

从研中海外
书究国外

刘东生

THE GREAT DIVERGENCE
大分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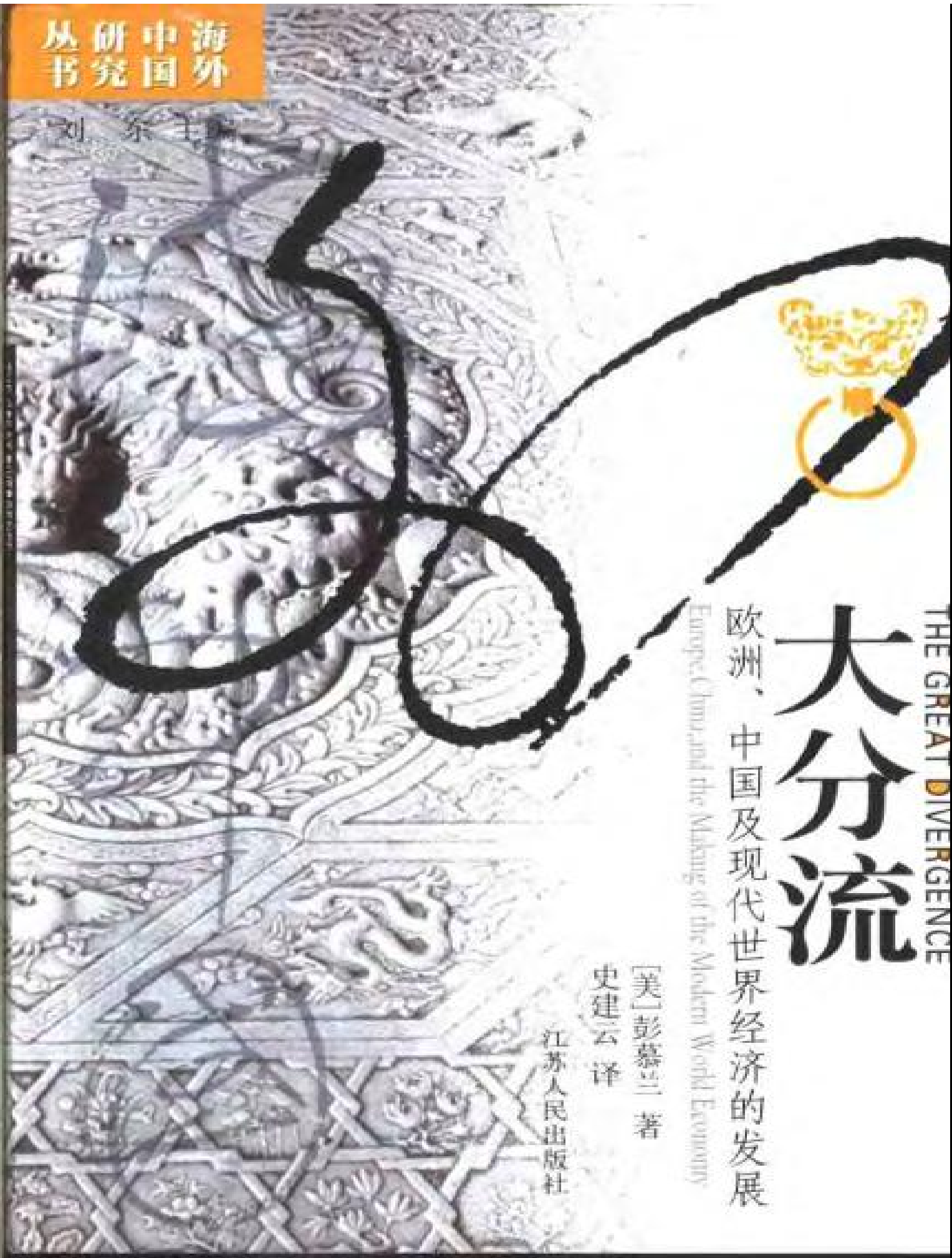
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

Europe, China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

〔美〕彭慕兰 著

史建云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刘东生 主编
周文彬 总策划

THE GREAT DIVERGENCE

大分流

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

Europe, China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

〔美〕彭慕兰 著

史建云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美)彭慕兰著;史建云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刘东主编)

书名原文: The Great Divergence: Europe, China,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

ISBN 7-214-03573-1

I. 大... II. ①彭... ②史... III. 经济发展—研究—世界 IV. F1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031927号

The Great Divergence: Europe, China,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

Copyright © 2000 b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only) Trade Paperback copyright © 2001

by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Jiangsu Ren Min Chu Ban Sh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in association with Arts & Licensing International,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10-2003-121

- 书 名 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
著 者 (美)彭慕兰
译 者 史建云
责任编辑 杨 健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中央路165号 210009)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集团地址 江苏出版集团(南京中央路165号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照 排 江苏苏中印刷厂
印 刷 者 淮安市楚州区书刊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960×1304 毫米 1:32
印 张 12.875 插页2
字 数 170千字
版 次 2003年11月第1版 2003年1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214-03573-1 F·742
定 价 26.00元

(江苏人民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序“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中国曾经遗忘过世界,但世界却并未因此而遗忘中国。令人嗟呀的是,60年代以后,就在中国越来越闭锁的同时,世界各国的中国研究却得到了越来越富于成果的发展。而到了中国门户重开的今天,这种发展就把国内学界逼到了如此的窘境:我们不仅必须放眼海外去认识世界,还必须放眼海外来重新认识中国;不仅必须向国内读者移译海外的西学,还必须向他们系统地介绍海外的中学。

这套书不可避免地会加深我们150年以来一直怀有的危机感和失落感,因为单是它的学术水准也足以提醒我们,中国文明在现时代所面对的决不再是某个粗蛮不文的、很快就被自己同化的、马背上的战胜者,而是一个高度发展了的、必将对自己的根本价值取向大大触动的文明。可正因为这样,借别人的眼光去获得自知之明,又正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历史使命,因为只要不跳出自家的文化圈子去透过强烈的反差反观自身,中华文明就找不到进入其现代形态的入口。

当然,既是本着这样的目的,我们就不能只从各家学说中筛选那些我们可以或者乐于接受的东西,否则我们的“筛子”本身就可能使读者失去选择、挑剔和批判的广阔天地。我们的译介毕竟还只是初步的尝试,而我们所努力去做的,毕竟也只是和读者一起去反复思索这些奉献给大家的东西。

刘 东

1988年秋于北京西八间房

中文版序言

我对这本书翻译成中文深感荣幸，期待着中文版的出版能够引起新的学术对话。我衷心感谢北京大学的刘东先生与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合作，进行了必要的安排，尤其要感谢史建云女士为这本书所做的特别认真的翻译工作。这本书现在已经两岁了，借此机会进行一些修改自然而然成为诱人的念头。但我没有这样做，只是订正了几处印刷错误，并改正了附录 E 中纺工和织工收入的一些计算错误。（幸运的是这些错误并不影响全书的论证，因为它们只涉及收入在纺纱和织布之间的分配，而大多数从事纺织品生产的家庭都是纺、织结合的。）

这并不是一个可以期望任何作者作出定论的课题，在我的著作受到非常多的称赞的同时，它也引起了相当大的争议。一些争议具体针对我的著作，一些则针对着一个对中国史和世界史进行学术再评价的更广泛的潮流。很多人现在把这个流派称之为“加州学派”，甚至于“尔湾学派”，但这个学派的成员只是一种松散的组合，并不限于加利福尼亚。我预料这本书在中国也会引起争论，尽管可能不是出于同样的原因。这意味着争论的变化而不是结束，当我们找到新的证据时，某些具体观点无疑会被推翻。但我以为本书中的一些观点将被证明有长久的生命力。

探究中国与欧洲的差异：时间、方法论和解释

首先，在我看来，通过最近两年的讨论已完全站住脚的观点是：欧洲的核心区和世界其他一些地方（显然主要是东亚，但或许还有其他地方）的核心区之间经济命运的大分流在 18 世纪相当晚的时候才出现。在我们能够对其进行计量的范围内，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在经济因素中占关键地位的劳动生

产率、重要日用品市场及生产要素市场的广度及自由度等,看起来都大致相同。在黄宗智、罗伯特·布伦纳和克里斯托弗·伊谢特努力重申江南地区生活水平和劳动生产率低下的老观点之后展开的一轮新辩论,在我看来只不过加强了这些新观点;读者可以在《亚洲研究》杂志2002年5月号上看到这场讨论的主要内容,全部讨论将收入一部即将出版的书中。而如果“大分流”的时间迟于我们通常认为的时间,这无可避免地会影响我们对它的解释。

在我看来已经站住脚的另外两个观点完全属于方法论问题——两者在很大程度上都要归功于这同一套丛书先前出版的我在尔湾的同事王国斌的著作。首先,我们两人都强调,在进行东西方比较(或者任何比较)时所用的单位必须具有可比性,而现代民族国家理所当然不是必然构成这些单位。因而中国作为一个整体(或印度作为一个整体)更适合与整个欧洲而不是与具体的欧洲国家进行比较;正如中国既有富裕的江南也有贫穷的甘肃一样,欧洲同样既包括英格兰也包括巴尔干。江南当然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但在18世纪,其人口超过除俄国以外的任何一个欧洲国家,就其在自己所处的更大社会中的经济职能来说,江南——而不是整个中国——是英格兰(或者英格兰加上尼德兰)的一个合理的比较对象。这种想法给了我们一条进行类比的基线,能使比较真正具有意义,从而使我们得以弄清,在世界不同地区、区域之间重要关系的建立方式有什么相同之处和不同之处。进一步使我们得以把经济发展看作地区间互动的结果,而不是始终寻找某种对一个具体地区内生的成功来说是具体的致命缺陷或关键的东西,并用这一关键性特征对1800年前的相同和1800年后的差异进行困难的解释。换一种方式表达,西方很多社会理论问的是“为什么是欧洲”,然后,在把世界其余部分从发展进程中排除后,再问“在欧洲内部为什么是英格兰”。但如果江南或畿内或古吉拉特与比方说塞尔维亚相比,对于长期发展来说是更好的候选对象——或者说它们肯定如此——为什么不彻底取消以洲为单位,直接去比较核心区?我们可能常常折回去引进比较传统的单位,当它们看起来有用时——毕竟一个重要的事实是:英格兰有它自己的政府,这个政府建立了与它的殖民地和其他贸易伙伴之间的关系,而江南没有——但如果我们把这些传统单位引进太早,它们就会妨碍我们的视野而不是帮助它,因为我们甚至会永远没有足够的可比性以开始我们的工作。

第二,我也以王国斌关于最好的比较是交互比较的主张为基础:这些比较问的是为什么欧洲不是中国,而不只是为什么中国不是欧洲。这一主张有几个优点。首先,它承认对西方经典社会理论(马克斯·韦伯等人)的批评,认为这些理论把非西方社会当作发展“失败”或“没有发生”的实例,同时没有

培养我们了解在其他地方确实发生过的不同形式的变化；但一些后现代学派的理论家根据这一问题断定我们应该放弃比较，与他们不同，王的主张提出了一种避免欧洲中心论（或至少将其最小化）的不同方法，即，在欧洲也寻找“没有发生”与“失败”。正如一句美国谚语所说，如果房间里有一头当时不应该存在的大象，可以委婉地假装它不在那里，但那完全不是事实。在我们打算集中描述其他区域的历史时，欧洲突发的现代性就是这样一头房间中的大象，而我们最好是承认它的存在。我们至少可以对中国和欧洲的实际情况进行比较，如我在本书中的尝试；当我们出于“根据它自己的条件”书写中国（或其他非西方社会）历史的值得称赞的目的，太经常地尽力把欧洲排除在这幅画面之外时，由一个欧洲史的理想化版本产生的一系列预期仍然是一种未经检验的存在，也仍然含蓄地规定了进程。在这方面，我们至少看清了欧洲很多实际情况也并不符合这一程式化的“欧洲史”——事实上，我们将看到一些实例表明，18世纪中国的很多地区比欧洲大部分地区都更符合这些预期。尽管诸如“为什么英格兰没有变成江南”之类听起来古怪的问题无疑并不比人们更为习惯的“为什么江南没有变成英格兰”天生更高明，但它们也并不更低劣，它们还具有重要的优势，因为人们通常很少提出这类问题，所以我们在研究它们的过程中还没有遭遇到成果急剧递减。

这使我得出了另一个观点，我认为这个观点是上面阐述的方法论与通过实证得出的直到相当近的时期经济后果并没有发生巨大差异的主张的结合。如本书将反复说明的，全世界的重要区域在18世纪时并不是完全相同的；相反，尽管人们能够确定在某些重要领域中，欧洲在比如说1700年就已经占据领先地位，但在一些同样重要的领域中也发现欧洲处于落后地位。由于我们知道19世纪发生的事情，我们太经常地把注意力仅仅集中于那些在比较早的时期就已经指向欧洲的突破和中国的困境的标志上。但一个更为准确的历史记录会承认指向不同方向的标志，并且会问，为什么在历史的某一时刻英格兰面对的问题（举例来说，相当平淡无奇的农业单位面积产量、最高产量几乎没有变化，一些地力耗竭的迹象，加上相当严重的滥伐森林）变成了小得多的问题，尽管由于英格兰的人口在1750到1850年间增长了两倍，人们预期它们本应成为更大的问题，而同时江南在例如地方能源供给（它曾长时期用多种方法进行调整适应）及它对以棉布换谷物的贸易的依赖（这种贸易长时期运转良好）方面相对的缺陷突然变成了更为严重的问题。再一次，对等的比较指引我们思考关联、联系和互动，在我看来，这种思考是对我们通过在一个区域内部寻找一个或两个根本特征来解释它在漫长过程中的轨迹而做的大量工作的一个重要的补充。甚至当我们寻找完全包含在一个正在比较

的单位之内的因素时，一种建立在交互比较基础上的方法也鼓励我们根据集中的具体的因素而不是一般性的描述进行思考，因而我们可能继续坚持清政府对某些重要部门（如采矿）的具体政策抑制了中国的发展的观念，但这是一个远离旧观点的呼声，那些一直以惊人频率提出的旧观点认为，我们可以用清政府更明显的“轻商”或“对发展无兴趣”、“追求地租”或“封建”等说法解释一切。

我集中注意的要素系列并不意味着详尽无遗。事实上，我赞成一些人所说，我们对被称之为“实用知识的成果和展示”（而不是比较狭义的“科学”）方面的差异应该给以更多的注意；我的意图是要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些我认为在以前的大多数解释中未受重视的因素，从而纠正不均衡，而不是想要涵盖一切。在纠正这些不均衡的过程中，回过头来思考地理问题、资源问题和环境问题对我来说是重要的。现代经济分析尽管有很大的作用，但可能经常误导我们认为所有资源最终都是可以替代的，以至一个单独的计量数据（总收入或资本积累）就代表了一个经济的容量。即使在几乎有无限的能源供应、低运输成本和化学工业（能够把碳氢化合物转化成几乎任何东西）的当今世界，这也并不完全真实。在一个 18 世纪的世界中它更是远离实际，在那个世界中，几乎一切食品、燃料、衣物纤维和建材都来自于植物种植，从而来自于当年的阳光、水分和土地的交互作用；在那个世界中，即使极为大量的劳动和资本也只能提高某一块已知土地的产量；也是在那个世界中，欧亚大陆的两端都突破了此前已经保持千年以上稳定的人口上限，发现它们本地的土地供给受到了令人痛苦的限制。在这些情况下，一旦我们用难以找到替代品的具体项目的物量进行观察，无论是土地制约的加紧，还是使其松解的资源幸运，最终都能够证明要比我们简单地把它们换算成等值的货币，并假定它们具有可替代性时它们会表现出来的更为重要。它们本身不是对增长加速或危机形成的解释，但它们产生的关联确实有力地改变了东西方的发展轨道。由此引起的经济命运和政治命运的分流远远大于实际生活在 18 世纪的任何人的预料；它是如此之大，以至当回顾它的产生过程时，难以相信它或是发生在相当近的时期，或是具有任何强烈的偶然性。

与中国史研究中其他倾向的关系

就研究中国史的具体著作来说，我的观点的一般延伸与最近李伯重、李中清、王国斌和其他人对清代经济成就正面的再评价一致。（在这一意义上，

也以吴承明等老一辈历史学家的学术成就为基础,但在一个方面突破了他们的研究,即,清代中国与一个早期资本主义的理想模式明确不同的那些方面并不是必然构成对发展的制约。)我的观点也与那些认为18世纪的中国在知性和其他方面都比早先的著作对它的描述更有活力的新的研究完全一致,尽管要评价这些不同的学术著作怎样互相紧密联系尚为时过早。

这并不等于说我们这些强调清代经济发展(更不用说任何更为广义的发展)实力的人在具体观点上都持一致看法。例如,我对18世纪产量的一些估计(特别是棉布)比李伯重的估计要高,但我确定的经济发展(至少以人均范畴衡量)开始减速的时间也比他确定的时间早,也更少直接论证全国市场的形成问题。一般说来,我们不仅都对清代经济成就有比较积极的评价,而且与前几代学者相比(既有马克思主义者也有自由主义者),更少强调明确的生产关系决定经济结果的能力;我们不是把具体的资本主义制度看作发展的必要条件,而是注重不同制度的组合可能取得相同的结果。同样,李中清和他的合作者认为中国人口体系取得了很多成果,而这些成果在马尔萨斯及其继承者看来,是英格兰所独有的,并且是通过完全不同的机制取得的。在这种关联中,至少王和我都援引了由伟大的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对“市场经济”(清代中国非常肯定已经出现)和“资本主义”(相对而言清代中国几乎没有出现)之间所作的区别——这种区分最近在西方学者中并不流行(或许除了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追随者),但在我们看来,它对于研究中国的过去和研究当代中国对建立一个不是简单模仿西方模式的市场经济所作的努力都相当重要,至少,我认为这一清代修正论的综合成果使下面的观点得到了广泛的接受,即:中国比较富裕的地区迟至18世纪中后期,在相对意义上极具经济活力,相当繁荣。那种认为中国或是由于人口压力,或是由于其社会所有制关系的性质而“闭塞”并极为贫穷的旧观点,现在在我看来完全处于守势地位。对于东西方在19世纪发生分流的“何因”的论争将会长时间伴随我们,但如果我们能够同意,我们改变了一直以来对“何事”与“何时”的解释——我们必须根据区域性的比较进行研究,必须根据一个相当突然的分流发生在1750年后的某个时间进行研究——那么我们就已经走过了长长的路途。

一些新的研究课题

如果这种关于经济分流的时间及性质的新认识能够成立,那么我们对于

中国历史的分期问题还有一些新的见解可以考虑。中国和西方的学者们在确定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时,通常如果不是定在明末(着重于内生的“资本主义萌芽”),就是定在1840年(鸦片战争带来的外部冲击)。然而,如果我们承认开始于明末,并在17世纪中期的中断之后以新的活力复苏的商业化浪潮和经济发展没有犯下什么具体的“错误”——没有什么因素使它与在其他地方影响较少人口的现代早期发展的类似浪潮相比更不重要或更没有前途——但尽管如此,也没有理由假定,如果不受干扰,这种现代早期的发展必然会转变为与现代发展相伴的引人注目的变革,那么,1550年看起来可能多少有点不重要,1840年则极为不重要。具体地说,鸦片战争不再是来自海外的中国现代性的起点,也不再是一个内生的现代性遭受挫折的关键时刻。它现在只成为许多重要时刻中的一个,在这些时刻,政府没有能力妥善处理外部环境造成的压力与一个不断变革的经济、社会、生态、政治环境之间的复杂关系。把这种时刻列一个目录,里面还会包括一系列推动性要素与衰减性要素的组合,例如引进新大陆的粮食作物、越来越多的移民进入西南与苗族起义;商人赞助者、不再能找到政府部门工作的学者与文化/知识变革之间不断变化的关系;江南-东北沿海贸易的发展、黄河治理费用的上涨与漕粮/大运河体系的衰微;中亚的平定与清代军界的变化;还有本书中举的许多内陆区域人口增长和手工业发展与长江中上游和三角洲地区间以稻米和木材交换布匹的远距离贸易的缩减的实例等等。

本书把重点放在区域性经济现象的分析上还暗示,我们可能需要对中国的不同地区作出不同的分期,这是多年以前施坚雅提出的一个观点,尽管是出于不同的理由。在这一方面,我打算说明的是,如果江南和内地之间的远距离贸易确实在1750年之后的某个时候开始衰落——造成了对双方都是致命的后果——而同时中国沿海的贸易却继续发展(不只是与西方,而且与东北、暹罗和其他贸易伙伴),我们在这一阶段还可以看到今天严重困扰着人们的某种势态的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一章:一个富裕的外向的沿海的国家和一个总的来说更为贫困的内陆之间,在经济和其他方面日益拉开距离。当我们重新考察1840年以后的一百年时,以前看起来是一个经济纯粹失败的时期现在表现得要复杂得多。一旦太平天国战争引起的巨大损害结束,在接下来的70年中,中国沿海很多地区经历了非常明显的发展:这不仅适用于那些被帝国主义从中国割裂开的区域(香港、条约规定的通商口岸、台湾以及比较短期的东北),也适用于长江下游大部分地区、广东、福建或许甚至还包括山东省东部。这种发展通常不仅与外国技术和(在某些实例中)商业惯例相关,与进入新的海外市场相关,而且与进口初级产品(例如东南亚的稻米和来自不同

地区的木材)取代内地供给的能力相关,后者早在18世纪末就开始更为稀缺也更为昂贵。在这一意义上,不断增长的海上接触造成的经济刺激和随着中国不同地区的联系在19世纪及20世纪初的中断而来的财政、政治、社会及某些情况下生态方面的灾难,都有着并不取决于西方的18世纪末的前因。如最近对中国—东南亚贸易研究的学术成果所表明,中国的海外移民亦是如此,他们开垦农田、开采矿山、开发其他资源供出口运回中国,这种移民在大约1870年以后变得非常重要——对东南亚,对中国,对我们常常错误地归之于纯粹属于“西方”对东南亚的入侵造成的活力。在所有这些方面,西方入侵和19世纪中期的其他灾难可能再度表现出使这些危机倾向极大加速,但没有启动它们。

一个极为长期的观点

最后,一个极为长期的观点提醒我们考虑怎样把东亚和西欧之间19世纪的分流放到全球历史的背景中。长期以来,这个分流本身就是背景,其他一切都要与它配合;世界史的大多数重要课题都是研究“西方的崛起”和“其余地区”所谓的停滞之间的差异,大多数早期的宏观历史著作在写作时至少隐含有阐明这一分流之前因的目的。近期对世界史的研究中目的论的倾向更少,在不同的方面预示了这里提出的观点,即:如果东西方重要区域的命运直到相当晚近还极为相似,为了解释这一分流而遍索遥远的过去或许并不是那么有用。然而,一些关注西方优势之深远根源的旧观点仍然有影响力,如戴维·兰德斯(David Landes)的近作《国家的财富与贫困》(*Wealth and Poverty of Nations*)。甚至在那些致力于建立一种较少欧洲中心论也较少目的论的新的世界史的人中,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也常常起着—个连接两段完全不同的世界史记事的枢纽作用。对于从1400年前后开始到1800年的这一阶段,我们已有的记述是,一些大体相似并且只有松散的相互关联的帝国、“文明”或“世界体系”沿着在很多方面并行的路线发展。然而,对19世纪和20世纪,大部分世界史学家告诉我们的历史是,一个单一的北大西洋核心成为变革的发动机,世界其余部分以不同方式作出“反应”;自由主义的历史观(认为现代性的“扩散”极为有益)和反自由主义的历史观(认为把非欧洲区域纳入一个资本主义体系是不幸的“合并”,如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追随者们的著作)在这一点上都是同样的。在这些史学著作中,中国在经济上落后于西方及清朝的政治形象与军事形象低下,成为西方和“其余地方”完全分离的

信号。

然而更近的事实可能警告我们注意,东亚与欧洲的差距是一种巨大但暂时的分离,而不是我的书名暗示的“大分流”。如杉原薰(Sugihara Kaoru)所说,如果世界结束于1820年,一部此前300年全球经济史的主体就会是东亚的奇迹:人口迅速增长,生活水平有节制但稳定地提高;结尾的简短的一章可能提到遥远的大西洋沿海有相当少量的人口似乎享有甚至更快的人均增长率(尽管或许不是太快)。如果世界结束于1945年,经济史的主体就会是,我们大部分人——至少是在西方——伴随着北大西洋的胜利和一个高消费、高能源利用和高劳动生产力的世界的诞生成长。在2002年,历史再度发生了位移。如果我们用总量指标作判断,1945年以来全球经济增长的重头戏并不是发生在西方,或非洲、拉丁美洲以及其他西方人能够用一只比较自由的手留下印迹的地方的前西方殖民地,而是发生在东亚(和东南亚的部分地区),那里至少曾保持部分的政治独立,同时使西方的技术适应它们完全不同的社会传统和天赋资源,而不是简单地模仿西方。即使我们根据人均指标作判断,日本也明显赶上了最富有的西方国家;台湾和南韩没有落后很远,中国沿海重要地区现在看来正在紧随其后。用某些基础指标如预期寿命和出生率判断,甚至中国许多内地区域(尽管以人均GDP衡量仍然贫穷)现在看起来也属于在世界上占第二位的成功区域,而不是简单地属于“其余”地区。的确,今天看来很难把东亚放在一个沃勒斯坦学派的观点中,按这一观点,外围区域一旦落后,就会陷入使它们永远也无法赶上来的不利境地。此外,这一东亚发展的大爆炸看来是本土技术和经验与北大西洋技术和经验融合的结果,也是这些地区间的一种分工,而不是源于简单抵制以前对西方有利的做法。

因而,如果站在比方说孟加拉或非洲的角度看,我在这本书中讲述的历史根本不是真正的大分流的历史。实际上,2002年春天在牛津举行的对本书的一次专题讨论中,一位著名的印度史学家说,他认为这本书中最令人震惊的内容正是,欧亚大陆的两端彼此相像的程度看起来远远超过像它们之间的任何地方。但同时,这个与19世纪北大西洋的持续密集发展的变革同时出现的经济分流仍然是全球历史的临界时刻之一,我们还远远不能说在中国同一时期没有发生这种转变对人民不再重要;事实上,我们不能肯定早晚会证明那一观点。到现在为止,我们仍然缺少词汇可以充分描述在至关重要的方面与西方经历不同,但仍然指向同样的“现代”社会的那些变革。这个课题过于庞大,需要对各种各样的前工业社会及其变革方式和连续性,以及把世界不同地区工业持续发展的开端归类的断裂性有更细微的理解。它还要求太平洋两岸的历史学家和其他学者深化我们的互相对话。江苏人民出版社主

持的这套译丛是这种对话基础的一个组成部分,我对我的著作列入译丛感到荣幸并表示感谢。我热切期待着中国同行们的反响。

彭慕兰
尔湾,加利福尼亚
2002年8月15日

目 录

中文版序言 / 1

引言：欧洲经济发展之比较、联系和叙述 / 1

欧洲中心论的各种变体：人口、生态和积累 / 8

其他欧洲中心论：市场、公司和制度 / 11

与欧洲中心论相关的问题 / 13

建立一个更兼容的历史 / 15

比较、联系和论述结构 / 21

对地理范围的一个说明 / 22

第一部分 无数令人惊异的相似之处 / 25

一、欧洲领先于亚洲？人口、资本积累和技术对欧洲发展的解释 / 27

农业、运输和牲畜资本 / 28

寿命更长？生活更好？ / 32

出生率 / 36

积累？ / 37

技术又如何？ / 39

二、欧洲和亚洲的市场经济 / 64

中国和西欧的土地市场以及对土地利用的限制 / 65

劳动体系 / 74

迁移、市场和制度 / 77

农产品市场 / 80

农村工业和副业活动 / 81

中国和欧洲的家庭劳动：“内卷”与“勤劳革命” / 85

第一部分的结论：现代早期世界经济的多重核心和共同制约 / 100

2 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

第二部分 从新风气到新经济? 消费、投资和资本主义 / 101

引言 / 103

三、奢侈消费和资本主义的诞生 / 106

更多和更少的普通奢侈品 / 106

现代早期欧洲和亚洲的日常奢侈品及大众消费 / 108

耐用消费品和奢侈的“物化” / 118

舶来品与时尚的轮转速度:全球性关联和以经济差异为基础的
文化外观 / 142

奢侈品需求、社会体系和资本主义企业 / 152

四、看得见的手:欧洲和亚洲的企业结构、社会政治结构与“资本主义” / 155

海外剥削和资本积累:威廉斯理论的再审视 / 174

明显因素的重要性:奢侈品需求、资本主义和新大陆的殖民地化 / 177

国家间的竞争、暴力和国家制度:它们多么不重要又多么重要 / 182

第二部分的结论:相似之处与不同之处的意义 / 193

第三部分 超出斯密和马尔萨斯之外:从生态制约到工业持续发展 / 195

五、共同的制约:西欧和东亚的生态紧张 / 197

中国的森林采伐和地力衰竭:与欧洲的一些比较 / 211

与旧大陆外围区域的资源贸易:准马尔萨斯问题之斯密型
解决方式的共同模式和限制 / 227

六、土地制约的解除:作为一种新外围的美洲 / 247

另一个新大陆,另一笔横财:贵金属 / 252

生态缓解的一些度量标准:工业革命时代的英国 / 256

比较和计算:这些数字意味着什么? / 261

超出这些数字之外的东西 / 263

进入一个工业世界 / 266

最后的比较:劳动密集、资源和工业的“成长” / 267

附录 / 279

A 人均陆地运输能力的比较估计:1800年前后的德国和印度
北部 / 281

B 18世纪后期华北和欧洲农场使用的肥料估计,及由此产生的
氮循环量的比较 / 283

- C 法国、岭南与华北一个地区森林覆盖率和燃料供给估计，
1700—1850 / 287
- D 18 世纪后期和 19 世纪初期英国各种输入提供的“虚拟面积”
估计 / 293
- E 中国长江下游地区农村纺织工人挣钱能力估计，1750—1840 / 296
- F 棉花和丝产量估计，1750 年及较晚期，长江下游和全中国——
与联合王国、法国和德国的比较 / 307

参考文献 / 319

索引 / 369

引言：欧洲经济发展之比较、联系和叙述

3

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欧洲人为了弄清是什么造就了西欧^①独有的经济发展道路而作出了很多努力，这些努力成为现代社会科学的重要起源，然而这些努力一直没有达成一致的结论。大部分文献集中于欧洲，力图解释欧洲机械化大工业的早期发展。与世界其他部分的比较习惯于展示“欧洲”——或者套用某种公式说是西欧，新教的欧洲，甚至就是英格兰——在其边界内有一些推动工业发展的独一无二的内在因素，或者与众不同地避免了一些障碍。

其他一些解释突出了欧洲和世界其他部分的联系——特别是殖民剥削的不同形式——但大多数西方学者不支持它们。^② 这些观点强调马克思所说的资本通过暴力剥夺美洲印第安人和奴役非洲人（以及欧洲自己的下层阶级的很多成员）进行“原始积累”，但对解决问题并没有多少帮助。在这一术语正确地突出了这些过程的残忍性的同时，它也暗示出这种积累就资本大规模积累的起步而言确实是“原始”的。由于学术研究显示出，欧洲人储存的自己的农场、工场和店铺收入中超出维生水平可以用来投资的剩余有着缓慢但明确的增长，上述观点逐渐站不住脚。

本书也强调对非欧洲人的剥削——还有对海外资源更普遍的利用——

^① 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西欧”，对大多数作者来说，是一个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而不是一个真正的地理实体，例如，爱尔兰、南意大利和伊比利亚的大部分地区，都远远没有达到典型的欧洲或西欧通常所具备的经济发展程度。一般情况下，我使用这一术语的地理含义，同时要指出的是，在某些比较中，通常用以代表“欧洲”的地区（例如尼德兰南部或英格兰北部），在面积和经济特征两方面与中国的江苏省之类单位，而不是与诸如中国或印度这样的整个次大陆可能更具可比性。

^② 例如，注意当前对 Eric Williams(1944)、Andre Gunder Frank(1969)、Samir Amin(1974) 等人观点全面否定的主流意见。对海外剥削研究的一个全面评论见 De Vries 1976: 139—146, 213—214。

2 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

4 但不把它们当作欧洲发展的惟一动力。本书承认欧洲发展的内在因素的重要作用，但着重于直到 1800 年以前，这些过程与其他地区——特别是东亚——的过程的相似之处。确实存在某些重要的差异，但我将证明，它们只有在欧洲拥有海外资源特权所规定的背景下才能引起 19 世纪的大变革。例如，在动员大批为了获得回报而情愿等待相当长的时间的资本方面，西欧可能有更为有效的制度——但直到 19 世纪，除了武装长途贸易和殖民外，很少见到公司组织形式的其他用途，长期的联合贷款主要是在欧洲内部用于战争经费。更重要的是，到 18 世纪，西欧在使用各种节约人力的技术方面已走在世界其他地区的前面。然而，由于它在各种各样节省土地的技术方面继续落后，在没有海外资源的条件下，迅速增长的人口和对资源的需求可能迫使它回到一种更为劳动密集型的道路上去。这种情况下，它与中国和日本的差异将会小得多。因而，本书认为海外高压统治带来的好处有助于解释欧洲的发展和我们在欧亚大陆其他一些地方（主要是中国和日本）所看到的现象之间的差别——但不能解释发展的全部，也不能解释欧洲和旧大陆所有其余部分之间的差别。还有其他一些完全不适合上述任一情形的因素也起了作用，例如煤矿的位置。因此，本书把比较分析、某些单纯的地方性事件以及一种综合性的或全球性的探讨结合在了一起。

此外，比较分析和综合探讨也互相制约。如果把西欧与比如印度或东欧区分开来的因素（例如劳动力市场的某种性质）在中国也同样存在，那么这种对照就不能简单地成为对一种欧洲差异的研究；欧亚大陆两端共有的模式也不能解释为欧洲文化或历史独有的产物。（当然，既然它们把某些社会与其他社会区分开来，也不能把它们解释为世界性趋势的派生物。）西欧与其他地区的相似之处迫使我们从一种单纯的比较方法——这种方法是实质上各个离散的社会作为比较单位——向一种同时着眼于全球性关联^①的方法转变，而这些相似之处还有另一种意义。它们意味着如果我们以欧洲为世界体系中心的话，就无法理解 1800 年以前的全球性关联；我们有的是一个多中心同时没有占统治地位的中心的的世界。全球性关联通常有利于西欧，但并不一定是因为欧洲人创造了这些关联或对其施加影响。举例来说，中国自 15 世纪以来重新以白银为货币——这个过程先于欧洲人到达美洲以及美洲白银的输出——对于西班牙在遥远的新大陆上的殖民地获得经济支持起了重大的作用；而极其可怕的、无法预料的瘟疫在最初创建殖民地时也是十分重要

^① 对那些表现出制度上的关联而不是真正离散的实体之间的比较的讨论（他称之为“环境比较”），见 Tilly 1984。

的。只是在19世纪工业化充分发展之后，一个单一的、占支配地位的欧洲“中心”才有意义。

然而，现有的大部分著作一直被限定在一个非此即彼的框架中——不是用一个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体系——它进行了必需的海外原始积累^①——就是用所谓的欧洲内生的发展，来解释几乎所有一切现象。在这两种选择中，大部分学者倾向于后者。事实上，欧洲经济史学界最近至少在三个方面全面加强了一种排他性的内生中心。

首先，最近的研究认为，发育完善的市场和其他“资本主义”制度在时间上可以回溯得越来越远，甚至可以回溯到通常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对立面的“封建主义”时期。^②（一种类似的修正也出现在对中世纪科学技术的分析中，那个曾被贬为“黑暗时代”的时期现在开始被视为具有相当的创造性。）这种研究加强了下述观念，即西欧在其开始海外扩张之前，就已经走上了一条独有的前途宽广的发展道路。在一些最近的研究中，工业化本身不再是一个转折点，它被包容进长达几个世纪的无差别的“发展”中。

这些研究与过去的著作表现出了一些细微差别，旧文献——从19世纪后期社会学的经典著作到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现代化理论——强调在现代西方和它的过去之间，以及现代西方和非西方社会之间，存在着一种根本性的对立。当较近期的著作试图缩小第一条鸿沟时，它暗示出第二条鸿沟——欧洲特殊论——可以追溯到甚至比我们想到的更早。而本书的一个中心论点就是，人们能够同样容易地找到根据，缩小18世纪的西方与至少是欧亚大陆其他一些地方之间的鸿沟。

其次，市场动力越是出现在想像中抱有敌对性的中世纪文化和制度中，就越是引诱人们把市场驱动的增长当作欧洲发展的全部历史，忽视凌乱的细节，混淆数不清的政府政策和地方习俗造成的影响。^③ 如果国内的法令只是

① 例如，Blaut 1993:186—206。

② 最近的一个较好的例子见 Britnell 1993。

③ 把立法变化和风俗习惯的重要性最小化倾向的例证，可以在重新解释英国敞地缩减的大量著作中见到。这些敞地曾经被认为代表了一种与新兴资本主义对立的集体道德观，它们被立法破坏是由于更多的个人主义代替家长制观念在议会中占了统治地位。现在普遍认为，对于一个收成不断波动，没有保障的环境中的个人来说，敞地制事实上代表的是一种理性的策略，它的消失主要是由于逐渐下降的利率使另一种形式的收获保险——即谷物储存——与使一个人保有很多零散的、可能在肥力和小气候方面有细微差异的小块土地相比，更便宜也更有效。（例如，McCloskey 1975a, 1975b, 1989）。这种观点一个进一步的推论——在下文76—80页（指本书英文本页码——译注）将对其进行讨论（和反驳）——声称，法国缺少由政府对传统的敞地制发动的同样成功的攻击行为，对于法国发展所起的阻碍作用并不像以前的历史学家普遍认为的那样重要。

4 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

6 增加了通往欧洲发展大道的小路或偶然发现的捷径,为什么对海外——在远离历史主流的地方——的压迫应该值得更多的注意?同时,对个人主动性越来越集中的关注,不仅提供了一条人们渴望的明确的历史主线,而且提供了一条与当前流行的新自由主义观念协调一致的历史主线。

第三,由于这类商业化进程涉及到了前工业时代西欧的许多地区,最近很多著作把与工业革命相关的无论什么东西都作为一种欧洲现象,而不是像通常习惯的那样,作为一种后来传播到欧洲其余地方去的英国现象来对待。^①这样一种趋势不仅受到一大批旧著作的挑战,而且受到认为英格兰在工业革命之前的几百年中,在一些关键性的方面已经与大陆发生分流的较新的著作的挑战。^②但是,上述降低政治重要性,缩小“传统”行为与理性的利己主义个人之间的冲突,从而使西欧内部的差别更容易最小化的倾向,为从英国中心论向欧洲中心论的转变提供了方便。

用一个“欧洲奇迹”代替英国奇迹有着重要的意义。首先,它再度使欧洲之外的联系显得不那么重要。西欧大部分地区卷入洲际贸易远远不像英国那样深,所以如果是“欧洲”而不是“英国”的商业增长稳步导致了工业发展,则国内的市场、资源及其他等等对这一转变来说肯定是足够的。而且,如果发展主要通过竞争性市场的逐渐完善而实现,受到重商主义限制和不自由的劳动困扰的殖民地——这里只提这两个问题——能够有足够的动力对它们的宗主国施加巨大影响就显得似乎不合情理。因而帕特里克·奥布赖恩(Patrick O'Brien),一位“欧洲”观的主要代言人,勉强承认如果没有殖民地和奴隶劳动,很难想像英国的工业化——其中棉业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还能进行下去:^③

只有一个以棉业作为重要部门、以英国改革作为西欧发展的发动机的过于简单的发展模式才能支持一种论点,即,兰开夏的棉纺织工业对于这个核心区的工业化生死攸关。这个过程有着如此广阔的战线,以至不可能被一支其供给线越过海洋延伸到亚洲和美洲的先锋队的失败所阻止。

① 对英国中心论的两种经典论述,尽管完全不同,见 Landes(1969)和 Hobsbawm(1997)。对这一观点最尖锐坦率的批评之一是 O'Brien 和 Keydar 1978。

② 见 Snookes 1994a, Wrigley 1990:101—102。

③ O'Brien 1982:12。

然后他作出结论说：“对于这个核心区的经济增长来说，外围就是外围。”^①

这种观点使欧洲的海外扩张在一个经济优势逐渐取得支配地位的过程中成为次要因素。对殖民地的权力可以用这种优势来解释，也可以不依赖于它，但殖民地与优势的产生没什么关系。由此产生的论述在两个重要方面自我支持：它们既不需要超出欧洲的地理范围，也不需要超出位于主流经济中心的买主和卖主自由竞争的模式。对于那些也在很大程度上用专利制度——能使创造力获得更为可靠的所有权——解释技术革新的加速度的学者来说，这个闭合模式几乎是完美无缺的。

对“欧洲”工业化的强调也常常以毫无助益的方法决定我们进行比较时所用的单位。在某些情况下，我们仅仅根据当时的民族国家确定比较单位，所以会用英国与印度或中国来比较。但是印度和中国各自在面积、人口和内部多样性方面都与整个欧洲而不是单个的欧洲国家更具可比性；而在这两个次大陆内部，一个自身与英国或尼德兰具备可比性的区域，在加上亚洲那些与巴尔干、南意大利、波兰等地对等的区域进行平均后又失去了可比性。只有在国家政策成为正在研究的这段历史的中心时，国家才会是一个合适的比较单位。

另一种长用不衰的方法是首先搜寻那些使“欧洲”成为一个独特的整体的东西（尽管所选择的细节通常只是真实描绘了欧洲大陆的局部），然后，一旦把世界的其余部分从这幅画面中摘除出去，就在欧洲内部寻找某种使英国独特的东西。这些欧洲的或“文明”的单位如此强有力地影响了我们的思想，以致很难动摇它们；它们也会在本书中出现。但为了多种目的，尝试一种我的同事王国斌（R. Bin Wong）在一些重要领域已使用过的不同的方法看来是更为有用的。^②

让我们同意下面的说法：一些基本特征结合成为，比方说，荷兰和乌克兰，或者甘肃和长江三角洲；一个像长江三角洲这样的区域（1750年前后大约有3100万—3700万人口，视三角洲的准确界线而定）肯定大得足以与18世

^① 同上。在他与Keydar研究英国和法国的著作中，O'Brien提出了极有说服力但却相当不同的论点，即欧洲的工业化不是简单的英国改革向大陆其他地区的扩散。例如，法国全力发展了不同的工业部门，这些部门通常涉及到使英国生产的半成品成为成品。但正是英国和法国之间的这种互补，显示出通往工业化的不同道路的可能性，也提醒我们不能简单地把英国的工业化从历史中抹除，还说明即使没有英国的工业化，大陆无论如何也是会工业化的。而英国的历史，如我们将要见到的，如果没有两个关键性的断裂——一个由煤，另一个由殖民地造成——是难以想像的。

^② 王 1997。

8 纪的欧洲国家作比较；分布于整个旧大陆的各种各样的核心区——长江三角洲、关东平原、英国和尼德兰、古吉拉特——共同拥有某些重要的特征，而这些特征是它们周围其他大陆或次大陆地区不具备的（例如，相对自由的市场、广泛发展的手工业生产、高度商业化的农业）。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不对这些区域直接进行比较，而宁可引入那些无论日常生活还是贸易、技术传播及其他等等的主要模式都没有多少相关的有着很大随意性的大陆单位呢？^①此外，如果这些分散的核心确实有很多共同点——并且如果我们愿意承认偶然性和关联性起了某种作用——我们对它们进行的真正的交互比较就有了意义：即，在按照较为一般的做法探讨那些使非欧洲地区没能走上标准化的欧洲道路的阻碍因素的同时，寻找那些使英国从一条本来可能使它更像长江三角洲或古吉拉特的发展道路分流的不存在的、偶然的和阻碍性的因素。

这里，我也遵循着一个在王国斌新著《转变的中国》中勾画出的程序。如王所指出的，许多 19 世纪的经典社会理论确实由于其欧洲中心论而有缺陷，但当前某些“后现代”派学者采用的相反的态度——全盘放弃文化间的交互比较，几乎完全集中于揭示历史瞬间的偶然性、特殊性以及或许是不可知性——使其甚至无法触及到历史（及当代生活）中的很多最为重要的问题。看来通过尽量进行较好的比较来对抗带有偏差的比较会更为可取一些。在通过另一方的前景进行观察时，把比较的双方看作“互相偏离”，而不是总把一方看作标准，可以部分地做到这一点。这将是我在本书中大量使用的方法，尽管我对这种交互比较方法的具体运用与王有一些重要的不同，并且我用这种方法研究的领域也相当不同。^②

9 这一相对来说未经检验的方法至少以一种不同的见解对世界各种不同地区提出了一些新问题。例如——在这里我再次与王相当一致——我将证明，一系列均衡性比较显示出，迟至 1750 年，欧亚大陆的许多地区在农业、商业和原始工业（即为市场而不是为家庭使用的手工制造业）的发展中仍存在着一些令人吃惊的相似之处。因而，19 世纪只在西欧出现的进一步的巨大发展再一次成为一种有待解释的断裂。相反，一些近期的著作，由于把自己限制在欧洲不同时间段的比较并寻找它们的相似之处（那确实够多了），常常模糊了这种断裂。因而，这类著作通常也不会忽略对工业化的重要贡献——特

^① 关于“文明社会”作为一个单位的有限的效用，见 Fletcher (1995, 3—7)；Hodgson (1993, 17)。关于大陆，见 Wigen 和 Lewis (1997)。

^② 例如，我比王对全球关联及其相互的影响给予了更多的强调，讨论了欧洲和中国之外的更多地方；我对他的某些主题如国家结构等也几乎没有谈论，而对他没有广泛研究的主题如环境变化之类则谈论得很多。

别是各种关联做出的贡献——在这里是作为理所当然的“背景”出现在一个限于欧洲不同阶段的比较中。

双向比较的一个范畴也证明把两个初看好像是单独的问题联系起来是正确的。西欧成为最富有经济的那一时刻,并不必然是打破了一个马尔萨斯公式,进入人均持续增长的世界的同一时刻。事实上,大部分我所称之为“欧洲中心论”的著作都认为,西欧早在其工业出现突破之前很久就已经独自富裕起来了。如果我们惟一的问题是,中国(或印度,或日本)是否能够自己作出向这样一个世界的突破——即,如果我们把欧洲的经验标准化,使之成为一个在没有“阻碍”或“失败”的情况下人们可以预期的模式——问欧洲在什么时间实际上避免了马尔萨斯公式就不再有意义了,有更重要意义的是它已经很长时间走在一条最终一定会导致那一突破的道路上了。同时,它最终超越过其他地方的那些时刻不会告诉我们欧洲还会有什么别的可能性,只能告诉我们其他那些地方在何时走上使它们进入停滞的弯路。

但如果我们进行交互比较,并准备考虑欧洲能够成为一个中国的可能性——即没有任何地方必然会取得引人注目的持续的人均增长——这两者之间的联系就会变得更紧密。如果我们进一步证明——如我在随后的几章中那样——18世纪世界其他一些大体上与欧洲一样闭合的地区,如何在资源制约没有获得一个戏剧性的缓解(就像矿物燃料和新大陆对欧洲的作用)的情况下,把它们的经济潜力利用到最大限度,那么这两个问题之间的联系甚至会再进一步。

这两个问题仍然是可分的:气候、土壤及其他方面的差异,可能使不同地区有不同的前工业的可能性。但在这些可能性方面,似乎欧洲不大可能对所有其他人口密集区域都有实质上的优势,特别是鉴于本书下面列举的证据表明,直到工业化得到充分发展之前,欧洲的情况实际上并不比东亚好多少。或者最终可以证明,尽管直至工业革命前夜欧洲并没有领先于东亚,但某些制度在早得多的时间里就处于最终确实使工业化必然发生的状态;即使没有美洲和位置有利的矿物燃料,纵然存在任何具体的地方资源短缺,技术发明也已经足以支撑增长,而不必凭借在别处支持了总体而不是人均增长的极端劳动密集的方式。但一旦我们真正把欧洲与其他一些前工业社会的水准进行对照,坚持这样一种必然性需要的大量的假设看起来就是不可靠的——特别是鉴于欧洲工业化前最后几百年的经济史没有显示出长期稳固的人均增长。因而,双向比较既提出了新问题,也重新设定了老问题之间的关系。

因此,本书将把重点放在欧洲的地区和中国、印度等国的地区之间的交互比较,这些地区以我看来在它们的大陆中占有相似地位。当我们的问

题——诸如那些关于核心与其腹地之关系的问题——需要时,我们将回到以大陆为单位甚至更大的单位,例如大西洋世界。在某些情况下,由于需要作一种多少有点不同类型的比较,我们将把全世界作为我们的单位——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称之为“环境比较”,在这种比较中,我们不是比较两个独立的事物(如经典社会学理论所做的),而是考虑一个较大的整体的两个组成部分,观察这一体系中每个部分的地位和机能怎样影响它们的性质。^①在我比王更为强调的这一层面上,对各种关系的比较和分析变得难以辨别。然而,相关分析仍然重要。我们对一个互相作用的体系——其中的一个部分比其余部分从中受益更多——的感知,本身并不能证明把那个部分称为“中心”,并假定它是其他一切事物的畸形的塑造者是正确的。反之,我们将要看到的是在不同方向移动的影响力的矢量。

欧洲中心论的各种变体:人口、生态和积累

认为惟有西欧经济才能产生工业变革的观点一般说来分成两大类。第一种,以 E. L. 琼斯(E. L. Jones)的著作作为代表,认为在一个类似于“前工业”的外表下面,从 16 世纪到 18 世纪,欧洲在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两方面的积累都已经远远领先于世界其余地方。^② 这种观点的一个主要信条是,对生育力的各种习惯性抑制(晚婚、神职人员的独身等等),使欧洲避免了“前现代生育体制”造成的另一种普遍状况,由此也避免了一种同样普遍的状况,即人口增长几乎吞噬了任何生产增长的全部成果。因而,只有欧洲才能调节其生育力使之适应艰难时期,并在这漫长岁月中增长其人均(而不只是总量)积蓄资产。

因此,按照这一观点,普通农民、手艺人 and 商人的 人口行为及经济行为的差异创造了这样一个欧洲:这个欧洲能够供养更多的非农业人口,使其人民得到更好的工具(包括更多的家畜),使他们有更好的营养、更健康、更有生产能力;并能够为超出于单纯生活必需品范围的商品建立一个更大的市场。奠定这一观点的主要论据在 30 多年以前由约翰·哈伊纳尔(John Hajnal)提出^③,自那时以来它们得到了详细的阐述,但没有根本的改变。然而,如我们

① Tilly 1984.

② Jones 1981, 1988.

③ Hajnal 1965, 1982.

在第1章将见到的,最近对中国、日本和(更多是推测性的)东南亚的出生率、预期寿命及其他人口变量的研究,使哈伊纳尔认为的欧洲人独有的成就显得越来越普通。

这些发现的重要性还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但在最近新发现的一个人口对历史的驱动作用的重要意义中,它们已经被部分了解:即承认在欧洲以外的前工业环境中存在经济繁荣和生活水平的提高。然而,这些事实总是被当作昙花一现,它们或是易受政治变动的伤害,或是在提高生产力的革新最终不能领先于由繁荣促进的人口增长时自行消亡。^①

这类论述与比较早期的著作相比是个重大的进步,那些著作或明或暗地认为,在现代早期欧洲取得突破性成就之前,全世界都是贫穷的,只有最小程度的积累;除了其他方面以外,它还迫使学者们不仅注意“欧洲的崛起”,同样注意“亚洲的衰落”。^②然而,这些对历史的看法至少在两个关键方面常常出现时代性的错误。

第一,它们往往把太多的在19世纪和20世纪困扰亚洲大部分地区的生态学的灾难(和人口密集造成的问题)强加到早期阶段,并认为18世纪的亚洲社会已经把一切可能的潜力消耗殆尽。某些观点把这种情形加之于一个人为规定的名叫“亚洲”的单位在1800年前后的所有地区;但是,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印度、东南亚以至中国的一些地区,在科学技术既没有发生重大突破,生活水平也没有下降的情况下,仍然有很大的余地可以容纳更多的人口。可能只有中国和日本的几个地区曾面临上面所说的情况。

第二,这类论述经常把欧洲从新大陆获得的特别的生态恩惠“内在化”。一些论述这样做时把海外扩张同化为欧洲内部“正常”的边境扩张模式(例如对匈牙利平原、乌克兰或德国的森林的开拓和移民)。这种说法忽视了新大陆这笔意外之财的特殊规模,忽视了那里殖民地特殊的强制性特征和生产结构,忽视了保证欧洲人在美洲扩张成功的全球性动力的作用。^③匈牙利和乌克兰的新农地的开拓与四川、孟加拉和旧大陆其他许多地方新农地的开拓类似,而在新大陆发生的事情完全不同于欧洲或亚洲发生的任何事情。此外,由于19世纪的欧洲在其边界之外找到了巨大的缓解生态问题的机会——既获得了资源又输出了移民^④——这种解释几乎不考虑16世纪到18世纪欧洲的某些人口密集的核心区是否曾面临过与亚洲核心区并无根本不同的生态

12

① Jones 1988; Elvin 1973; Powelson 1994.

② Abu-Lughod 1989; Frank 1998.

③ 实例见 Jones 1981: 70—74.

④ Crosby 1986: 2—5, 294—308.

压力和选择。

因而，把“亚洲的衰落”一体化的著作常常借助于一种过分简单的对比，即，把一个在生态方面已耗尽的中国、日本或印度与一个有广阔空间可供发展的欧洲——用一个短语表示，由于还没有发展到足以充分使用其内部资源而享有“落后的好处”^①的欧洲——进行对比。

为了尽力改变这种给人深刻印象的意见，第5章对中国和欧洲挑选出来的重要区域作了一个生态制约条件的系统比较。这一考察显示出，尽管18世纪欧洲一些地方比它们在东亚的对应区域有某种生态上的优势，全部模式却是相当混杂的。实际上，在一些出人意料的方面，中国的重要区域看起来比它们的欧洲对应区域境况更好，例如人均可利用燃料的供给。此外，英国这个工业化实际开始的地方，几乎不拥有在欧洲其他不同地区仍有存在的尚未充分使用的资源。实际上，对于木材供给、地力损耗和其他重要的生态指标，它似乎并不比它在中国的对应区域——长江下游三角洲——处境更好。因而，如果我们承认人口增长及其生态影响使中国“衰落”的理论，那么我们就必须说，当海外资源和英格兰在利用地下蕴藏的能源方面取得的成就（部分以地理上的好运为条件）结合在一起使欧洲得到挽救时，欧洲的内部进程已经使它非常接近于同一个悬崖峭壁——而不是“起飞”的边缘。另一方面，如果欧洲还没有陷入困境，那么中国也完全可能同样如此。

在进行这一论证时，本书与杉原薰研究全球发展的著作中的一些论据相同——我在写作过程中发现该书太晚了，以致无法更详细地进行分析。^② 杉原薰像我一样，强调1500到1800年间东亚人口的高增长率不应该被视为阻碍“发展”的病态。相反，他认为，这是一个供养人口、创造技能等等的“东亚奇迹”，作为一种经济成就，它完全可以媲美于工业化的“欧洲奇迹”。杉原薰还像我一样强调18世纪的日本和（按照他的观点，在一个较小程度上）中国较高的生活水平，以及尽管缺乏国家对所有权和契约的同样保证——很多西方人坚信这是市场的前提——仍对市场产生了很多有利影响的复杂的制度。^③ 他还认为——一个与我的论证一致的观点，尽管超出了本书范围——从长远观点看，正是一个西欧和东亚发展类型的结合，而不是单一的西方成就的传播，对世界GDP做出了最大的贡献，因为前者使西方的科学技术得以

① Frank 1998:283, 对 Gerschenkron 的嘲讽。

② 杉原薰 1997。

③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最近几年，很多西方经济史学家也开始有兴趣描述那些可以轻易强行订立契约，因此即使在缺乏国家对财产权的有力保护时，也允许高效率市场存在的制度安排。有参考价值的概括见 Greif 1998:597—633。

在有更巨大人口的社会中应用。

然而,杉原薰认为,这两种“奇迹”之间一个基本的差异是,早在1500年西欧就走上了—条资本密集的道路,而东亚则走上了—条劳动密集的道路。与他的观点相反,我认为欧洲本来也可能走上—条“东亚式”的劳动密集道路——这符合那些迟至1750年还能见到的令人惊异的相似之处,也与我解决“为什么英国不是长江三角洲”问题的决心—致,这个问题与“为什么长江三角洲不是英国”同样严肃。欧洲没有如此是因为原有的道路发生了重要的急剧断裂,这种断裂以矿物燃料和新大陆资源的利用为基础,这两个因素的共同作用,避免了密集使用土地的必要性。事实上,有很多迹象表明,欧洲有许多富裕区域已经被引上—条较为劳动密集的道路,直到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引人注目的发展才扭转了那条道路。我们将在全欧洲(包括英格兰)的农业和原始工业部门以及丹麦的几乎所有部门中找到这类证据。^① 围绕着劳动密集发展起来的东西方的差异不是必然的而是极为偶然的;人口增长的分布状态(与其总体规模相对比)最终证明是一个重要变量,又与16世纪到18世纪欧洲的市场变形和19世纪向新大陆的移民发生了很大关系。

在中国和日本,1750年以后的人口增长严重集中于不发达地区,而这些地区可以通过与资源饥渴的核心区的贸易“释放”的谷物、木材、原棉和其他土地密集产品的剩余较小;由于这些外围地区增加的人口中有—部分进入了原始工业,它们也更少需要与核心地区的贸易。另—方面,在欧洲,主要是那些已经相当发展、人口相对密集的区域在1750到1850年间人口大规模增长。例如,东欧的大部分地区只是在1800年以后才开始经历人口的迅速增长,南欧(特别是东南欧)甚至于更晚才开始急起直追。第5章和第6章将更多地讨论这些差异的政治-经济和生态基础以及它们对工业化的意义。同时,值得强调的是,它们并不是那种能够反映东亚(更不必说南亚)经历了比欧洲更严重的全面资源紧张的差异。然后,让我们从对可利用资源数量的讨论——无论 14
是已经积累起来的还是未经使用的——转向那些认为欧洲制度分配资源的方式更有利于长期自我支持的发展的观点。

其他欧洲中心论:市场、公司和制度

另—大类观点——显然在布罗代尔、沃勒斯坦和 K. N. 乔德里(Fernand

^① 实例见 Ambrosoli 1997; Levine 1977; Kjaergaard 1994。

Braudel、Immanuel Wallerstein 和 K. N. Chaudhuri) 的著作中以稍微不同的方式,而在诺思(Douglass North)的著作中以一种十分不同的方式——较少注意财富的水平。这些观点强调的是,在现代早期的欧洲(或欧洲的某个部分)产生了据说比别的地方当时存在的制度更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制度。这些观点普遍把注意力集中于有效的市场和财产所有权制度的出现,后者是对那些发现了更有效使用土地、劳动和资本的方法的人的回报。这些观点有一个共同的,尽管不是普遍的伴生物,即认为在其他地方(特别是在中国和印度)经济发展受到了政府的抑制,那里的政府或是太强大,并对私有财产抱有敌意,或是太软弱,当理性的企业家与地方惯例、神职人员和豪强发生冲突时,无法保护他们。^①

与这些观点有潜在的一致性的——尽管与它们完全不同——是罗伯特·布伦纳(Robert Brenner)的著作,他把欧洲内部发展道路的分歧解释为改变了财产所有权体制的阶级斗争的结果。按照布伦纳的解释,西欧农民在黑死病之后的约一百年中赢得了与他们的领主第一轮斗争的胜利,确立了他们的自由,免除了被迫的劳动;东欧的农民失败了,那以后的几百年中统治阶级更残酷地压榨农民,没能出现近代农业或节省劳动的革新。在西欧内部,布伦纳继续分析,接着发动了第二轮斗争,对象是那些现在仅拥有土地、追求自由经营土地以便获得最大利润的地主,后者常常驱逐那些非生产性的“过剩”佃农。按照布伦纳的说法,法国的精英们在这场斗争中失败了,自那时起,法国形成了一种以数百万小农为基础的农业制度,这些小农既没有能力也没有兴趣进行会使他们中的一部分变得多余的革新。但在英国,地主们胜利了,他们投资于能够降低劳动成本的革新,把数量巨大的用不着的劳动者从土地上赶走。这些被逐的农民中至少有一部分最终成为英国工业劳动大军,从由他们的被逐所创造,并由他们以前的地主所出售的农业剩余中购买食品。

按照布伦纳的观点,阶级斗争,而不是马尔萨斯压力或“自然而然”产生的更有效的市场提供了历史的动力;然而,终点是相同的。一个社会最终在多大程度上类同于新古典主义模式,决定了那以后它会有怎样的生产力;特别是英国,这个其土地和劳动最终最尖锐分离(并最彻底地互相修正)的国家被认为因此而有了最具活力的经济发展。在这里,布伦纳最终相当古怪地与诺思成为同盟,后者——尽管反对用阶级斗争解释财产所有权体系——也认为,随着经济越来越多地卷入互相修正的土地、劳动、资本和知识产权的竞争

^① Wittfogel 1957; Jones 1981: 66—67, 118, 125; Jones 1988: 130—146; Mckyr 1990: 233—234, 256—260; Powelson 1994.

性市场,经济发展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诺思和布伦纳的观点都集中于大多数人活动于其中的制度背景:短工市场、租佃契约以及由普通人生产并由普通人消费的产品。在这里他们与上面讨论过的认为前工业化的欧洲已经独自繁荣富裕的观点相似,并趋向于与那些观点融合。

然而,另一大类重要的制度学派观点——布罗代尔及其学派的观点——更为集中于由一些非常富有的人积累起来的利润;为这种积累提供便利条件的制度通常包括干扰了新古典模式市场的特许权。所以,这些学者对以使用高压统治和欺诈为基础的利润给予了较多的注意。而由于他们关注的许多大商人从事远距离贸易,这些学者就更多地注意了国际政治和欧洲与其他地区的关系。特别是沃勒斯坦,把“封建的”东欧和“资本主义”西欧之间的贸易发展当作一个世界性经济的真正的开端,他强调要在那种经济的自由劳动“核心”区中不断积累利润,需要有贫穷的、普遍不自由的“外围”持续存在。

但尽管如此,沃勒斯坦的历史动力是西欧相对自由的劳动、庞大的生产性的城市人口、商人和促进了远距离贸易及利润再投资的政府的独特结合。由于在某些商品生产中,廉价的、通常是强迫性的劳动比高水平生产力所需要的工具和制度更为重要,从而使外围地区日益专业化生产那些商品,因而产生于远距离贸易的国际分工扩大了西欧和其他各地之间的财富差距——但它以先前存在的、使西欧能够首先对其他地区施加影响的社会经济差异为基础。

与欧洲中心论相关的问题

16

本书借用了上述论点——主要是那些各种各样的“制度学派”观点——但最终证明的却是不同的命题。首先,无论我们可以把资本主义的起点推回到多久远,工业资本主义——矿物质能源的大规模应用使之摆脱了前工业社会共有的制约——是到1800年代才诞生的。在资本积累和经济制度两方面,都没有什么东西能显示出西欧经济在那以前有决定性的优势,使工业化只能在那里而不能在别处发生。此前几个世纪西欧核心区市场驱动的发展,确实足以并无疑成为工业化的一个重要先兆——但与出现在亚洲各个核心区的商业化和“原始工业”发展极为相似的过程相比,它对工业革命或许并没有更

大的传导性。^①成型于现代早期欧洲的科学技术发展模式较为不寻常，但我们将看到它们自身仍然不能保证西欧会走上一条与例如东亚根本不同的经济发展道路。

其次，在英国以外，欧洲的工业化至少到1860年还是相当有限的。因此，设想有一个以西欧共同特征为基础的“欧洲奇迹”是危险的，此外还因为在整个西欧普遍共有的因素中，有许多至少在欧亚大陆其他地方同样存在。

17 本书第一部分对于认为欧洲在1800年前有一种内生的经济优势的各种论点提出了质疑。它引入了一幅旧大陆人口最密集、商业化程度最高的地区中广泛存在的相似之处的画面。第1章引用了来自众多地区的证据，以显示1800年以前欧洲的物质资本并没有累积起决定性的优势，欧洲也没有比其他许多大经济区更少受马尔萨斯压力的束缚（从而有更大的投资能力）。其他许多区域的民众看来与欧洲人有同样长的寿命，生活得同样好，至少有同样的愿望和能力为了家庭利益的积聚而限制生育。这一章的后半部接着检验了欧洲在工业革命之前存在重要的技术优势的可能性。这方面我们确实发现了一些有关的差别——但如果没有对能源革命必需的幸运的地理偶然性和欧洲人对海外资源的特权，这些技术优势本来可能更小，出现更迟，作用的性质也可能不同。技术发明对于工业革命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但它并不充分，也不是欧洲独有的。还不清楚科技发明程度之间存在的任何差距对于避免一个马尔萨斯世界是否是关键性的（科技成就的推广可能时间要稍长一点），但明显的是，有助于松解欧洲资源制约——从而使得沿着一条特殊道路（消耗土地、消耗能源、节约人力）发展的技术革新成为一个硕果累累，甚至可以自行增强的过程——的全球范围的差异是有重要意义的。

第2章转向市场及相关制度。首先集中进行了西欧和中国之间的比较。显示出西欧的土地、劳动力和产品市场与中国大部分地区的市场相比，甚至迟至1789年，从总体上看可能距完全竞争更遥远——即更不可能是由有机会在众多贸易对手中进行自由选择的复数的买主和卖主组成——因而也更少满足亚当·斯密(Adam Smith)设想的发展过程。我从法律和习俗的比较开始，这些法律和习俗支配着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以及农业生产者能够在多大程度上选择向谁出售他们的产品。接下来的部分研究劳动：强迫性劳动的程度、对移民的限制（或鼓励）、对改变职业的限制，等等。

^① 杉原薰和速水融(1989)认为“工业革命”和“勤劳革命”在17世纪已经分离，Arrighi则认为是在18世纪。尽管这种分离的迹象确实有那样久远，但我将证明直到19世纪初，当新大陆加上煤，表明这样一种消耗土地的、资源密集的道路仍然可以长期维持时，分离的封印才被揭开。

第2章最后也是最复杂的部分,论述了家庭既作为消费单位又作为劳动分配——特别是妇女和儿童劳动——机构之间的关系。有些学者认为,中国人的家庭比西欧家庭更倾向于使妇女和儿童在其边际产出降到低于维持生存的最低工资价值后还继续工作,因而形成一种“内卷性经济”;我将说明没有什么理由相信这一点。^①相反,中国家庭的劳动配置看来与简·德夫里斯(Jan DeVries)所谓的欧洲“勤劳革命”的市场取向的劳动、休闲、消费的再定位十分相似。^②总的说,1750年前后中国和日本的核心区看来与西欧最先进的地区相同,精密复杂的农业、商业和非机械化的工业,以相似的、可以证明甚至是更充分实现了的方式结合在一起。所以我们必须在这些核心之外寻找对其随后的分流的解释。

建立一个更兼容的历史

第二部分(第3章和第4章)首先从生存导向行为转向检验各种新的消费需求,伴随后者而来的文化和制度变革,以及需求差异对生产发生重要影响的可能性(第3章)。在这里,我们发现了可以清楚地把中国、日本和西欧与其他地方区分开,但却完全不能使它们互相区分的差异。在这些社会中,可供消费的商品数量和“消费至上”的态度这两方面的差异都显得很小而且没有确定趋势。(例如,18世纪中叶中国人消费的糖几乎肯定比欧洲人更多,长江下游核心区的居民1750年人均生产的棉布则可能像英国人1800年生产的一样多。)所有这些社会中的制度(尽管别的方面不一定)看起来都能够使生产的增长日复一日地创造需求,尽管增加的需求能否创造供给相当不明确。最后,那些确实有利于欧洲的消费者行为方面的差别看来受到了欧洲以外因素的极大影响——例如,新大陆白银的开采和亚洲对它的需求,后者吸引了其他的“异国风味”商品进入欧洲,以及新大陆的种植园和奴隶制度构成的生产体系等。

第4章接下来研究了把第3章中的新“奢侈品”带到市场上——无论是输入、仿制(例如韦奇伍德“瓷器”)还是纯粹的本地生产——的商人和制造业者。在这样做时,这一章离开了“典型的”家庭和他们参与的土地、劳动及日用品的市场种类,转而观察以更大规模行动的企业家,考察了最后一种生产

^① 黄宗智(P. Huang) 1990:11—17;有关争论另见 Goldstone 1996。

^② DeVries 1994b。

要素——资本——的市场,还考察了主张存在一个与众不同的欧洲资本主义的观点。然后离开完全集中于据说更为完善的西欧内部市场发展的制度论证,转向那些更多注意外部联系,寻找在不完善的竞争中某些重要因素的优势,因此也对超经济强制付出了更多注意的观点。

一些观点认为,不是社会一般结构就是与商业所有权相关的具体规章,使欧洲商人在积聚资本、保护资本不受政府剥夺、理性的配置资本等方面获得了明显优势,第4章从否定这类观点开始。尽管某些金融资产在欧洲(或至少在英国、荷兰和意大利城邦)可能得到了更明确的规定和更多的保护,但这类差别太小,无法承担诸如布罗代尔、乔德里和诺思这样不同观点的学者赋予它们的解释问题的重任——甚至更难与早期的工业革命相联系,后者并不是绝对的资本密集。举例来说,中国一些较大的商行确实有规律地积累起了大笔资金,足以实施前铁路时代重大的科技创新。

19 西欧的利息率可能低于印度、日本或中国;但要证明这种情况造成了农业、商业和原始工业发展相对速度的重大差异是很困难的,而要证明它对机器工业的早期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甚至更为困难。重要的是,18世纪,当据说是比较优越的欧洲商业机构必须在不使用武力的条件下与来自旧大陆其他区域的商人竞争时,它们的表现平平。只有在海外殖民活动和武装贸易中,欧洲的金融制度——由一种竞争性的实行欠债财政的政府制度培育出来——才确实具有决定性的优势。

而更重要的是,如布罗代尔本人所强调,在18世纪,资本并不是一个特别稀缺的生产要素。^①与能源,并最终与土地面积(特别是整个欧亚大陆核心区日渐缩小的森林面积)相联系的制约,对于进一步的发展是一个重要得多的迫在眉睫的阻碍。发展的实质是劳动和资本都要比土地更充裕,但生产马尔萨斯所说的生活四要素——食品、纤维(衣服)、燃料和建材——中的任何一种,都仍然需要土地。

在某种意义上说,资本和劳动能够创造更多的土地(开垦),或通过灌溉、施肥及精耕细作使土地生产更多的食物和纤维,但与19世纪末化学工业所能够做的相比,这种作用是相当有限的。对于大量应用矿物质燃料之前的燃料和建材生产,劳动和资本对土地的替代能力事实上也是非常有限的。因此,即使欧洲在积累投资资本方面存在某种优势,这种优势自身也不能解决所有最“发达”的原始工业区域都面临的生态瓶颈。甚至欧洲内部就肯定有许多资本充足但工业化较迟的区域的实例,足以使人对较大的资本积累和向

^① Braudel 1977:60; DeVries 1976:210—214。

工业制度过渡之间的任何联系产生怀疑。意大利北部和荷兰就是明显的例子,尽管它们有高度复杂的商业经济。西班牙也是一个例子,不同的是,在那里,白银如潮水般涌入一个比较不发达的经济中,很可能延迟了发展过程。^①

布罗代尔没有系统地探究他自己对1800年以前相对充裕的资本的洞察可能对欧洲特殊性的解释发生怎样的影响;却转回到认为欧洲财产更为安全的未经验证的见解上去。^② 尽管如此,布罗代尔学派的观点确实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了远距离贸易,引向了政府、殖民地冒险和非市场的榨取等现象——我认为这些现象在欧洲的突破中所起的作用比在最新的研究中显示出来的更大。具体地说,我将证明,无论是产生于现代早期欧洲的所有权的新形式(例如公司和各种各样的使源源不断的未来收入证券化的主张),还是欧洲彼此竞争并拼命增加税收的那些政府的国内政策,都没有使1800年以前的欧洲自身成为明显更有利于生产活动的环境,政府之间在海外的对抗事业才真正重要。同样,股份公司和特许专营对于从事远距离武装贸易和建立输出导向的殖民地——这些活动当时需要的愿意为了回报而等待比较长时期的资本数额异常庞大——才有独特的优势。当我们把这种欧洲资本主义——政府和运用武力霸占某些市场的权力的联系在其中表现突出——的概念与先进的市场经济到处面临着日益增长的生态问题的理论结合在一起时,一幅关于欧洲最明显的差异是什么的新画面就出现了。

接下来,第三部分(第5章和第6章)提出了一个新的框架,用来考虑欧洲发展道路中的内部和外部因素之间的关系。第5章一开始讨论了在欧亚大陆所有人口最稠密、受市场驱动的商业高度成熟地区中,严重的生态问题对进一步发展造成的阻碍。这些问题并没有剧烈到引起重大的粮食危机,但它们使这些地区陷入了燃料和建材的短缺,以及某种程度上纤维的短缺中,在一些区域对土壤的持续生产能力形成了威胁。在考察了这些制约因素之后,第5章的最后部分考察了所有这些核心区通过与旧大陆人口密度较低的区域进行远距离贸易着手解决这些短缺的尝试;证明了这类贸易不能够提供充分适当的解决方法。蒸汽机时代以前运输的高成本是一个原因,但其他因素源于许多“外围”区域的政治经济条件,那里相对低水平的需求,以及由此而来的,在既没有殖民制度的强迫,也没有19世纪后期以降出现的制造业生产力更巨大的区域间差异(通常以诸如包含了新技术的资本设备之类相对稳定的要素为基础)的情况下,保持核心区制成品与原料之间的交换的困难。

① Flynn 1984; Hamilton 1934。

② Braudel 1977:60-75。

然后第6章研究了工业化时期欧洲土地限制引人注目的松解。简要叙述了从木材到煤的转换——一段重要的,但在别的地方已充分论述过的历史——接着转向欧洲与新大陆的关系对生态问题的缓解。这种缓解不仅依赖新大陆大自然的慷慨,而且也依赖创造了一种新型外围区的奴隶贸易和欧洲殖民体系的其他特征,这种新的外围区使欧洲能够输出数量不断增长的制成品交换数量不断增长的土地密集型产品。

这种互补关系的一个贯穿了早期工业时代的重要组成部分由奴隶制构成。新大陆的种植园从海外购买奴隶,供他们生存的产品通常是有限的,因而,奴隶制地区要比东欧和东南亚之类地区重要得多,因为后面这些地区出口农作物的生产者土生土长,自己满足自己的大部分基本需求,很少有现金可以用来购买别的任何东西。

21 种植园地带与诸如中国内地这样的自由劳动的外围区域也在一些重要方面存在差异。东亚的稻米、木材和原棉的输出者比被强迫种植现金作物的区域中的农民有更大的购买力,对外部需求也有更大的弹性和动机作出反应。但造成这些有活力的外围的同一种或多或少自由的劳动制度,也使居民可以离开那些报酬递减的领域。随着时间推移,这些区域常常会经历明显的人口增长(部分是由于收入增长)和它们自身的原始工业化;这种情况既减少了它们对进口工业品的需求,也减少了它们能够输出的初级产品的剩余。

相反,环加勒比海种植园地带很少显示出存在使其产品多样化或者不再需要输入奴隶及其给养的趋向。由于欧洲获得了它运载到新大陆的工业品(特别是布匹)换到的大部分奴隶,同时把来自英属北美的大量谷物和木材运往加勒比海,就使得那些殖民地能够购买欧洲的工业品。新大陆的全部进口需求——甚至对谷物和人力的需求——都有助于欧洲利用劳动和资本解决它的土地短缺。最后,我们还将在第6章看到,在殖民地时期开始活跃的原动力为资源流动创建了一个框架,使资源从奴隶劳动区域和自由劳动区域涌向欧洲的潮流在整个19世纪不断加速,尽管这一时期出现了殖民地的独立和奴隶的解放。

在分析过程中,第6章还显示出核心—外围不同的长期关系可能使欧亚大陆各种核心区共有的一个特征的重要性发生怎样的改变。这个特征就是“原始工业化”,即主要由为以商人作中介的(通常是远方的)市场进行生产的农村劳动力构成的非机械化的工业部门的巨大扩张。创造这一概念的欧洲历史学家们对于原始工业化和严格意义上的工业化之间的关系存在分歧。一些人认为,原始工业化为利润的积累和市场导向行为的发展、专业化以及对于那些难以在家庭中制造的产品做出了贡献。乔尔·莫基尔(Joel

Mokyr)说明了——用一种我认为像适用于他自己的欧洲范例一样适用于1750年前后的亚洲一些地区的论据——开发集中在原始工业领域中的大批“虚拟剩余劳动力”，能够对工业化做出重大贡献，而不会引起当我们期待工业工人从农业“剩余劳动”中产生时会发生的很多并发症。^①

但是，莫基尔的原始工业化模式设想原始工业区域在它们成为其中一个组成部分的无论什么样的“世界”中，都能够持续扩大它们的手工业输出和农业输入而不对相对价格产生影响。对这一设想的各种限制的研究把注意力集中到原始工业化的另一个方面。

原始工业的发展普遍与人口的巨大增长联系在一起(尽管对这种联系的性质有激烈争论)；在很多情况下，原始工业区域人口的迅速增长又与一个恶性循环联系在一起：非常低的计件工资率、工人为购买足够的食物而拼命工作使产量不断增加、通常很少有办法得到土地，然后是更低的计件工资率。相对价格的任何改变——无论是由于原始工业增加的人口使出口市场供过于求，同时又需要输入更多的食物，还是由于外部供给和市场日益萎缩——都将强化这一悲惨模式。更常见的说法是，人口增长——无论它与原始工业化是什么关系——可能对土地形成严重压力，因为增产燃料、纤维和工业发展所必需的其他东西都需要土地。如果不能通过贸易获得这些商品，保持产量增长的惟一方法就是更密集地使用土地，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这意味着更高的农产品价格、更低的人均生产率和工业发展的延缓。

严重的生态瓶颈和无数原始工业工人及失业的农业劳动者的贫困恶性循环迹象，在18世纪中叶欧洲的很多地区与中国或日本可比较的地区中表现得同样明显——事实上或许更为明显。但我将证明自那时起，欧洲和东亚的地位发生了变化。

举例来说，中国的长江下游地区在出售足够的棉布、输入足够的粮食和木材以维持原始工业的发展或维持其工人相对较高的生活水平方面，遇到了越来越多的困难。这并非因为该地区的内在“缺陷”，而是由于它与之进行贸易的地区正在经历自己的人口增长和原始工业繁荣过程，因而越来越不能与它互补。在某种程度上，长江三角洲得到了它作为一个领头区域应得的补偿——通过专业化生产价值较高的布匹，登上了增值阶梯——但这还不够。简而言之，在中国的八九个大区(每一个都比大多数欧洲国家更大)中，随着内地许多地区的居民把土地开垦殆尽、砍光了距河流最近的树木等等，运转良好的市场鼓励他们把更多的时间用于生产衣料之类。但是这些平稳运行

^① Mokyr 1976:132—164；比较 Lewis 1954:139—191。

的区域性市场和互相依存与全国性市场的发展发生了冲突,特别是在 1780 年以后;这使得一两个先进地区更难保持增长,更难避免为了节约土地和土地密集产品而采取更为劳动密集的对策。这样一来,外围地区的自由劳动和缺乏重大技术变革的发展就使这个国家整体走入了一条经济上的死胡同。

相反,西北欧在 1750 年以后的一个世纪中,专业化生产制成品(包括原始工业和工业)的能力达到空前程度,并使其这一时期引人注目的人口增长成为有用的资产。当然,这一变革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制造业(制造了大批比较廉价的可以用来交换土地密集型产品的商品)中一系列给人深刻印象的技术进步和交通运输业的技术进步,后者为专业化提供了很大的便利条件。但
23 这些众所周知的发展并不是全部历史。西欧也可能出现了人口增长、制造业专业化、人均消费水平提高——尽管在很多人看来甚至 18 世纪的水平已接近生态能力的极限——由于其有限的土地供给造成的限制突然变得更具弹性也更不重要。这部分是由于它自己的制度性障碍留下的大量未经开发的农业资源在法国大革命和德国后拿破仑时代的改革之后得以开发;部分是由于东欧(相当于中国长江上游或华西南之类的地区)更为极端的制度性障碍(首先是农奴制)使那里留下了大量闲置土地;部分是由于 19 世纪初新的土地修治技术从殖民地传回了西欧。在所有这些方面,人们可以说,西欧的土壤—森林学与其说是在开拓新的道路,不如说是在最好的和一般的做法上正在赶上中国和日本。即使如此,欧洲的变革还需要一些特殊的道路,通过这些道路,人口减少、奴隶贸易、亚洲对白银的需求、殖民地法规和重商的资本主义,把新大陆塑造成为一个几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土地密集型产品的源泉和西欧相对富裕的资本及劳动的出路。因而,发明创造、市场、高压统治和幸运的全球性关联结合在一起,造成了大西洋世界的突破,而同时,在东亚,机能很可能更为完善的市场在时间上早得多的扩展,却导致了一个生态僵局。

因此,第 6 章不是从经济利益和资本积累的角度,也不是从工业品需求的角度——欧洲本来可能在国内产生足够的需求^①——确定大西洋贸易的意义,而是研究它们在多大程度上减轻了欧洲真正缺乏的要素——土地和能源——的供给紧张。由于欧洲的海外榨取有助于减轻这些基本的物质上的限制,所以应该把它与英格兰转向用煤相提并论,煤成为使英国脱离一系列马尔萨斯制约的关键因素,而不应该与纺织、酿造或其他工业部门的发展相

^① 关于欧洲内部资本积累与“外部资源”的比较,见 DeVries 1976:139—146,213—214。关于需求,同上,176—192;Mokyr 1985b:21—23;以及 Mokyr 1985a,对需求要素在工业革命中的意义提出了更广泛的疑问。

比较,无论后者对于金融资本积累或工资劳动的发展做出了多少贡献,它们都是加强而不是减轻西欧核心区对土地和能源的压迫。实际上,衡量这一生态意外收获的重要性的一个初步尝试提出,在完全进入19世纪之前,一般说来,海外剥削的成果对英国经济变革的意义至少可能像它划时代地转向矿物燃料一样重要。

比较、联系和论述结构

24

因此第一部分——基本上是进行比较——提出,尽管较高水平的积累、人口模式和某些种类市场的存在结合在一起,可以把一些地区——西欧、中国、日本、或许还有其他地区——分离出来作为经济前途发生转变的最可能的背景,但这些因素不能解释为什么事实上的转变首先发生在西欧,或者为什么发生在任何地方。19世纪(当时欧洲弥补了土地修治方面的落后,并在其他许多领域中居领先地位)之前——即使当时欧洲与世界其他部分复杂的通常是暴力的关系已经被添加到历史中——科学技术的差异也不能作出很多解释。

第二部分继续进行洲际比较,但却是在一个洲际关系也开始变得重要的背景中。这部分研究提出,当我们转向与物质上的必然性直接联系较少——涉及到的人口比重也较小——的经济活动种类时,西欧的文化和制度差异,即使与其他“核心”区域相比,也确实显示出了一些潜在的重要性。然而,这些差异是程度差异而不是性质差异,完全限制在强度和范围内。它们肯定不能证明任何说西欧——而且仅仅是西欧——有一个“生产的资本主义形态”或是有一个“消费社会”的主张正确,它们自身也不能解释将会出现在19世纪的惊人的分流。此外,引人注目的是,在可以辨别出显著差异的地方,它们毫无例外地与对单纯斯密型市场动力的背离相关联——特别是与政府许可的垄断和特权相关,与武装贸易和殖民化的成果相关。

第三部分再度以比较开始,说明了凡是欧洲具有的优势——无论是来自一个更发达的“资本主义”和“消费至上主义”,还是来自阻碍了更密集使用土地的制度性障碍留下的闲置,甚或来自技术改革——在任何领域都没有接近于一条脱离旧大陆许多“核心”区域共有的一系列基本生态制约的道路。此外,与旧大陆人口密度较小的地区完全双方自愿的贸易——欧亚大陆所有核心区一直遵循的一个对策,通常比1800年以前西欧能控制的规模大得多——限制了解除这些资源瓶颈的潜能。但新大陆却有更大的潜力,大部分

是由于全球性关联的影响。首先，严重的传染病削弱了对欧洲人占领这些土地的抵抗。其次，随着征服和人口减少而来的大西洋两岸的关系——重商主义以及特别是非洲的奴隶贸易——使所需资源向欧洲的流动自我促进，这是旧大陆区域间双方自愿的贸易做不到的；这种关系甚至在工业化之前就预期初级产品输出地和制造业发达地区之间的分工能使自身永存于现代社会中。因而这个世界的第一个“现代”核心及其第一个“现代”外围一前一后地产生——这一全球性关联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使西欧在一种其主要特征并非自己独有的先进的市场经济的基础上，确立了某种真正独有的东西。最后，我们用联系和互相作用解释了仅靠比较不能解释的东西。

对地理范围的一个说明

为了概括本书的主要观点，对其地理范围作一个简短的提醒是适宜的。尽管进入了“世界史”的萌芽范畴，本书对世界各区域的研究却极不均衡。中国（主要是中国东部和东南部）和西欧用了相当篇幅；日本、南亚和中国内地少得多；东欧、东南亚和美洲还要少；非洲除了奴隶贸易外甚至更少涉及；中东、中亚和大洋洲几乎没有提到。此外，中国、日本、南亚和西欧在比较和联系两方面都得到论述。换句话说，既把它们视为那种有足够理由成为根本性经济变革的场所，以至它们的经历就能说明这样一种变革确实发生的地点，又研究了它们本身和其他区域之间的互相影响。

另一方面，对东欧、东南亚、美洲和非洲，主要是通过它们与其他地区的相互作用进行研究。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只是受影响——相反，概括性的论证强调，我们认为是“核心”的那些区域所具备的可能性，是以“它们的”外围地区的发展道路和内部动力为条件的。也不应该暗示我进行比较研究的那些区域是仅有的可能发生重要变革的地区。工业发展只是我们所谓的“现代性”的一个组成部分，虽然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他部分可能有其他的地理起源。由于那一原因，我们也不能仅仅去了解那些孕育了我们现在当作是我们年代的支配性特征的区域；这样做会极大地增加把那些特征当作必然事物的风险。总之，在欧洲历史上加上几片中国和日本的衬托，不会使它变成“世界史”。

但是，除了我的能力有限之外，我在本书中这样集中研究某些地区还有其他理由。一些与我想要质疑的历史有关，一些与我想要讲述的历史有关。

首先，正是中国，而不是其他任何地方，成为现代西方讲述的它自己的历

史的“另一面”，从斯密和马尔萨斯到马克思和韦伯都是如此。因此，本书的两个主要目的一是要弄清一旦我们免去了中国作为欧洲假定的对立面的角色，它的发展看起来会有怎样的不同，二是要弄清一旦我们看到了欧洲经济与一个它最经常与之对比的经济之间的相似之处，欧洲的历史看起来会有怎样的不同。 26

其次，在我自己的论述中所强调的那些过程把我们引向了这个世界那些人口密集的区域以及它们的贸易对手。另一方面，人口的高密度给正在进行的专业化加装了燃料；一个人不可能靠着做某些每个人都只是偶然需要做的工作来养活自己，除非在这个人的市场区域内有很多人。^① 人口密度并不是斯密型“市场容量”惟一的决定因素，甚至人口稀少的地区也不是不可能有精心安排的专业人员的组合，这些专业人员细致划分了当地文化认为是重要的某些工作。但是对于在经济活动的很多领域中——食物生产、衣料生产、建筑、运输，以及交换本身——尚有待发展的精密的专业化来说，最终没有什么东西能代替在一个可以承受的物质和文化距离内存在着很多人。（在自然界进行调查研究并探寻利用自然的新方法的专业化——在推动技术变革的过程中很难预知但明显重要的斯密式现象——也是如此。）

同时，也是我的论述要点的生态压力与人口的联系甚至更为紧密。^② 当然，在绝对意义上人口稀少的区域也可能遇到严重的生态压力，如果它们确是不能维持很多人口的话，或者如果人们以某种方式利用外部环境的话。所以在第三部分我对人口稠密地区和我所谓的“充分定居”地区——这些地区如果没有明显的节约土地的技术进步和制度改革，或能够通过对外贸易增加土地密集型产品，几乎没有广泛增长的余地，尽管它们的单位面积人口可能比其他一些地区更少——作了一个区分。（因而，举例来说，18世纪的英国可能比孟加拉更为“充分定居”，尽管英国的人口密度较低，但它的每英亩产量更低，而生活水平却更高。）但这一判别标准也导致对西欧、中国、日本，以及在较小程度上对印度的关注。可以对人口密度、信息共享、某些技术和制度 27

① 在这一关系中应该注意，“专业化”并不等于“分工”，也很少等同于“复杂性”。例如，可以设想一个社会有极为复杂的交换规则，决定了什么人每周烤面包，但在这个社会中没有一个人是全职面包师。这样一种社会肯定可以像任何一个社会一样复杂，其人民每个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技术系列中的能手，但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它不会有与另一种社会——其人民被不断驱使集中从事仅有的几种他们特别能够找到市场的工作——同样的经济动力。

② 我称这些动力为准马尔萨斯主义的，因为我不认为在我讨论的任何核心区，人口密集必然会导致生活水平下降，仅仅是在那些在工业革命前的技术条件下，逐渐恶化的耕地/劳动力之比成为产量进一步大规模增长的严重障碍的地方才会如此，而在早期工业技术减轻了这种制约的情况下，仅有人口密集自身是不够的。

变革的可能性作出进一步的论证，尽管这些论证不是直截了当的。

最后的尽管缺少知性的辩护力的一点是，我自己所受的训练使我对研究中国、欧洲和日本比研究其他地区更为得心应手，能够了解相当大量现存的对它们的研究。詹姆斯·布劳特(James Blaut)称之为“均变论”的理论——这种理论认为在某一点上(在他的分析中是1492年)，非洲和欧亚大陆互相联系的很多地区都有大致相似的“原动力”潜能，因而有“现代性”潜能^①——是一个有用的起点，但也存在着我们必须通过实证揭示的限制。如果证实它适用于各地，它会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巧合，但有很多证据证明并非如此。我本人猜想，如前所述，人口密度将证明是极为重要的，因而更可能的是，例如印度北部，将证明应归于中国、日本和西欧类型，而不是属于比方说中亚或甚至于奥托曼帝国类型。^②（在这一方面值得记住的是，10年以前，任何尝试写这样一本书的人都要用比我更艰苦的努力去搜寻那些支持我提出的关于中国的案例的文献；25年前甚至对日本的研究也是艰难的。）但有了现在可利用的文献——既基于我自身的限制，也基于我们的知识的限制——本书的地理重点看来至少足以对我们的进程提出新问题。我相当密切关注的地方不是全世界，世界其余部分也不是仅在与那些地方相互影响时才有意义，或者被当作一个负面的实例，例如，通过说明东欧与中国和与西欧两者的差异都比中国和西欧互相之间的差异更大，阐明东欧怎样显示出中国和西欧的共同点。但是我认为，对于再思考我们当前的工业化时代的发源地来说，这是一个合理的分类。

^① Blaut 1993:42,124,152。

^② 奥托曼的人口似乎在帝国的大部分地区都相当稀少，并且在18世纪大多数时候都在下降，相关论述见 McGowan 1994:646—657。

第一部分

无数令人惊异的相似之处

一、欧洲领先于亚洲？人口、资本积累和技术对欧洲发展的解释

31

对于欧洲怎样在 19 世纪中叶成为惟一富裕的区域这一问题没有一致的意见。不过，埃里克·琼斯的《欧洲的奇迹》一书或许是对目前的“主流”态势最接近的阐述。琼斯的观点是折衷的，很多欧洲至上主义者会对他的许多主张提出反对或疑问；但他的一些一般性命题还是博得了广泛的认同。对于我们的目的来说，这些一般性陈述中最重要的一项是——在其他不少著作中也可以见到——工业化并不是欧洲经济史脱离旧大陆其他部分发展轨道的分界点；相反，它表现出了此前几个世纪中已经一点一滴地积累起来的各种差异的充分成熟。事实上，很多学者简单地把这一点作为公认事实；既然琼斯明确地论证了这一命题，他的著作就成为一个有用的起点。

按照琼斯的观点，“欧洲人”^①在工业化之前已经单独富裕起来。具体地说，他们有多得多的资本，特别是牲畜，供他们支配，^②这是他们通过“把人口增长保持在略低于极限的程度”而积累起来的。这种情况又反过来使欧洲人可以“保持他们的消费水平略高于亚洲人”。^③此外，他们的积蓄资产比较不易受破坏，因为欧洲经历的自然灾害较少，并且比其他地方更早开始使用耐火的砖和石头作建材。^④因而，欧洲超出维生水平的年剩余中需要用来抵消折旧的部分较小，甚至在工业化之前，它在积蓄资产方面的优势就已随着时间的推移稳步增长。

但是事实上几乎没有证据显示出 1800 年以前西欧积蓄资产存在着数量上的优势，或存在一系列持久的能使欧洲资本积累获得明显优势的环境因

① Jones 使用这个名词代表的内容并不是始终明确的，在某些场合它包含整个大陆，其他场合只指西欧甚至西北欧。

② Jones 1981:4-5。

③ 同上，14。

④ 同上，22-35、40-41。

- 32 素——人口或其他因素。欧洲人也不可能明显更为健康（即人力资本占优势）、有更高的生产力或在别的方面继承了多年缓慢自然增长的超过亚洲较为发达地区的优势。

当我们转而对积蓄资产中包含的技术进行比较时，我们的确发现了欧洲在工业革命前两三百年间出现的一些重要优势；但我们也发现欧洲还存在着落后的领域。欧洲的劣势集中于农业、土地修治和低效率地使用某些土地密集型产品（特别是木柴）等方面。从结果来看，欧洲具有优势的一些领域证明对于真正革命性的发展是重要的，而其他社会具有较高技术的那些具体的领域则不重要。但如果没有使欧洲比别的社会更能摆脱其土地基础的其他变化，即使欧洲在很多部门中的科技领先地位也不会使一种突破能够自行持续发展。这种变化部分是由于欧洲在某些它原本滞后的节约土地的技术方面追了上来，这是一个主要由从海外殖民地获得的知识所推动的过程。部分是由于偶然发现了意外财富的运气，这种运气使至关重要的资源（特别是节约森林的煤）处在了特别幸运的地点。部分还由于全球性关联。这些全球性关联又受到欧洲人的努力（其中许多是暴力行为）、传染病造成的幸运和一些本质上独立的发展结合在一起的影响。（后者的一个实例是中国向银本位经济的转变，这一转变使新大陆的矿业有利可图，在其他生产得到发展之前的很长时期中支持了欧洲殖民地的生存。）

这些全球性关联使西欧可以得到数量巨大的新增加的土地密集型产品。此外，它们能够获得这些资源而不必进一步损害在 19 世纪人口和人均资源利用都巨大膨胀之前已经遭受沉重压力的欧洲生态系统，也不必把它们自己的大量人力重新配置到各种各样的劳动密集型活动中，而后者本来是为经营其自己的耕地以获得更高的产量和更大的生态承受能力所必需的。如果没有这些“外部”因素，欧洲的发明创造自身对其经济和社会的影响，不可能比在 18 世纪的中国、印度和其他地区不断发生的边缘性技术进步更具革命性。

农业、运输和牲畜资本

- 33 与其他大部分定居社会相比，欧洲人均拥有的牲畜确实比较多，并且，在一个牲畜构成一种极有价值的固定资产的欧洲耕作体系内，耕畜越多通常意味着越兴旺。在亚洲一些地区，牲畜的短缺也的确阻碍了耕种更多的土地。例如 18 世纪孟加拉的部分地区，无地的劳动者无法利用空闲的肥沃的土地，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弄到耕畜；但这并不是由于牲畜绝对数量的不足，而

是由于害怕失去其劳动力的地主们精心注意着垄断必需的牲畜。^① 正是一直有大量土地未经使用这一事实,说明不能把居民没有牲畜的原因归之于马尔萨斯压力。

在其他一些亚洲社会中,人口数量达到了限制牲畜的有效利用率的程度;但在那些例子中没有迹象能说明耕畜的短缺抑制了农业生产。事实上,如果牲畜短缺是一个决定性问题的话,就很难说清为什么至少土地更多、更富有的农民并没有饲养和使用更多的牲畜;然而在我们有合理的数据资料的时间段中,华北的大农和小农之间每英亩使用的畜力并没有明显的差异。^② 此外,按照欧洲标准微不足道的牲畜数量事实上足以完成使所有可耕地保持耕作所必需的全部工作。而且,对这一地区——其作物复种制度和生态环境比南方稻作区域更像欧洲——我最好的估计是,尽管役畜比较少,18世纪后期的中国人却比他们的欧洲同代人把数量更多——质量也更好——的肥料施到了土壤中。^③ 由此而来的产量供养了对于一个旱作区域来说是异常稠密的人口,^④其生活水平如我们即将看到的,大致可以与西欧相媲美。同时,在亚洲的稻作区域,与全世界最高的农业产量相匹配的役畜数量甚至更少;稻田耕作并不需要同样多的畜力,收获后的加工过程也比把小麦磨成面粉需要的畜力少。^⑤ 其他亚热带和热带区域,如中美洲,也可以用较少的耕畜甚或不用耕畜供养稠密的人口。当欧洲农业尽管有更多的牲畜却没有特别高的生产力时,很难把这一点视为一个重要的优势。

当然,耕畜也可以驮拽其他重物。前工业欧洲陆路运输的巨大优势,部分原因可能就是有如此之多的耕畜可供利用,这些牲畜每天都要吃食,而耕作只需要部分时间。欧洲人当时在用于陆路运输的固定资产方面是否有决定性的优势?与东亚比较或许如此,因为那里用于放牧的土地十分稀少,但中国和日本水路运输引人注目的发展肯定可以弥补这一点,并且展示出一种至少有同等价值的运输资本形式;亚当·斯密当时就注意到了东亚运输的总体优势。^⑥ 在亚洲那些与欧洲一样有大量牧场和草原的地区,农村运输可能

34

① Van Schendel 1991:42; Marshall 1987:7,23。

② 黄宗智 1985:145。

③ 有关计算见附录 B。

④ 例如,黄(1985:322)关于山东的人口数字是 1750 年前后每平方英里 400 人——无需净输入食物供养——而每平方英里大约 160 人的尼德兰(据 McEvedy 和 Jones 1978:62—63),需要输入大量食物接济。

⑤ Bray 1984:48,198—200(与欧洲的比较);Palat 1995:60(关于磨粉)。

⑥ Smith,1937:637—638。

也有同样高的发展。印度北部数不清的成群结队的公牛,有时一群即有上万头,^①成为一个尽管是野史性质的有说服力的实例。量化估计充满了很多不确定因素,但我们能够拼凑起来的数字显示,18世纪印度北部畜力驮运的货物—距离能力,在人均基础上与维尔纳·松巴特(Werner Sombart)对1800年德国作的估算没有很大差距。^②中国和印度都曾长期从中亚购买战马和其他一些牲畜,那里的牧场多得数不清。1700年以后,清王朝控制了大片的中亚领土,繁殖了自己的战马。如果中国人需要输入其他牲畜,在生态学方面也是行得通的。^③

我们在亚洲也看不到运输资本短缺的其他迹象。这样一种短缺应该会抑制流通,特别是像粮食之类体积庞大的货物。然而,在人口最拥挤的所有社会之一——中国——进入长距离销售的农产品比例看来可能比欧洲高很多。吴承明保守地估计18世纪有3000万石粮食进入长距离流通,^④或者说足以供养1400万人。^⑤这个数字是对1800年前欧洲粮食长距离贸易的顶峰的一个宽松估算的5倍多^⑥,超过波罗的海地区在其全盛期一个正常年景粮食贸易量的20倍。^⑦

此外,吴的数字只包括中国众多粮食流通过程中最大的那些,甚至对那些路线也使用了谨慎的估计。例如,他省略了山东省,该省1800年的人口约为2300万^⑧——略高于法国的人口——既没有特别的商业化,也不是特别的落后。18世纪该省年平均输入的粮食足以养活70万到100万人——高于波罗的海贸易养活的人口——输出了大约同样的数量。^⑨因而,如果我们把中国国内这一具有国家规模的地区粮食的进出作为欧洲“国际贸易”的等价物看待,我们会发现这一个省从事的粮食贸易可以与欧洲全部的长距离粮食流通等量齐观;而该省内部肯定还有相当数量的粮食流通,因为甚至这样的输入量仍不能满足其城市区域的需求(还不必说它的棉花和烟草种植区)。

中国也不是独一无二的。亚洲各地许多城市(殖民地时期前的美洲可能也有一两个)比除18世纪的伦敦以外的任何欧洲城市都要大,有一些城市也

① Habib 1990:376-377。

② 见附录A。

③ 实例见 Gardella 1992b:101-102。

④ 吴:1983:277。一石约为103公升,一石稻米重160磅左右。

⑤ Perkins 1969:297-307; Marks 1991:77-78。

⑥ Braudel 1981:127。

⑦ Jones:1981:81; DeVries 1974:170。

⑧ 黄宗智 1985:322。

⑨ 许檀 1995:86。

比伦敦大。估计 18 世纪日本有 22% 的人口生活在城市中,而西欧只有 10%—15%;^①马来群岛尽管总体上人口稀少,但可能也有 15% 的城市人口。^② 这些城市中有许多——南亚和中东也有一些——严重依赖长距离运输的大量粮食。

因而,总的来说,似乎很难发现欧洲存在运输优势的证据。一个最后的可能性是,欧洲的牲畜在为工业活动供给动力时产生了重要的差异,例如转动石磨。但亚洲以稻米为主食的区域并不需要以磨粉为起点,因为水稻(与小麦不同)通常用不着磨成粉就可以食用。当稻米需要被春碎成粉状时,一般每次只加工很少的一点,但并不是因为缺乏畜力,而是由于稻米自身的性质——稻谷脱壳以后破碎得很快——要求用手工加工每天的小量需要。^③ 此外,无论在欧洲还是在亚洲,大部分磨坊和其他工业设施都很小;它们也都会由于有限的需求、节日之类习俗的限制、其他方面的短缺(例如铸造用的燃料)等原因而停工多日。因而,一般说来并不需要大量的牲畜,也没有迹象显示畜力短缺成为任何地区工业发展的明显阻碍。

所以如果欧洲的牲畜构成了一种差距,它也不是作为一种“生产资料”,而仅仅作为一个消费项目:即,作为一个其他区域没有足够代用品的蛋白质来源。欧洲人肯定比亚洲大多数人吃了更多的肉和多得多的奶制品。但在现代早期阶段,这一优势是在下降而不是上升,而且下降得很快:例如,中世纪晚期到 1800 年间,德国的肉类消费下降了约 80%。^④ 此外,肉类并不是一种不能取代的蛋白质来源:很多中美洲人和北美洲人看来是从玉米、豆类和南瓜中获取肉类中最重要的氨基酸的,东亚人则从豆腐中获取。

更一般地说,任何以一类食谱——或者一种别的特点,如有较多的砖石建筑——为基础的观点都是不牢固的。我们怎么样决定哪些差距构成了“先进的生活水平”?^⑤ 为什么要强调欧洲在居住方面可能的优势,而不去强调, 36
比如说,日本、中国和东南亚大部分地区健康饮用水的引人注目的供给?^⑥ 或者为什么不去强调更为舒适和耐用的棉布? 亚洲大部分地区连穷人都穿得起棉布,而在欧洲一旦能买得到它,甚至富人都愿意去买。惟一明确的回答可能是,欧洲人物质用品的具体的组合方式使他们更健康、更长寿,或者精力

① Smith 1958:68.

② Reid 1989:57.

③ Bray 1984:53;Palat 1995:60.

④ Braudel 1981:196.

⑤ Jones 1981:7.

⑥ Hanley 1997:104,110-111,117,119-120;Reid 1998a:36-38,41.

更充沛——我们无可否认的有限的证据表明没有这回事。保罗·贝洛克(Paul Bairoch)通过 20 世纪的数据回推,作出了对 1800 年前后全世界大部分地区人均收入的估计。在他的数字中,“亚洲”作为一个整体极轻微地落后于西欧,但领先于整个欧洲,中国则甚至领先于西欧。^①但贝洛克的做法也有很多困难。我没有依赖他对每个经济体提出的单独的数字,而是一个主题接着一个主题,建构我自己的 18 世纪欧洲经济的“常态”。

寿命更长? 生活更好?

在 1650 年的英格兰(或许是欧洲最繁荣的地区),甚至贵族儿童出生时的预期寿命也只有 32 岁左右;1750 年以后才超过 40 岁。^②约翰·克内德尔(John Knodel)发现,整个 18 世纪和 19 世纪,14 个西德村庄中居民的预期寿命在 35 到 40 岁之间波动,这一数字如我们即将看到的,高于 19 世纪更大数量的德国人口的总计。^③里格利(Wrigley)和斯科菲尔德(Schofield)对英国村庄所作的大量研究提出,在整个 18 世纪,预期寿命在 35 岁到 39 岁之间,19 世纪升到了 40 岁,直到 1871 年之后,一直没有超出那一水平多少。^④

尽管这些数字相当令人意外地显示出全英格兰的预期寿命仅略低于斯通(Stone)确定的贵族男孩的预期寿命,我们却不应该匆忙作出这一结论。其他学者认为里格利和斯科菲尔德没有对 1780 年以前普通人出生和死亡的低申报率进行充分的修正;这样一来,由于降低了普通人预期寿命的估计值,就增加了普通人和有较好档案记载的贵族之间的差距。彼得·拉泽尔(Peter Razzell)估计,1600 到 1749 年间英国任何地方婴儿的真实死亡率都完全可能比里格利和斯科菲尔德的数字显示出来的高 60% 到 100%。^⑤仅此一项就会把出生时的预期寿命从 37 岁压低到 31.6 到 34.0 岁之间。拉泽尔认为其他具体年龄的死亡率也应该调高,特别是这一阶段的开始时期。^⑥法国大得多的人口样本的预期寿命明显更低:1770 到 1790 年间,两性出生时的预期寿命都在 27.5 到 30 岁之间。^⑦德国不同地区稍晚些时的数字(1816—1860)大致

① Bairoch 1975:7、13、14。

② Stone 1979:58。

③ Knodel 1988:68-69。

④ Wrigley 和 Schofield 1981:230、708--713。

⑤ Razzell 1993:757—758。

⑥ 同上,759-763;调整后的预期寿命是我自己计算的。

⑦ Blayo 1975:138—139。

与法国的数字相同：东西普鲁士为 24.7，莱茵省为 29.8，威斯特伐利亚为 31.3。^①

亚洲的不同人群看来至少与西欧人有同样长的寿命。汉利和 Yamamura (Hanley and Yamamura) 估计，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日本两个村庄人口出生时的预期寿命中值男性分别为 34.9 和 41.1，女性为 44.9 和 55.0。^② 史密斯、恩格与伦迪 (Smith, Eng and Lundy) 推算，在一个有较好档案记载的 18 世纪村庄中，活到 1 岁的人的总和预期寿命为男性 47.1，女性 51.8。^③ 因而，显然日本农村居民——一个并不包括贵族的人群，因为法律要求后者居住在有城堡的市镇中——的寿命至少与欧洲人同样长，还可能更长。

中国人的长寿给人的印象不那么深，但仍然完全可以与欧洲人的寿命相比较。其他亚洲人口也可以举出同样的实例。特尔福德 (Telford) 对一个比较繁荣区域的家谱研究显示，18 世纪中叶出生时的预期寿命为 39.6，尽管到 19 世纪初下降到了 34.9 (仍然与英国的估算值相似)。^④ 李中清和康文林 (Lee and Cambell) 利用 1792—1867 年间中国东北农村一个村庄异常出色的数据计算出，1 周岁男性的预期寿命为 35.7，1 周岁女性的预期寿命为 29。^⑤ 这些数字比特尔福德的 18 世纪中期的数字低一点，尽管这一人群中看上去对儿子异常强烈的偏好可能压低了女性的预期寿命。无论如何，它们仍然可以与欧洲农村繁荣区域的数字相匹敌。雷伟力和王国斌 (Lavelly and Wong) 找到了很多理由怀疑 18 世纪后期预期寿命的任何下降；他们还汇集了各种不同研究中时中国人预期寿命的估算，发现它们在 19 世纪之前普遍高于西 38
北欧同类人群的数字。^⑥

最近对清代皇族——或许是在任何地方前现代人口中有最完整档案记载的大型样本，而且并不是一个普遍富裕的样本——的研究呈现了一幅混合画面，但这幅画面全面支持了“中国人”^⑦ 的寿命与西欧人一样长的观点。出生

① Nipperdey 1996:89.

② Hanley and Yamamura 1977:221—222.

③ Smith, Eng and Lundy 1977:51 在表格中给出的数字是 46.1 和 50.8，指的是未来的预期寿命。还应注意的是，这里，像在最近对中国的研究中一样，由于发现了高比例的弑婴（通常并不是由于可怕的匮乏），使出生时的预期寿命与 1 岁时的预期寿命之间产生了一个巨大的差距，并使后者成为代表总体环境的更合适的指标。任何不肯相信弑婴决非一种绝望时的措施的人，不仅应该看到它在富裕的中国人和日本人中流行，还应看到在欧洲，手头宽裕的都市居民常常把他们的婴儿送到乡村乳养，即使他们很清楚这种做法会极大地增加婴儿死亡率。

④ Telford 1990:133.

⑤ Lee and Cambell 1997:60,76—81.

⑥ Lavelly and Wong 1998，特别是 721—724 页。

⑦ 皇族的成员是满族人，但生活在中国，并且在很多方面完全被同化了。

时的预期寿命显得较低，部分是由于弑婴率非常高——在 18 世纪弑婴率达到顶峰时，或许新生女婴中被弄死的多达 25%。^①（弑婴被普遍用作一种计划生育的手段，对这部分人口特别完整的记录使我们能够看到它应用得多么广泛。）无论如何，到 18 世纪后期，那些活到 1 岁的人口的预期寿命达到或略高于 40 岁，^②这使他们完全可以与前面讨论过的西欧人口中情况最好的那些相匹敌。从其他人口数据中也可以推论出中国人的预期寿命与欧洲人的预期寿命是同等的。如我们即将看到的，中国的出生率看起来低于欧洲的出生率，而同时其人口增长率在开始时高于欧洲（1550—1750），然后是同等（1750—1850 年间中国和欧洲的人口都大约翻了一番）；只有中国的死亡率也低于欧洲的死亡率时才有这种可能。（欧洲有更多移民出境，但直到这一阶段结束时，并不足以造成重要差距。）姑且承认，进一步的研究可能揭示出中国的出生率和死亡率比迄今为止发现的数字更高（特别是当我们找到这个国家比较贫困地区的有效数据时），但我们的欧洲数据也是不合比例地从比较富裕的地区提取的。

18 世纪中国和欧洲较富裕地区预期寿命的大体相似（中国或许有轻微的优势）也通过我们零星的营养学资料反映出来。我们不应该假定死亡率和营养状况之间存在太紧密的一致性，因为这种做法是假定前工业人口很少有办法自觉地影响死亡率，只能任由可用资源（以及外生的危机如流行病或战争等）的波动成为主要影响。例如，李中清和王丰作了一个很好的描述，说明新的公共健康措施（如接种天花疫苗的推广）、长期存在的个人卫生模式（使用肥皂、饮用开水）、大众态度的变化（从寻医找药到杀死或忽视某些婴儿等等所有方面的态度）等等，对 18 世纪中国人预期寿命的影响可能比我们通过前现代欧洲人口的研究而预期的更大。但尽管如此，马尔萨斯主义关于人均食物供给会影响死亡率的基本见解不可能被忽视；因而，发现中国人的寿命相当长，看起来一直有相当丰富的食物，是令人感到安心的。

布罗代尔发现了欧洲人 1800 年以前卡路里摄入量的大量记载，并注意到大部分数据来自对有特权者生活的记载；他认为从事艰苦的体力劳动的人（例如西班牙舰队上的水手）每天的摄入量为 3500 千卡，而“大城市民众”每人约 2000 千卡。^③ 克拉克、休伯曼和林德尔特（Clark、Huberman and Lindert）收集的 19 世纪英国的资料认为，不同类型的非农业劳动者家庭中，每个等成年

① 李中清 1994：7。

② 同上，9。

③ Braudel 1981：129—130。

男性(adult male equivalent)的卡路里摄入量为2000—2500千卡,1860年代的农村农业工人则接近3300千卡。^① 潘敏德从一部17世纪长江三角洲的农书中记载的农业工人的口粮定量反推,提出这些定量中仅谷物即可折算为4600千卡。^② 对18世纪全中国人口粮食消费的估计多种多样,但它们的平均值为每年2.2石左右稻米当量,^③每人每天约产生1837千卡。如果18世纪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与卜凯(John Buck)1920年代到1930年代的样本相同,^④换算为每个等成年人口就是2386千卡,还要加上他们所消费的无论何种非谷物食品。把数据换算为等成年男性,尽管合乎与英格兰比较的需要,由于下面的事实而变得复杂:即,17世纪和20世纪中国农村的资料中,成年男性和女性之间的消费差异比英国样本中的差异要大得多;但如果使用19世纪后期英国的比率,我们的中国的数字就变成每个成年男性2651千卡。这与英国各种不同样本中除一个以外其他的完全相似,包括那些19世纪末较为富裕的地区的样本,并远远高于布罗代尔对全欧洲“大城市民众”的估计。^⑤

东南亚的资料极为参差不齐,但一本来自吕宋岛19世纪初的教堂记事簿显示出,出生时的预期寿命为42岁。^⑥ 其他零散的证据显示,1500到1800年间,东南亚上层阶级的寿命可能略高于他们的欧洲同类,这一时期欧洲的游客也经常谈到土著居民有多么健康。^⑦ 在其他很多区域,我们仅仅是缺乏资料。

只有在印度我们找到的预期寿命估算值才明显低于西北欧的大部分数字:1800年前后,出生时的预期寿命大约在20到25岁之间,计算根据的是来自一个区域的不够可靠的资料。^⑧ 如同我们将反复看到的,多变的和软弱的资料结合在一起,使得南亚的情况特别难以概括,甚至使得对次一级的区域作出像中国、日本和欧洲能够作出的那些描述也特别困难。在这种情况下,

① Clark, Huberman 和 Lindert 1995:223—226。

② 潘敏德,未出版:10。

③ Marks 1991:77—78。

④ 转引自 Perkins 1969:300。

⑤ 关于英格兰,见 Clark, Huberman and Lindert 1995:226 注 25。潘敏德 1994:327 及附注对于成年男性的消费双倍于成年女性的估计作出了一个合理的论述。如果这是事实,中国每个等成年男性的消费会是一个更为令人印象深刻的数字:仅来自粮食中的即有 3181 千卡,但这样一种男女性之间卡路里的倾斜分布会使“等成年男性”成为一个多少有点欺骗性的比较标准。然而,上海 1930 年代的资料显示,成年女性的粮食消费是成年男性平均消费的 77% (上海社会局 1989:183);这与 Clark, Huberman 和 Lindert 用他们的英国资料计算出的转换率 0.733 极为接近。

⑥ Ng 1979:56,引自 Reid 1988a:48—49。

⑦ Reid 1988a:45—50。

⑧ Visaria 和 Visaria 1983:472—473。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印度劳动力体系的种类甚至比面积更大（但政治上更统一）的中华帝国要多得多；其种类的范围看来至少像欧洲的一样广，因而比仅有西欧自身时大很多。如果这种情形导致甚至在自然条件相似的地区收入分布和生活条件存在同样巨大的差异是不会让人吃惊的。（当然，这也是欧洲的情形，而在中国，区域性生态和生活水平之间的关系看来更为直接。）同时，即使是 25 岁的预期寿命也仅是略低于布莱奥（Blayo, Yves）的法国数字；此外，一项最近的研究认为，18 世纪中叶至少印度南方工人（农业工人和手工业工人）的食品购买力普遍超过了英国工人阶级。^①

出生率

如果欧洲人的死亡率并非特别低，他们的出生率也不是；因此欧洲家庭在保持他们的世袭财产方面就没有特别的优势。当约翰·哈伊纳尔首次描绘出欧洲生育体系使用高独身率、很多少年和青年在他们能够结婚前离家数年做佣人、相当晚的婚姻等方法，使其出生率低于一个“前工业人口体系”（这种体系中没有任何避免婚内生育的措施）的出生率时，人们普遍假设，世界其余地区的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的话，以这样一个“前现代”体系为特征。^② 确实，欧洲之外很少有大型社会有类似的推迟婚姻或压低结婚人口比例的制度，站在欧洲立场向外观察的比较学家们也根本不准备在欧洲开始出现有效的婚内生育控制的时间（约为 18 世纪末）之前发现它。但现在很清楚，亚洲（或至少是东亚）确实有过某种婚内生育控制。

日本的资料首次显示出令人吃惊的低出生率。其中有许多看来是习俗安排的间接的——或许是无意识的——结果，按习俗，年轻女性通常一次数年离开她们的家乡做雇工，因而对出生率产生了与哈伊纳尔在欧洲看到的类似的（尽管更明确的）影响。^③ 此外，我们也不会弄错控制一个家庭中儿童数量和性别的更为直接的人为努力的证据，包括流产和弑婴，或许还有避孕和节欲。更有启发意义的是，已经越来越清楚这些直接的手段——包括弑婴——不仅是在经济困难时期作为一种生存策略，而且也是繁荣时期积累和迁徙策略的组成部分。^④ 事实上，有证据证明日本富人中的弑婴行为实际比

① Parthasarathi 1998:78—109。

② Hajnal 1965, 1982; 特别见 1982:476--481。

③ Cornell 1996:43—44; Hajnal, 引自 Goldstone 1991:405。

④ Smith, Eng and Lundy 1977:107—132。

穷人中的更为普遍。^①

来自东南亚的证据较少,也不大引人注目,但也强烈地暗示出夫妻们进行了多种努力以控制出生率——特别是很多有女性从事小贩工作的家庭。^②就在最近已经弄清楚,不同阶级的中国家庭无论是在顺利时还是在困难时都会采取多种方法限制他们的家庭规模,拉开其子女的间隔,选择子女的性别。^③最广泛使用的方法看来是在婚后推迟圆房时间,从而避免在建立一个家庭后立刻怀孕;最近的研究表明,这使得中国女性尽管实际上普遍早婚,其生育期间平均看却比同类型的欧洲女性明显缩短。^④结果是,在1550—1850年这整个时期中,每个婚姻和每个妇女的生育率都低于西欧的水平。^⑤

总之,显然亚洲的不同人群至少像任何欧洲人一样,能够也确实为维持或改善他们的生活水平而作出保持低出生率的决策。^⑥此外,中国和日本的出生率比欧洲低的证据也支持了死亡率较低(以及由此而来的相当高的生活水平)的证据,反之亦是如此。并且,如果东亚人的生活与欧洲人同样或更好,就没有什么表面看来真实的理由可以认为他们家庭的资本积累水平较低;尽管如此,下一节将探讨各种宏观层面要素使欧洲人的努力更有效的观点。

积 累?

42

看来没有什么理由认为甚至迟至1750年,惟有大部分欧洲人——甚至西北欧人——才是富裕的。所以,既然欧洲人的积蓄资产看来并不能使他们为自己提供更高的生活水平,它们也就似乎不可能有更高的价值。然而,琼斯提出的另一种可能性——欧洲的积蓄资产贬值较少——值得单独注意。可能有这种情况:一种更为耐用的积蓄资产在长时期中会被其他差异抵消(如较低的总投资率或缺乏熟练工人),但当这些其他的差异不重要时,它会逐渐使自己的衰减变慢。尽管如此,目前看来没有理由把更多的重心放在任何这类情况上。

① Skinner,转引自Goldstone 1991:407。

② Reid 1988a:16,160—162。

③ 李中清和郭松义 1994:1—38;李伯重 1994a,41—42,46—52。

④ Lee and Wang,1999:20—21;Lee and Campbell 1997:90—95。

⑤ 李中清 1994:3。

⑥ 李伯重 1994a:57—58。

欧洲的建筑可能比中国和日本的建筑更能经得起风雨侵蚀，后两个国家使用砖和石料都比较少。然而，我们缺乏足够的证据可以说明欧洲在这方面领先于所有其他社会，或在积蓄资产这一已有的弱点中没有其他补偿性的差异。

琼斯还认为，欧洲最常见的灾祸——主要是流行病、战争和农业歉收——主要破坏劳动力而不是资本，而在亚洲很多地区比在欧洲更为常见的地震和洪水则更可能破坏资本。但是再一次，我们有理由怀疑这是否能使欧洲获得任何明显的优势。

确实，除了最严重的灾害外，人口通常经过一代或两代即从所有的灾害中恢复，而积蓄资产的某种毁灭性的影响持续时间却较长：在13世纪的战争破坏了灌溉系统之后，伊朗和伊拉克的衰退长达几个世纪，可能是一个最著名的例子。^① 但如果一个社会的基本结构没有被破坏，即使是重建费时费工的基本设施所花费的时间，通常也不比人口从流行病中恢复所需时间更多。例如，贯穿中国长江流域的治水系统，在17世纪连年的战争、瘟疫、萧条和人口下降之后，一旦恢复稳定，重建得相当快，^②在19世纪中期绝对水平同样高（尽管不是同比例）的破坏之后，也仅在几年内就得到了恢复。^③ 洪水和地震应该不会比瘟疫或旱灾更能毁灭一个社会的基本结构。所以，除非战争对亚洲基本社会秩序造成的损害比欧洲更大——这种情况很难成立，因为现代早期的欧洲战争频繁，战争发生的频率至少在中国和日本要低得多，而在东南亚，大部分战争中物质毁灭的范围有限^④——欧洲得益于其资本贬值较少这一观点是极不牢固的。（在后来的一部著作中，琼斯把他的重点从真实的物质毁灭的差距转移到另一种主张，即蒙古人统治时期的后遗症把特别保守的政体强加给了亚洲，这种说法我们将在以后讨论。^⑤）最后，琼斯没有提供能使我们相信置换被毁坏的物质资本比置换人力资本必然更为困难的理由，而欧洲的人力资本看起来至少与中国、日本或东南亚损失得同样快。

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欧洲的织工、农民或其他工人比他们在欧亚大陆各地的同行有明显更高的生产力——就像当 they 有更多或更好的资本时，他们本应该的那样。我们已经看到他们并没有表现出寿命更长或生活更好——这一事实的意义不仅在于其自身，还由于它暗示出在欧洲和亚洲的商

① Abu-Lughod 1989:193—197.

② Will 1980; Perdue 1987:211—219.

③ Bernhart 1992:129—134.

④ Reid 1988a:121—128.

⑤ Jones 1988:130 146, 特别是 145—146.

品竞争中,欧洲的制造业者没有因支付较高的实际工资而处于劣势。所以如果他们的工人有较高的生产力,他们就应该能够在亚洲市场上出售其产品。但是,正如所有的记载一致同意的,欧洲商人在亚洲出售他们的商品要比在国内为亚洲商品——无论是精英还是大众的消费品——寻找市场困难得多。(很可能尽管亚洲人吃得与欧洲人同样好,他们消费的其他商品却要比欧洲人少,但我们将在第3章看到,中国人和日本人其他商品的消费大概和欧洲人是一样的。)确实,亚洲输往欧洲的制造品的最大单一产地——印度次大陆——也是很多学者认为其工人生活水平异乎寻常低(如同我们在第3章将看到的,既由于极不平衡的收入分配,也由于人均产量的实际水平)的一个亚洲大区。但在整个18世纪和19世纪许多时间中,中国的纺织品和其他商品也得到了一个重要的欧洲市场(并且不仅是在富人中)。^①

技术又如何?

到1850年,至少西北欧已经比旧大陆其他地方有明显的技术优势,这不可能完全是19世纪的成就。但正如此前的几节所阐明的,从整体看18世纪的欧洲人比中国人或日本人更有生产力看来是不可能的;这意味着我们需要谨慎地为1750年前后全欧洲“科技优越”的主张下定义,并据此确立我们的解释目标。结论承认文化和制度因素在帮助某种“科学文化”传播方面的重要性,但是留下尚无定论、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是,这种文化怎样成为独一无二的。它们也倾向于把其他许多学者高度重视的比较具体的政治—经济因素作用(从专利法到与英国劳动力高成本连绵不断的冲突)减到最小。同时,这样的结论增强了从海外得到的某些关键性技术知识的重要性,增强了一系列与地理和可用资源相关的“随机因素”的重要性。⁴⁴

如果欧洲人,如我所证明的,1750年生产力的总体水平并没有领先,那么他们拥有的技术平均水平就不大可能更优越;而看来比较合理的是,对于许多重要部门来说,欧洲任何地方(主要是不列颠、尼德兰联合省和法国各地)所能够应用的最好的技术已经是世界上最好的。这些技术在以后一百年中的推广将会缩小欧洲技术最好水平和平均水平之间的差距,并创造出我们在1850年见到的大部分生产力优势。(举例来说,显然,牛顿学派的机械制造学

^① 郝延平 1986:28; Morse 1966:II:61、180、256、266、322。特别是对美洲市场容量的研究,以及对相对低廉的棉布价格的研究。

使欧洲人在 1750 年发明了某些抽水机和运河闸,比别处已有的东西都更好,但中国同时普遍存在的运河可能使中国人在较近期以前在开发内陆航道的潜力方面一直有平均程度的优势。)即使有人强调另一种情况——即欧洲 1850 年时的所有优势都产生于 1750 年以后的发明——仍然需要问一问这种创造力突然爆发的基础是什么。

1750 年以后最佳技术的加速传播和新的发明创造的爆发,都应该归诸玛格丽特·雅各布(Margaret Jacob)和其他人认为在 1750 年前的 150 年中形成的“科学文化”要素,特别是在英格兰,这些要素包括:越来越强的读写能力和印刷术,科学社团的发展,比较容易听懂的公开演讲等等。站在这些现象之后的是一种强有力的观念,即对一种机械本质的研究应该受到鼓励,因为它既为个人提供了物质利益,又为另外两种具有政治含义的认识论——以对于活生生的大自然、上帝以及社会秩序的直觉的、外露的或不可思议的知识为基础的固执己见的“教士的权术”或公众的过分自信——提供了一种有社会稳定性的代用品。^① 这种结构的某些部分对于西北欧来说确实是独一无二的,但并不都是。值得注意的是,举例来说,17 世纪,特别是 1644 年满族掌权之后,中国人对物理学和数学的兴趣明显增加,^② 出版商们也发现,对于销售大批书籍,通过他们的工作实现改善世界的承诺,避开被征服后的政治论辩的雷区,医学书籍是一条特别好的道路。^③ 更一般地说,无论欧洲的结构最终证明有多么成功,它并不代表技术进步的唯一道路。其他区域仍然在许多技术领域或领先或迟滞,并继续它们自己的发明和传播模式。

45 在很多领域中,各种各样的非欧洲社会仍然处于领先地位。我们已经提到过的灌溉或许是最明显的;在其他很多农业技术中,欧洲也落后于中国、印度、日本和东南亚部分地区。1753 年建立的一个威尔士农业改良协会承认这是一个事实,表示要致力于让威尔士“像中国一样繁荣”的日子早些到来。^④ 确实,一旦我们看清预期寿命的相似——这使得欧洲人不可能有好得多的营养状况——欧洲和东亚人口密度之间的巨大差距就成为农业技术差距大小

① 特别注意 Jacob 1988:27—30,58—59,64,77,81—82,89,110,123,150—151,158,209,223。

② 实例见 Henderson 1984;Kawata 1979。

③ Widmer 1996:95—99,103—104,107—108,113—115。

④ Bayly 1989:80—81。

的深刻见证。^① 我们还可以加上中国和日本的农业能力与纺织用纤维高涨的需求保持了同步(正如欧洲农业在1800年以后中断同步一样),以及甚至相对落后的华北在保持其土壤肥力方面也一直比英格兰或法国做得更好的证据(将在第5章中讨论)。如我们以后将看到的,将近18世纪末欧洲人在探索抗击其热带殖民地森林采伐过度和土壤退化的方法时,发现在印度和中国有很多可以学习的东西,但直到完全进入19世纪以前,他们没有以任何系统的方式把这些教训应用在国内。如果没有欧洲在大西洋彼岸获得的数额巨大的额外的土地(不仅通过航海及商业技巧,还通过运气、天花和暴力),很容易设想在18世纪这个最大的经济部门中欧洲明显的技术落后会与它在其他部门中的无论什么优势具有同样大的意义。

18世纪后期其他一些部门中也有欧洲人仍然需要学习的东西。在很多纺织品染织区域,西欧人一直在致力于模仿印度和中国的加工过程;瓷器的制造亦是如此。迟至1827年和1842年,两个英国观察家分别声称,印度的条形铁与英国铁一样好或者更好,1829年印度铁在英格兰的报价比英国铁价的一半还要低。^② 非洲许多地方也生产了大量的铁和钢,其质量至少与现代早期欧洲生产出来的任何产品一样好,尽管木材(用作燃料)的短缺限制了某些地区的产量,并可能造成在远离森林的地方铁的价格相当昂贵。^③ 医药在世界任何地方大概都不是非常有效,但是东亚(可能还有东南亚)的城市在诸如保持公共卫生和供给洁净水等公众建康的重要方面远远领先。^④ 17世纪和18世纪几项重要的医学进步之一——预防天花——似乎是在欧洲、中国和印度独立发展起来的。^⑤ 最近的研究表明,至少在母婴保健领域,清代医学——这方面的常识似乎一直在迅速传播——继续优于欧洲的医学,尽管(就我们所知)没有作出可与哈维对血液循环的研究相比的基础概念性的突破。^⑥ 这个单子可以继续列出更多的项目。

46

^① 由于灌溉在山东农业中不是一个重要因素,第5页注4讨论过的山东和尼德兰供养的人口密度之间的差异是一个特别令人感兴趣的例子。对中国农业技术的全面研究见Bray 1984。至于一个中国以外的实例(确实涉及灌溉),考虑下面的事实,在印度南方的高韦里河三角洲,耕作者上缴了他们94%的产出,但却活了下来(Van Schendel 1991:44)。这意味着一个农民能够养活16口人(尽管或许不能生活得很好)——暗示出亚洲各地不只是每英亩而且每个劳动力的生产率都比在欧洲发现的任何生产率更高。

^② 关于铁,见Dharampal 1971:243—244,246—247,260;英格兰的铁价(和从生铁到条形铁的换算)见Deane和Cole 1962:222注5,223注1。织和染,见Mittra 1978:13。

^③ Thornton 1992:45—48。

^④ 见Hanley 1997:104—105,110—111,119—120;Reid 1988a:38。

^⑤ Dharampal 1971:141—164论印度;杜家骥 1994:154—169论中国。

^⑥ 熊 1995对婴儿和母亲保健的研究;Unschuld 1986:183—197;Widmer 1996:95—115,和Bray 1997:311对医学著作出版普及的研究。

因而,总的说来,认为1750年的欧洲已经拥有独一无二的综合科技水平的观点需要给以相当大的限制。即使在能源的产生和利用方面——可能是欧洲在19世纪最重要的优势(如我以后将论述的)——此前一百年中欧洲的地位也相当不清楚。斯米尔(Smil)估计1700年左右中国的人均能源利用可能和西欧差不多。^① 尽管个别产生动力的机械(从水车到不久以后的蒸汽机)的功效可能是欧洲有最大优势的领域之一,但中国炉子的效率却有同样显著的优势,无论是用于烹调还是取暖。^②

回过头来看,显然,由于欧洲19世纪转向了可以利用的丰富的矿物燃料,欧洲人在寻找利用热能的方法方面的进步与中国在有效捕捉热能方面的进步相比,具有了更大的革命性的潜能——但这仅仅是回顾,而且仅仅是由于幸运的煤矿地理位置带来的优势。如果燃料短缺延缓了欧洲工业发展,别的地方首先产生了某种突破,欧洲壁炉造成的浪费对于技术优势的发展历史来说,可能就不是作为一种次要的“例外”,而是作为造成这一地区落后的一种技术缺陷的主要实例出现。或者如果新大陆没有提供大量的纺织纤维原料,欧洲机器纺织的早熟看起来就可能更像引人好奇的古董而不是一个伟大变革的中心组件,我们现在就可能正在援引欧洲农业单位面积产量的低水平作为一个征兆,说明严重的技术落后使欧洲必须保持把大部分土地用于粮食作物,因而导致这些精巧的但却不合时宜的发明创造在它们在别的地方受到模仿之前就凋萎。

在本章的结尾我们将回到蒸汽机和纺纱的重要实例,以及它们与资源横财的关系上。现在需要强调的一点是,甚至到18世纪晚期,欧洲以外的社会在很多领域仍然具有巨大的技术优势,它们从长远来看最终证实没有什么重要意义并不是必然的。甚至当欧洲的技术开始更快地在一个更广的层面上发展时,也并不是必然会克服土地修治、资源保护和市场扩展方面存在的缺陷,或者克服这些缺陷时必然会有足够的速度,从而使发展不会在持续影响的引导下,走上正是东亚和西欧一些非典型地区(如丹麦)所发现的用劳动密集方法解决问题的道路。

我们也不应该假定这些非欧洲人占优势的领域仅仅是曾经伟大但现在已停滞的传统的延伸作用。尽管18世纪的亚洲没有产生一项莫基尔所谓的“宏观发明”——完全依靠自身突然改变了生产能力的根本性的新见解——欧洲则在1500到1750年这一阶段,以及甚至在通常被定义为工业革命的那

① Smil 1994:234。

② 实例见 Anderson 1988:154。

些年头中(1750—1830)产生了其中几项。^①同时,各种各样比较小的技术改革在很多不同的地理和技术领域相继出现。曾在中国风行一时的欧洲染料受到当地改革者的模仿,^②正如许多亚洲产品在欧洲的遭遇一样。17世纪有人发现,华北植棉区有一种地窖,能够保持足够的湿度,使人们可以在很多气候干燥的日子中纺纱;这一发明在此后的一百多年中像野火一样蔓延,使一个其人口远远超过任何欧洲国家的地区得以生产出它自己需要的纺织品,并大大减少了季节性失业。正如仅仅是矿物燃料的崛起(这使得从每一盎司可燃物质中获得最大热能的意义比以前低了许多)使得中国炉子的高效率成为一个脚注而不是一个关键性事实一样,只是因为我们知道在另一个世纪中任何一种形式的以家庭为基础的纺织品生产都会归结为“落后”,这些地窖才没有被看作一种虽然简单但却至关重要,以一种给人深刻印象的速度推广的技术突破。^③

这个纺纱地窖的例子具有启迪意义,还由于尽管我们对于这一发明是怎样推广的知道得极少,但我们知道它确实得到了推广。尽管这个设计很简单,但需要掌握它的人属于最穷的、居住最分散的、文化水平最低的社会成员。这种推广可能通过我们看不到的机制相当迅速地覆盖一个大区,这一点应该使我们审慎地对待下述主张:即由于缺少科学团体和传播牛顿学说的信徒,中国(和其他社会)缺乏足够的手段传播新的和有用的知识。就这一点而言,我们甚至对于社会精英之间的科学讨论知道得也非常少,如本杰明·埃尔曼(Benjamin Elman)和其他人所描述的,这些讨论在18世纪比我们一般料想的要活跃得多。^④就算这些讨论通常通过古汉语进行,并且主要通过信件交换而不是在更为制度化的背景中进行,但这些信件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私人文件,信中讨论的内容相当广泛、复杂,并且通常相当实用。没有有组织的科学团体,综合性发明的普及可能会比在英格兰和荷兰慢,也完全可能会使精英科学和工匠知识之间的交叉传授更为困难。但关于科学技术领域中本地语言出版物可能做出的贡献还有许多东西需要了解,特别是既然我们已经了解到在本地语言的医学(无可否认是一个比其他种类科学技术更有声望的学科)书籍中存在活跃的贸易。此外,与欧洲不同的是,在欧洲,这些正式的科学团体通常实质上是为了保护科学免受某个敌对的教派的干扰,而在中国没有这类有权力和有敌意的实体,我们不明白为什么这些在欧洲发展起来的

48

① Mokyr 1990: 13, 57, 83.

② Greenberg 1951: 87.

③ Bray 1997: 217—220.

④ Elman 1990: 79—85.

具体机构应该在所有地方都成为科学技术进步的必要条件。所以,我们不需要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全面“停滞”的原因——它们并未如此——而是要考察它们不断进步的道路为什么没有使中国经济发生彻底变革。出于同样原因,在给那些帮助欧洲科技在广阔的层面以不寻常的速度发展的机构以充分声誉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考虑哪些具体的发展道路最终具有经济方面的决定性,并寻找使它们如此的因素。借用莫基尔的比喻(尽管为了一个不同的目的),我们必须比较的不仅是技术变革的发动机,还有它的方向盘——以及不同社会驶过的地形。

西欧不仅没有在所有技术领域中领先,而且在它们确实领先的那些领域中,也只有一些有长期意义。例如,到那时为止,西欧有世界上效率最高的水车,^①但仅此并不能使利用水力的欧洲工业部门获得竞争优势、有能力克服高运输成本(或生产过程其他方面的高成本)并征服其他地方的市场。在任何情况下,这都是一种只能在数量有限的地点确立的优势,并且即使在那些地点它也不能无限扩张。其他许许多多技术成就都是如此,无论是产生于欧洲还是别的地方。

- 49 在本章稍后,我将说明创造了持续增长的最重要的革新是用这种或那种方法节约土地的革新,特别是那些与矿物燃料联系在一起的革新,后者降低了靠森林提供能源的依赖性。但更常见的观点是认为决定性的现象是欧洲技术创新中出现了节约劳动的强调。这种常见的观点认为,经济差异(基本要点是西欧劳动力是自由的,并且据说挣相当高的工资)促使欧洲人(或者在这一观点的某些版本中是英国人)把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到节约劳动的发明中,而其他社会几乎不注意或者不需要节约劳动力。(这种观点对哈伊纳尔的人口观或布伦纳制度观的依赖——两者上文都讨论过——应该是相当清楚的。)这个独一无二的西欧需要减少昂贵的劳动力的使用,于是历史前进了,最后导致了机器和现代工厂的出现,以及人均生产力与生活水平的巨大改善,而同时其他社会更感兴趣于寻找能够节约土地、资本或某些具体的稀缺原料的创新。所以,欧洲人并不一定更有创造力,但高工资成本促使他们的努力走上了一个导致真正变革的方向。这一观点的各种版本由 J. B. 哈巴库克(J. B. Habbakuk)(英国与大陆欧洲对比)、伊懋可(Mark Elvin)(中国与欧洲对比)、沃什布鲁克(David Washbrook)(印度与欧洲对比)和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亚洲与欧洲的一般性对比)这样的不同的学者提出;^②

① Smil 1994:107。

② Elvin 1973; Frank 1998; Habbakuk 1962; Washbrook 1988。

它与工业化前欧洲已经比世界其他地方更富裕这一普遍主张相吻合。但除了或许一两个具体工业部门外,这一观点并不起作用。

首先是经验的问题。如同我们在本章前半部分看到的,看起来甚至在18世纪晚期,日本、中国和东南亚部分地区的平均收入可能与西欧的差不多(或更高)。如果这是事实,那么,欧洲的制造商面临着较高的工资成本这一情况就不得不依赖两种可能性之一。西欧的收入分配可能更为平均(或者至少是英国,如果承认工业革命在那里开始),所以工人在一个大致相同的一般人均收入中得到的份额高于别处的工人,这一可能性是可以理解的。另一种可能性是,一个社会可能存在一种非自由劳动的体系,这样一来,即使工人的劳动得到了相当高的总报酬,但他们没有为较艰苦的工作得到追加的收入,当他们的庇护人没有生产性的工作给他们做时,他们也不能寻找其他工作。在这样一种设定中,尽管看起来是高工资,但对于精英们来说,尽力从他们的下属中榨取较多的劳动时间,比投资于节约劳动的技术会有更大的意义。

后一种设定完全可以说明东南亚某些地区的状况,在那里,有高度技巧的手艺人,尽管人数稀少至他们常常可以得到很高的工作报酬,但却从属于“保护”他们并且独占他们产品的贵族庇护人。^① 它也可以适用于印度的一些地区;但那里形式上自由或半自由的(通常有微薄的报酬)手艺人似乎更为常见,至少在英国统治者针对各种各样的技术制定法律之前,织工在面对那些为他们预付流动资本的人时习惯上是保持自治的。^② 这样一种模式甚至在1400年代就已不适用于中国大多数的手艺人,实际上当政府指定的工匠世袭制度在1500年代崩溃后就不再适用于任何人。如我们在下一章将看到的,中国的劳动很可能要比欧洲现代早期的劳动“更自由”,肯定不会更不自由。依附劳动初看起来可能更适合于德川时代的日本,人们推测,当时各种各样的职业法规、对迁移的限制、世袭的庇护人一托庇者关系都由法令固定下来;但如同我们在下一章将看到的,事实是与法令全书全然不同的。

极为廉价的工资劳动的论点更难站住脚。在第3章我们将看到一些证据证明,实际上清代中国和德川时代的日本的收入分配一般而言都比西欧更平均,具体而言比18世纪晚期的英国更平均。(另一方面,第3章提供了有关印度的大量野史类的证据,暗示出收入分配比欧洲更不平均;每种倾向中具有某种指示性的定量证据都极少。)然而,甚至东亚的证据也远非无可置疑

^① Reid 1989:61,69—71;Reid 1988a:135。

^② Mitra 1978:37—41;Hossain 1979:324—338;Arasaratnam1980:259—260、263、265、268、272、278。

的,同时主要显示出中国和日本社会的最高层要求在国民收入中占有的份额并不比西欧的精英多;尽管如此,中国和日本由绝对贫困人口构成的阶层可能比西欧的更大,这促使不熟练工人的工资下降到明显低于欧洲的水平。尽管我没有发现可以认为这是事实的具体的理由——1840年以前访问过东亚的大部分欧洲人的叙事性证言都显示出相反的情形^①——这种可能性还是不能被消除。

此外,还有一种截然不同但却相关的——也是更可能的——情形,可以使中国和日本的核心区的高生活水平与低工资——至少低于荷兰和英国的雇主们支付的工资——协调一致。尽管在17世纪中叶和18世纪,荷兰和英国有许多工业是在农村中,但强有力的证据表明,当时这些国家中只有相当少的工人在农业和非农业劳动之间季节性流动。^②在这一时期之前,至少在尼德兰,有很多工业劳动者在高峰季节从事农业劳动,并为此得到相当高的工资。随着农业和工业劳动力市场越来越分离,日工资不得不提高到能够使现在就业不够充分的工人生存下去;这样一种工资提高确实出现了,但却以增加失业为代价。^③相反,在中国和日本,很多手工业工人几乎肯定没有充分与农业分离;因而至少从理论上说,他们可以在织、纺或制砖瓦工作收入较低的情况下仍然享受与他们的荷兰和英国同行同样或更高的生活水平。这样一种设想似乎是合理的,尽管远远没有确定,如果这是事实,它会使我们的其他发现与一种至少会刺激某些欧洲雇主寻找使用较少劳动的方法的特别有力的动机相符合。(它也意味着英国雇主会比那些其工人也务农的雇主在保持他们的工厂全年开工方面遇到的麻烦更少。因而他们会有更大的动机投资于集中化的厂房和设备。)欧洲雇主也面临着食品价格相对较高的问题,这意味着即使他们不必支付较高的实际工资,但也要比他们的很多——即使不是所有的——亚洲竞争者付出更高的货币工资。^④

但是,即使我们暂时接受西欧人的工资比任何亚洲人都高的观点,但要推论这种情况会刺激工业革命的技术变革仍然存在疑问。事实上,在现代早期的条件下,一般而论,高工资能够阻碍技术革新就像它能够促进节约劳动

① 实例见 Stunton 1799, II: 138.

② 当然,“相当少”是一个相对概念。DeVries 和 Allen 在把尼德兰和英格兰与西欧其他地区及较早时期比较时,对在原始工业和农业之间按照季节变化移动的工人数量之少感到震惊,而 Sokoloff 和 Dollar 1997 年拿英格兰与美国比较时,吃惊的则是甚至到 19 世纪后期,还有那么多的英国人部分时间在农业部分时间在工业中工作。我们将在第 6 章回到美国的例证及其含义上。

③ DeVries 1994a: 57—62, Allen, 引自 Postel-Vinay 1994: 72.

④ Parthasarathi 1998: 101—102.

的发明一样容易。莫基尔认为,这个表面上来自相矛盾的结论以一个相当接近于 18 世纪的现实的模式为基础。^① 假定,他说,新技术必须具体化为新资本设备,后者必须花钱。进一步假定,工资构成了绝大多数制造业成本中的大部分,技术方面只有很少差异推定大到足以使一个工资较高的企业或国家能以较低的总生产成本生产一种具体的产品。这样一来,那些支付较高工资的企业或国家的利润会普遍低于它们的竞争对手。如果——直到 19 世纪这也是普遍的事实——为购买新固定资产提供资金的银行或是不存在,或是只在很小的程度上存在,依靠一个企业的收益,任何包含了新技术的设备所需资金都将不得不出自留存的收益——那些工资比较高的企业这样做的能力会更小。因而,与其说高工资促进了节约劳动的技术革新,不如说它可能 52 同样合理地阻碍了任何种类的新技术。尽管这一模式今天看起来可能是违反直觉的,但它似乎符合早期的时代:例如,可以用它帮助解释为什么正是复杂的有着极高工资的荷兰经济实现工业机器化明显较晚。

此外,尽管最近两百年的工业化总的来说是劳动的节约和对资本的需求,假定这始终是重大的发明创造的理由仍是一个时代的错误。煤和蒸汽在各种各样工艺过程中的应用最终导致了巨大的劳动节约,但 18 世纪那些使煤可以用于生产铁、玻璃、啤酒等等产品的发明创造,其目的却是节约燃料费用(煤比木柴更廉价)而不是节约劳动;与其说把水从煤矿中抽出来的蒸汽机取代了做同样工作的人,不如说它们只不过是使某些没有足够人手可以做其他工作的煤矿能够得到开采。吹玻璃、制铁等行业中的其他发展与任何生产要素的节约都没有特别关系——它们关注的是生产出质量更高的产品。如果工业革命的缔造者们首先节约了昂贵的劳动,他们也是无意识的。在对英国 18 世纪专利获得者的一个研究中,克里斯廷·麦克劳德(Christine MacLeod)发现,大部分人声称他们的发明的目的或是改进产品的质量,或是节约资本(当我们回忆起与 1870 年以后的技术变革不同,工业革命的头一百年主要体现为相对廉价的生产资料时,这个目的就有了更大的意义);只有 3.7% 的人把节约劳动作为一个目的。^② 如果说发明家们并没有特别倾向于节约劳动,那些为他们的发明做鉴定的人甚至更少这样做;迟至 1720 年代,如果一个人说他的机器节约劳动,还会明显不利于他的专利申请。^③ 变革的长期结果无疑是劳动的节约;但对于一种认为高工资使努力集中在一个具体方向上的

① Mokyr 1991:177—181。

② MacLeod 1988:158—181。

③ Jacob 1988:92—93。

观点来说,有意识的动机似乎应该是问题的核心。

最后,由于使用的大部分生产资料本身成本比较低,即使一个所支付工资水平相当低的制造商也会有动机尝试它们;实际上,即使在我们自己的生产资料十分昂贵的时代,要说明低工资成本抑制了节约劳动的技术的应用也是很困难的。^① (有时候这种观点间或提出那些劳动成本差距很大的地方作对比——例如当代的巴基斯坦和德国——但不用那些工资差额确实存在但并不大的地方——例如,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和美国作对比。由于国民财富的差异并不像它们今天那样大,所以19世纪中叶以前很难发现巨大的工资差距。^②)如果19世纪以前的企业家们要使利润最大化,那么他们由于廉价的劳动而放弃的惟一创新就应该是那些无论如何都只节约边际劳动的创新;按照这些原则,要放弃某种类似于纺绵纱的创新,一个制造商必须享有实质上无需付出代价的劳动。在第2章我们将看到中国农民为了节约他们自己的劳动而花钱的各种实例,尽管伊懋可和其他工资动机论的支持者会声称,由于中国的劳动(与欧洲的劳动不同)如此廉价,使中国的制造业者忽视节约劳动的策略。

但高工资的假设可能仍然适用于一个重要部门:棉纺织业,布罗代尔和弗兰克都坚持其重要性。^③ 发明创造在纺纱中起的作用非常明确:它们使纺一定数量棉纱所需的劳动减少了大约90%以上。^④ 尽管这种大规模的节约本应该对以任何比率支付实际工资的雇主都具有吸引力,但它们可能特别吸引英国的棉纺织品制造商,后者比印度的生产者——他们在许多价格敏感的市场(在西非、中东,特别是新大陆,那里的奴隶穿的是最廉价的棉布)上与之竞争——支付的名义工资高得多。这一时期中国输出的纺织品(甚至还有中国最主要的纺织区江南在中国其他地区出售的越来越多的纺织品)质量相当高,竞争主要并不表现在价格上;^⑤但英国棉业制造商可能无法在中东、非洲和新大陆与印度棉布竞争,除非他们能减少他们支付的工资。

当然,英国纺织品制造商不可能轻而易举地做到这一点,并赢得这场与印度制造商的斗争;需要并不总是产生发明。至于英国作为一个整体,其纺织业制造商是否能征服这些市场的问题,不一定是至关重要的推定条件,因

① Mokyr 1990:166。

② Lazonick 1981:491—516;Bairoch 1975:3—17 论1800年前后国民收入差距的范围,以及今天存在的更大的鸿沟。

③ Braudel 1982:522,575;Frank 1998:98—99。

④ Chapman,引自 Mokyr 1990:98—99。

⑤ 李伯重 1998:108。

为他们的竞争者的商品是通过东印度公司交易的；尽管这些纺织品市场相当关键，但任何在这里起作用的“必要性”都是对纺织业者自身而言的必要性而不是对“英格兰”的。（这些市场中最有战略意义的是西非，因为迅速供给市场迫切需要的纺织品对于购买那里的奴隶是至关重要的。但那里所需布匹中至少有一部分是高价高质的衣料，英国贩奴商人关心的不是这些布匹的价格，而是如何获得足够的数量——首先是从印度，只是后来才从其祖国。^①）

所以即使在这里，“高工资/必要性”观点也遇到了问题。尽管如此，在这种受限制但又重要的情形中，可能也存在某种价值；它至少暗示出世界纺织品交易的模式和英国制造商与孟加拉竞争的具体方式——孟加拉既是一个以低工资为起点的经济（或至少是低货币工资经济），又是一个1757年以后东印度公司使用越来越多的暴力迫使其纺织品低于市场价格的经济^②——能够怎样加强纺织机械化的探索。此外，在其他方面它确实说明了寻找对具体发明而不是一般意义的“工业化”的解释，通过相关工业部门的细节以及当时人们认为某些发明可以实现什么目的——同时也尝试选择一些对更明显的正在冒头的欧洲霸权现象具有重要意义的实例——来确立这些解释有多么重要。

有了工业革命如何发生的知识，人们会受到诱惑去研究与两个最重要并最有活力的要素相关的欧洲的优势：纺织和煤/蒸汽机/铁的联合体，特别是后者。人们也确实发现了一些相关的欧洲优势，但通常是在令人吃惊的方面。

在纺织业中，中国人很久以来使用的机器与哈格里夫斯的珍妮纺纱机和凯的飞梭的差异都只在于一个重要部件。^③ 因而，几乎无法说在那些发明实际应用之前，西欧在这一部门有任何明显的技术优势。也不能作出结论说，正是由于这两种机器中所需的最后一个零件回想起来似乎很简单，它的缺少就说明中国的技术创新完全停止。18世纪欧洲技术中有很多几乎都是在此前150年中发展起来的，但是其间的等待并不意味着技术“停滞”；^④我们必须记住，现在看起来很明显的东西通常绝不是事先就很明显的。

此外，英国纺织业的革新也可能很容易地成为历史的脚注而不是重要的里程碑。当英国在棉纺工序中开始重大革新时，棉花在欧洲还是一种次要的

① H. Klein 1990:291—293。

② 见 Mitra 1978:46—47、51、63—66、75—92、113—115、126—127、14—15；工资的比较见 Chaudhuri 1978:157、273。

③ 见 Mokyr 1990:221。

④ 例如，Hobsbawm 1975:38。

纤维;麻纺和毛纺机械化花的时间明显长得多。而如我们在第5章将看到的,欧洲无论是毛还是麻产量的进一步扩大都存在严重的生态障碍和社会障碍。棉花来自海外,并且在18世纪大部分时间中只能得到相当有限的数量;实际上,纺纱新技术创造的对原棉日益增长的需求引起了非常急剧的价格上升,如果没有美国南方植棉的增长,价格上升会使这种技术的应用受到极大限制。^①

这个问题可以用一种较为概括性的方式简洁地表达出来。技术史通常设想一种突破会产生一个“瓶颈”,这个“瓶颈”把努力集中于一个具体的问题,由此而导致另一个突破,就像织机的进步产生了加快纺纱速度的动机一样。但这种瓶颈通常恰恰是由配置更多的资源定位的,如果没有任何技术变革,资源重新配置过程持续的时间越长,继续寻找一种技术解决方案的动机就越小。(一个典型的例子是,19世纪晚期,当矿物燃料在所有生产过程中的应用飞速发展而煤矿自身生产力没有发生重大变革时,煤矿工人的人数大量增加。)^②在纺织品生产机械化的情况下,棉花(和其他纤维)的种植中出现了一个瓶颈,这个瓶颈要求使用更多的土地和更多的劳动。

如我们在第5章和第6章将看到的,在欧洲不可能找到解除这一瓶颈所必需的土地。(尽管波兰和俄国的养羊业确实扩大了,^③但仍然不够任何地方使用,棉花生产则仍然微不足道。)同时,解决这一瓶颈使用的劳动主要是非洲的奴隶劳动;至于用于解决这一瓶颈的欧洲劳动,正是用在航海、贸易、压迫和制造(交换非洲奴隶和棉花自身的商品)方面的那些劳动。如同第6章将说明的,即使可以找到种植纤维作物的土地,用增加农业劳动力的方法在本国种植更多的纤维作物(中国和日本都走上了这条路,在把一部分森林和粮田转化为种植纤维作物的土地的同时,用劳动密集的方法在一些土地上榨取更多的粮食和燃料,但它们这样做付出了相当长期的代价),从长远看,也远不如重新配置劳动以解决这一瓶颈的这种特殊方法对欧洲有更大的利益。尽管棉花的情况特别清晰,但其他各种各样发展中的工业,以及人口增长对粮食的需求,也都产生了瓶颈,这些瓶颈的最终解决并没有使用更多的欧洲土地或把更多的劳动投放在那些土地上。尽管帕塔萨拉蒂(Parthasarathi)把工业化部分视为英国避免一种恶性循环的方法,即单位面积低产量→昂贵的食物→高货币工资→竞争困难,^④应该牢记的是工业化并不能单独解决那些

① 见 Bruchey 1967:表2—A(未标页码)。

② W. Parker 1984:38; Mokyr 1985a:107—108。

③ Gunst 1989:73—74。

④ Parthasarathi 1998:107。

据说在工业中引起了科技发展的问題,除非它也能满足工业和工人对农业的需求。既然,如我们将看到的,1750到1850年间英国单位面积产量并没有大幅度增长,问题的解决就必须涉及到能够把大量新增土地投入使用的贸易伙伴。⁵⁶

但更为主要的是,完全可以设想棉纺织业生产力的巨大增长没有导致18世纪生态制约的根本结束。纺织业所需的纤维仍然需要土地,在18世纪欧洲的许多地方,马尔萨斯四种必需品——食物、燃料、纤维、建筑材料——之间的土地竞争发展得更为激烈。只要食物和燃料的价格上涨得比工资快,^①如同18世纪欧洲大多数地区那样,就很难说清纺织品的需求怎样能够无限制地增长——即使织和纺的成本下降——纺织新技术也没有明显地应用于其他部门。棉纺织生产中的这些发展能够轻易引发农村“手工工业”长期增长已经呈现出的过程(有待第2章进一步讨论)的一种强化——这些过程包括人口加速增长、对土地的压力扩大、更为密集的劳动、实际工资停滞,最终或许发展到生态绝境而不是突破。

18世纪的西欧面临严重的生态压力(第5章将更为彻底地讨论这些压力)。简单说,“遥远的16世纪”和18世纪(特别是18世纪的后50年)人口和经济的膨胀导致了西欧森林的过量采伐,森林覆盖率和人均木材供给下降到甚至不如人口稠密的中国的水平,更不必提印度了。森林采伐过度带来了接踵而至的其他问题。法国和德国的考古证据表明,18世纪是土壤侵蚀史中两个最坏的时期之一;文献资料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并增加了其他一些毁林区域,这些区域经历了巨大的沙尘暴、产量下降和严重生态压力的其他征兆。^②对现代土壤侵蚀的研究显示出,它往往是一系列更为重要的土壤问题的最明显的征兆。^③18世纪晚期也见证了一种不寻常的以“欧洲季风”著称的气候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异乎寻常的长期干旱与短暂而异常狂暴的大雨轮流交替。这种暴雨落下时,既造成异常的侵蚀,又对农作物没有什么用处,特别是由于欧洲人(不像比如说印度人)没有可以储存和疏导雨水的大型灌溉系统。不清楚是什么引起了这种气候的发作,但显然在毁林严重的地区它出现得更为经常,^④因为树木缓和了局部降雨模式的季节性。今天有这样⁵⁷

① Goldstone 1991:186; Labrousse(1984):343,346—347。

② Blaikie 和 Brookfield 1987:129—140,特别是138;Kjaergaard 1994:18—22。更多细节见第5章。

③ Blaikie 和 Brookfield 1987:139。

④ 同上,133。

一种季风气候的仅有的几个温带区域之一是毁林严重的华北。^①（华北也比北欧更靠南，因而更接近热带高压系统。）

这些生态压力并不等于是一个会使欧洲人的生活水平崩溃的马尔萨斯危机。相反，它们发生在某些区域是由于人均消费水平提高和人口的增长。但它们确实，如我们将看到的，对进一步的发展形成了实质性的阻碍。然而在19世纪，尽管欧洲的人口和人均消费加速增长，生态变量却稳定了。西欧的森林覆盖率在经历了400年的下降之后，于1800到1850年之间的某个时候稳定下来，在整个19世纪，英国、法国、德国和比利时的森林覆盖率甚至有所上升；^②侵蚀减少了，土壤肥力稳定甚至得到了改良；欧洲的“季风”消失了，恢复了一种较为典型的降雨模式。^③

因而，显然欧洲在工业革命中取得的成就中有一大部分脱离了一种长期存在的模式，在这一模式中，一切增长都把大量增加的需求压到土地上。除了几个例外（例如丹麦），这种成就并不依赖使用大量的追加劳动提高土地的单位面积产量，并在同时保护其肥力（用埃斯特·伯斯拉普描述的著名的方式）；19世纪晚期，每英亩的劳动投入实质上甚至是下降的。然而今天使资本能够以令人吃惊的程度取代土地（和劳动）的化学方面的突破（首先是通过使用化肥和通过制造人工合成的根本无需栽培的原料）是属于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的。那么，欧洲的持续发展是怎样变成生态上可以承受的呢？

为了理解自我维持的增长是怎样成为可能的，人们必须如E. A. 里格利（E. A. Wrigley）所主张的，寻找能够解除土地压力的发展。里格利强调煤的用量的增加，因为每单位地表面积的煤产生的能量比木材要多得多。^④我要在这一点上再加上新大陆粮食作物的引进，特别是马铃薯，它在每英亩土地上生产了对欧洲人来说空前的数量的卡路里；生态知识和土地（特别是森林）修治两方面的进步，如里查德·格罗夫（Richard Grove）证明的，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殖民地的经验；还有在广阔的新海外领地上应用现有技术获得的大量资源。

58 这些发展中最新的进展基本上不是技术方面的，这将是第6章的研究中心；现在只要提一下新大陆既生产了土地密集型产品（棉花、糖以及后来的谷物、木料、肉类和羊毛），又生产了诸如海鸟粪之类的恢复地力的产品就够了。

① 赵冈 1973:22--25,30-31。

② M. Williams 1990:181。关于某些具体国家，见 Darby 1956:203—204，以及与 Cooper 1985:139 注2（法国）和 M. Williams 1990:181（德国）的比较。

③ Blaikie 和 Brookfield 1987:132—133。

④ Wrigley 1988:80—81。

马铃薯、生态知识和煤是本章技术史的组成部分,就像使它们变得如此重要的综合背景一样。

每英亩马铃薯产生的卡路里远比欧洲原有的作物多。马铃薯也在18世纪引进到中国和日本,但几乎完全是作为一种山地作物,因为在低地上每英亩水稻已经生产出了数量相当多的食品。在谷物产量低得多的欧洲(无论是每英亩还是相对于种子重量),马铃薯在爱尔兰和比利时这样的人口密集地区也占领了低地(到1791年,在佛兰德已取代了40%的谷物卡路里)^①,后来又传播到中欧和东欧的许多地区。

一个不那么广为人知的因素,像马铃薯一样,是一项技术性的进步:在19世纪,欧洲人开始对他们的森林运用科学保护的原理,并开始理解保护树木对于生态系统总体的重要性。里查德·格罗夫认真追溯了通往这一具体突破的道路。令人感兴趣的是,尽管这一进步主要是由于欧洲科学的应用——牛顿力学在了解树木怎样使水反复循环并影响局部气候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欧洲流行的一些理论却成为障碍:甚至在19世纪初,欧洲很多医生和植物学家还谴责森林中有致人疾病的“瘴气”,并把伐光树木推荐为一种公共健康措施。^②

欧洲人生态知识的这种结晶——看起来恰好在西北欧遭受地中海各地甚至华北的命运之前及时帮助了它的稳定^③——在两个重要方面与殖民地相关。首先,正是在热带岛屿上欧洲人能够观察到土地利用方式的改变、气候(特别是干燥气候)和土质变化三者之间的关系以某种速度逐渐展开,解决了他们靠理论无法解决的争论;正是在印度新近殖民化的地区(那里欧洲人的需求和所有权的改变使土地利用发生了迅速的变化),他们开始看到同样的活力也可以影响大面积的大陆性土地。此外,总结出这些关系的殖民地植物学家、外科医生和官员(通常是同一批人)从华南以及特别是印度南方的实践中学到了很多怎样管理生态系统的知识,这些实践在很多方面比欧洲自己的更先进。(日本的情况甚至可能会更好,但日本人与好奇心盛的外国人接触

① Braudel 1981, 170.

② Grove 1995, 408.

③ 如我们在第5章中将看到的,在18世纪,西欧大陆在最大范围内一直有比英国完好的森林,但由于大部分地区缺乏与英国日益增长的煤的使用等同的任何东西,也经受了更严重的燃料短缺和更迅速的木材价格上涨。

59 的机会较少。)①最后,殖民地软弱得多的财产权和相对独立于当地财产所有者的殖民地体制,使英国、法国和荷兰的殖民地官员可以用一种他们无法在国内使用的方法进行环境调节方案的实际实验,其中有一些相当极端。这类来自海外的知识一旦于19世纪带回到欧洲(和美国),就成为森林养护的基础,成为利用树木帮助保护和改良可耕地的基础等等。②因而,殖民地帮助欧洲消除了它在土壤森林学中的技术劣势(通过马铃薯、通过生态、也通过数不清的对植物学的重要影响③),伴随着我们将在以后讨论的资源输入,还提供了有重要意义的知识输入。

尽管如此,在我们最新的节约土地的伟大技术变革中,并没有超出欧洲范围的东西:煤的使用日益增长(特别是在英国),既取代了木柴又成为全部新过程的基础。

煤是工业革命早期景观的中心。只有棉花、铁、钢和铁路得到了同样的注意,而除了棉花以外,其他那些要素都要依赖煤。但在最近,煤的重要性常常被降低。例如人们注意到较早期的工厂以水为动力而不是煤,英国大部分煤被用于单调的毫无创意的家庭取暖和烧饭。里格利反复主张煤的中心地位,按照他的计算,到1815年,英格兰每年从煤中获得的能量相当于用掉1500万英亩的林地(如果他使用一种不太保守的换算则是2100万),④但这个数字告诉我们的东西并不是显而易见的。如果没有那么多煤,英格兰不会多消费那样多的木柴(里格利也没有说它会),因为它没有那么多;我们也不能具体说出有多少熔炉会停工,多少玻璃不会生产出来,或者多少个家庭无法取暖。这种调整会涉及到一系列因素的复杂的综合,更受冻的人,买更多的衣服,生产更少的铁,等等。我们也无法确定如果没有煤,具体的工业进步——更不必说更一般意义上的工业化——是否会刹车。

60 尽管如此,至少局部的回到早期对煤的重视上去看来是有根据的,无论是用里格利的理由还是其他人的。水一度可能比煤为更多的磨提供了动力,但它受地理环境的限制,携带不便,通常其可靠性依季节而变化。此外,在所有各种化学和物理过程中(从酿造到冶炼到染色)燃烧都是不能被取代的,在给分工以巨大推动力的运输革命中也不能取代。在至关重要的铁业中(还有

① 关于欧洲从印度引进的理论和实践(Grove认为至少在1857年前,这“比任何从印度以外输入的理论体系……更重要”(382))见Grove 1995:387-388,406,440,471-472;关于中国的影响,见187;关于早期阶段,见77-80。中国官方生态知识的洞察力及其限制,见Dunstan 1997。关于日本的森林学,见Totman 1989。

② Grove 1995:435,463-464,471-472,480。

③ Morton 1981:118-121。

④ Wrigley 1988:54-55;关于这种换算结果的更多内容见第6章,264页注3。

由此而来的钢、铁路及其他等),难以设想能够找到可以代替矿物燃料的东西。确实,哈默斯利(Hammersley)指出——与一些早期的观点相反——1660—1760年间英格兰的铁工业没有收缩,可用燃料或许也没有致命的短缺;他估计在这一阶段,覆盖了英格兰和威尔士土地面积2%的森林被用来为英国的铁业提供燃料。^①而18世纪末英国的森林面积只有5%—10%。^②因而即使在理想的情况下,英国木炭生铁可能的最大产量大约为87 500—175 000吨;但到1820年,英国铁的实际产量达到了400 000吨。^③除了需要一些木材供其他用途外,为了用木炭炼铁动员所有的木料是不现实的。铸造也需要既靠近铁又靠近水力(以驱动风箱)的地点,生产铁所用的木炭运输距离不能超过10到12英里(最好少于5英里);熔炉需要大块的木炭,但在运输路途非常远时,木炭常会碎成小块(甚至炭灰)。^④所以尽管哈默斯利的确说明了在1760年的水平上铁的生产没有面临一个“能源危机”——更不必说森林过度采伐没有引起用煤炼铁的突破——但同一些数字也显示出炼铁工业的进一步发展确实需要煤。

在英国其他大部分工业中,以煤为基础的生产过程的发展比它在炼铁业中出现得要早^⑤,因而实质上早于以蒸汽机为动力的煤产量的巨大增长。因此,煤/蒸汽机的兴旺不可能引起那些行业的革新,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与那些工业部门的发展无关。即使煤的主要用途是供家庭取暖,如果可以使用的煤较少,用于工业的燃料也会更为昂贵。姑且承认英国木炭的实际价格经过了1550—1700年间的剧烈上涨之后,在1700—1750年间看起来是稳定的(尽管所有的木材和木炭价格都必须极为谨慎地处理)。^⑥即使是在蒸汽机使更深层的煤矿得以开采之前,由于道路和运河的修筑,廉价的煤就逐渐得到了更广泛的应用;但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这些渐进的改良与蒸汽机(特别是1750年以后)可能引起的改良相比相当小,并且很快就会达到它们的极限。此外,可能是由于铁产量的增长,1750年后木炭的实际价格甚至在有更多的煤投入使

61

① Hammersley 1973:602—607;另见 Flinn 1978:139—164。

② M. Williams 1990:181。

③ Harris 1988:25,56。Flinn(1978:45)也指出,如果没有煤,木炭的短缺可能会使1750年后英国铁产量的增长踟躇不前;他的重点在于说明这个早期的产出率是可以维持的,不存在引起以煤为基础的制铁业发展的日益恶化的木炭危机。

④ Harris 1988:26;Flinn 1958:150。

⑤ Harris 1988:26。

⑥ Hammersley 1973:608—610指出,高运输成本使不同地点的木材价格变化极大,而通常单一的卖主或买主在一个具体市场上占据了主导地位,从而使价格成为稀缺性的一个拙劣的指标。此外,木炭价格中包括了相当大的劳动成本,所以与木料价格间只有松散的关联。

用的情况下再度上升。^① 更为昂贵的燃料肯定会对许多工业部门量的扩大造成憾事，不难看到它也限制了创新。如我们将要看到的，甚至蒸汽机自身最初也极为笨重，需要大量的燃料，并且不安全，以至如果其燃料要花更多钱，如果煤矿本身不是使用它的理想地点，对它做的实验可能使它看起来毫无价值。在第5章对于森林过度采伐（以及大陆欧洲）我们还有更多的话要说；现在只要明白煤对于英国的技术突破——特别是在铁、钢、蒸汽、动力和运输业中——是如何重要就够了。

此外，尽管把19世纪初煤的兴盛看作廉价的矿物燃料最终缓解了来自有限的土地供给的压力（甚至农业本身也受益于能源密集的化肥工业）的全过程可能过于目的论，但它明显成为决定性的一步；水力，无论其轮子得到了多么大的改进，但完全没有同样的潜力能提供超过未来几十年中飞速增长的人口的能源投入，或是让化学替代土地。因而，把煤的开采和使用看作欧洲最可能具备的技术优势看起来毕竟是明智的，因为这一优势纯粹发生在本地，对欧洲19世纪的突破是关键性的，并且（与纺织品不同）其兴旺并不依赖欧洲对海外资源的获取。

在这里，蒸汽机无论作为用煤为其他过程提供动力的机器，还是作为使采煤业本身得到巨大发展的更有效的抽水机的力源，都是至关重要的。M. W. 弗林（Flinn, M. W.）注意到尽管有很多利用风、水、地球引力和马匹给煤矿排水的方法，但其中没有一种在这个国家绝大多数煤层所在的深度大量使用。因此，如果没有蒸汽机，“英国的采矿业几乎不可能发展[到超过1700年的年产量水平]，大概肯定会开始呈现出收益日益萎缩”。^② 相反，随着采矿业中的蒸汽机变得越来越多也越来越有效，下一个50年中产量增长了大约70%，1750到1830年间几乎增长了500%以上（使总增长达到约900%）。^③

18世纪以前类似蒸汽机的东西一直在不同的社会中发展，尽管从来没有成为比珍品更重要的东西。^④ 中国人很久以来就知道蒸汽机所用的基本科学原理——存在大气压力——并且很久以来就掌握了一种与瓦特的发明十分相似的双重运动的活塞/圆筒体系（作为他们的“风箱”的一部分），以及一种与20世纪以前任何地方任何已知体系同样好的把旋转运动转换为直线运动的体系。所有保留下来的体系都是用活塞转动轮子而不是相反。（在一个风箱中，由活塞推动热空气喷出是其目的，而不是为轮子提供动力的一个步

① Flinn 1978:143—145,147—148; Hammersley 1973:608—610.

② Flinn 1984:114.

③ Flinn 1984:26,121—128.

④ 关于中国的实例见 Needham 1965:255.

骤。)1671年,一个耶稣教传教士在宫廷里演示了包括一台蒸汽轮机驱动的客车和一艘汽艇在内的能够工作的小模型,他的作品看起来对中国的模仿与对西方的模仿同样多。^①所以,用严格的技术眼光来看,这一工业革命的中心技术也可以在欧洲以外的地方发展;因此我们永远不能明确地说出为什么事实上它首先在欧洲发展。然而,我们可以确定一些理由能说明为什么欧洲——更具体说是英国——对于与工业革命的中心环节煤和蒸汽相关的发展系列来说是一个特别可能的地点。当我们把英格兰和长江三角洲——那里存在类似的缓解当地木材供给压力的动机,那里也存在先进的技术和高度商业化的经济——作比较时,可以看到欧洲的优势对地理环境的依赖程度与对技术能力的总体水平的依赖程度同样高,但远远高于对经济总体市场效率中任何(可能并不存在的)优势的依赖。

西欧领先于18世纪世界的相关技术是那些英国居领先地位的技术。其中之一正是采矿,但其余的并不是那些直接显示其关联性的技术:钟表制造、枪炮制造和航海仪器。

一般说来,中国的采矿史,特别是采煤史,多少有些令人迷惑。中国北部和西北有巨大的煤蕴藏量,在华北囊括了中国的政治、经济和人口重心的很长时期中,中国产生了一个巨大的煤铁多元工业。实际上,哈特韦尔(Hartwell)估计,1080年前后中国的铁产量可能超过了1700年欧洲除俄国以外地区的总产量。此外,这个煤铁多元工业不只庞大,而且相当复杂:例如,中国的冶铁工人似乎已经掌握了焦炭(提纯的煤)的生产和使用知识,而这是其他地方此后几个世纪都没有发现的。^②但在1100到1400的几百年中,中国北方和西北受到了难以置信的连绵不断的灾祸的打击:(蒙古和其他民族的)入侵及占领、内战、大洪水(包括一次黄河大改道)和瘟疫。12世纪的女真入侵者常常要求首都地区把一些最熟练的工匠交给他们作为(暂时)停止包围的代价;不清楚有多少工匠曾经回来。^③到1420年以后这一区域再度多多少少稳定下来时,中国的人口和经济中心已无可挽回地转移到了生态环境更宜人的南方;15世纪华北许多地区人口的恢复需要通过政府指令的人口迁移实现。^④

我们现在知道,与人们曾经认为的相反,采铁和冶铁业确实从蒙古人入侵的打击下恢复了。广东、福建、云南和湖南出现了新的生产中心,西北的生

① Needham 1965:135--136,225 226,369 370,387。

② Hartwell 1967:102—159。

③ Needham 1965:497。

④ 黄宗智 1985:114;何炳棣 1959:136—137。

产也有了一些恢复。到1600年,总产量达到至少45000吨的新高度,生产技术方面也有一些新的发展。^① 黄启臣的研究让我们看到了后蒙古时期铁生产的这一复苏,他对燃料谈得非常少,但很明显所有新的生产中心——他估计这些中心的铁产量占总产量的70%以上——都远离煤的产地,使人猜想这种铁主要是用木柴和木炭冶炼的。^② 我们对17和18世纪铁产量的情况始终没有多少了解,尽管这同一本书认为(根据非常脆弱的证据)它下降了。^③ 如果这是事实——或者即使只是没能保持增长——后蒙古时期资源重新配置的后果之一,即改变了对矿物燃料的依赖,很可能起了致命的作用。

至于煤更广泛的生产和使用,仍然有很多东西我们不知道。哈特韦尔认为煤业从来没有从蒙古人的入侵和相关的灾祸中恢复的观点可能早晚会受到严肃的挑战,就像他对铁业的相应观点已经受到挑战一样。但是至今为止这种情况尚未发生;即使最后证明煤没有像他认为的那样急剧衰落,它肯定再也没有成为中国经济的一个先锋部门。

不清楚有多少关于煤的开采和使用的知识在12到14世纪的天灾人祸中消失——这是一个明显的可能性,因为(无论中国还是西欧,迟至19世纪)这些知识通常是从师傅到徒弟口头传授而没有文字记载——也不清楚由于蕴藏着中国大部分煤的那些区域逐渐停滞、远离大市场、缺乏与其他手工业行业的互相促进,有多少知识停止了使用或停止了进一步的发展。尽管采煤业在中国仍然有重要地位,它再也没有成为一个先锋部门;取而代之的是各种各样节约燃料的发明(包括用在铁锅里翻炸食品代替用比较沉重的容器煮食品)变得日益重要。

18世纪长江下游地区——中国最富庶的地区,也是其森林采伐最过度的地区之一——通过沿河和沿海的贸易路线扩大了木材和豆饼肥料的供给。(这种肥料使居民可以把本来应该返还到土壤中的草和农作物残余当作燃料燃烧。)尽管这种以贸易为基础的缓解并不排除同一时期使用矿物燃料的经验——这两者共存于其他地方,也可以轻而易举地在长江下游同样如此而不会在文献中留下许多痕迹——煤几乎不可能特别吸引长江下游的手艺人和企业家的注意力;在这一地区内或其商人能比较方便地来往的地区中几乎没有煤。中国9个南方省份煤的蕴藏量只占当代中国煤蕴藏量的1.8%,11个东部省份占8%,而西北省份山西加上内蒙古共占61.4%。^④ 华南许多地

① 黄启臣 1989:1—2、46、84。

② 同上,2、70—72。

③ 同上,2。

④ 孙敬之 1988:93。

区和位于华北的北京市场范围内的确有一些煤矿运营^①——它们大都很小，所处的位置对利用中国最富有最渴求燃料的市场来说十分不利。它们也至少不时地受到缺乏连贯性的政府政策的牵制。^② 到此时为止，投入巨额资金改善其生产和运输条件在理论上可以证明是合理的最大的煤矿是西北地区的煤矿。

尽管把西北的煤矿与长江三角洲连接起来的利益回顾起来显得如此之大，以至设想曾有人对此作出过巨大的努力颇有诱惑力，但却不清楚那种努力可能是什么样；以我们所知的煤的用途为前提，我们现在能够想像的这样一个项目的大部分收益都是不可知的臆测。

同时，西北的煤矿工人由于在一个普遍落后的地区工作，特别不可能了解那些可能用来解决他们的问题的别的地方的技术发展，也很少有机会结识那些在诸如钟表制造之类专业化的奢侈品手工业中掌握了精湛手艺的工匠。这样的工匠确实存在，他们的技术，如果不是他们的人数，看起来并不落后于他们的西方同行——但他们几乎全部在长江三角洲或东南沿海，那里对钟表和带有精巧的发条的机器玩具有着真正的狂热。^③ 即使煤矿经营者知道怎样改良他们的采煤技术，他们也没有理由认为开采更多的煤会让他们得以占领一个巨大发展的市场：看上去无法克服的运输问题仍然把他们的煤矿与中国大城市中富有但在生态上极为贫乏的燃料用户分隔开来。^④

江苏北部徐州和宿县的煤矿离大运河不太远，可能是长江三角洲周边区域内仅有的可开发煤矿中位置最好的；但即使是徐州的煤矿，在清代，煤的成本在运达县城——亦是运河港口——时也翻了一番。^⑤ 像它们在更北部的同业一样，这些煤矿在宋代也是庞大的多元工业（特别集中于铁和盐的生产）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且也再没能看到它从 12 到 14 世纪的一系列天灾人祸中完全恢复。在 18 世纪，当政府出于明确的缓和长江三角洲燃料短缺的目的决定鼓励这一地区的煤业生产时，它也选择了把开采许可证发给穷人和失业

① 实例见黄启臣 1989:70—72 页一张 17 世纪的清单。

② 黄启臣 1989:109—40。

③ 见 Needham 1965:513—515, 522, 525—528, 531（提到了要求极为精巧工艺的直径一英寸的 17 世纪的钟，能够模仿最好的西洋进口货的钟表匠）；另见第 285 和 296 页关于早在 11 世纪出现的带有不同齿轮传动装置的里程表。

④ Skinner 1977a:217 论运输成本；亦见 T. Wright 1984:9，举了一个中国西北从煤矿到 50 千米以外的河岸之间煤的价格相差 5 倍的例子。另比较 DeVries 与 Van der Woude(1997:37)对欧洲的研究：“从历史上看，能源矿藏的开采更多地取决于运输成本而不是开采这些资源自身的成本。”

⑤ 余明侠 1991:27。

者,这些人主要是开采小型的地表的煤矿。^① 尽管即使有较好投资的煤矿看起来也不大可能会取得为改进中国的能源、运输和金属部门所必需的重大突破,但中国仅有少数几个地方所产的煤处在既是大市场又是熟练工匠集中地的比较容易到达的范围内,由这种小经营者主持其中一个这样的地点,几乎不可能有改进的机会。

最后,中国煤矿业者面临的最大的技术问题,特别是在西北,与他们在英格兰的同行面临的问题有根本的不同。英国的煤矿经常渗水,为了把水抽干就需要有一台大功率的水泵。中国煤矿中水的问题要少得多,相反,它们非常干燥,以致自燃成为经常性的威胁。正是这一问题——一个需要通风而不是大功率水泵的问题——吸引了这一时期中国最重要的技术指南的编纂者;尽管这一问题从来没有得到充分解决,但至少有一位当代的矿业史学家断言,那部著作中描述的方法对于它们的时代来说是相当尖端的。^② 即使有更好的通风技术使这一问题得到改善——或者如果人们对煤的需求迫切到足以以为这种高度的威胁付出代价——通风技术也不会像为英国煤矿排水的蒸汽机那样,能够帮助解决煤(和一般商品)的运输问题。因而,尽管“中国”作为一个抽象的总体,其总的技术、资源和经济条件,与作为一个整体的“欧洲”的同类型条件相比,对于一场煤/蒸汽革命的助益可能不会更小,但这些天赋财富的分布却使这样一种革命的机会更为渺茫。

66 相反,欧洲最大的一些煤矿位于一个有更大前途的区域:英国。这使它们得以靠近优良的水运,靠近欧洲最具商业活力的经济,靠近其他区域许许多多熟练的手工业者,以及——使煤的获得和使用问题成为新的当务之急——一个到1600年,如果不是更早的话,面临木柴巨大短缺的社会。^③ 尽管通过海运输入了木材和基于木材的产品,但这比像长江三角洲那样获得沿一条河漂流的原木要昂贵得多;使用(和更多地了解)相对容易得到的煤的动机相应的更大。事实上,从1500年起,英格兰对煤的最大需求是家庭取暖;人们用它是因为它便宜,尽管煤的烟和气味是严重的缺陷。^④ 工业,从酿造到玻璃制造到冶铁,在18世纪一系列革新解决了这一问题之前无法容忍这些烟造成的不洁。^⑤

① 余明侠 1991:19、20。

② 宋应星 1637:卷二,转引自余明侠 1991:23。水看来一直是一个较小的问题,即使在徐州煤矿,那里与西北相比是个相当潮湿的区域。同上,27页。

③ 细节见第5章和 Nef 1964:174、203—264。

④ Nef 1932:156—158; Wrigley 1988:77—78。

⑤ Nef 1964:158、183、203; Nef 1932:215—224。

关于怎样开采和利用煤的知识,大部分是由手工业工人积累的,甚至到19世纪还不是用文字记载。事实上,约翰·哈里斯(John Harris)指出,之所以18世纪关于如何采煤并把煤用于工业的文字记载在英国比在法国少得多,正是由于在英格兰需要了解这些精微要点的人——手艺人——是通过口头传授这种知识的。哈里斯说明了法国人模仿各种利用煤的过程的尝试的失败,甚至当他们复制设备时,由于,比方说,生产一只抗热坩锅需要非常详细的知识,要以秒为单位计时获得全部的经验——犯一个错误就可能造成非常之大的经济损失。物体要在火中烧多长时间,以什么样的角度,在不同的瞬间应该怎样进行观察,这些关键性的细节对那些习惯于在煤炉边工作的人来说是耳濡目染根深蒂固,但与那些习惯于柴炉的人的经验却完全不同,以至由一种习惯培养出的工匠甚至不知道需要对另一种习惯培养出来的人解释什么。^①只有当整组的英国工人被招募时(主要是1830年以后)这些必需的知识才有效地传播开来。

因而我们看到,专业技术对欧洲煤业的突破是至关重要的,但这种专门技术的发展依靠长期的经验(以及那条道路上的许许多多失败)和丰富廉价的供给。这种经验之所以可行,是由于工匠的技术、消费者的需求和煤本身都彼此接近集中在一起。没有这种地理环境的幸运,一个地区可能在一个前途有限的领域很容易地发展出许多专门技术(例如在使用和改良柴炉方面),并且不会沿着这条最终会导致开发巨大的新能源供给的道路继续发展。中国的情况——那里长江三角洲与煤矿的距离比巴黎盆地与煤矿的距离远得多——使英国的幸运甚至更为轮廓鲜明。

67

与开掘采煤巷道技术缓慢而稳定的进步或学会怎样使煤烟不致损坏啤酒、玻璃和铁相比,蒸汽机代表了一项更为重要的突破。我们已经看到在这一方面,英国遇到它所遇到的那种开采问题——必须用水泵抽水而不是防止爆炸——是幸运的,因为这导致了有很多别的重要用途的发动机的产生。但蒸汽机并没有发明它自己,在这里,位置也与技术进步有重要关系。

使蒸汽机产生效用的因素再度是来自众多工匠的不断的改进——包括一些相当出人意料的行业中的工匠。如莫基尔指出的,欧洲在18世纪——以及英国在欧洲——真正的技术优势不是工具或机器,而是仪器——钟、表、望远镜、眼镜等等。尽管这些小玩意可以作为某种生产资料应用——主要是

^① Harris 1992:18 33.特别是21—22,27,30—31。

在越洋航海方面^①——但它们的基本用途是作为有钱人的玩物,特别是城市中的有钱人。^②然而,正是这种来自仪器制造(以及某种程度上来自枪炮制造)的精密的钻孔和校准技术的转移,使纽科门最初的蒸汽机工作得相当好,以后又使瓦特得以继续改良,使蒸汽机的效率提高了三倍。^③经过两百多年使蒸汽机比那两种原始型号更安全、燃料更有效率、^④机身也更轻便的不断的改进后,生活在今天的我们常常会假定,甚至最粗糙的蒸汽机的能力也是如此明显,会使人们迅速采用它;但这仅仅在回顾时是正确的。即使有制造武器和仪器所用的精密工具外传带来的优势,这些机器的成本、体积和其他问题也意味着在88年的时间中(1712—1800)只有2500台按纽科门最初的设计建造的蒸汽机;^⑤其他工业部门和发明家大都把他们的赌注下在改良水车上。实际上,冯·滕泽尔曼(Von Tunzelmann)认为,蒸汽带动的纺织机每单位功率能源的成本直到1830年以后还没有大幅度下降,所以,直到那时水力(在可以利用的地方)仍然具有竞争力。^⑥

68 只有在采煤业中(1800年有1000台蒸汽机在该业中使用)蒸汽机的优势才明显到在短短几十年间得到迅速推广,并形成完整的行业。^⑦在一座煤矿中,蒸汽机的笨重不是问题,它庞大的燃料消耗成本——随着与煤矿的距离拉长而迅速增加——也不成问题。事实上,矿井水平巷道蒸汽机通常使用的劣等“小煤”的价格如此低廉,以至大概不会有人花钱把它们运到别的地方去卖,这使蒸汽机的燃料基本上是免费的。^⑧如果除去由其他相关行业的工匠转让技术所赋予的一些附加优势,除去能够通过附近煤矿的应用得到的知识,再除去煤自身的低成本,那么——在我们今天看来同样不可思议——蒸汽机很可能看上去并不值得推广。

弥补工匠、企业家和科学知识源泉之间的社会距离是雅各布的“科学文化”的一个胜利——其中欧洲可能有重要的优势(尽管我们需要更多的研究

① 这再一次是英国在欧洲的专长和欧洲在世界的专长。尽管海上运输在亚洲极为发达——在某些方面甚至领先于欧洲——但它更多的是靠近海岸航行,而在公海上花的时间很少,公海航行导航方面相当小的初级错误就可能损失惨重。这里穿越大西洋——一段在亚洲远途航海中没有相似航线的航程——的运货人的技术需求无疑起了重要作用,就像陆军和海军需要仪器帮助加农炮的瞄准一样。

② E. Thompson 1967:66—70。

③ Mokyr 1990:85,103—104。

④ 从瓦特的机型到1870年代应用的机型之间,效率再度提高了3倍——见 Mokyr 1990:90。

⑤ Mokyr 1990:88。

⑥ Von Tunzelmann 1978:224,289。

⑦ Mokyr 1990:88,90。

⑧ Von Tunzelmann 1978:62,63。

才能确定)。但是,即便如此,如果欧洲的煤和熟练的机械制造者集中地之间存在一个巨大的地理距离,如果中国只有一小段距离需要跨越,这两种假设中的任何一种都可能产生差异巨大的结果;当然中国早期煤/铁多元体的历史作了同样多的暗示。

欧洲技术革新的浪潮当然是(事实上是同义反复)工业革命的一个必要条件,但在我们把那种创造力抬高到一个远远高于18世纪其他社会的地位之前,在把它具体化为欧洲随后的领先地位的原因之前,我们应该记住,地理位置和并列的偶然性在使英国的煤和蒸汽机成为工业化的先锋时具有怎样的重要性。回顾一下,当欧洲支持了正确的马时,赢得那笔特别赌注的因素看起来就与偶然的,具体的说是英国的情况(主要是地理条件)产生了决定性的联系。看来欧洲的科学、技术和理念趋势不是惟一合适的解释,所谓的经济制度和要素价格方面的差异似乎更是毫不相干。最后,如我们在以后几章将看到的,如果其他某些资源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甚至这一能源突破也可能被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欧洲膨胀的人口吞噬,而那些问题的解决大部分要归功于欧洲对世界其他地方的征服。如果不是既有煤又有殖民地,单独哪一项都不会有同样大的重要性;如果没有它们促成的资源制约的松弛,欧洲其他的革新不会独力创造一个使其有限的土地不会阻碍无限的人均持续增长的新环境。

69 二、欧洲和亚洲的市场经济

如果西欧在 1750 年并不是惟一繁荣的地区,它的制度是否可能更适宜于在那一时刻前后开始的迅猛发展? 如果我们对制度下的“定义”足够广泛,这个观点至少对西北欧肯定是正确的。然而这一观点最常见的版本——西欧发展最快是因为它有最有效的商品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却完全不能令人信服。^① 当然,有一些学者赞成的是完全不同的制度优势,包括截然相反的情况:即,正是由于欧洲在一些方面偏离了自由市场,才使资本得以积累和集中,并保护了生态上至关重要的“闲置”资源,等等。在以后几章中我们将分析这些观点,至于现在,让我们注意较为正统的观点,这些观点认为市场有利于增长,而欧洲据说有最完善的市场。

可以肯定,即使这些以市场为导向的历史论述实际上也有较细微的差别。几乎没有经济史学家会认为西欧的真实情况与初级经济学教科书中的抽象描述紧密相似,很多人会同意,在某些特殊情况下,精心策划的(尽管通常是暂时的)对完全竞争的背离——如 19 世纪美国和德国的保护贸易——能够对具体的经济发展有相当大的帮助。^② 但是这种不健全在其他方面造成了伤害——举例来说,英国本来会卖给美国更多的商品,或者对于那些未受资助的工业部门来说,它们潜在的消费者要为了补贴某个特殊部门而纳税——所以在新古典主义基础上很难证明,背离完全市场对一个包括所有实际的和潜在的贸易伙伴在内的经济体系会有纯粹的长远的利益。因此,在学者们把欧洲视为一个整体的限度内(特别是当他们还把它与其他大洲的联系最小化时),要同意重商主义和其他对市场的干预存在巨大优势对他们来说是困难的。

^① 见 North and Thomas 1973,特别是 157—158 页;North 1991:35。

^② 见 Senghaas 1985:28—30、65。

出于同样原因,最近一些对欧洲活力的解释强调成千上万普通人进行的小规模的生产力改良和资本积累,这种解释可能更为强调相对完善的市场,而不是任何有意为之的变形,因为前者使所有这些生产者互相竞争,后者只能通过牺牲一些生产者的利益使另一些生产者获利。结果是,许多关于欧洲发展的论述都强调一系列因素的衰落,包括国家干预和任意征税,贵族和教会的垄断,依附劳动和土地利用及职业变更方面的习俗制约等等,它们还假定这些趋势在欧洲比在其他地方更早开始发展。然而,本章证明了一种完全不同的观点:18世纪的中国(或许还有日本)比西欧实际上更接近于一种类似于新古典主义理论的市场经济。

70

到此时为止,这两个地区最主要的经济部门都是农业。因此,我们从土地市场和农产品市场开始。之后将是对使用个人劳动力的限制(以强制性就业和劳役、对移居设置障碍、禁止某些活动等形式)的比较,然后是对务工和/或经商的自由的讨论,最后是对家庭作为一种对劳动力市场运营有强大影响的机构的比较。资本市场将在第4章讨论。

中国和西欧的土地市场以及对土地利用的限制

自然,中国和西欧在空间和时间的跨度上都有很多变化,但在16世纪到18世纪之间两者都有越来越多的地区朝着马克·布洛克(Marc Bloch)所谓的“农田个体性”发展。总的说来,中国比欧洲大部分地区,包括西欧大部分地区,更接近于市场驱动农业。

这里重要的是考虑怎样对一种虚构的经济理想的不同偏离进行比较。例如,黄宗智(Philip Huang)非常重视习俗对长江三角洲的土地、劳动力和产品市场的限制:那些想要出售、典当或出租其土地的人通常必须首先向亲戚和/或同村人提出。因而这些市场远非完全竞争性的;^①黄接着提醒我们,仅有活跃的市场不一定导致“质变性的发展”。^②但是既然完善的市场在任何地方都不是质变性的发展的历史前提条件,这一点本身并没有解释那里的经济为什么没能与西欧经济增长得一样快;要作出这种解释,既需要证据,又需要还没有人提出过的判断尺度。

对一个人可以把土地出售或出租给什么人的限制通常可能会使土地所

① 黄宗智 1990:108。

② 同上,114。

71 有者的钱受损失，并可能阻碍土地落入最有效率的使用者之手；限制越大，效率的损失也越大。我们永远不可能知道这类损失的大小，但我们可以为它们确定一个范围。例如，在基本技术知识普遍共享，能够刺激佃农使产出最大化的租佃形态（无论是分成地租还是定额地租）占压倒地位的条件下，即使是最有才干的农民在一定的土地上的收获与一个受习俗偏袒的技术较差的农民能够生产出的东西之间的差异也不可能很大。而且并不是每一笔受习俗制约的交易都会使土地落入一个技术较差的农民手中的。

理论上说，所需要的原始资料不仅要描绘出不完善的市场，而且要举出真实的具体结果，例如具体的地块之间的巨大差价不是反映土地的生产能力的差异，而是符合买主和卖主之间的社会关系。尽管欧洲相当先进的地区的确存在这类实例，例如17世纪晚期意大利的北部，^①但至今为止没有见到一个中国的实例；将来也不大可能找到足够的中国或西欧的文献，使我们能够系统地比较有多少习俗惯例导致土地市场背离了新古典主义的预期。

相反，我们能够找到证据证明，市场的不完善在一个地方产生了某种巨大的负面影响，而在其他地方没有发生同类情形。这种情况最可能的是，欧洲大部分地区限制土地利用的方法妨碍了已知的技术创新的应用——这些创新能够造成的生产力的差异，比一块土地从潜在的出价最高者偶然地转移给一个出价较低的亲戚可能造成的任何差异都要大得多。

中国各地绝大多数的土地或多或少都可以自由转让。明初（1368—1430年左右）政府曾没收了长江流域大量土地，但这些土地常常会回到私人占有状态；在1500年代中期，政府放弃了这些土地并承认所有的纳税土地在其他方面不受约束。^②一些土地，主要是在北方，在理论上仍然属于政府，并出租给世代沿袭的军人或大运河船夫集团；清代皇室自身拥有约70万英亩的地产。但即使在纸面上，这类土地的总数也从来没有达到过350万英亩以上，即全国可耕地的3%。^③此外，由于应该世袭的佃户出售或抵押土地，并在后来政府试图让他们为土地正式脱离官田地位而付款时愤怒的抗议（并得到了成功），这类土地中有许多最终无论如何都是被作为私有财产对待的。^④

有稍多的土地由于处于私有“善产”地位而不能转让，这些土地供寡妇、孤儿生活以及祭祖仪式的花费，或者提供维修寺庙与学校的费用。这些地产在一些区域相当重要——它们在广东省可耕地中所占比重可能高达

① 见 Levi 1988:79—99，一个皮德蒙特人村庄中土地市场的讨论。

② 黄仁宇(R. Huang) 1974:99。

③ 黄宗智 1985:87。

④ Pomeranz 1993:240。

35%——但在中国大部分地区它们是微不足道的。^① 20 世纪的一个调查估计，全中国农地中 93% 是继承者有绝对处理权的地产。^② 此外，即使在不可转让的地产普遍存在的地方，也不清楚它们的用途与其他土地有任何差别。

不管其所有者是什么人，大量土地是由佃农或者甚至转租人耕种的，这种情况下可能出现进一步的限制。即使在文献资料较完整的 20 世纪，要准确说出共有多少土地被出租也是困难的。在华北，出租土地可能不超过全部土地的 15%—20%，^③ 在高度商业化和比较富裕的长江流域，可能有近一半的耕地被出租。^④ 在华东南一些地方，大部分土地被出租。^⑤

习惯法通常规定土地应首先出租给亲戚或同村人。在宗族关系特别强大的华东南，亲戚通常可能确实限制了土地潜在的买主和租户——尽管由于许多亲族相当大，甚至“亲族优先”的惯例也允许许多人对任何具体地块展开竞争。^⑥ 另外，20 世纪一些接受调查者报告说，亲戚和非亲戚可以以同样的条件租种宗族的土地。^⑦ 在中国其他地区，我们对偏袒亲戚的习俗限制的了解部分来自档案材料，这些材料表明，提出过这类报价，但最终土地卖给了一个外人；^⑧ 中国很多村庄中以某种方式落到外人手中的土地的数量表明，这些惯例很少成为不能克服的障碍。最后，至少从 18 世纪起，我们发现了大量的案例，在这些案例中，由于一些新的不可逆转的事态发展，幼年亲属把家族土地出租给外人，就好像土地是不受限制的；这种做法不合规定，但看来一旦成为既成事实通常会得到承认。^⑨

一系列更为复杂的问题涉及到佃农的权力范围和他們与土地投资的关系。在田主自己不耕种的地方，通常由佃农对耕作作重要决策的租佃制远比由田主（或其代理人）作决策并使用雇佣劳动的“经营农场”更普遍。^⑩ 因而，大量争论集中于佃农拥有的保障是否足以鼓励他们改良土地，从而获得经营地主能够获得的生产力。

关于如何保障佃农的资料是混杂的。大部分现存的租佃契约表明佃农 73

① 陈翰笙 1936:34-35。

② Buck 1937:192。

③ 景胜和罗仑 1986:34-35；黄宗智 1985:103。

④ 黄宗智 1990:103—45%。

⑤ Marks(1984:44)指出大部分土地有永久产权，尽管一些区域存在佃农集中化；陈翰笙(1936:19)指出在一些相当特殊的村庄中 68% 的耕地被出租。

⑥ Naquin and Rawski 1987:100-101。

⑦ Warson 1990:247。

⑧ 例如黄宗智 1990:107。

⑨ Osborne 1994:11-13,15,19。

⑩ 黄宗智 1985:79-81；黄宗智 1990:58-75。

的耕作权相当有保障,^①但记载地主—佃农争端的档案资料却显示出这些规定可能很难执行。^② 18世纪迅速的商业化加速了主佃关系向单纯契约关系的过渡,尽管不是没有受到那些继续把土地看作神圣不可侵犯的祖业而不是一种纯粹的商品的人的严重抵抗。^③

但是,即使我们对这些关系持最悲观的看法——即租佃权无保障和高额地租使佃农在进行提高生产力的投资时处于弱势地位——我们还需要记住两个要点。第一,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不能采取改良措施是日益强大的市场的结果,而不是“惯例”造成。第二,我们正在涉及的最多只是耕种者在投资于土地改良时面对的附加风险——无论如何很多人显然选择了继续进行改良。(毕竟长期租佃极为普遍,即使没有获得保证。)我们到处都看不到习俗权力使有其他意愿的农民不能进行改良——这种情形,如我们即将看到的,在西欧更为普遍。即使是在相当贫困的华北,那里的经营农场比其他地方更普遍,租佃制则反之——或许意味着那里的佃农比其他地方更缺乏使生产力最大化的能力——经营农场看来也不比佃农或小农的土地有明显更高的生产力。^④

西欧农田中有许多远比中国的农田买卖困难。甚至在19世纪,英格兰全部土地中仍有约50%由聚居的家族占有,这使土地几乎不可能被出售。^⑤ 在18世纪的西班牙,“限定继承权只允许如此少的土地进入市场,以致其购买价格高至无法鼓励投资……改良资本家和农民经营者同样缺乏土地”。^⑥ 法国限定继承权的地产较少,但并不缺乏这类惯例。^⑦ 尽管17和18世纪西欧一些地方确实存在真正自由的土地市场——荷兰、伦巴第和瑞典^⑧——但仅英格兰和西班牙限定继承权的地产在西欧土地中所占的比例就比中国不能进入市场的土地比例大很多。

74 一个活跃的租佃市场能够对土地出售的限制作出很多补偿,即使再无能的土地所有者也可以让他的祖产由能够最好地使用它(从而在支付最高地租的同时仍然使自己获利)的人来经营。但在欧洲的某些地区,土地所有者还

① Myers 1982:290—291; Rawski 1985:6, 注释中有一个有用的文献综述; Bernhardt 1992:24—26。

② Zelin 1986:510—514。

③ Buoye 1993:54—57。

④ 黄宗智 1985:139—145。

⑤ F. Tompson 1963:68。

⑥ Carr 1967:51。

⑦ Forster 1960:120, 162—163。

⑧ 荷兰见 DeVries 1974:33, 38, 44—78, 54; 伦巴第见 J. M. Roberts 1967:68—69; 瑞典见 M. Roberts 1967:142, 146。

要负责进行资产改良,在这种情况下,甚至一个强大的租佃市场也不能充分补偿对土地所有权转移的限制。西欧还有一些地方土地利用像土地转移一样受到限制——有时甚至更甚。

在英格兰,地主在14和15世纪时设法终止了大部分由世袭权力保证的租佃关系。^①在尼德兰北部这类权力从来没有真正确立过,无论如何16世纪及那以后耕作的土地中有很多是新开垦的。^②到1600年代中期,这两个区域有着欧洲生产力水平最高的农业和最高的人均收入,^③它们在对欧洲科技突破的解释中也显得相当重要。但在它们之中,荷兰和英格兰的人口甚至在1750年尚不足法国的一半,而在法国,世袭租佃关系在16、17和18世纪一直占统治地位,并获得了更多的法律保护。^④既然在这几个世纪中欧洲农业能得到的最重要的新投资需要整个社区的合作(与中国不同)和/或只有一个地主(或他的代理人)能够决定的投资规模,稳定的佃农对于改良更可能是一种障碍而不是助益。

世袭租佃关系使小块土地的合并极为困难,如果没有这种合并,圈地的耗费就太大而用处又太小。而圈地对19世纪晚期以前欧洲农民能实行的惟一最重要的技术变革来说是必需的,即:在任意年份休耕(既可保护土地肥力,又为牲畜提供牧地)的1/3到一半的耕地上种植饲料作物。16世纪,北意大利、荷兰和英国的许多农民发现,如果可以把土地圈起来不让村中的畜群进入,在上面种植某种饲料作物,完全可以像休耕一样保护土壤的肥力,同时还能够饲养更多的牲畜。扩大的畜群产生的粪便又使一个农场的全部农田能够获得更高的产量。^⑤一项最近的研究证明,至少在英格兰,通过扩大畜群增加的粪肥并没有施加到农田中,所以在最好的耕地上每英亩产量没有任何进一步的生长。但由于牧地的生产力提高(包括一些以前相当贫瘠的土地)使最好土地中有更多的部分可以留下来种植谷物,这一过程仍然提高了农场的总产出。^⑥

但这种“新耕作法”一般要求两种“圈地”形式中的一种,而两者通常都违背习俗。一种是把村社以前用作集体的燃料和饲料来源的公共土地划分为私人拥有的田块。另一种是把已经由私人拥有,但此前一直(如同实际上所

① Bloch 1966:127—128; Brenner 1985a:47—48。

② DeVries 1974:27—28,31—32。

③ DeVries 1974:152,243; DeVries 1976:36。

④ Bloch 1966:128—192。

⑤ 见 DeVries 1976:39—40 所载比率。

⑥ Ambrosoli 1997:393—394。

有的土地一样)有义务每两年或三年休耕一年,以便让村中的畜群能够在上面放牧的土地合并并且加以围护。这第二种圈地讨论得较少,但它涉及到的土地更多,所以对我们的论证更重要。需要围住的地块不一定很大,^①但给太小的地块建围栏不合算,方形的地块比法国许多地方普遍存在的细长条的地块更经济有效。

在18世纪的法国,这两种圈地都发展得相当缓慢。批准公共土地分割的立法高潮出现在1750年以后,特别是1769年以后;立法允许土地所有者圈护他们已经拥有的土地最高峰的年份是1767—1777年。^②而即使这些权力在理论上得到承认,用壕沟防护的世袭使用的土地也常常使它不能实际应用。在英格兰,圈地的每个实际行动都涉及到为使土地达到值得圈护的规模而对分散的租佃关系强制性重新组合;在法国,这种性质的强迫是“不可能的”。^③甚至在地方法庭允许剥夺或调换一户具体的佃农的地方,法国的村社直到19世纪还继续对剥夺这类佃农的地主和任何打算耕种这块土地的新佃农实行“严厉制裁”。^④因此,在这个西欧最大的国家中对土地利用的限制强烈到足以极大地延缓这种新耕作法的推广:在1800年前后已知的技术条件下,这种新耕作法可以使每英亩产量比法国、德国北部和意大利的大部分地区使用的技术通常获得的产量大约高60%。^⑤在西班牙,王国法令甚至更为成功地制止了圈地;使地租和小麦价格固定下来的尝试进一步妨碍了向一种更有生产力的农业投资的任何行动。^⑥在德国大部分地区,三圃制至少一直流行到拿破仑时代,主要是由于共有权和各种各样的习惯法及保护权一直未经触动;在任何已知年份,1800万公顷农田中都有约400万公顷休耕。当我们看到在这些制度消亡后发生的事时,我们对它们起了多大作用就有了一种认识。到1850年,休耕实际上消失了,大量公有的和以前不能耕种的土地成为可耕地,2500万公顷土地年年耕种,每公顷的产量也上升了。(然而在西南部一些共有权延续时间较长的地区,产量的提高同样推迟了。)^⑦

总的说来,根据一个标准的统计,1800年西欧实行这一新耕作法的区域并不比1600年多多少——这一技术上的“农业革命”主要是一种19世纪的现

① Parker and Croot 1985:80—81.

② Bloch 1966:221—222.

③ 同上,233.

④ 同上,179—180.

⑤ DeVries 1974:152; DeVries 1976:64—67. 意大利北部普遍的强制性休耕见 Zangheri 1969:33—37.

⑥ J. Elliott 1961:62—64;另见 J. Klein 1920.

⑦ Nipperdey 1996:123,131,134.

象。^① 习惯或法律以如此之大的规模迟滞了最为公众所知的农业经验的推广,在中国连稍微类似的实例都没有。^②

一些最新研究对圈地是否确实引起了生产力的巨大增长提出了疑问。^③ 例如,格雷格里·克拉克(Gregory Clark)认为,由于圈地而增加的地租在英格兰低于40%(法国可能也同样),而不是许多资料所声称的100%。^④ 经常被引证的产量的更大增长,应该归之于在土地被圈之后通常投到土地上的劳动和资本的增加,而不是圈地本身和劳动与资本从其他生产用途转移的事实。因此,这些学者认为,总要素生产力——产出与用于生产这些产出的所有土地、劳动和资本的价值之比,以及由此而来的对总效率的衡量——的增长并不那么令人印象深刻。一旦从40%的地租增长中减去圈地的资本成本,总要素生产力的增长还要更小。^⑤

这类观点认为,甚至最广泛引用的中世纪和现代早期欧洲“市场失败”^⑥的例子也并没有真正重要的作用。然而就我们的目的而言,这个问题仍然存在。用总要素生产力作为圈地造成的增长的一个衡量尺度,是假定在一种环境中,圈起来的农场中使用的劳动和资本增加的数量——如果这些圈地不存在的话——会在别的地方以大致相同的价格得到利用。^⑦ 对于修筑围栏和圈地以后的改良所用的追加资本来说,这一假定看来是有疑问的,对劳动甚至更是如此。换句话说,把总要素生产力作为我们的尺度,就是假定土地——

77

① Shcher Van Bath 1977:71;Thompson 1968:63—73。

② 这里我们不必为“农田个体性”为什么在法国比在英格兰成功的晚得多,以及各种农业改革模式与“资本主义”阶级结构、政体和精神之间的关系等问题的激烈论争而止步;重点是时间的滞后本身及这种变革的相对缓慢和新技术引进的相对缓慢之间的实质性关系(Bloch 1966:197—98)。如果人们能够对18世纪英国的农业比法国优越提出怀疑,就会出现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即,这种新技术的自由应用造成了多大的差异。出现了一些这类怀疑,首先是Patrick O'Brien(1977:174)和F. M. L. Thompson(1968:71)。然而,他们的观点停留在暗示甚至英国采用这种新技术也并不像我们曾经以为的那样快,而不是否认它们的优越;对英国人口数字的校正研究往往把我们对英国农业发展的估计再度向后推(引自Cooper 1985:141—142)。尽管O'Brien告诫我们要注意农业差距是否大到足以解释英国的早期工业突破是正确的,这并不损害下面的要点,即法国在两个多世纪中“固着”在一种明显的人口最高限,以一种低于英国、低地国家、西德或者意大利北部的人口密度(Cooper 1985:138—139)而经历了周期性的生存危机(Ladurie 1974、1976),同时习俗阻碍了向更有生产力的农业体制的转换。

③ Allen 1982;McCloskey 1975a,1975b,1989;Clark 1998。

④ Clark 1998:77,87—94。

⑤ 同上,94—97;另见McCloskey 1989:159。

⑥ 然而,对McCloskey与其他人来说,市场根本没有失败;当利息率太高,以致大多数人不能用保留他们本该出售的剩余谷物并储存起来的方法确保抵御饥荒的情况下,敞地制作为一种减少风险的方法是合理的(通过保持一些小块土地的“搭配组合”);一旦情况发生变化,敞地制的低效率不再由这种保险职能来抵消,它们也就被抛弃了。

⑦ McCloskey (1975b:155—156)把这作为一个可能的问题提出,但却断言对其他生产要素的支付并不等于它们的真实机会成本。

该要素的产出由于圈地而增长——并不比劳动和资本明显更为稀缺,后两个要素是在利用圈地和新耕作法提高土地的产量时要消耗的。然而,正如我们在下面——以及在第5章更详细的叙述中——将看到的,更可能的情形是,土地稀缺在欧洲各地日益严重,以至于正是使每英亩产出增长的措施能够让总产量不断增长,即使要使用相当大量的劳动和资本。如果没有这类措施,土地稀缺可能造成更多人(或许还有钱)失业或破坏性的就业,而不是用在其他生产性工作上。

现代早期欧洲的许多财富往往用在诸如购买新的头衔(从而间接地用于战争,这是大多数政府的主要活动)之类非生产性用途上,而不是用于扩大生产。实际上,人们通常认为,把可利用的财富中比较大的部分用于增加生产和贸易,而不是追求各种各样的宗教、艺术或身份地位的其他象征,这样一种转变逐渐使某些欧洲经济成为“资本主义的”,同时其他经济仍是“前资本主义的”。^① 这种改变中有一些可能确实反映了一种正在萌芽的“资本主义精神”。然而,另一部分却是生产性投资的新出路的萌芽,包括几乎不需要投资者(他们通常仍然对其他追求地位的活动有更大兴趣)直接从事经营活动的出路。^② 圈地正是这些缓慢冒头的投资出路之一;在这个过渡时期,大笔金钱继续投入到其他的、在经济意义上较少生产性的方面。没有理由认为如果圈地存在法律上的困难,用于筑栏和改良土地的资本必然会投入生产性活动。因而一种作如此假设的度量方式会低估圈地对总产出的贡献,所以,总要素生产力低估了与圈地相关的制度的价值。

78 同样的观点甚至更强烈地用于劳动力的需求。由圈地带来的变化——牧地变成农田、排干沼泽、减少休耕——都要吸收劳动;但工资市价是否准确反映了那些劳动的机会成本?工资市价不大可能降到生存水平以下,因为如果它不能让你活下去,就没有理由去工作,但在那种工资水平上不会总有工作给每个人的。现代早期欧洲许多地方——包括人口增长特别迅速的英格兰和爱尔兰^③——经受了前所未有的农村就业不足与失业的困扰。^④ 如刘易

① 这种观点最有权威性的著述是 Max Weber 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随后是大量的其他解释,一些较集中于变革的理念,其他的则集中于物质力量,但对这一现象的重要性存在广泛的共识。对后一种观点有两种最重要的论述是下文讨论的 Fernand Braudel 和 Jan DeVries 的著作。

② 实例见 DeVries 1976:219—226、232—235。

③ 见 Wrigley 1990:107—111。

④ 见 Phelps Brown and Hopkins(1956:289—299,特别是第296页),指出农业没有能力吸收充分增长的劳动力,导致人口拥入兼职工作和报酬低微的副业。还要注意的,在18世纪许多年份,欧洲15—40岁的男性中有近5%在军队中服役(DeVries 1976:204)却没有造成值得注意的劳动力短缺。

斯(Arthur Lewis)在他的论“剩余劳动”经济的杰作中提出的,^①在这类经济中就业的人的工资不可能一路下降到这些工人的机会成本(非常低的)水平——即,如果他们目前的工作不存在的话,他们本来可能做的事情的经济价值。因此,在衡量圈地收益的净增加时,为圈起来的土地上使用的追加劳动支付的工资也夸大了必须从它们的产出中减去的部分;因而,用总要素生产力作标准也低估了很多西欧经济阻碍圈地造成的损害。

不清楚的是现代早期的欧洲在什么时候进入一个位于刘易斯的纯“剩余劳动”设定和一个劳动充分就业并获得其边际产品的设定之间的连续区间。在16世纪到18世纪很多时间中失业和就业不足肯定都是经常困扰欧洲的问题。对尼德兰劳动市场的一个详细的研究强烈暗示,尽管17世纪失业严重,世界范围内工资水平不断下降,尼德兰城市和乡村的工资却几乎没有降低。^②另一方面,莫基尔认为,这些失业劳动至少有一部分可以用其他因素来解释,而不是愿意工作的人实际超过了值得做的工作:例如,对休闲的偏好比现代社会中更强烈、工作的季节性与运输和信息的高成本的结合等。^③发现单纯剩余劳动——在总产量不受损失的情况下能够解雇的人——的努力,即使在20世纪一些非常贫困拥挤的地方也没有成功过。^④在现代早期的欧洲看来可能的是,圈地所吸收的追加劳动的机会成本大于零,但完全低于已知的工资市价。如果对休闲确实比今天有更高的评价,那也是在暗示,一种仅有边际利益的劳动利用方式(因为要引诱对休闲有很高评价的劳动者要花很多钱)仍然能使产出大幅度增长。所以,对圈地造成的增长的真实计量,可能处于由总要素生产力的计算显示的增长和忽视土地之外其他投入的成本显示的增长之间的某个位置上;这也意味着土地所有权的不明确造成的市场失败远远超过了人们在中国能发现的任何情况。⁷⁹

由于欧洲的土地法律,其他改良的结果也是可以预料的。在18世纪的法国,排干沼泽和灌溉现有的农田都受到极大的阻碍,因为习俗规定和法律手续使得用钱疏通那些受到这类改良威胁的人成为几乎不可能的事——即使在这样做极为有利可图的地方。大革命以后才废除了特权并简化了相关手续。^⑤相反,在18世纪的中国、日本,或许还有16到18世纪的印度——垦荒和灌溉快速发展的地方——习俗惯例对于补偿那些提供灌溉的人并对水

① Lewis 1954:139—191.

② DeVries 1994a:61.

③ Mokyr 1985a:107—108.

④ Schultz 1964:61—70.

⑤ Rosenthal 1992:xii,43,48—50,60,70,93,120,165.

权争端进行裁决似乎更为有效。^①

可以肯定,法国农民找到了其他增加产出的方法。至少在法国北部,18世纪晚期很多有机会在城市市场上做买卖的农民(以及早期的一些农民)通过作物混种和耕作技术方面渐进的变革作出了反应,这些变革明显提高了总产量。此外,在没有发生技术变革的条件下,由进一步的专业化带来的增长潜力决没有⁸⁰在工业革命的前夜耗尽。^②但出于同样理由,这些增长潜力没有耗尽是由于有如此之多的斯密型增长的可能性还没有得到开发。如果说法国食物供给的画面并不完全像某些编年史学家认为的那样暗淡,它也肯定足够令人沮丧——并且足以引起有势力的商人、政治家和其他城市人的关注^③——以至有实际意义的奖赏甚至期待着远方的能够增加其产出的农民。然而进步仍然缓慢,法国大革命前的社会政治体制——在这种体制中,商人和官员情愿到遥远的地方搜寻粮食——的残余继续表现为城市中的食品短缺。^④正如詹姆斯·戈德史密斯(James Goldsmith)——一个对稳定的农村观念持强硬态度的批评家——指出的:“无可怀疑,土地零细和领主法律陈旧的规定延缓了农村的重组,但它们并非不可克服的障碍……有证据显示资源尚未充分使用,不存在一个马尔萨斯陷阱。”^⑤总之,各种增强生产力的革新——围地、沼泽排水等等——相对缓慢的推广始终表现为一种需要由制度解释(例如罗森塔尔 Rosenthal 的解释)的“市场失败”。对于18世纪的中国,我们很少需要援引这一类的观点。

劳动体系

如果说西欧的土地所有权并没有与众不同的效率,它的劳动市场又如何呢?让我们首先回顾一下“自由劳动”问题是怎样与经济效率和发展问题联系起来的。从经济制度的角度看——与不自由的个人相对——问题在于控制了不自由劳动者的那些人要他们所做的工作,是否比他们在自由的条件下

^① Chen and Myers 1976; Marks 1997:105—110; Perdue 1987:165—174,181—196(指出问题在于水利设施建设过度而不是像 Rosenthal 指出的法国那样的建设不足); Kelly 1982:89—103,118—195(特别是 192—195)、204—219; Ludden 1985:87—89; Stein 1982a:109—116; Fukuzawa 1982a:200。

^② 见 Grantham 1989c:43—72。

^③ Tilly 1975:392—393,397—400,409—414。

^④ Kaplan 1976:252—299; Tilly 1975:424—428; Meuvret 1977:卷4—6各处。

^⑤ Goldsmith 1984:186,187。

会从事的工作生产力更低。他们特别可能迫使这类人坚持做相对非生产性的工作,这些工作似乎只有对一个领主才值得做,因为对后者来说,一个依附劳动者增加的劳动时间没有要用现金支付的边际成本,同时完全可能有一个人为压低的机会成本。^① 如果依附劳动者一旦得到解放会实际转向某种更有生产力的工作,则这种强迫劳动制度就确实压低了总生产力;这是一种设定,在这种设定中,举例来说,从“改良”地主的地产上被驱逐出来的以前的依附佃农成为新工业部门的劳动大军。(“改良”地主可能实际上生产的更少,但净利更多,因为他不再供养这样一大群限制在相对非生产性活动上的依附劳动者;当这些劳动者受雇从事另外某种职业,他们生产的价值高于他们维生的成本时,经济作为一个整体也随之获益。)

但由于新的工业部门很少能突然发展,这样一种情景通常是长期性的。在这期间,很多这类劳动者可能失业,总产出可能会由于原有的对产出有一定贡献的工作停止而下降,即使这种贡献并不足以证实支付一笔最低生活工资是值得的(例如,在一块没有多少杂草的土地上继续除草)。因此,在短期到中期阶段中,不自由的劳动可能提高也可能降低总产量。

这些问题出现在各种各样的依附劳动关系中:奴隶、农奴及其他等等。一些学者用同样的方式分析了农家妇女和儿童的劳动。他们认为,在文化和/或制度阻止这类人从事户外工作,但他们确实在家中生产可供出售的产品(除通过做饭、照料孩子等工作再生产劳动力以外)的地方,农民家庭的职能就像一个拥有几个依附劳动者的非常小的庄园一样。由于家庭成员无论如何都要吃饭,他们挣到的任何数量的收入对全家都是一个纯增长,即使这种劳动挣到的隐含的计时“工资”低于维生水平。一个广泛存在这类劳动的“内卷的”社会完全可以呈现出很多与一个典型的奴隶或农奴社会同样的经济(如果不是社会或情感)特征:劳动极度密集的技术的使用、非常小的外购生活消费品市场、对节约劳动的技术革新极端缺乏兴趣。^② 我们将首先考虑把人们束缚于非亲属关系的制度,之后再回到家庭劳动上来。

81

学者们对于奴隶劳动在中国何时失去经济意义没有一致意见。政府长

^① 这样一个劳动者在任何具体活动中花费的追加时间对领主来说仍然存在一种机会成本——劳动者在那个时间中能够被迫完成的某种其他任务的价值。但在很少有其他任务的地方——举例来说,在一个由于缺乏资本,由于所有者的偏好,或由于其他原因而没有工业生产,或它所需要的所有劳动力都已派定工作的农业庄园中——机会成本也可能非常低。无论如何,对于那些让劳动者做某种工作,否则就让他们休闲的领主来说,其有效的机会成本都是零,而对于一个必须让自由劳动摆脱休闲的雇主来说情况并非如此。我们将在第5章对此作更详细的讨论,特别是在东欧的背景中。

^② Lewes 1954; Chayanov 1966:53—117; 黄宗智 1990; Geertz 1963。

期以来一直在力求完全保有对臣民的权力,可以对其征税并直接征兵而不必通过地方豪强势力——但政府并不总能为所欲为。日本学者作了最大的努力以证明世袭奴隶农业劳动的延续,特别是在长江流域的庄园中。

然而,这种庄园到15世纪晚期——如果不是更早的话——逐渐让位于雇佣工资劳动的庄园。而到1600年代初,长江流域不是使用工资劳动就是使用奴隶劳动的“经营”农场,正在变成或由完全拥有土地所有权的农民或由契约平民佃农耕种的小块土地。在明清过渡期开始时(约1620年)还受到束缚的劳动者,大部分在以后50年的战争、混乱和随之而来的劳动力短缺中获得自由。甚至那些最为强调长江流域依附劳动的人也一般性地同意到16世纪它已不再重要。^①(大部分残存的不从事农业的“贱”民——乐户、优伶和某些隶卒——到1730年代成为正式的平民。)

在其他地方,依附劳动普遍在更早的时候失去重要性。例如在华北,很多农业工人在明代(1368—1644)地位低于其他平民,但他们并不束缚于土地。到18世纪后期,甚至在既不由田主也不由佃农劳动耕种的,在总面积中占比重非常小(不到10%)的土地上,这类劳动者也相当少见。^②华北佃农和农业工人面对的最后的法律障碍在1780年代消失——约与西欧同时——但那之前很长时期它们就只对极少数的人起作用。^③尽管有一些特殊地区——安徽省徽州地区特别显著——在进入19世纪甚至20世纪后,大地产仍以依附劳动为特色,但在1780年,这些异态大约只影响中国约3亿人口中的几千个家庭。^④满族旗人有资格蓄养奴隶,但到18世纪,甚至在这个小人口集团中,绝大多数人大概也没有能力这样做了。此外,即使在17世纪满族的全盛期,他们的奴隶通常也只是私仆(一般被作为准家属对待),不是农业劳动者或手艺人。^⑤

这个时间表与我们在西欧看到的没有根本的差异。到1500年,成熟的农奴制在易北河以西极为少见,所以大部分农民可以合法地结婚、移居和拥有土地。^⑥而在18世纪的法国甚至仍有一些农奴存在;^⑦强迫劳动和隶农制在

① Elvin 1973:235-267。

② 在景魁和罗仑的331家“经营地主”的样本中,他们的土地中只有20%由非佃农劳动耕种(1986:附录1和2),而这类地主不可能拥有总耕地面积的20%以上(实例见黄宗智1985:104),这意味着总耕地面积中大约有4%主要是由既非田主也非佃农的人耕种的。

③ 黄宗智1985:85—105。

④ 叶显恩1983:232—233、239—240、291。

⑤ M. Elliott 1993:346、383(满族的大部分奴隶是家仆);比较一般的论述见韦庆远、吴奇衍和鲁索1982:77—91。

⑥ Slicher Van Bath 1977:113—114。

⑦ Soboul 1966:159—161。

丹麦城邦也仍然相当重要。^①此外,在法国和西德,多种多样的封建权力和限制仍然存在,通常包括领主垄断谷物磨坊、农民的服务性劳役、领主对地方司法的控制;这些权力必然使很多农民在主张他们的任何权力时踌躇不前。^②甚至在19世纪初的英格兰,隶农制已消亡了几百年,济贫法仍然规定,只有居住在其出生地的教区的人才符合救济条件;这使很多人甚至短期移居也要冒太大的风险,从而使他们成为附近几个——甚至一个——大地主的不能自由行动的劳动后备军。^③在欧洲境内的远距离移居受到各种法律屏障、语言差异和其他障碍的极大阻碍——如我们即将看到的,比中国的远距离移居受到的阻碍大得多。

迁移、市场和制度

可以设想贫穷的劳动者(如果他们都能够迁移的话)会向两个方向之一迁徙:向土地与劳动之比较高的地方(典型的边疆)或向资本与劳动之比较高,并且有建筑业、服务业或制造业工作的地方(通常是,但并不总是城市)。83
在16世纪到18世纪,前一种模式可能一直远比后一种吸引着更多的人口;它在中国也远比在欧洲更为发达。

从理论上讲,寻求更富饶的土地的欧洲人可能不是盯着中东和东欧,就是盯着大西洋对岸。然而,多种多样的规章制度(通常被总称为“庄园制度”、“封建主义”或“二次农奴制”)意味着西欧人口拥挤的地区中只有极少数人能够通过向东方迁移改善他们的状况;大多数人不得不接受一种较为不自由的法律地位和对他们立桩标出的任何土地的不明确的权力(更不必说诸如有限的资本和市场销路之类边疆地区的共同问题)。尽管按照给他们以可靠的法律地位的专门安排,确实有一些自由的德国人移居到了俄国和普鲁士、荷兰人移居到了立陶宛等等,但这都是例外。总之,向东方比较空旷的有潜力的肥沃地区的移居规模,无论是与我们在一个想像中统一的欧洲应该预期的情况相比,还是与中国在同样大的空间跨度中实际发生的情况相比,都是非常小的。(对此我们在第5章将有更多话要说。)总的说来,填满这些地区必须等到19世纪出现巨大的法律变革和东欧自身的人口膨胀。

① DeVries 1976:58—59;Kjaergaard 1994:148—149,154—155,167,221—223。

② Soboul 1966:168—179;Behrens 1977:606—607;Mooser 1984:99—103。

③ Brundage 1973:2—5。

甚至 1800 年前欧洲人口前往土地充裕的新大陆的迁移与中国的移民相比也是暗淡无光的。1800 年前到达美洲的全部欧洲移民可能不到 150 万。^①此外,从英格兰来的人中近 2/3 是做契约佣工^②,同时,各个殖民地的政策对穷人在利用新大陆的机会的同时保持自由身份制造了人为的困难。^③欧洲自由移民的潮流与英国一国的过剩劳动力相比只是一滴水,没有一个地方让大西洋两岸的自由白人有近于平等的生活机会,像一个正在开辟的劳动力市场应该的那样。例如,1700 年前后向新英格兰的移民使一个英国年轻人的预期寿命大约增长 10 年,^④但直到 1800 年以后都没有出现移民大潮。

在向新大陆移民方面(与东欧不同),相对于穷人的工资和储蓄来说,移民的高成本大概是一个比任何法律问题都大的障碍。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大部分人只能通过接受契约劳役来满足这些移居的费用,订立合同时根据的条件同时受到两种情况的重大影响,一是为出口而生产的大种植园主对劳动力需求的限制,二是当契约佣工花费太大时,他们有机会改为使用奴隶。^⑤ 84 中国政府曾多次大力推动向劳动力稀缺地方大规模移民,这样做时所依据的法令允许农民继续保持独立,当然,在欧洲没有与中国政府的做法真正相似的情况。

中国政府的这些努力通常包括提供旅途费用、举办贷款、贷放种子、帮助获得耕畜、提供基本信息和授予土地。^⑥ 单只是 17 世纪后期和 18 世纪,前往中国不发达地区(以及那些由于 17 世纪的战争使人口减少的地区)的远距离移民就轻而易举地超过了 1000 万人,大部分移住民建起了有所有权的农庄;^⑦那些成为佃农的人几乎都是自由佃农。^⑧ 尽管我们缺乏足够的资料说明这些移民如何接近于实现跨地区的收入均等,野史证据却显示出中国有发展机会的土地很快就住满了人,达到向边疆移民不再是一个明显的发展途径的

① Kulikoff 1992:185—186。

② 同上,191。

③ 例如 Morgan 1975:215—234。

④ Greven(1970:26—27,109,193)提出 17 世纪后期 20 岁时的预期寿命增长,男性为 44.2 岁,女性为 41.6 岁(在后一类人群中微调到 40 岁以下),加上 20 岁以下人口异常低的死亡率。Razzell(1993:765)给出了不同的(以精英为主的)英国人口的数字,这些数字显示,17 世纪那些达到 25 岁的人预期可以再活 25—31 年,尽管这一数字在 18 世纪中期和后期向 35 接近(因而与马萨诸塞州相近)。

⑤ 见 Golenson 1989:52—96;Morgan 1975:295—315;我们将在第 4 章和第 6 章对此作更多的讨论。

⑥ 李中清 1982:284,293;孙晓芬(1997:30—34)关于四川;Marks(1997:291)关于广东到西南。

⑦ 李中清和王国斌(Lee and Wong) 1991:52—55。

⑧ Zelin 1986:518。

程度。因而,看来可能的是,中国的移民不知由于什么原因,对区域性的劳动力过剩确实比欧洲移民了解得更清楚。

另一方面,向资本充裕的地区移民在欧洲可能更容易。在欧洲资本最稀缺地区(如俄国)的居民可以肯定相当稳定;如我们看到的,像英国济贫法这样的制度甚至可能人为地抑制从英国一个贫穷的教区移居到伦敦(或后来的曼彻斯特)。但17和18世纪确实有很多欧洲人从短距离到中距离向核心区域迁移(例如德国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向尼德兰移居,爱尔兰人向英格兰移居)。

中国政府由于一直对“游民”心怀疑虑,并且对农民的好感远超过对无产者,所以没有采取措施让贫民到核心区就业,它帮助他们的方式是在外围区域寻找农田;事实上,它的一些政策阻碍了这类移居。组织救灾以便让人们在家附近获得定量配给的物资就是一个这样的例子;通过保甲制让邻居互相为彼此的行为负责的企图是一个具有同样目标的更有雄心的方案,但或许对移民并没有真正的影响。习俗和中国工业的社会结构可能关系更大。

18世纪中国和欧洲最大的工业部门都是纺织业,在这两个地区大部分产品都出自农村。在中国,大多数生产者都是妇女——部分是由于纺和织被认为是典型的“女红”。但在中国很少有单身妇女独自移民,在那里,即使是进行短期宗教朝拜的妇女,如果没有亲属护送,其名誉也有受到损害的危险;事实上,在中国农村一些地方,甚至今天妇女外出工作仍有很大的阻力。^① 对于一个随丈夫一起迁移的妇女来说,他们需要住房,而他,在理论上需要得到一块土地;有多种工作适合男性工资劳动者,但一个男性家长应该有他自己的农田(拥有或租入)的观念强烈到足以阻止大部分潜在的移民。长江下游和其他一些地区到处有农村织工和纺工,但却没有由两名纺织工人结成的夫妇,像人们在西欧经常发现的那样,也没有大地主有兴趣让这类人作为小屋佃农住在他们的土地上,以便获得对他们的劳动的使用权。简而言之,我们可以称之为“无产者移居选择”的东西在中国难以生存,因为标准的纺工或织工不是一个无产者——她是一个家庭的成员,这个家庭如果自己如果没有土地,至少有钱支付一个佃农的押租。

因而现在的情况是,欧洲的制度可能更有助于把人口从劳动过剩的区域转移到资本充裕的区域,从而(在理论上)创造出均衡的移民运动。19世纪当中国外围地区人口激增,而同时它最繁华区域的人口几乎没有增长时,这种具体的差异可能相当重要;我们将在第5章回过头来讨论。但在18世纪中期,

^① 实例见 Judd 1994。

即使长江三角洲这一高度繁荣的地区也难以想像会吸引很多移民不顾其性别准则和其他文化价值观来寻找挣工资的工作。长江三角洲每平方英里的人口已超过 1000 人，^①而长江中游土地最肥沃、降水最丰富的湖南省约为 175 人；^②当然，懂得怎样种地的人远比会做其他任何事的人为多（特别是男人）。在这种环境下，在中国即使没有习俗的阻碍，政府也没有鼓励向土地的移民，大规模的趋向于资本的移民也是难以想像的。毕竟在欧洲，制度对追求土地的干预相当多，对追求受雇于充裕资本的干预则非常少，但趋向 18 世纪的职业的人口潮流仍然相当小。当然，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向资本充裕地区移居的习俗障碍，在 18 世纪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中是像我们描述过的对欧洲土地追求者的障碍一样严重的“缺陷”。当然，无论中国还是西欧都不是一个运行平稳的新古典主义的劳动力市场；对我们的目的来说，中国可能多多少少更接近于这一模式而肯定不是更远离它就足够了。

86 农产品市场

此外，在市场上出售大量产品的农民至少比伦敦和巴黎周围他们的同行遇到一个独家垄断的买主的可能性更小。在英、法两国，渴望以几乎任何代价补充其资产的君主们允许一种“私人市场”的发展，既有的反对囤积居奇——在谷物到达市场之前就把它全部买下——的规章在这种市场里被忽视。商人越来越直接地向农民购买谷物，以一对一的交易方式阻止了谷物随时进入一个实质存在的市场场地，而在那里卖主可以考虑由数个彼此竞争的买主提出的价格。^③如布罗代尔所强调的，这种交易——其中商人一方有对远方市场的高度了解和现成的金钱——“天生的不平等”^④，通常会导致一个使农民永久欠债的自我循环，并使一个人无法选择在什么时间把自己的产品卖给谁。

相反，清政府非常关心确保地方市场以复数的彼此竞争的买主和卖主为基本条件——直到 1850 年代以前，这事实上是政府向商人和经纪人颁发许

① 王业键(Y. C. Wang) 1989:427。

② 据 Perdue 1987:25、40 计算。

③ Everitt(1967:特别是 543—563、568—573)关于英格兰，关于法国，见 Kaplan(1976:69—70)对强迫谷物只能在有多名买主在场的市场内交易的尝试的论述，90—91 页对废除这些规则的论述和 289—290 页对标准的“独家垄断”怎样形成的论述。另见 Usher 1913:306。

④ Braudel 1977:53。

可证制度的主要目的。^① 有很多证据显示,这种制度一般(尽管并不总是)针对粮食和棉花,它们构成了农产品出售的大部分。的确,商人确实常常利用贷款来保证得到他们想要的农民产品,但看来——再一次,至少在1850年前——农民很少丧失他们选择向谁出售产品的能力。^②

农村工业和副业活动

此外,中国农民在从事商业性手工业生产并把这些制成品卖给竞争性的买主方面,与他们欧洲的许多同行相比有相当大的自由。为简单起见,让我们集中注意纺织业。

明初的中国仍然有世袭匠户,1383年约占人口的3%,^③但这一制度在此后的两百年中土崩瓦解;这些受束缚的工人工资如此之低,以致很多人逃避他们的责任,同时农民家庭越来越多地出售布匹和其他手工业品。^④ 到明代末年该制度消亡,新建立的清王朝于1645年正式废止了它。尽管同业公会很常见,纺织业中的同业公会却并不重要,不存在城市对合法纺织业生产的垄断。相反,清王朝极力鼓励农村妇女纺线和织布,既是为了支持纳税农户的经济稳定,也由于一位坐在织布机前的母亲的榜样被认为有益于她的子女的道德教育。政府官员分发棉花种子,出版指导书籍,鼓励传授相关的技术,把“男耕女织”的分工推崇为巩固家庭的基础。^⑤

87

总的说来,这些政策起了作用。到1600年代初,长江下游几乎所有农村家庭都从事某种为市场的纺织工作。华北的很多地方连同岭南在17和18世纪跟了上来,长江中游和其他地方也发展起了一些重要的生产小区。^⑥ 在那些当地生产没有发展的地方,正是由于缺乏合适的地方资源——加上从较为发达区域输入的手工业品——使其停顿。

西欧的城市行会也失去了对纺织品生产的控制——但要缓慢得多。尽管利用农村劳动力有明显的成本优势,城市中的手艺人却普遍赞同赋予他们

① Mann 1987:42,45.

② 潘敏德 1994:130—202,特别是173—187;另见卢汉超 1992:488—490。

③ 吴承明和许涤新 1985:112—115。

④ 同上,116—118。

⑤ 对这些问题一个特别清楚的讨论可以在Mann 1992中见到。

⑥ 李伯重 1998:107—108;卢汉超 1992:480—481;黄宗智 1985:118—120。Marks 1997:171。

的特权以合法权力——可以调整,但不能轻易废除的权力。^① 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开始对这种特权的合法性产生疑问,但直到 1789 年以后才出现反映他们看法的法规。欧洲政府——最关心维持城市秩序政府^②——知道城市垄断权的任何快速瓦解都会导致大规模骚乱,它们也不断加强对农村生产的禁令。在德国许多地区,17 和 18 世纪的政府都力图巩固城市垄断权。^③ 德国很多行会在 18 世纪实际上变得更为强大(事实上的或法理上的),并且直到 19 世纪仍继续猎捕“地上的野兔”——它们行业中无营业执照的农村人。^④ 尽管有这些作用力,农村工业继续发展,一些雇主从尽力排斥农村劳动力转向雇用他们。然而,数百万其他农村居民的工业活动仍然受到城市垄断权的合法阻挠。

88 其他障碍存在于农村自身。拉特兰郡(位于英格兰,既是自由主义中心又是欧洲纺织业中心)的公爵们显然断定(有一些合理之处),在农村推广编织业引起了对农业工人的竞争、更高的出生率以及最终为供养穷人而征收更高的税额;而作为博蒂斯福德农村 3/4 土地的拥有者和农村出售的大部分产品的买主,他们能够阻止这类邪恶的发展。迟至 1809 年,皮特(Pitt)仍然这样描述他们的政策:“一个人数众多的强壮的农民阶层在这里受到支持,没有针织工也就没有需要操心的事物。”毫不令人惊讶的是,尽管累斯特郡许多地区纺织业的发展欣欣向荣,但它通常不会出现在由单独一个贵族家庭统治的村庄中,在土地所有权集中的区域则比较软弱。^⑤ 在德国一些地区(特别是普鲁士以外的地区),直到进入 19 世纪,行会仍然有效地阻止了很多工人(特别是妇女)从事布业生产;^⑥同时,迟至 1848 年,各种各样的奴役性的义务还为织工同时也为发明家们带来问题。^⑦

还有另外一些地方,农村工业确实有明显发展,但付出的代价却是把限制性的行会制度也强加于农村。在这些地方,农村和城市的行会常常为成功地抵制技术变革而(在政府支持下)共同行动;奥格尔维(Sheilagh Ogilvie)研究了德国的档案后得出结论说:原始工业发展和集团特权的这一制度性遗产

① Sewell (1980:117—121)关于法国;Walker(1971)关于德国。

② 王国斌(1997)非常强烈地坚持这一点,并揭示出它的含义是,欧洲政府会和不会对其作出反应的经济混乱的种类与中国有怎样的不同。

③ Kellenblenz 1974:59。

④ Walker 1971:88—107。

⑤ Levine 1977:19—20。

⑥ Ogilvie 1996:128—129。

⑦ Kriedte, Medick and Schlumbohm 1981:143,182,197—198。

在 19 世纪仍然“对经济和社会变革构成一种直接而持久的障碍”。^①

然而,我们不应该简单地列举对一个理想化的整合的劳动市场的偏离现象;那些偏离现象可以在任何地方发现,并不意味着不存在有意义的劳动市场。尽管如此,通过欧洲的一些案例,我们还是得到了一些结论性的计量——这些计量显示出劳动市场的整合相当有限而不连贯。

由布朗和霍普金斯(Phelps Brown and Hopkins)提出的著名的英格兰工资级数明确指出了长期的僵化趋势。各种非农业劳动的名义工资不顾供给和需求两方面的频繁变化而在数十年甚至几百年中保持不变;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之间的工资差异也在极长的时期中相当稳定。^② 我们现在对法国和德国各地有同样的发现。^③ 同时,失业——当工资不根据需求波动调整时一个可能产生的后果——在 16 到 18 世纪的英格兰相当严重。同样,在 18 世纪的英格兰,尽管季节性失业严重,似乎很少有农业劳动者在淡季从事工业工作,并且尽管收割期的日工资相当高,也很少有劳动力向农业中的季节性转移。^④ 这种农业和工业劳动市场之间的强烈分离有助于维持城乡之间工资的巨大差距:18 世纪末城市工资是农村工资的 154%。^⑤

89

荷兰的劳动力市场可能更有弹性,至少在 16 世纪末 17 世纪初的黄金时代是如此。名义工资和熟练工人的工资级差变化得更为频繁,临时工在农业和非农业工作之间来回移动明显,有助于那些劳动力市场的整合。^⑥ 但是,约在 1650 年以后,工资以及熟练工人工资级差的变动频率逐渐下降;各种有组织的城市行业能够保持高工资(甚至在 1670 年之后世界价格下跌时还能保持实际工资的增长),尽管利润下降,失业增加;^⑦ 各种季节性的非农业劳动越来越多地由来自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农村的临时移民补充。同时,很多比较穷的和比较不可靠的荷兰工人不再能够干足临时劳动的总天数,这既是由于公共工程(例如挖掘运河)的紧缩,又是由于农场越来越多地雇用全年工作的佣工。大量人口移居海外,成为荷兰东印度公司——一个最后可以求诸的雇主,但却是在 18 世纪才发展起来的——的海员或士兵。实际上,尼德兰共有三个分离相当明显的工资劳动市场,进入最理想的那一个要受到严格的限

① Ogilvie 1996,136。

② Phelps Brown and Hopkins 1981,3。

③ 转引自 DeVries 1994a:40—42。

④ Allen,转引自 Postel-Vinay 1994,72。

⑤ Williamson 1990,183。

⑥ DeVries 1994a:45,53,56。

⑦ 同上,61—62。

制,而另外两个市场上的人无法继续生活在这个国家。^①

18世纪晚期甚至19世纪大多数时间中,劳动市场也并不是必然逐渐变得更为整合。英格兰城乡的工资差距(1797年为54%)在1820年代到1850年代急剧扩大(像在工业化初期常见的一样),1851年达到顶峰81%,在以后的几十年中仅有缓慢的缩减(伴随着周期性的逆转)。^②

90 法国的劳动市场开始时似乎更为整合,但这最终证实只是暂时的。法国农村工业长时期以来普遍在夏季停工,因为它们竞争不过农忙季节的农业工资,很多工业工人一旦超过大约35岁,就会越来越多地专门从事农业,他们在工业中能够挣到的工资开始下降。农业和非农业工人(1800年前后,法国25%—40%的农业劳动力也在制造业中工作)之间的这一巨大重叠,至少在城市之外造成了一个比英国更为整合的劳动市场。此外,法国农业在1750到1870年间的日益商业化意味着这种整合至少在很多区域得到加强。^③然而,这种整合依靠的是法国许多工业部门异常的非资本密集(这使夏季停工在经济上是可行的)和低工资(使停工在每年夏季农业工资上升时成为必然)。随着19世纪最后1/3时间中以蒸汽为动力的工厂的发展,这类工业日益失去了竞争力;而当收割期工资在1870年代的农业萧条中突然下跌时,从工业到农业的季节性劳动流动也就中断了。结果是在19世纪晚期的法国,城乡间和区域间的工资差距都急剧扩大。^④到20世纪,法国的劳动市场以新型的分割为特征,而不是一种趋向于整合的长期趋势。

对于为什么部门间和区域间巨大的并不断发展的工资差距在欧洲进入工业时代后持续了如此长的时间,学术界没有一致意见。解释无疑是多样的,包括了很多不能够认为是劳动市场“缺点”的因素。^⑤尽管如此,学术界普遍承认这种缺点在使工资差距长期存在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然而,在权衡一种解释的不同构成时,引人注目的是我们在这里再次面临需要解释欧洲对斯密型效应的巨大背离——既在现代早期阶段又在工业时代本身出现——我们在东亚没有看到与这种背离近似的情形。

① DeVries 1994a:57—60,62。

② Williamson 1994:162,166;Williamson 1990:182—183。英国的数字是南部相当大的差距和北方相当小的差距的一个加权平均数;从182页1797年和1851年的指数换算为百分比是我自己所作。

③ Postel-Vinay 1994:65—66,72—74。

④ 同上,78—79。

⑤ Williamson (1990:193)估计,生活费用、城市生活的不舒适、农村中贫民救济效率较高等各种各样的不同,解释了一半以上的工资差距,但他的结论是,它们仍然留下了一个有待解释的劳动市场的实质性失败。

遗憾的是,我们没有来自中国的可靠的工资级数可以用来与上面的计算结果比较,但我们在本章的后面将看到,至少在18世纪,农业劳动者和农村纺织工人的收益可能相当接近。我们也知道,在这些部门之间的移动没有受到与欧洲许多地区存在的限制类似的制约。个体的中国地主几乎从未拥有过拉特兰郡公爵的权力;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可能更愿意他们的佃农有追加收入可以帮助支付正在日益货币化的地租。城市手工业行会,如我们所见,没有实际权力可以排斥农村的竞争者。较为非正式的措施,诸如通过当地居民的地方性团体对季节性的和永久性的雇佣移民进行骚扰,意味着劳动市场确实在许多方面被分割,但如果没有法律限制添加的影响,这种情况看来不可能使劳动市场比现代早期欧洲的市场更缺乏整合性。

在日本,大量对迁移和副业活动的法律限制持续到1860年代,人们可能预期劳动市场的分割模式会与在欧洲观察到的那些模式更为相像。然而,至少在已经商业化的区域中,非正式措施看来经常相当有效地挫败这些限制。斋藤修指出,从1750年代起,畿内地区市镇上的短工与农村短工挣大致同样多的工资,这暗示出一个充分整合的劳动市场;^①西川俊作(Nishikawa Shunsaku)同样指出,在19世纪的长州,边际劳动生产率——应该与农业劳动者的工资大体相等——与附近制盐企业工人的工资极为接近。^②所以尽管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迄今为止我们拥有的证据并没有证明欧洲的劳动市场比日本或中国的劳动市场更符合于新古典主义的标准。

中国和欧洲的家庭劳动：“内卷”与“勤劳革命”

消费和产出

然而,黄宗智认为,清代中国的经济仍然以一种西欧没有的方式“内卷”。黄认为,产量和交易扩大依靠的是不断投入更多的不付报酬的家庭劳动,每单位劳动的收益很小(并且不断萎缩)。这种收益帮助家庭满足了或多或少固定的消费需求,但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低利润和接近于零的绝对工资结合在一起,使投资于节约劳动的机器失去意义,把人们拴死在低效率的工作上,只给“非维持生计必需的产品”留下一个小市场。在这种情况下,农村工业能

^① 斋藤修 1978:92。

^② 西川俊作 1978:81-82。

够发展，但劳动生产率不能提高。因此，“这是小农生产和生存的商品化，而不是萌芽中的资本主义企业”。成为这种动态基础的是，由于“意识形态的束缚”，妇女几乎被排除了户外劳动；^①这些约束鼓励家庭把妇女劳动作为无需花钱的劳动对待，很像一个庄园中无论其工作是多是少都必须养活的奴隶或农奴的劳动。

92 暂且假定黄宗智对中国的描述是正确的，它与18世纪晚期以前的西欧有多少不同？在欧洲，也有充足的证据证明，1500到1800年间出现的产量扩大主要是由于使用了更大数量的劳动，而不是出于任何生产力的突破；这一趋势如此普遍、基本和持久，以至简·德夫里斯提议我们把这一阶段重新概念化为“勤劳革命”阶段。^②正如第1章所指出的，并不能肯定所有的追加劳动都使普通西欧人的生活水平有很大改善。如我们在第3章将看到的，有充分的证据证明非精英阶层的欧洲人在1800年比1500年拥有更多的财产，但他们并没有吃得更好——事实上，他们完全可能吃得更差。

我们已经知道，在中世纪晚期到18世纪之间，欧洲人均肉类消费是下降的。同时，1637到1854年间巴黎的人均面包消费没有显示出长期趋势；^③其他城市也有类似的资料。随着时间的推移，挣到那些面包所需的工作量增加了。1400到1500年间，在斯特拉斯堡，购买一个四口之家一个月食用的小麦所需手工劳动数量在40到100小时之间波动；通常的范围是60—80小时。到1540年，它完全越过了100小时的界线，并且在此后三个世纪中再也没有落到那一水平之下；法国的数据大体上显示出，直到1880年代，一个月消费的谷物才再度可以用100小时的劳动买到。^④德国工人的趋势大致相似：用谷物衡量的工人工资购买力在1500到1650年间下降了大约50%。^⑤在英格兰，购买力下降开始的时间稍晚，并且出现过一个高峰（约在1740年），当时建筑工人的工资再度可以买到16世纪那样多的面包；但另一方面，直到19世纪，他们也只是恢复到了他们在16世纪的谷物购买力。^⑥鉴于当时谷物对人们的日常膳食如此重要——甚至为城市上流社会的人也提供了一半以上的卡路里，为穷人提供的卡路里则可能达到80%^⑦——很可能人力劳动每小时的实际收益在这一时期是下降的。（一些人通过把吃面包改为吃马铃薯保持

① 黄宗智 1990:91,110。

② DeVries 1994b:249—270。

③ Braudel 1981:132。

④ 同上,134—135。

⑤ 据 Abel 1980:136,161,191 计算。

⑥ Clark 1991:446。

⑦ Braudel 1981:131—133。

他们工资的卡路里购买力不变,但这普遍被认为是饮食质量的一种下降。)

小农——无论是自耕农还是佃农——的伙食只是稍好一点。尽管当谷物价格上升时他们的收入有周期性的增长,并往往逐渐积累起更多的炊具和设备等,但他们的饮食并没有改善。实际上,农民数量的巨大增长消耗了他们增加的大部分产量,对现状不满的农民可以移居的空地逐渐消失,有助于精英们和政府占用更多的无论何种剩余。可以肯定,一些新品种进入了百姓的市场篮子,但由于有得也有失,这个新的市场篮子并不比旧的那个明显优越——而且人们为了获得这个市场篮子要比他们的祖先工作更多的时间。⁹³ 如果农业实际工资是增长甚至只是稳定的,就不会有农业劳动力的剩余,这些剩余压低了有充分文献记载的实际工资。^①

对“原始工业化”——现代欧洲早期农村手工业的巨大增长——的研究得出了一个类似的结论。戴维·莱文(David Levine)对英格兰农村纺织业的研究说明一个农村纺织工人的收入不能养活一个家庭;如果没有某些农业收入和/或儿童劳动的参与,即使两个这类工人的收入通常也是不够的。尽管如此,一对夫妇靠纺织业——或许再加上一块非常小的土地——生存的可能性使更多的夫妇不必等待继承一笔遗产就可以结婚。结果是纺织区域的早婚、高出生率和人口过剩,以及使工资进一步下降的压力。工资下降迫使很多人工作更长时间,从而加速了这一螺旋。^② 因而,莱文认为,原始工业化不是未来工业的预兆,而是一个死结,是一个外生的技术突破把英格兰(尽管不是它所有的纺织工人)从这个死结中挽救了出来。

原始工业化和更迅速的人口增长之间的关系不再像这一模式最早的创建者看起来的那样清晰。农业工资劳动机会的增加,也使在没有土地继承权的情况下谋生和结婚成为可能,它对人口的影响可能像那些由原始工业化造成的影响一样;^③ 它也引起了至少需要有两个人挣钱才能维生的家庭的增加。尽管如此,莱文的基本观点——原始工业化可能走进一条死胡同像它有可能引起一个大突破一样容易——仍然显得相当合理。它也提醒我们,无产者——在理论上他们是作为个人面对市场,而不是作为一个既是生产单位又是消费单位,并可能仍然拥有一些土地的家庭的成员——仍然可能以一种同样“内卷”的方式背离新古典主义的预期。

克里特、梅迪克和施卢伯姆(Peter Kriedte, Hans Medick and Jürgen

① Kriedte, Medick and Schlumbohm 1981; 28—29.

② Levine 1977; 58—87。另见 Kriedte, Medick and Schlumbohm 1981; 57, 77—86。

③ 见 Ogilvie and Cerman 1996; 1—11 对文献的综述。

Schlumbohm) 在一部研究当今德国、法国、英格兰和比利时部分地区的原始工业化的著作中提出,通过由商人积累起来的利润和组织技能,原始工业化事实上可以对继起的工厂的勃兴做出贡献。^① 然而,他们所描绘的这幅经济与人口对工人的因果关系的画面与莱文的观点极为相似:这是一个由内卷、生活水平停滞和对可用资源的全面压力日益增长构成的模式。^② 在 18 世纪和 19 世纪初的德国的相关地区,原始工业化似乎也伴随着巨大的人口增长,尽管地方政府尽力通过立法对婚姻加以限制;严重就业不足和工资降到生存水平以下的情况广泛存在,特别是 1840 年代。^③ 总的说来,最早在 1850 年以前德国的生活水平没有显示出改善的迹象。据说德国手工业者中有 1/4 到一半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法兰克福拥有获得公民权所需的足够财产的男性百分比从 1723 年的 75% 下降到了 1811 年的约 33%。^④

因而,16 世纪到 18 世纪,劳动增长而同时生活水平只有很轻微的提高,至少在西欧可能像在中国一样成为一种特征。尽管如此,德夫里斯的欧洲变革特征的另一部分确实与黄对中国的描述有极大的不同:“勤劳革命是一个以家庭为基础的资源配置过程,它既增加了市场出售的产品及劳动的供给,又增加了对市场供应的商品的需求。”^⑤ 换句话说,由于欧洲人把更多的时间用于为市场而生产,他们就要用一部分挣到的现金购买他们以前自己生产的日用品的产成品或半成品:面包、蜡烛及其他等等。^⑥ 尽管总的劳动时间仍在增加,^⑦ 为减少家务劳动而花钱表明妇女的时间不再被认为是一种零机会成本。

相反,黄认为——尽管他没有说的如此明确——中国农民没有明显地减少其家内劳动的数量。因而,工业品的农村市场没有发展,因为家庭(特别是妇女)劳动只是简单地增加,而不是像德夫里斯所描述的欧洲那样在增加的同时重新配置。如果这是事实,这会是一个关键性的差异,但它缺乏实证的支持。反之,德夫里斯关于西欧的描绘看来同样勾画出了中国的先进区域。

两个环境中都出现了劳动的某种增长和某种重新配置。生活在农村的欧洲人开始购买的很多新商品——咖啡、烟草、糖(农村手工业者花在这些商品上的钱占他们收入的比重比欧洲其他任何人群都高,^⑧ 尽管大多数农民可

① Kriedte, Medick and Schlumbohm 1981:100—101。

② 同上,77—88、139。

③ Nipperdey 1996:91—93。

④ 同上,121、144、150、183、192、197。

⑤ DeVries 1994b:249(着重号为后加)。

⑥ DeVries 1993:107—121。

⑦ DeVries 1994b:257。

⑧ Kriedte, Medick and Schlumbohm 1981:64—65、68—69; Medick 1982:90—92。

能买得非常少)——之所以被购买不只是为了取代以前在家中制作很费事的东西;实际上,其中大多数在19世纪以前甚至不属于家庭重要消费品。^①因而,看来它们不可能节省很多的家务劳动时间,除非我们把它们视为对人们非常爱吃的(并且是劳动密集的)熟肉食品减少的一种补偿。在农民家庭中越来越常见的其他商品——家具、餐具、墙上的装饰品等等——似乎也与节约劳动无关。相反,它们可能标志着一一种对最低生活水平的再评价,或许也是一种对拥有与休闲相关的某些商品的效用的再评价。^②也有可能公认的最低生活水平并没有提高而是发生了变化:就是说,拥有一箱内裤对保持一个人的自尊看起来更重要,而吃肉的次数则变得较为不重要。但其他日益常见的商品——面包房烤的面包、酿酒厂酿造的啤酒和裁缝缝制的衣服——显然确实节约了家务劳动时间。(事实上,如果我们把所有家庭使用的产品都看作纯“劳动”,其中有些是完全无报酬的,涉及勤劳革命的专业化发展甚至可能导致全部劳动时间的平均收益增长,尽管每小时的工资下降。另一方面,这一论点由于某些家务劳动[做饭、看孩子等等]至少可以部分地成为“休闲”的体验而变得相当复杂。)

中国人像欧洲人一样,购买的糖和烟草的数量也越来越多——事实上,我们以后将看到,1830年前他们吃掉的糖可能更多。为这些购买提供货币的劳动明显标志着劳动的增加而不是一种重新配置。鉴于粮食和肉类的消费看来都保持稳定^③,同时预加工的形式几乎没有变化,这方面似乎不可能节约很多家庭劳动力(尽管对中国食品加工业的研究可能要求重新评价这一描述)。或许最为重要的是,我们找到的极少的资料表明,购买一定数量稻米所需的劳动量从1100年前后(当时耕地与人口的比率最为有利)到至少1800年间是逐渐增加的,^④这是一个与黑死病之后的欧洲非常相像的模式。(在18世纪的中国,与在欧洲一样,一些人转向不大受欢迎的食物,特别是新大陆的粮食作物;^⑤但再一次,这没有改变食物价格上涨的一般模式。)

至于人们甚至在获得足够的卡路里所需费用上升时还开始购买更多的非食物商品,中国也与欧洲相似。有一些证据表明,家具、珠宝和其他商品在普通人中的占有量增加了。由于我们缺乏与欧洲人的遗产清单相似的任何记录,要把中国各种各样与休闲相关的商品(从而货币)可察觉价值的爬升与

① 关于糖,见 Mintz 1985:132。

② DeVries 1976:179-180;DeVries 1993:各处及107-114。

③ Perkins 1969:71。

④ 赵冈 1983:55-57。

⑤ 见何(1955)对新大陆粮食作物广泛传播的研究,注意它们在边远地区最重要。

欧洲的进行比较是极为困难的，但变化的方向看来相同。我们将检验第3章中的证据，并看到与欧洲的类同之处相当接近。为了说明我们目前的问题——中国增加的劳动是否明显比欧洲的更为“内卷”——只要指出在非食品购买方面有一些增长，没有发生与欧洲食肉量下降同样的受欢迎食物的明显减少就足够了。

中国人在购买劳务方面似乎也有急剧的增长，或许比欧洲人更多，后者似乎更偏爱遗产清单上列出的耐用品。例如，有充分的证据说明，在16到18世纪，甚至地位非常低的人雇用宗教专业人员和专职的艺人都有很大的增长：实际上，一个一次一付费的宗教和娱乐部门最晚从8世纪起就一直在发展。相反，在欧洲很多地方，固定的教堂和无报酬的社区团体继续处理生活周期中大部分宗教事务，没有一次一付费的安排。即使对生活在比较富裕的、都市的和“资产阶级的”英格兰的中产阶级来说，直到17世纪后期和18世纪，休闲商业化都是一种相当新的现象。^① 鉴于存在巨大的文化差异，如果中国的消费者把他们增长的购买力分配到与西北欧人不同的方面是不会令人非常吃惊的。中国和欧洲消费者偏好之间这样一种差异，如果存在的话，可能会有长期的重要性，但它很难成为“内卷”的证据。^② 但出于同一理由，在没有出现像欧洲那样的减少肉类消费的情况下，看来更明确的是，中国其他消费种类的增长代表了一种通过这种增长实现的生活水平的净提高。

因而，无论一般意义上的生活水平还是劳动投入（在我们所能辨别的范围内）都没有证明存在一个与“勤劳”的欧洲相对的“内卷”的中国，我们对有更具具体意义的家庭动态和劳动的了解也没有证明这一点。

如果农业中国确实是一种内卷经济——在这样一种经济中，至少妇女和儿童劳动的机会成本如此之低，以致他们几乎从来不会放弃做更多工作的机会，即使只能增加非常微薄的收入——人们也应该预期他们的家庭几乎从来不愿意为减少妇女的劳动花任何钱——但他们这样做了。例如，在1350到1850年间，棉布服装几乎完全取代了麻布服装，黄本人注意到，由于麻的纤维短，需要“一个相当费力的加工过程”才能制成适合于织布的纱线；棉的加工

^① 关于中国，见 Teiser (1933) 和 Johnson, Nathan 与 Rawski 1985 中的论文；关于英格兰，见 Plumb 1972。

^② 我要赶紧指出，这样一种差异也不一定意味着中国人（或者其他非欧洲人）必然更注重“来世”或更倾向于在“非生产性”的宗教上“浪费”资源。一次地方性的演出或葬礼使用的是同样的资源——人的时间、食物、戏装材料等等——而不论它是由专业还是业余人员进行。“宗教”支出也不一定比其他支出在经济上更缺乏生产性。雕刻纪念碑创造的经济需求正如吸烟一样，对于使购买者成为一个更好的生产者来说，两者在肉体上都没有多大作用；在一种特定背景中，两者对维持某人作为一个有效的生产者和社会成员都可能起了重要的心理作用。

要容易得多。^① 在全中国,如同在全欧洲一样,购买蜡烛都增加了愿意用钱来减少家务劳动的证据。如我们即将看到的,中国的家庭也会为了节省他们生产供出售产品的时间而花更多的钱。 97

某些始终为家庭使用而生产的特殊产品全然不顾以市场为基础的效率观。例如,由于中华帝国晚期绣花技术越来越成为女性气质的一个重要象征,强大的压力迫使少女(至少是某些身份的少女)在她们陪嫁的柜子中装上一些她们亲手刺绣的衣物——尽管掌握这种技术要花费相当多的时间,很多少女无疑可以通过专门为市场做织布或络丝工作然后购买刺绣品而取得更大的经济利益。(有些人确实不顾这种价值观而这样做。)②但所有的社会中都存在某种这样的对一个完全由市场驱动的生活方式的抵抗(或者,换一种表达方式,某些生产过程的文化表意用途)。“家内生产的用品及劳务”的同质范畴实际上由很多具体的物品组成,在任何特定文化中的人都会对不断为自己和家人而不是为其他人生产其中一些物品有更强烈的感受。另一种甚至更为真实的非物质的同质范畴亦是同样,即与家庭成员为市场的劳动逆向换位的东西:“休闲。”这个术语包括了所有各种活动(解纵横字谜、听或演奏音乐、做爱、出席另一个家庭之成员的生日派对,等等等等);在任何文化中,当为了得到更多收入(从而有更多的换取满足的机会)而需要作出牺牲时,都有某些事物的牺牲比其他事物更能让人接受。

因而,某些没有转化为“勤劳革命”的家庭活动的存在——无论它们对理解中国文化可能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并不说明这一过程在中国比在欧洲软弱,除非这些活动在中国非常多,或它们包含了更多的基本项目。(例如,在一个为别人提供饮食被认为是太具隐私的事,以致不能仅仅为了金钱而为陌生人这样做的社会中,会有一个比在中国或欧洲都更为强大的对“勤劳革命”的阻碍。)然而,在这些事情上中国和欧洲之间的差异看来是双向的,没有明显的纯“优势”。例如,中国农家妇女由于比欧洲妇女更可能生活在扩大家庭中,所以能够更容易地得到老人对孩子的免费照料,这些老人已老得不能在地里或在织布机旁工作。欧洲农家妇女较少有这类机会,也远不像中国妇女那样可以理直气壮地声称她们的婆婆帮助照料孩子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而把孩子交给非亲属照管则既浪费钱财又(在某些时期)受人指责。 98

因而,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根据产出或消费模式断言是中国还是西欧

① 黄宗智 1990:44;另见 Warden(1967)对用亚麻(638—39)和麻(48—49)纺线问题的一个描述。

② Bray 1997:256、260、263、265。

经历了更多的“勤劳革命”——包括家庭劳动的扩大及其重新配置和节约时间的消费的增长——或者哪一个地方出现了某种更接近于纯粹的“内卷”的事物。看来最安全的是把两地放在同一范畴中,并承认欧亚大陆两端劳动市场、节约时间的市场和其他商品市场以及人口压力的适度发展。为了确定有可比性的实例,让我们尽可能直接观察在不同生产安排中对人的劳动时间含义的评价。我们将首先观察男性的劳动,然后是女性,后者由于就业机会较少,最可能陷入一种内卷性经济中。

生产决策和劳动配置

我们缺乏足够的小农场生产决策的资料。但男性农业工人的工资从来没有低落到养活这个工人的成本之下,那些有机会得以自己耕种土地的人不可能面临比农业无产者更恶劣的处境。此外,大豆饼肥——比粪肥(当然,特别是自给的粪肥)价格高得多,但施用时可以少用很多劳动——购买量的急剧增长有相当的启发意义。事实上,根据工资和价格资料可以推断,购买豆饼的家庭隐约以一个大致与市场工资协调的比例评估男性劳动的价值。^①最后,由于对1600年代、1800年代和1930年代在长江三角洲耕种一亩(即1/6英亩)水稻所用劳动天数的估计实际上是同样的,^②同时每亩的产量却在提高^③,作为产量的一个百分比的地租则可能下降,^④所以实际上至少在中国的这一地区,农业内卷化的迹象比现代早期的欧洲更少,后者的劳动时间增加,不熟练工人的实际工资则可以证明是下降的。

对女性劳动的比较也没有明显表现出欧洲更“革命”而中国更“内卷”。对妇女在户外工作的文化抵制因素在中国比在欧洲更强烈,但那并不一定意

① 按照潘敏德(1994:36—38,110—113;另见足立啓二,1978)的计算,一定重量的豆饼在不同地方可以取代30到50倍重量的适当稀释的粪肥,所以能够用较少的劳动施用;它也节约了大量本来需要用于积肥的劳动。一个家庭花3两银子就可以购买足够为5亩水稻提供追肥的豆饼,等于用了一个长工一年现金工资的3/5,更接近于其现金和实物工资总和的1/4。豆饼和外购粪肥之间的价格差额可能约为一个劳动力一个月的总工资(误差偏向高工资一面),同时使必须运到田地中的重量减少了约4800—6200磅。这可以节约一个月劳动量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具体数量取决于一个家庭的地块分散程度。足立啓二集中注意富农购买的大豆豆饼,但特别说明他们进行这种购买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节约工资;显然,类似的逻辑也适用于较小的农场。(在18世纪的长江下游,5亩大的一块地可能趋向于“平均”数列的小头;见潘敏德[1994:521—524],对一个大约合理的“平均”地块面积的全面讨论。)对短工平均工资的比较不大有利,但短工工资应该高于维持水平,因为这类人有很多天不能找到工作。

② 潘敏德 1994:41—43。

③ Perkins 1969:21。

④ Bernhardt 1992:228。

味着欧洲女性出售其劳动的市场比中国女性出售其自制产品的市场更自由。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行会规章通常把欧洲妇女排斥在产品市场之外。这些规章是更为一般性的文化规范的组成部分,而这些文化规范鼓励男性让他们的妻子尽可能全神贯注于为家庭的生产(尽管对于大多数人口来说这是不切实际的),因而它们对女性事业心的敌视可能至少与中国人的偏好一样,后者坚持女性应该心甘情愿呆在自家的院子里,但并不认为在那里从事市场导向的生产有什么不好。欧洲启蒙运动的君主们模仿了中国由皇帝犁出当年第一条田垅的仪式,但却没有举行由皇后当众采集桑叶并亲祭蚕神娘娘的仪式,这可能并不是出于偶然。^①当然,褒扬女性既为家用又为市场进行生产,并认为这些任务有助于女性提高子女的道德观的思想,^②对许许多多的欧洲人来说完全是外来的异说。

当然,中国妇女很少自己出售或支配她们的产品。她们普遍受丈夫或婆婆的监督,后者相当强词夺理地降低她们的休闲时间的价值,甚至在追加劳动的报酬下降到完全低于市场工资后还要她们不停工作。然而,更多的欧洲妇女直接把她们的劳动出售给非亲戚这一单纯的事实,并不意味着她们不会在家庭内部同类权力的逼迫下,出售比她们愿意出售的更多的劳动——同时并不免除报酬微薄的家务劳动。

此外,当中国家庭出售妇女生产的纺织品时,它们是在一个有多个买主竞争的环境中这样做的:尽管对农民家庭与商人之间的关系有各种不同的解释,但大家都承认农民自己不断带着他们的商品进入市场。^③相反,欧洲的散工制——在这种制度中,商人提供原材料,通常提供设备和一笔预付工资,所以工人没有产品可以出售——意味着这些雇主通常能够用正在形成的“私人交易”在谷物市场使用的同样的方法,绕过一个竞争性的劳动市场。商人常常划分疆界以使彼此不必竞争;这使他们得以在一种相当接近于债务劳役的制度中使工人束缚于一个雇主,或者至少可以继续增加工人而不会抬高工资。^④

最后,我们众所周知的零散的工资资料显示,中国的“内卷”程度完全可

① 关于法国和奥地利君主模仿中国皇帝的农耕礼仪,见 Ledderose 1991:245—246。关于清代皇后参加蚕神祭典——“女性作为皇室官员主持的惟一公开仪式”——见 Mann 1992:79—81。

② 中国的思想家们通常认为,通过观察做这些工作的母亲,孩子们学到了勤奋、节俭和纪律。因而即使那些可以无需任何现金收入的妇女通常也受到鼓励这样做,而同时欧洲妇女常常被强烈要求避免为获得报酬而工作——只要她们的财力允许。见 Mann 1992:86—89。

③ 田中正俊 1984:90—92;西嶋定生 1984:61—62;卢汉超 1992:490。

④ Kriedte、Medick and Schlumbohm 1981:50—51,102—104。

能低于西欧。黄主要依赖的是 18 世纪河南工资合同的一个调查，该调查显示，夫妻一起受雇所得现金（在他们的膳食费用之外）比丈夫独自一人受雇所得要少。接受这样一种待遇意味着，在这些家庭看来，妇女继续工作是个好主意，即使工资低于维持生存的水平，而妇女能够做的其他事情（例如纺纱、织布）报酬同样微薄或更坏。但一个纺织品商业生产有限的贫穷省份的几份合同够不上据以说明富裕的纺织品产区；况且这些合同本身也还有些不明之处。^① 最后，黄对妇女纺织收入的估计依据的是 17 世纪晚期的价格，这些价格，如我们即将看到的，并不代表一般的状况。

相反，潘敏德提出了一系列假设的但似乎合理的 18 世纪中叶农民家庭预算。它们显示出在江南，一个成年妇女和她 9 岁的女儿通过养蚕和织这些蚕吐的丝，能够使一个相当贫穷的农民家庭每年增加 11.73 两（中国白银计量单位）收入，并且仍然做好家务；如果这个家庭能够无需借债即为这种生产提供资金，她们就能够挣到 13.73 两。^② 在这一区域一个男性农业工人即使一年能得到 12 个月的工作（不是一种非常可能的情形），每年最多挣 5 两工资，再加上他本人的部分伙食；^③ 如果他是一个长工而不是按日或月受雇，他可能得到全部饮食供给，但只能挣到 2—4 两白银。

因而，这些对妇女“额外”劳动潜在收益的估计看来等于或高于不熟练男工的市场工资。即使是 11.73 两也相当于 1750 年前后一个男性工人工资的 85%，如果这个男工按照月工资率工作 12 个月，并且除现金工资外得到他所有的食物。由于我们设定的养蚕织丝的母女组合平均食用一个成年男性稻米消费量的 90%，^④ 她们的收入超过她们自己生存以上的剩余就基本上与他的相等。姑且承认这个剩余反映的是两个人的工作，但其中一个人，一个 9 岁的孩子，几乎不可能被指望挣的与一个成年人同样多。她们每人用在这项工作上的时间都远远少于我们假设的工作 12 个月的男性农业工人；而且我们在对男性挣钱能力作出宽松假设的同时，假定妇女要以史料记载的最高利息率（月息 10%）为她们的工作筹资。

妇女在更为庞大的棉纺织部门中的收入也高于“内卷化”水平。卢汉超对长江下游的研究指出，17 世纪晚期一个女性织工的收入，在她的丈夫供给

① 黄宗智 1990:65, 引李文治主编 1983:407、413—417。与一对夫妻的雇佣合同可能常常包括子女以及父母的膳食费用；或者与丈夫单独订的合同可能包括的饮食较少（假设他的妻子会为他做一两顿饭）。这两种可能性中的任何一种都会使黄的推论无效。

② 数据来自潘敏德 1994:97—101。我增加了新的计算。

③ 赵冈 1983:55—56。

④ 潘敏德 1994:348。

原棉的条件下,足以养活三四口人。^①但是,像黄的研究一样,卢的估计依据的是1690年代的资料。中国刚刚从一次严酷的萧条中恢复,不同日用品的相对价格显得相当反常。例如,我们大部分的1696年的价格资料记载,那年棉布的价格低廉,而原棉的价格却达到8年中的最高水平,这种情况会使织工和纺工的收入低得异乎寻常。在有些人看来,按照他们的记录中应有的情况,可以说1690年代棉布异乎寻常的低价格是相当惊人的;1680年代的价格已经达到了一个50年来的最低点,远远低于明代大部分时间常见的价格。^②另一方面,到清中叶,中等棉布的价格接近于17世纪价格的双倍;高级棉布的价格也上升了,尽管上升幅度不完全相同。(我们缺乏最低档棉布的充分资料,但无论如何长江下游生产的这类棉布越来越少。)^③而正是包括了18世纪绝大多数时期和19世纪初期的这一阶段,对我们最为重要。

但人们可能预期,18世纪的人口膨胀会使粮食价格比手工业品价格上升更快。因此有必要对稍晚时期纺工和织工真实的赚钱能力作出估计。我在附录E中利用两套不同的原棉和棉布价格资料,对1750年代的情况进行了这种估计。然后我在正文中用了比较低的那套数字,它看起来更可靠,它也导致明显更低的实际收入。

我还——在其他条件中——继续假定男性农业工人得到了全年12个月的工作,同时按照一年200—210个工作日计算妇女的收入。事实上,假定正是女织工和女纺工能够全年工作可能会更合理;长江下游棉业中心20世纪的一个调查估计,每年的工作时间是305天。^④ 162

只纺棉的妇女实际收入确实非常低,至少用我们的低价格设定计算,只够买约1.3石谷物,即将近一个成年女性需求的一半。但是正如黄本人指出的,只纺纱的妇女很少是成年人;而即使1.3石谷物也超过了一个不到13岁的女孩(她做了大量纺纱工作)在她实际纺纱的日子中的食物摄入量。此外,这是一个使用低价格数据系列在一种非常悲观的倾斜中能够建构的案例。高价格设定则仍然显示出这类妇女的收入完全高于维持生存的水平。^⑤

至于既纺纱又织布的妇女,收入要高得多,我们的例子因而也显得更清楚。在18世纪中叶,一年210个工作日内,这样一个妇女能够挣到约12两银

① 卢 1992:482—483。

② 张忠民 1988:207。

③ 同上,207—208。

④ 徐新吾 1992:469。

⑤ 见附录E,为什么低价格设定在这里可能太悲观的理由,特别参见321—322页(指本书英文版页数——译注)。

子,即大约 7.2 石稻米。这个数字略高于男性农业工人在我们设想的最好条件下的收入序列的中点;足够养活一个成年妇女和多达 5 名儿童;或者,更合乎实际的是,一个成年妇女、一个年老的公公或婆婆(他或许能做一点家务)和两三个孩子。实际上,这个妇女较低的食物需求和较高的收入结合在一起,意味着她生产的高于她自己生存所需的剩余是一个男性农业劳动者剩余的 1.6 倍到 3 倍。

最后,一个能够购买棉纱而全心全意织布的杰出妇女,即使按照我们的低价格设定,在理论上也能挣到 24 两白银;大约双倍于纺工兼织工或一个男性农业工人的收入,或许接近于那些生产非常高级的织物的城市织工(大多为男性)的收入。^① 李伯重也证明了一名妇女能够比一名男工挣得多,远远超过维生所需的费用,尽管他的方法、年代和估计值都与我的不同。^② 总之,中国妇女在工作环境中受到的社会和文化制约可能比欧洲妇女的更多,这些制约迫使她们在家中为市场工作,但这似乎并没有把生产力人为压低很多。

中国妇女在家中挣的钱显然不比男性无产者少多少(或许还更多),这对于我们考虑“内卷化”假设的一个引起争论的新版本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个新版本是由杰克·戈德斯通(Jack Goldstone)提出的。^③ 戈德斯通与黄宗智不同,他没有声称中国的人口比欧洲更加过剩,或劳动市场更不发达(至少对于男性)。实际上,与我在这里所做的差不多,他利用莱文和其他人的著作描绘了一幅主要在原始工业中存在劳动剩余的欧洲(以一种宽松的观念)与中国对比的画面;然后他继续把这两个区域视为同类型的,认为(从来不使用“内卷化”这个术语)在这两个地区人们都会看到大量的居民,主要是妇女,其机会成本(以及由此而来的需要付给他们的工资)远低于不熟练工人的机会成本。

戈德斯通然后提出,这种极为廉价的妇女劳动侵犯了由于使用男性劳动而不得不与之竞争的任何雇主的潜在利益——即使该雇主能够利用机器使他的工人有更高的生产力。因而,戈德斯通声称(这里与黄相似)中国农民家庭中自我剥削的妇女使建立工厂的吸引力低于在没有她们竞争的情况下本应该有的程度。(注意对于戈德斯通来说,这是男女性工资差异的要害。因此,即使妇女吃的比男性少,挣的钱够养活自己——按照黄的观点消除了“内卷化”——戈德斯通的观点仍然能够成立。)欧洲的不同之处,他认为,在于妇

① 1730 年代和 1740 年代这类织工的一些工资数据见赵冈 1983:57。他引用的案例中有 3/4,这些工资实际上明显低于 16 两,但再一次,这些数字看起来只包括现金收入,而工人几乎肯定也得到食物,或许还有临时的住宿及其他一些福利。

② 李伯重 1998:150—151。

③ Goldstone 1996:1—21。

女能够离家工作。因而初生的工厂能够雇用它们正在与之竞争的同样非常廉价的劳动,并实现它们的新机器创造的潜在利润。因此,把中国妇女关在家中——尽管她们在那里为市场生产——至关重要。它使中国几乎没有工厂,尽管所有其他要素——可利用的资本、技术发明等等——使它成为一个与欧洲一样好的工业化的候选者。

戈德斯通提出的论点中有一些在本书其他地方涉及到。例如,我们已经第1章中看到了一些问题,涉及寻找某种障碍以便解释技术突破没能出现,就好像一个社会一旦具备了大多数必要因素,在逻辑上就能预期会出现突破。我们也已经看到一些理由可以使人怀疑仅有机器纺织业是否能够使任何社会实现自我维持的发展;在第5章和第6章我们对此还有更多的话可以说。但戈德斯通的主要问题在于:性别规范是否在中国成为纺织工业化的一个重大障碍,而在欧洲或日本却不是?

当然中国人让妇女呆在庭院内是一种强烈的偏好——强烈到甚至足以使许多贫穷家庭不愿把它们的女儿送进工厂。但看起来可能的是,如果工厂存在的话,仍然会有足够多的妇女(或其家庭的决策人)愿意为了使她们的收入得到微薄的增长而触犯这种禁忌。李伯重指出,无论男耕女织的观念可能有多么强大和久远,它在实践中并没有达到同样充分的完善。来自长江下游区域的大量原始资料提到明后期(17世纪)男性协助纺织而女性在田中工作;这类资料在清中期仍然相当丰富,仅在太平天国起义(1850—1864)之后才完全消失。^①此外,这种理念的应用缓慢发展似乎是与实用性紧密纠缠在一起,而不是粗暴地践踏后者。因而,男性停止协助纺织工作部分是由于他们的技术水平太低^②——他们的缺点应该是随着双季作物使他们用在耕作以外任何工作上的时间减少而加重的——而就在同一时期,江南的棉布生产越来越集中于高级织物。此外,妇女从水稻与丝绸生产结合区的田野里消失,要比在水稻与棉花生产结合区中消失得更快也更彻底;之所以如此的理由看来是大量的丝绸生产从以家庭为基础转向了以集镇为基础的工棚中,使妇女更难通过短途步行回到田地中(也使工棚更像很多早期的工厂)。^③而在安徽的产茶

104

① 李伯重 1996,102—106。

② 同上,105。Bray(1997,206—272)认为,男性在帝国晚期的纺织品生产中实际上起了更大的作用——这一观点在很多方面会进一步加强我关于分工没有受到旧规范过度限制的主张。然而,她的论证在很大程度上限于表现纺织工作中示范性的技巧,限于位于市场最高层的织工(实例见 239—241、257),这种状况或许有点像西方的高级男厨师,他们的存在本身并没有对改变主要烹调工作由妇女进行这一事实起重大作用。

③ 李伯重 1996,105。这种差异可能也有助于解释太平天国之后有关江南妇女务农的记载最终消失,因为也是在此时江南实现了从棉到蚕的非常大范围的转变(黄宗智 1990,120—122)。

区和广东及福建的产糖区，在整个 19 世纪妇女继续与男人并肩工作。^①

如果妇女能够在所有这些场所工作，为什么不能在二厂工作？如戈德斯通本人提到的，20 世纪的工厂找到了足够的妇女，尽管有时有点困难。对当代华南的一个研究认为，这种成见起了有利于妇女在工厂就业的作用，因为男人认为“他们的”女人在这类工作中比在别的许多工作中更少“抛头露面”，工厂的纪律与其他许多种职业较为放任的事务相比，也更适合于保持“女性气质”。^② 换句话说，人们找到了一些可以把文化规范和工厂工作视为完全兼容的说法，而不是执着于女性端庄的严格定义。戈德斯通假定，大众态度在较早的年代会造成一种更大的障碍，认为 19 世纪晚期外国的影响可能大大软化了这种禁忌。在我们对中华帝国晚期非精英家庭中性别角色和文化变革的了解如此之少的情况下，这种观点不可能被完全驳倒，但李伯重关于明代和清代初期性别分工更不明确的证据使它看来不可能成立。

对这种应该很严格的禁忌到底有多大力量的另一个疑问来自戈德斯通本人对丝业的描述。蒸汽缫车——它像机器纺锤和织布机一样，需要的劳动力远超过一个个体家庭能够召集的人手——比棉业技术推广得更快。戈德斯通注意到，这种情况首先发生在华东南，那里的宗族和扩大家庭异常强大。他因而提出，这些扩大家庭能够集合一大批足够的劳动力使用这种新机器，而不必让他们的妻女在非亲属面前抛头露面。因此，他认为，对于一个核心家庭来说有点过于大的这种机器在这一地区相当迅速的应用，正好显示出，正是要让妇女呆在家中的顾虑，在不同场合抑制了其他新技术可能的发明与应用。然而广东不仅产丝，也生产大量的棉纱和棉布；事实上，从 16 世纪起，它在这两类纺织品生产中可能都仅次于长江下游位居第二。那么为什么由该区域的亲缘结构为较大的妇女工作单位提供的机会并没有也在棉纺织业生产中证明它自己？^③（事实上我们的确有一条记载，说 1833 年在广东佛山有许多生产棉布的大型城市工场，尽管至少有一位史学家认为这条资料肯定不正确。^④）

尽管如此，反对戈德斯通的假设的最生动的证据——至少对 1800 年以

① Gardella 1994:172; Bray 1997:221—222.

② 李静君(C. K. Lee) 1995:385.

③ Goldstone 可能认为，亲缘结构的弹性足以允许应用一种已经证明其价值的技术，但要鼓励某人幻想和引进一种需要放宽现有的性别规范限制的新机器却还不够。这不是不可能的，但它促使我们把一种非常精确的作用程度归因于一种本质上无法量化的因素——从而使这一观点无法证明是不正确的。

④ 赵冈(1977:30—31)批驳了这一条史料。Robert Mark 对广东纺织业作了比较新的研究，他没有如此肯定。

前的时期——是前文展开的对收入的比较，它们暗示出假想的工厂并不会遇到被迫雇用男工的麻烦。此外，正如黄宗智指出的，长江下游全职纺棉的女性大多数是儿童——而13岁以下的男女通常都是可以当众露面的。^① 所以，戈德斯通提出的中国女性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和缺少工厂这两者之间的联系看来至少对18世纪缺乏说服力。如果英国妇女被迫呆在家里，戈德斯通描述的问题确实会存在，因为那里男性和女性挣钱能力的差距看起来要比长江下游的大很多。^② 但是我们的证据显示，尽管存在要她们隔离的期望，中国妇女的收入落后于她们的男人的程度远远低于英国妇女。而且在中国，工业也可以在非农忙时期得到廉价的男性劳动；这样一种现象，如我们已经看到的，¹⁰⁶ 为法国很多早期工业提供了动力（尽管在工厂工业化的发源地英格兰北部明显少见）。最后，我们应该记住，一旦人们领会到机械化能够造成生产力的差异，就几乎不可能想像工资差额本身能够使机械化无利可图。毕竟，英国棉纱在19世纪征服了印度市场，尽管两地的工资差距比我们在任何一个单独的社会中能够看到的都大，还要加上相当高的运输费用。

但即使有这一切，值得注意的是，从中国开始转向棉布生产（在1300年代，当时他们已经有了与400多年以后使英格兰棉纺发生革命的机器非常相似的纺麻的工具）到中国纺纱最终实现机械化的20世纪之间这一漫长时期中的某些阶段，戈德斯通的假设可能有重要的意义。实际上，我们将在第6章见到，中国织工相对于农业工人的实际挣钱能力在人口压力特别严重的一些时期急剧下降，如19世纪初和20世纪初；在这种情况下值得返回到戈德斯通提出的某些问题去。但戈德斯通的假设似乎不可能对工业化为什么开始和在何时何地开始的问题作出重要解释。

所以，总的看起来，在中国，劳动利用像土地利用一样，至少与欧洲同样符合于“市场经济”原则，可能还多少更好一点：“勤劳革命”看起来至少在欧亚大陆的两端是共同的。当然，在现代早期阶段整个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欧洲制度，与中国的情况相比，有可能使某几种狭隘但重要的行为的报酬与这些行为对经济做出的贡献更匹配。例如，似乎有理由认为，18世纪英格兰专利法的发展使发明家得以获得与他们的全部工作价值更接近的报酬，因而可能对工业革命的技术突破产生影响。^③ 但即使这是事实，这些证据也只是在我们所研究的阶段的末期才有意义。即使是那样，我们也需要记住，19世纪中

① 黄宗智 1990:95。

② Horrell and Humphries 1995:102—103。

③ 例如 North 1981:164—166。

期以前，西欧经济中得到新技术改造的部分（无论按地理范围论还是按经济部门范围论）是多么小，即使是最为重要的创新又是如何依赖（如我们在第1章中见到的）欧洲以外的事件和关联才能实现其革命性的影响的。因而，在发明市场上占支配地位的制度方面的差异太狭小，不能解释1830年以前——这是最早的时刻——任何时候欧洲可能存在的经济领先地位。

107 第一部分的结论：现代早期世界经济的多重核心和共同制约

到此为止，我们检验了很多强调19世纪中期以前欧洲在生产方面存在内生优势的观点，并发现它们都存在疑问。西欧的人口—婚姻体系，尽管是独有的，但并没有形成更好的生育控制，西欧人的寿命也不比其他不同区域的人更长。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显示出西欧的积蓄资产明显更多或具体化为决定性的全面技术优势。其土地和劳动要素市场看起来并不比中国的市场距斯密的自由而有效的市场理论更近，或许还要远得多。此外，倍受诋毁的中国家庭劳动利用模式，在经过更严密的考察后，看来与西北欧模式同样可以对变化中的机会和价格征象作出反应。因而，西欧最发达地区远非独一无二的，它们看来与欧亚大陆其他人口密集的核心区域有着共同的重要经济特征——商业化，商品、土地与劳动的互相修正，市场驱动的发展，家庭根据经济趋势对其生育和劳动力配置的调整。

而且，没有理由认为这些发展模式会“自然而然”地在任何地方导致工业突破。相反，所有这些核心区域都是在一系列不能只靠市场解决的基本的技术和生态限制下，主要通过分工的发展实现适度的人均增长。第二部分进一步探索物质的生存和再生产之外的行为，在第二部分，我们将更密切地关注“非必需的”消费模式，我们还要对塑造了一个要素市场的一整套最近的制度——支配着商业和金融资本大规模积累的法律和社会体制——进行比较。在这方面我们也将发现一些差异，但还不足以解释欧洲独特的发展。这些将在第三部分引导我们更为详细地观察在头两章间接提到的共同的生态限制，引导我们注意这里讨论的能够继续下去的发展项目和即将着手的一种新的更为引人注目的发展之间的关系——还有在这种关联要素的转换中的作用，包括那些使欧洲核心区在新大陆得到前所未有的生态恩惠，而同时使东亚核心区发现它们的外围越来越无法在市场驱动的发展中起到惯常作用的因素。

第二部分

从新风气到新经济？

消费、投资和资本主义

引 言

在第1章和第2章中,我们考察了一系列受到广泛承认的观点——这些观点用1800年前西欧的制度来解释这一地区早期开始的工业发展——发现根据最近对其他区域的研究,它们之中没有一种具有说服力。这说明,几乎没有理由认为,1750年前甚至1800年前的西欧比同时代旧大陆其他各类人口密集区域有更强的生产力。当我们转向土地与劳动的要素市场时,我们发现了令人非常难以置信的事实,即中国看起来至少与1800年前的西欧同样符合新古典主义的有效经济制度的理论。

然后我们浏览了各种各样的现代早期核心区域,它们的日常经济——与绝大多数人生产、购买与出售生活必需品相关的资源、技术、制度和行为——具有大致相似的发展水平和发展趋势。不存在足以解释19世纪的工业化或欧洲人的巨大成就的西欧优势。看来更可能的是,没有一个区域“自然而然”走向急剧断裂性的工业化,避免了共同的资源限制,并扮演了一个“世界工场”的角色。

因而现在到了上升至社会经济层次的时机。到此为止考察过的观点不是指向整体经济中的资本积累、资源配置和市场需求,就是指向影响到绝大多数家庭决策的制度。尽管这些领域中明显缺乏关键性的差异,但可能有一些差异使少数重要的富裕家庭愿意购买的东西发生了变化,从而影响了它们积累资本或刺激经济变革的能力及偏好。很多学者认为这类差异确实存在,它们产生于欧洲人对于自我、宇宙和其他影响经济的外在因素的观念在文化上的独特变化。对一条欧洲独有的发展道路的最著名的文化解释是马克思·韦伯关于“新教伦理”和“禁欲”资本主义的讨论,但近期的很多研究集中关注欧洲人的某些消费(特别是奢侈品消费)态度起的刺激作用;有些观点试

图通过证明一种欧洲人独有的“唯物主义”把这些表面矛盾的观点统一起来。^① 其他较少以文化为依据的观点则仍然认为,欧洲的政治经济是惟一有利于商业资本的,并使金融资源能够比在其他地方更容易地积聚、更好地保存、更有成果地使用。

112 尽管存在着差异,这些观点有很多共同之处。它们都集中于经济的“居高临下的高度”,而不是绝大多数生产者的行为(尽管一些观点也强调上流社会的观念和实践最终向社会更大部分的扩散)。它们都集中于某些商品的生产、消费和分配,这些商品就其满足基本的、生态的、维生的需求方面的贡献来说,几乎感觉不到什么价值,除了作为社会期望的一种折射外(例如把某种奢侈品作为某些阶层中婚姻和合法生育的一个前提条件)。此外,这类商品的价值通常依赖于“珍奇性”。因而,对我们迄今为止的讨论并不重要的远距离贸易,在这一部分中起了一个更为显著的作用。

轮船时代之前的远距离贸易还引起了其他问题。从这类冒险开始到所获得的商品最终出售之间有一段极长的滞后时期,这意味着金融中介成为整个过程的一个关键部分。因而,与抽象的财富(即,以纸币、贵金属或借据形态,而不是以土地、储藏的谷物或其他可以直接使用的东西表现出来的财富)地位相关的问题,在人们储藏哪一种财富(而不是直接兑换它)的倾向发生变化时——在它可以转变为其他种类的资源并受到法律或习俗保护(这当然可能非常不同于给予其他资产的保护程度)的限度内——也变得至关重要。我们必须把各种各样通常与远距离贸易相联系的权力与抽象财富放在一起考察,例如法定的独占特许权和其他特权。

由于远距离贸易涉及到了生产者和永远不会满足的消费者,这种商业也使极少数占据关键地位的人可能实现的利润率,与在较为地方性的、多边的、面对面交易的市场上能够达到的利润率相比高出很多。因而,如布罗代尔所强调的,15到18世纪最大的商业“资本主义”是在其环境与完善的市场条件最不相似的地方兴旺起来的。尽管如此,他还是把这种交换在其中特别充分发展的制度称之为“资本主义”,因为在这种社会中信贷和金融结构起了巨大的作用,资本普遍按照积累更多资本的原则配置,还由于这类社会可能逐渐按照能够促进这种积累的方式被改造。因而,“资本主义”的文化和政治经济都必须与我们至此已经讨论过的日常生活和市场经济领域分别对待。关于资本主义文化和制度的各种观点的一致性在于——除了文化和制度从来没有实际互相分离这一事实外——它们关心的东西与我们在第一部分中讨论

^① 如 Mukerji, 1983。

过的关于市场、维生和普通人的那些观点中关心的东西不同。

但我们将会看到,这些观点中的大多数也没能明确地把西欧的前景与中国和日本的前景区分开来,尽管它们可以把这三地与世界其余地方充分分离。(印度是一个复杂的中间性案例。)的确出现了一些差异,但它们看起来太小,以至除了在一个方面外没有多少解释能力。奢侈品需求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我将在第4章作广义的解释)两者都对欧洲得以控制新大陆起了很大作用(尽管另外的关联性要素也很重要)。新大陆反过来又成为生死攸关的力量——与其说是对于资本积累(如一些学者认为的),不如说是因为它的资源帮助欧洲脱离了一条受生态制约的、主要是劳动密集的发展道路(这是它与中国和日本共同的道路),走上了一条使用巨大数量的能源和土地,有大得多的变革能力的道路。 113

在本书第三部分,我们将从第5章中的那些生态制约开始(并且由此而回到普通人的世界中)。第6章将从制度、生态和关联等方面检验为什么正是欧洲能够缓解那些制约,分析它们对工业革命的意义,简要地预测随之而来的“东方—西方”的分流,分析西欧的命运和那些继续向劳动密集、资源节约道路下滑的区域的命运——就在最近西欧还是那条道路上的另一个旅行者。

114 三、奢侈消费和资本主义的诞生

更多和更少的普通奢侈品

关于 1400 年以后“奢侈”或“消费者社会”的产生的观点大致分成两类。第一种强调的是巨富阶层中奢侈消费的增长，通常认为，一种新的对使用昂贵的通常是耐久性的制造品——丝绸、镜子、精致的家具等——的重视取代了以前诸如维持大批侍从之类表达地位的方式，后者对生产的刺激作用较小；维尔纳·松巴特把这称之为奢侈的“物化”。^① 作为这种转变的组成部分，奢侈品越来越成为任何人都可以享受的东西，只要他们有足够的钱去买，而不再限于那些还要符合拥有高档物品所需的某种社会尺度的人。

但如果这些物品是根据品味的准则——它们的变化速度开始比过去更快——使用的话，这种新型奢侈就只是转化成了地位；这些准则在部分意义上是一种防卫，旧精英用以防止新的财富过于简单地通过消费转化为地位。在这种新兴“时尚”的支配下，甚至那些拥有大量诸如家具或玻璃之类耐用品的人都会感到有越来越大的压力迫使他们购买新的物品，以至于对这些物品的需求在继续体验社会必要性的同时，越来越远离任何种类的物质必要性。

这些观点继续证明，这些高等的消费模式最终为“下层”百姓所模仿。这种模仿受到城市化的推进，城市化也创造了集中的市场。它受到了新的自我观念和扩大的社会结构流动性的进一步鼓励，从而不仅使暴发户而且使“中间阶层”甚至某些穷人都能通过适当的消费方式用他们的钱买到社会地位。

另一组观点——包括西德尼·敏茨(Sidney Mintz)对现代早期的西方和

^① Sombart 1967:95.

现代西方糖消费增长的著名论述——也从社会最高层开始，但把重点放在曾经是奢侈品的东西向中产阶级及最终甚至由穷人消费的日用品的转化。这里，并不令人吃惊的是，重心很少放在牢固耐用的奢侈品项目上，而是更多地放在能够以比较小的单位获得，并通常迅速被消费的物品上。这些物品可能包括一支银发卡或一幅带框架的画，但它们主要由敏茨所谓的“成瘾性食品”¹¹⁵构成：糖、可可、烟草、咖啡和茶，它们在16世纪欧洲任何地方都是舶来的奢侈品，但到19世纪后期在西欧的许多地方都成为平平常常的东西。^①

尽管这两种现象互有重叠，但那些关注上流社会奢侈消费的人，与那些关注地位较低的百姓和“成瘾性食品”的人相比较，强调的是与工业化的不同联系。关注民众消费的观点通常主张，对这些除了通过市场就无法获得的物品的需求，使普通人更迫切地需要现金：它们因而鼓励人们工作得更多、更紧张并更多为市场工作，而不是当人们有了足以满足基本生存所需的东西时就宁愿停止为钱工作。或者，换一种不同的方式表达，他们对“维持生存”重新下了定义，使它包括了更多的外购物品——其中一些可能是在家中无法生产的——因而对我们在上一章中讨论过的“勤劳革命”起了作用。（如果一种要求结婚时陪送被褥的习俗，推迟了一个家庭完全接受由市场决定如何使用他们的女儿们的时间，那么用茶或香烟招待客人的要求则会推动人们更为信奉比较优势；但这两者中哪一种也不比另一种更明确地是一种与“个人选择”相对立的“社会制约”。）完全撇开不断变化的社会期望不谈，新的食品中有一些具有温和的（或者不那么温和的）成瘾性，极为适于纪律日益严格的枯燥乏味的日常工作，而这类工作越来越可能在工人住宅以外的地方进行。所有这些食品都有刺激性，使用简易包装，从而用最少的现场准备就可以在工间休息时提供一块面包和“兴奋饮料”。

因而，这些观点集中注意这些日用品的消费怎样使总需求扩大，这种需求又怎样改变了作为生产者的普通人的行为方式。此外，受其影响的欧洲人作为其他所有各种物品——从谷物到马车到服装——生产者的能力也受到影响，但他们自己不生产成瘾性食品。糖、烟草等等通常由奴隶或其他形式的不自由劳动者在欧洲以外生产，不会为了期望这类工人有更高的生产能力而向他们提供种类日益繁多的生活消费品。这些非欧洲的劳动制度对欧洲历史关系重大，是因为它们增加了成瘾性食品的供应量并压低了它的价格，

^① Mintz 1985:108。

不是因为它们成为刺激欧洲生产扩张的新动因的实证。^①

116 那些关注更为耐用而昂贵的奢侈品的观点相当不同。可以认为购买这些奢侈品的现金需求驱使上流社会成员更理性地使用他们拥有的无论哪种生产性的资产，从而把更多的谷物或其他普通商品送到市场上——但这种观点很难证实，并且肯定会被相反的情形抵消，例如购买华而不实的摆设与比方说为抽干一片沼泽提供资金发生冲突。而且旧式的上流社会行为，包括供养大批侍从，也创造需求。

另一方面，这些耐用奢侈品中有很多主要是在欧洲生产，集中了这类需求的城市中心的出现确实对生产者扩大生产、实现规模经济和引进新技术产生了重大的刺激。机会很多，但只限于那些有足够的流动资本的人，他们买得起昂贵的原料，能支付熟练工人的工资，并能够等待直到那些有势力但常常缺少现金的消费者最终偿付帐单；因而，奢侈品生产者的某个子集成为成功的资本家，而其他人逐渐成为工资劳动者。结果是，尽管对上流社会耐用奢侈品消费的讨论可能涉及到整个经济的总需求，它们的焦点却在别的方面——增长中的奢侈品市场怎样改变了商品生产方式，促进了新制度的产生和生产者的内部分化。

因而，就我们的目的来说，对成瘾性食品和民众奢侈品的讨论是对上一章提出的问题的回溯；民众对市场的参与、劳动的配置和大众的生活水平。另一方面，对耐用但较为昂贵的奢侈品的争论，指向了属于第4章中有关资本主义的讨论的主题：公司结构变化；能够提供信贷的人对生产的控制加强；相当少的有强烈再投资动机的人进行的利润积累。所以，尽管上流社会的消费至上主义按年代顺序首先出现，但从日常奢侈品开始却更具解析意义。

现代早期欧洲和亚洲的日常奢侈品及大众消费

在理论上，我们不应该比较个别商品的消费，而应该比较整个市场菜篮子；在理论上，我们也能知道，偏好相似到足以跨越消费差异——对购买力起重要作用的文化背景。但18世纪史料的现实状况意味着我们没有这种自

^① Mintz (1985:57—60)确实认为新大陆的种植园可能在其经营规模、劳动强度、要求严格的监督管理和密切协作等方面预示了欧洲的工厂，但他完全明白，新大陆用来强化劳动的直接的高压手段与消费主义动机是有区别的，后者构成了这些为欧洲人生产的新奢侈品的真正革命的意义。此外，尽管他确实展示了种植园与工厂相似的某些方面，但他没有说明发生了任何直接的“学习”，这些相关特征也可能根据其他很多制度进行了调整。

信,所以必须小心对待下面的比较的含意。我们(在第1章)对相似的预期寿命的估计和(本章稍后)对基本的卡路里在家庭预算中所占相似比重的估计,暗示出其他消费种类的比较对我们更大的计划有一定的重要性。 117

回忆一下至少在19世纪中叶以前“日常奢侈品”膨胀的限制是很重要的。1400年以后新出现的食品、纤维、饮料之类的清单令人眼花缭乱,很多东西能让人上瘾。但至少在18世纪末之前,一般说来直到19世纪,它们的传播都相当缓慢;巨大的增长幅度通常反映出最初的基数很小,即使在欧洲最富裕的区域也是如此。1800年前后即使在英格兰,每人每年也只消费约1磅茶叶,1840年为1.4磅;正是在那以后价格急剧下降,普通人成为每天饮茶的消费者。(到1880年每人每年的消费达到5磅左右。)^①至于欧洲其余地方,数字要低得多。1750年代除俄国以外的欧洲据说每年消费茶叶2200万磅,^②这意味着全大陆每人约消费2盎司,而除英国以外的欧洲消费量要小得多。甚至到1840年,欧洲输入的8000万到9000万磅茶叶,也只不过供给每个居民每年4盎司。^③

中国人的消费要高很多。吴承明估计1840年的国内茶叶贸易约为26000万磅,而他对中国国内商业的其他估计普遍偏低。^④如果中国当时有38000万人,^⑤人均就达到了11盎司弱——即使吴的估计没有漏掉任何重要的地方性或地区性茶叶交易圈,而这是不可能的。

当然,茶叶消费量并不是一种公平的比较。高额运费、关税和垄断经营使茶叶在欧洲比在中国昂贵,欧洲人还消费各种各样中国没有的饮料(咖啡、可可、葡萄酒)。然而,等待欧洲人对这种“日常奢侈品”的消费终于超过中国,所需的时间之长仍然是惊人的。我们没有烟草方面的数字,但1793年英国派往中国的特使斯当东(Staunton)和马夏尔尼(MacCartney)都对中国的吸烟人数之多感到震惊。他们的说法被一封中国人的信件证实,信中说,在浙江(一个一般说来烟草比较繁盛但并非主要作物的省份)“甚至两英尺高的儿童”都吸烟。^⑥ 118

① Braudel 1982:252,引| Staunton;Gardella 1994:38.

② Braudel 1982:251.

③ 根据 Gardella(1994:6)的出口数字以及 McEvedy and Jones(1978:28)的人口数字计算。

④ 吴 1983:99.

⑤ 对19世纪中期中国大灾变前夜人口的估计一般在42500万~45000万之间,但 Skinner 比较近期的著作提出,38000万左右可能是一个较为准确的数字(1987:71-76)。

⑥ Staunton 1799:II:48;Cranmer-Byng(MacCartney)1962:225;该信引自 Dermigny 1964:III:1253.

表 3.1 人均糖消费量(磅)

	欧洲	欧洲(英国除外)	英国
1680	1.0	0.85	4
1750	2.2	1.90	10
1800	2.6	1.98	18

即使在糖的消费方面,欧洲优势的出现也比人们可以预期的要晚很多。尽管 1700 年英国的消费已经达到每人 4 磅,1800 年更达到 18 磅,^①欧洲的其余部分却相当落后。对 1800 年欧洲大陆的一个充分的估计是人均略低于 2 磅;这个数字大致相当于布罗代尔估计的 1788 年法国人均 1 千克的数字。^②此外,如表 3.1 所示,英国以外的地区消费上升趋势并不明显。^③

这并不意味着糖消费的增长完全是英国的经历。“英国之外的欧洲”是一个过于粗略的范畴;至少尼德兰以及巴黎、波尔多和汉堡周围地区的增长,尽管不能与英国相比,也表现出比大陆其余地区更为急剧。(迟至 1846 年,巴黎人的消费还略低于人均 8 磅。^④)此外,1800 这个年份——拿破仑战争中后期——压低了消费数字。(事实上,巴黎糖的短缺曾在法国革命初期阶段引起民众骚乱。^⑤)尽管如此,这些数字仍值得深入分析。

首先,尽管使用奴隶劳动生产出了比较廉价的糖,消费并不是在整个欧洲都呈稳定上升的趋势。在今天,欧洲的人均消费使英格兰 1800 年的人均消费相形见绌——看来是不可抗拒的糖“对世界的征服”^⑥曾经是有一定限度的,有成本意识的种植园一直是在为一个萌芽状态的“消费社会”进行生产。糖,如敏茨阐明的,不只是随便什么日用品。它被欧洲人追求了几个世纪,被国王和教皇们交换,藏在它背后的知识及神秘性是后来发现的烟草或可可无法与之比拟的;它受到了肯定会从其消费增长中获利的强有力的投资者和重商主义政府的热心推广;它还能使人在肉体上上瘾。^⑦有了所有这一切,欧洲消费增长中一个长达 50 年的停顿——在一个经济普遍好转时

① Mintz 1985:67。

② 使用 Mintz (1985:73)全欧洲的数字及从中减去英国以后的数字(Mintz 1985:67)。对法国的估计见 Braudel 1982:226。

③ 产量数字来自 Phillips(1990:58—61)葡萄牙和西班牙殖民地的数字,以及 Steensgaard (1990a:140)法国、荷兰和英国殖民地的数字。欧洲人口数字来自 McEvedy and Jones 1978:26—29。英国消费数字来自 Mintz (1985:67,73),用 1700 年的数字代表 1680 年。

④ Braudel 1982:226。

⑤ 同上,227。

⑥ 同上,224。

⑦ Mintz 1985:16—18,138—139,164。

期——暗示出,设想 1850 年前“诞生了”一个不可逆转的“消费社会”^①可能会是严重的误解。出于同一原因,那种认为其他地方“奢侈”消费增长有太多停顿的观点,可能是抓住了某种完全正常的东西,却把它当作了一种与一个本应“自然”继续的过程相抵触的反常的东西。

其次,上表提醒我们,1850 年以前,我们主要是有一次英国革命而不是一次欧洲革命。在绝对意义和相对意义两方面,英国和欧洲大多数地区之间的距离都是在拉长而不是在缩短。西德尼·波拉德(Sidney Pollard)关于生产的观点——不是整个欧洲而是欧洲一些不毗连的地区在 19 世纪发生了一场革命——看起来也适用于消费。^② 当我们把其他区域与一个理想化的“欧洲”历史相比较时,消费增长的这种地理分布不均衡和时间不连续的模式都需要牢记。

糖在中国上层社会中重要的礼仪用途(主要是在佛教礼仪中)可以追溯到唐代,它也有医学方面的用途。^③ 在唐之后的宋代(960—1279),糖在富人中的用途扩展到特殊场合以外:“蔗糖产品逐渐完全融入了富人的生活时尚和饮食习惯中。”^④ 在 16 和 17 世纪,很多欧洲旅游者都注意到糖在中国有钱人中比在欧洲有钱人中应用更广泛。^⑤ 同时,糖在特殊场合的用途似乎扩展到了普通人中:1680 年前后广东省的一篇报道告诉我们,糖被塑成人物、动物和建筑的形状,“嫁女者无论贫富”,糖梅成为婚礼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钱人会筹备有“数十百罍”糖梅上席的宴会。分发甜食的理由据说是要影响新娘将来生育时的感受,“其有不速者,皆曰‘打糖梅’”。^⑥ 另一条大约同时的资料提到,即使非常穷的人家也要在新年时吃加糖的点心,大量糖果是婚礼的一个如此重要的组成部分,以致一些家庭为满足这一需求而破产。^⑦ 糖的这些用途,医药与礼仪用途及模仿性消费——富人经常用糖而穷人在特殊场合用糖——结合在一起,看来很像敏茨指出的现代早期欧洲的情况,后者为糖在 19 世纪成为普通人卡路里的一个重要来源铺平了道路。这种进一步的改变从未在中国出现——但这不能用与 18 世纪消费模式相关的任何现象来解释。

我们没有 18 世纪中叶中国糖消费的总数,但即使用我们掌握的零星资

① McMendrick, Brewer and Plumb 1982:1—6,特别是 4—5。

② Pollard 1981:84—106,111—123。

③ Daniels 1996:55,59,62—63,70—71。

④ Mazumdar 1984:62。

⑤ 同上,64。

⑥ 屈大均 1968:14,20b—22a。

⑦ Daniels 1996:73,75,80—81。

料作出的估计也相当高。中国生产的糖绝大多数产于广东、福建(包括台湾)和四川。幸运的是我们确实有1720年前后台湾运往大陆的糖的相当可靠的数字:10 400万磅左右。尽管直到鸦片战争之后台湾糖的产量没有引人注目的进一步发展,但看来存在持续的缓慢而稳定的增长。因而用1720年的数字作为对1750年的保守的估计看来是安全的。

我们没有广东总产量的估计。我们有一个对广东甘蔗“种植园”每英亩产量看来相当保守的估计——2400磅^①——但不是直接根据甘蔗种植面积计算的数字。但马宗达(Mazumdar)至少记录了该省(92个县中)的15个县,这些县是18世纪的甘蔗种植中心;^②其中3个县据说有40%的土地用于植蔗,还有一个县为60%。^③

罗伯特·马克斯(Robert Marks)最近的研究提出了一种不同的估算方法。他估计1753年前后广东和广西的农田中至少有2400万亩(400万英亩)用于现金作物,可能高达4150万亩。当时广东耕地面积占到了这两省总耕地面积的70%以上,非粮食作物的比例甚至可能更高。(广西的主要现金作物是水稻,在广东出售。)因而估计这一区域非粮食作物耕地中有70%在广东应该是保守的:即至少1680万亩(280万英亩),可能多达2905万亩(4 841 666 121 英亩)。马克斯认为,广东耕地的一半——2150万亩——用于非粮食作物应该是一个合适的推测,^④所以用1680万亩的数字看来是比较谨慎的。

甘蔗可能比其他任何非粮食作物占用了更多的耕地;^⑤它即使不是第一位,也是第二位(在桑树之后)或至少是第三位。(广东输入它需要的大部分棉花,只种植极少的烟草;茶和水果是这一名单上仅有的其他可能占第二位的项目。^⑥)但即使我们用1753年前后广东非粮食作物面积最低数字的1/10,即28万英亩,也会使该省种蔗面积达到总耕地的3.9%。用马宗达对每英亩

① Mazumdar 1984:297。Mazumdar 提出真实的情况说明,中国的糖产量不可能比亚洲其他任何地方低很多。Henry Botham, 18世纪晚期的一个种植园主,在东印度和西印度都有种植经验,会赞成这一点;他证明中国的自由劳动比亚洲和美洲的欧洲殖民地上的依附劳动能更有效的种植甘蔗(引自Daniels 1996:93);另一些西方人则承认迟至1840年代中国人带来的植蔗方法的优越性。Shepherd(1993:159)对台湾每英亩产量作了一个低得多的估计,但在这样一个人口稀少的边疆地区,使每英亩产量最大化的压力比在大陆上要低很多。此外,台湾全部种蔗的耕地都是旱地,而广东和福建的很多蔗田是水浇地,可以获得高得多的产量(Daniels 1996:105,236)。Eugene Anderson (1988:80—81)列出帝国晚期各地糖产量的范围在每英亩1600—3200磅之间;Mazumdar的2400磅的数字实际上在这个序列的中间。

② Mazumdar 1994:280—281。

③ 转引自上书,272。

④ Marks, 个人通信,1996年8月。

⑤ 同上。

⑥ Mazumdar 1994:271,372。

产量的估计去乘,我们得出广东每年的产糖量为 67 200 万磅。加上台湾,不算四川、福建的大陆部分和很多种植少量甘蔗的地方,1750 年的总产量为 77 600 万磅。^①

17 世纪的一条资料估计,福建(包括台湾)和广东占到了中国甘蔗种植面积的 90%。这意味着我们至少可以把我们的总产量再提高 8600 万磅(福建和广东产量的 1/9)。实际上,为了反映出到 1750 年时甘蔗的推广,我们或许应该用一个更大的比例提高这一数字;甘蔗普遍传播到有福建人移居的地方(既有中国其他地区也有东南亚),而这些移民在 1700 年代比 1600 年代多很多。^② 尽管如此,我将省略广东和台湾以外所有地区的产量。最后,除了荷兰占领台湾时期外,1840 年代前中国糖的输出量相当小;^③另一方面,1730 年代中国每年从越南进口约 8000 万磅糖。^④ (我省略了来自泰国的较少的数量。^⑤) 加上这些进口使我们得出中国在 18 世纪中期的消费量为每年 85 600 万磅左右。

1750 年中国的人口约为 17 000 万—22 500 万,^⑥这意味着人均糖消费量为每年 3.8—5.0 磅。加上中国其他地方的产量,每年至少再增加 0.4—0.5 磅;用安德森(Anderson)对帝国晚期产量估计的宽松范围的绝对下限计算, 122 会减少 1.1—1.4 磅。只要略微提高广东的种蔗耕地百分比就会使这些估计值直线上升。

这些估计远远超过了欧洲 1750 甚至 1800 年的平均数。中国糖中的蔗糖含量低于欧洲人吃的糖,按照今天的标准这会使其成为一种劣质商品。但直到 19 世纪,很多人都喜欢他们的糖带有较多的杂质,从而更有滋味。^⑦

根据 18 世纪末北京的价格——即使对这种最高级的糖这大概也是一个相当高的价格,因为所有的糖都来自遥远的南方——一个士兵购买这样多的白糖需要用 3 天到 4.5 天的工资。^⑧ 这并不那么难以置信。一个农业工人几

① 见 Daniels 1996 第 90 页地图,图中包括了另外 6 个省份中种植甘蔗的府州。

② Daniels 1996:97、105。

③ Mazumdar(1984:357、374、376),提出 1792 年有 65 000 担,即大约 860 万磅从广州出发,加上输往日本的另外大约 260 万磅。即使在 1833 年,从广东的输出也只增长到 3400 万磅。

④ Nguyen,引自 Reid 1988a:31。

⑤ Cushman 1975:105。

⑥ 1741 年的官方总数为 14 100 万,但何(1959:36—46)认为这个数字肯定至少低估了 20%。其他人提出的数字甚至更高。

⑦ Daniels 1996:276。

⑧ 这些数字根据 Mazumdar 1984:64 引用的价格计算。还有一些不精确是因为不能确定这条资料中引用的度量单位“斤”是等于 1.1 磅的“海关斤”还是相当于 1.3 磅的市斤。对我们的目的来说,这不是一个能造成很大差异的范围。

乎需要花掉他一个月的现金工资,对这样一种商品来说听起来确实像是太多了。但现金只是农业工人收入的一部分;如果我们使用第2章估算的一个男性农业工人现金和实物收入的合计(无可否认那是相当丰厚的),那么他在18世纪中期每年的收入相当于10800文钱。5磅高级糖只不过占他全年收入的4%,这是一个较高的数字,但不是完全不可相信的,因为按照方行的估算,农村穷人的收入中约有1/4用于非粮食食品。^①既然无地的农业工人属于最穷的中国人,我们可以预期他们的糖的消费低于平均数。

中国的合计数像欧洲的一样,也隐藏了很多地区性差异。谢泼德(Shepherd)提出台湾每人每年的消费约为10磅,那里肯定是糖价最低的地方。^②糖的运输路线和地方菜肴风味(特别是南方和东南的蜜饯水果及各种各样的甜味调料)都意味着华南和华东比华北的消费量要大很多很多。^③

因而,看来相当可能的是,1750年甚至1800年,中国人糖的消费量高于大陆欧洲。即使我们对1750年中国消费量的估算比真实数字高了一倍,中国与欧洲大部分地区的差距仍然远远小于欧洲大部分地区与英国的差距。

但在某一时期中国的人均糖消费量下降,而欧洲在1840年以后出现了爆炸性的增长。卜凯1930年代的调查发现,中国人的糖消费量约为每人2.2磅,是我们对1750年估计的最低数的60%。^④鉴于当多灾多难的1850年代和1860年代结束后,中国的糖产量有可能增长(尽管新增加的产量中有许多供出口),糖消费的这一下降看来最可能发生在1750到1870年之间。

茶叶消费没有下降,但可能发生了停滞。1912年的一个估计是人均2.6磅,这代表着引人注目的增长;但这一数字似乎太高了,因为同一个十年中抽样调查的一个庞大的城市样本的计算结果是人均消费2磅多一点。张仲礼认为1930年代的一个全国性估计1.1—1.3磅(18—21盎司)更为可能。^⑤这个数字仍然远远超过1840年代的11盎司,但那个较早期的数字,如我们所言,可能是低估的。在富裕得多的1987年的中国,人均茶叶消费略低于1840年的数字;^⑥尽管这种比较并不公平,因为茶叶现在要与啤酒、软饮料和其他饮料竞争。总的来说,19世纪和20世纪初,“成瘾性食品”的人均消费如果没有实际缩减,肯定也增长得较为缓慢。对于18世纪中国日常奢侈品欲望的

① Daniels 1996:93,97.

② Shepherd 1993:482页注78.

③ Ng 1983:134—135;Ng 1990:306.

④ 转引自 Daniels 1996:85.

⑤ 张 1955:303.

⑥ 这个数字是由 Gardella(1994:8)表格中的总产量减去出口再除以12亿人口得出。

增长,不存在自我维持的必然性——出于同一原因,欧洲消费将要发生的事情也不是不可避免的。但这不足以说明欧洲能够令人信服地走上中国的道路,像欧洲大陆在 1750 到 1800 年间实际上可能做的那样;我们需要对最终实际发生的分流作出解释。

人口趋势极度夸大了这种分流。如我们在以后更详细的分析中将看到的,中国 1750 年以后的人口增长主要集中于比较贫困的区域。因而,即使每个区域的消费都保持在 1750 年的水平,全国平均水平也会下降。这对糖的消费来说特别真实,因为 18 世纪的消费特别强烈地集中于通过水路与糖产地连接的三个富裕的大区:岭南、东南沿海和长江下游。这三个区域可能几乎占到中国 1750 年糖消费的全部(除了首都附近另一个小小的集中区),当时它们的人口约占全国人口的 40%。^① 在 1843 年(和 1953 年),这同样的三个大区可能仅占中国人口的 25%。^② 仅此就会导致全国糖消费的平均水平下降 37.5%,这解释了我们 1750 年的最低估计和卜凯 20 世纪初的研究结论(2.2 磅砂糖加上一些用其他方法加工的糖,还有一些在糖产区被吃掉的粗糖)之间的
124
大部分差距。这一人口因素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在这样一种消费下降出现的同时没有引起对生活水平下降的大量议论;如果消费在任何具体地方并没有下降多少,那么任何人都不会有理由注意到有所减少。这种人口增长分布模式与欧洲的情况形成鲜明对照,在欧洲,至少在 1750 到 1850 年间,人口一般来说在大陆(还有爱尔兰)比较富裕的地方增长最快。

但人口趋势只能部分地解释消费的分流。例如,棉布的消费几乎不可能像糖的消费那样在地理上集中;有证据证明华北的棉花产量发生了绝对下降。(即使如此,这里的地方消费也可能只有很少下降或没有下降,而只是华北以前输出到长江下游的棉花减少了。在附录 F 中进一步讨论数据及其限制。)当然,1750 到 1900 年间欧洲的消费不只是避免了下降——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增长得更快,尽管主要是在 1840 年以后。

如我们在第 4 章将看到的,这些新的“日常奢侈品”的贸易结构可能在重要的方面有所不同。在中国,糖、烟草和茶绝大多数在国内生产;它们的贸易

① 这种强烈的集中通过以下几方面表现出来:地区性烹调风格、我们所了解的糖的水运路线、这些地方讲述糖的重要用途的野史资料,加上其他地方相对缺少这类记述。如果这些地区在 18 世纪中叶确实消费了中国所有的糖,如果全国的消费量是我在前文估计的一系列数字的最低点,这些区域的人每人每年就必须消耗 10.7 磅糖——一个相当高的数字,但考虑到有人估计台湾产糖乡村本身的人口每年吃掉 10 磅糖(Shepherd 1993:482 注 78),这并不是一个完全不合情理的数字。

② 根据 Skinner 1977a:213 计算,用 Skinner 1987 的研究结论作了调整。

是高度竞争性的,参与者有很多相当小的商人,利润率也相当低。^①而且这种贸易并不为政府提供很多的税收。所以没有特别强有力的利害关系去推动这些商品的消费增长,而同时政府内部却有官员在积极地阻止它们。^②在欧洲,我们也发现了一些官员和伦理学家尝试阻止这些新的品味(日本、奥托曼帝国和印度在这方面也同样)。但欧洲还有想要鼓励消费增长的非常强有力的利害关系:渴望获得税收的官员,加上为提高生产能力和获得特许经营权进行了巨大投资的商人和殖民地种植园主。即使如此,直到19世纪中期价格大幅度下降以前,大陆欧洲大部分地区和英国比较贫困的地区消费增长一直缓慢。

有人认为英国人喜好甜食可能部分是由于其他食品烹饪过于简单,反过来说,例如中国,糖的消费较低可能部分是由于中国复杂的烹饪技术,加上它有众多的其他甜味调料和调味品。^③但是,考虑到我们估计的18世纪中国糖消费量的高数字,这种解释的分量不可能太重。糖从药物到大量用作“调味品”的转化在中国相当成功,这类似于敏茨认为所有阶层的欧洲人都学会了喜欢糖的那个阶段;从大量应用和高度喜爱的“调味品”到主要的碳水化合物的转化则从来没有出现。而对于这一转化来说,最重要的差异与品味和分配的关系可能要比与生产、价格和殖民地的关系要小。^④

仅有爱好不能维持“流行奢侈品”的无限增长,部分是由于这些作物不可避免地要与其他用途竞争土地。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糖生产的发展主要出现在糖不与其他粮食作物竞争的地方。台湾直到19世纪一直是一个人口稀少的边疆地区,那里甘蔗和水稻的种植携手并进——大陆无需为得到它的糖而输出粮食。在广东,17和18世纪,种植越来越多的甘蔗的同一批农民中有很多成为生产甜薯和花生的先驱(通常是开垦那些以前认为不适于耕作的山地);因而他们也形成了自己的粮食供给。在其他一些例子中,甘蔗种植占据了曾经用于种棉花的耕地,从比较价格和与孟加拉及长江三角洲的贸易增长的角度看,这种转变是有意义的。^⑤但在中国,那种不必减少粮食生产就可以使糖(或茶叶,或烟草)的产量保持增长的地方越来越少。而如我们以后将看

① Ng 1983:99,157;Ng 1990:305—306。

② Ng 1983:184—186,190。

③ Daniels 1996:87;Mintz 1985:190。

④ 当然,不一定到处如此——例如,人们可以很容易地设想,在印度一些地方,食品交换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受到社会的规范,这些方式对影响糖在大部分人口中的使用(或不使用)可能极为重要。但在中国和欧洲的案例中,对于一种可能深刻影响对糖的接受的文化因素来说,没有出现这样明显的同类现象。

⑤ Mazumdar 1984:80,284—285,287,372。

到的,1750到1900年间,棉花(或许还有烟草)产量在一个关键地区——华北——可能有引人注目的下降,因为迅速增长的人口需要更多的土地种植粮食。

在最坏的情况下,口粮对耕地的需求阻止了现金作物产量无限度的继续其16到18世纪的迅速增长。而如果生产不能保持增长,人均消费就会下降,因为中国的人口在1750到1800年间大约翻了一番。然而相反,即使在现代农业投资出现之前,中国的粮食生产也明显地确实与人口增长保持了同步。^①因而看来可能的是,粮食生产至少排挤了一部分其他作物的生产,特别是在华北,那里的人口增长特别迅速,单位面积土地产量的提高则相对困难。

然而,欧洲几乎所有的糖、烟草和咖啡都在殖民地生产,茶叶则用来自美洲的白银购买;因而在某种意义上,成瘾性食品的消费增长对欧洲粮食供给的压迫并不像在中国那样严重。欧洲需要的大部分棉花也来自殖民地或前殖民地。¹²⁶

此外,特别是对英国来说,糖消费的增长恰逢其时。如我们在第5章将看到的,18世纪后期英国农业达到了一个临界点,在这一点上,如果不出现重大的技术突破,产量进一步的增长几乎是不可能的,而这种突破甚至到19世纪中叶都没有开始;即化肥的大量应用(首先是开采的磷酸盐和进口的海鸟粪,然后,到20世纪,是合成肥料)。同时英格兰人口飞速增长,使国内的谷物供给首次出现了不足;而解决这种短缺的长期办法——北美的大量谷物——还要再等几十年。在这之间的半个世纪,也是或多或少工业革命的半个世纪,英格兰从联合王国其余地方输入了更多的谷物,但这也不是一个完美的解决办法。^②卡路里明显不足,很多穷人还要拼命适应新的工作节奏(包括在工作时吃午餐),对于糖向英国饮食的核心渗透,这是一种理想的环境。在东亚,糖在确立自己的重要调味品地位方面可能做得同样好,但由于粮食产量确实跟上了人口增长,糖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成为敏茨所谓的“碳水化合物核心”的组成部分。

殖民地的生产结构也对种植园主产生了巨大压力,迫使他们在农产品出场价格下降时增加糖和烟草的生产——中国的蔗农很少出现这类情形,因为他们也种植生活所需的作物。殖民地的种植园在它们具体生产的现金作物方面通常专业化程度极高;这意味着它们需要输入其他的一切——从食物到工业品到它们使用的奴隶劳动力本身——所以正是在其产品价格较低的年

^① 这种理论的经典描述见 Perkins 1969。

^② Thomas 1985a:142—147。

份，它们需要偿付相当高的现金支出。（对此我们将在第6章作更多论述。）

殖民地种植园的极端专业化性质可能会削弱前面刚刚叙述过的观点：在海外生产的成瘾性食品不像中国糖和烟草产量的增长那样与稀缺的欧洲农田发生竞争。用工业品（它们更多地使用欧洲充裕的劳动力和资本而不是它的相对稀缺的土地）交换糖并不与国内的食物需求发生冲突；当工业品（或在亚洲获取的商品）用来交换生产新大陆的产品的非洲奴隶时同样如此；用新大陆的白银购买中国茶时也同样如此。但当新大陆的种植园必须靠欧洲供
127 养时就完全不同了。如阿贝·雷纳尔（Abbé Raynal）指出的，“为了喂饱美洲的一个殖民地，必须耕耘欧洲的一个省”。^① 或者至少对法属加勒比海是如此。

但英国还有别的新大陆殖民地——在北美——它们生产的谷物、肉类、木材和鳕鱼有剩余可以卖给产糖的殖民地。北美殖民地反过来又向英国购买工业品。这样英国就通过这条路线有效地把充裕的劳动力和资本——不是稀缺的土地——转化成为糖，正如它通过非洲的奴隶贸易，以及通过直接把工业品卖到加勒比海所做的一样。（巴西的甘蔗种植园主要消费巴西国内生产的食物。因而，像英国一样，葡萄牙不需要从欧洲运出大量食品；但它并没有也像英国那样垄断其殖民地贸易。）第5章和第6章我们将更多地论述土地短缺和生态压力。目前值得注意的是，18世纪晚期在英国以外的欧洲，人均糖消费的停滞——这使大陆很多地方看起来更像中国而不像英国——可能部分反映了类似的制约；而对英国糖消费引人注目的增长的部分解释可能就在北美。

耐用消费品和奢侈的“物化”

对于比较耐用的物品——家具、银器、亚麻布等等来说，存在一种内生的欧洲优势看起来更为合理。但在这里也有理由小心行事，特别是与中国和日本比较。

由于可用资料的差异，进行这些比较特别困难；举例来说，在亚洲没有与欧洲的遗产清单对等的东西。尽管如此，精英阶层消费的变化，比方说在1400到1800年间，似乎在许多社会中大致相似。在欧洲、中国、日本和印度，人们都发现，室内用具、精致的服装、饮食器具和今天被称之为“收藏品”的东

^① 引自 Braudel 1982:226。

西的数量和品种在最富有的人口中有引人注目的增长。展示物质财产成为一种更重要的确定地位的因素,而同时,要使消费与不由财富规定的等级身份相符的反复努力仅取得了有限的成功。同时私人侍从作为一种地位象征的重要性下降了,很多旧的上层家庭发现他们没有财力通过消费继续进行地位竞争。但我们的视野需要超越这类非常普遍类同之处。

奢侈消费的发展在任意两个社会中都不会完全相同。本书也不可能考查消费内涵在不同社会之间变化的所有方面。对我们来说,有关系的是,为地位竞争而使用商品的方式发生了质的改变,这种改变在不同社会中相似到足以推动使用量的同样增长。 128

物品的拥有和交换在很多社会中都是表现地位的一种重要标志。这使人们轻易地认定,拥有巨额财产的人数的增长只不过反映了一种对财产积聚的普遍的刺激,这种刺激以前受到骄傲自负的上流社会或疲软的生产力的阻挠。按照这样的表述,对更多奢侈品的期望是永恒并无需解释的;变化的只是生产及收入的分配。

另一方面,可能有人认为早期社会中由少数人拥有的奢侈品太少因而关系不大,认为现代早期阶段非必需品的消费高潮标志着一种激进的“唯物主义”的新生活方式。这后一种说法,就其把现代无限需求作为创造的而非天生的现象来对待这一方面说,是非常重要的;但它也存在问题。对我们的目的来说最严重的是,它可能轻易地不知不觉陷入一种二分法,把社会分为两种,一方面是由“商品”和“市场”决定社会关系,交换被认为是对利益的个人主义的追求;另一方面是由社会关系调节经济,社会地位决定消费,人们关心的是互惠关系。^①在把这类二分法应用到历史中时,结果往往是在首先成为“唯物主义”的欧洲与地球其余部分之间划出一条分界线,后者由于还没有越过这条界线,不得不从外部引进“商品”、“唯物主义”和“经济人”。

但最近的著作作用更多的细微区别表述了这些论题。在一个有启发意义的陈述中,阿尔琼·阿帕杜拉(Arjun Appadurai)建立了一个连续统一体,它一方面从“时尚体系”出发,另一方面发展到“配给”或“特许”体系。在时尚体系中,为数众多的能代表地位的商品可以由任何人拿足够的钱来购买;金钱向地位完全而直接的变形主要受不断变化的社会惯例的制约,这些社会惯例使一些消费者行为“庸俗”,另一些消费者行为“优雅”。在配给体系中,某些极为重要的、通常是神圣的物品只能由那些社会“特许”占有它们的人合法拥有和交换。在这两种情况下,社会地位和商品的拥有及交换都是互相构成

^① 例如 Polanyi 1957。

的,但却通过相反的方式:

129

在地位体系受到一个稳定的商品域中有限的等值物及交换保护和复制的地方,在一个时尚体系中受到限制和控制的东西是在一个不断变化的商品域中的品味,还有对完全的可交换性和不受限制的拥有权的错觉。禁止奢侈的法律构成了一个中间性的调节消费的策略,它适用于致力于在商品膨胀的背景中展示稳定地位的社会,如印度、中国和前现代阶段的欧洲。^①

这一描述避免了把社会完全归入一个或另一个阵营——事实上,阿帕杜拉甚至在当代的西方发现了某些“配给”商品——因而阐明了我们在所有的社会中都既有“经济”也有“文化”。^② 它也防止了把消费归类于——像人们有时所做的那样——一种假想的西方独有的“个人主义”,从而避免了把强大的集团视为与消费需求增长必然对立的因素。

尽管消除了过于简单的二分法,阿帕杜拉的描述仍然把时尚和配给之间的差异突出显示为地位和消费之间相互影响的独特模式。而且,它们之间的差异阐述得足够清楚,使我们能够看到向一个或另一个方向的转化将会对经济发展产生怎样巨大的影响,也使我们能够找到对这类转化的解释。

一个由于容许更多的人购买索价高昂的商品而逐渐削弱的“配给”体系意味着对市场的依赖增加;因而意味着将有一种新的能代表地位的商品入侵(或许从一个“异国的”来源)。一个体系越是接近于成为一种时尚体系,人们更新他们的个人物品储备也就越快,从而使需求不断扩大。此外,配给体系通过明确的定义,阻止了一个地位较高的人群的消费被低于他们的人群模仿;而在一个多少接近于时尚的体系中,上流社会的主要反应不是禁止这种模仿,而是转向新的商品(或展示新商品的方式),同时把旧商品指斥为“庸俗”。因此,这种体系引起每一个阶层中那些力图维持社会等级的人,和那些力图迈上(或跳越)社会等级的人对商品的不懈追求。当印刷的书籍和雇用的家庭教师帮助人们继续这种竞争时,这种体系也可能导致品味的明确标准的诞生,然后是它们的互相修正。

即使这样简要的概括也给了我们一些可以探寻的具体的东西:具有社会意义的商品品种的增加和它们变化的速率;可以拥有它们的人数的增加,可

^① Appadurai 1986:25(着重号为原有的)。

^② 另见 Sahlins 1976。

以从陌生人那里获得它们的范围的扩大;模仿性消费的急剧增长和供不同阶层的人使用的不同种类的地位性商品的增殖;还有对各种商品“合宜的”、“有品味的”应用方式的讨论激增。

所有这些现象在西欧各种各样的都市化地区都有最充分的文字记载:文艺复兴时期的(北)意大利、黄金时代的西班牙、荷兰、法国的一些地区、英格兰。每种情况都包含了上层阶级家庭及其意志的一个转变。在乡村,较适于军事防卫和成队的家臣侍从表演的城堡(例如,有一个占据中心地位的宴会大厅,里面有一些极长的凳子)让位给拥有更多房间(和走廊)的庄园,这些房间使个人可以不受干扰地独处,有更多的设计体现出个人舒适的特征,有非常多的装饰。^①更多的家庭需要不止一处住宅。有时这是由于中央集权的政府要求一年中至少有部分时间在宫廷露面,有时是由于更多的农村显贵在城市中有足够的生意,因而需要在那里有另一处住宅,还有时或许是因为自我观念的一种改变。看来与其说一个人是要为他所属于的那个王朝奠定不朽的基础,不如说他更想要建筑一套住房(通常不是一个人的第一套住房)供自己使用和享乐,并据此确定房屋的位置和风格。^②城市中的房屋可能远不如乡村房屋那样壮观,但建筑的数量也在增加,日益坚固,并越来越为了满足一些新的需求而设计,这些新需求包括舒适性和私密性,还要有一个场所供展示那些象征着一个人的财富和品味的财产。^③皇宫建筑可能在这一倾向中领先,但它很快就传播到富裕贵族、商人和其他阶层。

与房屋本身同等重要的——或许更重要,特别是在城市区域——是房屋内部物品的增加。镜子、钟表、家具、带框的油画、瓷器、银器、亚麻布、书籍、珠宝和丝绸服装,可以列出名称的只是少数项目,它们都日益成为富有的西欧人“必要”的地位象征。此外,变得越来越重要的不仅是这些商品的数量和做工,还有它们的“时髦”;^④因而奢侈收藏品的文化价值比它们的物质磨损下降更快,新的奢侈品消费越来越不受现有的储存的阻碍。很多作家悲叹这些倾向吸干了社会财富,使贵族家庭破产,破坏了更为重要的地位和人性价值尺度。在整个欧洲,政府和宗教机构至少曾断断续续地尝试阻止这些趋势——但几乎没有成功过。人们日益通过无休止的财富积累来证明自己。

但这种“消费社会”的产生不是独一无二的。克鲁内斯(Craig Clunas)指出,中国明代(1368—1644)上层社会的住宅中也充斥着越来越多的绘画、雕

① Hoskins 1953:44—59; Stone 1979:169—170,245—246。

② Sombart 1967:97,100—105。

③ Schama 1988:311。

④ Braudel 1982:311—333。

塑、精美的家具等等。此外，他还发现——正如在欧洲一样——对于一个具体的环境、个人或目标来说，拥有正确的奢侈品种类变得越来越重要。因而，举例来说，雕刻精美的床被标明是适用于男性还是适用于女性，在同样的专门作用出现于欧洲之前就已经在中国开始了；^①真正富有的人家还可能会在一年中的不同季节使用不同的床和椅子。^②同时，名声最高的奢侈品——以出自伟大的艺术家之手而著名的作品——日益成为商品；也就是说，任何人只要有足够的钱就可以得到它们，而不再是只在私人之间流传。随着有钱人越来越能够通过消费（而不是通过买官、或通过土地、或使其子女受教育）改变地位，公开出版的参考书开始就如何正确地评价和展示这类物品提供建议。一些书籍告诉旧的上层人物怎样通过品味重现他们的地位，即使“市侩们”可能有更多的钱购买奢侈品；另一些手册以暴发户为对象，建议他们以正确的方式获得和展示这些物品。

这些论说——其中一篇特意以“赘物论”为标题——开始出现的时间略早于欧洲的同类文章；在整个明代新的文章不断写出，旧文章则反复重印。^③尽管明初政府发布过各种各样的禁止奢侈的法律，试图巨细无遗地控制不同社会群体的服装、宴会器皿等等，但这些法律看来没有起什么作用，并很快就变得陈腐不堪不切实际；1500年以后只增加了一个新条目，尽管新的奢侈品和新风尚层出不穷。^④而同时，在17世纪的意大利和西班牙，禁奢法继续发布，甚至在诸如荷兰和英格兰这样的“中产阶级”地区也在进行振兴这类法律的努力。^⑤

室町和德川时代的日本都有类似的证据可以引用，那里来自伦理学家的抱怨和一系列无效的禁止奢侈的法律都列出了被“错误”阶层的人“不适当”使用的各种各样的物品。到18世纪，这些文献中包括了对农民住宅中的“金、银和象牙”饰品的指摘，^⑥以及对武士甚至大名为了尽力赶上富裕平民的消费习惯而堕落的悲叹。^⑦至少有一位欧洲消费至上主义学者由此作出结论说，中国和日本的发展看来像西欧同时代的发展一样醒目。^⑧

印度的证据较为模糊。可以肯定，莫卧儿王朝时的印度奢侈品消费曾有

① Clunas 1991:54—55.

② 《金瓶梅》692.

③ Clunas 1991:8—39.

④ 同上,151.

⑤ 同上.

⑥ Hanley and Yamamura 1977:89.

⑦ Yamamura 1974:41—47.

⑧ P. Burke 1993:148—161,特别是158.

明显增长。许多欧洲人——其中很多人刚从伦敦、巴黎或阿姆斯特丹来——提到，印度的城市中陈列着令人眼花缭乱的供出售的奢侈品。^① 当 18 世纪莫卧儿帝国的分裂使各个地方性的宫廷更为重要时，这些首都通常成为模仿上层消费的区域性中心，与欧洲的多重宫廷差不多。^② 实际上，政府官员额外津贴的商品化扩大，部分刺激了奢侈品消费的增长（见第 4 章），看来是这一时期印度经济的主要推动力之一。^③

然而，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找到与中国、日本和欧洲由很多阶级广泛参与的新兴的“时尚体系”同类型的证据：例如，指导如何正确和有品味地使用商品。尽管商人和“供职绅士”在 17 和 18 世纪的印度变得更为重要，^④ 但奢侈品需求似乎非常严重地集中于贵族中。^⑤ 相反，印度比西欧或东亚有更多的证据证明，旧的“配给”体系保留了许多权力，在这种体系中，地位在分配一整套相对固定的专用品的使用权时起了一种相当稳定的作用。^⑥ 因而，尽管在印度肯定存在“消费至上主义”，但其进展看来可能比在东亚或西欧都要小。

如果我们把“奢侈的物化”视为一种改变，它取代了私人侍从的规模而成为一个人的地位标志，看起来是合乎逻辑的。最晚从 16 世纪起，在中国和西欧，有人身依附的仆人和佃农的人数都出现了急剧下降，加上上流社会的逐渐城市化，使得维持大批侍从更为困难；尽管日本没有经历类似的法律变化，社会和经济力量却向着同一方向推进。应该注意的是，私人侍从之中心地位的衰落，也使上流社会更可能对民众的消费不满。当各种各样的仆人充分融入其主人的家庭中时，至少让比较常露面的仆人穿上华丽服饰成为上流社会家庭证明自己的财产的一个方面；但一旦仆人成为地位低下但却独立的人时，他们做的任何展示都可能被指责为不合适的甚至危险的出风头。^⑦ 因而在中国、日本和欧洲，指责民众消费的文献汗牛充栋，既表现出经济变革，又表现出这些地方的上层社会在多大程度上不再主张直接拥有他们的下人——从而表现出他们自己在多大程度上逐渐用更多的商品来标志人际地

① 例如 Tavernier 1925, I, 52; Raychaudhuri 1982a, 180—181; Raychaudhuri 1982b, 266—267; Bayly 1983, 206, 266.

② Bayly 1983, 201—204; Bayly 1989, 51.

③ Bayly 1983, 201—202, 204—206, 266.

④ 同上, 466—467.

⑤ 同上, 206, 268.

⑥ 例如, Dumont 1970.

⑦ 实例见 Stansell 1986, 164—165。另见 Adshead (1997, 25—26) 的一个稍有不同的解释，但有相同的实际意义。

位关系。

在印度正相反,依附劳动显然仍然相当重要,即使对于如何重要还有争论,^①有官职的贵族和农村柴明达尔都受法律迫使拥有许多侍从。^②实际上,许多“贵族气派”的奢侈品需求可能反映了送礼给受宠的侍从的需要。利用有固定的象征意义的昂贵礼物保持这种关系看来对印度的社会和政治竞争仍然是重要的,^③但与为较严格的个人用途而购买相比,这大概对“时尚”的促进作用更小。

印度上层社会相当城市化,可能比中国程度更高,尽管或许不如西欧,肯定不如日本。然而,外国观察家常常震惊于在印度甚至大城市都与巨大的营地有多么相似,成群结队的人围绕在他们所侍奉的人周围。^④如果这种私人仆役和依附关系在事实和名义两方面都比在中国和西欧更为强大,我们就可以预期通过“时尚”向社会竞争的转化更少。城市奢侈品市场在印度也不会像在中国、日本和西欧那样稳定发展。如贝利(Bayly, C. A.)指出的,贝拿勒斯和勒克瑙在1780年呈现出奢侈品需求的巨大集中,但它们在这方面与1680年的德里和阿格拉并没有很大的差异,当时莫卧儿的权力和贵族官邸都更为集中。^⑤

同样的观点甚至更强烈地适用于东南亚。在这里,我们也发现1450年前后到1650年间出现了令人感兴趣的“奢侈的物化”迹象,特别是在城市中,某些奢侈品对昂贵的原料像那些到处都有的原料一样滥用。尽管如此,并不存在一种以欧洲或东亚的规模向“奢侈的物化”和“时尚”的持续转变。人身依附仍然是主要的社会组织原则,^⑥甚至最大的城市也是宿营地的聚集地,成群结队的人围绕在他们的庇护人周围,在城市中构成了一个或大或小的独立村庄。(与印度不同)几乎所有的非宗教建筑都相当简陋。这种安排的方方面面都在强调有依附者的人的威望高于有财产的人的威望。^⑦

因而,看来中国、日本和西欧彼此之间的相似程度高于它们中任何一个与印度或东南亚之间的相似程度;如果我们把它们与东欧、中东或非洲的社会相比,可能同样是如此。或者,换一种较为谨慎的说法,至少中国和日本的

① Perlin 1979, 1985; Washbrook 1988.

② Moosvi 1987: 175-176; Bayly 1983: 199, 266; Raychaudhuri (1982b: 181)关于大规模的侍从。

③ Bayly 1983: 266.

④ Tavernier 1925, I: 105; Hambly 1982: 438-442.

⑤ Bayly 1983: 199.

⑥ Reid 1983: 199.

⑦ Reid 1993: 87.

例子显示出,欧洲新精英们的消费至上主义在性质上并不是独一无二的。但我们也必须考虑程度上是否存在重大的差异。

住房的发展完全不同。在欧洲很多地方,宫殿、城堡、市政厅和其他有钱人住宅的建筑热潮似乎一直继续到18世纪末(尽管有周期性的上升和下降)。而在中国和日本,宫廷建筑的兴盛伴随着17世纪的政治变动(分别为清王朝和德川幕府的建立)出现而不是更早。^①至少在日本,真正坚固的住宅建筑的推广显然是16和17世纪的一个发展。^②尽管16世纪到18世纪房屋质量有一定改进,但差异看起来不如欧洲那样明显。也没有暗示出居室作用观念发生了基本变化。^③在中国,帝国晚期居室用途改变得也相当少。例如,住宅仍然不仅是吃饭、睡觉、做饭的地方,而且也是一个重要的工作和宗教活动场所。它继续被认为(至少在上层社会中)属于许多代人所有(包括有祭坛和牌位在宅内的祖先),而不只是表现现时住户的成就和品味。由于住宅的观念没有很大改变,建筑风格的改变也远没有欧洲那样大。^④

此外,在中国和日本受欢迎的建筑材料仍然都是木材,两地的建筑高潮都是在18世纪最适合做立柱的木材开始用尽时逐渐停止的。^⑤(有一些迹象表明石材在建筑中的作用增加了^⑥,但这仍然不常见。)例如,在日本繁荣的畿内地区,至少从18世纪中期起,城市和乡村建筑工人的工资与绝大多数其他行业的工人(包括农业工人)相比是下降的,这强烈地暗示对新房屋的需求并不特别旺盛。^⑦这种建筑高潮的衰退并不代表一种全面的经济迟滞,也不意味着没有使用石材的能力。至少在日本,对木材的偏好更多地是为了适应气候和地震的威胁;实际上,日本房屋能够轻易“晾干”,似乎减轻了潮湿气候中的呼吸系统疾病,可能对城市中的日本人相对于欧洲人比较高的预期寿命做出了贡献。^⑧正如白馥兰(Francesca Bray)所指出的,中国人有很多宇宙观和礼仪方面的理由喜欢在住宅建筑中使用木材而不是石材,尽管他们知道怎样使用石材,尽管木材在明清两代变得日益昂贵;^⑨这些偏好背后的某些信仰也在日本广泛流行。无论这些偏好有什么理由,它们都意味着在东亚一个人

① Menzies 1992a:64;Osako 1983;Totman 1992:22。

② Hanley 1997:25—35。

③ 同上,36。

④ Bray 1997:59—172,特别是71页。

⑤ Totman 1992:23;Totman 1995:84;Osako 1983:132—135;Menzies 1992a:64,69。

⑥ 实例见 Perdue 1987:109—110。

⑦ 高藤修 1978:98。

⑧ Hanley 1983:188—189。

⑨ Bray 1997:77。

的住宅要“赶时髦”需要的投资少得多；在东南亚甚至更是如此。^① 在印度的上层社会中住宅建筑的巨额投资（和石材的使用）可能更常见，但我不知道用什么办法衡量其程度。

但其他花钱项目中的差异更难查明，部分是由于在这些巨大的单位内部有如此多的不同：至少存在阶级和地区之间的差异。尽管我们对哪一个都无法作彻底的分析，但还是能够有一些起点。

至少在欧洲的一些地区，即使地位相当低下的人也购买“奢侈品”。不仅富有的商人和事业稳固的工匠师傅，甚至地位非常脆弱的学徒期满的工人都会买某些“奢侈品”：镶有金银纽扣的腰带、鞋子和背心，酿造和蒸馏的饮料，咖啡、茶、糖等等。事实上，分享和/或显示这类商品成为城市“平民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② 梅迪克认为，手工业者的总预算中花在这类“小奢侈品”上的部分比其他任何社会群体都大。^③ 他还收集了欧洲农村手工业者同类行为的证据，并且不仅是在英格兰和荷兰；他引证了诸如此类的例子：萨克森农村织带工人为了表现自己与农民的不同而模仿城市的时尚，符腾堡的手工业者，用一句当时的话来说，除了马铃薯什么也吃不起，“但如果他们被迫放弃早咖啡，他们就会认为自己过的是非人的生活”。^④ 仅是确认这类消费的存在就很有意义，而其中一些（例如咖啡和茶）肯定是在16到18世纪新出现的。但仍然不清楚的是，在平民中有多少“奢侈”消费，以及它有多新；非精英的“奢侈”消费甚至在其总量还相当小时，如我们在茶和糖的情况中所看到的，就可能招致来自他们“上一阶层”的不成比例的批评。不是所有的新消费习惯都标志着总需求的永久增加：例如18世纪初英格兰杜松子酒消费引人注目的上升，在18世纪下半叶出现了几乎同样戏剧性的下降。^⑤

136 农民的需求仍然难以弄清，可能与农村手工业者的习惯相当不同。^⑥ 无论如何，德夫里斯对1550—1750年弗里斯兰省的研究确认，至少在这个异常繁荣的阶段，农村小农甚至佃农购买了品种繁多的非必需品。他还指出，高级家具和其他木器、餐具、室内装饰品及其他一些商品的总量随着时间的推

① Reid 1988a, 62—73.

② Medick 1982, 86, 90—95.

③ Kriedte, Medick and Schlumbohm 1981, 64—65, 69; Medick 1982, 90.

④ Medick 1982, 94—95.

⑤ Medick 1982, 103--104.

⑥ 注意 Medick 提到，萨克森农村织带工人希望自己看起来与农民不同，而不是看上去像境况较好的农民；还要注意的是，Medick 认为，在土地所有权的缺乏对农村社会其余人至关重要的情况下，农村手工业者采用种种不同的新消费方式作为显示地位的方法，并不适合于农民。

移有实质性的增长(尽管并不均衡)。^①(当然,人们会预期即使在购买率的增长放慢时,非常耐用的商品的储备仍会有某些增长。)然而同样重要的是,某些类型的储备看起来并没有增长很多——最值得注意的是纺织品,这是这一时代最大的“产业”部门,也是最终的工业革命的领头羊。人们没有拥有较多的纺织品特别令人吃惊,因为1550到1750年间大多数布匹的价格与其他商品价格相比是下降的。^②此外,消费品总量比生产资料总量增长缓慢。^③因而,总的说来,如德夫里斯本人所说,在这一繁荣时代,无论是农民需求的增长幅度还是其实际构成看来都不能完全正确地解释工业革命^④——特别是棉纺织品的需求中有很多来自欧洲以外的地方。^⑤

虽然如此,欧洲民众的消费需求与其他地方的需求相比,可能大到足以对解释欧洲最终与其他“先进”经济分流起某些作用。遗憾的是,我们缺少其他社会中真正可以比较的财产记录。然而,我们可以通过观察其他地方的非精英阶层购买非必需品的能力是否较小,从而对是否可能存在较大的差异作出部分推测。

我们可以用来比较不同社会收入分配的证据同样参差不齐令人苦恼。尽管如此,我们已经掌握的东西与琼斯的观点背道而驰,他认为收入——以及由此而来的对“日常”奢侈品的有效需求——在欧洲远比在亚洲的大经济中分配得更为均匀。^⑥在以印度为一方,以中国、日本和西欧为另一方之间可能存在一个真正的鸿沟,但我们拥有的极少的证据表明在这后三个区域间并不存在巨大的差异。

对于中国来说,对20世纪之前的收入分配惟一真正的数量估计是张仲礼所做。张所谓的19世纪中国的“绅士”——广义的规定也包括了最富裕的商人家庭——约占中国人口的2%,获得了约24%的国民收入。^⑦

我所知道的现存的全欧洲数字中没有可供比较的,但我们确实有当代人对1688、1759和1801—1803年英格兰及威尔士收入分配的估计。按照林德尔特和威廉森(Peter Lindert and Jeffrey Williamson)的修正,这些估计显示出1688年2%最富有的人口(包括王室家族)占有国民收入的19%;1759年

① DeVries 1975:220—224。

② 同上,218—220。

③ 同上,234—235。

④ 同上,236。

⑤ Braudel 1984:575。

⑥ Jones 1981:110, Jones 这一观点的证据实际上来自印度,对于那里,如我们以前提出的,他可能完全正确,但他对“亚洲”和“欧洲”的笼统的谈论却要无力得多。

⑦ 张仲礼 1962:326;比较一般的论述见 296—331。

22%；1801—1803年23%。^①当然，“英格兰和威尔士”这个单位只是欧洲一个小而相当富裕的局部地区，前引中国的数字则涵盖了从中国的伦敦到中国的保加利亚。显然中国远为平均的地权分配——土地在欧亚大陆的两端始终是最重要的生产性财产——意味着一个更严格相配的比较完全可能显示出在中国存在更大的收入均等。土地所有权的报酬在中国人口中肯定比在欧洲人口中分配得更为平均，即使欧洲的租佃市场减少了使用土地的机会的不平等，以至工作的机会像在中国一样广泛均衡地分布。98%以下的人口占有的收入份额当然只是总收入分配中一个非常偏斜的画面，对于购买力的分配甚至是一个更不适当的引导，^②但是作为我们仅有的量的指标，它相当值得注意。斯当东根据他1790年代从北京到广州的一次长途旅行作的评论（与斯密和马尔萨斯的评论不同）也令人吃惊，他说他没有看到严重的贫困。^③最近对长江下游农民预算的一个重建认为（根据零星的证据），17世纪一个“典型”的农民家庭要把其总收入（现金和实物）的55%花在粮食上，两百年以后是54%。^④在18世纪晚期的英格兰，基本的卡路里通常消耗了农民和手工业者收入的同样比例。^⑤中国的这一研究几乎肯定少计算了非粮食消费，从而使这一对比向不利于中国的一面倾斜。^⑥

138 欧洲和东亚经济中最大的非农业部门都是纺织业，纺织品消费顺理成章地成为工业化过程中首批可以增长的消费项目之一。尽管我们的资料参差不齐，它们还是显示出欧亚大陆两端纺织品的生产和消费水平旗鼓相当。

对于中国首要的产布区——长江下游——可以用我们估计广东糖产量时用的同样的方法对原棉和丝的产量作出估计。实际上，在这里使用这种方法更准确，因为我们的土地利用资料比我们掌握的广东的资料好得多。这一估计显示出，仅长江三角洲南部11个商业化程度极高的州府平均每人就生

① 据 Lindert and Williamson 1982:393,396—397,400—401 的数据计算。

② 能够购买非必需品的收入数量不可避免地要比总收入的分配均匀程度低很多。此外，财富不均使这一画面更为黯然，如同任何一个要把他每年收入中的一部分用来抵消其净财产负值的负债农民能够告诉我们的一样，中国和欧洲之间财产分配应该怎样比较我们差不多一无所知。

③ Staunton 1799,II:134,141。

④ 方 1996:93,97。

⑤ Phelps Brown and Hopkins 1981:14:1790 年代英格兰穷人家庭 53% 的支出用于粮食。

⑥ 方 1996。由于缺乏对农业工人收入的任何独立估计，方的计算是根据农书记载需要提供给这类工人的东西，并计算了 5 种基本消费品的价值——粮食、其他食品、燃料、住房和服装——和家庭生产开支。他的资料遗漏了不常见但却非常大的花费，如一生中的各种典礼、珠宝（尽管很明显甚至贫穷妇女通常也会有一点）、娱乐和杂食（即赶集路上买的小吃），以及任何要用钱购买的物品，这些钱是由，比方说，一个从事织布业的妻子所挣，而没有被负责雇用、监督的人察觉，还有支付给农业工人本身的工资。

产了将近 16 磅净棉以及约 2.0 磅高质量的生丝。^① 一些棉花未经纺织即输出到岭南，但也从华北输入原棉。到 1850 年，江南成为一个原棉净输出区，因为岭南的需求保持上升而同时从华北的输入却在下降，但很难知道具体的数量，不过在 1750 年时任何净输出都应该少很多。^② 因而，我假定江南纺织了它的全部原棉，除了用作棉絮的以外；20 世纪人均棉絮用量为 1.3 磅^③，18 世纪可能差不多同样多。这样，估计长江三角洲纺织品产量人均 14.5 磅棉织物和 2.0 磅丝织物看来似乎是合理的（尽管或许有点高）。

作为对比，1800 年——当时纺织技术的变革已经健康起步——联合王国的棉、毛和亚麻产量的总和为人均 12.9 磅^④。（由于其他种类的织物更重，在比较不同地方的产量时用重量作为计量单位有利于生产较重的织物的地方。但如果我们把各种织物都换算成面积，就会有利于江南，因为一磅棉布比一磅羊毛织物会有更大的面积。）遗憾的是，我们不知道长江三角洲输出了多少布匹——比重完全可能高于联合王国的比例（约占产量的 1/3），^⑤ 从而使这一区域的布匹消费降低到低于联合王国的水平。但中国和欧洲生产力水平最高的地区人均织物消费即使大致相等也相当有启发性，特别是当我们记起长江三角洲这些州府的人口几乎双倍于联合王国时。此外，至少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初，中国的棉布服装似乎远比英国生产的同类服装更为耐用。^⑥ 遗憾的是，中国和欧洲的资料都非常参差不齐，产量数据在地域上过于分散，使我们无法集中注意几个重要地区。这方面的一个例外是丝，长江下游的丝产量可能占了中国产量的一半多，或许高于 3/4。^⑦ 因而总产量可能低于人均 1 磅——远非棉那样重要，但对于一种奢侈织物来说也并非微不足道，并且仍然远高于欧洲的数字。

遗憾的是，用来推算我们的棉、糖、丝和长江三角洲棉花估计值的方法，适合于相对有限但高度商业化的区域，对广阔但商业化不足的区域却失灵了。在这种情况下，设定条件的小小变化就可以轻而易举地使我们对棉田数

① 所用方法和计算的具体情况见附录 F。

② 这些推论的理由在附录 F 中有进一步的解释。

③ 赵冈 1977:233。

④ Deane and Cole 1962:51,185,196,202。人口估计来自 Mitchell 1988:8-10。

⑤ Deane and Cole 1962:196,202。

⑥ 黄宗智 1990:137。

⑦ So(1986:81 页注 2)认为，1840 年以前广东提供了中国丝输出量的 1/4。输出对总产量来说远非一个理想的代表，但由于广东有这个国家惟一开放对外贸易的口岸，并且距中国主要的国内奢侈品市场比长江下游（其本身就是最大的奢侈品市场）远数百英里，看来它供输出的比重不大可能比江南更低；如果这是事实，则它的输出比例应该是它在总产量中所占比例的大致上限。

量的估计扩大双倍或三倍(让我们假设,从一个非常庞大的总面积的3%变成9%)。最好的替代方法可能是从后期的数字倒推回去。

1870年,捻军起义和太平天国起义被镇压之后不久,中国生产了大约18.5亿磅棉花;^①大致每人5磅多一点,尽管19世纪中期战争的后果使人口的估计数相当不可靠。然后到1900年,这一数字降到了约15亿磅,但从那时起又开始了一轮新的并且迄今为止仍在继续的上升。一个接一个考察中国的主要棉产区,显示出来的情况初看可能让人吃惊:中国1750年的产量并不比1900年低多少,因而人均水平要高出很多。

首先,重要的是要注意,1750年以后没有出现很多新的产棉大区。^② 尽管1750年以后长江中游省份确实增加了植棉面积,但它们从来没有成为非常大的产地。同时,四川和陕西一些重要产区在19世纪转向一种不同的现金作物——罌粟时,主要以牺牲棉田为代价;^③这种转变部分发生在1870年以前,部分发生在那以后。尽管整个中国零星分布着其他很多较小的产棉区,但1750年和1870—1900年最重要的产区都是长江下游和华北。

没有什么理由相信19世纪长江下游的棉花产量有很大增长。1750到1850年间这一地区商业化程度最高的部分人口增长很少,可耕地则完全没有增长,它的其余部分增长也不多。19世纪中叶的大灾难使人口和耕地大幅度下降;到1900年它们可能有所恢复,但直到1949年以后它们一直没有更大的增长。^④ 同时,1750年这一区域用于现金作物的耕地比重可能已经与它两个世纪以后所占的比重同样高——实际上,1930年代输入到这一区域的稻米大概要比1750年代少,^⑤这意味着一些耕地甚至可能倒退回口粮种植。如果说有什么区别的话,1900年的棉花种植面积也可能是由于1870年后有较多的耕地转向植桑而下降。尽管我们的产量数字非常零乱,但它们并没有显示出1750到1900年间长江流域棉花有任何明显的增长;也没有人会预期如此,因为没有发生重大的技术变革,(在人口没有增长的情况下)劳动的投入可能也没有发生大的改变。

这使我们注意华北,这一地区的资料特别稀少,种植模式可能比其他地区波动更大。一方面,里查德·克劳斯(Richard Kraus)认为,1900年山东和河北一共只有300万亩棉田,到1920年代增加到了500—600万亩(尽管军阀

① Kraus 1968:158—159、162—164、167。

② 赵冈,1977:23。

③ 同上。

④ Skinner 1977a:213;Ho 1959:244--247。

⑤ Skinner 1977a:234—235、713注30—32。

在这一区域造成了巨大破坏),而1930年代还要更高。^①(山东和河北是华北三个主要产棉省份中的两个;对第三个省份河南,我没有找到可用的资料。)这种增长可能是对以前水平的恢复;我们已经看到1870到1900年间全国棉花产量的下降,在华北,在经历了19世纪后期可怕的干旱之后,人们减少这种非常需要水的作物的种植面积应该是极为合理的。甚至克劳斯1920年代的数字也仅占这两省耕地面积的3%。

另一方面,赵冈引用的一条18世纪中期的资料说,河北省(当时叫直隶)的耕地中有20%—30%为棉田;这就是说仅该省就有1400万—2100万亩。^②尽管这看起来令人难以置信,另一条资料认为该省保定以南地区有20%—30%的耕地植棉则比较可信。^③那相当于直隶有700—1500万亩棉田,视这条资料所指地区的准确范围而定。^④即使山东和直隶的农田中有10%种棉,也会有1700万—2400万亩,即1900年数字的6到8倍。^⑤如果我们使用前文对其他地区所用的估计方法,接受官方对耕地面积不符实际的低估,采用人均口粮消费每年2.2石的数字,那么这也是两省能够用于非粮食作物的近似面积。^⑥如果我们改用黄的主张,即1750年代的耕地面积已经接近1930年代的水平,可以用于非粮食作物的面积膨胀至7000万—9000万亩,取决于我们假设每人的口粮消费是2.2石还是2.5石;而且棉花是华北最主要的非粮食作物。^⑦因而,有多种理由相信华北1750年种的棉花明显多于1870年或1900年。 141

其他资料也支持这样一种设定。山东和河北的人口在1750到1870年间增长了40%以上,到1913年达到80%左右,而耕地面积的增幅要低得多。珀金斯(Dwight H. Perkins)认为这一面积实际上根本没有增长。^⑧这让我感到太极端了——举例来说,这些省甚至1800年的森林面积还可能比1930年代剩余的森林多很多(见第5章)。但即使1750年代官方不可靠的土地数字也仅比1873年低4%,却比1930年代低了45%;这些“增长”包括了添加到征税单上的久已开垦的土地。^⑨在中国其他地方,单位面积产量的巨大增长弥补

① Kraus,引自黄宗智1985,128。

② 赵冈1977,23。

③ 张岗1985,99引方观承。

④ 具体情况见附录F。

⑤ 至于耕地面积的官方数字,那是太低了,对它们的一个合理的修正见黄宗智1985,325。

⑥ Marks(1991,77),注意估计的范围是每人从1.74到2.62石,岭南用的是2.17石,那里比华北更高产。

⑦ 更详细的论证见附录F。

⑧ Perkins 1969,233—234。

⑨ 黄宗智1985,326—327。

了日益恶化的人/地比率,产量增长则通过更多的使用肥料(粪肥和豆饼)、更多的复种作物和每亩地更多的劳动(例如极为认真的中耕)实现。但华北并没有种植任何对追加劳动的反应与水稻的反应同样鲜明的作物;追加投入的肥料主要限于粪肥,因为肥效更高的豆饼价格也更贵;相对较短的生长季节对复种作物构成了限制。此外,1853年黄河改道以后涝灾和土壤盐碱问题的恶化完全可能引起山东和豫东数百万英亩土地产量下降。^①所以,在1750到1870、1900甚至1930年间,华北所需口粮总量的增长幅度可能要比它的耕地增长幅度大得多。

因而,华北的棉花产量看来可能像四川和陕西的产量一样明显下降,同时长江下游的产量保持不变;只有长江中游和(推测)河南这两个相当不重要的棉产区的产量有所增长。由此得出的结果必然是1750年前后全中国的棉花产量起码与1870年同样高,或者说肯定与1900年同样高。

如果取最低的数字(1900),减去用于填絮的棉花,然后除以1750年比较低的人口数字(17000万—22500万),我们就得到一个每人平均约6.2磅的消费量;用1870年的数字则是人均将近8.0磅。这与欧洲的数字进行比较结果如何?1800年联合王国(包括爱尔兰)的消费是人均棉、毛和亚麻合共8.7磅左右。^②1780年代法国的亚麻产量为人均6.9磅左右,棉为微不足道的0.3磅。^③毛织物数据仅有平方码而没有磅,准确的换算自然要取决于织物成品的种类;但18世纪末每人1.2磅看来是适度的。^④因而看来可能的是,法国大革命前夜人均纺织品产量略高于我们对中国的保守估计的顶端,比底线高1/3。德国的产量数字要低得多:1816年的毛织物产量仅为每人1.1磅,1838年的棉织物产量更是每人仅有0.6磅,1850年的亚麻产量约为每人3.3磅,合计为每人5磅纺织品。^⑤从英格兰的输入把德国的消费提高到其产量以上,但19世纪初的德国人——绝对不是最穷的欧洲人——每年所用的衣料看来仍然可能比中国人(整个帝国平均)75年以前用的还要少。

因而,18世纪中后期中国的纺织品消费完全可以和欧洲的纺织品消费一争短长。此外,野史资料显示出甚至农民也购买其他很多非食物商品,至少在16世纪以及18世纪,这些非食物商品的品种和数量都有所增长。例如,一

① 黄宗智(1985:53—69)调查了许多与土壤有关的问题。

② 据 Deane and Cole 1962:51,185,196,202 计算。

③ Mitchell 1980:30,449,478。

④ 数据引自 Markovitch 1976:459;计量标准的资料在 497 页。为了换算成磅,我用了赵(1977:234)对粗布重量的估计,和 Jenkins 及 Ponting(1977:11—12)的观测数据:羊毛纱线的重量 1.5 倍于同样长度和同样质量的棉纱。

⑤ Mitchell 1980:30,449,478。

些来自长江下游的文章提到,小农和佃农典当中妇女的金银发钗为养蚕筹措资金。^①对民间宗教仪式表示不满的描述,包括对一些极贫穷的农村地区的描述,提到在一些这样的仪式上甚至农家妇女都穿戴着过于华而不实的服装、化妆品和珠宝。^②朝圣本身就是一种日益兴盛的商业。到1600年代初,仅泰山每年就可能吸引近百万旅游者——附近并没有大城市。以平价包干全部旅途花费的组团旅行看来甚至在相当“落后”的农村地区也很有市场——令精英阶层的道德家们极为反感。^③同时,正是声称看不起宗教朝拜的绅士们自己也越来越多地旅行,不仅为了事业,也为了教育和享受。如蒂莫西·布鲁克(Timothy Brook)所指出的,“旅行已经被理解为绅士阶层文化极致的表现”。^④

至少在长江三角洲,商业化的饮食场所的相应发展甚至延伸到了农村集镇。19世纪初期的一条资料列举了一个“几千户人家的集镇”,有45家酒馆和90多家茶馆,附近另外三个集镇分别有40、65和80家茶馆。顾客既有集镇居民也有从周围村庄来的人,他们来这里可以获得价格信息,可以看表演,还可以赌博;也就是说,为了商业化的娱乐、商业化的饮食,并为商业活动拉生意献殷勤。^⑤

143

16到18世纪,以大众读者为对象,使用通俗易懂语言的宗教读物、医药手册和历书的出版也掀起了一个大高潮。传教士利玛窦认为,1600年前后中国的书籍比欧洲更便宜也更普及。^⑥尽管中国拥有书籍的人可能不如17和18世纪新教欧洲比较富裕地区拥有《圣经》的人多(欧洲由于使用字母语言而在活字排版方面占有成本优势),但他们的人数仍然证实了巨大并不断发展的需求。

住房在中国和日本可能都是与欧洲相比最不占优势的领域之一。埃里克·琼斯,如我们以前看到的,把住房作为欧洲更为繁荣的一个重要信号。但即使在住房和家具方面,1800年以前中国也不一定落在欧洲后面很远。16到18世纪到过中国城市的欧洲旅行者像他们的祖先一样,对雄伟的公共建筑和牌坊留下深刻印象,特别是在北京和长江流域下游的大城市中。少数到过较偏远地区的人也对那里非常富裕的人家的住房感到吃惊。加莱奥特·

① 引自潘 1994:85。

② 陈宏谋 1962:68;5a—6a。

③ Dudbridge 1991:226—252;Pomeranz 1997a:188—191;吴沛宜 1992:39—64。

④ Brook 1998:181。

⑤ 樊树志 1990:279—281。

⑥ 引自 Rawski 1985:17。

佩雷拉(Galeote Pereira)是一名曾到过中国南部和东南部许多地方的葡萄牙人,1549年作为一名走私犯在中国沿海被俘(1552年离开)并留下了他在那里的生活的记述。加斯帕·达克鲁斯(Gaspar Da Cruz),另一名葡萄牙人,1556年到过广州和其他一些沿海地区,在多年以后出版的一本书中,他把来自佩雷拉的素材与他自己的直接观察混合在一起。他们两个都特别提到了住在桂林的亲王的豪宅。^①但豪门巨宅也存在于印度、近东和东欧。因此,达克鲁斯对中国小贵族和士绅以外的人的住宅的观察有更大的意义,而由于达克鲁斯从未到过长江流域或首都地区,情况就更是如此。

达克鲁斯首先提到,以广州与中国其他城市相比,包括一些比较小的城市在内,“建筑极为低劣”,^②但接下来却把那里的地方官员的宅邸描述为“十分豪华”。^③他继续说,“[城市]普通人的住宅从表面上看,一般不是很漂亮,但里面却非常令人羡慕”;他称赞泥瓦匠的工作,称赞使用的优质木材和漆,特别称赞“精致的大柜,用作房子的间壁”。^④而更令人感兴趣的是他对中国南部和西南部农村中“富裕村民”——显然既非绅士又非商人——的房屋

144 在没有城墙的村庄中,有一些富裕村民的房屋,当人们从远处看它们时(由于处在茂盛的树林中,所以除了这些房子外你看不到任何其他房屋)由于树林的荫蔽,人们可能会认为看到了葡萄牙的农村庄园,雄伟高大……这些房屋很高,有三四层。看不到瓦屋顶,因为围墙高过了屋顶,修饰整洁,污水通过伸出的管道排到外面。这些房屋很坚固,有高大宏丽的石雕门廊……进入这些(非常大的)房屋的首间,那里有一些精心制作的带雕花的大柜橱,但这种做工与其说是为了美观,不如说是为了结实耐用。他们也有侧面带扶手的靠背椅,全部用一种非常硬的木材制造,做工非常精致,因此他们的家具耐用而且有很高的声誉,可以传给他们的子孙们使用。^⑤

可以肯定,这些家庭听起来远不如扬州、苏拉特、大阪和阿姆斯特丹的商业巨子或北京、德里、江户和巴黎的贵族家庭那样挥霍无度和追求时尚;他们

① Galeote Pereira 1953:40, Da Cruz 1953:109.

② Da Cruz 1953:92.

③ 同上,96—97.

④ 同上,99.

⑤ 同上,106.

也完全可能落后于长江下游那些正想方设法挤入上流社会,阅读持家参考或其他鉴赏指南书籍的地主们。但作为一个我们可以称之为农村“中上等”阶级,而不是真正的上层社会的成员,他们说明,甚至在中国最落后的大区中的偏僻的村庄中^①也存在一个高档商品的真实市场;从我们所能作出的微小区别来看,他们似乎更像而不是更不像德夫里斯所说的弗里斯兰农民中的富户。

遗憾的是,对中国所有不同经济水平和地区农民拥有财产的最早的实际调查是1920年代卜凯及其助手们作的调查。而且这一调查存在一些重要的缺陷。除了其他问题外,一个缺陷是大地产超出了比例,^②而且它对于所讨论项目的质量与数量相反,实际上什么也没有告诉我们。尽管如此,它仍然有一定的意义。

这个样本包括了分布在全中国各地的3万多个农民家庭。此外,时代较晚可能并不是一个像它初看起来那样大的问题。1800到1850年间,中国农村的生活水平可能并没有很大改善(即使不是全无改善)。接下来的25年是灾难性的,以至少4场大内战、大洪水、旱灾和其他灾难为特征;这些事件的死亡人数可能超过了5000万。看来19世纪的最后25年和20世纪初可能恢复到了1850年的水平,并在刚刚恢复的基础上开始了一些增长,但增长并不大。实际上,一些重建的“典型”预算显示,1920年代及1930年代华北和长江下游的农民都比他们1750年代的祖先们境况更坏;^③我们对人均布、茶、糖消费的重建也显示出至少在一些大的人口群体中生活水平有所下降。另一项研究认为,1937年长江下游的地主从其土地中获得的收入比他们在1840年要少得多,^④1840年又比1700年代后期更少。因而,认为18世纪的村民拥有1920年代村民拥有的绝大多数财产并不是非常古怪的观点。

145

表 3.2 每农村家庭商品平均数

	中国麦作区域	中国稻作区域	弗里斯兰内陆	弗里斯兰沿海
桌子	4.1	4.6	1.3	2.6
长凳	4.0	12.0	2.5	4.3

① 注意这些房屋是在村庄中而不是在集镇上或有城墙的县城,后者是16世纪这个国家商业化程度最高的地区中的地主们经常移居的地方。此外,达克鲁斯特别把这些房屋与有严重抢劫问题的地区——一般说来是农村中经济较为不发达的地区——联系在一起。

② Esherick(1981)和Stross(1985)对卜凯数据的限制性提出了两种有用的,尽管是分歧的评论。

③ 实例见潘 1994:325—326,382—383,394—397。

④ Bernhardt 1992:50—52,135—136,219—223。

续表

	中国麦作区域	中国稻作区域	弗里斯兰内陆	弗里斯兰沿海
椅子	2.1	4.0	6.7	13.5
镜子	0.4	0.3	1.0	1.2
床	3.4	4.1	3.3	5.2
柜子	2.2	2.7	1.0	1.2

卜凯的大部分数据都是家具。家具在 18 到 20 世纪之间与其他商品相比肯定变得更贵,因为木材变得非常稀缺。一个粗略的推测是 1937 年的人均森林面积在它 1700 年水平的 6% 到 8% 之间。^① 因而,在这一阶段——甚至 1800 年以后的更短时期——即使中国人总体的生活水平有轻微改进,他们每年购买的家具总数看来也不可能持续增长。同时,19 世纪中叶的大破坏可能毁坏了此前几十年中积攒起来的大部分储备。

卜凯的数字是作为 8 个气候区的一整套平均数提出的,然后合计为两个巨大的“麦作区域”和“稻作区域”,大致相当于中国淮河以北和淮河以南。表 3.2 把这两个大区的数字与德夫里斯的 17 世纪弗里斯兰一个内陆村庄和两个沿海村庄的数字并列,包含了卜凯和德夫里斯都有统计数字的全部项目。^②

146 我们不应该赋予这些数字太多的意义。上表列出的荷兰家具中有很多相当精致,^③而中国家具中可能有许多相当粗糙:其中只有 36% 上了油漆。^④ 按照户型及其复合度调整家具数量是不可能的,尽管它们看来不大可能使这一比较有很大偏差。^⑤ 当然,这些数据仅仅包含了农村家庭普通用品中的一部分。尽管如此,它们应该能够推翻那种陈词滥调,即与欧洲塞满了新商品的住宅对比,中国农村中住的都是斯巴达人。

在日本,明治初期的社会经济变革影响如此深远,以致从 19 世纪后期的数字向回追溯的方法没有意义。然而,确实有一项对德川后期 29 个村庄的研究认为,在所研究的这一区域中农民收入中至少有 20% 可以用于储蓄,或

① 根据凌 (1983:34—35) 的森林面积数字,人口按 1700 年 1 亿—1.2 亿,1937 年 4.5 亿—5 亿计算。森林采伐和人均每年可以获得的木材供给趋势在第 5 章有更为详细的讨论。

② DeVries 1975:表 6—16;Buck 1937:456。

③ DeVries 1975:220—224;Schama 1988:311、316—320。

④ Buck 1937:457。

⑤ 中国麦作区域样本平均每户的规模是 5.5 人,中国稻作区域样本 5.2 人 (Buck 1937:370)。DeVries 的数据中没有户规模数字,但就我们的一般人口资料看,它们的平均值看来可能同样大或更大。另一方面,北欧的户常常比中国的复合度低——即,家庭成员中除一对已婚夫妇及其子女以外的其他成员更少。由于不属于这一主要婚姻关系家庭成员的同居者可能更需要有自己的床,或许他们还需要其他一些自己的东西,这常常会抵消一户中有较多人口本来会造成的影响。

真正随心所欲地花在非维生用途上;其他一些研究甚至提出了更高的数字。^①到18世纪晚期,人们发现,乡村中的居民从很远的地方购买家具、药品和其他专门制作的奢侈品,同时村中的店铺备有各种各样现成的香水、头油、香和纸。^②18世纪的禁奢法令指责农民吃得太多,使用昂贵的特制木器,拥有过于华丽的衣服、雨伞和用金子、象牙及白银制成的饰物。^③19世纪初一个村庄中一家商店的存货包括了各种各样的文具、餐具与炊具、烟草制品和“其他日用必需品”。^④

有迹象表明印度的收入分配明显不如中国、日本或西欧平均(因而大众消费也更受限制)。对1647年莫卧儿土地税的一个研究发现,445个家庭获得了全部岁入的61.5%,而全部岁入约占农业总产出的50%,流入那些家庭的岁入中有大约1/4代表实际的个人收入。(其余部分被假定用于各种各样的官方消费。)^⑤如果这些数字准确,这445个家庭——大概不到0.002%的人口——仅通过他们的职位获得的收入就相当于全部农业产出的7.5%,或者说是社会总收入的6%!^⑥根据穆斯维(Shireen Moosvi)对1595年的重建^⑦所作的一个估计与此相似:它认为1671个莫卧儿贵族仅从他们对政府税收的权力中获得的个人净收入就相当于全帝国总产出的7%左右。尽管穆斯维据以研究的史料还有疑问,她的计算结果却可能低了很多,并进一步证实了我们的一般描述。至少有一些到过中国的欧洲旅行者提到那里没有严重的贫困,而同时在印度的欧洲人似乎对那里极端的富裕和贫困感到震惊。^⑧因而,贝利(Bayly)对印度奢侈品需求的讨论几乎完全指的是贵族社会的需求并不让人感到意外。^⑨哈比卜(Habib)估计17世纪中期莫卧儿帝国生产了300万—400万磅丝绸^⑩——不到我们估计的18世纪中期中国产量的1/15——也暗示出对这样一个广阔的帝国来说市场相当狭隘(尽管中国自己在1650年的产量也比它1750年的产量低很多)。

147

① 见 Hanley and Yamamura 1977:357—358 的概括。见西川俊作(1978:76—79)和斋藤修(1978:85、93、99)论实际工资的全面增长和地区工资级差及技术工资级差的缩小。

② Hanley 1983:190。

③ 全部引自 Hanley and Yamamura 1977:88—89。

④ Crawcour 1965:41。

⑤ Raychaudhuri 1982c:266。

⑥ Moosvi(1987:303—304)认为,城市区域大约为莫卧儿帝国1595年前后的税收增加了17%:所用的方法非常粗略,但对于这些目的来说看来是可行的。

⑦ Moosvi 1987:108、129、131、221、278。

⑧ Hambly 1982:440。

⑨ Bayly 1983:201—206。

⑩ Habib 1982b:224。

把太多的赌注押在落到一小部分精英手中的任何一种商品或收入的数量比较上都是危险的。此外，帕塔萨拉蒂最近的研究提出了一种引起争论的情况，即印度的劳动者远非贫困的，在签订有效契约方面遇到的障碍可能比他们的英国同行要少。^① 所以或许最终将证明，印度的收入分配既在最高层严重集中，又在底层相对平均，而处于中间阶层的人群在收入和消费中所占比重都落后于中国、日本和西欧与他们地位同等的人。但尽管有这种新证据，谈论印度不断提高的大众消费可以与上述其他地方相媲美仍然显得太早。

印度农村有越来越多的人生产现金作物或手工业品，但这些商品往往被直接从他们手中榨取。因而商品产量的增长不一定必然伴有农民对市场的更多参与；事实上，依仗强制性权力榨取农民各种正当收入和商品而兴盛的市场，最终取决于那些权力能够——优先于农民自己对市场的参与——继续强迫施行。^②

148 印度一些处于依附地位的人群可以利用对他们的技术的需求逃避或修订他们的义务，实际上，18世纪很多时候对劳动的需求普遍旺盛，政府没有插手阻止迁徙，或否认印度工人从那种状况中获取的利益（如其他很多地方政府的所作所为，欧洲也有一些）。^③ 特别是耕种旱地或在适合于干旱地带的职业（例如打井）中工作的种姓有相当大的迁徙自由，因为这类土地与有复杂的灌溉系统的土地相比，分布更广阔也更难以独占。此外，由于与旱地耕作相关的种姓成员通常成群结队地迁移，他们常常形成或多或少自治性的单一种姓社团，在这种社团内改变职业更为容易。但在其他情况下（特别是在湿润地带），对地域和职业变动的限制确实有效，土地所有者和佃农之间的经济权力极不平衡。^④ 如果勒登（Ludden）根据印度南部一个地区得出的这种干旱和湿润地带模式之间的差异在更一般的意义上是真实的，则印度生产出最大剩余的地区可能也是收入分配最不平均的地区，因而对非必需品的市场参与更为有限。即使那些通过迁移改善了状况的依附性人群，与其他地方可以更容易地签订契约同时留在原地的同类人群相比，也可能更不容易积攒物品。

可以肯定的是，最近的研究显示出，从15世纪到18世纪印度集镇和城市的特征是：除贵族以外，经常购买非必需品的店员、中小型商人和其他人的数

① Parthasarathi 1998: 82—101。

② Perlin 1978: 183—184, 188; Perlin 1985: 440—443, 448 注 83, 452; Bayly 1983: 195。

③ Parthasarathi 1998: 92—96, 99—101。

④ Ludden 1985: 46—52, 59—67, 81—96。

量也日益增多。^①至少到1820年代，白银首饰和白银积蓄看来即使在农民中也普遍存在。^②但与日本、中国或西欧相比，定期参与这些市场交易的人看来可能仍然要少很多。贝利认为，1850年前后，农民直接从城镇市场购买的东西仍然主要限于盐、铁商品。^③因而，即使印度的“奢侈”和“时尚”与日本、西欧和中国的发展的相似程度比我在这里证明的更接近，大概它的社会关系和劳动制度也保证了这种欲望只影响到人口中一个更小的部分。同样的理由至少同样强烈地适于这一时期的东南亚。那里的穷人可能少于印度，但依附劳动仍然是一种重要的制度。^④

但在中国、日本和西欧，消费者需求广泛超越了阶级。它在空间的扩散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例如我们已经看到，在中国和欧洲各地糖的用途是如何的多种多样。商业化程度较低的地区的人不仅消费较少，而且他们消费的东西中有更多的部分由自己生产。因而，市场需求的区域性差异甚至大于生活水平的差异。举例来说，德夫里斯发现，在弗里斯兰比较富裕的地区和该省内陆地区之间，不仅专业化的手艺人数量有巨大差距，家用商品的价值也存在四倍的差异；而这些内陆区域在欧洲更多项目的综合比较中远远说不上贫困。^⑤“落后”甚至影响了地方有钱人的需求，因为一个小市场意味着专门生产的商品的高价格和选择的局限性。在最富裕地区范围以外的需求衰减得似乎相当急剧。在蓬圣皮埃尔，甚至直到1750年富裕农民还没有开始拥有钟表——在弗里斯兰很多农民开始这样做之后60年——然而蓬圣皮埃尔位于诺曼底，是法国比较富裕的农村区域之一，并且通过河流与巴黎和海岸相连。^⑥考虑到甚至在西北欧比较富裕的地区中尚存在这种差异，要在内部变异更大的单位“中国”、“日本”和“欧洲”之间对需求水平进行系统的比较几乎就是不可能的。

所以，下面的段落有一个比较谨慎的目标：要说明我们没有理由认为中国和日本较富裕和较贫穷地区之间的差距比欧洲的更大。

在日本，需求在地理分布方面不均衡的程度可能低于欧洲。当然，日本比中国或欧洲都更小，它的很多地方能利用沿海船运。由于从17世纪中期起，这个国家的所有大名都被迫在众多家庭成员和侍从陪伴下，把大约一半

① Bayly 1983, 194, 370—371, 466—467; Perlin 1978, 191.

② Bayly 1983, 242.

③ 同上, 347; 但一种相反的观点见 Perlin 1985, 468—470.

④ Reid 1988a, 129—36; Reid 1989, 64—71.

⑤ DeVries 1975, 231 和表 6—16.

⑥ Dewald 1987, 72; DeVries 1975, 表 6—8 到 6—10.

的时间花在江户的将军宫廷里，新品味的传播至少在上流社会中受到了鼓励。由于每个大名在他自己的“堡镇”中也拥有宫廷——不像例如某些法国贵族那样很少住在他们名义上的家中——这使地方上的名人有充分的机会了解和模仿从江户带回来的习惯。此外，为上层社会家庭来往于江户而修筑的交通网也供其他旅行者使用，为多种多样的商品创造了至少是初步的全国市场和充分发展的地区性（与纯粹的地方性不同）市场。日本较“发达”和较不“发达”地区之间的工资差距看来至少从18世纪中叶起逐渐缩小。^①

150 中国的情况要复杂得多。在这里（如同我们在第6章将看到的），最先进地区和一组中等发达地区之间收入的差距大约也在1750到1850年间的某个时候开始缩小，但最贫穷地区的收入可能进一步拖后。尽管如此，区域之间的差距看来不可能与欧洲西北部核心地区和其余地区之间的差距扩大得同样迅速。

然而，“奢侈品”需求的分布可能比收入的分配更不对称。例如，克鲁内斯认为，对“不必要的东西”的新兴趣可能主要出现在长江流域下游，因为他所分析的上层社会消费指南是在那里出版的。^② 中国缺乏众多起了时尚界前哨作用的王室宫廷，而这些甚至在欧洲相当穷的地方都有——尽管在明代的确存在一些亲王的宫廷。

另一方面，这些指导奢侈消费的书籍全部在长江下游出版，这一事实告诉我们的东西要比类似的集中在欧洲能说明的少得多，因为中国共用一种书面语言，这些书像江南出版的其他书籍一样，可能流通得更为广泛。事实上，由于中国的商人和官员都要到处旅行——有志向的人要离开他的出生地实际上是件很平常的事^③——上层社会的新品味可能传布得又快又广。布鲁克认为，尽管在1560年代还可以想像有绅士处在江南风气支配的“时尚圈”之外，一个世纪之后这事实上是不可能的。^④

品味从江南向北京的传播肯定很快，反之亦然。18世纪东南沿海福州的一名官员认为，该城上层社会的生活风气像长江流域最富裕的城市一样奢靡。^⑤ 岭南大区的首要城市广州，除了其他方面外，还被普遍认为是这个国家某些最好的家具的产地，这些家具在数百英里之外的上流社会成员中有一大

① 高藤修 1978:99。

② Clunas 1991:173。

③ 见 Skinner(1971、1976)一个更充分的解释。

④ Brook 1998:221—222。

⑤ 郭起元 1962:36:21a。

批拥护者。^① 17世纪的小说《金瓶梅》对令人难以置信的品种繁多而昂贵的食品、家具、服装、装饰品甚至性生活用品提供了一些最详细的描写,这部小说以华北一个中型城市临清为背景。(1843年它是其所属农业大区中第十大城市,^②尽管它在17世纪的名次可能更高。)这部小说也为“品味”准则——旧上层人物在一个新的消费至上的世界中用它们保护自己——提供了一些最明确的范例:它的商人主角实际上是在用被克鲁内斯的消费指南指为粗俗的方式消费而不断地残害他自己。

一部名气较小的17世纪小说《醒世姻缘传》,故事背景在武城,华北一个极不重要的县城。然而仅在短短的前4回中,主角(其父亲突然成为富翁)就买了好几张铺着丝床单带纱帐的床、门类繁多品种齐全的绣花丝缎服装、象牙筷子和嵌银雕漆杯子、羊皮里绉丝靴子、装饰华丽的刀剑、精工制作的窗帘、被褥和“奢侈饰物”、一张金漆文几、许多书、金扇、绫袜,还有大批药材和用珍奇配料制成的壮阳药。^③这是一幅过于无节制的画面,而作者假定这种无节制在一个相当短的时期内,就可以在一个大概有两三千人的城镇中实际实现:这个城镇甚至可以肯定不在帝国最大的500个城市之中。^④在我们对住房的讨论中,我们甚至在西南地区看到了一些我们可以称之为“中层社会的奢侈”的迹象,那是中国九个大区中两个最穷的之一;我们对20世纪家具的考察展示的是全国平均水平。

至于欧洲,我们已经看到一些实例,显示出甚至在诸如法国北部和荷兰这样的相对富裕的地方,新的耐用品的传播是多么的不均衡。比较小的奢侈品同样如此。如我们所知,直到1830年价格急剧下降以后,欧洲大陆糖的人均消费才出现了持续上升。^⑤在法国农村很多地区,直到20世纪,咖啡一直是一种足以在特殊场合作为得体的礼物的奢侈品。^⑥甚至在英格兰,1840年代以前劳动阶级对烟草、茶和糖的消费似乎也不可能有很大意义;当然,消费的总体水平在那以后比那以前提高的快得多。^⑦19世纪初的英国穷人比一两年以前购买了更多的酒、衣服和读物是无可怀疑的,他们也肯定享用了一

① Clunas 1988:66—68。

② Skinner 1977a:238。

③ Nyren 1995:8、11、17、18、23—24、46—47。

④ 1843年中国有1653个2000人以上的城镇(Skinner 1977a:229),尽管到那时人口增长了很多,住在城市地区的人口比例却没有扩大。

⑤ 我没有发现全欧洲的消费数据,但通过产量数据可以推断出19世纪中期有比较大的增长。Mitchell(1993:511)证明巴西的产量出现过一个高潮,再加上欧洲大陆大部分地区在1850年代到1870年代开始了甜菜的种植(1993:255—312)。

⑥ E. Weber 1976:143。

⑦ Mokyr 1988:74—75、79—90。

些烟草。但这是否能够真正表现出对新的外购商品的欲望强烈到足以改变旧的工作习惯？或者把这种消费视为一种补偿——一种代表社会存在的不得已而求其次的新方式，这种方式随着由生产体系变革加诸于工人身上的变化对旧的需要和身份的侵蚀，随着代表地位的旧商品如肉类更为稀少而变得
152 更重要——是否更有意义？^① 由于，比如说，更穷也更少卷入市场的意大利、葡萄牙和爱尔兰的下层阶级——更不必说数百万东欧农奴——远远没有加入到这个新的消费社会中，我们不应该对新商品在中国甚至更为广阔的空间中的传播不均衡赋予太多的意义。

舶来品与时尚的轮转速度：全球性关联和以经济差异为基础的 cultural 外观

但是即使西欧、中国和日本人的实际的商品积累看起来非常相似，还是存在着令人感兴趣的差异。欧洲人消费的增长和变化似乎在收入上升和下降的不同阶段一直持续，并在 18 世纪中叶以加速度发展。中国和日本的同类趋势并没有显示出同样的加速度。举例来说，克鲁内斯注意到，一旦清代的新王朝在中国稳定建立（约在 1683 年），并开始把精英人物引回到明末有很多人逃避的公益事业角色，谈论奢侈的新出版物就急剧下降。由于确认等级和身份的古老方式重新确立，他说，“清谈成为多余”，一个“消费社会”的发展由于没有达到“必要的规模”而停止。^②

18 世纪中国的著述至少像 16 和 17 世纪的著述一样充满对奢侈的指责，同时小说则提供了比以前更昂贵的华而不实的小摆设的目录。有人推测如果我们详细的财产清单，它们在 18 世纪的平均水平应该高于 16 或 17 世纪（这一点，如我们所见，不一定是欧洲的情况）。然而，品味指南方面的新书出版减速，完全可能代表着新的商品和风尚发展成为全社会渴求的社交礼仪必需条件的速度正在放慢。沈从文的巨著中国服装史也提示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尽管明后期服装和首饰风格的很多变化在清初继续从社会最上层向下扩散，^③新王朝也明文规定了官员服饰式样的多种改变，但看来清代普通人的服

^① 举例来说，甚至在这一阶段“平民文化”的主要研究者之一的著作中都提出了不同的重要性，见 Kriedte, Medick and Schlumbohm 1981 与 Medick 1982 对比。

^② 另见 Blook (1993) 和 Peterson (1978); Clunas 1991: 169, 173。

^③ 沈从文 1992: 489。

装式样与明代相比并没有多大变化，^①更不如 18 世纪末欧洲普通人的服装变化多。^②

另一方面，欧洲时尚变化的步伐不断加速，特别是服装。实际上所有对欧洲人（和北美人）遗嘱财产清单的研究都显示出，生活消费品在不动产总值中的比重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下降；在很多研究中甚至这类商品的绝对值也是下降的。压倒性的证据表明，16 到 18 世纪欧洲消费需求不断增长，拥有的商品品种也越来越多，要使上面那些发现与这些证据协调一致，看来几乎必然会得出以下的推论：各种各样的生活消费品正在更快地被抛弃，以致一生中购买的东西更多并不意味着生命中任何一瞬间（例如凝固在死亡财产清单中的那一瞬间）总会有更多的物品储备。

为什么商品的寿命周期会缩短？一些商品如服装之类变得（相对来说）更为便宜，因而使它们更容易替换。其他一些情况下新商品可能不如旧商品耐用（例如，喝水用的玻璃器皿和瓷器大概比锡铅合金、锡或木制餐具更经常被打破）。^③然而，时尚意识的加强看来也起了重要作用。毕竟，正是在 18 世纪的欧洲，战争曾为了让“木女士”安全通过而中断：一个身穿巴黎下一季时装，从圣彼得堡到波士顿巡回的人体模型。^④这一时尚的更大胜利可以充分说明，欧洲人每年的奢侈品需求比中国人或日本人的需求增长更快，尽管我们暂时假设，这些商品的详细目录（以及对它们的看法）是以非常相似的方式变化的。

这意味着对欧洲人和东亚人花费在财产上的钱的水准的比较可能会比财产本身的比较显示出一个更大的差距；反过来，这种差距又限制了我们能够根据任一种比较作出的推论。就我们目前的目的来说——揭示欧洲人每年购买了较多的商品，并由此推动“勤劳革命”比其他地区前进了一点儿的可能性——正确的比较是以购买周转率为基础；但要证明这样一种模式显示了一种“更高的生活水平”则更为棘手。相反，它显示的可能是一种品味的差异

① 沈从文 1992:488。

② Staunton 1799:II:180。

③ DeVries 1993:101—104。

④ Jones 1981:113—114。

154 或可以使用的材料的差异。^① 鉴于我们对糖、茶和布匹的比较,我们应该记住,我们甚至不能肯定欧洲人每年确实在非必需品上花了更多的钱。但是如果他们尽管并不比中国或日本人更富有,却的确这样做了,就值得考虑是否正是这种社交引起的“折旧”使欧洲人的消费在经济周期、比较价格、政治稳定等等因素的变化中保持了不寻常的强烈增长。

为什么仍可使用的商品被丢弃(或被打入冷宫)的速度会首先出现差异?比较社会史提供了一些线索。对中国、日本和西欧,17世纪都是一个存在许多不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因素的时代。但清王朝和德川幕府于17世纪中期在中国和日本掌权,可能使这些社会在18世纪比西欧大部分地区享有更大的稳定性。当然欧洲的重要地区——特别是新消费至上主义最为明显的英国——在18世纪也享有相对的和平(在国内),但政府没有像清政府和德川幕府那样积极地投身于传统角色和地位的保存和/或复活中去。可想而知这可能使人们通过时尚包装自己并彼此竞争变得更不重要;因此人们会拥有积累起来的财物——这种积累在中国和日本都与18世纪的“全盛期”相关——但却较少对供周转的财产总量的周转率感兴趣。

至少在中国,把时尚发展作为一个非常长期、缓慢并决非线性的过程的组成部分是值得考虑的,在这一过程中,上层社会中地位的竞争和自我表现与政府职位和官员品级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松散。这一发展趋势中一个重要阶段是16世纪后期和17世纪初期,在这一时期,官场生涯中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和挫折似乎鼓励了上层社会寻求其他的生活方式和(至少是含蓄的)不直接依靠科举制度而把他们自己分等级的方法。这种要求,加上不断增长的私人财产,不仅有助于加强我们讨论过的时尚和炫耀性消费的发展,而且刺

^① 当我们把商品按照物理性质从最不耐用(食物和饮料)到可能是最耐用(如房屋)的序列排列时,问题就变得明显了。显然,人们吃得有多好的正确标准是他们获得的食物的年流量,因为除非你把食物全部“折旧”,它是不会让你获益的;在任何特定时刻手头储备的食品的数量毫无意义。但是对于住房来说,正是能够实现的储备衡量出幸福(因为这种储备每天都要使用,同时却只有非常微不足道的折旧)。如果有人发现,比方说,日本人在一个平常年份花在住房上的钱比英国人多,因为他们的木屋比石屋需要更经常的维修和更新,从而证明这显示日本人的住房必定更好,这种说法肯定是荒谬的。但是对那些耐用性处于房屋和大块面包之间的东西——从服装到家具——怎么办呢,特别是如果时尚对它们的报废起的作用与实际的磨损一样大时?一般说来,我们接受这些商品天生短命的现代观念,因而计算其产量(和购买量)的年流量,而不去费力从国民收入中减掉它们的“折旧”。但在很多比较贫穷的经济中,这类商品的折旧率之间的差异可能对居民福利有很大影响,这反过来又会与他们的花钱水平相关(如果我们省略折旧,还会由此而与他们表面上的福利相关)。毕竟,一个人为了保持其现状而必须付出的任何支出都会对他造成同样的影响,无论它是一笔债务的利息,是准备弥补物质的折旧,还是一种由社交引起的对那些仍然有物质机能的日用品进行更新的需求。此外,如果我们减去在欧洲可能更耐用的商品种类(如房屋)的折旧的同时,忽略在那里贬值速度可能更快的商品的折旧,我们就是在使欧洲人看起来比他们实际上更富裕,亚洲人看起来比他们实际上更贫穷。

激了其他活动,诸如越来越多的上层社会人士成为佛教寺庙的护法,对由私人组织的注疏学增加兴趣等。^①

从这一观点出发,清代的成功——不仅重建了1644年以后的秩序,而且使一些有荣誉感的公益事业(既包括官方的安排也通过受政府鼓励但并不由政府主持的慈善事业)恢复为一种理想和地位的标志——很可能中止了时尚的发展,就像它明显制止了寺庙护法的增加那样。认为公益事业复苏对时尚发展的减缓有广泛心理影响的任何观点肯定都是推测性的,但至少有一种相当直接的联系可以看出来。对官服的严格管理是一种禁止奢侈的立法,它确实在有清一代一直有效实行,^②授权穿用本来只限官员穿用的各种各样的服装组件(纽扣、帽子等)显然是政府奖励商人、地主和文人的一种直观的方式,这些人为从救灾到修路等一系列公共事业提供了有价值的帮助。这类服饰的穿戴者当然没有兴趣看着它们贬值,或者让那些没有参加同样的公益活动的人得到它们。在这种意义上,恢复了活力的清政府的所作所为,尽管无疑并没有像某些学者认为的那样摧毁这一广阔经济中的“资本主义萌芽”,却可能足以使一种“配给”体系复兴到多多少少迟滞了“时尚”发展的程度。

清代法令对上层社会的妇女有同样重要的影响,尽管她们被排除在政府职位之外。诗歌唱和——在明代,至少在长江下游地区的上层社会妇女中已成为自我表现和社会竞争的绝对重要的手段——在中国的“漫长的18世纪”中甚至变得更为牢固,它反映了太平盛世,反映了一个激烈竞争的婚姻市场(在一片没有世袭贵族的土地上),还反映了可能是前所未有的强调把书写能力作为文明人的必要条件(伴随着注疏学的兴盛)。^③这种形式的竞争和自我表现比欧洲的时尚需要购买的东西少。征集比较落后地区——包括新征服区域——的妇女的诗词,甚至给了这些妇女一条变相参与清王朝的建立并成为满—汉“文化使者”^④的道路,这是一种控制边疆地区的方式,与通过消费这些地区异乡情调的产品进行控制完全不同的方式。同时,清代文化的高度道学性鼓励这些妇女比明代更大程度地限制她们的身体活动,并在她们自己与城市娱乐界妇女之间划出一条更明显的界线。已婚的上层社会妇女与妓女之间的社会交往和文字交流在明后期的长江下游地区相当常见,而在清代变得非常之少,^⑤随着这两类妇女停止相处,商业化和具有时尚意识的娱乐界对

① Brook 1993; Peterson 1978.

② 沈从文 1992:516.

③ Mann 1997:16—18,76—120.

④ 同上,212—216,219.

⑤ Ko 1994:266—278; Mann 1997:121—128.

人数更多、更富裕也更重要的上层已婚妇女群体的影响力大概小了很多。

156 因而，在这里，一种政治和社会“秩序”的回归也可能使人们减少了通过不断快速购买和丢弃生活消费品以包装自己的兴趣。但是任何这类观点都应该被视为完全是推测性的——我们对于上层社会在不同场合的服装知道得太少（更不必说家庭预算），因而无法在这一点上更进一步。至于进一步的线索，我们需要对欧洲时尚变化的异乎寻常的加速度提出疑问，这种加速度与中国和日本的品味“没有”发生如此令人眼花缭乱的变化至少需要同样多的解释。

任何解释都肯定有一部分必须依赖于非常普遍的态度变化，如很多作者所认为的。在18世纪的西欧，一个人可以实现的选择范围——在从婚姻对象到事业到宗教信仰的一切方面——作为一种地位和个人尊严的确认标志^①日益凸显，看来可能也提高了消费选择作为一种自我表现形式的重要性，并因此为欧洲正在发展的“时尚体系”增加了一个刺激。一些学者在看到中国上层社会中个人选择（例如婚姻决策）所具有的重要性大致同步增长的同时，也精明地就此止步，不再声称这些趋势同样明显，并且认为由于把“个人”作为一种选择主体，它们并不代表同类型的意识形态权力。^②

多少不同地考虑一下这一问题，16到18世纪欧洲政府的发展，部分是由于剪掉了巨大的扩大家庭的翅膀（例如，通过宣布家族仇杀为不合法，并使法律的统一作用扩大延伸）。^③在这个过程中，它们几乎无疑缩小了在确定人的身份时扩大的亲戚网络的向心性，从而也用证据证明了通过与外购商品之间的新关系（与亲族和不可剥夺的遗产对立）确认一个人的身份地位的趋势的扩大。相反，德川幕府和清王朝恢复秩序都是通过与地方习俗的一种合作，它们把大量日常行政管理事务交到了后者手中；扩大的亲族在这些习俗中占有突出的地位，特别是在中国，政府对它们的权力和意识形态向心性的推动远远比抑制它们的企图更频繁。或许在这种习俗及身份一直比较重要的地方，人们更为缺乏通过对商品的选择与展示不断证明自己的动机，^④因而也更少需要替换在物质上仍然有使用价值的物品。

157 但由于个人选择和群体成员资格的外在价值可能在不同社会中以非常之多的不同方式发生变形，并在某些领域受到鼓励而在其他领域中受到抑

^① 关于至少在英国社会的局部，选择的真实程度和它成为地位的确认标志的程度的一个精密研究，见 Handler and Segal 1990；特别是 43—63。

^② 如 Powe 1992：2—3、5—6、32—34。

^③ 实例见 Stone 1979：93—107，特别是 99—100。

^④ 参看 Sablins (1976：216)：“钱对于西方人来说就等于其他地方的亲戚关系。”

制,我们这些对一种比较具体的现象寻求解释的人应该在一个比较具体的层面上进行我们的主要探索。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更严密注视的东西正是欧洲“时尚体系”的加速发展所涉及的对象种类,以及影响它们在全球的产量和分布的因素。

如果欧洲品味的变化确实比中国和日本的品味变化更快,这种差异的一部分看来可以归之于舶来品,特别是外来的制造业产品名声高低的差异。毕竟,印度和中国的纺织品、中国的瓷器等等对欧洲时尚——甚至下至地位非常低下的阶层——都是非常重要的,而在东亚则缺少具有同等重要性的西方商品。确实,17世纪中国的鉴赏指南列举了各种各样值得收藏的外国制造的商品,^①这一时期中国和日本的各种其他书籍也显示出对西方产品的兴趣。明末清初西方的眼镜和其他饰物惹起了人们的兴趣,“西洋缎子”——用非常昂贵的原料织造,花纹模仿意大利建筑边缘装饰图案,与圆明园西洋楼石刻边沿纹样完全相同——曾风行一时,先由17世纪的中国宫廷妇女采用,又在18世纪被长江下游时髦的妇女们接受。^②也是在18世纪,国外——首先是俄国,然后是美洲——的毛皮制品变得非常流行。但是,海外来的商品从来没有对中国和日本的风尚和消费模式产生像亚洲的纺织品对欧洲那样的影响。为什么?

西方学术界对东亚(特别是中国)有一个共识,即这些国家的人民对外国商品不感兴趣,因为他们对自己文明的优越性深信不疑;确实有一些文献支持这样一种观点。反映这种态度的最著名的言论可能来自中国的乾隆皇帝,他在1793年告诉英国使节,中国出产它所需要的一切,对西方可以提供的小巧的玩物不感兴趣;所以他看不出建立更广泛的贸易关系的理由。^③对于很多历史学家来说,这段话概括了一种长期以来始终与好奇的、充满欲望的、生气勃勃的“欧洲心态”相反的“中国”心态。甚至一些更为敏锐的学术研究,尽管注意到皇帝的态度怎样变来变去,在一些时期接受舶来品(作为君王自命为四海共主的内容)而另一些时候排斥它们(作为中国文化优越性主张的内容),却也常常在比较一般的意义上把这些皇帝的态度当作“中国人”对外国商品的态度的提喻法(修辞学术语,即以全体代部分,或以部分代全体的比喻叙述方法——译注)。^④因而,从这样一种观点出发,欧洲人对外国时尚的较大兴趣就不是偶然的。它暗示着欧洲的分流归根结底源于一种根本的态度

158

① Clunas 1991:58--60、110、137。

② 沈从文 1992:491。

③ 邓嗣禹和费正清(Teng and Fairbank) 1954:19-21。

④ 例如 Sahlins 1994(1989)。

差异，一个或许通常与更大的冒险欲望和创新欲望相关的差异。

然而一旦我们不再用满洲皇帝代表中国，立刻就会想到对这个国家较少输入大批舶来品的更为简单的解释。毕竟，中国的进口恰好与其出口同样多（由这一时期的外贸制度所限定），特别是它与东南亚的商业往来充满了异国风味的初级产品：供美食家吃的鱼翅和燕窝（还有数量庞大的不那么新奇的黑胡椒）、供珠宝业用的珍珠、来自中东和太平洋诸岛换船转运的香料，还有珍贵的木材。^① 18世纪甚至19世纪初，对所有这些进口商品的需求急剧增长；把这些产品从马来群岛大量运到广州的英国商人肯定发现他们的问题不是市场过剩，而是如何保证充足的供给。^②

这些舶来品的输入没有一种经历过与英国进口烟草、茶和糖相似的膨胀过程，但难以明白它们怎能如此。甚至事实上，搜寻檀香和其他在中国受到珍视的异国风味的输入品对众多太平洋岛屿造成了极大的生态损害，极具讽刺意义的是，只是当开往中国的船只开始装满鸦片时，它们才得到解救。^③ 此外，除了胡椒，实际上所有这些舶来品都是采集而不是养殖的；这个简单的事实排除了与新大陆种植园的成就相当的产量激增（和单位价格下降），后者是通过大批奴隶在严密而残忍的监督下非常密集的劳动而实现的。人不能养更多的鲨鱼，或创造更多的丛林环境让燕子造出需要的窝，但人能开垦更多的土地种甘蔗。有过搜捕奴隶增加采集工人的努力——特别是在苏禄王国，今天菲律宾群岛南部地区^④——但这类工作的分散性意味着即使是奴隶也保留着很大的契约权力；没有出现类似一个加勒比海种植园中可能发生的情况。

159 糖和烟草的消费确实急剧增长，但（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它们主要在中国国内由自由的农民生产；这意味着它们不仅要与其他用途竞争土地，还要与其他可能的用途（包括休闲）争夺生产者的时间。在这些模式中很难见到任何迹象表明中国人对舶来的奢侈品不感兴趣；看来比较可能的是，他们购买的大多数舶来品难以转变为廉价的“日常”奢侈品。（当然，欧洲人在东南亚搜寻的丁香和上等香料亦是如此，糖和烟草在欧洲的舶来品输入中也是异常的。）

说明中国人对舶来品相对不关心的任何实例都必然指向工业品输入量

① 仅从泰国一国进口的品种齐全的奢侈品清单见 Cushman 1975:105—106、200—204；关于从东南亚沿海热带丛林的进口，见 Warren 1982:419—420。

② Warren 1982；McNeill 1994:319—325。

③ McNeill 1984:325—336。

④ Warren 1982:419—434。

的微小。即使在这方面，如克鲁内斯指出的，中国的鉴赏家们实际上也把各种各样的外国产品包括在他们的珍藏品中。^① 尽管乾隆可能对欧洲工业品不感兴趣，广东和福建沿海的上层社会却并不如此，他们中的一些人确实积攒钟表和其他西方古玩珍品。^② 尽管如此，中国人均输入的工业品非常之少，对于时装和房屋装饰观念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则可能是毫无疑问的。此外，由于欧洲除了工业品外没有东西可提供，中国从西方的进口与它从东南亚的进口不同，确实单调得令人吃惊。在鸦片大量输入之前，中国从欧洲和欧洲殖民地输入的商品中有 90% 左右是白银，史学家们正是根据这一点产生了中国整体（不只是宫廷）对外国物品缺乏兴趣的印象。但是，对于为什么白银在西方运往中国的货物中占了统治地位有一个好得多的解释，在冯·格拉恩（Richard Von Glahn）、弗林（Dennis Flynn）与吉拉尔代（Arturo Giraldez）以及弗兰克最近的著作中有清楚的阐述。

中国在元朝（1279—1368）统治下使用纸币和一种严重失控的铜币制度的一系列失败经验，没有给这个国家留下任何受到普遍承认的货币中介，此后，从约 1400 年起，中国实际上在为它的经济重新确定通货。在这一过程中，对这一巨大的高度商业化的经济来说，白银逐渐成为价值储备、大宗交易的货币计量单位（并且通常是实际的中介）和政府的支付手段。由此产生的对白银的巨大需求使它在中国比在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都更有价值（相对于黄金和其他绝大多数商品），而中国自己的银矿很少。所以，在西方船只到达亚洲之前的那一百年中，中国已经在输入数量巨大的白银（主要是从日本，多少也从印度和东南亚输入）。

当西方人运载着从有史以来发现的最富矿中生产的白银（在 1500 到 1800 年间拉丁美洲生产了全世界约 85% 的白银^③）真的来到时，他们发现把这些白银送到中国（无论直接还是经由中介）会产生非常巨大而可靠的套汇利润——利润如此之大，以至对于追求最大利润的商人来说，没有什么更好的理由大量运送其他任何商品。（前往北京的入贡使团——马歇尔·萨林斯 [Marshall Sahlins] 为了理解“中国”的态度而分析过它们——不受这种影响，因为它们实质上是皇室之间以控制价格进行的象征性交易。在这些交易中，追求利润通常明确地扮演次要的角色，尽管使团普遍伴随着追求利润的“私人”贸易。^④）

① Clunas 1991, 58—60。

② Idema 1990, 467—469（引自文献的实例）；Waley-Cohen 1999。

③ Barrett 1990, 224。

④ Wills 1995（未出版；许可引用）；滨下武志 1988, 16—18；Sahlins 1994（1989）。

各种各样宁愿把这些白银保留在国内(举例来说,作为一种供支付战争费用的储备)的西方知识分子和政治家,一直坚决主张应该把其他商品运送到亚洲取代白银。在文字记载中,他们的主张要点常常使事情看起来好像是“西方人”一直竭尽全力想让“亚洲人”购买其他外国商品,而中国人的民族优越感实在太强(或西方的工匠太笨),使这种努力无法实现。但强调这些争执,像强调中国皇帝关于朝贡贸易的特有形式及限制的规定一样,是把一些政治领袖的意见误解为整个社会的喜好。在上面两种情况下,交易什么商品的实际决策都是由植根于市场的商人作出的。

把白银作为现代“货币”——换句话说,一种为弥补欧洲“贸易赤字”而转让的抽象价值的余额储备——进一步加强了把中国的进口偏好视作一个文化保守主义的信号的倾向。相反,我们必须把白银本身视为一种商品;一种以矿物为基础的精炼产品,它非常适合于一种重要职能,并且在西方能够远比在亚洲任何地方(除了某些时期的日本)更廉价地生产;而地质上的偶然性使中国几乎根本不能生产它。此外,它还是西方不仅在原料供给而且在提高产量的技术方面都占有优势的少数工业品之一;欧洲人铸造的硬币比亚洲使用的任何钱币更好也更难以仿造。^① 由于中国人使用的白银是条状的,这种铸造方面的优势与他们关系不大,但它对南亚人和其他用户有很大关系,他们通常是欧洲白银最初的买家,然后通过自己的贸易网把其中很多送到了中国。^②

把白银视为现代意义上的“货币”,认为它被送往东亚是作为商品的替代物,而不是作为一种中国人用作货币中介的商品,这种论点一提出就表现出明显的武断性。毕竟,很多很有名气的商品——丝、胡椒、鸦片、可可豆——也在一地或另一地行使过货币职能,但却仍然被视为商品。此外,很多白银在用作货币和用作装饰之间变来变去(例如首饰被典当或被熔化时)。把白银当作一种具体的商品而不是当作现代钞票的等价物,有助于我们弄清下述事实的意义:就在白银流入中国的同一时期,大量黄金从中国流向了欧洲和印度。^③ 最后,西方学者中长期存在的把西方看作这个紧密结合的世界的积极(而令人满意的)代理人的倾向,也加强了把白银当作一种送往中国去支付

^① Perlin(1995)没有谈论绝对优势(鉴于欧洲人在印刷和金属冲压方面的优势,看来可以假定如此),但确实强调了市场能量足以促使在欧洲生产多种专门为了最终用于亚洲国家国内流通的硬币。

^② Flynn 1995:429—448。

^③ 对这一问题的一种更详细的解释,见 Flynn and Giraldez 1996; Von Glahn 1996: 83—142, 224—237; Perlin 1991: 315—348。

日用消费品价值的余额储备的倾向。但是一旦我们想到，这种态势是通过这一时期世界经济中可能高达40%的部分（当我们计入中国的也在“白银化”的属国时）改变了货币基础而产生的，就不难看出，中国的白银需求在创造一种全球经济中起的“积极作用”每时每刻都与西方对瓷器、茶等等的的需求同样大。

我们将在第6章更全面地讨论新大陆的白银。这里重要的是一个更具体的观点：西方在白银输出中的巨大的比较优势吸收了来自亚洲的开创新风的著名商品。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有如此之多的其他异国风味商品流入欧洲——它们用白银支付，并使欧洲时尚的车轮转得比别的地方更快。（我们将在第4章讨论这种流入的其他一些理由。）它使这种独特的流入固定在一一种跨越欧洲、亚洲和美洲的经济关联中，而不是欧洲独有的任何“唯物主义”^①或“好奇心”。由于欧洲获得并经营美洲的银矿，也提醒我们想到高压统治在促进欧洲经济优势中的巨大意义。（先进的技术也有作用，但如果没有强占矿产和强加于当地居民的劳动义务，它们就不会有意义。）在这种具体情况下，向外推行高压统治的成果可能对它们加速时尚变化的方式起了重要作用，从而对欧洲内部以市场为基础的互利贸易起了重要作用；但有决定意义的是，解释的方向是从海外高压统治发展到国内斯密型动力的特别加强（然后再到进口替代的工业化），而不是从更为有效的国内交易和工业生产发展到压迫海外居民的权力。

最后，我们必须记住，即使白银引起的奢侈品输入为时尚机制提供了什么特别的加强，说欧洲人对“非必需品”的需求比中国人或日本人的需求有更强的能力，足以产生一种真正的经济差异，都只是一种推测——不是松巴特、布罗代尔和其他人认为的那种必然事实。如我们以前所见，无论社会最上层的奢侈品需求发生了什么情况，都没有明显的理由可以使人认为欧洲的“勤劳革命”和大众对斯密型动力的参与比在中国（或许还有日本）更为明确得多。有待考虑的是新奢侈品的需求有些时候具有的第二种意义——它在成功的商人和手工业者中引起了新的资本积累，引起了比较大的经营者的新优势，从而导致雇用无产阶级化的工人的资本主义企业的诞生。本章最后一部分将转向这些观点，下一章比较全面地考察金融制度和“资本主义”。

162

① Mukerji 1983。

奢侈品需求、社会体系和资本主义企业

松巴特关于奢侈品和欧洲资本主义起源的杰出著作提出，奢侈品需求增长引起了新型手工业者和商人的出现。由于原料的费用、获得精湛技术需要的时间、向通常有权但缺钱的消费者收帐的困难，大多数手工业者无法独立生产这些商品。

这实际上并不新鲜。很多奢侈品生产需要的流动资本常常超过一个手工业者能够筹集到的数额，这个问题以前是通过由最终的拥有者委托制作并为工作提供资金来解决的；手工业者通常在主顾的庄园里做他的工作，这种做法防止了携款潜逃，并使主顾可以随时干预设计方案的选择。然而，现在这些商品需求量的增长以及需求在城市中的集中，意味着一个能够自己负责生产费用的生产者（或经销商）可以利用规模经济并从而比在旧制度下工作的手工业者生产出更廉价的商品。

松巴特提出，这样一来，出现了一些独立店铺，它们先进行生产然后再把商品卖给任何有足够的钱的人。然后，这少数非常成功的手工业者兼商人开始以更大的规模进行生产，并雇用数量更多的手工业者，后者由于缺乏足够的资本，永远不能成为独立的生产者；相反，他们逐渐变成了无产者。^①

这种情况确实出现过，但我们对其数量不应估计过高。甚至到 18 世纪后期，用不着离开大城市中心很远就能发现旧式的委托制作工作占优势地位。^② 出于同样理由，在中国和日本的大城市中也发现了松巴特所描述的同
163 样现象——诸如现成的奢侈品与委托制作的工作方式同时并存。^③

同时，在其他地方，定制的手工业品产量完全可以满足一个奢侈品需求高潮。曾有欧洲人提到，在印度的大城市中能够得到一个人可以实际想像到的一切东西，正是这同一些欧洲人也提到，获得这些商品通常是通过强迫手工业者承担专门的定货，而不是通过在独立的店铺中购买它们。^④ 再一次，这一模式在整个次大陆并不是始终一致的：印度农村很多织工相当独立于任何一个买主/主顾之外。阿拉萨兰姆(S. Arasaratnam) 对 18 世纪印度东南部的

① Sombart 1967:134—135。

② 例如 Dewald 1987:195。

③ Clunas 1988:65—72; Clunas 1991:155—156; 关于日本，见 17 和 18 世纪一个中型港口新潟的店铺中出售的现成商品的种类：竹越與三郎 1967:3:11。

④ Raychaudhuri 1982b:266。

研究表明,即使织工接受了对他们的工作预付的现金(如大多数人所做的),与欧洲通过散工制接受原材料的织工不同,他们对其产品仍保持相当大的支配权;在港口或其他有很多潜在买主的区域附近的织布村庄中,这种情况转化为相当高的自主权。^①

所以,这是一条脱离手工业劳役和受少数几个非常富裕的主顾直接支配的漫长的道路。但在大部分情况下,这些织工不是直接与商人打交道,而是通过半世袭性质的织工首领(有时也通过其他仲裁阶层)。这些织工首领“对一组织工实行一种家长制控制,但不从经济上控制他们的劳动果实”,^②他们看来安排了大大增长的产量,通常有非常高的质量,同时并没有成为直接控制生产的资本家,也没有创造出由那些提供资金并出售产品的人直接监督的无产者。

在东南亚的城市中,贵族消费者也仍然在发号施令。熟练的手工业者永远有违背他们的心愿被带到宫廷中去的危险,常常发现在某一个贵族或富有的商人庇护下工作对他们来说是最好的保护。^③ 17 世纪的马六甲——有 20 万人口,大于几乎所有的欧洲城市,只有几个例外——甚至明显得到了几乎所有奢侈品种类的供给,而没有出现“资本主义”手工业者兼商人的发展。尽管东南亚手工业者的稀缺常常使他们可以为自己谈判到相当好的条款,但直到 19 世纪末,在欧洲殖民政体完全终止了合法的私人奴役之后(但是没有终止主顾—受庇护人关系的文化意义),他们才开始脱离一种主顾制度和定货生产(甚至在资本密集的金饰行业)。^④

此外,各种各样非奢侈品生产的逻辑性可能为向一种资本主义结构的转移提供了不同的并同样引人注目的理由。例如,中国的采伐业沿着这一方向 164
发展是由于冒险进入森林并最终得到原木的收益要等待很长时间,还要加上对相当多的成队的伐木工的需求。到 19 世纪,采伐企业雇用了成千上万的工资工人,而不再向较小的独立经营者购买木材。^⑤ 一个甚至更明确的实例发生在德川晚期的渔业中。

北海道的渔业早已是一种商业经营;捕捞的鱼大部分成为鱼饼肥料卖到比较富裕但生态压力更为严酷的地区。在德川晚期,需求伴随着本州很多地区农业的持续商业化而膨胀。同时,本州东北角的一次大灾荒使人口稀疏的北海道可以使用的工资工人有了巨大增加,使大型契约渔场得以广泛使用一

① Arasaratnam 1980:259—260。

② 同上,265。

③ Reid 1988a:135—136。

④ Reid 1989:64—71。

⑤ 吴和许 1985:437—439。

种新的高效但昂贵的渔网，这种渔网需要 15 到 20 个工人操作。这样一来，契约渔场在与这一地区众多的独立渔户竞争中获得了优势，并改变了它们与后者的关系。大渔商很久以来一直把钱借给较小的渔户，然后购买他们的捕获物，但在劳动力不足而需求增长的情况下，他们既没有动机也没有能力使这些供应者无产阶级化；甚至拖欠了上年贷款的渔民通常还能得到新的贷款继续独立经营。但一旦可以使用更多的工人和新渔网，这种情况就发生了变化，现在取消抵押品赎回权、购买更多的渔网、把拖欠贷款的渔民变成工资劳动者都有了意义。简言之，资本从商业领域转移到生产领域本身、工资劳动增长、有较多固定资本的集中的协作生产成为典型，这一切都集中在一种产业中，有一条人们能想像出来的最简陋的生产线。^① 再一次值得记住的是，欧洲奢侈品消费确实与中国、日本和东南亚（尽管或许不包括印度）明显相反的一个领域——住房——是那些手工业生产结构破坏得特别慢的领域之一，在这些领域中，直到 20 世纪才开始出现能够形成规模经济的很多完全相同的单位的生产。

所以，下面的结论看来是不可避免的：某些奢侈品的需求与其说创造了其他生产体系，不如说是创造出了出售预先生产的美观小摆设的店主和众多的店员，这种奢侈品需求的尺度和性质就其本身而论并不重要。有意义的是在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都普遍变得越来越重要的社会内部的需求增长（有时还要有规模经济）。如果没有这一背景，贵族消费者对巴黎手工业者不断增长的需求（松巴特引用他们利用其权力逃避帐单的欲望作为一个理由，说明为什么只有最资本主义化的手工业者才能幸存）复兴旧的生产关系就可能像
165 改革旧的生产关系一样容易。来自商人、“富裕农民”和其他比贵族政治权力少的人的需求，对一种生产现成商品的新工场可能有更大的刺激作用，但如我们所见，有很好的理由认为，“奢侈品”需求至少在中国和日本的不同阶级中像它在欧洲人中一样扩散。也如我们已经比较充分地看到的，说到“自由劳动”和市场在整个经济中的重要性，欧洲并不比中国和日本突出；事实上，它可能至少落后于中国。至少，所有这三个社会在这些方面彼此的相似，远超过它们之中任何一个与印度、奥托曼帝国或东南亚相似的程度。

所以，至少到现在为止，看来在这三个社会中，有着我们普遍认为是“资本主义”性质的新型企业诞生所需的同样的条件。因而，到了考虑我们为什么会如此频繁地听到这类企业——和更广义的“资本主义”——仅在欧洲出现的时候了。

^① 见 Howell 1992:271 ~ 278。

四、看得见的手：欧洲和亚洲的企业结构、社会政治结构与“资本主义”

166

一些历史学家，其中大多数受费尔南·布罗代尔影响，指望用位于经济顶点的大型企业解释欧洲的独特性。这些各种各样的观点（像那些论述消费的观点一样）有时还不如第一部分中讨论过的观点精确，后者提出的是一个明确而相当简单的“完善的”市场模式和/或可以计量的财富尺度。而这些人认为，集中的资本积累——也称作“资本主义”——的理想条件包括了财产权（包括金融资产的保证权）和竞争性市场的普遍发展，但也包括一些安排，允许某些人通过规避竞争性的交换、限定其债务、保护他们在诸如垄断和包税这类非市场或反市场特权中的权力而获利。

由于这些观点用一种由互相矛盾的趋势构成的复杂的混合态作为资本积累的“正当权利”，使它们难以实际应用并进行比较性的讨论。提出一个具体的亚洲社会就可以反驳第2章中提到的有关市场的观点，而要证明一个欧洲独有的“资本主义”则需要对层面更广泛的案例进行比较。此外，这里我们的确发现了欧洲一些名副其实的组织上的优势——但在1800年前的世界里，除了战争、武装长途贸易和殖民外，它们似乎只适用于极少的努力中。因而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将最终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欧洲以外贸易与殖民地的政治经济方面。如我在第三部分将证明的，欧洲以外的活动至关重要——与其说是由于它们促进了金融积累，不如说是由于它们使自然资源的供给有巨大增长。

布罗代尔本人详细说明了工业化前整个旧大陆上的大商人有多么多的共同特征。这些特征中实际包括了所有他指称为“资本主义”的行为：运作高度“透明的”竞争市场、使生产者和消费者几乎互不相识的交易成为重心、利用信贷阻止渴求现金的交易对象（从挨饿的工匠到摆阔的君主）与潜在的竞争对手打交道、在高回报的活动间反复移动等等，所以资本主义专指“资本进

167

入无间断的生产〔或分配?〕过程”，而不是进入任何具体的商品生产线。^①

这种不安定的一个原因是，在前工业社会中，对于最成功的商人来说，没有一个单独的部门有足够的经济潜力：“商人没有专业化是由于在他能够从事的商业中，没有一个分支发展到足以吸收他所有的能量。人们也常常同意，过去的资本主义很小是由于它缺乏资本……事实上，商人的来往信件和商会章程揭示出很多资本看起来都是徒劳无益的投资。”^②这种资本过剩只有在19世纪技术发生迅速变革时才发生了变化，因为后者使得为购买改革实际生产过程所需的设备而投入的大笔资金能够获利。直到那时为止，最成功的资本家面临的一个永恒的问题是在哪里再投资他们的利润——与曾经是安全的专属于他们的产品形成竞争的仿制潮流减少了他们原有的高回报，使这一问题更加恶化。（这也使各种各样能提高人的地位，但非生产性的利用利润的方式越发具有吸引力——这是其他人比布罗代尔强调更多的一个观点。）

因而，布罗代尔认为，资本主义发展缓慢，并且只有在一种非常稳定的社会秩序——在这种社会秩序中，所有权被认为神圣不可侵犯，从而使资本家家庭得以历经很多代人扩张他们的财产——存在的地方，才能成为真正的力量——布罗代尔声称这些条件只在欧洲和日本得到了满足。^③ 无论中国还是伊斯兰教社会，他认为，政府的权力都太大了，使富有的非统治者不能享有任何真正的安全；在印度，种姓制度对职业的限制使大商人有一定的安全，但还不够，同时还限制了他们从事新的事业的权力。^④

K. N. 乔德里对欧洲与亚洲所有权待遇的差异提出了类似的尽管多少有些更狭隘的看法。在他早期的著作中，乔德里强调1500年以后欧洲的某些企业形式——接受存款的公立银行和股份公司——使投资更为方便。^⑤ 乔德里对这些观点的阐述以韦伯的论述为基础，后者认为只有西欧才发展起使企业的资源、本金和代理商可靠地隔离开来的理念和会计制度，使得计算真实的企业收益率成为可能，从而使资本积累最大化。

但是最近的研究推翻了这些观点。举例来说，中国的会计制度远比韦伯
168 设想的复杂；在19世纪后期“管理型”的大企业涌现之前，也只有很少的西方

① Braudel 1977:47。

② 同上，60。

③ 同上，69—71。

④ 同上，72—74。

⑤ Chaudhuri 1981:40,45; Chaudhuri 1985:212。

企业采用了最“理性的”西方会计制度。^① 中国很多企业生存了数百年之久, 尽管它们并没有完全实际与之分离的家系曾几度沉浮。商业世家的记录特别缺乏, 因为人们极少夸耀这种成就,^② 但仍然有一些实例保存下来。经营着许多布店的瑞蚨祥商号持续了三百多年, 玉堂商号, 一家从事食品加工的商店, 从 1776 年一直营运到 1949 年以后。^③ 天津有一些商业世家从 18 世纪 (甚至 17 世纪后期) 一直兴盛到 20 世纪。^④ 如果更为全面地观察家族谱系, 就会发现有一些家族延续了一千年甚至更长, 尽管中国只有极少的世袭职位, 并且 (如我们所见) 几乎没有不可转让的土地。^⑤

此外, 即使那些主要是与一个家族联系在一起的企业, 通常也会从其他家族吸收一些资本, 并雇用职业管理人员。^⑥ 很多企业筹集到足够的资本可以跨越巨大的地理区域从事经营活动, 开始进入多行业经营, 甚至达到一种实质的垂直统一管理程度。^⑦ 据记载, 19 世纪初陕西省的大木厂, 每家雇用的工人都在 3000 到 5000 人之间。^⑧ 这使它们成为前工业世界中最大企业中的一些, 并无疑暗示出它们能够筹集到足够的钱从事任何前工业活动或早期工业活动。到 19 世纪, 在汉口这个中转大港, 有很多企业是按照股份制原则组织的, 投资者来自全国各种各样的不同地区; 四川富荣大型盐场中制盐和售盐的企业也是如此。^⑨ 在印度北方和其他地区的班贾拉 (banjara) 和班亚 (banya) 商人团体中也常见到包括很多非亲族投资者在内的复杂的商业伙伴关系^⑩。这些企业无疑仍然没有达到韦伯的理想形式, 但大多数西方企业是否实际更接近韦伯的理想形式也并不明确。

在后来的一些著作中, 乔德里较少关注他早期对理性的企业结构的论

① Chandler 1977; Gardella 1992a: 317、331 以及特别是 321。

② Mann (1987: 91) 提供了一个出色的实例, 包括中国传统史书中用什么样的方式有意削弱商业对于有名望的家族的重要性, 以及一些用来把商业成就表述为一种不同的、名声更好的成就的代名词。另见 Pomeranz 1997b: 19。

③ 关于瑞蚨祥, 见 Chan 1982: 218—235; 关于玉堂, 见海山 1983: 48—78、90—106 和 Pomeranz 1997b。

④ Kwan 1990: 260—272、290—294; 张筱伯 1995: 67—72。

⑤ Beattie 1979: 1—23、127—132; Dennerline 1986: 173—179、194—207; Rowe 1990: 51—59、63—65; Watson 1990: 247。

⑥ Chan 1982: 219—222。

⑦ 实例见 Pomeranz 1997b (关于玉堂商号)。

⑧ 吴和许 1985: 439。

⑨ Rowe 1984: 72—73; Zelin 1988: 79—80、86—90、96—101; Zelin 1990: 87—88、91—95、106。

⑩ Habib 1990: 389。

169 述，^①更多地致力于一种所谓的亚洲商业资本缺乏安全的观点。^② 布罗代尔有时认为这种情况反映了亚洲一种普遍更为独裁的统治制度，与布罗代尔不同，乔德里认为人身和土地财富在亚洲不一定比在欧洲更不安全。但在亚洲，商人企业的资本不像在欧洲那样是与人分别对待的，所以仍然是不安全的：

在亚洲这些商业民族中，商人和银行家无法把他们的投资纳入受法律保护并受国家鼓励的公众利益领域。把钱投入威尼斯或热那亚共和国债券或阿姆斯特丹银行债券的公民并不能免去金融风险。但债券的特性是受法律承认并有抵押价值。把钱借给统治阶级上层人物或帮助实现税收的印度和中国商人却不能使他们的国债制度化为可以上市的资产。

在亚洲，土地私有权观念既不受规模大小的限制，也不受业主类型的限制……商业资本从来不是这样。商人及其经营基金始终是不可分离的。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商业活动在印度洋普遍存在。社会和法律几乎都不承认资本的生产作用与其所有者完全是两回事。^③

资本和资本家之间缺乏分离，乔德里认为，起源于下述事实：亚洲大帝国中的统治阶级与欧洲城邦中的统治阶级不同，他们既不为政府利益也不为他们的自己的利益从事商业活动：

社会认为其他生产要素——土地和劳动——是可以分割的；拥有充足购买力的任何人都能购买土地并雇用劳动者。但在贸易和产业中使用的资本一直坚定地掌握在商人群体手中。有权力占有能产生持久收益的商业投资可能会比直接向商人征税更好，这样一种观念似乎从没有在亚洲统治者的脑海里出现过。如果曾经有过，另一种情况必然会随之发生：需要对这种权力和权利作出法律限定。由于它在法律上一直不明确，并在社会中受到曲解（一直与高利贷、独占和垄断联系在一起），资本的社会所有权范围，以及它的具体利用、管理和积累范围也一直受到限制。^④

① 他的早期观点见 Chaudhuri(1978, 1981)。

② Chaudhuri 1985, 210—215, 226—228; Chaudhuri 1990, 386。

③ 同上, 210, 214。

④ 同上, 228。

所以，“对任意征收的恐惧始终挥之不去”。^①

然而，亚洲的大商人是否比他们的欧洲同类实际上遭受过更多的没收是不明确的。一旦我们把欧洲君主们赖账时发生的事实上的没收加入进去，这样一种观点就显得特别值得怀疑：如我们即将看到的，至少南亚一些商人面对这种情况有相当大的保护，中国商人则极少碰到这种问题，因为政府很少借款。德川时代的日本商人——布罗代尔认为他们享有与他们的欧洲同行同样的优势——可能比中国或印度的商人遭到过更多的事实上的没收（通过贵族和领主赖账，以及将军制定的免除债务的法律），尽管在这一阶段后期变得比较少见。^② 170

此外，尽管一定水平的财产安全对于市场运作是明显必要的，但却不一定每一个安全增量都会自动降低风险费用、使资本降价并推动经济发展。格雷格里·克拉克发现，尽管国债的利息率确实对 1540 到 1837 年间的政治危机与稳定的长期趋势作出了反应，但私人交易要求的回报率一般说来并不如此。此外，保护财产免遭征收和税收侵害的政治体制中的巨大变革（例如国会对政府预算控制的加强）对私人交易中的资本价格没有产生明显影响。因而，他对制度环境逐渐“改善”是工业革命的一个重要前提产生了怀疑；至少在这一方面，英国的制度至少早在 1540 年就足够稳定，而由此而来的较少独裁和腐败的政治体系的发展对资本市场却并不重要。^③ 如果英格兰的财产安全在大约 1540—1600 年和 1690—1760 年这两个时间段的差异并没有对资本价值造成巨大差别，为什么 18 世纪欧洲和东亚（或许还有南亚）之间的差异会造成关键性的差别就更加说不清了。

但是即使中国或印度政府对商人的威胁并不比欧洲各国政府对商人的威胁大很多，商业资本及其所有者之间没有完全分离可能仍然是个问题。有人认为，在中国，扩大的亲族对任何富裕成员的财产拥有权力抑制了资本的长期积累，因为供养鳏寡孤独、教育和求官的“慈善信托”性质的不动产吸干了利润。然而，最近的研究显示，天津的富商在把他们的财产与他们兄弟的家庭财产分开时很少遇到麻烦，甚至随着时间的推移麻烦还更少。^④ 相反，“慈善信托产业”本身可能是商人资本长期积累的一个手段。我们正在发现越来越多的实例，在这些实例中，这些理论上不可转让的信托产业被租借给

① Chaudhuri 1985:213。

② Totman 1993:333(强迫借款)，和 519(一些拖欠持续到迟至 1831 年)。

③ Clark 1996:587—588。

④ Kwan:1990;张筱伯 1995。

企业家，或拥有一些商业或工业企业而不是土地。^① 这里，亲戚和共有财产的联系是为资本的长期积累服务的，它使家族的每一个分支都可以从这一事业中得到一个收入源泉，同时任何分支要想提取其本金都非常困难；管理者（有时是从家族以外雇用的）看来对制定企业的支出比例、根据需要留存收益有着重要权力，很像现代的公司经理。^② 而且，与何炳棣 45 年前研究过的扬州大商人——他们的奢侈生活和对加入文人雅士圈子的渴望长期以来影响着我们对帝国晚期中国商人上层的印象——不同^③，直到 20 世纪政治日益强化使商人子弟进入官场成为必要以前，天津和富荣的商人世家都没有为把他们的子弟送入官场而作出巨大努力。^④ 最后，我们应该记住，直到 19 世纪晚期——完全进入工厂时代——以前，欧洲经济中除了几个部门外，家族企业也都占主导地位。

西欧和东亚的商业组织在欧洲人认为最重要的一个部门——海外商业——中可能最为不同。欧洲人创造出新的合股经营形式并最终形成股份公司，主要就是为了远距离贸易和开拓殖民地。这些形式的确使资本及其所有者之间分离的制度化达到了一个新水平，并在这样做的同时促进了贸易航行和对于一个单独的投资者来说过于庞大的货运统一管理。

相反，一只在东南亚水面进行贸易的中国帆船典型情况下运载着很多不同商人的货物，这些商人或他们的代理人在船上做船员工作，得到货位代替工资。由于这些船的货舱细分为很多间隔，一位学者把这些船描述为“就像一座漂浮在水面上的广州郊区市场”，而其他人士则断定这类贸易只能是一种“落后的”、“沿街叫卖的”“小”资本主义的组成部分。^⑤ 但是，如我们下面将看到的，只要欧洲人不使用武力，用这种方法经营的商人在大多数路线上与欧洲人的竞争都取得了成功。（当然，他们可能通过接受较低的利润来占领市场，但我们没有这方面的证据，中国的资本价格比较高也使这种做法不大可能。）

事实上，这样一种体系是对利用这些航线上的季风的完美认识。由于在风向自行反方向改变之前商人无法回家，他就不能大幅度减少花在港口（一

① Zelin 1988:97—109; Zelin 1990:86—88, 92, 95, 98; Kwan 1990:271—272, 290—300; Pomeranz 1997b.

② 这种相似性的例外，如 Kwan 注意到的（1990:272 注 2），是缺少一个公司普通股市场，能使具体投资者的资产折现为符合企业对实收资本的需求——但玉堂商号似乎也找到了一种方法处理这一问题（Pomeranz 1997b）。

③ 何 1954。

④ Zelin 1990:99—100, 105; 张筱伯 1995:88—91; Kwan 1990:175—187, 262—276。

⑤ Ng 1990:315; 这一出色的描述见 Van Leur 1955。

用武力推动中国的海外商业，尽管那里的利润率可能高得异乎寻常。清政府，如我们将看到的，的确对于每年前往东南亚的“客商”表现了某种关心，但对定居海外的中国人却表现出冷淡或敌意；而后一种人对建立贸易基地或殖民地至关重要。任何中国政府都不会许可以中国为基地的私人武装贸易的发展。清王朝在 1680 到 1760 年间大约使中国的面积增加了一倍，但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中亚，而中亚对沿海商业几乎没有利害关系。因而，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现代早期欧洲彼此竞争的国家相比，更不利于一个具体的资本主义部门的发展。

此外，中国政府很少借款，没有让很多商人参与税务托收，19 世纪中期以前也很少出卖官职（尽管有多种级别的考试）。^① 尽管中国政府确实建立了一种国内垄断——盐——一些专卖商通过它变得特别富有，还有一些比较小的垄断，但它在这方面比欧洲政府做的少得多。中国政府没有对糖、烟草、酒或其他日益流行的“小奢侈品”实行垄断，而这种垄断使欧洲的统治者及其宠爱的商人都获得了非常多的钱。因而，国家财政——它不仅使欧洲很多最富裕的资本家获益匪浅，还成为新财政制度的一个试验室^②——为中国的大商人提供的机会少得多。

所以，至少对中国来说，可以认为，一个通常能够依靠现行的以土地为基础的税收制度生存的政府，比它的欧洲同行对其商人干涉较少，但为商人创造的机会和特权地位也更少；以后我们将回到这种可能性上来。或许欧洲最大的企业通过与政府的关系获得的特许权值得它们接受政府干预，所以欧洲的政治经济比中国的政治经济更有助于资本主义积累。但这样一种观点尚有待证明。

174 另一种可能性是，在欧洲，为适应政府的财政需求而产生的制度改革一般说来导致了更有效的资本市场的发展。这看起来有一定道理，但我们在详细说明更为复杂的资本市场与哪些活动相关时必须非常小心。在转回这一任务之前，我们需要再多涉及一些非常宽泛的观点，这些观点认为渴求信贷的欧洲政府对金融资产提供了特有的保护。考察亚洲除中国以外一些国家财政与私有市场之间多种多样的关系的实例，将对从政府对信贷的需求到对资本的保护再到更一般意义上的廉价而丰富的信贷之间的任何直接联系提

^① 关于明代国家财政，见黄仁宇（R. Huang）1974：5、24、49—50、80、104、112、114、119、148、150、203；关于商人参与税务托收，见张筱伯 1995：94—98；关于出卖官职，见何炳棣 1962：33、47—50；关于商人很少卷入政府财政事务的一般描述，和与现代早期欧洲的比较，见王国斌 1997。

^② Van der Wee 1977：345、352、368、373。

出疑问。

在东南亚,殖民地时期前的大部分政府无论按照欧洲还是中国的标准看都相当软弱;尽管一些大陆国家正在日益强盛,^①但商业化程度较高的岛屿国家并非如此。很多东南亚国家政府是越界贸易热心的赞助者,并积极吸收商人从事政府税收的预付、征收和管理。^②然而,这些政府在它们的社会剩余中所占比例都相当小,^③所以它们所提供的通过购买财政特权或商业特权而获得高额利润的机会也比现代早期欧洲的机会更少。

但政府借款在中国和东南亚的发展比在西欧慢得多,并不意味着私人信贷和金融资产一般说来比其他地方更不安全。同时在南亚和中东的很多地方,势均力敌的对手间激烈的军事竞争更为普遍,创造出了与现代早期欧洲政府需求相似的财政需求;^④并且在一些这样的区域中,人们发现发展中的财政制度看上去与欧洲的一样复杂。

最近的研究成果描述了一种南亚的资本主义,它突破了恰恰是乔德里所强调的那些限制。例如,弗兰克·佩林(Frank Perlin)指出,印度各地的大家族在14世纪开始积累村庄领导权、收税权和其他分享土地产品的权力。获得这些权力通常是通过借钱给政府,给其他重要家族,并且越来越多地给农民本身。^⑤在这个过程中,农民产出中这些可以分离的份额逐渐在制度上被限定,它们受到保护的程度是一致的,即使国王也不能废除它们,^⑥而一个拥有者却可以出售或转借它们。换句话说,它们与布罗代尔和乔德里提到的欧洲的债券或对未来税收的留置权同样“安全”。^⑦事实上,在印度,国家财政管理看来是从私人财政改革进化而来,而不是反方向的发展。^⑧

在佩林和安德烈·温克(Andre Wink)集中注意印度北部和中部的同时,¹⁷⁵桑贾伊·苏布拉马尼亚姆(Sanjay Subrahmanyam)在印度南部发现了甚至更为有力的证据,证明了积累资本的家族与商业化的国家财政之间的互相渗透。苏布拉马尼亚姆追溯了他称之为“资产组合资本家”的经历:这些人把各种活动结合在一起,包括远距离贸易(主要是高利润的奢侈品)利润的不断变换的混合;信贷、票据托收和其他金融活动;购买或租借税收权和政府独占权

① Lieberman 1990:79—80。

② Subrahmanyam 1993:18—25; Reid 1993:116,120。

③ Reid 1988a:120—121,126—129; Reid 1993:116—120。

④ 见 Bayly(1989:52—55),对莫卧儿、萨非和奥托曼帝国“军事财政”的一个综合论述。

⑤ Perlin 1985:特别是 422,432,442—446; Perlin 1979:179,187—192。

⑥ Perlin 1985:448 注 83,452。

⑦ 同上,442—448,452;另见 Wink 1983:606—608。

⑧ Perlin 1985:431—432。

(例如钻石矿);资本密集型的土地开垦(通常购买边境地区的征税权,为移民与灌溉提供资金,然后利用信贷和征税权提供的杠杆作用,成为当地生产的输出品的惟一买主);担任英国和荷兰在当地的收购代理商;作为一名朝臣或将军,或是军队供需官。^① 在这里,对未来收入源泉的权力也成为强大的习惯,有时受到正式的保护;它们最终变得可以买卖、可以继承、可以抵押,非常像欧洲大部分地区的等效利益(equivalent interest)。

在更近的研究中,苏布拉马尼亚姆对从南印度到他所谓的“现代早期的亚洲”进行了归纳,^②提出有两个特别庞大而重要的“资产组合资本家”集团分布在印度洋及其毗连海域的广阔的海滨地区。伊朗人使自己插足于从东非沿海到中东、南亚和(后来)东南亚部分地区的贸易、征税与托收、财政、高利润的生产部门(例如政府矿业)中。同时中国人从沿海的广东和福建扩散到整个东南亚。这两大集团都把最初在私营交易和财务中发展起来的手段带到了政府税务征收事务中,同时利用政府关系取得有利可图的特许权,获得了不公开的情报,在其他方面增进了他们的商业利益,与佩林描述的情况差不多。^③

对于一系列依靠其贸易中转地的位置(马六甲、霍尔本兹等)生存,必须为流动商人提供良好环境的城邦来说,“资产组合资本家”的活动和他们所渗透的政府的全面重商主义态度有最充分的文献证明。^④ 仅这些城邦就构成了一个地带,其享有的活跃和安全可以与现代早期欧洲的资本家相比——注意乔德里指的是威尼斯、热那亚或阿姆斯特丹的债权人享有的明确的法律地位,而不是那些借钱给法国、西班牙或其他欧洲大国的国王的人的比较不确定的地位。(甚至在欧洲民族国家中最为赞成重商主义的英格兰,政府也在查理一世与议会战争时期拖欠实质性债务,其他一些皇家债务在延期几十年后是否曾经归还也无法确定。^⑤)

苏布拉马尼亚姆接下来提出,南亚和东南亚拥有大片土地的帝国越来越遵循这些城邦的榜样,同时这些城邦中有一些正在获得对内地的实际控制。因而在印度洋的农业大国和商人统治的城邦中,政府财政以前的分离模式出现了某种集中,“资产组合资本家”可以在其中安全活动并获利的领域也出现

① Subrahmanyam 1990:298—342。

② Subrahmanyam 1993:第1章。

③ 同上,20—26;Subrahmanyam 1990:298—342;Perlin 1979:171—237。

④ Subrahmanyam 1993:16。

⑤ C. Hill 1990:188—189。

了巨大扩张。^①

在这样一些拥有大片土地的帝国中作为中介为政府税收服务的 18 世纪的商人，其利益得到的法律保护甚至可能大于他们的大多数欧洲同类所享有的。以孟加拉为例——其人口比除俄国或法国之外的任何欧洲国家都多，在 1770 年可怕的灾荒之前有近 2000 万人口^②。贾加特·塞斯(Jagat Seths)家族，政府的银行家，通常向纳瓦布(统治者)预付税收，从而获得征收他们已经预付的税款的权力(他们再通过契约把这种权力转包出去)。在统治者被国内外敌人推翻时，他们的权力明显保持完整无缺——这是他们共谋推翻一位试图废除其前任已经卖出的各种特权的纳瓦布的重要原因之一。^③ 他们那些向欧洲君主提供贷款的同时代人通常缺少这种选择权，尽管他们可能需要它。

引人注意的是，我们发现这些“资产组合资本家”在印度相当活跃，而与中国、日本或西欧相比，印度的普通人口可能更少卷入市场；他们的存在特别明显地减轻了对一个资本家阶级发展所需条件与社会整体改革所需条件进行区分的必要性。在一部比苏布拉马尼亚姆的书更早的著作中，贝利提出，至少有两个因素限制了现代早期印度资本主义改革的潜在可能性。^④

贝利强调各种各样的征税权、独占权和其他特权中的交易——他称之为“王权的商业化”——是以大部分人口被排除在市场之外为前提的。如果购买者不确信他们能够继续霸占各种各样商品和劳务更为竞争性的市场的发展，这种权力就不会有足以进行广泛交易的安全存在。就这种意义来说，一种根本不是与市场经济发展携手并进的资本主义，完全可能对市场经济，并因而对更为全面的经济改革不利。

但贝利也对我们可以称之为印度资本主义灵魂的东西作了论述——尝试追随韦伯关于宗教信仰和经济活动之间的联系的观点，但依靠的证据要比 177 韦伯使用的任何非欧洲实例的证据更好。尽管我们在这里无法对他的观点作出完整的评价，但对其进行简要概述并探讨这些差异可能具有什么样的经济意义是值得的。

贝利认为，印度北部的多数商人不愿意模仿资产组合大资本家——无论是越来越深地卷入高利润、高风险和资本快速周转的投机事业(通常与政府有关联)，还是日益紧密地参与土地经营——是由于这些活动的形态与普通

① Subrahmanyam 1993:18-27; Subrahmanyam 1986:357-377。

② Van Schendel 1991:38。

③ Marshall 1987,40、51、59、71、75—79。

④ Bayly 1983。

集市商人对于他们应该如何的理念有冲突。具体说来，贝利认为，普通的印度商人关心的是保护家族“利益”——经济的、社会的和精神的。危险的投机、奢侈的生活或者仅仅是拥有可能使一个人（或其子女）进入奢侈生活的财富都可能危及这一利益。所以普通商人通过谨慎的生意、相对缓慢的资本周转和一种相对禁欲的生活方式建立起他们的地位——这一切都与一个野心勃勃的宫廷商人的生活相矛盾。此外，在商人中流传的一些警示性的故事暗示，直接经营土地或土地税特别危险，因为它会使人陷入一种复杂的庇护责任中，并且要对收成投下大胆的赌注。在一个大众购买力受到限制的经济中，进入管理政府税收、远距离贸易和其他可能有高额利润的领域永远具有诱惑力，但大部分印度商人的社会精神特质却指向远离这类活动的方向。“资产组合资本家”本身有时受到羡慕和妒忌，但他们更为保守的商人伙伴也常常把他们当作反面典型。^①

很难对商人文化的这一描述提出疑问，但也很难了解它有多大的解释能力。毕竟，对其野心勃勃的同僚不表赞赏的小心谨慎的商人不仅是印度的一个特征。甚至在像阿姆斯特丹这样的早期资本主义冒险家的温床中也可以见到他们。所以，正如西蒙·沙玛（Simon Schama）所指出的，对于许多市民来说，证券交易所是所有不正当投机买卖的一个符号，尽管极为谨慎的市立银行都把有价值的商业活动证券化。^② 此外，贝利本人引用了印度北部虔诚的商人的迷人例证，这些商人住在集市附近低矮朴实的房屋中，但同时在城市郊区维持着富丽堂皇的波斯风格的住宅，可以推测他们在那里经营着某种更有野心的生意。^③ 所以，虔诚能够支配的通常是一个人自我夸耀的东西而不是他实际做的事情；中国那些悄悄进行实际的商业投资的士绅家庭也是如此。

178 即使有很多商人按照他们自己的意愿真正置身于高风险高回报的投机事业之外，仍然不清楚这对经济整体造成了多大差异。无论如何，对数量有限的参与者来说，在那些部门中存在着机会，高利润的诱惑力看来也引诱了足够多的人，使此类活动不虞资本匮乏。与更为明显的经济关系对比产生的差异看来是一种结构性的差异——至少在一些欧洲国家中，借钱给政府最终证明体现了谨慎的投资，而在18世纪印度的混乱局势中与政府发生牵连始终是一种赌博行为。（克拉克引证和上文讨论过的英国利息率的变动，显示

① Bayly 1983:383—387。

② Schama 1988:347。

③ Bayly 1983:387—388。

出在对政府和私人借贷的风险进行比较评价时有一种类似的变化。)事实上,如我们即将看到的,通过竞争性的东印度公司和西印度公司在某种准政府行为——包括发动战争——中投资,实际上使欧洲产生了积聚长期资本的新形式,而在其他地区,投资于暴力活动仍然是一种较为短期的投机行为。但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主要不在文化方面,这些新的经济手段对除建立殖民地和武装贸易之外的活动的适应性看来也是有限的。

有一些迹象显示 18 世纪西欧的资本市场是全世界最有效的,尽管也有理由谨慎对待这一现象。17、18 世纪荷兰的利息率大概是全世界最低的,条件最好的借款人的利息率是 3%,英国的利息率则在 18 世纪降到了 4%—5%。^① 在 17 世纪后期的苏拉特,条件最好的借款人利息率在 7% 左右,而看来在整个 17 世纪印度的利息率一直在下降。^② 日本的利息率也是下降的,却是从一个较高的初始水平开始。向大名——他们拖欠的太多了,以致他们不能算是理想的借款人——贷款的利息从 1707—1740 年的平均 12.45% 降到了 1860 年代的 8.68% (尽管在后一个十年中有严重的政治动乱)。^③ 在中国,我们的零星证据显示,名义上的利息率在 18 世纪约与日本相同,19 世纪则高于日本。天津的“银号”在 18 世纪后期对政府和少数非常可靠的商人似乎都收取 10% 的年利率,^④ 而当铺认为政府贷款 12% 的利息率足以吸引它们反过来服从各种政府调节措施。^⑤ 这看来显示出“军事财政”更为显著和国家信贷更为发展的地方(南亚和首先是欧洲)确实产生了能使资本更广泛地分散到经济中去的更好手段。但我们不应该太快地作出结论说,甚至中国也受到 179

昂贵信贷的困扰。

首先,由于我们不知道 18 世纪中国的通货膨胀率,我们也就不知道它的真实利息率。其次,利息率随着借款人的不同而变化,风险较大的贷款利率在不同社会之间的差异不可能总与条件最好的借款人的贷款利率差异相同。此外,如果对借款人的评判有时是按照一定的标准而不是按照信用价值,低利息率就不一定能反映信贷的市场价值。例如,英国法庭的档案显示,17 世纪的出借人受到相当大的压力要把钱借给比他们社会地位高的人(并且不能取消抵押品赎回权),即使他们明知道对方没有偿还能力。^⑥

① DeVries 1976:211; Clark 1996:567。

② Habib 1982d:376—377; Chaudhuri 1981; Perlin 1990:269。

③ Hanley 和 Yamamura 1977:345。

④ 张筱伯 1995:97。

⑤ 潘敏德 1985:40—55; 潘敏德 1994:103—130。

⑥ L. Hill 未出版。

更重要的是,利息率对人们借钱投资的欲望不是惟一的影响,甚至也不一定是最重要的影响。例如,在中国,没收用作抵押品的土地极为困难;如果借款人拖欠债务,债主可以让他成为一个缴纳地租的佃农,但很难把他从土地上赶走,或取消他可以在某一天归还债务赎回土地的选择权。从一般人的角度评判,这种(习俗)惯例代表了财产权的一个严重缺陷,无疑提高了出借人要求的利息率。但借款人的看法可能不一样。无数的农民家庭在决定是否借钱买一架织布机、购买桑叶以便饲养更多的蚕、或者甚至是为一次婚礼筹措资金(从而得到一个新的劳动力)时,可能更愿意在几乎不会丧失他们对土地的全部权力的条件下冒险尝试高利息率,而不喜欢利息率较低但对拖欠的处罚更为严格。这种情况似乎特别可能出现在养蚕业中,那一行业中的借款期限普遍比较短,丰收的回报和失收的风险都相当高。

另一方面,在欧洲,农村工业的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普遍出自包买商而不是工人;这些一般来说更有偿付能力的投资者可能更不愿意冒险,他们宁愿以低利息率承担拖欠贷款时更严酷的后果,因为相对来说那是不大可能发生的。但是除非我们找到证据证明中国的利息率反映了资本的绝对短缺,或者证明这些利息率使某些重要行业不能赢利,我们就不能假定它们或是阻碍了原始工业和农业的进一步发展,或是阻碍了商业化。而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这两种假定都不可能是事实。

我们研究的核心区域中没有一个是经历过工业化资本绝对不足的状况。如布罗代尔所指出(在本书第148页的引文中),对早期“资本主义”的限制并非来自资本太少。^① 它们的产生是由于,在可以通过把大笔资金投入固定的厂房和设备,从而运用技术改进生产过程之前的时代,资本缺乏适当的出路。或者更准确地说,问题在于缺乏比投资于头衔和其他经济上非生产性的资产(尽管其中一些仍然能使个人有利可图)对富人更有吸引力的足够的投资出路。^② 由于中国——有本书所讨论地区最高的利息率——的生产力和生活水平仍然可与欧洲相比,它似乎不可能存在积蓄资产严重短缺问题,或缺少积聚资本所需的适当机构。英国大多数早期工业项目是由企业家或他们的亲族提供资金而不是求助于金融机构,既然中国人口中2%的最富有者在总收入中所占的份额看来和英格兰及威尔士的精英们占的同样多,^③ 很难了解为什么在中国不能发生同样的事情。对年代较晚有较完善文献记载的时期

① Braudel 1977:60.

② DeVries 1976:213—231.

③ 见前面第3章的讨论。

的研究,也显示出存在可能成为潜在投资的实际剩余。^① 日本的利息率仅略低于中国,既高于印度的港口也高于西欧的城市,一项对 1840 年代日本两个市镇和 29 个村庄的研究显示,农民中的储蓄率约为 20%。^②

尽管如此,利息率的差异是应该有一些影响的。正如结果表明的,最可能的设想是,西北欧比较廉价的资本和更为复杂的资本市场使这一特别的核心区域更容易从遥远的地区获得所需初级产品稳定增长的供给,而中国比较高的利息率则可能(尽管这完全是推测)对此造成阻碍。但在考虑这种假设之前,让我们先来探讨资本价格的差异直接影响核心地区自身生产能力的可能性。

这些差异不可能对核心地区的农业或原始工业发展构成致命的差异。潘敏德的著作说明了在 17 和 18 世纪的长江下游(华北也同样),农民是怎样通过借钱从事养蚕、植棉、家庭纺织业生产等等,大幅度增加了他们的收入的,即使是在高利息率盛行的条件下——事实上,甚至常常是以没有基本保证的信贷开出的最高利息率借款。他说明关键在于农民可以得到不止一个借贷来源,不会使农民陷入依附一个保护者的境地(无论是一个地主兼高利贷者还是一个独家垄断的包买商),并由此而阻止这个未来的生产者在竞争性的市场上买和卖;大多数农民可以明显地避免这种依附。^③ 正如我以前所说,农民甚至可能实际上更愿意这样做,而不愿意利息率更低但要为了拖欠贷款承受更为可怕的处罚。

人们仍然可以预期在欧洲有更多的织布机、纺锤之类会被购买,因为那里的商人购买它们时可以使用贷款比中国农民为此目的使用的贷款低廉得多。但只有在商人把他们从廉价贷款中得到的利益转让给生产者,而不是把那些利益留作利润或用来降低价格时,才会使更多的人认为纺纱或织布是值得做的事。而现代早期欧洲的纺织品市场竞争非常激烈,农村原始工业劳动市场又极不完善,众多劳动者面对的劳动力的购买者是在他们所在地区中独家垄断或有能力控制市场的少数人,^④在这种条件下,上述情况看来是相当不可能的。

要说明为什么中国与欧洲的资本价格及企业形式之间的差异会对早期的机器工业有决定性的作用甚至更为困难。工业革命初期的大多数技术都是低廉的。早期的纺织厂并不需要很多固定资本,很容易由家庭企业提供资

① Riskin 1975:65—80,特别是 75。

② 引自 Hanley 和 Yamamura 1977:357。

③ 潘敏德 1994:第 3 章。

④ 见第 2 章,87—89。

金。对前工业的制约造成最大破坏的英国煤业,直到 19 世纪的中期和后期,几乎完全是通过家庭和地方的关系筹集资本的。^① 在早期工业经济的这些部门中,几乎从来没有使用过有限公司形式。

此外,对早期的工业革新者来说,投资的高额回报足以使高于英国的利息率不会成为一种抑制因素。相反,17 和 18 世纪的荷兰^②——可能有全世界最廉价的借贷——没有产生一种有活力的突破;尽管对泥炭这一最有希望的地方性地下能源投入了大量资本,用于进行实验和建设基础设施以使运输费用低廉,但最终只不过证明了它在质和量两方面都是不够格的。^③ 因而,资本市场的差异看来不可能对 19 世纪后期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前的生产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在地方和地区性商业中,欧洲比较低廉的借贷可能造成了一些差异,但很难说清楚这些差异的程度有多大;由于这里讨论的所有社会都已普遍市场化,要弄清楚由较高的利息率引起的贸易中的一个小小的劣势怎样在中国、日本甚至印度成为有决定作用的“障碍”是有困难的。除了武装的洲际贸易和移民这个重要的例外,欧亚大陆不同核心区之间的商业企业形式也没有很大差别;^④19 世纪中期以前的商人肯定很少使用有限公司形式。

182 如果西欧新兴的资本主义企业有自己独有的优势,人们会预期这些优势应该在欧洲企业与亚洲商人竞争的场合表现出来。但是首先出现一种欧洲优势的场合,却是地理位置和地方政治都有利于运用武力建立独家垄断或近似于独家垄断的领域(主要是香料)。在那些地方,欧洲人确实取代了他们的亚洲竞争者并获得了巨额利润;摩鹿加群岛(“香料群岛”)、斯里兰卡和(断断续续的)马六甲海峡、霍尔木兹海峡及红海海峡都是重要的实例。^⑤ 另一方面,在咖啡贸易中,欧洲人没能在一个以中东为基地的竞争性贸易中占主导地位。他们在 1700 年代最终获得成功,是由于在他们自己的殖民地建立了新的生产中心:爪哇、圣多曼格、留尼汪岛。^⑥ 在欧洲商人从印度本土商人和在菲律宾的中国商人手中夺得对某些(尽管绝对不是全部)贸易的控制权的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的因素,看起来也是政治和军事力量,而不是优越的商业

① Griffin 1977:43—59; Morris 和 Williams 1958:137—149。

② DeVries 1976:211。

③ 同上,165—167,252; de Zeeuw 1978。

④ 见 Braudel(1982:585),尽管他认为这些活动在亚洲不如在欧洲普遍; Gardella 1992a: 319—321; Perlín 1990:258—301。

⑤ Subrahmanyam 1993:62—74; 另见 Bayly 1989:67—74。

⑥ Ukers 1935:1—5; Chaudhuri 1985:92,198 199。

组织形式。^① 17世纪中期,欧洲人确实没有使用很多武力就控制了科罗曼德尔(印度东部)沿岸各地重要的纺织品贸易,但这是由于当地的战争已经耗尽了本土商人的财力,失败者为恢复其地位而与外国人结盟进行孤注一掷的努力。^② 一般说来,在武力无法提供一张王牌的场合中,欧洲人发现自己输给中国人、古吉拉特人和其他亚洲商人——或者与他们合作——的次数至少和他们击败后者的次数一样多。^③ 此外,荷兰和英国东印度公司——应该是当时欧洲最先进的资本主义企业^④——经常付不出红利,甚至需要周期性的求助于各种特权以挽救公司避免破产。^⑤

修筑铁路需要非常多的资本,开始赢利前有更长的等待时间,因而是一种不同的情况,对于筑路来说,股份有限公司的企业形式和能否获得廉价资本都是至关重要的。但铁路只是在工业革命顺利进行时才开始修筑。陆路运输中发生的这一重要突破是技术性的而非财务性的;18世纪中期铁路的兴盛并不是由于企业家最终解决了怎样为可行性和赢利性早已为人所知的线路筹集资金的问题。无疑,铁路建设一旦开始就会加速进行,因为一大批投资者(其中很多人通过棉纺织厂、煤矿和其他早期工业企业致富)正在寻找把大笔利润再投资的安全方式,他们愿意接受比较低的回报(特别是当贷款在新独立的拉丁美洲被一火焚之之后)。^⑥ 由于有大笔金钱在寻求安全的出路,而很多工业部门仍然不使用大量的固定资本,布罗代尔所说的丰富资本寻求适当出路的时代没有完全结束,尽管随着新技术创造出长期安排大笔资金的有利可图的方式,它即将完全结束。^⑦ 所以,在比较一般的意义上,西方的股

183

① Habib 1990:398;王康武 1990:421。

② Brenning 1977:326—338,331—332。

③ Subrahmanyam 1993:186;Subrahmanyam 1990:193—218;Blussé 1986:97—99、116、120、123—129、154、165;Ng 1990:311—312;Bayly 1989:69;Lombard 1981:179—180;Pearson 1991:108。

④ Chaudhuri 1978,1981;Steensgaard 1982。

⑤ Chaudhuri(1978:444—452)论1750年前的东印度公司;Bayly(1989:98、120)论1760年以后的东印度公司;Giamann(1981:249—250、264—265)和Gaastra(1981:69)论荷兰东印度公司。比较全面的论述见Lombard 1981:179。

⑥ Hobsbawm 1975:109—115。

⑦ Braudel 1977:60。这种情况可以认为与Schultz对迟至1960年代很多“不发达”地区的假设相似:对农业新技术投资的限制,他认为,不是像一些人所认为的那样由储蓄供给不足引起,而是由新技术及其他投资机会的供给不足引起,这些机会已经在地主和其他财富拥有者考虑他们的选择权的具体环境中证明了它们的价值。见Schultz 1964:83—90、96—101。

份有限公司和西方的金融制度甚至对铁路也可能并不是绝对必要的,^①尽管它们或许有帮助。确凿无疑的必要因素是英国独有的采煤业的成功,而它部分是以地理环境为条件的。

至少在英格兰,运输业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可能是一个廉价资本和复杂的金融制度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的领域。在英格兰有无数用私人的钱修筑的公路和运河,把生产者、物资投入(包括煤和谷物)和市场连结起来。尽管这些设施中没有一种所需资本达到铁路需要的规模,但它们确实与铁路同样,都要承担最初投资和收益实现之间相当长的时间间隔——比1850年以前任何种类的生产或一个大洲内的任何贸易实际的资本周转时间都要长得多。因此,这些基础设施的改良对于聚集资本所用手段的效率相当敏感,包括那些允许某些投资者在企业产生成果前就把他们的股份变成现金的手段。当英国在19世纪开始严重依赖来自美洲的初级产品时,伴随着这些大陆腹地的开发,运输业基础设施甚至变得更为重要;那些工程项目,无论由国家还是私人提供资金,确实都需要有组织的资本市场从大批外行人手中把投资集中起来。^②

184 但是对于(大西洋两岸)有组织的高效的资本市场帮助建造了英国需要的运输基础设施的阐述,并不能同样说明,在中国比较不发达的资本市场使江南和岭南缺乏运输能力,这种能力或是原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所需或是机械化的工业化所需。在长江和珠江两个三角洲,一个引人注目的河流和运河网络使几乎所有人都能利用廉价的水上区间运输。如亚当·斯密注意到的,中国人部分重要河流的适航性(黄河大部分河段是个巨大的例外),加上政府修筑的1400英里长的大运河,使中国作为一个整体与欧洲相比,在水路运输方面有相当大的优势。^③当然,江南,在一条一直在三分之一以上中国人口的家园流淌的河流体系的最前端(也位于大运河的终点和太平洋沿岸),得到了极为完善的服务。一种江南无法通过水路大量获得的关键性物品——煤——中的大部分,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处在如此遥远的内陆和山区,以致如

^① Roy(1997:78—114)提出了一个有争议的观点,即股份有限公司形式甚至对多得多的美洲铁路网络的发展在功能上也不是必要的——然而,一旦股份有限公司被用来使投资者从铁路获得的收益最大化,它就成为一种制度规范,其他企业被期待与其一致并常常确实如此,尽管对于组织这些企业工作来说,这种形式并不是一种天生有更高效率的方式。

^② 北美的实例见Majewski(1994:47—105,特别是50—51、93—94、109及以后)论私人资金及股份有限公司(甚至对从来不付股息的项目)的重要性。关于铁路出现时银行重要性的提高,另见D. Klein和Majewski 1991:12—18。关于甚至在铁路时代之前政府补贴(以及由此而来的国债市场)的重要作用,见Goodrich 1960:51—65。

^③ Smith 1937:637—638。

果没有现代建筑设施和机动运载工具，什么样的金融机制都不可能解决它的运输问题。

但是一种似乎合理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如我们在下一章将看到的，19世纪的江南不再像它在18世纪中叶那样从长江中游和上游获得极为廉价的稻米、木材和其他初级产品，这是一种新情况，对江南的进一步发展及其制造业的专业化施加了重要限制。如我们将看到的，这种变化几乎完全是这些内陆区域自身人口增长和原始工业发展的结果。人口增长大概会在任何情况下发生，但它不能直接说明为什么——举例来说——长江中游开始发展它自己的手工业而不是输出更多的稻米并输入更多的布匹。这包含了很多因素，运输成本或许是其中之一。

大部分较晚定居的区域距长江河道更远，因此这些新社区与河岸之间的高运输成本会鼓励更多的自给自足和更少的贸易；如果地方政府或私人团体能够容易地获得廉价借款，这些成本是有可能下降的。尽管中国人有足够的筑路知识，^①但中国的很多道路看起来确实相当低劣，并且这些道路的设计更多地是为个人旅行（和驿使）而不是为了笨重货物的运输。甚至一些连接相当重要的市镇的的道路也并不比纯粹的地方性道路更宽或更好。^② 在一些区域，道路实在无法与完美的水路体系竞争，但在竞争不构成一个因素的地方，¹⁸⁵我们可能想要给金融体系指派某种角色。在西北、长江上游和西南的采伐业中，更为方便的借贷在它们稳定下来之前的略长时间中帮助保持输出增长也是可能的；毕竟，采伐业的确需要对于一种前工业活动来说是不同寻常的巨额流动资金。

但在稻米和木材业中这最有可能是个相当小的因素。木材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拖运很远的路程到达河岸（比欧洲木材陆路运输的距离更远），然而我找到的极为有限的证据表明，与波罗的海的木材运到英格兰后的价格变化相比，木材在江南的最终价格是其产地价格的一个比较小的倍数。^③ 最可能对木材贸易构成基本制约的因素若不是森林自身的面积，就是那些在前现代的技术条件下即使有充足资金也无法解决的运输问题的性质（例如非常陡峭的

① 迟至19世纪初，马克当仍然能够通过从中国带回来的今天用他的名字命名的方法对欧洲的筑路技术做出巨大贡献；见 Heske 1938:24。

② Schran 1978:30-31。

③ Albion 1965:103（引用的最终价格是产地价格的20倍）与李伯重 1994b:93的对比。李在这里引用的史料相当含糊并且是根据印象而来的，但它们看来暗示，典型情况是最终价格接近于产地价格的10倍左右。当然，对于木材的其他产地或不同种类，这些倍数可能会有所不同；但无论如何，这条资料看来给那些认为缺乏运输基础设施是中国采伐业的一个特殊问题的人添加了求证的责任。

山坡)。尽管运输问题可能对稻米贸易的停滞起了某种作用,但我们在第5章将看到,其他因素的作用可能要重要得多。

所以,看来我们不大可能确认中国的资本市场在任何方面对维持江南与其外围之间的关系构成了严重问题。但是,这种对于中国的借贷制度如何能够更好地帮助维持远方初级产品必需的流动的考察,确实有助于我们集中注意或许是欧洲金融制度——实际上是一般意义上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按照布罗代尔的观点)和军事财政——最重要的领域:即组织西欧与遥远的外围的贸易。

本章其余部分将集中于这些关系。我首先关注的是新大陆、奴隶贸易和海外高压统治通常对于欧洲资本积累起了重要作用的观点:这些观点不可能不加考虑,但它们也不是使人非信服不可。然后我们继续分析资本主义、海外高压统治和工业化之间看起来更强的联系:即欧洲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和国家间的暴力竞争,加上某种(对欧洲)非常幸运的全球关联,使欧洲(特别是英国)与大西洋世界其余地区的关系在核心—外围关系中成为独一无二的。这些关系又使英国在获得某些土地密集型产品时具有独特的优势,而这些产品在18世纪后期欧亚大陆所有重要的核心区都发现难以保证足够的数量。这一观点将带我们进入本书第三部分,那里我们将更详细地考察共同的生态问题和欧洲从这些问题中的解脱。

海外剥削和资本积累:威廉斯理论的再审视

以非欧洲地区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许多学者认为,通过奴隶贸易、海上掠夺及类似活动积累的金融资产对于工业革命的资金至关重要;这一观点的埃里克·威廉斯(Eric Williams)版本是最著名的一个。少数欧洲至上论者,最著名的是费尔南·布罗代尔,同意,新大陆的矿产、种植园和奴隶贸易给了欧洲重要的能力,使其能够比它自己的生产力所允许的生活得更好、投资更多。^①但是大部分人主张这些利益由于三个理由中的至少一个而变得不重要。一些人首先否认高压统治允许平均水平以上的利润。另一些人承认至少存在正常水平以上的利润的可能性,但认为这些利润的积累与欧洲内部经济活动产生的利润积累相比价值不大。其他人则指出——如我在前文所述——工业革命初期的资本需求相当小,并认为这使得无论怎样的正常水平

^① Braudel 1982:196—205。

以上的利润都可能与工业革命毫不相干。

最后一种观点的正确性——能够用于固定投资的资本积累在引起一次工业革命中并不是决定性的——实际上取决于正在批驳的是什么论据。离开奴隶贸易和新大陆矿业的利润，英国仍然有一些人可以创办棉纺织厂和酿酒厂；一旦棉业革命的利润滚滚而来，甚至铁路所需要的多得多的资本也能够得到满足。但是一种更为一般性的观点可能仍然站得住脚。考虑到欧洲各国在供养 18 世纪不断增长的人口时遇到的很多困难——以及如果必需的产量是通过劳动密集而不是资本密集的进一步扩大而实现，欧洲最终可能走上不同的长期道路（一个我们将在第 5 章和第 6 章详细考察的课题）——可资利用的财力资源的削减就可能具有深刻的含义。

海外高压统治看来不可能没有带来超额利润。显然，奴隶贸易、新大陆的矿业、海上掠夺之类行为能够获得惊人的利润；尽管各种各样的失败行动明显拉低了平均回报，这些不断实行的行为仍然成为一些巨额财富积累的基础。的确，欧洲内部一些平凡的事业同样有利可图，但我们完全不清楚，如果没有强烈的海外高压统治造成的机会，欧洲的财富拥有者是否还会坚持抽干更多的沼泽，而不是购买更多的名衔、名花或名画。实际上，即使在相当“中产阶级”的英格兰，在其计划书中提到海上掠夺行为的商业投机项目要比没有这类内容的项目更容易吸引上层阶级的投资。^① 下面的说法无疑是对的：“不能通过搜寻资本的神秘来源而发现理解欧洲经济中资本能力增长的关键；相反，它取决于如何保存和保持现有的积蓄资产之生产能力这一问题的答案。”^② 但我们不能忽略下面的事实：一些“生产性”用途存在并赚钱，主要是由于欧洲以外的高压统治。尽管一系列文化和制度变革为欧洲人把他们的财富投入经济上具有生产性的企业的趋向日益扩大做出了贡献，但我们不应该完全忽视爱国主义、异国情调和征服的共鸣感在引诱至少一些人利用合股公司和其他新制度创造的无息投资的新机会时的魅力。简而言之，海外高压统治肯定为西欧资本积累做出了某种贡献——但它的作用是否足够大？

用任何尺度衡量，欧洲以外的利润与欧洲内部那些不那么引人注目的活动中挣到的钱相比都相形见绌；但这个论点无需澄清。帕特里克·奥布赖恩在一篇经常被引用的文章中计算，海外高压的成果不可能超过 18 世纪后期英国总投资的 7%（尽管后来的一篇文章展现了更高数字的可能性）；对于全

① Rabb 1967:35—48; Andrews 1984:18—19.

② DeVries 1976:213.

欧洲来说这个数字还要低得多。^①

但在一个前工业世界中，这个数字可能相当重要。典型的产出增长率比今天的大部分工业经济缓慢得多，而且有迹象显示（尽管没有证实），前工业生产资料的物质耐用性平均水平远远低于它们现在的水平（由于使用不同的材料并更经常地暴露在自然中）。这也暗示出全年未被消费的产量中成为资本净积累的比例比今天要小很多：大部分都用于抵消生产资料的高折旧率。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曾经作过估计，通过使用对整体经济来说比较低的年增长率（0.4%对他提出的工业经济正常水平的0.25%），把生产资料的平均生命周期从40年缩短到30年，并提高日常维修的需求（从产出的1%提高到2%）以解决这些差异，最终计算出一种典型的“前工业”经济，其总储蓄中只有6%成为资本净积累，而他的典型现代经济中有76%。通过进一步的调整，他提出了一个假想的前现代经济，这个前现代经济，即使在总项目中储蓄起来的部分（26%）比他的现代经济（24.9%）中更多，所取得的积蓄资产净增长也仅仅等于其年产出的1.32%（现代经济为19%）。^②

在这样一个环境中，即使一顿相当小的“免费午餐”——不以牺牲消费为代价而获得的总储蓄的一个增量——也可能导致资本净积累的极大增长。例如，如果我们设想一个经济实际上符合库兹涅茨的前工业经济的第二种模式（总投资占产量的26%，净投资占产量的1.32%），把奥布赖恩承认的由于“超额利润”而可能达到的7%加到总投资中，将会使全年生产资料的净增长增加一倍以上。反过来说，要去除大部分甚至全部资本净积累，也不必大幅度减少总资本构成的数量；无论哪一种情况，这一假想的7%的增加都可能是非常重要的。

姑且承认，我们应该说“可能”而不应该说“曾经”。为了证明这一观点，奥布赖恩规定与外围地区的商业利润是“正常”商业的两倍，尽管他正确地指出还没有人说明过任何这类情形。^③ 尽管高压统治的费用中有很多是由有特许权的公司支付的——因而在他的计算中已经被计入——一些追加费用没有也不必在这类思想实验的任何彻底形式中扣除。（这样一种计算也会再一次面对怎样评估现代欧洲早期劳动的机会成本问题——比方说，斯堪的纳维亚的移民和与荷兰东印度公司签约的荷兰农村失业者是否有另外的机会能

^① O'Brien 1982:17。在后来的一篇论文中（O'Brien 1990:171、176—177），他承认洲际贸易的利润可能在总资本构成中占了1/5到1/6，但他拒绝估计有多大的百分比应该归之于不同种类的高压统治。因而，看来坚持使用他最初的数字是比较谨慎的。

^② Kuznets 1968:47—50。

^③ O'Brien 1982:17。

在国内找到某种生产性活动?① 很多人可能找不到。)但是如果高压统治为欧洲人创造了一些追加利润,如同看上去可能的那样,如果投资的小量增长可能意味着净投资的巨大变化,忽略欧洲以外的高压统治对欧洲资金发展能力做出的贡献就似乎为时过早。然而,假定这些超额利润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至少会同样的危险。看来一种更合适的观点是,无论有没有来自海外高压统治的贡献,18世纪后期的欧洲在聚集、保护或配置商业资本(无论什么来源)方面都还不具备能够完全说明其长期趋势的优势。

明显因素的重要性:奢侈品需求、资本主义和新大陆的殖民地化 189

欧洲的奢侈品需求、消费主义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确实在一个方面起了明显作用,即刺激了新大陆经济增长和非洲的奴隶贸易。但即使在这一领域,推动向新大陆移民的也是欧洲的政治经济与欧、亚两洲——特别是中国——需求的一种结合。

尽管有一些殖民者是受宗教和政治的激励,但如果殖民地居民没有发现他们可以在欧洲或亚洲出售的商品,难以令人相信欧洲在新大陆的殖民地会有很大发展。大部分殖民行为是由利润追求者私人提供资金的。很多移民可能想要寻找一片他们可以在上面相对自给自足的土地,而不是一个他们能够从那里出发参与动荡不安的输出经济的地点;②但在1800年以前,白人移民中只有不到1/3是自己筹措路费的,那些实际为移民付款的人感兴趣的是利用移民的劳动创造输出,而不是帮助后者实现自给自足的安定生活的梦想。③

此外,如果美洲没有输出如此之多的烟草、糖等等,相对于穷人的储蓄来说已经很高的移民费用还会更高;这些产品的货主面对着返程时几乎全空的船,为了运送移民而拼命竞争。④实际上,输出是如此重要,以至一些北美殖民地经济史著作把海洋运输成本的不断降低——这使移民得以进一步向内

① DeVries 1994a:58—60。

② 烟草的疯狂起落见 Morgan 1975:185—186、197;安全和有限制的参与市场的希望,见 Kulikoff 1992:17—18、27—28、35、39。

③ Galenson (1989:56—64)估计了作为契约佣工到达的人数,指出旅行费用完全超出了大部分不熟练工人的收入——特别是年轻工人;可以认为这种情况对德国或欧洲其他地方的移民更为适用,因为那些地方的工资普遍低于英格兰。

④ Galenson 1989:57。

陆迁移,并仍然可以向欧洲市场出售产品——当作白人人口及其控制下的领土发展的主要推动力。^①而最重要的是,非洲人向环加勒比海地区(包括北美的南部和巴西)的流动——在1800年前一直是比白人的流动大得多的潮流——明显受到欧洲奢侈品需求膨胀的推动。

190 对西班牙帝国来说这一机制更复杂一点。那里到目前为止最重要的输出品是白银——最重要的需求不是来自欧洲而是来自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在一系列使用纸币和成色极低的铜币的试验最终失败之后,正在向一种初步的银本位制度转化。(印度对货币白银的需求也在增长,尽管不是同样大。它的人口比中国少,货币化不如中国彻底,而使用的货币中介甚至比中国使用的种类更多——包括黄金。)在1300年代末期,当中国开始大量吸收日本的白银时,它的金银比价在1:4到1:5之间。当新大陆的白银开始到达时,中国的金银比价仍然只有1:6,而欧洲是1:11或1:12,波斯是1:10,印度为1:8。^②由于套汇交易如此有利,新大陆全部白银的1/3到一半左右最终进入了中国。弗林和加拉茨(Dennis Flynn and Arturo Giradez)指出,正是中国这种巨额需求使西班牙的国王们可以在征收沉重的矿业特许权使用费的同时,无需为新大陆的大部分白银产品制定脱离市场的价格。实际上16世纪和17世纪初欧洲巨大的通货膨胀显示出,即使中国(在较小的程度上还有印度和近东)吸收了如此之多的大西洋世界的白银(又为留在欧洲的白银提供了可以追逐的商品),白银的价格仍然在迅速下降。如果没有亚洲的需求,新大陆的矿业在几十年后可能会不再拥有继续获取利润并同时支付维持西班牙帝国运行的租金的能力。^③

这首先并不是一种奢侈品需求。因为白银成为中国经济的主要价值储备、主要纳税手段和一种重要的(尽管远非惟一的)流通中介,除了最穷的人以外,所有的人都经常使用白银。(铜币在1700年代再度稳定,产生了一种一直持续到20世纪的双重金属货币体系。)事实上,停留在欧洲的白银——17世纪那里的人们在日常应用中日益转向使用铜币^④——具有更多的前现代奢侈品贸易的特征,尽管是以一种前所未有的规模。白银贸易代表了某种新的东西——一种普通人经常使用的商品中出现的真正全球性的、大规模的贸

① 对欧洲需求推动北美殖民地——至少是新大陆以输出为主的区域——经济发展之作用的一个全面描述见 McCusker 和 Menard 1985,特别是 17—34 页对各种争论的全面描述。另见 Shepherd 和 Walton 1972。

② Von Glahn 1996:214。

③ Flynn and Giradez 1996,321—329。

④ 见 Flynn 1984:47 引证的许多欧洲国家。

易——由各种各样不寻常的环境养育起来的中国的的需求,在质和量两方面都表现出锋利的优势。^①

但欧洲奢侈品消费与“消费至上主义”的发展在白银的历史中仍然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因为亚洲的白银需求是有效需求,其他货物必须从亚洲流向大西洋世界;中国的丝绸、瓷器和其他商品,印度和东南亚的棉花及香料。实际上,弗兰克认为,新大陆的白银,由于使欧洲成为亚洲产品的一个市场(除了白银欧洲几乎没有什么东西可供交换),成为1500到1800年间亚洲“原始工业”发展的主要原因,因而也是其人口增长的主要原因。^②至少对于中国,我倾向于怀疑欧洲人的奢侈品需求是产量增长的一个重要刺激;即使是丝绸,国内需求也使出口相形见绌,因而中国产出增长和劳动力需求增长的大部分都应该是由此引起的。但是当然,白银的流入为中国经济车轮注入了润滑油,起到了某种刺激作用。并且,如我们在第3章中看到的,印度或者特别是东南亚,如果没有外部需求是不大可能经历类似的增长的。

由于弗兰克特别注意对认定全部能动力量都在欧洲的理论提出怀疑,他常常把欧洲人对亚洲商品的欲望作为一种既定条件。他强调两件事:新大陆的白银怎样使欧洲人把那些欲望中更多的部分转变为有效需求,而本来他们只能转变较少的部分;亚洲经济的活力怎样使他们满足这种需求并吸收了前所未有的货币中介净输入。作为对欧洲中心论的一种矫正,这些强调很有帮助。然而,人们不能把欧洲对亚洲商品需求的增长简单地解释为一种比较大的支付能力和永恒的或无法说明的欲望。

举例来说,如果设想有这样—个世界,欧洲人已经到达墨西哥和秘鲁,但欧洲所有的社会结构都和罗马尼亚甚至俄国一样,那么就不大可能会有同样多的白银运往中国。或者用一种不那么极端反事实的方式,只是简单地假设欧洲先进国家对禁奢法执行得比事实上更有效。在这两种设想中,把亚洲对白银的需求与新大陆的供给挂钩都会更难;而如果没有这一点,如弗林和加拉茨所指出的,西班牙维持其在新大陆的存在就会遇到很大困难。

这里我的论点并不是要对欧洲时尚和奢侈品需求赋予一种独有的激发

^① 我并不打算通过指出这种全球贸易的“锋利的优势”,暗示可能会有同类规模的其他变革紧随其后。可以证明以当时采矿、印刷和其他相关技术的分布条件和金属储备的状况,货币白银对中国来说是一种实际上没有近似替代品的货物;这是一种高度异常的情况,会使白银由于其承担价格高度上涨和洲际贸易运输的高额费用的能力,而成为对一个巨大的市场来说独一无二的商品。(在最近的一次交谈中,我的同事王国斌提出,1850年前欧洲仅有的另一种既同样缺乏近似替代品,又在中国有非常大的出售潜力的可以输出的商品或许应该是先进武器。)如果这一思路被接受,它就会使偶然性和关联性在欧洲发展中的作用变得更大。

^② Frank 1998, 158--164.

力量,尽管这种需求的数量以人均计算或许比中国或日本大,但在性质上却不是独一无二的。反之,我要强调的是,这种需求仅在与新大陆的白银本身、亚洲原始工业的生产能力以及那些经济中对一种大量输入的日常用品(白银)的空前需求发生关联时才是重要的。但肯定欧洲需求的增长——无论是以其熟悉的还是不常见的特征——即使对依赖白银从而依赖中国的新西班牙总督辖区来说,也必然成为历史的组成部分。

192 至于环加勒比海地区和北美,当然,欧洲的奢侈品需求推动了殖民地扩张的观点更为简明易懂。毕竟亚洲生产自己需要的糖和茶叶(后者在很大程度上抢先占领了咖啡或巧克力的任何市场),它也早就自己生产烟草。因而,推动加勒比海地区和北美发展的反馈机制是一个大西洋循环,即使这个循环处于一个更大的全球经济中。欧洲的需求使得新大陆扩大生产有利可图;产量和货运量的增长有助于降低单位交易成本,并因而使得对私人团体来说,为从最初的港口向比较远的地方移居、引进更多的人(奴隶、契约佣工或自由人)、扩充港口设施等等提供资金成为值得的事。

同时,这些输出品纳的税也为发展殖民地所需要的行政管理提供了经费;这为移民和输出在晚些时候开始更为迅速的膨胀创造了前提条件。在以后那个更快速的发展阶段,主要的输出品是大宗产品——棉花、越来越便宜的糖和(19世纪中叶以后)小麦。但在最初的两百多年中,新大陆非白银输出品中的大部分是奢侈品:巴西的黄金、北美的毛皮,还有烟草和糖。总而言之,欧洲的奢侈品需求是启动最终提供了更大的资源潮的水泵的重要因素,而这些资源对欧洲19世纪的工业兴盛和人口膨胀必不可少。

海外探险、移民和贸易——而不是原始工业化或早期工厂——是这一阶段最需要资本的活动。欧洲新的金融制度和更露骨的军事财政模式非常适于组织武装移民和海外贸易。实际上,这些制度最起作用的领域正是这些活动而不是核心区内部的生产或贸易。

在早期的殖民企业和现代跨国公司之间画一条直接的连线是有诱惑力的,但它们之间的差异也同样明显。或许最重要的是,这些企业是对领土限定范围,目的(很像是一个国家)是把其他所有人排除在它们的地理范围之外,而不是在一系列跨越很多地区的具体的生产领域或劳务领域专业化。总之,它们像原始的跨国公司一样具有准政府性质,它们获得特许权常常既由于经济目的也同样由于军事/政治目的。^①实际上,丹尔斯·斯滕斯加尔(Niels Steensgaard)认为,正是对亚洲进行远距离武装贸易的独一无二的挑

① 实例见 Arrighi 1994:73。

战——与那些卷入对新大陆殖民地的征服、殖民和武装贸易类似的挑战——使荷兰东印度公司(Vere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 即 VOC)成为比以前存在过的任何企业都更具“现代”性质的企业。

简言之,斯滕斯加尔认为,VOC 在亚洲的军事/商业帝国庞大的固定成本——它内在负担的成本,而不是对一个独立的、非赢利的政府的依赖——使它不可能遵循早期的做法,即在一段预先规定的时间之后就完全结束贸易伙伴关系,同时所有资产分回到合伙人手中。相反,有必要使公司的大部分积蓄资产成为永久性的,并把尽可能多的利润留作流通资本;仅此就使它能够把庞大的固定成本分摊到足够大的贸易量上,并充分补偿那些具初始资本永远不能结清归还的投资者。最后,由于并非所有的投资者对这类企业都有足够的心甘情愿的耐心,企业的所有权和控制权不得不坚决分离,同时有一个股票市场,使不满意的所有者可以退出一种永久性的安排,在这种安排中,他们对政策的发言权日益受到否定。^① 195

我们有理由怀疑斯滕斯加尔进一步的主张,他认为这种新的公司形式作为一种纯粹的经济企业,比它与之竞争的各种各样的亚洲企业效率更高。但这种组织形式是专为在东印度和西印度创建商业帝国特制的。实际上,对我们的目的来说,斯滕斯加尔的观点最令人感兴趣的是,它说明了西方的公司形式是由对殖民地贸易进行强烈的高压统治的需求进化而来的;只是在很久以后它才被一个国内项目(铁路)所需要。

同时,这些公司要增加运回欧洲的“舶来品”数量的需求可能也起了各种各样的重要作用。首先,它意味着一些非常有势力的重商主义者和政治活动家在促进烟草、糖之类商品的品味方面有很大利害关系;重要性到底有多大将在下文讨论。尽管促进新品味的欲望与奢侈品进口会吸干国家财富和信誉的担心常常互相抵消(如果不是在商人之间也是在政治家之间),但这类担忧并不妨碍获得用于再输出到欧洲其他地区的货物。由于一些公司(和政府)一直努力这样做,而边界又不可能封闭,这些新奢侈品得到了充分增长。

对于某些商品,这些新公司至少起了一种肯定不是它们有意为之的促进作用。通过积极推动价格昂贵(部分是由于高关税,部分是由于独家垄断或少数卖主垄断价格的权力)的新产品的流行,印度公司鼓励了新的进口替代工业——从德夫特陶、伟奇伍德陶和迈森的“瓷器”到 18 世纪后期的仿印度纺织品——的发展。如我在第 5 章将证明的,在各种各样土地密集型产品的

^① Steensgaard 1982:235—238;另见 Gasstra(1981:57)关于国家帮助 VOC 的董事们对付想要公司迅速结算的股东。“退出”和“发言权”这两个术语来自 Hirschmann 1970。

供给受到制约的条件下，这些工业不能独自推动一个能使自身永久存在的过程；这一突破还需要西欧通过煤和殖民地获得生态松解。但是它们肯定确实
194 给欧洲已经增长的消费、专业化和“工业革命”增加了一个推动力；在这一意义上，殖民地贸易公司可能在两个方面对欧洲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它们既有武装贸易的完善组织，又对其商品的国内模仿者无竞争能力，因为它们对后者无法使用武力。

国家间的竞争、暴力和国家制度：它们多么不重要又多么重要

本节进一步提出，现代欧洲早期的政治经济——特别是代价高昂的长期军事竞争——在造成欧洲独有的海外商业扩张中起的作用可能大于企业家的才干，或是大于对异国商品的好奇心本身。此外，还提出欧洲的军事竞争对欧洲经济发展做出的最大积极贡献或许不是通过交战、政府机构官僚化等等影响欧洲内部经济环境的方式（例如推动技术改革或批准在统治者强迫下用货币换取新的财产权），而是通过把这种竞争扩展到欧洲以外。成果最大的是高压统治最有力的领域：在发展中的大西洋经济中。

但是在我们转向欧洲人不断在海外建立政府和互相交战的意义之前，值得探讨一下论述这些活动在欧洲内部之影响的观点。这类观点提出战争对欧洲发展有三种可能的好处：技术外流、需求增长带来的刺激和政府为促进生产增长（从而国家税收增加）而改革其制度的动机。

由于技术变革的原因并不是非常清晰，我们还不能完全忽略战争推动了技术革新的观点。但在19世纪以前，由战争促成的有民间用途的革新数量少得令人吃惊。19世纪皇家海军在食物保存方法上取得的进步是一个早期的范例，自那时起成为这类技术外流的一种预期模式，但在工业化的战争出现之前，这种成果极为少见。^① 也没有很多理由认为前工业的战争加强了深入探索利用大自然的新方法的总体努力；并不存在专用于研究和发展的预算，尽管偶然会为具体问题的解决颁发奖金，但看起来与其说它们吸引了更多的人进入科学实验，不如说它们更可能使发明家从一个任务转向另一个任务。存在一些从工作中学习的效果，在这方面，举例来说，为造枪而掌握的精密钻眼技术，已经证实在改进蒸汽机所需要的精密钻眼工作中很有用；但其
195 他行业的手艺（例如钟表制造业）也传授这些技巧，没有迹象显示与战争相关

^① Mokyr 1990, 140, 184—186.

的工作提供了特别好的培训。如果说有什么影响的话，战争对技术革新的净影响很可能是负面的：把技术人员从有更大民间用途的事业中吸走，同时破坏了信息的交流，杀死了潜在的发明家，等等。^①

类似的证据可以用来——带有更大的确定性——反驳战争通过不断扩大需求提供了重要刺激的观点。军需、军装之类的合同确实在具体时期刺激了具体的工业部门，但所有这类需求最终都要通过税收提供资金，从而减少了私人的需求。如同我们已经看到的，西欧（像东亚一样）看起来发展了一种制度和框架，在这一框架中消费者需求保持长期扩大（尽管有周期性的升降），为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生活消费品支付的款项本身就引起了来自生产者的需求。总之，除了自然灾害时期之外（此时食物吸收了人民购买力中的大部分），没有迹象显示总需求不足在欧亚大陆的任何一端成为一个问题。如果不存在一个问题，军事需求也就不可能成为一种解决方法。

国家间的竞争导致了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独有的制度结构的观点比较复杂。大部分这类观点都提到，君主们常常批准对财产给予更大保证——一个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的必要条件——以交换他们所需要的满足军事突发事件的短期税收；因而，他们作出结论说，财产越来越安全是无休止的军事竞争的一个副产品。^② 但是，如果说这是财产所有权在欧洲如何变得更安全的实际情况的话，它并不是达到这一结果惟一可能的路线。尽管那些假定它是的人认为，在政府没有面对着不断增加其军事开支的同样压力的地方，它们较少需要与财产所有者们谈判，因而没有理由批准后者的权利。中华帝国有时被说成是典型的范例，因为它没有面对在国土面积和财力上都能与之匹敌的邻国。^③ 乔德里的观点——受到皮尔逊（M. N. Pearson）的支持——是一个更为狭义但同样明确的表述，即，由于主要的亚洲帝国都不依赖商业税收（如果军事竞争更为激烈的话，它们本来会需要利用这些税收），它们从来不需要给商业财产以安全保证。^④

在经过前面对中国市场如何行使职能——通常比 18 世纪欧洲的市场更 196
接近于新古典主义原理——的冗长讨论之后，这样一种观点几乎无法成立，如果它指的是那里描述过的“财产”的性质：出售和使用生产性资产的权力在

① Mokyr 1990:183—186。

② North 1994:263。

③ 一个有力的实例见 Braudel 1977:68。

④ Chaudhuri 1985:210—214;1990:384—386。Pearson(1991:97—103)提出了一个类似的观点，但是认为决定财政压力的关键性变量是皇帝可以征税的农民的数量，而不是它面临的军事压力的大小。

很大程度上是无争议的。无论国家间的竞争在推动欧洲向那个方向前进方面可能起了多么重要的作用，其他社会用其他方法也达到了一种同样的境况。

持续的战争真正帮助保护的是完全不同的东西：以特权形式表现的权力，从包税及用钱购买的官职到政府批准的垄断与行会特权的确认。我们已经看到这种特权是军事竞争中的欧洲和南亚的一个共同特征，在18世纪一般来说相当安全并且可以容易地转让。^①相反，由于中国面对的军事挑衅持久性和激烈程度都低得多，在清代仅有两种重要的国家特许的独家垄断或少数卖主垄断（盐和广州贸易），19世纪以前出售的官职相当少（尽管有很多名誉头衔），没有国债，税务直接征收而不是把它们分包出去，对城市行会排斥乡村竞争者的企图或是反对或是袖手旁观。^②

所以，问题变成这些特殊性质的权力的蔓延和确立对经济发展做出了什么贡献。在总产量方面，看得出来它怎么能起积极作用。包税农民和官职购买者肯定没有使产量增加，行会则尽其最大的可能干扰了未充分就业的农村劳动力的动员。垄断者使所有商品的价格——从糖到烟草到盐之类的生活必需品——都保持在相当高的水平上，以至它们到达的市场仅是它们在19世纪将到达的市场中的一小部分。^③（相反，中国一种重要的垄断经营是盐，盐可以在国内许多地点生产，私盐的生产和走私使这一制度漏洞百出，以至它不可能大量降低需求。）佩林对印度作的如此充分的表述——即特权的价值迄今为止就在于它们保证掌权者能够阻止其他许多人以同等条件参与市场——仅是略微不适用于欧洲（在欧洲，至少被出卖的权力中通常较少包含获得依附劳动的可能）。

197 更一般地说，这表明有必要把某些欧洲社会中发生的许多变化区分开来——更稳固的财产权、代议制政府的扩大（至少对有产者）、某些民间特许权的扩散——这些东西太经常地在诸如“现代化”、“自由主义化”和“合理化”之类标题下混合在一起。由于这些特许权中有很多是由为了战争而正需要钱的政府批准，一切都似乎通过某种方式与无拘束的内部竞争（在市场中或在“思想的市场”中争夺政治权力）联系在一起，设想以内部竞争为最大特征的社会会选择剧烈的国家间的竞争是太容易了——这是一个看起来由英国

① 关于印度的史料，见 Perlin 1979 全书；Bayly 1983:217。

② Kwan 1990:146—147；Mann 1987:42（建立商人特许权的目的是控制市场而非增加税收）；Mann 1992:76—79；张养信 1995:94—98。

③ 对19世纪前50年中茶和糖消费增长主要是由于价格下降而不是收入增加的证明，见 Clark、Huberman and Lindert 1995:233—235；另见 Mokyr 1988:74—75、79—86。

(暂时)的胜利验证了的逻辑,那里自由主义制度曾走到最远。^①但更严密的观察则显示出不同的情况。

首先,如查尔斯·蒂利提醒我们的,任何这类观点都仅仅适用于那些按照他称之为“资本密集”或“高压统治及资本密集”的道路建立政府(作为他称之为“高压统治密集”道路的对立面)的国家。^②这些政府在现代早期的斗争中不是仅有的胜利者(俄国是个明显的反例)。同时,属于“高压统治及资本密集”范畴的一些国家,例如丹麦,在获取政治力量的竞争中仍然举步维艰,纯粹的资本密集类型(诸如荷兰共和国)则完全没有进步。^③

其次,并不是所有这些变革都与战争或国内竞争有同样的联系。代议制政府和各种各样的财产权得到承认或确认,经常是为了换取战争所需要的税收;而言论自由通常是经由军事动员无能为力的途径取得胜利的。值得记住的是即使是在英国——经常被当作自由主义如何在国家间的竞争中获胜的完美典范——编年史也对任何简单的联系提出了疑问。有证据可以证明,英国正是在1790—1830年间它最为独裁的几个时期之一——还有直到1832年底它显得更为独裁的时期——从丧失美洲殖民地的打击中恢复过来,成为无可置疑的世界一流强国,在经济上与欧洲其余部分(暂时)分流。^④ 198

此外,不是所有相关的财产权都会导向经济自由主义。很多财产权巩固了前文讨论过的各种反竞争的特权;甚至那些按照今天的标准不太特有的权力也经常妨碍总体的成效。举例来说,在法国(国家间竞争的主要胜利者之一),一个永远在渴求现金的政府批准了地方对“所有权”的权力(和由地方法院进行裁决的权力),包括对小块土地的合并及圈护,以及对公地的调换或分配实行少数否决权。如我们在第2章看到的,这使许多改革措施直到大革命

^① North(1994:262—263),承认对税收的需求不仅产生了有助于财产安全的经验,也产生了降低财产安全的经验(例如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尽管如此,他强调前一种方法最终取得了胜利,并由于国家税收的需要而成为必需的。

^② 注意 Tilly 指的是为了增加政府从国内人口得到的资源而在资本密集和高压统治密集策略之间进行的选择(例如在强迫劳役和购买劳务之间进行选择,或者在雇佣兵和征召入伍之间进行选择);他没有否认所有国家都使用高压手段对付其他国家和欧洲以外的臣民。

^③ Tilly 1990:134—137,150—151。丹麦可以认为是合格的“高压统治及资本密集”类型,因为它有18世纪欧洲最高的征税标准——其中大部分用于按人口平均欧洲最大的陆军和舰队——同时它还有大量的商业和一大批在欧洲之外进行贸易的有特许权的公司。然而尽管有这些奋发的努力,它在1658年丧失了今天的瑞典南部地区,1814年丧失了挪威,在19世纪晚些时候又丧失了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和冰岛,留下来构成一个国家的只是它以前领土及影响力的一小部分。见 Kjaergaard 1994:4—5,14—15。

^④ Bayly 1989:8,116,161,195—213,235—236;E. Thompson 1966。

之后才具有了法律上的可能性。^① (西德几个小国施行同样的政策没能拯救它们的君主制,进一步削弱了国内民主化与国家间竞争胜利之间的任何必然联系。)

即使特权可能在短期到中期压低产出,仍然可以设想它们鼓励了资本积累从而鼓励了长期的发展。这种观点一个相当受限制的表达式是,对未来所有各种收入(来自包税等等)的保护和出售有助于发展使其他种类的未来收入得到安全的手段:因而包税和国债为私人债券、股份有限公司等等铺平了道路。

股份有限公司的一个起源——复杂的合伙关系——在全世界都可以发现。但是一种把永恒的生命力、法律上独立的人格、特别有利于公司内部资本积累的结构综合在一起的企业看起来确实是西方独有的。然而,我们已经看到,在铁路时代之前并没有出现一种工程技术,其需要的有耐性的资本数量太大以至无法通过传统的(通常基于亲戚关系)网络聚集,这些传统网络为其他大部分事业(包括对工业化初期如此重要的煤业和棉业)筹集了资金。在那时以前,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股份有限公司在海外殖民和武装贸易中最为重要——正是这些行为(主要由于作为一个准政府行事的费用,包括作战和建设基础设施)需要最大数量的有耐性的资本。特别是在英国,整个 19 世纪家族企业在大部分经济活动中占主导地位,包括一个环绕世界的帝国的贸易。¹⁹⁹ (一个有趣的例外是在非洲的贸易和殖民,那里大量的准政府行为再度受到期待,也再度为那里的股份公司颁发特许证。^② 我们很快就会回到殖民地股份有限公司上来。)因而,必须进行极为长时期的观察,才能发现这些新的金融机制本身对欧洲内部经济活动的一个重要利益。

一个更为有力的观点——如果成立的话——是,战争驱使下产生的特权有利于积累,因为它把财富交到了特别有可能为了最大收益而进行再投资的人手中。在其著作中的一些地方,布罗代尔提出了同样的观点,强调(如我们所见)大家族王国在种类繁多的投资载体之间移动的重要性。但是,即使这些家族王国很重要,也无法认为它们创立的所有载体都是必须的;至少这类

^① 见 Brenner (1985a, b) 关于法国政府的构成与阻碍圈地和合并等等之间的联系; Rosenthal (1992) 关于地方裁决及其对改革产生的障碍。这里值得注意的是, Brenner 坚持认为,这种政策等于一种为了确保政府的税收和征兵基础而保护农民的政策,他的这一主张已经遇到了挑战(比较 Cooper, Rosenthal 等),有人指出,事实上通常正是那些富裕的和有特权的人坚持反对诸如分割公共土地的方案。在这是事实的范围内,它只是加强了这里提出的观点:一个人必须怎样的泛泛而谈才能说明为了社会内部更为“竞争性的”经济制度而以某种方式选择国家间的竞争体系。

^② Arrighi 1994: 282-284.

与政府相关的载体中有一些可能把资本从较为生产性的活动中移走。如同简·德夫里斯证明的,用于现代欧洲早期发展的许多资本是通过把钱从各种各样提高声望但在经济上非生产性的财富出路上移走而“建立”。致使欧洲几乎所有国家把更多的官职、包税和头衔放到市场上的军事竞争,是这种转移的一个障碍,而不是一种助力。杰弗里·帕克(Geoffrey Parker)注意到,即使在荷兰这个或许是17和18世纪欧洲最为中产阶级的地区,很多债券持有人看到战争结束都心烦意乱,因为这使他们丧失了一个可以把他们的钱投入进去的安全的、有利可图的、享有声望的(并且对智力要求不高的)领域;我们称之为生产性投资的东西多多少少是某些人在最不得已的情况下求其次的东西。^① 在这种情况下,很难理解军事财政怎么能够被说成对欧洲自身的内部经济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而且,战争本身无疑提高了资产的贬值率,造成了技术人员的流失,并使企业运营的成本上升。

尽管如此,当军事竞争映射到欧洲之外时,它确实支付了红利。首先,国家间的竞争结构大大推动了海外扩张。此外,它既加快又影响了新大陆的发展,与仅仅把这些人烟稀少的地区向自由移民和贸易开放所能做到的相比,对解决欧洲的资源瓶颈问题起了更大的作用。

当然,在某种程度上,海外征服本身就是欧洲内部激烈的军事竞争的结果。这种竞争引起了军事技术和战略的重大进步,从而使欧洲人能够弥补他们漫长的供给线及规模有限的海外军队带来的缺陷。但我们应该注意不要把欧洲海外成就太多地归功于“军事革命”。欧洲人在亚洲获得的许多胜利可以归因于遇到的敌人,由于后者不习惯于为土地战斗(与缴获物对比),因而把领土丢弃给他们(如在东南亚一些地区),^②或者敌人的内部冲突造成的局势使少量武装精良的军队就能产生巨大的差异(如在孟加拉)。^③ 尽管如此,直到18世纪末,欧洲人在旧大陆的胜利是有限的(并经常发生逆转)。^④ 欧洲人的冒险主义首先正是在新大陆得到成功,而在那里疾病至少与军事技术或组织同等重要。^⑤

可能更为重要的是,与渴求税收批准特权的竞争性政府联系在一起的特许垄断、包税以及一个布罗代尔式的“资本主义”的其他特征,是怎样成为欧洲对新大陆占领区独特的经济影响所必需的。我们可以通过对比欧洲新大

① G. Parker 1988:63—64。

② 见 Reid 1988a:122—123。

③ Bayly 1989:52—53,67—70;Marshall 1987:70—82。

④ 实例见 Marshall 1980:15—17,21—23,27;Bayly 1989:98。

⑤ Crosby 1986:71—103,196—216。

陆殖民地的影响和没有政府支持自己在东南亚站住脚的中国商人的影响看到一些答案。东南亚大部分地区,像后接触时代(post-contact)的新大陆一样,人口稀少,能够大量供给“故乡”需要的土地密集型资源。去过那里的中国人数量很多,但东南亚从来没有为中国沿海变成新大陆为西欧变成的样子。

新大陆的欧洲殖民地为了军事保护(对付美洲印第安人、其他的欧洲人和非洲奴隶,在很多地区奴隶的数目超过了白人)和政治组织花了相当多的费用。这类费用最适合由一个单独的团体负担(无论是政府还是有特许权的垄断者),它能够从所有的输出品上抽取一个份额,并避开“免税追加条款”问题。(1670年代一个在弗吉尼亚烟草田工作的人为国王挣的钱比他为自己或为他的雇主挣的钱更多。^①)因而,与新大陆的生产者成为一个比较开放的市场的一部分会发生的情况相比,垄断权的安排使住在欧洲的人认为用其他方式为进一步移民提供资金更为有利。

为殖民地提供启动资金的殖民地公司,尽其所能推动它们的产品在故乡流行。^②至少在某些情况下官员亦是如此。尽管我们见到过更多对不喜欢任何进口“奢侈品”的欧洲重商主义者的记载,我们应该记住,英格兰、荷兰和法国强烈支持它们的公司获得这类商品供再出口到欧洲其余地方。并且如果人们无论如何都要消费外来商品,即使最为重商的官员也能够轻而易举地被说服,最好的做法是通过自己本国的公司进口,同时政府通过进口税和来自201 特许公司的战时贷款得到这一行动中自己的一份。^③

理论上可以推论,如果没有垄断,欧洲的市场仍然可能更快地成长,像19世纪自由主义化使价格降低之后的情况那样。但我们完全不知道如果自由贸易从一开始就流行的话,移民和发展会如何得到资金。如果甘蔗种植园主们仍然有一个较大的市场需要供应,他们完全可能仍然输入更多的奴隶,但正是欧洲商人而不是新大陆的种植园主提供了把奴隶运往新大陆所必需的大部分流动资金。即使那些无财产的新来移民有机会进入的奢侈品输出领域——烟草、毛皮、可想而知甚至还有黄金和白银(到17世纪后期一直有很多小型私人矿井在运营)——从一个更为开放的贸易体系中获得的大部分利益都可能自然地落到欧洲消费者而不是新大陆的生产者头上,要弄清楚分散在那无数消费者头上的利益怎样提供了殖民地扩张的资金或新大陆发展

① Crosby 1986:71—103,196—216。

② 实例见 Mintz 1985:163—164,170。

③ 从新大陆的进口具有的财政意义的相关数字,见 O'Brien(1988:11,15),和下面第6章。

需要的经常开支是困难的。

当然，最终，数百万普通人确实为他们自己或他们的亲友向大西洋彼岸移居提供了资金。但那段历史属于一个 19 世纪的世界，通讯、交易和运输费用都有极大的下降，^①再加上新大陆政府能够对它们自己的人口征税，用以供应为私营经济活动繁荣所必需的军队、政治秩序和基础设施。

要证明欧洲日益增长的“奢侈品”消费（与东亚的情形相似）与为扩展新领土而批准垄断权的竞争性的政府（一个更像南亚和东南亚的模式）“解释”了为什么只有欧洲拥有重要的海外领地是愚蠢的。地理环境和流行病的偶然性、航海技术的进步以及其他很多因素使这种情况成为一个“多因素决定”的典型案列。尽管如此，欧洲和中国的政治经济为扩张提供了什么样的不同背景仍然值得考虑。

海外的中国商人主要来自福建和广东；那些省份也居住着大量渴求土地的居民，其中很多确实移居到台湾和中国内陆许多未开发地区。1800 年以前也有相当大数量的劳动力（主要是矿工，但也有一些是农民）到达东南亚许许多多人口稀少的地区——有时由地方当权者引进，为了开垦土地种植现金作物。^②他们定居的地方既包括未来的甘蔗、茶和烟草种植区（一个东南亚的“加勒比海”），也包括伊洛瓦底江、湄公河和昭披耶河三角洲（加上吕宋岛），²⁰²这些地区在 1850 年以后成为东南亚的“北美”；即，许许多多由海外移民耕作的粮食产地。东南亚许多劳动力稀缺地方的工资高到足以引诱移民，即使他们不能立即使自己在这一地区获得一块富饶的土地。^③把东南亚陆地上的这些大河三角洲变成水稻田需要大量劳动力——主要是用于把田地修成水平的——但是没有技术上的理由能说明为什么这需要等待法国和英国的殖民政体。

但农业工人大批移民在 18 世纪从来没有太大的可能性。中国政府没有兴趣为其巨民的海外掠夺提供直接的军事和政治援助（像王赓武和其他人所指出的^④）。这使荷兰和西班牙殖民当局能够阻止马尼拉和巴达维亚的中国大商人社团购买土地，周期性地鼓励愤怒的“土著”通过对中国人的大屠杀而发泄他们的不满，或是自己动手犯这样的大屠杀罪行。（1740 年的巴达维亚和 1603 及 1704 年的马尼拉是特别著名的实例。）在这种环境下，中国商人

① Galenson 1989:67—68。

② 见 Heidhues 1986:164—182 所引实例。

③ 见 Blussé(1986:26—27)关于巴达维亚(印尼首都雅加达的旧称——译注)附近区域一个出色的实例；见 Reid(1988a:129—131)对劳动力高工资的一般论述。

④ 王赓武 1990:400—421。

很好的理由使他们的资产保持流动——以便他们能够容易地逃走和/或行贿,而不是通过获得土地或改良土地(无论如何他们都不会被准许拥有土地)把他们的财富固定下来。至于那些特别想要土地的人,可以在家乡购买一些,那里的财产权更有保证,亲友也会提供相当可靠的照料。

此外,即使在1850年前的东南亚,中国商人和中国农民同时存在的时期,他们之间的联系也是软弱的。巴达维亚的事变说明了这一点。

1690年以后中国实业家在巴达维亚城墙之外的糖业生产发展中占了主导地位:1710年的84个糖厂老板中有79个是中国人,劳动力中也占有一个很大的百分比。然而,糖厂老板并不包括城墙内富有的中国商人(后者表现出如果受到虐待,他们有能力使这个城市瘫痪)。同时农村产糖的中国人社区由一个看来极为贪渎的荷兰治安官治理,而不是由对城里的中国人负责的中国“首领”治理。^① 荷兰东印度公司以控制价格收购糖并在波斯、印度和欧洲出售。^②

203 当这些市场衰退时,农村的不满接踵而来,荷兰人尽力要把农艺家们驱赶到锡兰去,那里需要更多的劳动力。城市中的中国人只是在荷兰人和爪哇人把农村将被驱走的人中发生的一次起义归咎于他们,并因而对他们进行屠杀时,才牵涉到这些问题中:实际上,城市和农村的中国人之间看起来只有非常少的联系。^③

与国内市场间没有一种稳定的——更不必说有特权的——关系,或者至少是后来东南亚政权对中国人生命和财产提供的保证,巴达维亚市内成功的中国商人没有理由把大批同胞带来务农,或进行农村移民所需要的投资。因此,由于没有本国政府的支持,中国人在国外农村的定居就始终像是为短期繁荣的开发活动建造的临时营地,没有成为(像新大陆的种植园那样)发展中的社区的核心,这类社区能够以土地密集型输出品回报国内那些为进一步移民提供资金的人。

1740年清政府确实认真考虑过采取惩罚性措施。这应该使我们谨慎对待一种过于空泛的观点,即:中国是一个“闭塞的世界”,看不到与它自己国境之外的经济发生关系能够获得任何好处。^④ 实际上,赞成用贸易禁运方法

① Blussé 1981:174。

② 同上,175。

③ Blussé 1986:94—97;关于清政府对这次事件中发生的情况的理解,见傅 1966:173—174。

④ 关于“一个自称大一统的帝国,它不可能通过榨取其他经济使其经济富裕,因为它是惟一的经济(这肯定是中国人的意识形态,也可能是他们的信念)”的观点,见 Wallerstein 1974:45。关于清政府对进行报复的讨论,见 Cushman 1978 和傅 1966:173—174。

惩罚荷兰人的大屠杀行为的主要观点之一就是，如果不给予完全的惩戒，荷兰人可能会虐待下一批去进行贸易的中国人，就像他们曾经虐待长期居住的中国人一样。反对禁令的主要观点则认为，它会对华南沿海成千上万人的生活产生有害的影响。关键性的差别在于，那些仍然以中国为根基的人在与东南亚贸易或到东南亚旅行时有权力受到皇帝的保护；那些定居他国的人则没有这种权力。清政府肯定也进行领土扩张——但却是在中亚，那里无助于江南和岭南获得初级产品，而一个由商人资助的东南亚的殖民地却可能有所帮助。

由于清政府对安全的考虑^①、保持低税率的愿望及其（直到18世纪末）不断重复出现的预算盈余，使它们甚至对被动地许可中国人从事武装海上贸易都不感兴趣（比方说，准予进口垄断）。结果是，从来没有私人团体（除了一个昙花一现的例外）能在巨大的中国市场和海外奢侈品之间建立排他性的联系。

有一个例外，郑氏家族的海上帝国，在其17世纪的全盛期非比寻常的富有和强大。它对荷兰人在商战和海战两方面的成功（它把后者逐出了台湾并在东南亚很多有钱可赚的市场上取代了后者），对任何一种认为“中国人”对欧洲式的武装贸易与殖民/海上扩张相结合天生不感兴趣、不适应、或在技术上装备不足的观点提出了严肃的怀疑。^② 郑氏家族也从事殖民活动：它们不仅占领了台湾并扩大了向台湾的移民，而且威胁着吕宋。^③ 204

但郑氏帝国的兴旺仅发生在一个中国王朝的危机时期；完全没有通往母国市场的安全而有特许的通道，它只能轮流与一系列经常被包围的大陆港口进行贸易。此外，郑氏家族的领袖们始终把海外活动视为在中国进行军事行动的一个主要的资金来源（为了恢复明朝统治的毫无希望的目标），而不是它自己的一个长期事业。它们的帝国因而成为一种与欧洲的武装贸易和殖民化同样成功的活动的辉煌实例，但却不是中国国家制度的一个正常部分。

即使海外的中国商人和移民武装了自己并多多少少保护了贸易垄断地位，他们也会面对其他的限制。比如说，垄断糖的进口对一个商人几乎没有什么好处，因为同一种产品在中国国内有巨大的产量。相反，欧洲商人可以

^① 关于对有太多海外关系的中国人的具体的担忧（与反对外国人本身一样）以及清政府对商业力量和海上力量在同一批人手中的任何结合的疑虑，见 Wills (1979, 1995)。关于清政府主要的安全考虑是国内的叛乱——一种只有手中拥有特许暴力的人最终回国才能使之扩大的威胁——的观点，见王国斌 1997: 83—89。

^② 更详细的描述见 Wills 1994: 223—228。

^③ Santanaria 1966: 78—79。

在糖、咖啡、茶叶和丝绸进口商品上(相当一段时间内还有烟草)附加足够高的差价,以收回他们用于海外保护的费用,因为这些商品在国内没有生产。(另一方面,他们不能为所欲为地大幅度抬高——比方说——北美小麦的价格。所以,尽管宾夕法尼亚的谷物被卖到欧洲各地,^①人们也知道就在不远的内地有大量同样的土地,但在殖民地时期并没有为了输出小麦而开发很多新的地区。边远地区小麦种植的迅速扩大必须要等到运输费用有更大幅度的下降,北美自身大城市市场发展,以及一个独立政府的出现——它有自己的理由为征服、统治和统一边远地区支付代价,甚至并不期待从那里获得直接的税收。)

因此,中国海外贸易的发展完全不同于欧洲公司与政府相连的资本主义。差价相对较低的竞争性贸易使 1730 年代仅台湾一地输出的糖就相当于 1750 年代整个新大陆输出的 1/3,并使一大批小投资者和船主获得了适当的
265 回报。^② 尽管如此,并没有促进利润的集中,这种集中本来会使,比方说,吕宋岛的北部值得占领——尽管由于 18 世纪西班牙对这一地区控制软弱,^③它与台湾接近,马尼拉存在一个重要的中国商人社区(1603 年已经大于 1770 年的纽约或费城,是 1770 年的波士顿的两倍以上)等条件^④,对于假定得到武装许可,可以像他们的欧洲同行那样在定居地市场上使用武力和特权(使他们得以补偿军队的花费)的福建商人来说,这样做可能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到 1700 年代末,巴达维亚及其周围地区可知的已有 10 万中国人;比纽约、波士顿和费城 1770 年的人口加在一起还多。^⑤ 但是如果没有办法让输出品的消费者为殖民付款的话,是不会有殖民地的。就这一意义说,东南亚的糖和东南亚的水稻与其说像新大陆的烟草或糖,不如说更像是新大陆的小麦——因此,东南亚大陆上这些未来的大饭碗,就像美洲的大面包篮一样,在其发展所必需的资本和劳动能够输入之前还要等待更长的时间。

此外,政府对“日常奢侈品”没有税收方面的利益。由于中国 90% 的糖及其全部丝绸和烟草没有越过国界(在 1850 年代对国内贸易征收厘金[过境税]的制度建立之前)也没有创造税收,清代的官员不能通过促进这些贸易获利。

① McCusker 和 Menard 1985:199。

② 见 Ng(1983:157)对运输费用的研究;糖的数量同上书(163)和 Shepherd 1993:156—66 对比 Deerr 1949:193—203,235—42,Phillips 1990:59,61 和 Steensgaard 1990a:140。

③ 实例见 de Jesus(1982:21—37)关于西班牙在这一地区的控制如何软弱的实证研究。而且尽管西班牙的控制马尼拉附近较强,那里中国人的数目却大大超过了西班牙人。

④ 1603 年的大屠杀前夜,马尼拉的中国人居住区或许有多达 3 万中国人(Bernal 1966:51),而 1770 年费城有 3 万人,纽约 25 000 人,波士顿 16 000 人(McCusker 和 Menard 1985:131)。

⑤ Blussé(1986:97)认为 1800 年巴达维亚及其直接的腹地有 10 万中国人。

与反对输出白银购买丝绸的欧洲重商主义者相比，为从台湾运来的糖太多而忧心的官员们并不一定更为“反市场”；毕竟，他们希望的是台湾继续向福建的商业区、手工业区和茶叶产区出售稻米，而不是让任何一个地区自给自足。^①清代的官员知道，华南沿海有很多人依赖海外贸易为生，他们希望这些贸易能继续下去，除非它加剧了安全方面的担忧。但是当一些官员确实看到了安全方面的担忧，并想要缩减“奢侈品”进口时，他们并没有像欧洲的鹰派那样面对具有强大相反利益的财政部、军队和殖民地官员。

并不仅仅是洲际贸易、殖民地扩张和军事财政之间的关系使欧洲的殖民主义成为独有的。即使中国有过更为“欧洲/印度”式的重商主义，或印度有过更为“欧洲/中国”式的对舶来品的大众需求，它们或许仍然不会像欧洲人（和非洲奴隶）对待新大陆那样去对待东南亚。首先，它们没有类似于旧大陆/新大陆疾病斜率那样的生物学优势。但是如果欧洲没有从一种引人注目的多重因素的综合中获利——流行病、欧洲战争、军事财政和奢侈品需求、中国的白银需求等等——它也不可能像它现在这样利用新大陆。阿尔弗雷德·克罗斯比(Alfred Crosby)正确指出，任何带着许许多多疾病到达美洲的旧大陆人都会使广大区域中的人口下降，但仅靠病菌并不能使出口导向型经济及由那些出口的先期开支资助的大规模移民取代那里的社会，并由此而毁灭它们。并且，如我们即将看到的，新大陆的出口对于发展的持续和加速来说，是一个必要的尽管不是充分的前提条件——特别是在英国。因此，在这里我们有了一种背景和机制，欧洲资本主义和消费至上主义通过它能够产生的作用，远远超过了如果没有两个新大洲成为活动舞台，它们本来会产生的作用。

206

第二部分的结论：相似之处与不同之处的意义

显然，迟至18世纪中叶，西欧的生产力或经济并没有独一无二的高效率。但是我们不能从发现旧大陆其他很多地方与西欧同样繁荣，并有同样的“原始工业”或“原始资本主义”，直接跳到一些学者提出的非常反事实的断言——某些亚洲社会在满族或英国的入侵摧毁了“资本主义萌芽”之前，一直在向一次工业突破发展。看起来更可能的是，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地方必然会向这样一个突破发展；事实上，甚至在欧洲，18世纪后期的很多经济思想家们

^① 关于这些担忧，见 Shepherd 1993:162—168。

并没有看到这种未来。^①

反之,旧大陆最“充分定居”(即,与使用现有技术的土地容纳能力相比稠密的人口)^②和经济最发达的地区看起来都在向一种共同的“原始工业”的死胡同发展,在这条道路上,即使有稳定增加的劳动力投入、已知最好的生产方法的传播和能够使分工更为有效的商业化的发展,产量也只是勉强领先于人口的增长。^③现在不可能知道它是否会继续无限期地领先——产生一个杉原薰称之为“东亚奇迹”的以劳动密集为基础的持续发展的欧洲副本——或者它是否会落后于人口增长,形成一个真正的马尔萨斯绝境。但这些结果中没有一个与实际出现的资本密集、能源密集和吞食土地的“欧洲奇迹”非常相似。纺织品生产和消费的增长,尽管经常被引证为“工业化”的开端,实质上并不能改变那条道路,因为它没有为一种根本的困境提供解决方法:即,食品、纤维、燃料和建材的生产都在争夺日益稀缺的土地。实际上,到了森林为纤维作物而消失的地步(或者还有更坏的是绵羊,每磅羊毛线需要更多的土地),运输业或重工业更根本的突破所需的能源变得越来越难以得到。

因而,与其把16到18世纪其他先进经济看作“没有成功的欧洲”的实例,倒不如把这一阶段的西欧看作一种并不特殊的经济可能更为合理;仅仅是在18世纪后期特别是19世纪,意料之外的重要的断裂使它突破以前限制了所有人视野的能源利用和可用资源的根本制约时,它才成为一种幸运的反常。尽管新能源本身主要来自英国煤开采和利用的一个高潮,我们将在下两章中看到,欧洲利用大量新的矿物衍生能源的能力也要求各种各样新大陆资源的流动。正是通过为这些流动创造前提条件,欧洲的资本主义和军事财政——作为一个巨大的全球关联的组成部分——才真正具有了重要意义。

^① 这一观点由 Wrigley (1988) 提出,并由王(1997)详细阐述。

^② 注意按照这里的用法,一个“充分”定居的区域并不是一个人口稠密地区的同义语,例如印度北部每平方英里的人口比西欧多,但它的生态环境使它还可以供养更多得多的人口。一个相对“充分”定居的区域供养的人口,大约与如果没有技术上的重大突破它应该能够供养的人口同样多。这样的区域可能面对迫在眉睫的生态危机,在这些地方控制了一种相对稀缺的生产要素(土地或许还有资本)的精英们可能缺乏能力坚持让(充足的)劳动力依附于他们自己,它们因而成为劳动力市场从而一般说来要素市场的形成条件较好的区域。这些条件看来似乎是18世纪后期中国、日本和西欧的特征;这三个地区此时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人口水平,在工业化开始(欧洲即将来临,日本还要经过两代人,中国则在一百多年以后)和人口增长率有很大提高之前,它们都没有较大地超越这一水平。相反,一些现在几乎成为人口压力同义语的地方,例如印度、爪哇和越南,到此时为止人口增长似乎都要慢得多,并且在19世纪初期或中期都可以看到开始了非常迅速的增长;至于东欧,人口迅速增长甚至开始得更晚。

^③ 用 Elvin(1973)或黄宗智(1990)比较 Levine(1977)和 Kriedte、Medick 与 Schlumbohm (1981);王 1997 也指出了这种类似之处。

第三部分

超出斯密和马尔萨斯之外：
从生态制约到工业持续发展

五、共同的制约：西欧和东亚的生态紧张

211

由于已经把工业化与任何地区现代早期经济过程的任何“天赋”的好结局分离开，我们现在可以提出一种区域之间关系的发展模式在哪些方面使西欧在工业化前夜获得了重大优势。这些优势不一定会导致一次工业突破，但极大地增加了这种可能性，并使这样一种突破更容易继续下去。这些优势有助于着手解决旧大陆核心地区共有的一个重大问题：在化学合成肥料、合成纤维和使化学合成物变得经济的廉价矿物能源出现之前，劳动与资本替代土地的能力存在着限制。这些限制使得在人口扩大和人均消费增加的同时提高一个地区工业专业化的程度难以继续下去，更不必说以 19 世纪的加速度这样做。贸易有所帮助，如我们将看到的，但不能解决这些问题。劳动密集型的土地经营能够供养更多的人口，或许能够保持生活水平轻微改善，但不会比这更多；它往往会降低而不是提高能够在农业之外就业的人口百分比。

使欧洲逃脱这些制约的优势主要是生态性的。一些来自欧洲本身的闲置资源——是由这些资源早期发展的阻碍因素形成的具有讽刺性的利益——但东亚在有效利用土地和燃料方面的优势极大地抵消了它们。另一些，第 1 章已经讨论过，与煤矿的幸运位置及开采它们的技术相关。还有一些以新大陆的恩惠和形成它与欧洲关系的关联为基础：这一部分历史将是第 6 章的重点。这些有利的方面堆积起来，又为其他改革的出现赢得了时间；它们共同改变了欧洲的许多经济可能性。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这个额外的喘息机会能够解释技术创造力——但这两个因素携手工作，每一个都增加了另一个的功效。

所以，在本章，我首先简要重述西欧与其他地区的前景如何相似，强调它与其他人口密集区域的共同点。然后概略叙述一系列 18 世纪共同的生态挑战，并发现尽管西欧的人口密度在绝对意义上或低于中国或低于日本，它却面临着同样严重的生态问题。无论是在西欧还是东亚，到 18 世纪后期，如果

212

没有重大的制度变革、节约土地的新技术和/或土地密集型商品进口的巨大增长,都几乎不会出现进一步广阔发展的余地。尽管日本仍然有一些边缘区域,在那里,如果能够进行制度改革,在尚未集约利用的土地上应用现有的最好的技术,是有可能实现发展的,欧洲则有更多的这类区域(特别是在东欧),但中国却相当少。所有这三个地区都有核心区(长江和珠江三角洲、不列颠和尼德兰、畿内和关东),那里只有在发生重大技术变革、与外围区域贸易巨大增加、或者两者共同作用的情况下,才能支持人口和消费的进一步增长。

理论上说,欧洲比东亚留有更大的余地,可以通过提高其土地利用的劳动密度维持进一步增长的人口;但是欧洲农业的性质使它无法不断地充分开发这些可能性。此外,这样一条道路不可能导致人均消费的进一步巨大增长,更不必说工业化。当我们观察一个或多或少朝着这一方向发展的欧洲国家——丹麦——时,我们将看到劳动密度的提高使它能够稳定其脆弱的生态系统,并维持其生活水平;但人口和人均消费处于停滞状态,也没有奠定一个重大突破的基础。

最后,我考察了所有这些核心区域在多大程度上通过与旧大陆各种各样未充分定居地区的贸易尽力缓解了它们的问题。在所有情况下,这类贸易都只是一种局部的解决,不只是由于最终有可能克服的技术性限制(例如高运输成本),而且由于旧大陆或多或少“先进的”区域间双方自愿的贸易性质中固有的社会和经济制约。

似乎有理由假定,只有那些把比较稠密的人口、高产的农业、广泛而成熟的商业和广泛的手工业行业结合在一起的地区,才是工业变革的可能场所。但这些标准仍然使中国、日本或许还有印度——特别是印度北部——与西欧处于同一范畴。

213 经过进一步考虑,印度与其他地区相比最终看来是一个可能性较小的地点。尽管它的人口在绝对意义上数量大而密度高,但仍然远未达到其前工业供养能力的顶峰。莫卧儿帝国时代的印度人口增长显然比同时期的中国、日本或西欧低得多;1600到1800年间估计每年在0.1%到将近0.3%之间变动,更为迅速的增长只是在1830年以后才开始。^①此外,在那里起作用的种姓制度使相当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专业人员群体单独控制了某些资源,并且(至少是在理论上)使那些人及其后裔永久性地依靠那些资源;这可能起到了阻碍资源迅速消耗的作用,而这种消耗在中国、日本和欧洲比较常见,因为这

^① Moosvi 1987:402、405; Subrahmanyam 1990:358—360; Habib 1982a:166—167; Visaria and Visaria 1983:463—465.

些地方更难以对资源过度利用施加限制，人们能够更容易地通过职业变动和地理迁徙避免依赖一种已衰竭的资源。^① 尽管种姓制度甚至在欧洲人承认其重要性的地方似乎也不再经常受到尊敬，但它很可能对经济增长、人口增长（在工资劳动和职业变动使人们能够无需继承一个现有的经济位置就能结婚的地方更可能发生）和资源衰竭起到了某种制动装置的作用。

无论由于什么原因，印度的政治经济和生态环境看来都与那些已经非常接近其前工业人口顶峰并且完全高于以前任何周期的顶峰的区域不同。可以肯定，18世纪后期的印度仍然有非常大量的森林；甚至人口稠密的孟加拉在1700年代中期也仍然有约1/3的林地和沼泽未经耕作。^② 农民自我保护最常见的方式——个人和集体逃亡——是一个在中国、日本和西欧大部分地区很久以前就已不合乎实际的方式。姑且承认，最近的研究破坏了下面这种理论，即：在英国的木材和现金作物需求、不限制身份继承的财产权和19世纪的人口增长破坏了生态平衡之前，前殖民时期的印度统治者认真地维持了这种生态均衡。但推翻了前殖民时期生态体系的虚幻想像的同样的证据——包括关于当局为了让寺庙拒绝收容逃税者、反抗者和盗贼而焚烧森林的描述^③——也提醒我们，印度一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宽松的生态环境，和一种在欧亚大陆两端已经变得更为少见的农民反抗方式。

由于空闲土地的数量一直相当大，印度的上层社会通常依靠依附劳动，尽管也存在一大批由于无法获得土地而为他人工作的“自由”的农村无产者。^④ 因此，如我们所见，尽管印度的农业和手工业都有大量商品进入市场，但生产者通常并不如此——那意味着他们购买的商品较少，并且面临的对于“勤劳革命”有重要意义的时间配置问题也较小。 214

这些土地利用与阶级关系之模式的一个后果是，平民使用的日用品的国内市场非常有限。实际上，就我们能够追溯到的最早的年代看，印度输出的商品显然多于它的输入（贵金属除外）。^⑤ 外部需求和上层需求的变化对其经济波动的解释作用远比它们在中国、日本或西欧突出，在后几个地方人们一般假定，（至少是在大约1500年以后，在中国则是1000年以后）生产的任何增

① Gadgil and Guha 1993:91—110.

② Van Schendel 1991:38.

③ 实例见 Rangarajan 1994:149—152.

④ Raychaudhuri 1982a:180—181; Habib 1982a:168; Habib 1982c:249; 福沢 1982b:251—252; Raychaudhuri 1982b:284,304; Raychaudhuri 1982c:335; Arasaratnam 1980:259—260.

⑤ Chaudhuri 1978:155—156; Latham 1978a:50.

长都会通过向生产者支付而为自己创造需求。^① 在驱使依附劳动者更艰苦的工作和/或开垦未经利用的土地能够使产量和精英阶层的收入增长的地方，精英们极少可能为努力发展新的生产方法而投资。^② 对于能够使普通商品产量扩大的发明创造，也不存在有保证的市场，尽管有众多人口和相当好的运输条件；因为太多的人口只有非常有限的钱。此外，没有什么条件保证一个聪明的印度工匠个人能从一项改革中获利。最后，由于植根于众多庇护人——托庇者关系中的分层互惠保持了价格的稳定，对经济利益本身的追求——尽管肯定存在——具有的推动力可能比它在中国、日本或西欧的作用更小。

因此，印度对于工业突破不是一个非常可能的地点，尽管它有成熟的商业和工艺。再度回忆一下印度的情景怎样发生变化——特别是在政治动荡的18世纪——是值得的。一些区域的社会安排看来一直在向“充分定居区域”同样的方向移动。德川时代的日本似乎是这类区域的一个合适类比，那里越来越多的以书面形式详细规定并由法律严格约束的任务正在被废除。我们或许不应该把印度当作一个与中国、日本或西欧有完全不同的经济轨迹的地方，而是当作这样一种地方：上述区域中我曾描述过的那些趋向在这里表现得数量上更为虚弱，向其他方向推动的力量则强大得多。如果没有殖民主义，会盛行哪些趋向肯定只能推测——远距离贸易的发展可能会对任何方向具有潜在的贡献。^③

在旧大陆其他地方，人口从其前工业的最终顶点的增长比在印度更为停滞，对于一条发展道路来说，实际情况也与相对来说更为强大的西欧和东亚的情况根本不同。从东南亚到东欧，稀疏的人口意味着精英阶层不能轻易放弃依附劳动，他们经常加强依附劳动以适应他们产品的新市场。

现在我们还剩下中国、日本和西欧。并非巧合，这些区域正是在1800年

^① 例如，比较 Raychaudhuri (1982b: 306)、Bayly (1983: 204—206, 251, 266, 272, 290) 和 Prakash (1981: 196—197) 对中国、日本和西欧的权威论述。

^② David Washbrook (1988) 在尝试证明18世纪的印度是“资本主义的”，但却是一条不会导致工业化的道路时概略地提出了这一观点；他集中注意的是劳动的低廉价格，而不是劳动如此经常受束缚的事实，我则认为后者至少同等重要，他也没有讨论廉价的闲置生产能力问题。这种设定的另外一面发展为对外贸易的“剩余物出路”模式，主要适用于在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仍然有很多空旷土地的国家。（见 Myint 1958; Lewis 1954.）这些经济学家提出的观点之一是，在这种情况下，增长需要的资本非常少，至少暂时如此；就我们的目的来说，我们可以用一句话重新阐述这一见解：在这样的背景中，上层阶级可以通过出口而增进他们的利益，这些出口几乎不需要投资，并且肯定不需要在改进技术方面投入很多资本。

^③ Perlin 1994: 83—85 特别有力地阐述了这一观点；Perlin 1985: 458—473。

前“破坏了旧的生态体系”^①并达到人口密度新水平的区域。^②至少在它们的核心区，稠密的人口和实质性的资本积累使精英阶层——他们按照自己的意愿相当自由地配置生产性资产——可以在不使用依附劳动的情况下仍然能够得到劳动力并同时获得利润。出于同样原因，这些地方也正是空闲土地最少、劳动力配置错误最少、其他形式的“闲置能力”也最少的区域。

因此，这三个地区都对工业突破有最大的需求，对能为改革生产过程提供最强劲动力的制度有最大的需求——但仅有需求并不能产生结果。所以，这些“充分定居”区域面临一个共同的潜在的绝境。

这些区域中没有一个面临食物生产直接不足，但其他种类的生物学压力是明显的。在中国和日本，食物和纤维作物的产量都与人口增长保持同步，但（至少到19世纪）却是以严重的森林采伐、山地水土流失和随之而来的洪水威胁的增加为代价；如果没有重要的新耕作手段（例如开采或人工制造大量肥料），即使这种以生态为代价的劳动密集型的增长也可能接近它的极限。一般说来这在西欧是同样的事实，但有两点重要的不同。

一方面，如我们所知，甚至在1800年，强化西欧农业的各种方法仍然未得到充分运用。所以，与东亚相比多多少少更为“闲置”的资源在制度和价格的变化使其有利可图时可以被开发，这种情况正在缓慢发生。例如，格兰瑟姆（George Grantham）对法国的研究显示，市场进入条件逐渐改善使农民甚至在技术条件没有发生多少变革的情况下改变了作物混种方式、利用了以前未充分使用的家庭劳动、改变了他们自己的消费模式，使他们在1850年可以比1750年出售更多的谷物。在德国发现了类似的模式，但开始稍晚：1800年以后，由于旧制度对土地利用的限制结束而引起休耕地急剧减少，出现了一个向新作物和市场导向的农业的明显转变。^③就这类改革可以在未来实现的意义上说，与东亚的情况相比，18世纪欧洲的农业为在遭遇马尔萨斯抑制之前继续发展留下了更多的机会。

216

但另一方面，这种“闲置”不可能为满足19世纪新增长的人口与其他压力而迅速方便地动员起来。格兰瑟姆的数据显示，向更有生产力的农业的转变发生得极不均衡，即使是在相当先进的法国北部亦是如此。法国农业，如同他在别的著作中证明的，甚至在1860年代仍然投资不足，尽管法国经济从整体看并不缺乏资本；问题在于制度的变革非常缓慢，因而影响了耕作技术

① 这个短语是 Fernand Braudel 的(1981:70)。

② 关于中国，见何(1959)；关于日本，见斋藤修(1985:185—188)；关于欧洲，见 McEvedy and Jones(1978:26—30)。

③ Nipperdey 1996:126—127,130—131。

的选择。^① 法国继续供养自己,但它的人口——特别是其城市人口——比英格兰、德国和 19 世纪欧洲整体的人口增长都要慢得多。

同时,在工业化和人口增长都最为迅速的英格兰,甚至早在 1750 年这种有待开发的闲置资源可能就已经非常少,因为市场机会的刺激与有利的制度安排的传播远比法国更早。因而,英国的农业生产力看起来在 1750 到 1850 年间没有发生很大变化。^② 饲料作物的改进使更多的中等土地可以用作草地和牧场,从而使优质土地能够更专门地用于谷物,但结果是用于粮食和家畜的土地之间出现了一种比以前更为严格的分工,同时,吃到更好的饲料的家畜产生的更多的肥料完全留在了改良的草场上。粮田得到的肥料几乎和以前一样。因而,在英国开始开采、输入和晚些时候人工制造肥料之前(主要在 1850 年以后),每英亩耕地产量和可耕地总产量一直保持平平并有持续下降的先兆。^③ 毛罗·安布罗索利(Mauro Ambrosoli)的著作指出,尽管英国人非常仔细地研究了大陆的习惯、经典的农业指南和他们自己的经验,他们所学到的如何在提高产量的同时最好地保持土壤肥力的知识中有很多实际上并不适用于英格兰,因为它采用的是劳动力高度密集的方法,而英国资本主义农场主(安布罗索利认为他们与大陆上的农民不同)的意图是要使劳动力的成本降到最低,利润则达到最高。他们采用的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方式,从根本上推翻了众多文献记载的最好的耕作方法,在很多情况下,实际上干扰了土壤肥力的保持;正是部分地由于这些策略,在 19 世纪,仅仅为了避免产量下降,就需要越来越多的非种植的磷酸和硝酸。^④ 换句话说,如果不是新工业品的输入最终挽救了它,在不把更多的劳动力投入土地的情况下,英格兰可能连维持其产量都困难。如同我们将看到的,其他很多地方走上了劳动密集的道路,但这条道路没有导致工业化。

甚至在这些新的投入成为现实时,在几十年时间中也只是勉强维持了产量,而同时消费却急剧上升。汤普森(F. M. L. Thompson)估计,英国每个劳动力的产出在 1840 到 1914 年间增长了约 50%,但由于劳动力数量下降,这意味着 75 年间总产量的增长约为 12%;1866 到 1914 年间的粮食产量实际上是下降的。由于机器加上非农业部门生产的饲料和肥料——1840 年还相当少——到 1938—1939 年在产量增长中占到了 45%,这些新增生产能力中的大部分显然与 1800 年前后还根本无法使用的技术相关。那时在英格兰本土

① Grantham 1989b:147、151。

② 例如,Clark 1991:454—455。

③ Ambrosoli 1997:367、374、392—395、412。

④ 同上,412。

所能得到的东西完全限于在一个已经实现市场导向的农业中，由市场引起的进一步的合理化产生的利益，^①其中一些实际上降低了农业总产出（尽管它为其他工作释放了劳动力），并且没有为保持土壤肥力做任何事。

此外，由于欧洲总人口在 1750 到 1850 年间大约翻了一番，^②大陆上正在开始启用的无论哪种闲置能力都是在满足地方性需求。西北欧作为一个整体在 1836 年仍然缺乏足够的口粮作物^③——大陆上的工业化在那时仅是刚刚开始。在德国，在拿破仑开始破坏旧制度之后的 50 年中，尽管耕地面积增加了将近 80%，但产量仅与急剧上升的人口勉强保持同步（部分也是由旧体制的结束引起，因为旧体制既限制了婚姻，也限制了人口向通常使婚姻得以成立的原始工业及其他工资劳动职业的转移）。实际上，“饥饿的 40 年代”及那以后移民率的不断增长暗示出，这里食品供给的增长可能稍稍落后于人口增长。^④ 欧洲大陆可以出售给英国的剩余并没有增加。

英国自己的谷物和肉类产量变得越来越不足，正像首先由小麦对其他产品的相对价格急剧上涨（1750 到 1790 年间上涨了 40%）^⑤，然后由拿破仑战争期间的严重问题显示出来的那样。为了缓解不足，英国先是转向从爱尔兰进口，从 1784 年起由爱尔兰国会按价格的 10% 提供补贴。^⑥ 1824—1826 年这些进口相当于英国自己的农业、林业和渔业总产出的 10%（超过从德国和波兰的进口之和），1830 年代还要更多（当时的统计数字无法得到），^⑦但它们无法进一步增加生产；很快，爱尔兰就明显不能供养自己，它的农作物输出急剧下降（没有完全停止）。随着英国粮食赤字不断增长，它最终变得严重依赖新大陆，并在较小的程度上依赖俄国和大洋洲。

218

同时，19 世纪英国食品消费的增长速度并不像其人口和人均收入的增长预示的那样快。正如克拉克、休伯曼和林德尔特所注意到的，所有可用的估计都显示出 19 世纪英国的人均粮食供给是停滞或下降的，即使是有我们已经讨论过的进口和我们将在第 6 章讨论的糖进口的巨大浪潮。^⑧

更富有的人口并没有让每个人消费更多的卡路里的原因在许多方面与工业革命自身相关。在户外工作的人口减少，缩减了对食品的需求。1863 年

① F. Thompson 1989:189,193; Ambrosoli 1997:395,412.

② McEvedy and Jones 1978:28—29; Grantham 1989a:43.

③ Thomas 1985a:149.

④ Nipperdey 1996:92—93,97.

⑤ Thomas 1985a:141.

⑥ 同上。

⑦ 同上，145—146。与大陆进口的比较见第 141 页。

⑧ Clark, Huberman and Lindert 1995:215.

的农业劳动者家庭与城市劳动者家庭相比，每个等成年男性几乎多消费了50%的卡路里，比同样收入的城市劳动者花在食品上的钱更多。^① 从事重体力和非机械化劳动的人口减少——这是一个能够使每小时需要的卡路里下降1/3到一半的变化。^② 棉布价格——1750到1850年间下降了85%^③——和家庭取暖费用的大幅度下降^④也极大地降低了对卡路里的需求。^⑤ 茶和糖在19世纪与其他食品相比价格低廉了很多，也变得更为普通，^⑥它们常常起到抑制食欲的作用；^⑦所以它们在减少英国谷物需求中起的作用甚至大于糖在英国人的卡路里中占的实际份额的作用。（我们将在第6章中对此作进一步讨论。）重要的是要注意，所有这些变化或与煤业中的技术突破有联系，或与从欧洲以外的产地源源输入的廉价原材料（棉花、糖和茶叶）有联系。因此它们突出说明了下述要点：英国没有按照格兰瑟姆描述的大陆欧洲的方法满足其增长的食品需求；由此而加强了我们的观念，即如果没有煤和殖民地的双重利益，英国本来会面临一种没有明显的内部解决方法的生态绝境。

此外，格兰瑟姆关于城市需求增长通过推动向有更高生产率的作物混种方式的转变而增加供给的观点，或许主要适合于粮食作物。纤维作物引起了更为严重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们需要从土壤中吸收大量养分，需要很多的劳动力。在英格兰大部分地区，亚麻和大麻实质上是园艺作物，种植范围非常有限。甚至数额巨大的政府津贴也没能引起产量增长，而产量增长对于使英国实现这些作物的自给是必要的。这些作物的自给距纤维自给始终有很长的距离，从18世纪后期开始，英国输入的棉花数量不断增加。^⑧ 在法国，纤维作物几乎不在正常的作物轮作中，因为它们过于消耗地力。1750到1850年间大麻的种植确实有所扩大，但是仅在城市附近，那里可以得到丰富的人畜粪肥供给。靠近城市的土地范围当然是有限的；由于城市周围地区提供了很多就业机会，这些农场几乎没有足够的未充分利用的劳动力，而这是劳动密集型的纤维作物巨大增长所必需的。^⑨（在另一极端，亚麻种植在俄国确实得到了发展，因为那里很容易让土地在不同作物之间休耕——但劳动

① Clark, Huberman and Lindert 1995: 226—228.

② 同上, 225.

③ Mokyr 1990: 111.

④ Clark, Huberman and Lindert 1995: 233.

⑤ 同上, 235.

⑥ 同上, 233.

⑦ 同上, 234.

⑧ 关于输入，见 Bruchey 1997: 表 2-A；关于亚麻津贴及其有限的作用，见 Warden 1967: 362—364.

⑨ Grantham 1989a: 49—71；关于增加大陆亚麻产出的有限前景，见 Warden 1967: 724.

力问题和运输问题都不能如此容易地解决。)所以,尽管欧洲农业可能无需进一步采伐森林、损耗地力或实现技术突破,就能够满足食品需求的增长,对于纤维作物它却极为缺乏弹性。当19世纪的欧洲纺织品产量突飞猛涨时,欧洲大陆发现它自己正在输入的纤维比中国或日本必须或者能够输入的纤维多很多。

如果说纤维供给的价格弹性低于食品供给,建材与燃料——马尔萨斯四项必需品中的后两项——供给的价格弹性比纤维和食品中的任一项都要低得多。人工造林能够把每英亩木材的产量提高到天然林地以上。然而这种努力在各地一直处于相当初级的水平。1800年的日本可能比中国或欧洲稍稍先进一点。^① 尽管欧洲在热带的经验和东印度公司对印度森林保护的接管产生了颇有价值的关于造林技术的意义及方法的知识,但这种知识直到1840年代尚没有在欧洲应用。^② 18世纪末或19世纪初肯定没有迹象显示出旧大陆任何核心区域能够大幅度提高木材产量;反之,它们全部面临着木材需求增长、当地可以种植树木的土地面积缩减和几乎不变的单位面积产量。因而,这是一个对西欧和东亚的加速发展都很严重的生态威胁。这一问题值得进一步考察。

随着林地变成耕地,燃料短缺在欧洲、中国和日本的最发达地区都成为一个重要问题。欧洲的木材短缺无疑在集约耕作区域——从西西里到丹麦——最为严重,但欧洲大陆几乎到处都有木材短缺的记录;到拿破仑时代,木材短缺被视为一个全欧洲性的严重危机。^③ 这种看法对于诸如斯堪的纳维亚和俄国这样的地区来说无疑是不正确的,但它的存在证明了人们已经多么习惯于担忧木材短缺。

如果我们接受布罗代尔的估计的话,整个欧洲的燃料供给一直足以提供每年每人约0.5吨煤当量(tce)。^④ 这应该会使欧洲人的平均舒适程度高于当代亚洲农民家庭所需的最低估计数目(人均0.33tce)。^⑤ 但由于北欧寒冷的冬季、欧洲消耗更多能源的烹调方法及其低效的壁炉,布罗代尔的数字也许

① Totman 1995:104; Totman 1989:116—170; 李伯重 1994b:88; Osako 1983:132、135、142; Menzies 1996:651—654。

② Grove 1995:187、199、261、264—266、299—300、332—336、365、382、387—406、409、427、435、440、463—464、471—472。

③ Kjaergaard 1994:18—19、89—91。

④ Braudel 1981:367。

⑤ 关于这样一种估计的实例见亚洲开发银行 1982:114、360。由于欧洲使用的烹调方式,这些最低值在那里可能会高一些,当然在北欧比较冷的地区还要更高。(相反,当代亚洲大部分穷人,在华北的除外,生活在相当温暖的气候中。)

并不代表比当代亚洲农村“最低”水平更高的舒适程度。基亚加德(Kjaergaard)的18世纪末丹麦使用燃料的总数^①——折算为每年每人0.55tce——大致与布罗代尔对法国和整个欧洲的推算相等。这个燃料消费水平使1740—1840年成为丹麦历史上室内温度最低的年份——也是肺结核最严重的年份。^②

由于木材不能在陆地上远距离运输,以及常见的地方性燃料短缺,平均数使问题淡化了。甚至在森林覆盖率相当高的法国,也有一些地区在18世纪“再也见不到木材”,“穷人家中没有火”。这种情况随着人口增长而日益恶化。

18世纪欧洲燃料价格的上涨幅度看来普遍大大超过其他价格的上涨。^③在法国,拉布鲁斯(Labrousse)估计,木柴价格在1726—1741年和1785—1789年这两个时间段之间上涨了91%——与他的巨著中任何商品比较都是上涨幅度最大的。1768年以后这一上涨特别迅速,并持续到了19世纪初,当时它获得了一种“值得注意的影响力”。^④在英国,木柴价格在1500到1630年间已经上升了700%,是1540到1630年间一般价格上涨幅度的三倍;^⑤对这个国家许多地区来说,17世纪是一个能源危机时期。^⑥1750年以后,英国的木材、木炭、松脂制品和条形铁(用木炭生产)长期短缺。1763到1795年间条形铁的价格翻了一番,尽管有关税保护,以煤为基础的生产也开始出现实质性发展,但从瑞典和俄国的进口仍然急剧上升。^⑦1750年代进入英国港口的全部货运吨数中一半以上是木材;杉木的进口从1752到1792年间又增加了700%。^⑧

即使在能够找到足够的烹调用燃料的地方,工业用燃料也不一定够用;18世纪欧洲各地的铸铁业由于燃料短缺经常每年只开工几周。^⑨实际上,用粗略的估算方法就能说明,到1789年,仅是维持布罗代尔估算的燃料消费数字,就需要法国林地可持续产量的90%以上。^⑩因而,即使木材没有一点儿浪

① Kjaergaard 1994:123.

② 同上,97.

③ Goldstone 1991:186.

④ Labrousse(1984):343,346—347.

⑤ Nef 1932:i:174,263.

⑥ Nef 1964:262—264.

⑦ 但要注意瑞典和俄国在铁业中的比较优势包含了低成本的劳动力和高质量的矿石,而不仅是丰富的燃料(Flinn 1958:151).

⑧ Thomas 1985a:140; Thomas 1985b:729.

⑨ Braudel 1981:367.

⑩ 见附录D.

费,所有木材都能方便地运输到需要它的地方,也只能有非常少量的木材可以供烧窑、酿造或铸造业的发展,或用来制造更多的纸、船舶或房屋。在英国许多地区、在比利时、在里昂周围以及(通过进口)在丹麦,越来越多的使用煤——我们以后将回到这一问题上来——极大地减轻了压力,^①但1850年以前西欧其他地区没有这种情况发生。^②

尼德兰是一个令人感兴趣的中间性案例,它在相当长的时期中使用一种我们可以称之为半矿物质的燃料:泥煤。为采掘泥煤和运输泥煤的运河投入的大量资金使尼德兰在16到18世纪得到了非同寻常的丰富而廉价的能源供应。然而从长远看,泥煤对于真正持续而大规模的工业发展是不够的。^③

这并不是说荷兰工业的麻烦是由燃料供给问题引起的。德夫里斯和冯·德沃德(Van der Woude)指出,不能把能源供给视为荷兰经济的制约因素,因为在工业衰退的同时仍有大量泥煤尚未开采(19世纪泥煤的产量有很大增长)。此外,进口煤可以以一种并不比它在伦敦的价格高很多的价格到达荷兰。矿物燃料的缺乏并不是荷兰发展的制约因素。相反,他们认为,泥煤生产停滞是由于需求停滞;荷兰工业衰退有多种原因,但并不是由于缺乏燃料。^④

这些观点相当合乎逻辑。当然,泥煤是采掘而不是每年种植的。但荷兰人口、工业生产和能源利用长达150年的停滞使尼德兰成为一个特例。它作为西欧许多地区商业、金融和保险服务的输出者的特殊地位也是如此,还有它在满足自己对纤维和燃料的需求的同时长期依赖粮食与木材的进口这一事实。我们不需要说明,无论其他情况如何,某种原材料的短缺对每个发达经济都构成沉重的压力;当然造成停滞的另外的制度方面的因素可能在燃料成为一种制约因素之前就已介入,就像尼德兰的例子所表现的那样。但是任何大经济如果既要维持人口的继续增长,又要维持人均产出的继续增长,它就会需要矿物燃料和/或其他对土地限制的明显缓解。到1780年代,甚至人口停滞和有丰富泥煤的尼德兰,进口的煤也相当于其泥煤产量的1/3左右。^⑤如果荷兰的人口在18世纪初到19世纪初之间像英国那样翻了一番,那么甚至泥煤产量在19世纪的迅速增长也只能维持人均能源供应每年200万大卡;而英国经济在1815年,在蒸汽机的全盛期之前,人均使用的以煤为基础的能

222

① Kjaergaard 1994:120.

② Nef 1932:1:169.

③ De Zeeuw 1978:23—25.

④ DeVries and Van der Woude 1997:709—710,719—720.

⑤ 同上,709 注释 18.

源已经超过了800万大卡。^① 如果连泥煤的巨量供应都不能为新经济提供足够的燃料,每年生长的树木就更不必说了。

同时,用于船桅之类的质量较高的木材供给甚至更为缺乏。这种短缺使英国人尽力为其海军保留其新英格兰殖民地所有适用的树木,并把大部分商船的建造转移到它从魁北克到马德拉斯的森林繁茂的殖民地。在美国革命的前夜,仅在美国的殖民地就建造了英国商船的1/3。^②

对欧洲来说,英国——更不必说法国——的木材短缺并不是特别严重。1789年法国约有16%仍然是森林,而16世纪中叶有33%以上。^③ 迈克尔·威廉斯(Michael Williams)估计,“海岛和半岛欧洲”其余地区中,大部分——意大利、西班牙、低地国家和英国——到1850年森林面积降到了5%—10%。^④ 丹麦尽管有得力的燃料节约措施,其森林——1500年占其陆地面积的20%—25%——到1800年也只占其陆地面积的4%。^⑤ 如我们将看到的,中国的岭南大区——这个地区在商业发展和人口密度方面仅次于长江下游——林地百分比到1930年代逐渐下降到与此大致同样的水平。^⑥ 斯堪的纳维亚许多地区、东欧的一些地区和俄国的一些大区仍然有茂盛的森林,但如我们即将看到的,它们缓解欧洲比较“发达”地区的短缺的能力是有限的。属于德国和奥地利的那些区域仍然有比法国更多的森林,总体看或许多达25%。^⑦ 尽管如此,甚至在19世纪人口高涨和耕地剧增之前,区域性短缺在德国局部地区就已经很严重;而德国全国的年消费量甚至在18世纪后期就明显超过了树木的生长,既导致了木材进口,又使德国国内的树木以不可持续的数量被采伐。^⑧

同时,不断增长的粮食需求也威胁着欧洲另一种能量供给:土壤肥力。随着以前的草场变成耕地,羊群和牛群似乎在不断萎缩(正如前文讨论过的肉类消费长期下降所暗示)。^⑨ 森林缩减也使养猪的花费更大,这种家畜看来

① 荷兰的数字依据同上(减去了进口煤的份额),及第719页对19世纪的泥煤产量等于17和18世纪之和的观测检验。英国煤产量数字来自 Mitchell(1988:247);以煤为基础的能源的资料根据 Smil(1985:36),假定烟煤和无烟煤各占50%。

② Lower(1973:36)论魁北克; Cronon(1983:109—110)论新英格兰; Gadgil and Guha 1993:119; Albion 1965:161; Thomas 1985a:140。

③ 见 Cooper 1985:139 注释 2。

④ M. Williams 1990:181。

⑤ Kjaergaard 1994:15。

⑥ 见凌(1983:35)对林地面积的估计。

⑦ M. Williams 1990:181。

⑧ 同上; Heske 1938:5, 25—26。

⑨ Slicher Van Bath 1977:90。

同样在减少。^① 在丹麦，森林正在变得特别稀少，到 18 世纪牛群被禁止进入森林；^② 这使更多的树苗得以存活，但极大地增加了养牛的成本，并因此减少了肥料供给。

结果是，17 世纪后期和 18 世纪，欧洲很多地区每英亩农田施用肥料的数量和质量看来都在下降，即使在一些耕作变得越来越集约的区域亦是如此；^③ 至少在法国，衰退的步伐看来在 1750 年之后加快了速度。^④ 在丹麦，1700 到 1759 年间肥料价格上升了 500%，同时农作物价格的上升幅度则非常小。三叶草最初似乎是一种灵丹妙药，以至 18 世纪后期丹麦有 40%—70% 的土地以三叶草为轮种作物，但这产生了它自己的问题：土壤的“三叶草疲劳症”、在植物之间迅速传播的三叶草病害再加上产量下降，使进一步的改革成为必需的。^⑤

在英格兰，完全市场导向的农业和高度的文化素养产生了一大批有关农业改良问题的文献，那里的情况相反，家畜可能在增长；但土壤肥力的前景仍然远远不像一些有关“农业革命”的描述所暗示的那样美好。1787 年一则来自诺福克的报道表明，著名的“诺福克轮作制”并没有解决土壤退化问题，至少没有解决浅层土壤的退化问题；三叶草变得斑驳不齐，土地显出了疲劳的迹象。^⑥ 引进的三叶草品种和其他饲料作物发挥了它们最大的作用，使某些二流土地得以变成优等草场，同时把最好的耕地留下来种植谷物。但如果这些新牧场还要维持下去的话，它们生产的肥料就必须留在原地，因而这一体系并没有为粮田或粮食供给带来缓解；它使农业总产出增加（谷物加上畜产品），但没有增加粮食产量。^⑦

224

因而，总的来说，尽管土地修治的知识不断增进，到 19 世纪初，欧洲（包括英格兰）耕作最为集约的土地中还是有一些面临严重的衰竭。（尽管如此，英格兰看起来并没有面临严重的土壤侵蚀问题——而这个问题，如我们即将看到的，困扰着欧洲大陆各地——或许是由于轮作制度，以及其农业初步摆脱了有很多生产者却没有足够的再投资财源的境地。^⑧）如果没有 19 世纪肥料进口的高潮（特别是海鸟粪）、开采磷酸盐矿和后来的人工合成肥料，情况可

① Slicher Van Bath 1977:89。

② Kjaergaard 1994:107。

③ Slicher Van Bath 1977:95。

④ Bliakie and Brookfield 1987:131-132。

⑤ Kjaergaard 1994:60、85—86。

⑥ Ambrosoli 1997:374。

⑦ 同上，392—394。

⑧ Bliakie and Brookfield 1987:140。

能会是灾难性的。^①

最后，在森林过度采伐继之以过度放牧的地方，土壤本身可能消失：在 18 世纪的匈牙利、普鲁士、瑞典、丹麦、英格兰、荷兰和法国沿海地带，突然失去了树木的地方，泥石流和沙尘暴（有时会把土壤带到 30 英里外）是常见现象。^② 其他以前是森林的地方变得泥泞（因为其他植物吸收水分既不像树木那样好，也不像树木那样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再蒸发的表面）和高酸度；为了抵消这一切，必须使用大量密集的劳动掺撒泥灰和修筑沟渠。^③ 法国和德国各地的考古研究显示，18 世纪是欧洲历史上土壤侵蚀最严重的两个时期之一，而在此阶段这一问题达到了最严重的程度。^④ 此外，严重侵蚀通常意味着存在更多的土壤问题，^⑤1750 年以后西欧大陆很多地方产量停滞或下降的记录证实了这一点。

225 欧洲很多遭到侵蚀的低地在 19 世纪得到了恢复。（然而很多高地从来没有恢复。^⑥）这是由于一系列条件的综合，包括更好的翻耕及施肥技术（所用的改良犁与在中国早已常见的犁非常相似）、重新造林的努力（在新技术知识、可以利用的非木材燃料增加和 19 世纪后期北美木材进口的帮助下）和废除残存的公共土地（随着这些土地的缩减和人口的增长，它们成为使用最为过度的土地）。19 世纪贫瘠地区的农民向城市（和美洲）移居或许也有帮助。可以利用的海外农产品和非农业性肥料（首先是开采，然后是人工合成）的增加，也在阻止土质下降的同时，实质上使 1800 年代更多的欧洲人能够吃得更好。如果没有这些多重因素的缓解，其中新大陆占了很大分量，19 世纪可能会看到一个向下的生态螺旋——就像中国一些地区发生的情况一样——或者只有以人口更为缓慢的增长和更低的生活水平为代价才能避免这一命运，同时还必须把更大比重的人口留在土地上，努力发展劳动极为密集的节约土地的技术，而不是为工业提供廉价的劳动力。

甚至存在某种理由可以推测——尽管我们只能推测——西欧的森林采伐已经开始对气候施加有害的影响。欧洲正常的降雨量模式是全年相对平均分布，但 18 世纪后期却出现了“欧洲雨季”，短时期狂暴的、集中的（并且是高度侵蚀性的）降雨与相当长的旱季交替出现。^⑦ 尽管我们并不知道为什么

① Hobsbawn 1975:106; F. Thompson 1968:62—77。

② Kjaergaard 1994:20—21。

③ 同上,21,40—41,50—56。

④ Blaikie and Brookfield 1987:129—131,138,140。

⑤ 同上,137。

⑥ 同上,136。

⑦ 同上,133;另见 Lamb 1982:235—236。

会发生这种情况，但却知道毁林区域更为趋向于这种天气模式。事实上，如我们看到的，欧洲人只是通过一些为了建立种植园和/或为海军造船提供木材而过度采伐森林的殖民地的天气变化才开始对此有所了解。^① 今天有这样一种气候的仅有的几个温带区域之一是森林严重采伐的华北，我们不久就会转向那里。此外，即使是到此为止森林采伐可能并没有影响气候的地方，它对土壤产生的影响也可能与这种气候发展得更极端时会产生影响相同。当土地从森林变为耕地时，地表的最高温度可能大幅度提高（在新英格兰的一些试验中上升了 10°C — 11°C ），同时最低温度变得更低。此外，由于树林较少的土地也不能留住降雪，它就丧失了一个保护层，土壤受冻往往比以前更深。甚至在大气层气候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的情况下，平均风速也会提高，可能带来严重的侵蚀后果，土壤流失更为迅速，洪水和干旱越来越明显，同时地下水位也在降低。^② 欧洲那些已经几乎没有多余的农业产出的地区正站在这种变化的边缘——或者说是需要投入更多的劳动以避免它们——就这一意义说，这些地区面临一个可能对工业化造成严重阻碍的生态危机。

中国的森林采伐和地力衰竭：与欧洲的一些比较

中国农村的数据很少，但我们确实知道区域性的资源衰竭常常很严重。在长江三角洲，木材短缺引起了大型建筑和船只价格飞涨。一条海船所需木材的价格在1550到1820年间可能提高了700%（同时稻米价格大概提高了100%）；许多供海外贸易用的平底帆船的建造地点从长江三角洲、福建和广东转移到了东南亚。^③ 中国不同地区的人们都在尽可能避免燃烧以前作为燃料的木材，改为燃烧农作物残余、草和牲畜粪。^④ 到1750年前后，至少有三个大区——岭南、东南沿海而首先是长江下游——依赖外部供给各种各样生态敏感的商品。所有这三个区域都输入数量庞大的食品（占长江下游总供给的13%—18%），三者都输入木材；至少长江下游，消耗地力的棉花的一个主产区，还从东北输入了大量的豆饼肥。^⑤（19世纪岭南输入了它需要的大部分

226

① Grove 1995。

② 一个对这些关系的有用的概括，见 Cronon 1983:122—123。

③ 李伯重 1994b:86—89,94; Viraphol 1977:180。

④ Marks 1997:320。李伯重(1998:48,200页注释23)提到江南肥料的短缺和向非农业性肥料来源的转变。然而，他强调的是新肥料的优点而不是家畜粪用于其他目的。

⑤ 王业键 1986:90—95；王业键 1989:427；Adachi 1978；Marks 1991:76—79。

棉花,也开始输入更多的豆饼,当时它的人口与长江三角洲不同,继续在增长。)

确实,由于中国人口的高密度,假设中国的生态问题比欧洲的生态问题严重得多是有诱惑力的;但那样做实际上不无危险。虽然中国发展建筑业和燃料密集工业的机会可能比欧洲少,但它所面临的对它再生产其现有生活水平的能力的威胁或许并不比一个假定没有美洲的欧洲会面临的威胁更人;实际上,它的境况可能稍微更好一些。

水稻种植——为水稻输送大部分养分的与其说是土壤不如说是水,一年的藻类能够恢复 24 季水稻连续种植造成的氮的损耗^①——使华南的集约耕作完全可以持续;猪(一个重要的肥料来源)的数量看来不断增长。^② 岭南灌溉种植的水稻每英亩粮食产量在豆饼肥料不断增加的帮助下保持增长,在 1750 到 1900 年间可能翻了一番。在 18 世纪已经大量应用豆饼肥料的长江下游,1800 年以后产量增长缓慢,但一些地区甚至直到 1930 年代还在明显继续增长,而并没有大量应用新技术。(化肥和杀虫剂 1900 年以后才开始出现,直到 1960 年代后期一直没能广泛应用。)^③

227 早作区域的生态环境更为脆弱,但仍然与西欧的情况惊人相似。我对 1800 年前后华北一个以种植小麦和高粱为主的旱作区域的粗略估计显示出,每英亩种植面积使用的肥料约比西欧多 40%—60%。我们对这种肥料的质量几乎一无所知,但有理由认为它比西欧使用的肥料更好,它的使用方法也更好地保存了养分。^④ 更重要的是,与一个假设均匀混种的轮作体系中每六年种植两季固氮的三叶草不同,一块典型的华北农田在一个平均六年的轮作周期中收获三季固氮的大豆。(在中国和欧洲,实际应用的轮作方式都非常多。)附录 B 对一个华北小麦农场样本和一个英国小麦农场的氮的损耗率进行了估算。尽管这种推算远非实际情况,它仍然显示出华北的土壤养分一直比欧洲农业“先进的”中心地带保存得更好——或许棉田除外。^⑤ 此外,覆盖了华北许多地区的黄土有一个重要的优点。由于这种土壤有相当良好的毛细管效应,它可以从地下特别深的地方把水分和矿物质吸上来;这使它,用一个地理学家的话说,只要保持潮湿就能有效的“自我施肥”。^⑥ 既然我们拥有

① 水稻种植生态的一个经典描述,见 Ceertz 1963:29—37。为恢复氮的损耗施放到水田中的干粪的数量见 Smil 1985:140。

② Perkins 1969:71—72。

③ Marks, 私人通信,论岭南;Perkins (1969:21)论长江下游。

④ 见附录 B 中对计算的解释。

⑤ 见附录 B。

⑥ 冀朝鼎 1963:14—15。

的证据强烈显示出,19世纪中国的许多地区,即使没有输入的或人工制造的肥料,每英亩作物的产量也在继续提高,就没有理由认为,除了几个具体的区域之外土壤问题处于危机状态。相反,如果没有输入海鸟粪和其他矿物肥料,英国和其他地区的很多农民就无法使他们1800年前后的产量维持更长时间。^①

在欧亚大陆的两端,纤维短缺可能都是更为严重的问题。在中国,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人均棉产量在18世纪中期到19世纪后期之间可能有明显下降,但总产量并不是这样。尽管如此,至少在没有从东北得到大量输入的豆饼肥料的地区,甚至这一成绩对土壤造成的损害也可能很严重。当然,对于欧洲来说,巨大的差异在于,它自18世纪后期开始大量增加纤维的输入——首先是美洲棉花,但也有印度和埃及棉花,后来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羊毛。

中国的森林覆盖和燃料供给问题更为严重,但或许并不像我们通常认为的那样差,并且——令人吃惊的是——并不比西欧的情况明显更差。凌大燮估计1700年左右全部林地比重为帝国土地的26%。^②如果我们减去4个与帝国其他地区关系不大的人口稀少的边远地区——西藏、新疆、青海和外蒙古——中国其余地区的数字是37.2%。此外,凌对华北平原许多地方的估计可能太低。^③ 228

然而,凌的数字是1700年的,当时清代人口的突然剧增才刚刚开始;1800年的情况更有多差?当然,大量以前覆盖着森林的土地在18世纪变成了耕地,特别是当玉米、甘薯和其他外来作物的推广使人们能够耕种以前不能耕种的土地时;而从长远来看,山地开垦在生态上是灾难性的。同时,越来越多的湖滩和河床开辟为耕地,导致河水流速减缓、河床淤积速度提高、洪涝灾害增加。然而这些问题过了很多年才变成灾难性的;在1800年它们完全有可能并不比其他人口密集地区更严重。例如,丘陵地区的定居引起土壤侵蚀和洪水增加,这样一种模式在日本高度发达的畿内和关东地区也相当明显,至少比长江流域早50年就似乎到达一个几乎长期受洪水威胁的阶段。^④

让我们从长江下游开始,这个大区与欧洲的英格兰和尼德兰,或日本的关东和畿内地区之类富裕但生态环境紧张的区域最具可比性。18世纪中叶

^① Rossiter 1975: 149—153; Ambrosoli 1997: 395; Hobsbawm 1975: 106; F. Thompson 1968: 65—70. 另见附录 B。

^② 凌 1983: 34。

^③ 见下文 234—235 页(指本书英文本页码——译注)和附录 C。

^④ 以 Totman 1992: 22 与 Schoppa 1989: 147—167 比较; Perdue 1987: 227, 230; Will 1980; Osborne 1994: 30—31。

在长江下游和中游都有对于低地开垦过度的指责,但这种开垦一般来说牺牲的是水而不是森林,并且它的影响(主要是对排水)尚不是决定性的。^① 1780年代以前有一些对于丘陵地带的垦拓引起的生态问题的抱怨。^② (针对社会问题的抱怨是另一个问题——开垦丘陵的人中有很多是来自其他地区的流民,“土著”和“外来人”之间经常发生冲突。)长江三角洲很多地方是通过围垦滩涂而不是砍伐森林开垦土地的,这些地方的树木此前一直就比华南大部分地区要少;江苏省,包括长江三角洲很多地方,是惟一的甚至在公元前2700年森林覆盖率就明显低于50%(46%)的南方省份。^③ 凌大燮估计到1700年,江苏——主要由长江三角洲的部分地区加上华北平原向南延伸的一部分组成——大约有5%的森林;这使它可以与华北最差的地区和18世纪的英格兰相比。^④

但是森林并不遥远。紧邻长江三角洲南半部的浙江丘陵有很多区域迟至1802年一直是森林,直到1840年代仍继续出现新的开垦;事实上,1820年以后垦殖有所加速。^⑤ 真正把洪水归之于山区开垦的第一个案例直到1788年的记载中才出现。^⑥ 福建省的东南沿海地区——像江南一样是一个人口非常稠密的区域,也是一个巨大的造船业中心——看来早在16世纪就出现了严重的山区森林采伐、侵蚀加重和洪水问题,但后来情况似乎得到了稳定而不是持续恶化。^⑦

严重的问题正在长江下游的生态环境中形成,但或许直到完全进入19世纪之后它们才比欧洲和日本的核心地区的问题更为严重。到那时,如我们将见到的,欧洲最发达的地区通过地下和海外的资源使生态问题得到了明显缓解;日本在较小的程度上亦是如此,后者日益依靠远洋渔业提供食品和肥料。^⑧ 即使存在这种缓解,从1720年前后到1860年日本的人口仍然是停滞的。一些学者还认为,日本人均收入的停滞开始于18世纪中叶,尽管是在一个异常的高水平上。^⑨

对岭南这个或许是中国商业化程度和人口密度占第二位的大区的森林

① 以 Schoppa 1989:120--139 与 147—163 比较;另见 Perdue 1987:196,202,219—233。

② Osbrone 1994:30。

③ 凌 1983:33。

④ 同上,34。

⑤ Osbrone 1994:36。

⑥ 同上,30—31。

⑦ Vermeer 1990:141—147,156,161。

⑧ Totman 1992:23。

⑨ Hanley and Yamamura(1977:16—28)检验了这一观点并作出了批评;L. Roberts(1991:88—95)提出需要一个比较复杂的分类,并认为这种旧观点可能确实适合于一些时期和地区。

采伐和燃料供给压力进行更为量化的观测是可能的。尽管这一区域在 18 世纪后期肯定遇到了生态问题的困扰，它仍然比“海岛和半岛欧洲”许多地区保持着更多的树木供给。完全可能，它所处的状态甚至比法国更好，后者经常被从欧洲挑选出来与发达但森林采伐过度的英国进行对比。^①（岭南 1753 年前后有 1750 万人，1853 年达到 3050 万；^②法国 1789 年有 2600 万人，而土地面积约比岭南大 40%。）

凌大燮给出的 1700 年前后的数字认为，沿海省份广东的森林覆盖率为 54.5%，而正在成为广东省饭碗的邻省广西则为 39%。^③ 像中国别的地方一样，1700 年刚刚开始的人口剧增敲响了森林的丧钟；而与长江下游不同，岭南的人口增长在整个 19 世纪和 20 世纪持续发展猛烈如初。到 1937 年，能够可靠确定的广东的森林面积约为 10%，而广西仅为 5%。^④ 但我们缺乏这之间年份的数字，我们必须作一些估计。 230

表 5.1 岭南森林面积,1753—1853

	森林面积(公顷)			森林覆盖率		
	广东	广西	岭南	广东	广西	岭南
1753	9 000 000	6 500 000	15 500 000	45	35	40
1773	8 200 000	6 020 000	14 220 000	41	32	37
1793	7 440 000	5 660 000	13 100 000	37	30	34
1813	6 560 000	5 240 000	11 800 000	33	28	30
1833	5 760 000	4 940 000	10 700 000	29	26	28
1853	4 880 000	4 700 000	9 580 000	24	25	24

一个简单的方法是利用人口趋势。使用由罗伯特·马克斯汇集的数字，我们可以在人口增长和森林消失之间计算出一个平均关联：广东省每增加一个人就意味着减少大约 0.4 公顷的森林，广西每新增一人则减少 0.6 公顷。^⑤（这个差异能够成立，是由于广东不仅砍伐森林也围垦滩涂，有很多高度集约耕作的稻田，与广西不同的是，它还要输入稻米。）然后我们可以利用这些平均数，按照马克斯对 20 年间隔的人口估计，计算在某些年份可能会损失多少森林。然而这一方法很粗略，它可能会使我们的计算结果产生偏向，使表面

① 实例见 M. Williams 1990:181—182。

② Marks 1997:280。

③ 凌 1983:34。Robert Marks, 第一个全面考察了岭南生态史的作者，认为这些数字一般看来是合理的。

④ 凌 1983:35。

⑤ 根据 Marks 1997:280。

上非常坏的情况出现得比实际的年代要早。^① 结果列在表 5.1 中。

持续下滑的趋势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岭南 1863 年的森林覆盖率仍然将近 25%,当时它每平方公里的人口约为 77 人;比较起来,法国 1789 年的森林覆盖率已经下降到 16%,当时它的人口密度仍然在每平方公里 50 人以下。^②

正是由于岭南的人口远比法国更为密集,它的比较高的林地百分比仍然有可能掩盖了更大的木材稀缺。为了研究这一点,我建立了两个简单的尽管是人为的测量标准。一个是人均可持续的燃料供给,它是对在砍伐量没有超出林地正常生长量的情况下每年能够获得的热量(以 tce 为单位)的一个估计。另一个是人均工业用木材供给,是假设在家庭基本燃料供求得到满足但并没有超出,也没有浪费木材的情况下,有多少木材能够供给其他用途(从造纸到建筑到铸造)的一个估计。

看上去可能很明显,法国在这两个标准上表现得都会比岭南好,因为它依赖每公顷森林的人口比岭南少了如此之多。但至少四个因素暗示出另外的情况。

首先,华南的人均燃料需求可能比法国的低很多:在更温暖的气候中需要的供暖较少;中国人的烹调方法比欧洲人的更快,燃料的效率也更高;与欧洲普遍使用的炉子和(特别是)敞开式的壁炉相比,中国无论是用于烹调还是家庭取暖的火炉设计得都更加有效。在我对广东的计算中我就这些差异作了一些调整(见附录 C),但所用的方法几乎肯定低估了它们的影响。^③

第二,在中国树木种植和木柴收集的一般模式——其特征是每个家庭庭院中或庭院附近的小树丛,加上依靠一片片断续相连的树林的收成——意味着运输费用最小。因而,值得花力气捡拾树枝和其他可以燃烧的小块木头,而这些东西在欧洲会被留在树林中的地上浪费掉。我没有办法知道这种差别的大小,也把它忽略不计,但它适合于一个普遍的模式,在这个模式中,中国农村家庭使用少量追加劳动(通常是妇女和儿童劳动)就能够获得最多的资源,并弥补更为稠密的人口的生态消耗。^④ (大片树林的相对缺乏也适于另

^① 事实上,我们应该预期在我们研究的这个阶段的早期,每一个新增加人口所减少的森林面积比较小,晚期则较大。比较好的土地可能首先有人定居,所以早期增加的人口比后期增加的人口或许需要较少的土地(尽管提高土地生产力可以对此作出弥补)。此外,在最初一些年中,新增人口增加的燃料需求不必超过当年的树木年平均生长量就能得到满足;但当人口变得非常稠密时,为燃料进行的砍伐就可能超过可持续产量,至少在一些区域引起了一个向下的螺旋。

^② 法国人口统计引自 McEvedy and Jones 1978:59。

^③ 关于火炉的设计、搅拌烹饪和其他影响烹调时的燃料效率的事物,见 Anderson 1988:149--151。另见附录 C,309—309 页(指本书英文本页码——译注)。

^④ 这一树木种植模式及其与欧洲的差异,见 Menzies 1996:663、667。

一种模式，在那一模式中，中国的上层社会人士——比欧洲大多数统治阶级成员举行的打猎和骑马活动要少得多——与其他大部分定居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群体相比，更少去保护大片的供低强度使用的土地。^①结果是闲置资源更有效率但也更少——这类闲置资源后来对于欧洲成为“落后的好处”。)

第三，在亚热带的岭南，每棵树的年生长量几乎肯定比在法国更大。这一差异可以估算出来并添加到计算中，但我没有这样做；这是又一个确保这些比较——如果有误差的话——不利于中国而不是欧洲的做法。 232

第四或许也是最重要的，中国农民家庭的燃料供给有很多并非来自树木，而是燃烧农作物残余。所以，在法国变成农田的每公顷森林都是燃料供给总量的一个减少，但在中国，加入耕作的土地仍然生产燃料。燃烧农作物残余在环境方面并不是不付代价的，但它也不一定是一个大问题。它必然伴随着有机物的损失，而这些有机物本来是会回到土壤中的（当蚯蚓、细菌和真菌把植物分解为可供植物吸收的养分时），尽管我们对氮循环量的估计显示出这不会成为一个致命的问题。另一个无法计算但或许更为严重的问题是，清除农作物残余常常会增加风侵蚀造成的土壤损失。这在华北比在岭南更可能成为一个严重问题——对此我们将在以后考察——因为北方的土质一般来说比较轻，同时从收获到下一季作物的根系牢固到能够帮助抓住土壤，这之间的间隔时间也长得多。为了当前的目的，我将至少忽略岭南发生的这些损失，继续估计这种做法在满足区域燃料需求中的价值。

在绿色革命之前，稻类作物（和其他小颗粒谷物）按重量计可食用的不到一半；如果我们假定农作物残余的重量等于可食用稻米的产量——对后者人们知道得相当清楚——我们肯定没有估计过高。然而，这些残余中的一部分还用于饲养家畜，特别是猪。尽管我们没有1920年代以前中国任何地区的家畜普查数字，但有理由认为猪（肉类的主要来源）与人口的比率没有很大变化；这使我们能够通过20世纪的数字回溯到18世纪。我假设其他家畜，主要是用于使役的家畜，每人平均数量与20世纪的华北同样多；这几乎肯定是一个过高的估计，因为岭南农民比北方农民耕种的土地要少得多。（更详细的资料、假设和计算见附录C。）

对1753年岭南粮食产量（按照马克斯的重建）应用这种方法产生的计算结果是，可供燃烧的农作物残余至少可以产生人均0.08tce，或者说是亚洲开

^① 这样一种概括更多的指汉族绅士、商人和地主，而不是建立了清王朝的满族征服者；但后者的人数除了在北京和东北外从来都是少数。此外，在很多满族人在他们的文化兴趣中变得不那么“尚武”，并放弃了打猎和骑马的同时，有非常少的汉族人接受了打猎或马术。

发银行估计的今天最低需求量的大约 1/4; 一个更为可能的数字是每人 0.16tce。(18 世纪的农民使用的燃料不可能比今天认为必需使用的燃料更多, 假定他们确实如此因而面临一个可怕的燃料危机是荒谬的。) 只是为了防止这一估算仍然包含某些向上的偏差, 我完全省略了种植除谷物、甘薯和豆类以外其他作物的土地上的任何农作物残余——而其他作物的种植非常广泛。马克斯估计, 1753 年岭南人口消费的全部粮食只要使用其耕地面积的 30% 就应该能够种出来。因而, 甚至在需要把马克斯的产量估计减半这一不可能的情况下, 全岭南用于其他作物的耕地面积也肯定超过总耕地面积的 40%; 把这些土地上的农作物残余忽略不计, 对于农作物残余产生的热量的任何乐观估计几乎肯定都是矫枉过正的。

表 5.2 人均总“燃料”供给
假定木材没有其他用途(单位: tce)

1753	1.75	1813	0.99
1773	1.45	1833	0.83
1793	1.19	1853	0.70

表 5.3 高于并扣除家庭燃料需求的木材供给

	林地 (公顷)	供燃料所需 森林	剩余森林	“非燃料”木材 人均(吨)
1753	15 500 000	1 650 000	13 850 000	2.85
1773	14 220 000	1 675 000	12 545 000	2.25
1793	13 100 000	2 260 000	10 840 000	1.73
1813	11 800 000	2 469 000	9 331 000	1.32
1833	10 700 000	2 956 000	7 744 000	1.00
1853	9 580 000	3 339 000	6 241 000	0.74

我们现在可以继续研究 1753 年及其后的燃料供给。加上岭南每 20 年间隔新增加的人口, 加上适当的家畜数目, 假定(不真实的)新加入耕作的土地只是满足了新增人口的粮食需求, 利用上文计算出的森林消失数字, 就制作出了表 5.2 和 5.3。表 5.2 显示出岭南人均潜在燃料供给是如何变化的。表 5.3 显示出, 如果每年只采伐林地可持续产量, 在扣除需要用来弥补可以得到的农作物残余和家庭供暖及烹调最低需要量之间的缺口的数量之后, 有多少木材可以用于其他用途。

尽管这些数字并不精确，它们说明了两个非常重要的事实。一方面，我们看到，即使是在一个有效利用资源的经济中，人口增长能够多么快速的吃掉木材的供给。当我们想到表 5.3 中的“非燃料”木材用在了许许多多的建筑物、大车、船和其他必需品身上时，显然，任何工业发展所需的能源供给（甚至包括纺织业，它在漂白和染色生产中使用燃料）都在迅速缩减中。因而，看来在市场手工业的发展有助于推动人口增长的范围²³⁴内，那些同样的力量最终也可能关闭“勤劳革命”能够在其中引起一场工业革命的生态窗口；除非，说得更精确些，出现了向矿物质燃料和/或输入初级产品的有力转折。一个生态瓶颈迫在眉睫，在追溯中（尽管只是在追溯中）它是作为人口进一步增长、人均收入提高或人口向农业以外部门移动的一个严重制约因素出现的。

另一方面，这些数字并没有显示出甚至迟至 1853 年一个马尔萨斯危机的逼近。岭南的情形看起来比法国（再一次，完全不是西欧森林采伐最严重的地区）在早得多的时候面临的情况还要好。1550 年前后，法国潜在的燃料供给总量约为每个居民 2.3 tce，即人均 3.6 吨，超出基本燃料需求的可采伐木材；到 1789 年，几乎所有这些剩余都消失了。如果所有可采伐的木材都烧掉，人均燃料供给约为 0.64 tce，如果燃料消费保持在布罗代尔估算的人均 0.5 tce 的水平上，则每人剩下 0.29 吨木材可供其他用途。中国远非惟一遭遇严重生态问题的国家，甚至中国一些人口较为密集的地区看起来也比欧洲经济上处于同等地位的地区处境更好。

尽管如此，最后我们还需要考虑华北。这个缺乏水稻优势，又肩负着支持中国首都（一直是世界最大城市之一）重任的旱作区域相当大。到 1900 年，华北很多地方成为生态灾区，一种普遍的倾向是假定这种情形已存在很长时期。凌大燮 1700 年的数字显示，华北的两个省份——山东和河南——森林采伐已经非常严重（森林覆盖率分别为 1.3% 和 6.3%）。第三个完全位于华北大区的省份直隶，像部分属于华北的山西一样（18.8%），情况要好得多（22.7%）。尽管如此，这仍然是一种非常令人不安的局势。

总的说来，华北大区和华西北大区或许有中国最严重的生态问题。由于华西北人口稀少，我们在这里将忽略其日益恶化的问题——把它们的意义看作地方性的——集中注意于它的人烟更为稠密的邻省。实际上，华北，如我们在第 3 章中所见，是中国一个在 1750 到 1900 年间非粮食作物产量不仅按人均计算而且按绝对量计算都下降的大区，因为它的耕地中必须用于粮食生产的部分越来越多。但是即使在华北，1800 年前后也不是到处都同样严酷：提高生活水平的前景有限，但稳定的生活水平和多少持续的人口增长在生态上看来仍然是可行的。

1696年沿着大运河旅行的法国传教士杜霍尔(De Halde)提到了山东南部广阔的森林,这是华北森林采伐最严重的省份中人口最密集的地区之一。^①在整个18世纪,兖州附近区域——靠近杜霍尔所看到的森林——持续不断地把木柴通过运河运往临清的皇家砖窑。尽管数量不大,这也有助于说明山东不像凌的数字显示的那样缺乏林地。^②甚至迟至1793年,乔治·斯当东(George Staunton),前往北京的一个英国使团的成员,还展示出一幅混沌的画面。在提到华北平原大部分地区树木“零星散布”的同时,^③他也注意到一些地方有大片的树林,通常是在墓地周围。^④总的说来,他相信他所看到的华北农村,尽管一般说来是贫穷的,但并不缺乏基本必需品。他也注意到华北高粱的根通常是烧成灰用作肥料,“在缺少燃料时”也拿回家去燃烧。^⑤最后,他提到华北的大运河两岸栽种着一段又一段绵延数英里用以巩固堤岸的柳树和其他树种。^⑥尽管它们本身数量不大,但这些树木表明燃料短缺还没有达到危急程度:在20世纪,当人们变得真正不顾一切时,事实证明不可能保护这些树木逃脱非法砍伐。^⑦

任何量化估计肯定都是非常粗略的,但通过20世纪的资料回溯,能够作出一些合理的猜测。作为一个样本区域,我选择了鲁西南的27个县,1800年前后它大约有500万人口。华北这一个具体的地区在1930年代是中国燃料短缺最严重地区之一——每人每年的燃料供给大概是0.09 tce,比当代孟加拉或萨赫勒最严重的地区更为恶劣。^⑧所以正是这一地区在1800年前后看起来相当适合居住——如斯当东的证词显示——是令人吃惊的。

用粗略但是极为保守的估计方法计算出这一区域那时的燃料供给是每年0.62 tce,比布罗代尔估计的法国同一时期使用的能源高20%,几乎双倍于当代可利用能源的最低估计。那一燃料供给中大约有40%以上应该是来自

① Pomeranz 1993:134.

② 许檀 1986:138.

③ Staunton 1799, I:279, II:46.

④ 同上, I:266;还有 II:46,169.

⑤ 同上, II:138,141.

⑥ 同上, II:142.

⑦ 关于20世纪的燃料短缺和非法砍伐树木,见 Pomeranz 1993:124--125,143—145.

⑧ 见 Pomeranz 1993:125;Pomeranz 1988:附录 F.

农作物残余，但看来可能的是，该区域在 1800 年至少还有 13% 的林地。^① 这不会留下很多木材供其他用途——举例来说，农村盖房子使用了大量的各式各样的砖——更不必说供工业发展；燃烧农作物残余可能在长时期中造成了土壤侵蚀扩大和养分损失（特别是与以后几十年中进一步的森林采伐和水位下降结合在一起，对此我们将在以后讨论）。然而，到 1800 年为止，总的情况看来并不比西欧大多数地区更坏。²³⁶

所以尽管人口稠密，1800 年中国人口对土地的压力可能并不比欧洲（或日本）更严重。至少在树木和土壤方面，中国的衰减率可能比在 18 世纪的西欧所见到的要慢。

在其他领域欧洲可能存在一个更大的生态缓冲器。举例来说，东亚更多的采用复种制，使那一区域在 19 世纪前半叶北半球经历比较寒冷的气温时（即是说出现了预料之外的阳光能源不足）更容易受打击。^② 欧洲的危险较小，它仍然有大量水源充足的草原和牧场可以转化为耕地。1700 到 1850 年间，欧洲除俄国以外地区新增加农田中几乎有 2/3 来自这些草地，人口史和制度史都显示出这种转化大多发生在 1800 年以后。但在中国（或者更准确地说，中国的中亚部分），大部分残存的草原是半干旱的，几乎所有新增加的农田都不得不自来自于清除森林或围垦水下的土地。^③ 所以，比较丰富的水源（事实上是一种原始的恩惠）可能使欧洲在对付其土地压力时有更大的余地。

土地与水的问题也在其他方面相关。尽管在中国，仔细收集小树枝和农作物残余等，在解决燃料短缺方面与开垦较少土地并留下更多树木起着同样的作用，但它在其他方面就不一样了。森林采伐最终导致土壤侵蚀和洪水的威胁；前者，像已经提到的那样，在 18 世纪的中国可能并不比欧洲更严重，但后者则可能更严重。森林采伐还导致了气候干燥（因为失去森林的区域降雨较少，暴露在阳光下的地面和低矮植物的蒸发率也更高）。特别是华北，有一个高度季节性的降雨和干旱模式，这个模式不像北欧，倒更像是某种地中海

① 见附录 C。林地的数字比凌提出的该省全省的数字高很多（1983），但我只看到它会过高的两种可能性。一种是我严重高估了每英亩的农作物产量，但出现这种情况需要一种不可能的结论，即：在生态灾难不断，技术发展平平的 19 世纪，产量的增长甚至比迅速增长的人口提高得更快。另一种可能性是，我极大地低估了这一区域非粮食作物的耕地数量，而这一区域看来（如它在 20 世纪那样）集中种植小麦和高粱，只有相当少量的烟草和棉花。这种情况比较可能发生——我在第 3 章中提出整个华北在 18 世纪后期可能比一百年以后种了更多的棉花——但如果我的林地数字由于这一理由而发生错误，就意味着甚至有比我们所认为的更多的农作物残余可以用作燃料，1800 年前后的中国也比我所证明的更为繁荣。

② Marks 1997:224。

③ 欧洲的数字见 Richards 1990:164。

237 和热带区域,^①这个模式可能随着森林的消失而恶化。此外,由于黄土地变得越来越干燥,它不再能够通过它那不寻常的强大的毛细管机能为植物提供来自地底的额外的养分。最最重要的是,由于黄土非常轻,当森林采伐严重破坏了必需的防风设施时,它特别容易受到侵蚀。(1930年代亚美利加大平原长期遭受干旱和尘暴的地区丧失的很多土壤也是黄土。)

所以,欧洲对付其燃料短缺的方法(甚至在煤业兴盛之前)在保护其他资源种类方面可能比中国的方法更好。应该强调的是,这并不是由于欧洲人有意识地想要通过保持树木的覆盖阻止干旱。尽管在欧洲的一些热带领地正在开始这类努力(那些地方森林采伐对气候的影响更为明显),这些理论(部分从中国和印度的文献中学到)在欧洲本土直到后来才发生影响;在18世纪的欧洲进行的程度有限的树木保护,目的仅仅是为了保证有足够的木材供建筑业(特别是造船)及用作燃料。^②

到1800年,在18世纪后期华北的部分地区,缺水可能发展成为一个严重问题,尽管以我们目前的了解还不能作出明确的结论。最近的两个世纪中地下水位出现了危险的巨大下降;事实上,今天华北很多城市都面临着缺水和严重的地面下沉问题。^③但在18世纪后期,这些问题或许还并不危急。实际上,华北的农民一直认为打更深也更昂贵的灌溉用井是必要的,特别是如果他们想要种棉花的话。(从长远看,当然,这使情况更为糟糕。)^④尽管如此,1771年对北京以南一个邻近区域的调查仍然指出有117眼泉水和5个大湖,与1420年发现的情况几乎没有变化。^⑤济南(山东省会)附近和鲁西南地表水的消失似乎也主要是19世纪后期和(特别是)20世纪的现象。一部1839年的府志列出了历城县的7个湖、150眼泉、11口井、14个池塘和18个湾;它特别提到该县以前著名的72泉中有两个已经死去,列出了过去曾有记载(有时是遥远的过去)但后来消失了的另外7眼泉和两个湖。(该地区上一部地方志是1785年修撰的。)^⑥这说明地下水位有所下降,但并不急剧。然而,到1920年代,历城县的一部县志——几乎每个方面都要详细得多——只提到了

① 实例见 Hsieh(1973)地图 I-17 和 I-23, 标明华北大部分地区年平均降雨量约为 500 毫米, 其中仅七、八两个月即降雨 250 毫米, 十月到四月最多 150 毫米。与北欧的比较见 Wallen 1970:63, 114, 162—192, 227—239。

② Grove 1995:56—59, 155, 199 及各处。

③ Smil 1994:38—49; China News Digest, 1998, 5, 21。

④ 潘 1994:57—59。

⑤ 左大康和张培元 1990:476。然而这个区域是个特例,因为它有很大部分被圈在一个皇家禁区中。

⑥ 《济南府志》1839:卷6。具体提到已经消失的水体的页数为 6:24a—b, 6:32a, 6:33b, 6:35a, 6:36a—b, 6:40b 和 6:42b。

5 个湖、40 眼泉、5 个池塘和 4 条小溪；它特别谈到著名的 72 泉（1839 年还有 70 个是活泉）仍然存在的不到一半，列出了一大批其他已经消失或显著收缩的水体。^① 因而看来可能的是，18 世纪与井和地下水位下降有关的任何问题，都是一种早期的比较轻微的信号，代表着将在 1850 年以后的某个时期加速扩大的问题。

尽管如此，由于事后观察的有利条件，我们能够看到中国和欧洲在生态及经济问题之间的联系中存在一些重要差异。欧洲几乎没有机会在它自己境内扩大其衣物纤维和木材的供给，在其相对来说非集约的农业和（与东亚比较）有限的劳动供给（这会妨碍扩大亚麻生产、更仔细的收集燃料和利用农作物残余）条件下，或许甚至没有机会以能够与 19 世纪的人口增长相匹配的速度扩大它的食品供给。然而，最终证明通过长距离贸易（首先是烟草、海鸟粪、糖、木船和松脂制品，后来是谷物、肉类和原木）致力于解决这些短缺是可行的。中国和日本更多的是通过劳动密集以及（如我们下面将看到的）国内贸易等手段在国内满足这些需求；它们这样做并没有使它们自己陷入一种直接的生态困境。但从长远看，至少中国这样做是以降低其水供给的安全余地为代价并（可能）更容易受寒冷气候的损害，这些问题甚至到今天也不可能通过贸易或任何能够迅速掌握的技术来解决。

中国外围区域相对薄弱的生态安全余地也使它们在政府帮助处理这些问题的效率或承诺有任何下降时容易受到伤害——而 19 世纪中叶发生了一个急剧下降。富庶的长江三角洲由于长时期以来被要求管理它自己的大部分水利设施和其他生态方面的事务，它受这一下降的影响要小得多，尽管 19 世纪的内战和鸦片进口急剧上升——后者同样是伴随着政府的新问题及新倾向而来的——对它产生了很大影响。^②

最后，一旦卷入这种更为集约的农业及燃料收集模式并受其供养的人口存在，就没有什么容易的方法可以退回去，并把这一路线产生的问题改换成欧洲道路产生的问题，后者证实是可以通过殖民地、技术和化学手段解决的。^③ 甚至在当代的条件下，把中国的人口转移到出口导向的工业中，并输入更多的初级产品（如欧洲曾经做的），也已证实难以在一个足够的规模上实

① 《续修历城县志》：卷 10—12，10，44a 提到 72 泉。

② 见 Pomeranz 1993：3—5 章。

③ 杉原薰（1997）对这一同样现象的理解比较乐观，认为尽管在随后的东亚“奇迹”形成的巨大的人口基数上采用和适应西方技术，迄今仅造就了一个其生活水平可以与西方最富裕国家竞争的国家（日本），但它给生活在非欧洲世界其余部分的无数互不相同的人带来了好处，并为 20 世纪全世界 GDP 的总增长比西方的增长率更高做出了贡献。

239 现。之所以如此,不仅是由于涉及到的人口数目非常人,而且由于与原始工业中的“剩余”劳动力不同,如果没有农业产出不足的不断恶化,这些“剩余”劳动力中的很多人事实上不可能转移到工厂中。

总之,在19世纪结合在一起抑制了西欧生态环境水平下降的各种变化中,没有一项在中国起作用。没有由公共土地、三圃制或为了爱马的贵族保留的草场之类效率极低的土地利用模式形成的闲置土地。没有从已经普遍存在了几个世纪的重量更大的铁犁的推广中获利(深耕使侵蚀放慢),也没有从造林理论和技术的引进及进一步发展中获利。贫瘠地区的农民既没有工业城市也没有美洲作为一种另外的选择,并且,如我们在第2章所见,外围地区本来有可能通过向原始工业的长江三角洲移民寻求更高收入而实现相当有限的缓解,但习俗甚至减少了这种机会。既没有可以取代木柴的煤业的兴盛,也没有来自新大陆的数目巨大的土地密集型产品。尽管中国在1800到1850年间的人口增长可能比欧洲慢(1750到1850年之间的速度大约相同),它却集中于诸如华北和长江中上游之类的区域,这些区域已经是运往长江三角洲的初级产品的重要输出地。所以如果有人把1800年前后中国生态可能已经比欧洲更为脆弱(部分是由于纤维仍然自给自足)的方面加在一起,再加上缺少制度性的闲置资源、土地修治方面缺少相对容易实现的改良、缺少任何既是人口出路又是初级产品来源的美洲的等价物,一个突然的分流就不那么让人惊异了。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在1800年前后并不比欧洲的情况恶劣很多——特别是在核心区域——甚至看起来恶化得更慢的生态环境,在中国一些区域能够怎样更为迅速地恶化,而同时欧洲的情况却趋于稳定。因此,看来可以作出反面的设想:如果欧洲没有其全部(或至少大多数)多重缓解因素——一些由新技术造成,一些通过后进因素的赶上,一些通过新大陆的横财——它也可能更少实现经济变革,而更多的经历环境阵痛。

240 在这种情况下,再度观察丹麦是有启迪作用的,丹麦是西欧一个在某些方面看起来不像英格兰却更像中国和日本的局部地区的实例。尽管它的海军和商船队在16到18世纪都有充分的扩大(以它的森林为极大代价),它也有从事海外贸易和殖民事业的英—荷模式的特许公司,但丹麦最终并没有从海外扩张中获大利,它的土地、燃料和土壤肥力问题在18世纪变得尖锐起来。然而,在通过国内措施稳定其生态环境方面它比欧洲大多数地区做的都好得多:掺撒灰土、开垦沙丘、挖渠、系统的森林管理、大量种植三叶草的轮作方式等等规模浩大的活动。这些措施都是劳动高度密集的——基亚加德极

为保守的估计，农村劳动力的人均工作时间增加了 50%^①——在很多情况下，需要大量动员强迫性的农奴劳动（这在 18 世纪的丹麦仍然很普遍）。^②

尽管这些成就把农业繁荣放到了一个生态更为健全的新基础上，1500 到 1800 年间在丹麦仍然看不到城市人口比重增长，只见到原始工业的有限发展；^③某些燃料密集产品，包括玻璃，实际上完全是进口的，尽管存在着运输问题。^④虽然丹麦有适量的资本、良好的运输条件、能够分享欧洲的科学成就、并且附近就有许多有同类文化的工业化榜样，这些模式仍然一直持续到 19 世纪。此外，尽管农田耕作、节约燃料和修治土地所使用的这些劳动高度密集的手段造成了劳动力自然生产率的长期实质性下降，劳动力仍然压倒性地集中于农业；基亚加德估计，1500 到 1800 年间农业产量最多增加了 100%（一个为了支付燃料之类进口商品而必须供出售的增长比重），而同时劳动投入的增长超过了 200%。^⑤（当丹麦的劳动回报在 19 世纪后期确实开始上升时，它主要不是由于自然生产率的改进，而是由于其邻国的工业日益发展，提高了丹麦人能够从他们的农产品中获得的价值。）

因而，通过密集使用农村劳动而实现生态上近乎自给自足的道路，一旦被采用就难以放弃，至少在 20 世纪化学和机器使种植业能够进行更为彻底的改革之前无法放弃。在这一意义上，丹麦的道路与 18 世纪和 19 世纪初东亚很多地区所走的道路的相似之处多于与英格兰甚至佛兰德的相似之处。（它也是安布罗索利认为在一场如果海鸟粪和其他非农业生产的肥料没能得到应用，有可能成为生态灾难的大赌博中，英格兰正在逐渐脱离的“农民”的道路。）即使对土地修治投入了这样数量庞大的劳动，结果也只是接近于生态平衡；1740 年以后，特别是 1820 年以后，煤的输入稳定增长。^⑥ 241

但是只是在事后才能看到欧洲的问题似乎比中国的问题更容易解决，也只有在技术变革、制度进步和新大陆的资源共同作用下才可以解决。在 18 世纪后期，东亚不可能被认定比欧洲“人口过剩”，因为它的更大量的人口过着与欧洲人同样的生活，在某些方面对他们的生态环境的损害则比欧洲人口

① Kjaergaard 1994:151。事实上，由于他认为工作周的长度可能增加了 50%，每年又有了更多的工作周，可能的增长是高于 50% 的。另见 55—56 页对掺撒灰土的讨论，那里他计算每 tonde (0.55 公顷) 土地可能要用 110 个劳动日，但后来进一步的计算却是按照每 tonde 50 个劳动日。

② Kjaergaard 1994:37—38。

③ 同上，151—154。

④ 同上，123。

⑤ 同上，158。

⑥ 同上，127—128。

造成的损害少。

甚至中国人口在 1800 到 1930 年代的进一步增长——至少增长了 1.5 亿甚至 2.25 亿——也并没有伴随营养水平的任何明显下降。甚至就在 20 世纪初，在社会贫困特别严重，马尔萨斯理论似乎特别适用的时候，青壮年人口的平均体重——这是一个通常用来代表一般营养状况的指标（尽管有争议）——可能也有轻微的爬升。^① 非必需品的平均消费或许真的下降了，但其中很大程度上，如我们在第 3 章看到的，是由于人口增长集中于比较不发达地区，使江南和其他一些地区生活相对奢侈的人口在全国平均消费中占的比重逐渐下降而产生的一种影响。几乎没有迹象说明除了 19 世纪中叶的天灾人祸阶段之外，任何具体地区的生活水平有所下降，只有华北和西北可能例外。因而，如果我们想据此说明一种对现存期望值的凶兆的话，并没有什么迹象能显示 1800 年存在“人口过剩”或迫在眉睫的生态危机（更不必说 1750 年）。我们最多能够证明存在着一种限制生活水平进一步迅速改善的生态“瓶颈”，以及一些对华北和西北未来比较严重的问题的暗示。

因而，总的说来，欧亚大陆的两端都遇到了严重的麻烦。它们所遇麻烦的任何程度上的差异（仅以国内资源为依据）或许最终都能证明是相当小的。欧洲的大部分优势是由阻止土地密集利用的制度性障碍留下的闲置资源构成，而不是优越的经济安排造成的逐渐积累。只要我们把自已限于这些区域的内部资源方面，比任何差异看起来都更为重要的是，人口增长和原始工业化多么迅速的关闭了可能会使任何地方的经济生活和人均资源利用出现更为彻底的变革的生态窗口。要使一场工业革命发生并持续下去，或者即使是为了原始工业的增长能持续得更长久，就必须在某些地方找到燃料、纤维或许还有食物的巨大的横财。

242 但是为了理解这些相当突然的横财的充分意义，我们必须首先观察最后一个具有一般相似性的领域。我在上面说明了由于极为有效的（并且通常是劳动密集的）资源利用方式，中国和日本的核心区域在寻找缓解土地密集型资源短缺的地方性方法时做得更好；但这些方法远非完善（特别是对木材），它们要依赖其他非地方性资源的输入（例如用东北的豆饼挽救棉田土壤）。总之，欧洲和亚洲的核心区域都需要通过与人口较为稀少的区域进行远距离贸易获得土地密集型资源。在这种远距离贸易是与旧大陆其他区域进行的双方自愿的贸易的范围内，欧亚大陆两端的核心区域面对着同等的机会和限制；但是可以举出一个很好的实例说明中国的核心区域比它们的西欧对应区

^① 李和王，1999：6，10。

域在利用这类贸易方面更为成功。

与旧大陆外围区域的资源贸易：准马尔萨斯问题之斯密型解决方式的共同模式和限制

自由劳动外围区域的进口替代

中国、日本和欧洲的核心区都从人口比较稀少的地带输入土地密集产品（特别是各种能量）。对西欧来说，这首先意味着波罗的海和东欧的谷物、木材及牛的贸易，然后是新大陆的富余产品。岭南有一些从东南亚甚至印度的进口，但江南主要依靠长江上游及其支流的稻米和木材，约从1680年起也开始依靠东北的木材和大豆。在日本，16世纪和17世纪初期的大规模对外贸易在1640年以后受到了政府的严厉限制，到1700年除了一些白银和丝绸交易外几乎没剩下什么。^①然而，核心区（汉利和Yamamura称之为“区域Ⅰ”）和这个国家的其余部分（汉利和Yamamura称之为“区域Ⅱ”）之间发展起一种国内交换模式。区域Ⅰ似乎在1720年达到了它能够供养的最大人口，它输出铁钉、瓷砖、工具、皮鞋，而最重要的是纺织品。区域Ⅱ输入制造品，输出稻米、木材、马匹和其他土地密集产品。远离中心的区域，特别是最靠北的地区，也是鱼的重要产地，鱼从18世纪中叶以来作为核心区的食品和肥料都变得日益重要，捕鱼也要航行得越来越远。^②

输入的土地密集产品必须得到支付，我们研究的所有核心区都尽力通过出售制造品，特别是纺织品来这样做。但这种交换模式至少面对着两个可能的限制。 243

一个是，原料输出地区常常开始一个进口替代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它们开始自己生产以前进口的制造品。随着该地区主要输出品的生产报酬开始缩小——例如，当输出更多木材逐渐需要把原木拖曳越来越远的路程才能到达河岸时——人们转向了其他工作。在20世纪，很多第三世界国家政府把进口替代作为一个有意识的工业化策略，通常长期的成效相当小。^③因此，经济学家们常常把进口替代看作一种强行违反市场“自然”趋势，用关税、津贴

① 杉原薰 1996:38。

② Hanley and Yamamura 1977:19—28,132--136,163 171;Howell 1992:271—275。

③ 当然，有很多较为开放的经济进步也很小。

之类手段人为改善新兴工业竞争地位的努力。但两百多年以前，核心和外围区域之间的技术差距通常相当小，而且无论什么样的差距都没有受到国际承认的专利权的保护；需要为固定资产投资大笔初始资本的生产过程非常少；相当高的运输费用（特别是体积与价值之比较高的日用品）提供了一定程度的“天然”保护。有几种生产过程（例如养蚕和织绸）如此复杂，以至很难与已经形成的产区竞争，^①但其他很多生产过程是简单的。因而，在1800年以前的世界中，进口替代并不是一个“强制性”过程：它在某些外围区域看上去出现得相当自然，在那些地方，人们可以自由地转向新产品的生产，可以自由决定哪些产品自己生产，哪些产品用他们其他劳动挣到的现金去购买（即参与到德夫里斯的“勤劳革命”中去）。只有在缺少某种特别的原材料时，在需要特别复杂的技术的领域，或在政府或贵族的垄断权进行干预的情况下，这一过程才受到阻碍。

实际上，进口替代最终传播到了长江下游和岭南与之进行贸易的中国大多数区域。原始工业的发展打断了长江中游的稻米剩余（既由于人口增长，也由于一些土地为了向当地的纺工和织工提供原料而改为种植棉花），而这些剩余以前是运往长江下游的，它也使这一区域较少依赖江南的棉布。^② 华北于17世纪开始生产更多的它自己需要的棉纺织品，并且，随着这一过程持续到18世纪，它输送到江南的原棉减少了。^③

244 华北作为一个原棉输出地的衰退可能比长江中游和上游作为稻米及木材产区的衰退更为严重，因为它似乎更缺少对其人口增长和最终更为严重的生态问题的固有的制动机能。像长江中上游一样，1750到1850年间华北的人口增长超过了帝国的平均水平。但在长江中游，人口增长看来一直在自我调节，就像长江下游的情况一样。在19世纪中叶的内战之前最后几十年中，随着土地和水的短缺加重，长江中游的人口增长相当缓慢；然后从那些战争中恢复大概花了50年的时间。^④ 尽管这一地区土地和水的压力严重，但人口增长放缓看来出现得足够早，避免了巨大的生态危机或经济危机。洞庭湖（中国第二大湖）水面面积对于长江中游人口驱动的生态压力是一个有用的指标，因为从该湖开垦了很多耕地，极大地增加了洪水的威胁。1825到1850年间，洞庭湖水面面积几乎减少了800平方英里（该湖以前面积的13%），但

① Borah 1943, 85—101; Schurz 1939, 44—45, 364—366.

② 李伯重 1998, 108.

③ 卢汉超 1992, 482—483.

④ Perdue 1987, 219—233; Skinner 1987, 67—77.

自那时起在 19 世纪的其余年份大致是稳定的。^①

另一方面，在华北，人口继续增长极少停顿，直到 1950 年代人口甚至开始更迅速地增长；尽管存在一系列带来永久性影响的真正的生态灾祸，这种情况仍然发生了。1850 年之前及之后，华北人口增长最迅速的地方看来都是河南，一般说来这是这个大区最贫穷的省份。^② 不清楚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但最近对中国其他地方生育控制的研究可能会提供一些线索。

李中清和王丰研究中国人口体系的开创性的新著强调了扩大的亲缘集团的角色，它们通过宗族组织或通过合住一起的家庭的家长起作用。这种集团对于实行婚姻内生育的限制和安排收养都是必不可少的，收养是对生育限制的补充，在一对已婚夫妇没能生育一个生物学意义上的男性继承人的情况下，提供适度的养老保险和祭祀典礼的连续性。^③ 更一般地说，已经证实，已婚兄弟仍然保持紧密联系的社会安排提供了一种保险方式，这种方式减少了通过让更多的后代上门探望以避免风险的必要性。^④ 宗族组织在华南特别强大（尽管构成宗族组织的家庭平均看并不比华北的更复杂^⑤）；合住的家庭在辽宁特别常见，这是李和王农村数据的另一个主要来源地。

245

但是华北和西北的宗族普遍薄弱，合住家庭看起来（根据已知的零散资料）远不如辽宁普遍，实质独立的核心家庭则比较常见。在北方，当兄弟们分割家庭财产时（无论双亲中的一位是否仍然在世），与南方同样的场合相比，他们给一个高于家庭的单位留下任何财产或创立任何基金的可能性要小得多。^⑥ 甚至原来摆放祖先牌位和供桌的房间也可能改为住房并/或分割，那以后每个兄弟都有他自己单独的供桌，即使这些兄弟的房屋仍然面向一个共有的院落。^⑦ 在这种情况下，很难设想扩大家庭或是在实际权力或是在观念上对核心家庭内部作出的生育决策的影响，能够像它在江南或辽宁所表现出来的那样有力。因而，可能有一种不同的亲属关系体系使在中国其他一些地区对人口抑制有重要作用的家庭机制在华北和西北相对软弱，从而使这些地区更接近马尔萨斯、哈伊纳尔和其他人错误地归之于整个中国的人口动态。

① Perdue 1987:204.

② 梁方仲 1981:396—397、400—404（1850 年前）；林富瑞和陈代光（1981:39）1774 及以后的年份，略去 1842 年的数字，因为这一年的数字对他们列出的所有省份来说都高得可疑，还有 1711 年河南的数字，低到了不可能的程度（但会使该省后来的增长率更为引人注目）。

③ 见李和王 1999，特别是第 7 章和第 8 章；关于具体的收养制度，另见 Waltner（1990）和 Dennerline（1986）。

④ Cain 1982:173.

⑤ 实例见 Buck 1964:367.

⑥ Wakefield 1992:224—229、254.

⑦ Wakefield 1994:201、227—228.

不管华北人口激增出于什么原因，到 1840 年代它的人口密度可能比长江中游高出了 50%——尽管华北的水更少，生长季节更短，还有其他不利条件。^① 到 1953 年，华北的人口密度比长江中游高了 70%。在这种情况下，华北——与长江中上游不同——的人均非粮食作物产量几乎可以肯定在 1750 到 1900 年之间的某个时候发生了下降；它甚至可能经历了生产水平的绝对下降。如果原棉产量下降，而同时又有更多的原棉在本地纺织，向江南输出的下降幅度就可能非常大。（对这些设想更详细的说明见附录 F。）

无论外围地区的这些发展过程是像长江中上游看上去那样，达到了一个相对良性的平衡，还是像华北和西北那样没能如此，它们都限制了比较发达地区保持增长和制造业进一步专业化的能力。然而，在我们回到这些因果关系之前，值得对这一过程的原因作进一步的观察。

到现在为止，我把这一过程描绘为一个“自然”的过程，当外围区域有或 246 多或少的自由劳动并且没有特别的限制（例如殖民地的垄断制度）时它是可以预期的。但实际情况更为复杂。我们仍然远远没有弄清什么因素引起了这些外围区域的人口增长，尽管对其产品的外部需求和日益增加的谋生机会肯定起了某种作用。

人口增长和原料输出下降之间的联系也不是一个简单的联系。在仅靠增加劳动投入不可能大幅度提高产量的旱作区域华北，对于为什么这一区域新增加的劳动力中有很多进入了手工业以及原棉输出量下降，人口增长和环境制约可能是一个相当好的解释。^② 人口增长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单独解释木材产区输出量的下降；粮食和森林争地，如何提高木材单位面积产量的知识仍然停留在初级水平。^③

但是在增加劳动能够轻而易举提高水稻产量的长江中游，当劳动力增加时，为什么新的劳动力不是集中于种植比实际种植的更多的水稻，并用稻米交换棉布，却是自己生产棉布，原因就不是同样明确了。实际上，珀金斯的零散资料显示出，长江中游省份湖南一些输出导向程度极高的县，每英亩水稻的产量的确随着该省人口增长而急剧提高：18 世纪它们约为长江下游水平的 60%，而在 19 世纪赶上了后者。^④ 耕地面积也明显增长——可以推断主要是在发展程度较低的地区。^⑤ 由于湖南人口在 1775 到 1850 年间增长了约 40%

① Skinner 1977a: 213, 226, 据 Skinner 1987 调整。

② 进一步的讨论见附录 F。

③ Menzies 1996: 619—622, 644—665, 659—663。

④ Perkins 1969: 21, 315, 318—319, 321。

⑤ 同上, 234。

(它在 1750 到 1775 年间以每年为基准可能增长得更快,但数据非常贫乏)^①, 该省或许能够维持其人均粮食产出,并增加可以输出的剩余产品的绝对量。既然这些输出并没有增长而是下降,我们就应该得出下面的结论:其他很多本来能够实现产量增长的地方并没有出现与这些重要输出县同样的增长,至少部分是由于人们为劳动力选择了不同的利用方式。很多清代官员也这样认为:一些人把他们鼓励种植双季稻活动的失败归咎于农民不愿意投入必需的劳动,即使当地的自然条件适合。^② 那些把更多劳动投入非粮食生产的人——无论是低地从事织布的女性,还是山区种茶的男人和女人——仍然要消费稻米,从而减少了可供输出的剩余。劳动力的这些重新配置并不是必然发生的。

尽管从事生产任何具体的输出品的劳动力的实际报酬在减少,初级产品的价格却无疑可能上升到足以使继续专业化比多样化获得更高的报酬。尽管前现代的运输成本可能鼓励了地区性自给,河上和沿海的运输费用通常并不太高。由于中国的外围区域确实继续向江南和岭南运输大量的(尽管在减少)高体积价格比的货物,人们会认为需要回程货物的货主为江南的输出品提供了有吸引力的运输价格(尽管增加重量在逆流而上回程时比它顺流而下前往江南时是一个更大的问题)。所以我们对长江中游的原始工业化需要进一步的解释,或是通过阻碍输出进一步增长的力量,或是通过鼓励区域内部多样化的力量。²⁴⁷

一个合理的可能性——尽管是一个我们几乎没有资料能证明的可能性——涉及到地方运输成本。在一个大区内,首先住满人的是土地最肥沃和交通最方便的地区,距成为运输大动脉的河流最近的地区;后来的发展地点与这些运输动脉的距离可能是不均衡的,从那些地点运输体积庞大的货物费用昂贵。由于中国人均大牲畜比欧洲或印度少,运输成本有可能会随着人们从河岸向远处迁移而特别急剧地上升——尽管中国在总的运输能力方面没有居于劣势(如第 1 章说明的),但是这最多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外围地区的输出没有与人口、耕地面积和总产出保持同步增长。它没有解释为什么已经靠近良好运输条件定居的人口在 19 世纪会减少输出,除非我们能够证明他们开始用他们的初级产品与后来的发展中区域生产的商品进行交换。

对于在主要河谷之外定居的人口——在 18 世纪后期和 19 世纪初期的中国,开垦和耕种山地的人数迅速增加——中的某些群体,这种情况可能是说

① Perdue 1987:56—57。

② 同上,129、132。

得通的。山地定居长时期以来就与中国引进国外的粮食作物有关(马铃薯、甘薯等等),这些作物可以在高山和劣质土壤中生长。^① 这种情况把山地的开垦放到了一个马尔萨斯框架中,人口增长迫使人们依靠贫瘠的土地,新作物使他们得以幸运地在那里生存,或者新的粮田使人口可以继续增长。这类依靠劣质食物勉强度日的贫困的山地居民与河谷中比较幸运的农民的剩余产品输出毫无关系。

但是山地的耕作还有与我们的研究相关的另一面。山地和以前的荒地上种植的作物中有许多种——茶、花生和各种油料作物——有更大的需求,不仅因为人口的增长,还由于繁荣的扩大。事实上,在最近一篇论文中,方行就是根据有更多的非谷物类作物被消费,建立起他的 17 和 18 世纪长江下游生活水平提高的论点。^② 尽管我们还没有中国其他地方饮食状况的同类研究,但看来长江中上游地区低地的水稻种植者——他们的贸易条件和土地生产力都在改善中^③——很可能把一部分增加的收入花在了各种各样的调味品上。如果他们确实如此,他们就会成为他们的高地邻居的消费者,并且可能至少把一部分稻米运送给后者作为交换。文献合理强调了中国非谷物现金作物的生产者也如何经常地种植粮食——所以,比方说,茶和甘薯可以先后增长——这使他们比加勒比海地区完全专业化的“成瘾性食品”的生产者更少依赖外购食品。^④ 18 世纪后期和 19 世纪粗粮的推广甚至把湖南一些以前的缺粮县变成了净输出县。^⑤ 但看来仍可能有一些以前顺流而下的稻米现在改为向上运往山区。

到此为止,我把讨论限制在经济因素上,增加的细节明确针对市场力量在中国发挥其自身作用的方式,没有引用其他任何引起结果的力量。还有更多的经济因素可以添加进来,对江南重要输入品短缺的日益扩大作出更多的解释。华北和长江流域之间的水运在 1800 年之后恶化,进一步抑制了原棉的货运量;鸦片在长江上游、西北和西南作为一种取代棉花的现金作物崛起也不可能有什么帮助,尽管这发生在 1850 年以后。^⑥ 但是其他与文化 and 政府政策相关的影响同样需要加以考虑。

这类可能因素中的一种是政府和慈善团体的仓储制度,至少在 18 世纪

① 经典的论述见 Ho 1955:192,196—197。

② 方行 1996:97。

③ Perdue 1987:113—135;Perkins 1969:21。

④ Mazumdar 1984:269—270;Gardella 1994:32。

⑤ Perdue 1987:134。

⑥ 南北大运河的衰落见星斌夫 1971:223—227;Pomeranz 1993:154—164。鸦片在一些地区取代棉花,见赵冈 1977:23。

这些制度在平抑季节性价格波动及欠收年份的价格上涨两方面都相当有效。如魏丕信(Pierre-Etienne Will)与王国斌指出的,这减轻了从事非粮食生产和从市场购买食物要冒的风险。^① 仓储制度在18世纪达到全盛期;那以后它落入了低谷。但是许多地方一级的仓储甚至在以后继续发挥作用,尽管政府不再能为解决偶然性危机而进行地区间的大规模粮食调运。因此,在谷物剩余地区19世纪的仓储制度可能继续减缓一些选择多样化生产的农民的风险,而对地区间专业化所冒的风险却不再能起同样的减缓作用。

一个更深层次的因素可能是中国人的性别规范。它对于室内工作(首先是纺和织)的妇女比对田间工作的妇女更为“合适”。如果这种偏好(以及对于缠足妻子的偏好)不存在,腹地的家庭就可能追求更大的田块,甚或进行更为集约的耕作——因而会有更大的剩余可供出售——并生产更少的布匹。²⁴⁹

我们已经讨论了(在第2章)在评估这些规范对经济选择的限制程度时出现的一些问题,我们也看到即使是在江南,妇女直到1850年以后也没有完全离开田地。我们还看到,至少按照18世纪中期的价格,不需要引用文化偏好就可以解释这一时期的农村妇女为什么从事织布而不是耕作。(比较价格在长江中游甚至应该更有利于织布工作,因为那里的稻米更便宜。)但最节省用词的解释并不总是对实际动机最好的描述,理想化的“男耕女织”的家庭分工——一种在明代特别是在清代由于政府的鼓励变得比较常见的分工——或许确实鼓励了内地的进口替代生产。^②

由于“男耕女织”的分工是一种时不时会受到实践践踏的理想,人们甚至可能把它看作一种被渴望的生活方式(就像在某些时期,当男性收入许可时,一些西欧国家把妇女限制在家务中一样),当长江中游在18世纪后期变得更为繁荣时,更多的家庭就会采取这种方式。由于文化偏好并不是自动地扮演自己——湖南的男性必须学会怎样种棉花,湖南的女性必须学会怎样纺与织——清政府通过传播知识的方法鼓励耕织家庭的努力应该造成了一些差异。

此外,在19世纪中叶——当内陆的边疆地区住满居民时(除了东北)——这些性别规范或许也对阻止移民从移居地迁回江南起了作用。只要内地仍然可以得到土地,大多数人的技术(和自我形象)仍固着于农业,大概无论如何也不会有很多移民回到沿海地区。但是尽管19世纪有很多麻烦,江南的人均收入仍然是中国最高的,随着别处的土地日益稀缺,人们可能设

① Will and Wong 1991:496—497。

② Mann 1992:75—96;李伯重 1996:99—107。

想没有足够土地的人会移居到长江三角洲寻求手工业和服务业工作——因而使长江三角洲重新开始人口增长、工资下降、使它输出的棉布更便宜，如此等等。即是说，可以设想，如果妇女能够单独（向生产纺织品的职业）移居而不影响名声，如果织布在观念上不被看作是在一个男性有可靠的农田使用权（拥有或长期租佃）的家庭中女性成员的工作，这样一种移民就会出现。但是既然这些偏见确实存在——江南的租佃甚至经常需要一大笔押金——农村
250 贫困家庭向核心地区的移居就不大可能发生。1900年以后城市工厂工业（其中一些建有供单身女工的宿舍）和欧洲意义上的无产阶级的兴起，才产生了这样一种运动；然后到1950年代中期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止向城市移居时，它再度中断。

清政府鼓励不发达地区的人口增长和手工业发展，不仅是作为一种文化观的组成部分，而且是作为一种使能够可靠纳税的富裕民户数量最大化的手段。清政府也不是简单地任由市场动力引起这些发展。我们已经看到政府怎样鼓励向人口稀疏区域的移民：提供信息和基础设施投资，有时还提供贷款。田赋政策——一方面，法律对江南和另外几个富足地区规定的沉重赋额不对其他地区征收；另一方面，实际政策允许很多新定居或重新定居的区域继续停留在纳税名单之外——肯定有利于“外围地区”的发展，同时或许限制了帝国最重要的核心区。

政府也作了相当多的尽管是分散的努力，以促进农业和手工业中优秀经验的推广：例如引进新的作物品种并雇佣江南的织工到其他地区指导那里的人工作。^①（官员从来不在自己家乡境内任职并经常轮换的制度有利于这些努力。）在华北和西北，清政府为生态边缘区域的生存保证作出了巨大的努力。这类项目中最大的一个，黄河的管理（也为了其他目的），在19世纪初大概花费了政府总支出的10%以上：高于一些政府花在除战争、还债和官员薪金以外的全部支出比重。^②

我们不可能准确度量清代政策的效果；它们或许没有根本改变发展态势。但它们肯定起了某种作用：这种作用与市场一起，把一个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相结合的经济推进到整个帝国。然而，这种作用或许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持续，它何时和为什么变化是相当值得考察的。

如王国斌指出的，摆在明后期和清代官员面前的有两种向全国范围扩张

^① Mann 1992:86; 王国斌 1997.

^② 对于把这一制度作为生态环境脆弱的华北的一个补偿的冗长论述——尽管强调了这种补偿在19世纪即将结束时被取消（所以它不能解释20世纪的人口继续迅速增长），见 Pomeranz 1993.

的经济模式。一种强调区域间的贸易和专业化；另一种是增加有很大独立性的自给自足的单位。两种扩张在其早期阶段通常都需要政府作出某种努力，²⁵¹但后者需要的来自政府上层的随时关注相当少。^①（或至少它被认为可以如此：如果考虑到地区或地方自给自足产生的长期生态影响，这不可能仍然是事实。我们能够讨论其互相依赖或自给自足之程度的很多不同层次，从全国到施坚雅所说的大区再到地方市场社区，也使这幅画面变得更为复杂。）我已经证明在 1750 年以后的阶段，实际情况强烈地向“离散单位”的方向转移，也是在这一阶段（特别是 1800 年以后），政府似乎更加勉强地处理大型工程项目，当它们这样做时效率也更低。不同的流行理论的变化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认为什么可能什么不可能的观念的变化，以及不断变化的官员想法、具体政策和主要经济趋势实际上怎样互相联系，都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使之丰满。

同时，日本显示出在中央政府义务完全不同的情况下多少有些相似的发展模式。1720 年以后日本主要核心区的发展非常有限——事实上，关东和畿内的人口在 18 世纪后期和 19 世纪初期都是下降的——尽管 1780 年以后很多外围地区的人口和手工业开始起飞，^② 德川幕府并没有牺牲核心区的利益鼓励外围地区。但在大约 1760 年以后他们至少默许了一些外围藩国的领主实行某些新措施，从而使这些藩国可以把它们的经济多样化，并能够比过去更为稳定地供养增长的人口。

例如土佐，一个比较贫穷的输出木材的藩国，在 17 世纪的建筑高潮中森林受到严重毁坏，为向大阪提供木材（也为了支付土佐的领主为将军服役和在江户居住造成的非常巨大的花费）砍光了所有山峰。随后的耕种新垦土地的努力没能跟上人口的增长，从童山秃岭上突然涌下的大洪水又接踵而至。土佐的 18 世纪比 17 世纪更为艰难，民众可以得到的食物似乎更为稀少，1750 年代成为饥荒的年份。^③

但 18 世纪后期土佐的人口增长开始恢复，困难也减轻了一点；这主要是由于废除了领主的垄断，从而引起了诸如高级纸张之类输出品的小规模生产的兴盛。而这种垄断能够松弛，又是由于土佐的领主大幅度削减了他们在江户定居和为将军服役的支出——这是在这个特定的外围区域能够减轻负担，²⁵²

① 王国斌 1997:139;另见 224—229。

② 核心区的人口停滞见斋藤修(1985:211)与岩桥胜(1981:440)的比较。外围地区人口持续增长——尽管 18 世纪中叶发生严重的灾荒——见 L. Roberts 1991:87—91。

③ L. Roberts 1991:88—100,115—21。

使它的经济解除不良的财政压力之前,中央政府不得不同意的变革。^①

当外围地区废除有害的垄断和劳役并因而供养更多的人口在财政上成为可能时,人口增长本身也起到了加强自由化趋势的作用。边远藩国的人口增长伴随着双季稻的更多种植,这种高度劳动密集并难于监督的耕作体系的扩大应用,看来鼓励了向更小的农场和更高的佃农自治发展的趋势。畿内地区两个世纪以前就出现了土地制度的同样变革,当时它正在经历人口增长和双季稻种植的扩大。^②

所以尽管德川幕府像清政府一样,并没有推动人口和原始工业化向更广阔的前景发展,它们最终确实废除了鼓励人口和手工业向核心区集中的政策。而在同时欧洲至少有一些政府正在做相反的事,为了维持专业化的核心地区的特权地位而与市场作斗争(并不总是成功的)。无论原因何在,日本的原始工业像中国的一样,与原始工业时期的英格兰相比,地区性分工表现得模糊得多,家庭分工则更为明显。^③

旧大陆腹地的发展没有在向它们购买初级产品的较先进地区引起直接的短缺。甚至人口密集的长江下游也不断发现它可以用它的工业输出品交换原料的市场——部分通过到更远的地方去,部分通过专业生产某些其他地区还不能与之竞争的品种,如高级织物之类。但是这些方法是有限的。

到1800年,中国的木材商已经渗透到了帝国的每一个角落,一些原木要漂流一千多英里才能到达其最终目的地。在低工资的陕西省,一些木料只是到达河边就要拖曳65英里——比欧洲人在陆地上拖曳的路途更长,供应马德里木材的非常罕见的情形除外。^④ 但这类工作需要的自由劳动的数量最终使这种木材变得甚至对江南来说也过于昂贵。正如18世纪的一条资料所描述,“木值百金,采之亦费百金;值千金,采之亦费千金”。^⑤ 此外,高运输成本可能产生自相矛盾的作用,增加了森林的损耗,输入地区却没有获得利益:这是一个与从庭院附近的树木收集燃料所得效果实际相反的模式。例如,在1920年代,从中国西北部森林运输的高成本意味着只有树木最有价值的部位才值得运输:结果并不是延缓了采运作业,而是增加了伐木工留在地面上的

① 同上,271—299。

② Smith(1959),转引自Palat 1995:62。

③ 斋藤修 1983:40—43。

④ 吴和许 1985:435—446;李伯重 1994b:93;Blaudel 1981:355—367。关于马德里,见Ringrose 1970:27。马德里能够买得起特别昂贵的材料(并且因此发展到它的最近的腹地无法供应的规模)是由于它作为新大陆白银的征税者和中途站的地位,而不是来自它生产的用来交换初级产品的任何商品,甚至不是来自任何它从自己周围最密途地区中应得的租金和赋税。

⑤ 引自李伯重 1994b:93。

树桩的体积和“废木料”的数量，减缓了森林的更新。^① 18世纪后期，采伐业可能随着向更遥远的区域移动而逐渐变得同样的浪费。所以，尽管中国远距离产品市场的功效引人注目，它们却不能无限期地为发展中的沿海区域提供原材料。

日本的区域Ⅰ和区域Ⅱ之间的贸易在18世纪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尽管或许不是同样迅速。区域Ⅱ的进口替代生产逐渐高涨，这些藩国的农民正在越来越卷入现金经济中，尽管这两个过程仍然或多或少由于大名的垄断作用而减速。^② 因而，到19世纪，区域Ⅰ仍然未受到挑战的输出品中，有很多品种属于卖给区域Ⅱ的相当小的上层社会的奢侈品。同时，腹地的人口增长（在区域Ⅰ的人口增长已经停止之后还持续了很长时间）正在减少其土地密集产品的剩余。例如木材输出在18世纪停滞。^③ 总的来说，正如托特曼（Conrad Totman）所指出，“德川社会在扩大其生态基础方面遇到了空前的困难。”^④ 尽管核心区的人口增长率为零，木材和稻米贸易实现了自由化，^⑤ 地理环境使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地区能够得到某种水运的便利，这种情况还是发生了。

较为不自由和弹性较低的外围地区

西欧与东欧之间的贸易面对着一系列不同的限制。与中国内地不同，东欧遍布着以程度不等的强迫劳动经营的庄园。尽管普鲁士的农民有时能够提起诉讼保护他们的权利，但容克贵族控制了法庭，诉讼很难取得成功，^⑥ 梅克伦堡、波兰和俄国的农民甚至更少求助于司法。尽管这种情况仍然留下了失控的可能性，但那些这样做的人要冒着失去他们拥有的无论多么微小的权利，^⑦ 以及受到严重报复的风险。俄国的逃亡农奴经常会回来。尽管庄园主们无法制止逃亡，他们的反应看起来远比印度和东南亚的劳动力契约“所有者”们更为协调一致，具有巨大的威慑效果。波兰农民的逃亡一度相当成功，

254

① Menzies 1996:634.

② Hanley and Yamamura 1977:19—23,131—146。大名对区域Ⅱ的控制效率更高，似乎部分与不同的行政官员有关——区域Ⅰ主要是由德川幕府的人统治，他们对自己领地的控制常常比很多“在外的”大名的统治更松散——部分是由于区域Ⅱ的城镇和贸易发展程度更低，非农业就业的机会也更少。

③ Totman 1995:104.

④ 同上,102.

⑤ 同上,105—107.

⑥ Hagen 1985:114; Hagen 1986a:71—72.

⑦ Hagen 1985:114; Hagen 1996:308; Hagen 即将出版:38—39.

但在18世纪变得越来越困难。^① 尽管最近的研究阐明，甚至东欧的贵族也是通过“协商”而不是直接的强迫，然而产生的活力仍然与比较自由的区域完全不同。这些差异意味着人口增长和进口替代比中国内地更慢。但如我们即将看到的，它们通过其他方式限制了输出。

严重依赖强迫劳动的领主在遇到输出品生产报酬下降时比自耕农或工资劳动的雇主要迟钝得多。至少在理论上，一个农奴的劳动时间增加一小时不需要他的领主付出成本，所以即使是难以运输的木材也不必以天价出售。使用依附劳动的耕作可以在对于自由劳动环境来说是不正常的情况下发展（即使是低工资的自由劳动）：例如，产量增加有时是在价格下降时为了维持领主收入作出的反应。^②

事实上，劳动并不是简单地从一个庞大的农民阶级中压榨出来。如威廉·哈根(William Hagen)指出的，至少在普鲁士，在16世纪谷物生产兴盛时期，受压榨的强迫劳动的巨大增加，部分被农民必须缴纳的实物及现金的减少抵消了；因而这种劳动对庄园主来说的确有一个明显的价格。此外，农民接受这些增加(勉勉强强的)，部分是由于他们所受的束缚一直容许农民有足够的时间(并使用他的马)耕种他的小块土地；这暗示出被这些增加的劳动负担压垮了的农民阶级的早期形象可能是相当夸张的。实际上，农民看来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上增加了相对劳动密集的园艺作物的种植。无疑，在部分意义上这是当人口增长和领主利用各种各样的优势为自己吞噬更多的农田时，份地减少引起的一个必要的措施，但它也可能反映了缴纳的实物(谷物)及现金减少，这意味着农民能够用更少的谷物收成度日。^③ 当农民为领主工作更多的时间种植输出作物，在他们自己缩减了的土地上采用更为劳动密集的方法时，劳动总投入不断增加看来是可能的——或许比假定输出需求能使农民每小时挣的更多并允许他们选择更悠闲和/或更多的消费时会投入的总劳动更多。因而，在这一区域，“协商领主”的影响很可能与我们对单方面受强迫的“农奴制”的旧模式所预期的影响没有太大的差异。在梅克伦堡、波兰的大部分、立陶宛、俄国和其他很多地方，多少近似于农奴制的旧形象可能仍然适用。

同时，东欧城镇与原始工业的发展相当软弱也延长了输出导向，减少了我们在东亚外围地区看到的那种进口替代的可能性。对中世纪晚期和现代

① Blum 1961:309—310,552—554;Hagen 1996:307;与 Reid 1988a:129—130 比较;福沢 1982b:251;Habib 1982c:248;Ludder. 1985:42—50,80—84。

② Kochanowicz 1989:100—102。

③ Hagen 1985:104,107,111;Hagen 1986b:154;Hagen 即将出版:38—39,43。

早期东欧城市的停滞与毁灭的解释多种多样。一些强调与其他商业和工业中心的竞争，一些强调连绵不断的战争的影响，一些强调落后的农业从一开始就限制了城市的规模，一些强调贵族不惜任何代价削弱资产阶级权力的有意识的努力（并拒绝农民把城市作为可能的避难所），还有一些强调谷物生产的兴盛本身为东西欧之间带来了一种新的分工。^①

无论由于什么原因，东欧的纺织品生产早在 15 世纪就开始至少相对下降，当谷物输出上升时它的绝对数量也开始下降。^② 有一些纺织品生产迅速增长的例外：18 世纪的西里西亚、波希米亚各地和奥地利阿尔卑斯山区，但这种发展通常发生在领主势力出现缝隙的地方——即，在良田稀少但几乎没有强迫劳动的山区。^③ 在东欧大平原的大部分地区，庄园有较大的势力，农村工业远远落后于西欧。^④ 在哈布斯堡帝国的匈牙利部分——那里不是波罗的海，直到更晚些时以前也不是对西欧的主要谷物输出地，但确实在“漫长的 16 世纪”开始输出牛、葡萄酒和其他土地密集产品——直到 1860 年代或 1870 年代以前一直有 80% 以上的劳动力在农业中。^⑤

此外，这一地区无论是输出的兴盛还是原始工业的发展都没有产生与较自由地区的繁荣造成的完全同样的人口影响，在后一类地区中，经济繁荣通过工资劳动经常引起早婚和多子女。对 1763 年以后谷物价格重新上升作出反应的普鲁士的领主最终使用了更多的工资劳动者，因为进一步增加强迫劳动的尝试遇到了日益增多的抵抗，效率也越来越低：在这样做时，他们让更多的人居住在他们的土地上成为独立的小屋农，使新家庭的形成更为迅速。^⑥ 但是就我们所知，这并不是一种易北河以东其他地方共有的模式——实际上，18 世纪强迫劳动普遍增加，有时达到了一周 6 天——即使在普鲁士，它也主要是在解放强迫劳动之前最后半个世纪中的事。^⑦ 此外，甚至在这种情况下，在强迫劳动解放之前向工资劳动转变也不是一个稳定的趋势。相反，随

256

① 见 Hagen 1988 和 Hagen 对学术史的综述，即将出版。

② Pach 1990:183、186—188; Kriedte, Medick and Schlumbohm(1981):178—199 引 Kisch.

③ Kriedte, Medick and Schlumbohm 1981:14、19; Good(1984:22)对奥匈帝国提出了同样的观点，把原始工业与土壤肥力低和缺少庄园农业联系在一起。

④ Gunst 1989:64、69。波希米亚确实既有大庄园，又有高度发达的原始工业，但至少两个方面它的庄园是特殊的。首先，按照东欧的标准衡量，农民有不寻常的强大权力。其次，由于一个强大的采矿业在大多数庄园形成之前就已经存在——并且引起相当大的城市人口和不寻常的货币经济——庄园的大部分剩余以本地市场为目标（并且无论如何，主要表现形式不是食用谷物，而是供酿造用的黑麦和啤酒花）而不是输出到西方。

⑤ Good 1984:23.

⑥ Hagen 1986a:73—90.

⑦ Rosener 1994:113.

着工资劳动者数量的增多，他们也变得更像是依附农民的旧有劳动力。1763年，这些短工为他们的住房、菜园和放牧权支付了 9.5 塔勒（taler 一种银币，大致相当于一个农业短工一周的现金工资）；为脱粒工作得到实物工资，为其他各种各样的工作得到现金工资；每年只有 6 天无报酬的劳动。到 1808 年，他们的现金租金削减到了 5 塔勒，但他们每人每年要付出 65 天无报酬的劳动（加上脱粒、犁地和其他重体力劳动），约为一个得到一份更为充足的土地的“全农”应尽义务的 40%。^①

原始工业发展导致婚姻更容易和人口增长更迅速的可能性在东欧也比在西欧更少。在施卢伯姆仔细研究过的一个区域中，甚至 18 世纪和 19 世纪亚麻业的巨大发展为无地者提供的机会也相当少。相反，这一行业的大部分劳动力来自于“全份地”的农民——他们已经有足够的土地供养一个家庭——和依附他们的小屋农。拥有大地产的保护人继续控制这些小屋农组成家庭的权力，他们并不希望有太多的小屋农。人口增长了，但并不是以施卢伯姆在其早期著作中与原始工业联系在一起急速发展的步伐增长。^② 维尔纳·勒泽纳（Werner Rosener）在全面观察 1800 年前后的东欧时，估计 10%—15% 的农村人口在大庄园中做家仆，他们普遍不能组成家庭。^③ 在奥匈帝国，直到 1781 年以后农民的婚姻才能够不受领主的干涉。^④

257 这种体制也使向东部的移民保持低速度，即使东部的土地上人口相当稀少。有过殖民化的方案——特别是在普鲁士，那里为了排干并开垦湿地引入了或许多达 30 万殖民地居民，但加利西亚、立陶宛和俄国的部分地区也有。为了保有这些新佃户，统治者通常不得不保证他们拥有人身自由，允许他们把他们对土地的权利传给后代，并免除各种各样习惯性的负担。^⑤ 但这些都是例外的安排，涉及到的也都是以前荒芜的土地；最好的土地并不吸引移民，因为几乎没有西欧人会接受耕种它们的条件。此外，尽管可以上溯到 12 世纪的向东欧移民的浪潮（主要是德国人）持续到了 18 世纪，它对当地状况的影响却越来越小。早期的移民既带来了新耕作技术，也带来了耕种者权利的观念，影响了他们在普鲁士、波希米亚和波兰部分地区的斯拉夫邻居，但 18 世纪向东部更远地点的移民（主要是布科维纳和俄国）几乎没有什么影响；他

① Hagen 1986a:88.

② Hagen 1997.

③ Rosener 1994:154.

④ Good 1984:34.

⑤ Rosener 1994:130—132.

们与周围的人口相比太少也太隔绝。^① 所以，正是在西欧的人口趋势会引导我们期待更多的人口（及其观念）向东欧迁移时，这个潮流却收缩了。

因而，使人口增长、原始工业化和摆脱输出者地位的任何趋势减缓的制度性力量在东欧远比在日本的外围区域强大，比中国的内地则更为强大得多。对西欧来说，用制造品交换东欧的初级产品的永久性贸易机会相应加强了。当我们想到波罗的海的木材到达英国造船厂时的价格（没有任何进一步的加工）大约是它们产地价格的 20 倍，我们对购买力、资源和机会成本跨越欧洲的差异就有了一些概念；我所掌握的江南与遥远的中国内地非常有限且不精确的木材价格资料显示，一个比较可能的比率是 10 比 1。^②

但这种贸易伙伴关系为西欧引起了不同的问题。首先，制度的刻板性限制了东欧提高产量的能力。其次，它不是一个很好的制造品市场，限制了西欧对它的初级产品的支付能力。所以，依附劳动帮助稳定了欧洲东西部交换的模式，但也把它保持在一个相当小的规模，一个越来越不能满足西欧对土地密集产品的欲望的规模。让我们首先观察阻碍产量不断增长的因素，然后观察由东欧对西欧的商品需求相对有限而引起的问题。

强迫劳动常常是非生产性的，领主和农民都不会为进行改良而大量投资。值得注意的是，当容克地主开始为他们的土地投入更大量的资本时，他们也开始使用更多的工资劳动。^③ 同样值得记住的是，东欧的领主制（像西欧很多地方比较温和的制度一样）不仅是一个领主和一些个体农户之间的关系，同时也是一个领主和一个村庄社区之间的关系。因而，它们有助于再生258生产各种各样的共同财产——林地、公共牧场和敞地——在这些方面，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进行变革是极为困难的。通过维持这种“闲置”，东欧的制度可能为将来留出了可以输出的谷物剩余；但在较短的时期内，这些制度置价格动机于不顾，使为增产谷物而动员这些土地非常困难。^④

在德国，如我们在第 2 章所见，土地公用权的终止使产量大幅度增长成为可能，但只是发生在拿破仑时代之后。在农奴解放更为缓慢的哈布斯堡领地，休耕地的减少亦是如此：从 1750 年前后占土地的 33% 到 1850 年才下降到 25%。^⑤ 用新的作物轮作制取代休耕制只在 19 世纪中叶的波兰和匈牙利

① Gunst 1989:63—64。

② Albion 1965:103 与李伯重 1994b:93 比较。尽管如此，需要强调的是，李所引用的一些价格记录是含糊的，使用诸如“几两”或“几十两”这样的说法。

③ Hagen 1986a:86—92。

④ Rosener 1994:172—184。

⑤ Good 1984:70。

开始。事实上,甚至二圃制在 19 世纪中叶之前也没有完全从这些地区消失,而在俄国、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它持续到了连接农业区和港口的铁路修通及 1829 年博斯普鲁斯海峡到俄国水路通航之后。在俄国部分地区,二圃制一直持续到 1860 年代农奴解放之后。^① 一般说来,向东欧走得越远,新技术的传播就越慢。因而,从农奴解放前的东欧输出谷物停滞在一个远远低于生态潜力的水平上,存在着供给方面的原因。如我们马上要看到的,也存在需求方面的问题。

东欧(和北欧最北端)购买的西欧制造品不多。大部分东欧农民几乎不买输入品,基本上处于现金经济之外;城镇居民很少,只靠相当少的富裕领主自身,不能产生一个巨大的市场。在普鲁士,至少“全份地”的农民看来出售了足够多的谷物以使他们能够购买相当数量的亚麻和其他制造业商品;但即使是在普鲁士,比较贫穷的“半份地”农民、小屋农和仆人的数目也远远超过了“全份地”的农民家庭。在波兰,买得起许多制造品的平民实际上相当少见。^② 在斯堪的纳维亚大部分地区,农民和森林居民是自由的,但他们的数目不足以购买很多东西;所以向他们购买的机会也同样受限制。^③ 尽管西欧人确实尽力把他们自己的和欧洲以外的奢侈品(亚洲的香料和丝绸,还有后来新大陆的糖)卖给上层社会,他们从东欧输入的商品中约 1/3 仍然不得不用白银支付。^④ 白银需求甚至在一个铸币受到限制的经济中(如在俄国),或是在货币铸造经常进行但却较小的经济中(如在挪威),也可能轻易地供给过剩。

类似的需求方面的问题伴随着西欧与东南亚的贸易,尽管两地的距离无论如何都会限制前轮船时代任何笨重产品的贸易。^⑤ (这里也有很多后来提供输出品的土地在 18 世纪尚未开发,如我们在第 4 章中看到的。)中国和日本与东南亚的贸易展示了一幅更为复杂的画面,不同的货币中介在不同的方向流动(说明成为主要刺激力量的是套汇而不是使贸易平衡),^⑥ 很多中国商品被购买是为了转卖到更远的西方去。尽管如此,每个向东南亚出售商品的人就其本身而论看来找到的都只是一个相当小的市场,以致一大船任何当时已

① Gunst 1989:76-77。

② Hagen 即将出版。

③ Blum(1961:132-134)关于俄国货币经济的限制;Jeannin(1969:94)关于斯堪的纳维亚;Kandleberger(1990:58-59)关于挪威。

④ Glamann 1977:262-263。

⑤ Barrett 1990:250-251。

⑥ Von Glahn 1996:132。

知的货物在一个具体的港口都能轻而易举地使市场过剩。^①同时，离开南亚和东南亚前往中国和日本的初级产品（越南和泰国的糖、印度尼西亚的胡椒等等）有更广阔的市场，没有遇到类似的“过剩”问题。实际上，如果这些路线两端的当局没有对参与者施加限制，这类商品中有一些或许能够卖出更大的数量。^②

再一次，印度提供了一幅输入和输出两方面都是复杂而中性的画面。在与中国的贸易中，印度主要是输出农产品——棉花、靛青和后来的鸦片——同时再输出一些它从更远的西方得到的白银。它从中国得到黄金和各种各样的奢侈纺织品（其中一些而非全部供再输出）。这里谈到的黄金肯定有货币或准货币用途（举例来说，首饰常常在需要时被融化）但更多的是作为保值而不是用作政府支付或（尤其不是）日常交易的中介；实际上，其中许多可能流通得相当缓慢，以至对它的需求可以视为主要是一种储藏而不是一种交易需求。所以，在与中国的贸易中，印度看起来几乎就像是一个更大的东南亚或东欧——这符合我们早先的观察，即有许多印度人一直基本上生活在现金经济之外，同时收入分配明显地极不均衡。

但印度 18 世纪与其他区域的贸易看起来完全不同，输出的品种更多，到此时为止最大的输出品——棉布——是一种制造品。尽管英国正在开始显示出对印度森林的兴趣，但一直主要表现为在马德拉斯和孟买造船。木材输出像 19 世纪的棉花、靛青和最终的小麦一样仍有待于未来。^③事实上，如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注意到的，18 世纪除了用新大陆的金属铸造的货币外，印度购买的欧洲制造的商品数量很少，但这与其说是反映了某种惰性经济，不如说通常反映了地方竞争或是运输困难。^④此外，从欧洲输入的铸币（和从大洋洲输入的贝壳）被普通人广泛用于普通的交易，而不只是作为富人的价值储藏。^⑤印度不同的政府也从中亚和阿拉伯输入大量欧洲制造的武器和战马；^⑥这些都不是生活消费品，但它们进一步证明了把印度说成是一种“守财奴”经济而不是“花钱者”经济的陈辞滥调是严重的夸张。因而，看来印度对它的欧洲贸易伙伴没有造成与东欧和东南亚同样的“小市

260

① Van Leur 1955:67,135—136,162,197—200。

② Cushman 1975:105—106,124,200—211;Viraphol 1977:107—121,181—209。

③ 见 Wadia(1955)关于造船;Rangarajan(1994)关于森林;McAlpin and Richards(1983)关于棉花种植面积和森林采伐;Latham and Neal(1983:271—273)关于小麦。

④ Kindleberger 1990:68—69;一份卖到印度的欧洲货物清单见 Chaudhuri 1978:475—476。

⑤ Perlin 1987:248—314。

⑥ Chaudhuri 1990:278—283。

场问题”，但交易的具体商品几乎无法满足西欧对用制造品交换土地密集产品的需求；那种交易模式要在后来才形成。

最后，与现代早期的欧洲广泛进行贸易的非洲地区展现出一幅多少与东南亚相似的画面，尽管作为初级产品的产地在某些方面甚至更没有前途。在这里，我们也发现了相对稀少的人口（尽管不是在塞内冈比亚部分）和一种依附劳动起重要作用的社会结构。（尽管像东南亚的依附劳动一样，受束缚的非洲人一般比东欧的农奴更自由。）同时，地方工业完全能够满足绝大部分的地方需求，输入品主要限于奢侈品。约翰·桑顿(John Thornton)令人信服地证明，16世纪和17世纪欧洲人卖到非洲的铁即使在重要的沿海地区也不可能超过铁用量的10%—15%，同时布匹输入也不可能高于那些地区棉布用量的2%；那里的进口商品可能主要用于供精英们夸耀的舶来品。同时，非洲也向欧洲出售数量可观的棉布。^①

此外，由于非洲（这方面与东南亚不同）也有大量黄金，除了奢侈制造品外，欧洲人能够用来交换这里的商品的东西相当少。无论如何，非洲输出的主要初级产品——胡椒、黄金和象牙——对替代欧洲的土地没有什么作用；直到很久以后，欧洲人有了足够的军事力量（和对疾病的抵抗力），可以强迫非洲人种植欧洲需要的作物，情况才发生变化。^②

261 的确，非洲有一种输出品最终确实达到了巨大的规模：奴隶。但奴隶贸易的增长并不代表欧洲人可以单方面地塑造他们与非洲的贸易，尽管从当代人的立场看这种交易显示出一种完全优势的关系。外来的奴隶贸易利用的是下述事实：相关的社会不仅允许一种对人的所有权，而且没有土地的私有权。因而，人身所有权变成了一种储备积累起来的财富的方法，^③购买奴隶的欧洲人是在使奴隶的所有者把这种储备财富转化为无生命的（因而也是更为保险的，尽管是生产率较低的）表现名望的商品；这是一种随着奴隶贸易的扩大，欧洲人必须不断搜寻才能找到足够数量的商品。^④

因而，概括说，我们应该避免把20世纪的模式反射回较早的时代，在20世纪的模式中，贸易条件通常有利于工业品的输出者而不利于原料输出者，

① Thornton 1992, 45—54.

② 同上, 112—125; Grosby 1986, 136—142.

③ Thornton 1992, 85—90.

④ 关于获取供这种贸易用的足够的印度棉布的困难（它有助于刺激英国棉布业的兴盛），见 Hobsbawm 1975, 57—58; Chaudhuri 1978, 273—275.

使“土地”几乎成为“贫穷”的同义语。^①只是在初级产品的生产本身开始需要更多的工业品投入,甚至穷人也开始购买很多非农业产品,和/或农产品的生产需要工业品的帮助时,这种模式才逐渐固定下来。因此,在这里“消费不足”是作为一种与学者们(大部分是马克思主义者,尽管不是全部)常常展示的在19世纪和20世纪发挥作用的情况完全不同的现象出现的。在大部分这类描述中,需求不足被视为一种核心区的问题,是在机械化使生产力的巨大飞跃能够远远超过工资微薄的工人的购买力时产生的;因而有人认为,对新增市场的需求刺激了19世纪后期帝国主义国家中一个新的独特的资本主义高潮。然而,这里所说的消费不足是作为某些前工业外围地区本身的社会结构和人口状况造成的问题(即为什么它们的输出比输入多)出现的,它被视为阻碍了前工业的核心地区(它们缺少的是某些产品的供给而不是消费者)获得它们所需的土地密集产品的努力。

特别是对于西欧,东欧扮演了一个生态上有能力输出大量谷物、木材和其他土地密集产品的外围贸易伙伴。由于制度的僵化,这种能力没有以东亚的外围地区同样的速度转化为内部的发展。但同样的僵化意味着东欧与西
262
欧的贸易相当迅速地发展到了顶点,其水平,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与谷物、木材和肥料在中国的远距离流动相比也更低。^②尽管有强烈的需求、不断上升的价格和一般说来良好的水运条件,波罗的海地区丰富的木材的砍伐仍然相对受到限制也很令人吃惊。我们缺少可以用来与中国的木材贸易进行量化比较的资料,但波罗的海地区的采伐业似乎比18世纪的新英格兰和加拿大的采伐业受到更多的限制,后者几乎没有其他输出品,并且输入它们需要的大部分制品。它无疑几乎与19世纪的采伐业同样黯淡。^③

世界体系理论普遍把“封建主义”东欧和“资本主义”西欧^④之间的这些交换视为一个转折点,由此展开一种全球性分工。然而,我们在这里所看到的是,这些交换在性质上或规模上都没有什么异常之处,它们的发展存在着一些重要的内在限制:这些限制因素也限制了西欧通过这些交换扩大其食物、

① 在附属国和世界体系分析中可以发现对这种设想最充分的详细阐述,这些分析强调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外围的国家能够拉近与核心地区的差距是多么的罕见。然而,同样的设想也支持强调必须动员农业以外的资源并尽快建立工业基础的各种各样的发展规划和前景,尽管后一类理论与前一类不同,经常在原则上赞扬参与全球市场的作用。

② 见前文第34—35、226页(指本书英文版页码——译注)。

③ Lower(1973:22,31—32)和 McCusker 与 Menard(1985)论18世纪后期的波罗的海地区、新英格兰和加拿大;关于19世纪,见 Lower 1973:59—134; Tucker and Richards 1983: xii—xvii。

④ Wallerstein 1974:71—89。

燃料、纤维与建材供给总量的能力。仅仅是找到“不发达”的贸易伙伴并没有解决任何核心地区的问题，至少是没有长久解决。

在 19 世纪后期，东欧没有经历中国内地和日本的“区域 II”早些时候曾出现过的巨大的人口增长（无论是自然增长还是移民^①）和进口替代，这对西欧可能会成为一种优势。它的影响使东欧可以在一个时代中有更多的土地密集产品供输出，在这个时代中，生产的普遍资本化和工业革命带来的生产力的提高，使哈布斯堡领地与俄国成为人们可以在那里卖出从棉布到车辆随便什么东西的地方。因此，在这里，欧洲（如果把它作为一个整体考虑）最终可能获得了某种产生于制度性障碍的“落后的好处”，这种制度性障碍在较早时期阻碍了更为集约地使用土地。但是这些好处在 18 世纪或 19 世纪初的技术和制度环境中还不能得到。在当时，那正是农奴解放和公地分配刚刚开始向中欧和东欧发展的时候，东欧许多地方的普通人购买的工业品仍然非常少，昂贵的生产资料也仍然罕见。所以，1800 年前后东西欧之间的贸易仍然保持着它从 17 世纪中叶以来的状况，远远不能够满足西欧的需求。因而，在 1800 年，本章开始时描述的生态压力在西欧像在中国和日本一样仍然未曾解决。这些压力可能完全阻止发展，也可能迫使它走上一条更为劳动密集的“东亚”（或是丹麦）道路而不出现重大突破。最终，这里讨论的生态系统的“落后的好处”造成了一个重要的差异，但它们花了很长时间才成为可能。

在过渡时期，煤业的突破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生态缓解方式——但即使那样也还不够，因为需要的土地密集产品多种多样。如果西欧想要在其工业生产和初级产品消费方面有超出 18 世纪中叶水平的进一步的巨大增长——即使只是总增长，更不必说人均增长——它就需要有一种新的贸易伙伴。如我们将看到的，那只有在新大陆才有可能。

^① 在移民的情况下，在另一种意义上，支持多重社会制度的多重政府的存在对欧洲发生作用——但再一次不是由于迫使其进一步加速，而是由于抑制性的短期效应。某几个沙皇有时可能通过具体的许诺引诱德国人到他们的国家，但以当时俄国大部分土地和耕作者的法律地位，即使黑土地带也不会吸引人们离开过度拥挤的威斯特伐利亚或东英吉利亚，像四川或江西的山区吸引福建人，或东北吸引山东人那样。相反，在新大陆吸引他们之前这些人一直留在家乡——如果他们在 17 或 18 世纪去新大陆，要以暂时失去自由为代价，而如果他们在 19 世纪或 20 世纪初前往，付出的一张统舱的票价要低得多并不断迅速下降。

六、土地制约的解除： 作为一种新外围的美洲

264

有一个核心区——西欧——能够逃出原始工业的死胡同，并在技术条件许可时把手工业工人转移进现代工业中。它能够这样做，主要是由于新大陆的开发使它不必动员数量巨大的追加劳动力——这些追加劳动力是以更为集约并且在生态上可以维持的方法利用欧洲自己的土地所必需的——即使这样做能够提供足够的初级产品以保持 19 世纪人口增长的领先地位。新大陆既生产“真正的资源”也生产贵金属，它们需要分别对待。让我们从真正的资源开始；而它们又是以加勒比海、巴西东北部和后来的美国南部的种植园产品为起点。

新大陆输出的农产品主要由奴隶种植。种植园几乎全部分布在岛屿上或海岸边。因此，从环加勒比海种植地带的输出与中国的情形不同，在中国，当自由劳动者报酬缩减并把他们的努力更多地转入手工业时，从内地向江南和岭南的输出停滞；它们也没有受到旧大陆的林业工人远离河岸时面临的运输费用剧增的干扰。由于新大陆种植园的经营者的（不像东欧庄园或东南亚的胡椒园的经营者的）从海外购买大部分劳动力，并且常常缩减他们的维生产品的生产，西欧与该区域的贸易也逃脱了尾随着它与东欧原材料贸易而来的“小市场问题”。输出必须高到足以负担购买奴隶的全部费用以及给奴隶吃饭穿衣的大部分费用。

有很多理由说明为什么非洲奴隶在如此之多的新大陆殖民地中成为主要的劳动力。第一也是最重要的是，新大陆的居民在与外来人接触之后令人震惊的死亡率——主要是由于疾病。如我们所知，1800 年以前欧洲的穷人中很少有人能付得起自己的船票，如果有人能强迫他们生产输出品的话，他们是最值得运输的。但由于欧洲人不可能接受完全的奴役地位，这意味着契约期满时他们将得到自由和一块土地。当新大陆欧洲人（和非洲人）的存活率开始改善时，对大多数种植园主来说这种契约变得太昂贵了；他们宁愿预付

265

更多的钱得到一个永远无需给予自由的奴隶。^① 幸存下来的新大陆居民有时会受奴役(特别是在巴西),但非洲人为了某些理由更受欢迎。新大陆居民被认为身体脆弱,因为有如此之多的人在与欧洲人接触后死去;至少有一些欧洲人出于人道主义立场反对奴役他们(但并不反对奴役非洲人)。^② 美洲印第安人也会发现逃跑并与附近未被征服的土著居民联合起来要容易得多(尽管非洲人有时也如此)。由于在最初的50年之后对土著居民的征服明显放慢(当时天花造成了最大的损害,还有许多土著居民获得了枪和马匹),获得土著奴隶常常并不容易。^③ 对比之下,非洲内部庞大的奴隶贸易使欧洲人在那里获得奴隶相对容易,只要他们有奴隶主需要的货物。同时,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国王们宁愿在大西洋彼岸进行奴隶贸易,不愿在新大陆搜捕奴隶,因为前一种做法比在当地搜捕奴隶更容易监视和征税。^④ 这还有另一种意义,国家间的竞争和军事财政间接帮助了促进海外人口在新大陆的重新定居,并帮助把移民安置在一种环境中,在这种环境中他们(不像,比方说,中国边疆地区的移民)会发现很难从一种输出品的集中生产中转移。奴隶完全没有选择权,甚至他们的主人也可能没有选择,因为他们(与一个假设在当地追捕奴隶的人群不同)必须为他们购买的劳动力付款。

1760到1810年间英属西印度群岛的奴隶输入大致相当于糖出口年收入的1/4;来自英国本土的进口约占1/2,来自英属北美的食物和木材(高于并扣除直接与糖交易的数量)占了剩下的1/4。^⑤ 法属加勒比海地区的糖输出在法国与海地的大革命之前比英国属地的输出低约15%,它的奴隶输入在整个18世纪则几乎与英属加勒比海地区的输入同等,所以这里的奴隶输入应该占到了糖收入的30%。^⑥ 在巴西这个世界最大的奴隶输入国,1821—1826年(我找到的第一个有连续数年数字的系列)为进口奴隶支付的价格等于这个国家这些年总输出的收益。^⑦ 由于1820年代出现了一个异常大量输入高价奴隶的数字,这无疑不是典型状况;18世纪后期的平均数可能更接近于出口总价

① Galenson 1989:52,76;Morgan 1975:215—216,296—299.

② Thornton 1992:135—136.

③ 同上,138—141.

④ 同上,136—137.

⑤ 根据 Miller 1986:70 的奴隶价格计算,英国进口数据据 Mitchell 1988:462—464 和 Deerr 1949—1950:1;另见附录 D.

⑥ 出口量见 Deerr 关于英属加勒比海(1949—1950:1,193—203.)和法属加勒比海地区(I:235—242);奴隶输入见 Curtin 1969:216.

⑦ 1821—1826 年数字来自 Miller(1986:70)和 Ludwig(1985:107,314),使用每个奴隶 25 万里新的大致价格(偏向于 Miller 数列的下端);计算方法与西印度群岛的相同。

值的 1/4，与英属和法属西印度群岛一样多。^① 因而，奴隶贸易有助于使欧美贸易产生根本性差异，比旧大陆核心地区和外围地区之间原材料与制造品和白银的直接交换有更大的可扩张性。

此外，旧大陆几乎所有依附性的现金作物生产者也种植他们维生所需要的作物，同时新大陆的很多奴隶却很少或根本没有机会为维生而耕种。由于很长时间内种植园主们都只购买极少的女性奴隶（并且释放她们比释放男性奴隶多），很多奴隶也没有家庭，而在旧大陆各种各样的环境中，家庭帮助进行强迫劳动的现金作物生产者提供了维持生存的必需品。^② 因而，尽管奴隶们很贫穷，他们的日常所需仍创造了一个相当大的进口市场；在这方面，奴隶与旧大陆外围地区大多数不自由人口不同。这些商品（首先是廉价的供奴隶穿用的棉布）构成了进口工业品中一个巨大的组成部分，而进口工业品价值几乎占到英属加勒比海地区糖出口收益的 50%。这些商品中有一些一直在欧洲制造；另一些最初从印度经过欧洲运来，但后来被英国的仿制品取代。

来自英属北美的谷物和木材（扣除用糖直接交换的一个不明确的数目后）占了加勒比海地区糖出口收益最后的 1/4。由于这种贸易使大陆可以支付它自己输入的英国工业品，^③ 它展示了一条间接的道路，通过这条道路，英国继续把它的相当丰富的资本和劳动中更多的部分变成节约土地的输入品。巴西和英属北美的奴隶种植园比加勒比海地区的种植园能够在本地获得更多的供给，巴西的种植园也通过为它们的奴隶提供食品和衣物时异常的吝啬而特别节省；^④ 因而它们从国外购买的商品更少，但这些需求仍然不是微不足道的。^⑤ 此外，巴西人限制供给购买的策略——从吝啬的食物到不平衡的性比例——增加了用来自非洲的新购奴隶补充奴隶本身供给的必要性。

因此，奴隶制有助于使欧—美洲贸易与旧大陆核心与外围地区之间的任何贸易都不同。一个类似中国西南地区那样的自由劳动的外围区域不会为欧洲同样的效力，即使它有同样的生态宽松环境；一个东欧（或后来的爪哇）那样的外围地区也不会如此，在那里，一个一直是维生导向的经济中的参与者被迫从事兼职的输出生产。波托西的白银输出随着当地人口的恢复和一

267

① 关于奴隶的购买与价格，见 Miller 1986:70; Ludwig 1985:107, 314; Curtin 1969:216。巴西 1796 和 1806 年的出口数字来自 Morineau 1985:177—178。

② 实例见 Schwartz(1985:354—358, 385)关于巴西的性比例和婚姻率。

③ 见 Shepherd and Walton 1972:43—44; Richardson 1987:765—766。

④ 实例见 Schwartz(1985:136—138, 296, 436, 441—442)关于巴西。

⑤ 实例见 Subrahmanyam(1993:182—185)关于运往巴西供奴隶穿用的最廉价的布匹。

种更为自给自足的地区经济的再度出现而下降，^①这提醒我们，在没有强大的武力或是没有当地对欧洲商品的需求反复出现的条件下，仅靠欧洲的需求并不能保证一种商品向欧洲持续流动。我们很快就会回到白银问题上来。这里所强调的需求不仅仅是使如此之多的糖、烟草和早些时的棉花从环加勒比海地区流出的生态方面的需求：这一地区也在社会和政治方面被设计成几乎“需要”其他的一切。实际上，英国的优势之一就在于，与法国、荷兰或丹麦不同，它不需要用船把食物从欧洲运到它的产糖殖民地，但可以依靠北美大陆这样做，后者然后又购买英国的工业品（用劳动和资本而不是土地生产）。

因此，人口下降和奴隶造成的人口恢复结合在一起，使环加勒比海地区成为一个异常巨大的进口市场和土地密集型产品的输出源泉。事实上，它成为第一个呈现出人们现在熟悉的“第三世界”轮廓的外围地区：既是生产资料（在这里是会走路会说话被诱骗绑架来的工具）又是日用工业品的巨大的输入地，同时，随着生产变得更有效，更为资本密集，并逐渐扩散，出口商品的价格也不断下降。对比之下，在整个 18 世纪，欧洲生产的能量种类——包括食物——中大多数的价格与工资及其他商品相比都是上升的。^②因此，新大陆的种植园区域是一种新的外围区域：这种外围区域的输入足以使它与核心地区的贸易保持相当的平衡。还有，它的输入和输出互相促进：更多的糖的输出始终如一地导致更多的奴隶输入、更多的食物和布匹输入，并且（通常）让更多的种植园欠债，导致下一年以随便什么价格出售更多的糖。^③

同时，绝大多数种植园区域集中生产一种或两种输出品，极大地推动了贸易本身的一种重要进步。18 世纪横渡大西洋的运输成本甚至在并未发生实质性技术变革的情况下下降了大约 50%。这种下降部分是由于政治变化：
268 英国海军镇压了大部分海盗行为，从而降低了保险费用，使更多的货物可以用海员较少的非武装船只运输。^④然而，另一个重要原因（第 4 章中简要讨论过）是收购货物所花的时间急剧减少。这意味着流动资本周转更快，更集中地使用船只，还有海员工资的巨大节省（他们从离家之日起每天都要付给工资，即使收购货物时他们在港口中耽搁）。缩短港口停留时间的方法是：由一名当地代理商在船到达之前就把需要的货物收集在货栈中，而不再让船拜访

① Lang 1975:61,65—66。另见 Stern(1988)对西班牙统治下的新大陆内部再度出现高度统一和自治的经济的比较全面的讨论。

② 实例见 Goldstone1991:186 页图表；另见 Thomas 1985a:140—141。

③ Richardson(1987:745—746)指出了任何已知年份从英属西印度群岛输出的糖和下一年该地区对奴隶的需求——从而又生产了更多的糖——之间的一种直接关系。

④ Shepherd and Walton 1972:81—84。

许多种植园并花费时间讨价还价。当每个区域只出售一两种输出品，而不是像例如印度洋的港口那样有许多可能性时，这种责任委托制更容易施行。^①

因而，当从旧大陆很多外围地区搜寻更多的初级产品意味着耗尽最容易得到的资源、面对更高的运输成本和违背进口替代的逻辑性时，一个相反的态势就在新大陆很多地区起了作用。在社会和政治因素不利于进口替代的条件下，单一农产品的输出降低了横渡大西洋的运输和交易成本。这又使得美洲出现了更高的地方运输成本——即，向内地进一步的扩张——而在欧洲的出售仍然足以支付工业品并偿还启动资金。无论涉及到的是奴隶劳动、契约劳动还是自由但需要启动资金的人，这种态势都会运转，它在北美洲的移民中起了重要的作用。^② 它也帮助大西洋彼岸的工业品（和虏获的“生产资料”）交易——与波罗的海的贸易或中国内地商品的贸易不同——保持了扩大趋势。

换句话说，一场人口灾难、殖民地的立法和奴隶制结合在一起，创造出一种外围地区，它是在大部分生产需要昂贵的生产资料之前，大多数人仍然与维生生产有某种联系的时代中，一个不断扩大的原料来源。实际上，这种情况甚至在新大陆许多地区也证实是暂时的；随着秘鲁和墨西哥人口水平的恢复，较为自给自足的经济再度出现，输出也下降了。^③ 如果不是环加勒比海地区出现的这种特殊情况，仅有一个富裕的、自由劳动的核心地区和一个比较贫穷的、使用依附劳动的外围地区之间贸易的存在，是不会产生这样划时代的影响的；例如，西欧与东欧的贸易决不比长江下游与它的众多自由劳动的外围地区的贸易更重要或更有活力。支配外围地区的劳动方式确实是关键性的，如世界体系理论所坚持的，但如果我们把各种各样的“受强迫的现金作物生产者”混合在一起，我们就过于简单化了。新大陆的奴隶制和殖民主义在真正重要的方面存在差异。 269

关于奴隶制在欧洲（特别是英国）工业发展中的意义的早期观点通常集中于出口市场，把它视为工业发展的一个刺激因素；它们因而容易受到“内因”论的攻击，后者认为国内市场也在不断发展，并且依靠着一个更大的基础。这种争论可能天生不会有结果——当加勒比海地区的需求占到了英国1748到1776年间工业产出增长的12%时，^④格言中的这只杯子是满了一半

① Shepherd and Walton 1972:52—53,67。关于印度洋上任何已知商船载运货物的极端多样性，见 Van Leur 1955:132,253;Chaudhuri 1978:204—208。

② Shepherd and Walton 1972;特别是 McCusker and Menard 1985:18,23,28-30。

③ Lang 1975:61,65—66。

④ Richardson 1987:768。

还是空了一半？相比之下，本书的观点强调的是一些市场比另一些市场关系更大。因为新大陆和奴隶贸易提供了扩大中的国内市场不可能提供的东西：不需要大量使用英国的土地，工业品就能够转化为数量不断增加而价格合理（甚至是下降的）的土地密集的食物和纤维（和后来的木材）。

另一个新大陆，另一笔横财：贵金属

同时，墨西哥、秘鲁加上后来的巴西，把数额巨大的贵金属运到了欧洲。其中一些来自对殖民地的直接榨取，例如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国王们对其领地内所有的矿业都要分上一份。1640年以前法律规定这一比例至少占全部外运产品的27.5%——或许多达40%。^① 由于这些税收迅速引起了广泛的走私，王室在产量中实际占的比例从来没有那样高，为了尽量减少违法交易，法定税率也逐渐降低；虽然如此，王室仍然可能得到了登记产量的1/10到1/15。^②

这种流动中一个实际上更大的部分仅是稍微有点间接地依靠高压统治。强制性的劳动定额压低了采矿成本，无论当地人是自己实际完成这种工作还是用贴补别人工资的方法花钱摆脱它。^③ 当这些定额的直接受益者是常住新大陆的矿业企业家时，它们明显地提高了在任何特定价格上可能的产量；由于很多人——从大中型矿山的经营者到“实物分成”的矿工本人——都有黄金和白银出售，^④因而无法阻止这些积蓄落入欧洲买主手中。同时，殖民地的立法极大地减少了那些带着欧洲和亚洲商品来交换贵金属的人之间的竞争——并且至少尽力限制了当地对这些进口商品的替代生产。因而，这种贸易的范围和它的成交价格都被扭曲了，使黄金和白银输出中一个未知的较大的部分成为给欧洲的一件“礼物”。

这个“礼物”中有一些留在了西欧。这些金属对欧洲经济发展或许没起什么作用，因为它们为无数的战争提供了经费，包括西班牙对西北欧正在形成的核心区经济发起的几乎成功的进攻。^⑤ 尽管如此，这些金属可能帮助欧洲贸易的车轮涂了润滑油，它们肯定在更有效的军事技术的发展中扮演了一

① Hamilton 1934; Flynn and Giraldez 1996, 321—329.

② Morinenu 1985, 102, 121, 289.

③ Stern 1988, 849—852; Tandeter 1993, 15—85.

④ Stern 1988, 852—854.

⑤ Flynn 1984, 43.

个角色。同时，新大陆的很多珍宝继续东行，把其他商品带给了欧洲。它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单独的流向。

新大陆黄金和白银输出的一个重要流向是旧大陆形形色色生态富有的小市场地带——从东南亚到近东各地到东欧——使欧洲能够扩大它从这些外围地区的真正的资源输入。在这些场合，白银或黄金（通常较少）的用途类似于现代的通货储备：它们是一种价值差额储备，转让它们是为了弥补与对欧洲商品需求有限的区域之间的贸易不平衡。但是也可以把这些通常在从欧洲转手运走之前已经铸成货币的金属看作一种欧洲制造的商品，在这些地区有相当大的市场，而本地的产量（由于缺少合适的原料）有限。^① 在正在迅速铸币化的经济中（例如斯堪的纳维亚的许多地区），这类制造品至少部分意义上是一种大众通用的商品；在市场化程度最低的外围区域，例如东欧，它实质上是一种奢侈品。无论哪种情况，它都使西欧从这些区域得到的初级产品比没有它时能够得到的数量更多。

但是，由于贵金属不会用坏或用完（不像衣服或谷物），如果社会中只有一小部分人使用它们，要为它们创造出一个不断膨胀的（或许甚至是持久的）市场是困难的。的确，富人可能增加他们的白银或珍宝储藏；但总有一天他们的储藏会足够对付所有可以想像得到的责任，白银作为一种引人注目的消费品，与丝绸、瓷器、油画之类相比，肯定会开始失去价值。因而，新大陆的白银帮助西欧获得的原材料要比如果 15 世纪的“金银饥荒”延续下来，它们能够获得的更多，^②但白银本身不能使西欧与铸币化程度较低的旧大陆经济之间的贸易无限扩大。

第二个流向也有助于欧洲获得土地密集产品，但不那么直接。这一流动是交换各种各样的亚洲（主要是印度）制造品，这些制品在为美洲获取奴隶的成本中又占了很大部分。仅印度棉布就占 18 世纪英国商人用以交换非洲奴隶的货物价值的大约 1/3，可能占法国商人（他们生产印度织物的出色仿制品的工业发展较慢）用来获取奴隶的商品的一半以上。^③ 葡萄牙皇室的大量贸易是直接由亚洲到非洲再到巴西，在母国停留仅仅是为了呈送新大陆的商品。^④ 换句话说，这一部分金属流动推动了我们已经描述过的过程，在这个过

271

① Perlin(1994:113—118,147—174)强调了一点，即这一时期的铸币通常更多地被视为一种制造业的商品，而不是与“商品”相对的“货币”。Perlin(1991:239—373,特别是248—249,268—280)考察了作为商品的铸币的生产，这些铸币通常是专为远方特定的市场设计的。

② Day 1978:3—54。

③ H. Klein 1990:291。

④ Subrahmanyam 1993:183—185。

程中，新大陆的奴隶区域成为有充裕的劳动和资本但缺乏土地的欧洲的一个重要补充。

在印度，如我们看到的，一个有力的例子说明，与其把大量金银铸币的流动看作是一种弥补“贸易赤字”的财富储备，不如把它看作是在满足基础广泛的交易需求。但尽管在印度有正在经历货币化过程的令人印象深刻的证据，继之而来的结论并不一定是如果没有新大陆的贵金属，印度会简单地输入更多的其他欧美商品。很大一部分人口仍然只有在要获得一些必需品、满足偶然的礼仪需求（如为了婚礼）和筹集现金以支付税收及其他款项时才进入市场；在他们确实购买了其他产品的情况下，也不清楚欧洲工业品到底有多大的竞争力。名气更大的中国纺织品和陶瓷制品、东南亚的珍奇食品和来自中东的独特的伊斯兰商品意味着欧洲的奢侈品也不会找到一个大市场。所以即使我们把流向印度的贵金属只当作另一种商品，它们在另一种意义上大概也是特殊的：它们大约是人们能够设想印度以这样大的规模购买的惟一的欧洲商品。（突然想到另一种可能的商品是武器；我们不清楚在跨越莫卧儿的衰退和英国势力发展的这一阶段中，这种已经很重要的贸易如果进一步巨大增长会产生什么影响。）

最后，贵金属的第三个流向是数十年中所有流向中最大的；但这一路白银的流动对减轻欧洲的土地压力或许作用最小。它流向了亚洲人口稠密、商业化高度发展的地区，在那里，它被用作一种涉及社会中所有阶级的交易中介；接下来，各种各样的生活必需品又流向了欧洲和美洲本身。这一描述，如我们看到的，可能适用于印度贸易中的一部分，但它首先是指流向中国的白银大潮，在中国，数百万的普通人用白银缴纳赋税并用于许许多多日常的购买活动。

在这里白银显然是一种货物，而不是用以弥补账目不平衡的价值差额。事实上，在白银于 1500 到 1640 年间流入中国的同时，金和铜离开了中国，通常最后留在了欧洲。^① 而尽管丝绸这个中国输出品中最重要的“真实货物”是一种织物而不是金属，它在一些地方也被当作钱使用。因而，在这种贸易中，新大陆的白银只是进行套汇交易的许多商品之一；中国用来交换白银的商品品种（黄金、瓷器、丝绸）比其他地方丰富，白银在中国相对稀缺，^② 但有非常高的需求，因为它成为这个全世界最大经济的货币和财政基础。^③ 到 1640 年前

① Flynn and Giraldez 1997: xxvii; Von Glahn 1996: 129—133, 224—229.

② 关于不同地区金银比价的资料，见 Von Glahn 1996: 127.

③ Flynn and Giraldez 1997: xix.

后,这种贸易使中国白银对黄金的比价与欧洲达到大致平衡的程度;这样一来,由于失去了存在的理由,这一贸易开始急剧下降,只是在18世纪才恢复。^①在其最早的形态中,这种贸易几乎没有为欧洲提供土地密集产品。尽管如此,它能够获得巨大的利益,并提供了可以用来在其他地方进行交换的货物(与越来越多的白银不同)。

在中国像在印度一样,可能很难想像,如果得不到白银的话,还有另一种商品会以这样巨大的规模进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新大陆的矿山也对欧洲在旧大陆其他地方获得商品的能力有重要意义。但是中国的情况与印度不同,从输入者方面说,在中国要把它输入的大量白银看作不重要的东西更为困难;所以,如果缺乏这种流动,我们肯定会设想不是有其他种类货币中介的输入,就是中国自己的生产资源发生了巨大的重新配置,或许随之又扩大了对其他输入品的需求。同时,从欧洲一方说,贵金属向中国的流动和向印度的流动之间的差异在于,前者对缓解土地压力的作用——即使是间接的作用——相当小。

新大陆贵金属各种用途之间的这些差异是后起的,并且极不充分,贵金属的不同用途和不同目的地之间的联系应该被视为趋势而不是绝对规律。即使在东欧——或许是普通人口卷入现金经济程度最低的外围地区——也并非所有输入的贵金属都代表了一个停滞的经济中精英阶层进行的抽象的“财富”储藏。而在这个阶梯的另一端,甚至在中国肯定也有一些白银被储藏。我们必须承认这些行为中有一些是到处都有的;一些学者认为在西方的“花钱者”和亚洲的“存钱者”之间存在尖锐差异是没有根据的。^②此外,在一个普通人没有储蓄账目的社会中,在一个珠宝和其他可供夸耀的物品常常成为一种保证婚姻(它们繁殖了新的生产单位)成功的重要因素的社会中,储藏和交易需求之间的界限本身就是含糊不清的。

但是尽管这些范畴的性质相似而多变,它们还是告诉了我们一些东西: 273
新大陆的贵金属并不是简单的“钱”,欧洲人把它们分散到整个旧大陆变成“真实”的资源,欧洲人的需求不断推动这个过程。其他地区的内部动力可以创造的“需求”并不比欧洲的更不真实,例如中国对一种可以更方便地使用的通货的需求,或东欧贵族把他们的谷物剩余转化为某种容易储藏和运输因而便于供军队作战用的东西的欲望。^③正是欧洲和其他区域动力的交点决定了

① Von Glahn 1996:128、232。

② 最近对这种所谓的差异及其长期意义的一个重申,见 Kindleberger 1990。

③ Blum 1961:201-204。

这些金属流动的范围和性质:世界经济仍然是多中心的,从其他地方放射出来的力量对它的影响能够像从欧洲放射出来的力量一样大。

实际上,正如我们在第4章中所见,如果具体说,中国没有这样一种动态经济,其正在变化的金属本位能够在三个多世纪中以难以置信的数量吸收新大陆开采的白银,这些银矿在几十年内可能就会无利可图。1500到1640年欧洲以白银标示的物价的巨大膨胀,意味着即使亚洲吸走了大量的白银供给,这种金属的价值仍在下跌,^①旧大陆货币化程度较低的地方也不会无限期地不断吸收贵金属而不使它们贬值。这是现代早期的白银和黄金并不完全像当代的“钱”的又一个方面;今天那些有硬通货可以花用的人永远不会在获得更多的资源方面遇到麻烦,因为当代的外围地区对资本有难以置信的巨大需求。

尽管如此,新大陆金属的转手确实使西欧得以把它的真实资源的输入扩大到远远超过它在其他情况下能够得到的。为了使旧大陆一些货币化程度较低的外围区域流出的资源不断增加,新大陆的一些白银可能必须转换为棉布、瓷器或香料;但由于中国的需求,这种转换也是可以实现的。如我们已经提到的,新大陆的金属本身、通常用白银交换来的转手的亚洲货物和产自新大陆当地的异国情调的商品(如糖和烟草)合在一起,为西欧从旧大陆其余地区的输入所作的偿付要比全欧洲制造的工业品所作的更多。

所以,一些作者对高压统治榨取的金银和由双方自愿的贸易实现的更为重要的真实资源流动所作的区分看起来是不自然的。^② 不仅生产新大陆输出资源所用的土地和劳动完全是超市场的高压统治的果实,为避开所有引起旧大陆内部核心—外围的交换趋向停滞的因素,也需要在整个新大陆采用加勒
274 比海种植园独特的经营方式和重商主义政策。如果没有这些特征,如果没有白银帮助支付殖民地行政管理费用,并供亚洲商品转手运往非洲和美洲之用,很难说清这笔“生态横财”怎样才能以如此大的数量到达欧洲;也说不清欧洲如何能够从旧大陆其余地区获得它实际获得的生态缓解。

生态缓解的一些度量标准:工业革命时代的英国

有关联的数字相当多,^③但为了有效地讨论它们,必须对它们作一些分

① Hamilton 1934; Flynn and Giraldez 1996:323—329。

② 实例见 Jones 1981:83—84。

③ 贯穿这一节的计算方法见附录 D。

解。为了进行论证,让我们排除掉那些无需发生重要的制度变革就能从旧大陆外围区域获得的商品(例如毛皮,可以认为俄国能够大量输出),以及旧大陆通过引进诸如马铃薯(没有它无论爱尔兰还是普鲁士都不能向英格兰输出谷物)之类新大陆的植物而获得的利益。新大陆庞大的渔业——北美的海岸对它很方便但并不重要——也最好不予考虑。这些东西在某种松散的意义上都属于新大陆的横财,但如果我们在计算我们的净值时过于宽泛,我们就只是在简单地计算横渡大西洋的贸易量,而没有说明这些交易(更不必说它们背后的任何具体机制)的实质。所以对于18世纪和19世纪初期,讨论将几乎完全集中于糖和棉花,连同对19世纪中后期来自美洲的初级产品更大的洪流的一些反思。

敏茨估计糖在1800年英国人摄入的热量中约占2%,到1900年达到了令人眩晕的14%。^①事实上,实际数字看起来甚至更高。使用敏茨所作的人均糖消费量的同样的估计,同样换算为卡路里,1800年联合王国(包括爱尔兰)每人每天糖的消费量超过了90千卡。如果1800年英国人平均每天消费2500千卡(一个宽松的估计),^②那么90千卡即使在那个早期年代也几乎占到了总摄入量的4%;如果人们确实每天平均消费2500千卡,1901年糖的平均摄入量就会达到卡路里总数的18%以上,如果他们的平均消费是可能性比较大的2000千卡,糖的平均摄入量就超过了22%。尽管今天糖常常被嘲笑为一种“垃圾”卡路里来源,但它在比较穷的人的饮食中可能是有价值的,它阻止了体内宝贵的蛋白质燃烧转化为热量。^③

275

4%这个数字对于1800年可能不算高,但值得记住的是,一英亩热带甘蔗田生产的卡路里比4英亩马铃薯(18世纪大多数欧洲人对它不屑一顾^④)或9—12英亩小麦更多。^⑤1800年前后联合王国吃掉的糖产生的卡路里(使用敏茨的数字^⑥),需要至少130万英亩中等产量的英国农田,可能超过190万;

① Mintz 1985,133。

② Clark, Huberman and Lindert(1995:223)收集了各种各样的劳动者家庭的人均消费调查,提出了每个等成年男性低至1500千卡(适用于一个1787—1796年农村穷人的样本),高至2400千卡(适用于1863和1889—1890年的城市工人)的估计数,加上1860年代对农业工人的一个3200千卡的估计;但甚至后一个数字换算为每人平均数时也低于2500千卡。

③ Daniels 1996:277。

④ Braudel 1981:170; Salaman 1949:479—484。

⑤ Mintz 1985:191。

⑥ Mintz在这里提的是“不列颠”,但由于他的数字与Deerr和Mitchell提供的联合王国的数字相似,他或许也是指联合王国;对于他的目的,这不会产生什么不同结果。并且如我们所见,由于英格兰自1770年起从威尔士、苏格兰和爱尔兰获得了大量的食品供给——如果那些地方没有另外的方法满足最低的卡路里需求,这些供给应该是减少的——联合王国的数字正是我们在估计加勒比海地区对供养工业化的英格兰所做贡献时需要的数字。

1831年则需要190万到260万英亩。由于欧洲(特别是英国)到此时尚未耕种的土地绝不是这个大洲上最好的土地,我们可以有理由让这些数字更大一些。

干肉加上船只、基于树木的松脂制品和小量的木材及谷物,在18世纪后期节省了一些土地,在19世纪初节省了大量土地。举例来说,1800年以前北美向英国的木材输出微不足道(尽管向南欧的输出并非如此);但到1825年,它们大到足以取代100万英亩欧洲森林的产量,并在那以后急剧增长。^①当新大陆的白银和再出口支付了英国输入的大量波罗的海木材时,也间接地实现了一些节约(它在1780年代和1790年代每年取代约65万英亩的产量)。当时英国可耕地总数约为1700万英亩,^②到此为止发现的新大陆300—400万英亩的“虚拟土地”,即使不算棉花——并且在19世纪中叶美洲输入品的高潮变得非常非常大之前——对英国的耕地基数也不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增加。

到1815年,英国从新大陆输入的棉花超过了1亿磅;到1830年为2.63亿磅。^③如果用同等重量的大麻或亚麻代替这些纤维,需要增加的土地面积相对来说可能并不大:1815年为20万英亩,1830年为50万。但大麻和亚麻——特别是大麻——既在大多数用途上被认为是低等纤维,加工起来又更为困难,纺麻工序的机械化也出现得比纺棉更晚。^④更重要的是,大麻和亚麻都是高度劳动密集和肥料密集的作物,密集到大部分人都只是把它们当作园艺作物种植。甚至长达三个世纪的政府计划和津贴都没能在英格兰或北美推动大规模的种植。^⑤

现在还剩下羊毛,这是欧洲长期以来主要的衣料纤维。但喂养足够多的绵羊以代替英国从新大陆输入的棉花制成的纱线,需要的土地数量令人无法相信:用典型农田的系数计算,1815年为将近900万英亩,1830年为2300多万英亩。最后这个数字超过了英国农田和牧场的总和。它也超过了安东尼·里格利(Anthony Wrigley)的一个估计:要与1815年前后英国采煤业年平

① 计算方法见附录D;输出数字来自Lower 1973:259。

② Mitchell 1988:186。这个数字实际上属于一个较晚的年代(1867年),但它是可以得到最早的数字,当时的情况看来也相当稳定。

③ Mann 1860:112。

④ Mokyr 1990:103。

⑤ 见Warden(1967:32—40)论英格兰及其殖民地。

均能量产出相称,需要这个国家魔术一般的再增加 1500 万英亩森林。^① 如果把 1830 年前后的棉花、糖和木材加在一起,我们得到的虚拟土地数量就在 2500 万到 3000 万英亩之间,甚至超过了以正常系数计算的煤的贡献。

从大陆以外地区的进口也通过改变习惯而减少了人均食品需求,如第 5 章讨论过的;这可以使我们计算出的节约土地的结果明显增加,但它或许是无法计量的。家庭取暖更为低廉当然主要归功于煤产量的激增。但让更多的人室内工作——而不是沿着“江南”甚至“丹麦”的道路走向生态意义上的幸存——却既要依赖廉价的基于煤的能源,又要依赖海外棉花、谷物及其他土地密集产品的供给;室内劳动者消费的卡路里大约比户外劳动者少 1/3 左右。^② 如果没有美洲的棉花,有助于保暖并进一步减少热量需求的数量空前的廉价布匹也是无法想像的。至于茶和糖抑制食欲的性质也造成热量需求减少,这是另一种部分经由海外高压统治获得的隐性的节约。大多数糖来自新大陆的种植园,而茶最初用新大陆的白银后来用印度的鸦片支付。这些因素的结合甚至在 19 世纪初期就使“虚拟土地”明显增加,在 19 世纪中后期则使“虚拟土地”巨大增加。 277

当然,美国南方并不是将要种植棉花的惟一的地方;但如果没有这一区域,曼彻斯特早期的发展就会面临非常严重的障碍。如果没有这一区域具体的生态和制度传承,它要维持棉纺织业的繁荣会多遇到多少困难,这一问题可以通过观察后来在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发生的所谓的棉饥荒获得某种理解。

尽管美国的棉花输出仅在 1862 年至 1865 年中期出现过中断(1861 年北方还没有实现有效的封锁),英国在 1850 年就已经开始为增加棉花供给作出巨大努力。这些努力几乎肯定远远高于英国在一个假设从未有过美国的输出的世界中为寻找棉花供给可能作出的努力。在这方面英国的能力比它在 19 世纪初所具备的要大得多,能够运用的运输和其他相关技术也要先进得多。或许更重要的是,对克服最初的棉花短缺来说,与建立这样一种工业预测能够产生的潜力相比,已经存在的为数众多的工厂、数量庞大的工人和现有的期待着产品的顾客,对于避免棉花供应下降创造了更大的刺激。然而尽管有这些努力,“原棉的供应……仍是毫无弹性。”^③

① Wrigley 1988:54—55。Wrigley 实际上把“乔治三世之死(1820)”作为他的截止日期,但按照 Mitchell(1988:247)对煤产量的统计,产量实际达到必不可少的 1500 万吨时应该是 1815 年。更重要的是,Wrigley 对 1 英亩林地 1 年生产两吨干木材的估计,如他所提到的,可能是高估的,这使他对煤的作用的估计偏低。如果他像 Smil(1983:36)和我在别处那样,使用当代全世界的中值,他对煤的作用的估计就会上升到略高于 2100 万英亩“虚拟土地”。

② Clark, Huberman and Lindert 1995:223 与 226 对照。

③ Farnie 1979:136。

英国的努力主要集中在印度。印度政府在1850年代一直实行一种“棉花导向的并吞与修筑铁路政策”,但是在第一个十年中几乎看不到成绩。1861年确实发生了一个大的飞跃——主要不是通过产量的扩大而是以牺牲国内消费和向中国的输出为代价——但1861年印度运往英国的棉花仍然不到美国发货量的一半。而且,这之后出口也只上升了8.6%,尽管这正是联邦封锁开始生效,棉花价格飞涨之时。^①

另一个相关的成就——远非外来的努力——出现在埃及。这一成就能够实现是由于埃及政府本身自穆罕默德·阿里(Mohammed Ali)时代以来一直被要求扩大棉花生产:当他下令建立的工厂终于证实没有竞争力时,棉花就成为出口商品。出口开始于1821年,1824年超过了2700万磅,到1850年代几乎达到5000万磅;^②但这个数字还不到早至1815年美国输出数量的一半。在其最高峰,埃及的出口接近了20000万磅(仍然没有达到美国1830年的出口量),此后即急剧下跌。^③这些昙花一现的成就发生在上层施加强烈压力40年之后——实际上直到美国南北战争爆发,埃及的棉花种植才扩展到穆罕默德·阿里及其亲属的领地之外——由兰开夏的成功榜样激发的一种体制所策划。尽管有这一漫长的准备阶段,它们并没有呈现出一种可持续的生产水平,更不必说可以进一步扩大。它们也没有以一种兰开夏能够长期接受的价格提供棉花。

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尼罗河三角洲在任一季节都有约40%的耕地种植棉花;按照当时使用的轮作制,显然三角洲的每块耕地都在1863到1865年间的某个时间段种过棉花。^④由于埃及水源条件良好的土地数量有限,这或许代表了在20世纪的大工程能够建立的灌溉系统还不存在的条件下,能够植棉的土地的最大绝对值。即使在这种土地上,种植成本也迅速上升到仅仅是在1864年价格达到绝对最高点时才有利可图的程度;^⑤而按照那一价格(事实上,即使是按照1862年的较低的价格),原棉实际上比粗纱还要贵。^⑥

尽管价格急剧上涨,英国推动其他听起来大有希望的产地——巴西、西非、昆士兰和缅甸——出口的较分散的努力几乎没有产生结果。^⑦1861到1862年间英国棉花消费下降了55%,同时价格(在1861年已经由于战争而上

① 同上,137、142、145--146、151。

② Issawi 1966:362,416—417,度量标准换算见518。

③ 同上,417。

④ Owen 1966:424。

⑤ 同上。

⑥ Farnie 1979:145。

⑦ 同上,150。

涨)翻了一番。按照相对值,1860年棉花的价格约为羊毛价格的1/3,而到1864年超过了羊毛。^①如果不是在南北战争开始时有大量储备原棉供应,同时仓库中的棉业成品又有大量过剩(从而压低了对更多的纺和织的需求),价格无疑会升得更高。^②1862年兰开夏的纺织厂大约有一半停产,仍然开工的工厂到11月份每周工作2.33天(而1860—1861年为6天);^③有大批企业(特别是小型企业,它们在现金储备、设备和其他财力方面更接近于早期的工厂)破产。

确实,即使是这种不充分的原棉供给也高于美国在19世纪初供给的数量;但如我们所见,它也是产生于那时无法想像的努力。在没有20世纪的耕作工具的情况下,替代来自这些“新欧洲”的较晚也较大的粮食作物富源,始终是极不可能的;除了欧洲本土、相对稀少的人口和有利的制度结构外,旧大陆几乎没有什么地方具有类似的、对欧洲粮食栽培更有利的生态综合条件。^④

比较和计算：这些数字意味着什么？

279

有人可能会反对这些计算,就像对海外压榨和欧洲资本积累的观点常见的一种反映那样(第4章讨论过的):如果有其他更大的因素——欧洲内部的资本积累、粮食的国内供给或无论什么——我们怎么能说某种因素是决定性的?这个问题无论是对这里的具体事例还是对更为一般的概念化的历史过程都是重要的。

当我们主要关注解释单个案例的发展时,那么较小的因素就是较次要的因素。但即使如此,也产生了范畴问题。“英国输入的新大陆农产品”作为一个包容性的范畴看起来可能依次小于一个类似的“国内(英国)农业产量”范畴和“从欧洲其余地方的输入”范畴,但如果我们把这些范畴进一步分解(“从德国输入的粮食”、“从斯堪的纳维亚输入的木材”等等),我们就会发现新大陆的一些亚范畴如“从美国输入的纤维”之类,在这个更长的因素名单上会处于最大的项目中。我们提出的范畴的精确程度依赖对不同产品的可替代性、具体部门对较大经济的重要性等情况的综合判断(有时是对实际情况的进一步逆推)。(这是一个理由说明为什么新大陆的资源显得比新大陆的利润更

① Farnie 1979, 147, 162.

② 同上, 138—139, 144—145.

③ 同上, 145—146.

④ 一般性的论述见 Crosby 1986.

为重要：有能够带来钱的明确的其他投资方式，但能够获得大量土地密集产品的其他方法则并不明确。）因而，除非我们想要作出一种范畴性的描述，在这一描述中，始终存在着对任何具体因素的替代选择，始终存在着精确地度量行为、商品等等的相对意义的市场，这种判断就无法避免。（为了说明对这些假设的某些限制，设想一下火星人突然夺走了地球上的全部矿物燃料。我们可以通过观察当前全世界GDP中落到矿物燃料生产者头上的一个相当小的百分比估计它的影响，但实际的影响肯定会更大。）

更一般地说，显然存在某些情况，其中某个事物的一个相当小的增量会产生根本性的差异。人类基因有98.4%与黑猩猩的基因完全相同，^①但对于为什么人类几乎分布在整个地球（而黑猩猩只在几个孤立的地区存活）这一问题，没有人会由于一种解释过多强调其余的那1.6%造成了不同的行为方式而取消其解释资格。

相当小的差异可能创造巨大的历史分流这一基本理论既是谚语式的（“因为缺少了一颗钉子……”）又是现代的（就像在“混沌理论”的著名范例中，一只蝴蝶在非洲扇动它的翅膀，改变了格陵兰的气候）。它与追求均衡的模式背道而驰，后者认为小差异不应该产生巨大而持久的分流。它因而导致了历史学 and 经济学——至少是那些把一种单一均衡当作一个特定制度发展趋势的终点的经济学流派——之间尴尬的联姻。承认小因素的重要性也可能导致思维混乱。解释可能变得如此杂乱，以至我们无法抓住它们；或者它们可能成为一个摸彩袋，里面每件东西都可以摸出来成为适合于它们各自目标的“关键性”因素。但对于历史来说重要的是，某个时期肯定有一些因素的持久影响大于它们的规模能够显示的。

在比较的基础上对这类因素进行论证，部分取决于所讨论的这些案例其他方面的相似之处的清晰程度。历史从来不像黑猩猩与人类的情况那样简洁，在黑猩猩与人类的案例中，98.4%的基因绝对一致。相反，我们描述的是大致的相似性，或者似乎与某些抵消性的劣势紧密联系的优势，或是难以想像什么地方存在着任何机制，会过分夸大一个具体差异在大分流发生的这个阶段的意义。

因此，煤和新大陆将有多大的意义，部分地依赖我所指出的其他地方的相似性怎样使读者信服，以及对那些具体现象的证明。至于那些现象本身，我愿提出给它们以特别重视的四个理由：

^① Diamond 1992:23.

1. 上面的计算显示出它们与某些合理的标准相比并不小(例如英国国内的土地基数)
2. 它们出现在解释一个关键性分流的正确的时间(当我们把这一分流的日期推回到 1800 年前后的那一百年时)
3. 它们通过减轻一种制约——有限的土地数量——影响了发展,这种制约在当时的知识水平和制度条件下本来是非常难以减轻的
4. 中国、日本和欧洲本土某些地区(例如丹麦)的核心区提供了合理的实例,说明缺乏这些优势的社会看起来可能会是什么样子

它们不要求我们去设想,如果没有这些减轻,欧洲会经历一场马尔萨斯灾难:一种近似于“蝴蝶翅膀产生的飓风”的情形,或者设想如果有一个更长时间的生态窗口,印度、中国或日本会发生一场工业革命。有可能发生一场欧洲生态危机,但我们的反事实推论允许我们设想各种各样更为可能的结果,这些后果共同用一系列劳动密集对土地压力进行了调整——现实中的人在多少相似的环境中成功地运用了这些方式——但不会导致任何类似于英国的突破。实际上,如我们在最后一节将看到的,即使出现了可以模仿的技术,这些劳动密集的道路仍可能使效法工业革命更为困难。因而,强调我所选择的因素,在我看来,是对于最初并不很大的初始差异有可能导致未来大得多的差异这一原理的一个合理的而不是随心所欲的援引。 281

超出这些数字之外的东西

在介绍了不能通过均衡模式或者更一般情况下的量化措施轻易获得动态影响的理论后,让我们简要观察把新大陆与欧洲脱离旧大陆其余部分的分流联系起来的那些方面。我们只是简要地触及(在第 3 章)了诸如烟草和咖啡之类新大陆的输出品在文化方面的动态影响——特别是它们对消费习惯和为市场进行生产的动机的影响。尽管在我们已经做过生态推算的品种中并不重要,这些“非必需”商品——和利用新大陆的白银在亚洲得到的其他商品——无疑在使对欧洲的经济动力十分重要的“勤劳革命”加速方面起了很大作用。

首先,烟草、糖、可可、咖啡和茶叶或多或少都是成瘾性的,容易调制并消耗迅速,提供了短期爆发的热量。这使它们适合于在漫长的工作日的中间休息时用,特别是在离家工作时;随着住宅与工作场所的分离,特别是在工厂时

代,这些特征变得更重要了。(特别是在英国,为中国茶叶部分取代杜松子酒和啤酒提供了资金的新大陆的白银,也可能对创造出能够更好地适应快速并且有时危险的工作的人口起了很大作用。)此外,这些新的“日常奢侈品”全是(烟草除外)欧洲不种植的商品,因而从来不能在家庭中制造;所以获取它们只能通过为市场进行生产。那些令人向往的棉织品或丝织品或流行的棉丝混合织物亦是如此;甚至在穷人中也成为重要地位象征的白银带扣和其他小装饰品同样如此。

282 这些东西不仅必须购买,而且在很多情况下它们的价格对专业化也是一种刺激。一个家庭可以用大麻或亚麻制作自己的服装,但不太可能会冒毁坏一块比较珍贵的衣料的风险;一个家庭必须相当富有,才会情愿一笔勾销在训练一个年轻人学会加工丝绸的过程中浪费的所有织物,除非这会成为他们维持其生计的方式。所以,异国风味的商品在这一阶段成为很多普通人生活的组成部分,可能通过重要的尽管无法度量的方式,对劳动时间从为家庭应用而生产到为市场而生产的重新配置起了作用,而后者又对欧洲通过扩大分
工的取得“内生的”增长起了重要作用。我们还要考虑种植园本身作为工厂组织的试验室可能具有重要意义的一面,如敏茨所提出的。^①

此外,我们必须记住,新大陆的贵金属不只是使欧洲人可以在新大陆其他地区购买更多的商品。它还帮助培养了欧洲军队的指挥官和军需官,这些人成为当地精英的有影响力的伙伴,并且常常在以后成为殖民地的主管。^②对甘蔗和烟草种植园征收的消费税,还有其他的殖民地商品,在形成这些军事能力方面也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1670到1800(或1810,如果愿意把拿破仑战争期间的更多年份包括在内)年间英国政府收入(以不变价格计算)中增加的部分,有一半来自海关税收;至少在1788—1792年,2/3的海关收入来自于对茶叶、糖、印度棉布、生丝、烟草和“外国酒”(主要是用加勒比海的糖酿造的朗姆酒——这一用语不包括葡萄酒)的税收。^③这几种商品征收的海关税合计占到了英国这些年所有重要税种收入的22%。^④当然,欧洲人在亚洲的很多早期征服行动是由靠这些贸易生存的各种各样的东印度公司自己施行的。

值得注意的还有,在不断扩大的军事力量使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初期的欧洲人可以从亚洲各地的政治不稳定中获利的同时,欧洲自己也发生了内

① Mintz 1985:46—61.

② Bayly 1989:74; Washbrook 1988.

③ 据 Q'Brien 1988:15 数据计算。

④ 据上书 11 页数据计算。

部动乱。^① 杰克·戈德斯通(Jack Goldston) 勾画出了 17 世纪中叶和 18 世纪后期这两个时期欧洲政治的不稳定与由人口引起的资源短缺及价格上涨之间合理的联系。^② 按照他的见解, 海外资源的影响显得更为突出, 使这些问题避免了进一步恶化。政府对新大陆商品的税收可以说有同样的作用, 因为这些税收不会比对国内产品和资产的征税更不得人心。如果我们想到, 英国在其革命时代走过了一条相对平稳的道路, 而欧洲大陆许多地区在革命过程中都遭遇了巨大的经济衰退, 如果我们想到, 英国连同它的巨大扩张的殖民帝国正是从那一时期开始上升, 这看起来甚至更有意义。

因而, 对新大陆以及被弄到那里工作的非洲人的剥削所起的作用看来可能 283 在许多方面大于我们的虚拟土地数字反映出来的作用。把所有的指标合并考虑, 看来可能的是, 与欧洲内部的市场、家庭体系或其他制度的运作产生的假定高于旧大陆其他核心地区的优势相比, 这种剥削对于区分欧洲与其他那些核心区有更大的意义。在把西欧与至少是东亚的核心地区区分开来时, 一个具有同样重要性的因素看来只存在三种候选。一个是欧洲生态自相矛盾的“落后的好处”, 它留下了未开发的资源, 从而为 19 世纪提供了生态喘息余地。然而, 我们已经看到, 这些好处并没有扩展到英国(或低地国家)或扩展到一些至关重要的商品(尤其是纤维作物和木材), 它们被生态劣势抵消了。第二个可能性是英国煤矿幸运的地理位置及其与整个煤/蒸汽综合体发展之间的关系。第三个是工业革新浪潮自身——某种仍然没有完全弄清楚的现象, 并且如我们所见, 它有更为重大的意义是由于它与丰富的煤及新大陆对其他资源限制造成的缓解结合在一起。

在本书最后两节中, 我在两个方面继续穷究这一决定性的分流观念。我首先论证了新大陆对于欧洲进入 19 世纪后的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性, 简要勾画这些动因怎样随着工业革命向英国之外扩散而改变和继续。最后, 我回到中国、日本和印度, 这些地区都在不同程度上被迫采用日益劳动密集的方法对付生态压力, 并在不同程度上发现这些调整使以后实现资本密集与能源密集的工业化更为困难。由于我反复论证如果没有这里所讨论的横财, 欧洲也可能被迫走上一条更为劳动密集的发展道路, 这些最后的例证就不仅要涵盖全球的历史, 而且要最终完成 19 世纪初期是具有长期影响的分流的关键时刻这一论证——就在这一时刻, 由于我们讨论过的所有因素, 英格兰避免了

^① Bayly(1989)对商业化引起的政治危机——这些危机动摇了从北非到爪哇的穆斯林帝国——在为欧洲帝国主义的新高潮开路时起的作用作了一个出色的描述, 他还注意到这些危机和欧洲人在距家乡更远的地方发现的“国家的全面破坏”之间的一般相似性。

^② Goldston 1991。

变成长江三角洲，这两个地区终于有了如此不同的外表，以至无法看出就在多么近的时期它们曾经完全相同。

进入一个工业世界

能节省土地的新大陆的输入在 1830 年以后才有了重要增长：它们与矿物燃料的令人眩晕的进步保持了几十年的同步。英国的煤产量从 1815 年到 1900 年增长了 14 倍，^①而它输入的糖在同一时期约增长了 11 倍，^②它的棉花输入增长了引人注目的 20 倍。^③同时，英国也开始依靠美洲的谷物、牛肉和其他初级产品；木材输入剧增；最后，新大陆也成为欧洲过剩人口的一个重要出路。

当然，在 19 世纪初期，英国停止了向北美和加勒比海地区出售奴隶，它以前也从未向阿根廷出售过很多奴隶。但是到 19 世纪中叶，新技术使横渡大西洋的运费能够比 18 世纪有更大幅度的下降，其他变革（特别是铁路）造成了内陆运输的革命。这极大地加速了前面讨论过的过程，即不断下降的运输成本使欧洲移民可以通过把美洲更多地区的初级产品送回欧洲而支付他们的船票、启动资金和工业品。（一个独立的美国政府的成长——与早期追求利润的殖民地公司相比，更少关心如何收回它用于保卫和发展未开垦地区的钱——也促进了这一过程。）

到那时，也出现了新大陆的生产者想要从欧洲得到的机械类（与人力相对）生产资料，至少出现了一些对设计的专利保护。同时，廉价的运输、机械化的生产和欧洲移民带来的品味，意味着欧洲现在也能够在新大陆出售大量的生活必需品。随着资本和劳动不仅以工业品的间接形式，而且以移民和投资的直接形式大量流入，土地富裕、市场导向的美国成为人口日益稠密、工业日益发展的欧洲的一个理想的补充。

然而尽管有所有这些变化，至少英国仍然间接依赖海外高压统治为其 19 世纪新大陆资源输入狂潮中的很大一部分提供资金。事实上，甚至在它作为“世界工厂”的名声达到最高峰时，英国也几乎无法在美洲卖出足够平衡它从

① Mitchell 1988:247。

② 据 Mitchell 1988:709—711 计算。

③ 比较 Farnie 1979:7；见 Mitchell(1988:709—712)关于糖的消费和(1988:196—201)对直到 1920 年代前并不重要的国内产量的说明；以及 Bruchey 1967:表 2 A。

大西洋彼岸的进口的货物。^① 随着进口替代在欧洲大陆和北美继续发展,并最终形成也在出口市场上竞争的行业,情况变得更坏。结果是,欧洲殖民主义和海外高压——现在集中在旧大陆——继续在几十年中起重要作用,即使不像 1850 年以前那样重要。

实际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最后 40 年中,英国与美洲及大陆欧洲之间已经变得非常巨大的贸易逆差——甚至在计入运输、保险和利息支付之类“看不见的”数字之后——主要是通过和亚洲贸易的巨大盈余来平衡的。到目前为止,最大的盈余是在英国与印度的贸易中,印度的立法人为扩大了从棉布到火车头的一切商品的市场,而印度又通过向中国输出鸦片和向大陆欧洲输出在高度强迫条件下生产的诸如茶和靛青之类各种各样的农产品弥补与英国的大部分逆差。^② 与此同时,英国在继续输出大量资本的情况下维持与它的大西洋及大陆欧洲贸易伙伴的巨额逆差的能力,不止与英国的消费者有关:它也帮助下一波工业化的地区——特别是美国——能够保护它们自己的市场、在一个无保护的市场上出售产品、获得大量流入的资本。

确实,如埃里克·琼斯所说,不仅偶然踏上新大陆的任何人群(并使那里的人口减少,就像任何身带旧大陆的病菌的人会做的那样)都能像欧洲人一样利用这些陆地;并且琼斯所指的欧洲人的企业形式^③也不是这个方程式的独一无二的要素,或者是使西欧的发展凌驾于地球上其他人口密集地区之上的要素。西欧为开发和持久征服而做的组织改革,以及把企业形式和强烈的高压统治结合起来的制度改革——加上由从美洲印第安人易受天花伤害到新大陆白银的巨额供给,以及中国重新确定通货本位的同样巨大的工程,这所有事件构成的有利的全球性关联——使它们获得了巨大的优势。这又反过来使西欧获得了一种特权地位,使其可以忍耐带着多重生态挑战的“生物学旧体制”的最后一百年,甚至可以继续不断地扩大对土地产品构成巨大需求的工业部门(从纺织到酿造到铁业)。

最后的比较:劳动密集、资源和工业的“成长”

因此,当煤、蒸汽和机械化打开了巨大的新技术的潜能时,西欧(特别是

^① 见 Latham(1978b:69)和 Hobsbawn (1975:138、144—145)论贸易平衡;见 Platt(1972:4—5)论英国在拉丁美洲市场的限制。

^② 见 Latham 1978b:69—70、80、89;Farnie 1979:325;Hobsbawn 1975:149。

^③ Jones 1981:84。

英格兰)处在一个可以使它们资本化的独有的位置上。新大陆大量未开发的资源(及地下资源)就在它们的面前伸展,实际上消除了土地的制约。此外,它们在新大陆已经获得的东西意味着它们进入19世纪时的生活水平比它们在没有新大陆的情况下应该达到的水平更高,它们有加强了军事能力(这可以在某些情况下强迫开放市场,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利用垄断),手工业的规模比它们在其他情况下能够维持的规模更为广阔。最早的工厂工人正是来自于这些原始工业工人,而不是直接从农民阶级中诞生。

一支工厂劳动大军主要是从已经在原始工业中工作的人中拉出的意义在莫基尔的欧洲工业化“成长”模式中显示得非常清楚。首先,尽管有大量在农业中发现“剩余劳动”——即能够从那个部门中转移出来而不会明显影响生产的工人^①——的尝试,这样的实例即使在今天的第三世界中似乎也是罕见的;^②而我们的核心地区中没有一个在1800年前后能够经受住农业产量的大幅度下降。其次,工厂雇用以前的原始工业工人有一个明显的好处。如果工厂从农业中吸引工人,那么即使对他们的需求并没有抬高工资(换句话说,如果农业中存在剩余劳动),但也不会有理由让工资下降;当批量生产的技术扩散引起一家工厂制造的产品价格下降时,企业就会遭遇利润下降,并可能使困难不断扩大。(莫基尔假设需要的固定资本相当低廉,像工业化早期常见的一样;由于不论生产过程如何,原材料成本都大致相同,工厂的工资总额就是最重要的可变成本。)但如果初生的工业能够吸收制造同类产品的原始工业的工人,则对工厂价格施加向下压力的同样的技术扩散也压低了工人改换工作可能挣到的工资。因而工厂能够减少工资并仍然从这一部门中吸引新劳动力,这使它得以在较长时期维持较高的利润。^③

因而,在这一设定中,工业可能产生于原始工业的“成长”;它不要求一个使农业能够以大致相同的土地数量维持或增加产量并同时释放大批劳动者的同步的社会和技术变革。此外,原始工业工人通常带着某些相关技术和/或有益于进一步革新的知识进入工厂。所有这些意味着原始工业在几十年中的持续发展先于机器工业的发展并与之重叠,使欧洲所处的地位比它被迫在农业和林业中保持更多人手要好得多。

换一种稍微不同的表述方式:欧洲原始工业和许多早期机器工业的发展需要更多的农业产出。把英国(或者更一般的说是欧洲)是否能够在国内找

① Lewis 1954:139—191;关于后期的文献见 Myint 1958:317—337。

② Schultz 1964:61—70。

③ Mokyr 1976:132—164。

到足够的土地解决这些问题完全撇开不谈，为了供应这些农产品而直接追加大量的劳动都会在稍后产生进一步的问题。但实际上相反，欧洲获得许多这类供给是通过让别人种植它们，同时把它自己的劳动力变成新的士兵、水手、商人和工业品的生产者。当国内的工厂需要更多劳动力时，由于前面讨论过的优势，它们能够吸引原始工业的工人。 287

随着时间的推移，士兵和水手的人均效率由于技术变革（例如更好的枪和更好的船）而变得更高，并越来越多地被用殖民地税收雇用的“本地人”补充或取代。因而这一海外部门经历了一种它自己的“成长”过程，这意味着这种获得初级产品的方法没有吸收越来越多的欧洲劳动力。在另一种情况下会成为必然的国内农业的巨大发展，不仅遇到了生态困难，而且难以与工业劳动大军的膨胀相协调。当英国的农业劳动大军在 1850 年以后终于在绝对数量上开始下降时，它既与 19 世纪前期还不可能使用的技术相关，也与农产品输入的大规模增长相关；产量在劳动投入减少时保持了稳定，但没有较大的增长。^① 这种情况与第 5 章中讨论过的非典型实例（对欧洲来说）丹麦形成的对比非常鲜明。在丹麦，一种通过劳动密集方法近于稳定化的生态系统看来在数十年中与工业化产生了矛盾，尽管这类工作中有很多，其边际报酬——以及城市和乡村劳动者的实际工资——较低并不断下降。^②

在一个长时期中，中国和日本像作为一个整体的欧洲一样，也找到了保持它们的原始工业不断发展的方法，尽管没有一个新大陆为它们提供必须的纤维和其他土地密集品的输入。这些过程还包括可以缓解核心地区对土地的地方性压力的某种贸易（和渔业）的扩张；但与欧洲的解决方法相比，它们需要它们自己的农业部门更强烈的密集和更大的扩张，特别是纤维生产。到 18 世纪末，这一过程看起来以逐渐降低的速度和相当大的生态代价在继续。日本人口在 1750 年停止了增长，而尽管中国的人口继续增长了一百年，原始工业人口的百分比却可能是停滞甚至下降的。很可能中国仅有的有过大规模原始工业的地区实际上经历了逆工业化过程。而真正发生的情况是，中国以农业为主的地区所占人口百分比在 1850 年比在 1750 年大了很多。

长江三角洲上经济最发达的府州 1750 年约占中国人口的 16%—21%， 288
到 1850 年勉强占到中国人口的 9%，1950 年约为 6%。如我们即将看到的，这些府州在原始工业中工作的人口的百分比可能略有下降，但无论是否如

^① Thompson(1989:189)指出每个农业劳动者的粮食产出在 1840 到 1900 年代初期增长了约 50%，但农业劳动者的数量减少了 25%，使总产出净增长了 12.5%。此外，即使是这些增长也还需要大量应用农业以外部门生产的供农业用的化学制品和其他产品（见 193—199）。

^② 见 Kjaergaard 1994:160 关于工资趋势。

此，这个清代原始工业最发达的区域在总计数字中再也没有同样的分量了。在岭南，原始工业第二发达的大区，1750到1850年间人口增长了约75%，但全中国的增长率约为100%；此外，岭南的增长中广西所占的比重非常之大，而这是一个主要限于农业和林业的省份。

因而，尽管在以农业为主的大区中有一些正在发展更多的原始工业，它们在1750年以后人口增长中所占的巨大比重意味着中国作为一个整体在1850年至少与1750年同样是一个农业国，1950年也同样如此。此外，分散在内地农村中，通常被视为一个理想的农业家庭组成部分的原始工业工人，不像与土地脱离联系的真正的无产阶级那样能够方便地转移到设想的工厂中去。因而，在1750年之后的大约两百年中，对于沿着比较容易的“成长”道路实现工业化，中国日益处于更为不利的位置上，不得不设法应付从农业中直接吸收它的大部分工厂工人造成的所有问题。

尽管如此，对于并非所有的早期工业化地区都有巨大的原始工业部门这一问题，美国是一个重要的启示。事实上，索科洛夫和多拉尔(Kenneth Sokoloff and David Dollar)在比较19世纪的美国和英格兰时强调，英格兰农业工作更为强烈的季节性延缓了工厂工业的发展。由于大量的工人可以在一年中只工作部分时间，而工资比他们完全离开土地所需要的低得多，手工业生产成为工厂的一个顽强竞争者，对集中的厂房、设备和监督管理的投资所获得的利益比它在农业和工业劳动者更彻底分离的情况下应该得到的少。相反，在美国，极为有利的土地与劳动之比意味着农民能够通过其他活动补充他们的谷物种植——例如牲畜饲养、伐木、种植果树和开垦土地——这些工作每英亩的收益较低但每小时的收益较高；因而农村劳动力可以充分就业而不必求助于手工业生产。所以当工厂建立时，它们能够比在英格兰(特别是英格兰南部种植谷物的手工业地区)发展得更为迅速。^①

289 这个观点对于英格兰和美国这两个案例是有说服力的。但美国的情况与我们欧亚大陆核心区的任何情况都有着根本的不同。极为有利的土地与劳动之比意味着美国农业能够在一支独立的工业劳动大军产生后(无论是来自国外移民还是迅速的自然增长，亦或是由农村向城市的移居)不费力地供养它。它也意味着这些农民即使不从事工业性副业，也富裕到买得起工厂产品，即使这些产品是使用相当昂贵的劳动制造出来的。同时，远距离和关税也帮助保证了通常使用较为廉价的劳动力生产的欧洲工业品没有占领所有的美国市场。

^① Sokoloff and Dollar 1997, 1-20.

由于这些具体条件，必须在前农民（无论是来自马萨诸塞、爱尔兰还是德国）中找到它们的劳动力的美国工厂仍然——与“成长”模式相反——可能比英国工厂发展得更为迅速。而在 18 世纪的旧大陆，很少有地方能够在既不提高当地的农业产量又没有通过生产工业输出品换来初级产品的情况下容纳人口的巨大增长；在旧大陆核心地区的农村人口没能用于原始工业的地方，这更可能是由于劳动高度密集的全年多季作物（例如在岭南地区），或者为保护脆弱的生态环境投入大量的劳动（例如丹麦的掺泥灰、挖沟渠之类），而不是在 19 世纪的美国农田中可以看到的各种各样赢利但土地密集的副业。

所以，旧大陆的核心区不能用美国那样的方法产生一支工厂劳动大军。对它们来说，选择只在于是把人力从专业的原始工业中拉出来，还是从至少兼职务农的人口中拉出来。因此，能够吸引原始工业的工人看来一直是创造旧大陆工业劳动大军的最有利的方式。这使英格兰的处境远远优于长江三角洲之类的地方，后者缺乏能像英格兰的外围贸易伙伴那样对其作出补充的贸易伙伴。

这个观点也可以用莫基尔的欧洲工业化“成长”模式的另一个特征表述出来。这一模式假定，当农业的边际劳动生产率下降到低于原始工业的边际劳动生产率时（前者比后者起点更高但下降得也更快，主要是因为土地的供给有限），人们首先转向原始工业部门。因而，只要所谈的区域能够继续输出原始工业产品交换食品（我们还可以加上纤维和木材），同时不影响食品和手工业品在进行这些交换的“世界”市场上的比较价格，超出某一点的剩余劳动将全部进入原始工业。

这个条件通常被称之为“小国假设”，对尼德兰和比利时是合适的，莫基尔正是在这些场合揭示了这一模式——在某一点上它也适用于长江下游和岭南，以及关东和畿内地区。尽管如我们所见，长江三角洲各府州输入了数额巨大的初级产品——3600 万人口输入了其口粮的 15%—22%，再加上木材、豆饼肥料等等——它们凭借的腹地和市场网络如此庞大，以至小国假设作为一种观察 18 世纪中叶这一地区贸易的方法仍然适用。但随着这些腹地中的一些——诸如长江中上游和华北——人口日益稠密，经历了农业报酬递减并发展起更多的自己的原始工业，贸易条件确实向着明显不利于原始工业生产者的方向转变。

尽管用银两表示的棉布价格年与年之间时有起伏，从 1750 到 1850 年间

棉布的名义价格似乎并没有什么趋向。^① 广州的原棉价格——对此我们有比较充分的数据——也显示出没有明显的倾向,尽管短期的波动经常很猛烈。^② 但在这同一个百年中用银两表示的长江下游稻米价格上升了40%。^③ 仅仅这一项增长就会使第2章中推定的妇女纺织收入下降约30%,从1750年的7.2石稻米减少到1850年的5.0石。

此外,岸本美绪收集的零散数据表明,就在长江下游,原棉价格在1750到1800年间也有实质的上涨。这样一个发现是与广州一带的价格无倾向一致的,因为这两个区域间的运输成本在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初期急剧下降。它也符合17世纪的模式,在17世纪,长江三角洲的原棉价格看起来大致是跟着稻米价格走的。^④ 如果岸本美绪的数据大致代表了江南,那么纺工和织工收益的下降在1750到1794(她的数据截止时间)年间就下降了约50%,尽管它们是从一个比较高的起点开始下降的。如果我们相信原棉的价格趋势在很长时期中追随着稻米的价格趋势变动,我们假设的纺工兼织工的稻米购买力在1750到1800年间就下降了25%,到1840年下降了37%。^⑤ 用盐或者木柴来衡量,它们的下降幅度甚至更大。

甚至这些下跌了的收益仍然能够满足妇女本人的维生需求,并与男性农业工资(用实际工资概念衡量也在下降)接近到足以使中国的“性别差距”不如欧洲那样严重。但它们确实表明甚至在机织布的任何竞争出现之前,基于家庭的纺织生产的收入就有了实质性下降。一个生产最高级棉布的妇女会避免这些压力,因为它的价格在这同一百年中几乎翻了一番,^⑥但这些妇女是非典型的,她们有特殊技术,并且每年生产的布匹可能更少。

291 在莫基尔的模式中,长江下游原始工业劳动收益的这样一种下降应该至少导致一些劳动力以从前无法接受的低工资返回到农业中,从而引起农业进

① 张忠民 1988:208。

② 见 Dermigny 1964:IV:表 19。

③ 王业键 1992:42、45。

④ 岸本美绪 1997:139、141;Greenberg 1951:92;Dermigny 1964:IV:表 19。更详细的内容见附录 E。

⑤ 更详细的内容见附录 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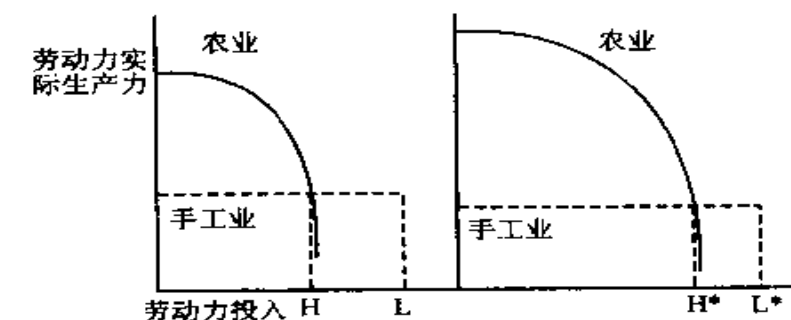
⑥ 张忠民 1988:194。

一步集约与某种程度的逆工业化的结合。^① 尽管任何这类转变都会是微小的，我们仍然有一种能够代表它的指标。在 19 世纪初的广州，来自长江下游的原棉看起来更便宜也更多，令把印度棉带来出售的商人非常沮丧。尽管价格下降可能主要是运输条件改善的关系，^②数量的增长也暗示出长江三角洲的棉花留在本地供纺织的或许比以前少；这一时期长江下游的原棉产量似乎不可能有很大增长，从华北的输入也几乎肯定在下降。

但是，长江三角洲大多数妇女继续从事纺织，即使收益更低；事实上，如我们早先所见，正是在 19 世纪，提及这一地区妇女与男性一起在田间工作的史料最终完全消失。^③ 如果一些家庭不愿意让他们的妻女们回到她们更容易被别人看到的田间工作——或许甚至尽力增加棉布产量以维持收入——这种情况可能最终会与戈德斯通描述过的半内卷化的情形相似：妇女固着于工资非常低的基于家庭的纺织工作，使预期的基于工厂的纺织业生产利益更低。这一时期出现的任何这类模式都是一种暂时事态的结果，而不是以永恒规范为基础的中国长期发展的一个根本特征（如黄所认为的），它出现得太迟以至无法成为工厂不发展的根本解释，如戈德斯通所说。^④ 尽管如此，它可能有助于延缓家庭纺织业生产被工厂生产取代，即使是在出现了可以应用的技术时，如戈德斯通后来在他的论文中提出的。无论哪种情况，这些妇女都仍

292

① 如果画成曲线，这一关系看起来大体如下：



Time T=1

初级产品相对价格上升之前

H, H* = 劳动力转入手工业之点

L, L* = 劳动力总投入

$L - H, L^* - H^*$ = 用于手工业的劳动力

Time T=2

初级产品相对价格上升之后

② Greenberg 1951:91—92.

③ 见李伯重 1996, 和上文 103—104 页(指本书英文本页码)。

④ 如我在第 2 章和其他地方说明的，这种具体的不发展显然并不需要很多解释——它在中国和其他地方都面临许多阻碍，而比较“自然”的道路似乎是原始工业化的潜力完全耗尽。需要解释的是为什么欧洲各地没有同样走上这条道路——所以欧洲可以被视为没能成为中国（或英格兰没能成为佛兰德），而不是整个世界没能成为英格兰。

然是家庭的组成部分——在这种家庭中,男性(某些情况下还有儿童)被迫在耕作、收集燃料和土地修治方面实行日益集约化的劳动策略——没有出现工业化的未来先兆。

日本对类似压力的反应保持在与中国同样的基本框架中,但有一些差异可能具有长期意义。首先,日本人口突破其历史最高点后不再回落的时间比中国或欧洲都早。人口在17世纪后期达到了新的高度,当时欧洲和中国都处于低迷时期,约在1720年它达到了一个稳定的水平,一直持续到了1860年前后。^① 这样长时期的人口零增长,与19世纪早期中国缓慢但仍然绝对增长的人口相比,可能代表着一种对生态制约更为迅速而彻底的人口调整,但也可以认为这种调整更强烈是由于情况实际上更恶劣;毕竟,总的说来日本人口密度甚至在1860年前后仍然远远高于中国。^② 尽管日本海洋渔业巨大增长提供了一种中国很少利用的缓解方式(它既提供食品也提供肥料),系统的森林学的初期发展也成为重要的调整,^③日本同样面临对其核心区域原始工业进一步发展的严重障碍。

1730年代,农产品价格相对于工业品价格急剧上涨,然后,直到1820年代后期它们开始又一次急剧上升之前,没有明显的倾向;1735—1825年的一般流行水平约比1720年代中期的高峰高20%左右,比1730年的波谷几乎高50%。^④ 我在关东或畿内都没有看到与相对价格变化相适应的逆工业化迹象,但这些地区的人口确实减少了;1751到1821年间关东减少了16%,畿内可能是5%,而同时人口增长明显的行政区主要位于那些直到1870年人口一直相当稀少,斋藤修的农村工业化指标也一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区域。(相反,畿内地区的人口密度和农村工业化指标都双倍于全国平均水平。)^⑤ 我们已经看到工业和人口的巨大增长发生在如土佐这样的贫穷藩国,这里旧的独占权正在放松;但很多这类独占权仍在继续,就像对移居的阻碍那样。与中国相比,这些对外围地区发展的阻碍可能使对家庭限制的压力蔓延到更多的外围地区(尽管任何比较都是用当代的数据推测的),最终保存了一些大陆欧洲很多地区都有但中国没有的同样的闲置能力。换一种方式表达,日本最发达地区在全国总量中所占的份额是下降的,像中国的情形一样,但程度要轻得多,因为外围地区的增长更小。劳动密集度提高了,但这几乎完全是由

① 斋藤修 1985:185。

② McEvedy and Jones 1976:166—171,179—181;特别注意日本可耕地的低百分比。

③ Totman 1989:81—170;Howell 1992:271—275。

④ 斋藤修和新保博 1989:91。

⑤ 见斋藤修(1952:211)和与石横胜(1981:440)的比较。

于每个劳动者工作时间的增加,而不是人口的增长。尽管城市和集镇与农村相比是在衰落,^①这个国家仍然相当高的城市化比率也意味着与中国的情况相比,莫基尔称之为“虚假的剩余”劳动力中有更多的部分积淀在(与农业相对的)手工业中。

正像我们所预期的,印度的历史再度不同,但它在同样的一般性框架中仍然适用。此外,印度与中国的差异指向了与日本的差异相反的方向,并显示出对工业化更严重的长期阻碍。印度,如我们所见,其人口膨胀比中国或西欧开始得晚,比日本则更晚:几乎肯定在1800年之后,很可能在1830年之后。^②印度19世纪出现了耕地面积的巨大增长,几乎没有食品、燃料、纤维或建材严重全面短缺的迹象。(当然,分配状况完全是另一种情形:例如,印度在19世纪后期输出大量的粮食,而国内却有严重的饥饿现象。)但尽管沦为殖民地前不久发生的商业化得到延续,印度人口在非农业部门中就业的比重在英国统治的初期可能下降了。随着以前的流浪人口和以前的手工业工人都被越来越多地拉进——和推入——定居的农业工作中,这个次大陆经历了贝利称之为“农民化”的过程。这一过程看来是在殖民主义之前就开始了,部分是由于争夺莫卧儿帝国继任地位的政府希望流浪人口在土地上定居会加强政府的控制、公众的安全、并增加政府的税收;它在英国人的统治下加速,²⁹⁴并涉及到数量不断增加的以前的城市人口。^③

对印度是否在19世纪发生了逆工业化发生过一场激烈的争论;由于资料不足,这一问题不可能得到解决。^④尽管如此,看来全职织工和纺工(特别是那些以市镇为基础的)的数量在18世纪后期有明显减少是相当明确的。这看来首先是由于东印度公司和其他一些商人采取的措施(特别是在孟加拉),他们日益使织工隶属于一个单独的买主;由于这种做法压低了收益,许多手工业者放弃了他们的职业。^⑤此后,与兰开夏的竞争对收益造成了进一步的强烈压力。^⑥印度在城市中生活的人口百分比在长时期中明显下降——从17世纪后期的13%—15%降到了1881年的9.3%——尽管现在无法确定

① 杉原薰 1997:153。

② Moosvi 1987:402,405; Subrahmanyam 1990:358—360; Habib 1982a:166—167; Visaria and Visaria 1983:463—465。

③ Bayly 1983:219—226,290—292; Bayly 1989:188—189。

④ 见 Bagdhi 1976; Vicziany 1979:105—143; Bagchi 1979:147—161; Perlun 1983:89—95; Harnetty 1991:455—510。

⑤ Hossain 1979:325—335; Mitra 1978:23,25,29,32,37—38,48—49,56,79—80,84,87—92,132,144,164,172—173。

⑥ Harnetty 1991:463—466,505—507; Mitra 1978:188,194—195。

下降的比较准确的日期。^① 哈比卜发现 1595 到 1870 年代之间印度生产的糖、棉花和靛青价格的绝对值极可能是下降的(更不必提人均数字)^②,这一发现也暗示了逆工业化过程。

尽管印度棉纱和棉布的总产量可以坚持下去,但由于农村兼职纺工和织工的增加,这对未来工业化的意义与全职的原始工业劳动力增长不会相同。这些人以后不能在不牺牲农业生产的情况下进入工厂;^③他们也不是那种一个未来的工厂主为他们支付的费用会与其产品的单位价格共同下降的工人,因为他们收益中有一大部分来自农业。

因而,可以认为,尽管印度以一种铸币化程度低于中国、日本或西欧的经济开始了 19 世纪,它却一直沿着同样的方向前进,并比它们有更多的生态空间供人口增长和人均消费。但是到 20 世纪初,它失去了这一优势,同时却既具有一个人口稠密区域的劣势,又具有一个原始工业发展有限国内市场亦有限的区域的劣势。这些问题综合在一起发生,与其说是通过导致中国进入死胡同的(主要由)市场驱动的那种区域性发展,不如说是通过殖民地(以及在某种程度上本地的)当局对人口定居的偏好、“习惯”法、农产品和林产品的输出以及一个由宗主国工业品占领的市场。结果是,甚至在巨大的人口增长中初级产品的输出仍日益重要——生产初级产品的劳动力通常并不比 18 世纪印度最不自由的区域更少受强迫(还可能更多)。^④

所以,尽管农业和商业都有可观的发展,印度仍然可能处于对引起工业变革的发展来说相当不利的地位。比较一下如果 18 世纪的社会趋势继续的时间长一点,同时人口增长和与机制品的竞争来得稍晚一点至少可能发生的事情,殖民地印度的“农民化”形式可能有理由归类于一种“不发达的发展”。英国人或许并没有像一些民族主义学者声称的那样阻挠一个本来非常可能发生的工业突破,但 19 世纪的变化可能使这样一种突破比它在另外的情况下更为困难,也比西欧经济或东亚经济面临的过渡更为困难。换句话说,日本以及特别是中国的核心区域可能由于它们的外围地区向“核心”形态聚合而面临瓶颈,但印度的核心区却遭遇到更坏的命运,它们向一种比较外围的形态聚合。

因而奇迹就在于,大约与“小国假设”变得不适用于东亚核心区同时——主要是由于其外围区域的人口增长和原始工业的发展正在使能够供给它们

① Habib 1982a: 168—169。

② 同上。

③ 关于印度农业甚至在 20 世纪仍缺乏真正的“剩余劳动”,见 Schultz 1964: 61—70。

④ 实例见 Bayly(1989)关于茶叶种植。

的“世界”市场的初级产品数量与它们的需求相比变得更少——同样的假设仍然适用于英国，尽管它的人口剧增同时人均需求增长（开始时缓慢，然后约在1840年以后非常迅速）。此外，它在接下来的一百多年中不但一直适用于英国，而且适用于一个空前巨大的“工业欧洲”。如果没有这一奇迹，更多的人口、更高的人均消费和劳动密集程度低得多的土地修治的结合——所有对“欧洲奇迹”重要的东西——都是不可能的。如果没有这一奇迹，欧洲前工业市场经济的成就——尽管令人印象深刻——可能会与其他地区同样令人印象深刻的市场经济走向同样的方向。如果没有这一奇迹，甚至那另一个奇迹——构成“工业革命”初期历史的一连串的技术变革——完全可能缓慢到像是爬行。

这一奇迹可以部分地由西欧自己的“落后的好处”来解释，如第5章中讨论过的：由于制度性障碍留下了未经开发的国内资源，而这些制度性障碍只有在19世纪才能松解，并且到那时为止使一些正在工业化的领域的输入需求没有变得更大。但如我们所见，这种观点几乎不适用于英国，也不适用于纤维和木材。技术性的提高——例如每英亩的产量——也有帮助，但它几乎不可能单独解释欧洲领先于地球其余地方的浪潮。当然，欧洲的木材问题通过煤获得了实质性的缓解，但在相当长的时期中，这只适用于英国和其他几个地方。而且，即使在煤得到大量使用的地方，木材的总需求仍在不断上升，因为木材还有很多其他用途：木材输入在18世纪后期继续上升，并在19世纪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速度。（尽管煤，如我们所见，通过它与蒸汽机、铁路等等的联系也达到了新的水平。）

296

因而，要对欧洲核心区所发生的事情作出一个比较完整的解释，我们还必须观察它的外围区域，并弄清为什么它们成为“世界”市场上初级产品扩大的而不是收缩的供应者。这个答案一部分要依赖在东欧和俄国长期抑制人口增长的制度安排和在中国内地及日本的区域II发生相当迅速的那种原始工业化——更多的“落后的好处”，但这些好处直到1860年以后才可能大范围的收获。这个答案的其余大部分——以及使欧洲越过原始工业的第一个百年到达工业变革的桥梁——如本章所证明的，要依赖新大陆：不只是依赖其大自然的恩惠，而且依赖其独有的制度和关联，比单纯斯密型贸易能够把它的更多恩惠更早的带给欧洲。

制度性因素中包括一些——像奴隶贸易和矿山劳动体系——明显背离市场原则的因素，并且我们常常过于迅速地把它们归之于一个“前现代”世界，忘掉了它们在造就我们的世界中所起的作用。其他一些因素，如股份有限公司，是常见的、“现代”的、并明显起源于欧洲的。所以，我们总是忘掉它

们是由欧洲以外的冲突所创造，并为了欧洲以外的冲突所创造的。它们在很长时期中可能具有的最大意义是作为一种保证暴力行动所需要的庞大的固定资本的手段：从而是一种迫使这些企业增加“异国情调”的输入品数量（而不是仅仅集中于利润盈余，如威尼斯人和葡萄牙人常常做的那样）的手段，并由此而扩大了欧洲人在海外的势力。还有一些众所周知的因素，如专业化的奴隶种植园，但本书用一种新的见解确定了它们在为欧洲创造一种新的外围时的作用。在这些制度之外是各种各样有利于欧洲人在新大陆扩张势力的全球性关联：从风的模式和疾病的传播，到欧洲政府间的竞争与中国的白银需求。

所有这些主要在欧洲以外的非市场因素在使越过大西洋的贸易成为一条独一无二的自我膨胀的道路方面都是至关重要的，欧洲（特别是英国）通过这条道路能够把它的劳动和资本用于释放其严重紧张的土地，从而甚至把（与东亚不同）远远超过农业发展速度的人口膨胀和原始工业的膨胀变成一种供进一步发展的资产。没有这些因素，这种人口膨胀及原始工业的膨胀可能会成为一个后来的大灾难的基础；它也可能由于初级产品价格 19 世纪的上涨而停止；或者可能由于必须使用更多的劳动密集手段开发和养护有限的土地基础而受到严重限制。

所以，在解释为什么其他方面并无异常的西欧核心地区取得了独一无二的突破，并成为 19 世纪新世界经济的有特权的中心，能够以前所未有的生活水平供养飞速发展的人口时，市场以外的力量和欧洲以外的关联应该占据重要地位。我们进行地区间比较的漫长的旅程至少为我们以之开始的方法论问题带来了一些解答：它说明，与其说我们有理由追寻工业化前夜真正独立的实体之间的差异，不如说我们更应该了解先前已存在的关联在使这些差异产生时起的重要作用。

A 人均陆地运输能力的比较估计： 1800年前后的德国和印度北部

301

尽管水运有很大的成本优势，但在很多前现代经济中绝大多数商品是通过陆路运输的；水路常常根本无法利用，或者在到达和离开岸边前后需要走很远的陆路。然而几乎不存在对任何前工业经济实际的或可能的陆路运输货物量的估计。

一个珍贵的例外是维尔纳·松巴特在《现代资本主义》(*Der Moderne Kapitalismus* 第2卷,第1部分,339—341页)一书中对德国1800年前后情况的推算。他依靠的是1846年在德国海关同盟范围内陆路运输和旅行所用马匹的一个统计,他认为这个统计略低于1800年使用的马匹数(因为开始修筑铁路应该使拥有马匹的欲望逐渐下降)。然后他乘以一个每匹马能够负担的合理的载重量和每天行走的距离,并假定每年250个工作日。(这最后一个假定未作描述,更不必说解释,但它对调整他的数字来说却是必需的。)结果是每年50 000万吨千米或每年32 500万吨英里。

在最近的一篇论文中,哈比卜估计印度北部的班贾拉斯(*banjaras*,赶着牛群流浪的种姓,他们为别人运货,有时自己也成为商人)的陆路运输能力为每年82 100万吨英里。^① 尽管哈比卜的一个关键变量数字——班贾拉斯的牛群的规模——根据的是非官方观察家的粗略推论,而不是调查统计,但它看来可能是过于保守了。

此外,哈比卜的估计是根据每年大约115个工作日——不到松巴特的数字的一半。班贾拉斯没有固定住所,牛群为了到处寻找食物需要不停地转移——正是由于它们沿着大路放牧并且很少吃购买的食物,它们才成为一种非常廉价的运输工具,出于同一理由,哈比卜假定它们每天只能前进六七英里。因而,哈比卜的工作日数字——为了尽可能保守而作的选择——对我们

^① Habib 1990。

的比较来说似乎过低。为了估计运输能力,我们完全可以不去估计工作日的数量和比较每天可以运输的能力。我选择了另一种方法,使结果略微(尽管只是略微)向有利于德国的方向倾斜:假定松巴特的工作日估计数是合理的,同时把哈比卜的数字加倍,以使它大致体现每年 230 个工作日(而德国是 250 个)。哈比卜的数字变成了每年 164 200 万吨英里,即松巴特数字的 5 倍多一点。能力比较中一个最后的不确定性是松巴特没有具体说明是英吨还是公吨——如果他指的是前者,那么印度北部的数字就需要进行调整再增加 10%,从而使它达到了德国数字的 5.5 倍。

最后,我们需要除以人口。这里的数字也是粗略的,但我们可以确定合理的范围。麦克伊迪和琼斯(McEvedy and Jones)给出了后来成为德意志帝国的地区在 1800 年的数字(因而与松巴特所依据的关税同盟马匹统计涵盖的地区大致相同)是 2400 万;^①尼珀代(Nipperdey)给出的同一时期和地区的数字是 3000 万。^②对印度的估计变化很大:《剑桥印度经济史》列出了整个次大陆 1800 年的一系列估计,在 13 900 万—21 400 万之间。然而这些数字中的大部分在 17 000 万—19 000 万之间。^③如果减掉印度南部班贾拉斯活动区域之外的约 2000 万人口,^④我们的范围是 15 000 万—17 000 万,在德国人口的 5 到 7 倍之间,由 5 到 5.5 倍的陆路运输能力为之服务。

这意味着德国的人均陆路运输能力可能高于印度北部,但并不高很多。此外,我们的数据可能向着对印度不利的方向倾斜。班贾拉斯专门从事远距离运输,这意味着我们遗漏了用于向本地市场驮运货物和其他短途旅行的畜力运输;在一个前工业经济中,这类旅行可能占了陆路运输量的大部分。相反,松巴特计算了所有运输用的马匹,明确地包括了那些主要用来载人而不是货物的马匹。在数据不确定的条件下,最终的比较是不可能的,但看来可能的是,运输能力大致相同——并且两地都有大量可以使用的能力未经利用。

① McEvedy and Jones 1978:71.

② Nipperdey 1996:85.

③ Visaria and Nipperdey 1983:466.

④ Subrahmanyam 1990:360.

B 18 世纪后期华北和欧洲 农场使用的肥料估计,及 由此产生的氮循环量的比较

来自满铁调查的 20 世纪的数据(这些数据在其他方面看来都是准确的)列出的比较贫穷的华北村庄中每播种亩施肥量在 1800—2000 斤之间;我据此作出了 1900 斤的估计。在一个比较发达的华北村庄,满铁的数据是每播种亩施肥 3000 斤。^① 换算成每英亩千克为 6600—10 600 千克/播种英亩。

为了把这些数字回推到 18 世纪后期,我假定在一个只有很少耕畜的经济中,^②猪和人是最重要的肥料来源;我进一步依靠珀金斯关于中国肉猪数量大致与人口数量趋势一致的估计。^③ 利用黄宗智汇集的河北和山东 1790 及 1933 年的人口数字计算,^④18 世纪后期的肥料供给应该为 1930 年水平的 60%左右。

但 18 世纪这些较低的肥料供给是用在比 20 世纪更少的播种土地上。用黄 1753 到 1812 年的数字(无论如何它们是非常接近的)中间的一个数字,把它们与他 1933 年的数字比较,得出了一个系数 1.4。^⑤

计算结果是 5600—8900 千克/播种英亩,高于斯利赫·范巴斯(Slicher Van Bath)的 18 世纪后期欧洲 4000—5600 的数字;^⑥而所讨论的“欧洲的”数据极不均衡地来自尼德兰、莱茵兰、英格兰和法国。看来可能的是——尽管无法证实——华北肥料的质量等于或好于欧洲的肥料。

从农作物产量和施肥水平过渡到土壤养分本身的发展趋势是一种极不严密的做法。一定数量的肥料——或者,甚至更重要的是,大豆之类的固氮

① 全部数字引自黄宗智 1985:147—148。

② 见上书,138—154。

③ Perkins 1969:71。

④ 黄宗智 1985:322。

⑤ 同上,327。

⑥ Slicher Van Bath 1977:94。

304 作物——可以使土壤中一种具体的养分增加多少取决于许多因素,包括一些我们不可能知道的。影响这些事情的地方性状况如此之多,以至即使对今天的情况最好的估计也是宽泛的范围而不是数字;举一个极端的例子,每公顷土地种一季大豆据说可以固定 15—331 千克氮(kgN)。^① 尽管如此,利用有记载的诸如一吨具体作物增加的氮含量之类重要参数的平均计算结果,还是可以对西欧和中国由农业产生的氮循环量进行某种有用的比较。氮是一种可以成为分析重点的合理的元素,因为它是植物三大“重要营养”成分之一。另外两种中的一种——磷——的水平常常与氮的水平密切相关。第三种,钾,在分析上甚至更为困难:一种土壤中可能存在大量的这种养分但却不能被植物吸收,而迄今为止我们对为什么会如此几乎一无所知。^② 此外,由于氮不能以大多数植物可以利用的形式在土壤中长期积存——除了通过种植固氮作物——氮循环量相当经常地成为前现代土地生产力的限制性因素。^③

作了这些防止误解的说明后,我使用彼得·鲍登(Peter Bowden)对各种参数的估计,^④把一个重建的“典型”华北农场与一个模拟的英国农场作了比较。在大多数情况下,英格兰更像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长江下游或岭南地区,但小麦和水稻之间的生态差异是个无法解决的问题。使用华北的资料我们至少是在比较同类的作物,从而可以选择一种具体的估计,比如说由生产一吨小麦引起的氮的损耗,而不致歪曲案例之间的比较。我假定这个华北农场采用两年三熟的轮作制,种两季小麦和一季大豆,这是一种典型的安排;至于英国农场,我假定每年一季,两年种小麦之后种一年固氮的三叶草作物。

一季小麦生产每千克麦粒和与它同时生长的麦秆大概要从土壤中吸收大约 0.0234 千克氮。^⑤ 即使麦秆经过翻耕回到土壤中,但——正像典型情况下发生的事——在这个过程中至少损失了麦秆中一半的氮,^⑥因而欧洲的耕作方式使每千克小麦吸收 0.0214 千克氮。至于华北,我假定土地失去了全部残余物,尽管这是一个夸大的假定,这样生产每千克小麦失去的氮就是全部的 0.0234 千克。

英国 1770 年代的小麦平均产量为每英亩约 23 蒲式耳。^⑦ 以 8 蒲式耳为

① Smil 1985,140。

② Smil 1990,429。

③ Kjaergaard 1994,22,58,87。

④ Bowden 1990。

⑤ 根据 Smil(1985,174)的每公顷数字,根据 Smil(1983,203)中多少不同的资料作出的推测产生了大致相同的数字 0.209 千克氮/千克小麦。

⑥ Smil 1985,218。

⑦ Bowden 1990,197。

一夸特,^①5 夸特为一吨,^②这个数字换算为 523 千克/英亩。18 世纪后期华北的直接数字极难获得。尽管如此,1930 年代的一个合适的估计是每亩 100 斤;^③加上那一时期华北每亩麦田残余物数量的数字(按照《山东的家畜》是 140 斤^④),也使我们得到一个非常实际的麦—草比率。如果我们采用珀金斯 305 的观点,即人均粮食产量没有改变,回推 1800 年的数字,按照当时耕地和人口的已知(近似)趋势,把每亩产量调整到使这一观点成立,我们得到的 1800 年的数字约为 306 千克/英亩。^⑤所以在 6 年的周期中,我们的模拟英国农场生产了 4 季小麦共 2092 千克/英亩,华北的农场生产了 6 季小麦共 1816 千克/英亩。(值得注意的是一旦把三季大豆的收获加入到华北的产量中,它就成为一个总体上比英国农场好得多的粮食产区,尽管在中国人的眼光中华北是一个相当差的粮食产区。)

英国农场的小麦在 6 年中应该从每英亩土地中吸收 44.77 千克氮;中国农场的小麦吸收了 42.49 千克/英亩。我们现在可以转向补充措施,从施肥开始。

当代的数字显示,从牲畜粪肥中进入土壤的氮约为鲜重的 0.9%,其中一半或一半以上在施用到土壤中后由于挥发而损失。^⑥如果我们把这些数字应用到 18 世纪后期,它应该表现出英国和华北的农场即使没有固氮作物也都能轻而易举地补充它们失去的氮,但这看来是不可能的;两个地方(以及实际上几乎所有地方)的农民都认为轮作制对维持高产是绝对必要的。至少有两个理由说明为什么这些 20 世纪后期的数字对 18 世纪后期来说过高。首先,它们来自用商品饲料喂养的牲畜,这些饲料比从前的牲畜所吃饲料有更高的营养。其次,上面的数字是新鲜肥料。肥料如果不立刻施用,就会迅速丧失价值,^⑦但节省劳动的考虑意味着在中国和欧洲,肥料在施用之前都要堆积相当一段时间。事实上,在英国一些农场中,习惯做法是平均一年不到一次在土壤上施放厚厚的一层肥料。^⑧

所以,从肥料中得到的收益肯定比 20 世纪的计算所表示出来的低很多,而我们不知道低多少。但无论绝对水平如何,相对看华北的农场在这一方面

① 同上,373,表 48,注 a。

② 同上,32。

③ 见 Perkins 1969:267,270。

④ Minami Manshu Tetsudo Kabushiki Kaishi 1936:33。

⑤ 见附录 C 和 Pomeranz(1995)更多利用珀金斯的数字把农业参数的估计从 1930 年代回推到 1800 年。

⑥ Smil 1983:333—334,336。

⑦ 同上,335—336。

⑧ Slicher Van Bath 1977:94—95。

可能都更为优越。如我们所见，它们不仅每英亩多施了60%的肥料（按重量计）而且施肥次数较多，所以堆积过程中损失的养分可能较少。最后，中国大部分家畜粪肥来自猪，而英国的大部分肥料来自奶牛或肉牛。至少在今天，猪产生的肥料明显更好：氮含量为2.0%—7.5%（以鲜重计），而肉牛为0.6%—4.9%，奶牛为1.5%—3.9%。^① 以比较短的间隔施用较多的质量更高的肥料，中国的施肥方式比英国的施肥方式应该对土壤更为有利。

最后，我们来看固氮作物。在华北，这类作物通常是大豆；在英格兰是豌豆、菜豆或三叶草。三叶草是一种比豌豆或菜豆好得多的固氮作物；在现代条件下，大多数三叶草品种的根瘤菌可以固定24—94千克氮/英亩，不同品种的平均数为每英亩60千克左右。这个平均数略高于大豆，后者为48千克氮/英亩。^② 然而，由于我们假设的中国农场六年中种了三季大豆，而英国农场种两季三叶草，平均性能的比较再度偏向于中国的农场（每六年144比120千克氮/英亩）。

这一比较受到很多不确定因素的困扰，但它至少再一次显示出没有理由假定中国的情形更坏。以豌豆或菜豆而不是三叶草作为轮耕作物的英国农场情况可能更不好；普通菜豆当代的数字是12年平均4—26千克氮/英亩，豌豆为22年平均7—31千克氮/英亩（尽管小扁豆多少高一些，蚕豆还要更高）。^③ 斯米尔对菜豆产量的估计是，一季作物的中等产量为每英亩约0.56吨^④——再一次有很大的变化范围——但鲍登发现的实际的英国农场菜豆产量数字三年中有两年是每公顷13.4—15蒲式耳（1737和1738年；第三个数字来自一个所有有记载的作物产量都反常高的年份[1671]）；^⑤按这个数字计算每英亩约为0.144吨，即当代平均水平的近1/4。如果我们按照同一个比例把固氮量折算为3千克/英亩，它就变得太低以至不能补偿种植小麦的两年消耗。（顺便提一下，豌豆、菜豆和三叶草之间的比较——后一种作物在“改良”农场中迅速推广——显示出圈地可能造成一个巨大差异的另一条途径，尽管最近的著作倾向于不同的观点。）

因而，总的说来，我们对英格兰或华北都不能作出准确的氮循环量估计。然而我们可以说，我们所有的证据都表明华北的处境并不更坏；有许多证据表明它的情况更好。

① Smil 1985, 153.

② 同上, 142.

③ 同上, 142.

④ 同上, 145.

⑤ Bowden 1990, 374—375.

C 法国、岭南与华北一个地区森林覆盖率和燃料供给估计, 1700—1850

307

华北燃料供给的估计是对鲁西南的,这是华北平原人口最稠密的一个地区。我以前曾根据相当可靠的史料对这一地区 1930 年代的燃料供给作过一个估计。(所用的基本资料和技术在 Pomeranz 1988,附录 E 中有描述。)

为了从这些估计回推到 18 世纪后期,我再度利用黄对这一时期华北人口和耕地百分比变化的估计,如上文说明过的,我没有详细数字可以用来对这些具体的县的变化进行分别估计。再一次,我接受珀金斯的观点,即中国猪只数大体随着人口数目的变化而改变,同时耕畜数目大致随着耕地面积的变化而改变。

减去大约 30% 的耕地面积,如全省范围的数字所显示的,然后需要猜测一下这些土地在耕种以前是干什么用的。我尽力压低我对燃料供给的估计,方法是按一定比例把土地分派给甚至只有微小可能的用途,这些土地只生产最少的燃料。

例如,在我对 1930 年代的估计中,有 18.9% 的土地用于建筑和道路,因而没有任何产出;这大概是一个可以由此开始的高估。由于建筑物和道路占地数量应该大致随人口和商业化而增加,假定 1800 年前后这些土地中只有 60% 用于这类用途似乎是最为合理的;但我把 1930 年代数字的 80% (15.1%) 分派给这一用途。

没有种庄稼、地面没有建筑物或道路、也不是全无用处(例如多岩石的山坡或什么都不种的沙土地)的土地需要指派给下面三种类型之一:草地、半森林或成熟的森林(按每英亩产出的能量升序排列)。华北几个世纪以来只有极少的草地,因为它除了耕田必需的役畜以外只有极少的大牲畜;根据 1940 年的一个调查,这一区域的家畜只从草地得到 7.5% 的食物。为了使我的估计保守,我假定 1800 年前后家畜从草地上得到其食物的一半:这远远高于任何野史证据所显示的数字,它要求把这一区域全部土地的 27% 分派给这一用

308

途(1930年代为3.8%)。然后我分派全部土地中还有13%是森林,其中2/3属于产量较低的半森林范畴。这是1949年以后的调查中发现的大致比例,但150年前成熟森林的比例几乎肯定更高。

最后,我再一次用珀金斯的假定作指导,把可利用的农作物残余的数量向下调整。如果用1930年代土地数量的大约70%,养育了1930年代水平60%左右的人口和牲畜,并生产出一个既不大很多也不小很多的人均剩余,那么每英亩作物的产量约为1930年代的85%;我假定每英亩同样生产了等于1930年代85%的农作物残余。我进一步假定家畜在1800年和1930年吃的一样多,农村家庭在1800年燃烧木柴和秸秆之类的技术与它们在1930年代的技术取得的效率一样。结果是一个相当舒适的燃料供给量,按照前矿物燃料时代的标准,每人每年0.62tce;由于这种计算对土地利用的估计十分敏感,改变任何一种我对土地用途的非常保守的假定,都会使燃料供给的估计值迅速上升。

对法国的计算要简单得多。由于农作物残余和草地几乎不用于燃料,我们无需关心土地利用的模式,只要注意有多少土地供给木材。为了作出一个大概的人均燃料供给估计,我直接引用了库珀(Cooper, J. P.)的1550和1789年林地的近似值:分别为1800万和900万公顷;至于每公顷可持续的燃料产量,我使用斯米尔的世界平均数字每公顷3.6吨木材(1.8tce),这个数字也用于华北。^① 人口数字——1550年1400万,1789年2500万——引自麦克伊迪和琼斯。^②

结果是1550年人均燃料供给2.31tce,1789年人均0.64tce。鉴于1550年人们使用的燃料大概并没有超过人均0.5tce,我们应该认为木材数量高于生活所需,达到了可以供其他用途的水平,它也能够以充足的数量得到:每人每年大约3.6吨木材。但是到1789年,林地每年生长的几乎所有木材都必须用来满足布罗代尔的燃料消费估计(0.5tce)。供其他用途的仅剩下了0.29吨。只是勉强高于1800年前后华北——中国本土两个森林采伐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人均0.24吨的理论上可以供非燃料用途的木材数量。亚洲开发银行(ADB)认为,人均0.33tce是人均燃料使用可以承受的最低值,而不是这里对法国和华北使用的人均0.5tce,但今天亚洲最贫穷的人大部分生活在比法国和华北更温暖的气候中,他们与18世纪的人相比,有热效率更高的炉子和房屋;很多人使用的烹调方法也比法国——即使不比华北——的烹调方法

① Cooper 1985:139注2;Smil 1983:100—101。

② McEvedy and Jones 1978:59。

有高得多的燃料效率。如果 0.5tce 对法国和华北确实都是一个合理的最低值,那么到 1800 年,两地都不可能在把很多木材分派其他用途的同时,不给部分人口造成严重的燃料危机。

然而岭南在某种程度上要比法国的情形好,尽管它在 1753 年的人口密度已经等同于法国 1789 年的人口密度,到 1853 年又大约翻了一番。有两个因素可以解释这种优势的大部分。首先,在岭南像在华北一样,农作物残余经常用作燃料。其次,由于岭南的亚热带气候和中国人使用的烹调方法,使用亚洲开发银行的人均 0.33 tce 而不是法国和华北所用的 0.5 tce 作为燃料消费的“生存”线看来是合理的。斯米尔估计今天热带村庄中最贫穷的居民烧的燃料只相当于温带贫穷居民燃料用量的 1/5;^①尽管岭南只是亚热带,我假定那里的居民需要法国人均燃料的 2/3,大概是低估了它的优势——特别是由于他们使用的烹调方法也比欧洲的更为经济。此外,为了避免过于重视这种气候差异,我使用我对法国和华北所用的同样的每公顷木材可持续产量数字,尽管事实上在比较温暖的气候中树木每年生长更多。

第一个任务是估计不同时期的林地面积。我从凌大燮提供的 1700 年前后岭南的森林覆盖率开始;^②罗伯特·马克斯认为这些估计一般说来与其他资料相符。^③凌估计广东 2020 万公顷土地中有 54.5% 在 1700 年是森林,广西的 1870 万公顷土地中有 39% 是森林。到我们有更好资料的 1937 年,广东下降到 10%,广西下降到 5%,^④同时这两个省份的人口分别增加了大约 2500 万和 1000 万。^⑤由于人口增长是森林采伐的首要动力,我用减少的森林除以人口增长数,得到的结果是广东每增加一个人大约平均减少 0.4 公顷森林,广西每增加一个人减少 0.6 公顷。(由于广东更多的采用高产的稻作农业,这个差异是合理的。)

尽管粗略,这个方法更可能高估这一阶段早期的森林采伐而不是低估它。在这一阶段的早期,仍然有足够的林地面积,所以并不需要为获得燃料甚或为建筑而砍伐超过可持续产量的树木;到这一阶段结束时,甚至维持最基本的家庭需求都使为提供木材而过度砍伐树木成为必需的,因而为剩余森林的破坏增加了一个新的动力。结果列在表 C.1 中。

316

① Smil and Knowland 1980;119。

② 凌大燮 1983;34。

③ Marks, 个人通信,1996 年 8 月。

④ 凌大燮 1983;35。

⑤ Marks 1997;280。

表 C.1 剩余森林面积(公顷)

	广东	广西	合计
1753	9 000 000	6 500 000	15 500 000
1773	8 200 000	6 020 000	14 220 000
1793	7 440 000	5 660 000	13 100 000
1813	6 560 000	5 240 000	11 800 000
1833	5 760 000	4 940 000	10 700 000
1853	4 880 000	4 700 000	9 580 000

下一步我们需要计算燃料消费维持水平(人均 0.33 tce)中有多少可以通过农作物残余来满足。为了避免过高估计可以实现的燃料供给,我作了两个极为不切实际的假定。第一,我假定森林伐光之后没有成为农田的土地既不生产燃料也很少生产家畜饲料。这一假定忽略了数量庞大的土地:马克斯估计 1700 到 1793 年间广东耕地面积中新增加的全部土地只相当于损失的森林面积的 1/6;广西这一数字约为 1/3。其余部分中有很多成为不能长庄稼的草地(特别是在陡峭的山区)^①,而那里的草有很多被收集起来供牲畜饲料和其他用途。

第二,我只计算了粮食作物的残余部分。我们不知道 20 世纪前的不同年份岭南农田中有多少用于不同的作物,但我们确实有一个相当可靠的对 1753 年当地所产粮食消费量的估计:6000 万石,即大约 93 亿斤。^② 由于稻谷(和大多数其他作物)的残余部分稍重于可食用的部分,因而我们不需要准确的面积数字就得到了一个由粮食作物提供的农作物残余的最低数字。但为了说明这是一个多么保守的估计方法,值得一提的是,马克斯估计 1753 年岭南的粮食需求只要 1680 万亩地就能够满足,^③而仅广东就有 4300 万亩地投入耕种(第 9 章)。因而我们正在把这一地区许多农作物残余——可能是多一半——排除在我们的估计之外,如同我们先前排除了数量巨大并不断增加的既不耕种也无森林的土地一样。

对 1753 年可以用于燃料的农作物残余作出估计的最后一个步骤是估计 311 这些农作物残余中有多少需要供牲畜饲料。为此我估计 18 世纪岭南的人均牲畜数量与 20 世纪的华北同样:大致每六个人一头等牛。这可能略微低估

① Marks 1997, 280, 319—327。

② 同上, 251。

③ 同上, 250。

了猪的数量,因为岭南比华北富裕,而珀金斯估计这一时期全中国人均猪的头数并无太大的改变。^①然而,对役畜的估计几乎肯定过高,因为这类牲畜的需求数量是与耕地面积而不是与人口保持同步,而岭南的人均耕地面积远远低于华北。假定18世纪牲畜的饲料消费与20世纪相同。最后,我假定牲畜饲料需求中大概有一半由农作物残余以外的东西满足:野草、林区空地上种植的饲草、残羹剩饭等等。(仅野草就可能提供这些需求中的多一半。)所有这些计算的结果得到一个数字:1753年可供燃烧的农作物残余为人均636磅(0.318吨),产生了人均0.16 tce,即将近最低需求的一半。其余的燃料需求只要消费岭南1550万公顷森林中165万公顷森林的可持续木材产量就能得到满足。

然后我使用同样保守的方法估计后来年份中来自农作物残余的燃料供给。换句话说,我采用马克斯对每20年时段的人口增量估计,乘以他的人均粮食消费估计量,得到可利用的农作物残余的增量(再一次忽略了开垦土地的数量远远超过种植这一粮食增量所需土地的数量),加上与人口增长成比例的牲畜饲料需求,假定人均燃料需求不变,然后估计需要砍掉多少森林才能持续满足农作物残余没有满足的燃料需求。结果列在表C.2中。

表 C.2 岭南可供除燃料以外其余用途的林地

	岭南森林面积(公顷)	燃料供给面积	可供其他用途
1753	15 500 000	1 650 000	13 850 000
1773	14 200 000	1 675 000	12 525 000
1793	13 100 000	2 260 000	10 840 000
1813	11 800 000	2 469 000	9 331 000
1833	10 700 000	2 956 000	7 744 000
1853	9 580 000	3 339 000	6 241 000

最后,我计算了“多余”林地上的可持续木材产量,并用它除以人口(见表C.3)。显然,即使是在一个普遍相当节俭的生态/经济体制中,人口增长对“剩余”木材的供给也构成了沉重的压力。在一百年间,人口增长了大约75%,森林面积仅减少了约40%,但“剩余”木材供给下降了55%,人均剩余木材则下降了75%。尽管如此,一般的水平和趋势仍然比前工业法国的水平和趋势都更好。法国1550年人均3.6吨的剩余与岭南1753年的数字相比更占

^① Perkins 1969:71。

优势,但并不像人们预期的那样大;而由于农田对法国的燃料供给没有作用,每个新增人口对木材“剩余”的压力要比在岭南大得多。到1789年,人口自1550年起增长了将近80%——大约与1753到1853年的岭南同样——但人均剩余木材下降了令人震惊的92%,降到了只有岭南的40%的程度。如果没有一种新的燃料来源,这两个区域都会遇到严重的问题;但是与我们的直觉相反,看起来正是法国面临更紧迫的困境。

表 C.3 人均“可使用”木材(吨)
岭南,1753—1853

1753	2.8	1813	1.3
1773	2.2	1833	1.0
1793	1.6	1853	0.7

D 18 世纪后期和 19 世纪初期英国 各种输入提供的“虚拟面积”估计

糖

19 世纪初期联合王国的糖消费量在税率下降引起购买力巨大增长之前每年大约 15 万吨。^① 由于一年 5.6 吨糖为 140 人每天提供 420 千卡热量,^② 一年 15 万吨糖就可以每天为 61.4 万人提供 2500 千卡。(卡路里的每天摄入量数字变化相当大,但对大革命前夜巴黎普通老百姓的估计比这个数字更低^③——19 世纪英国工人的大多数数字亦是如此。^④)

本来需要多少土地来供养这样多的人口呢:用敏茨的换算方法把 15 万吨糖换算为总卡路里,结果是 57 181 246.6 万千卡。使用附录 B 中英国小麦产量的同样数字,假定必须为下一年的种子留出产量的 1/10,每英亩播种面积可以生产 471 千克小麦。按照经碾磨之后大约 50% 的出粉率,^⑤ 这些小麦生产出 235 千克面粉,每千克面粉约产生 3400 千卡,^⑥ 总数为每英亩播种面积 79.9 万千卡。这意味着大约需要播种 71.5 万英亩最好的土地。此外,按照鲍登概括的英国农业状况,^⑦ 这样一个农场一年需要 4 头牛作为耕畜,每头需要一英亩地出产的干草(即使假定它从公有牧场上得到 50% 的饲料,并且一年中只有部分时间在厩中喂养)。因而,20 英亩小麦播种面积实际需要至

① Mintz(1985,143),错误使用了“不列颠”一词;Mitchell 1988 有实际数字。

② Mintz 1985:191。

③ Braudel 1981:130。

④ Clerk,Huberman and Lindert 1995:223—226。

⑤ Aykroyd and Doughty 1970:86—88。

⑥ 同上,89。

⑦ Bowden 1990:73,75,294。

少 24 英亩土地；乘出结果后，我们发现用小麦取代进口糖中的卡路里需要 85.8 万英亩土地。如果我们尝试在不使用公有牧场的情况下留出全年喂养耕畜所需足够的干草，这个数字上升到 100.1 万英亩；如果我们假定实行的是三圃制，必须为 20 英亩种植小麦的土地保留 10 英亩休耕地（或者在比较近代的形式中是三叶草地），家畜在那 10 英亩土地上放牧，上述数字上升到 107.2 万英亩。最后，如果我们假定休耕的 10 英亩地真正在休息，另有 4 英亩地生产干草（尽管到 18 世纪末在英格兰这不再是一种常见的做法），我们得到的结果是 121.55 万英亩。

另一种方法是认定整个联合王国实际上是一个粮食市场，英格兰在 1770 到 1860 年间从“凯尔特边缘区”吸收了庞大的供给：^①这是一种只有在这些区域有其他卡路里来源时才可能出现的运作方式。19 世纪初期的苏格兰、威尔士和爱尔兰合在一起，几乎与英格兰有同样多的人口，并以大致同样的比例消费糖。^②用米切尔（Mitchell）的人口数字^③乘以迪尔（Deerr）的联合王国糖消费平均数（每人大约 18 磅）得出如下结果：

1801 年：31 100 万磅

1811 年：33 300 万磅

1831 年：43 200 万磅

用以前讨论过的同样方法，第一个数字产生了 89.2—126.4 万虚拟英亩。1811 年的数字变成 95—134.6 万虚拟英亩；1831 年的数字成为 123.7—175.2 万英亩。如果我们打算取代布罗代尔^④认为是典型的大陆产量的数字（假定英格兰必须从欧洲其他地方输入任何增加的谷物），所有这些数字都要翻将近一番；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假定更多的利用马铃薯，这些数字就会减少。

木 材

木材计算起来最容易。我使用斯米尔对一公顷有适度生产率的“天然”林（即不是人工造林的产物）中生长的树木可以采伐的增量的估计，^⑤阿瑟·洛厄（Arthur Lower）关于波罗的海及美洲向英国输出的木材量的数字，以及

① 见 Thomas 1985a。

② Deerr 1950, II, 532。

③ Mitchell 1988, 9—10。

④ Braudel 1981, 121。

⑤ Smil 1983, 36。

从板材英尺向立方英尺的换算率。^① 估计的结果是,18世纪末每年从波罗的海输出的木材相当于646 875英亩(按每年15 000万英尺板材计),19世纪初每年从北美输出的木材相当100万英亩多一点(按每年25 000万英尺板材计)。

棉 花

315

1815年英国输入了大约10 000万磅新大陆的棉花;1830年为26 300万磅。^② 由于亚麻在照料良好的条件下每英亩大约出产500磅,^③要生产足够的亚麻取代1815年进口的棉花可能需要约20万英亩土地;取代1830年的进口则需要50万英亩。但亚麻生产受本书正文中描述过的困难的影响,要扩大到这样的规模难度会非常大;18世纪后期全英国的产量可能不会超过16 000英亩800万磅。^④ 而大麻——每英亩的产量大致相同,作为一种农作物也有很多同样的问题——不能用于生产比较高级的织物。^⑤

再看羊毛,我使用鲍登对17世纪一个在500英亩的良田上养绵羊的英国农场的重建数据。^⑥ 他估计这样一个农场可以饲养总共1000头阉羊(每头每年产4.5磅羊毛)和1181头其他绵羊(每头产3.5磅);结果是全农场每年的总产量为8445磅羊毛。按照这一产出率,按重量取代1815年的棉花进口,需要11 841个这种农场,或5 920 500英亩土地,取代1830年的进口则需要15 393 300英亩土地。一磅羊毛生产35 840码(64乘以560)64支优质纱——一种“键类型”^⑦——而一磅棉花生产64×840即53 760码64支纱;是羊毛的1.5倍。(18世纪的大多数棉纱在40到80支之间,尽管19世纪的机器能够纺出更细的纱。^⑧)如果我们用这一参数把羊毛调整到足以与进口棉花生产同样多的纱,我们得到的结果是1815年将近900万英亩,而1830年为2300多万亩。

① Lower 1973:25、39、259。

② Mann 1860:112。

③ Warden 1967:11。

④ Rimmer 1960:5。

⑤ Warden 1967:49。

⑥ Bowden 1990:86。

⑦ Jenkins and Ponting 1982:11—12。

⑧ Mann 1860:26—27。

316 E 中国长江下游地区农村纺织工人挣钱能力估计, 1750—1840

对妇女通过纺纱织布挣到多少钱的任何估计肯定都是近似的, 因为我们的原棉和棉布价格资料都相当零散, 并且短期波动通常都相当大。把棉价的高峰和布价的波谷进行比较——或是反过来——会产生非常误导性的结果。此外, “棉布”远非一种统一的产品, 引用的价格也常常不清楚指的是哪种布。江南生产的棉布的平均质量在我们讨论的这一阶段有所改进,^①部分是由于劳动成本比较低的大区一直在满足它们自己对低质量棉布的更多需求。

岸本美绪报告的原棉价格数据^②和张忠民的棉布价格数据^③合在一起成了一幅有意义的画面, 它们似乎表现了最典型的情况。然而, 方行^④引用的原棉价格要高得多——几乎与张引用的最终的棉布价格同样高——而《木棉谱》, 一部被广泛引用的 18 世纪史料, 引证了一个按照那些比较高的棉花价格有实际意义的棉布价格, 但如果把岸本美绪记载的原棉价格合在一起, 会使纺织工人的收入难以置信。(方的棉花价格是华北的, 并且是在边远的市场上, 但由于华北向江南输出原棉, 所以问题仍然存在。)这些差异是重要的, 因为——由于稻谷价格相当清楚——棉花和棉布都使用比较高的价格导致了用稻谷表示的收入高于用较低价格进行的计算。

所以, 我作了两个系列的计算: 一个棉花和棉布都使用高价格, 一个都使用低价格。这两种设定计算出的结果在一人(或一户)既纺又织的情况下相当接近, 尽管高价格设定计算出一个较高的收入。对于那些只纺纱者, 低价格设定证实了这种工作养活不起一个成年妇女的观点, 尽管只有在对所有参

① 方行 1987:89。

② 岸本美绪 1997。

③ 张忠民 1988。

④ 方行 1987。

数的可能性都作出最悲观的假定时,这种观点才能成立。实际上,它显示出这种工作能够养活一个成年女性但完全没有剩余:这是毫不奇怪的,因为大多数不织布的纺纱者,至少在长江下游,看来都是女童。相反,高价格设定显示出,即使是一个成年女性纺纱者也能养活她本人并有一些剩余:一种多少有点疑问,但并不是完全不合情理的情形。至于只织布的妇女,低价格设定使我们计算出相当高但看起来仍然合理的收入,而高价格设定计算出的收入就我们所知超过了大多数农村家庭必需的花费。 317

因而,低价格设定看起来更为合理,比较不利于我的假说,也与较多的现有价格数据一致。所以我在正文中只使用了那些数字。但在本附录中,我把两个系列的估算都列举出来。

18 世纪中期的纺、织结合

用高价格计算

数据的选择

对于 18 世纪中期,《木棉谱》说棉布之“佳者”(不清楚这个词指的是一种怎样特别的质量)每尺(这里指面积单位)价格“未尝过”50 文钱(一种广泛使用的铜币,价值大约为一盎司白银的千分之一)。卢汉超^①引用的 1677 年的一条资料说,从原棉开始,一个妇女纺织成一匹长 20 尺的棉布大约需要 7 天;对体力劳动生产率的这些估计与黄的并没有很大差异。一匹布的价值大约为 1000 文,按照 1750 年的银钱兑换率折合为 1.1 两。

但这一价格中有一部分是棉布中包含的棉花的价格而不是妇女的劳动,而棉价的变化又相当大。岸本美绪的数据显示,18 世纪中期每斤籽棉的价格为 20—40 文,常见的价格在每斤 20 到 30 文之间,但在干旱年份每斤价格甚至超过 40 文。^② 如我们即将看到的,这些数字比方行引用的华北的棉价低很多。尽管如此,当我们把岸本美绪的布价与她的原棉价格比较时,我们看到棉布价格中纺织劳动和棉花本身所占比例非常接近于由方行的数字得出的结果。^③ 这种假定廉价原棉和廉价棉布的“低价格设定”在 319 页和后面的

① 卢 1992:481。

② 岸本美绪 1997:139。

③ 方行 1987:92。

321—322 页(指本书英文本页码)逐步展开。

然而,当我们把岸本美绪比较低的原棉价格与《木棉谱》中的棉布高价格比较时,麻烦就出现了。由于一斤籽棉只出 0.33 斤净棉,岸本美绪的籽棉价格意味着每斤净棉的价格为 60—120 文钱。织成一匹布大约需要 1.33 斤棉花,^①按照这一比例,在一般的年景要花费 130 文左右;把它与《本棉谱》中的棉布价格比较,棉布价值中几乎有 90% 可以余留作为劳动报酬。这看来高得难以置信,由于我想要对纺织工人收入作出一个保守的估计,我假定《木棉谱》中的价格只有在原棉价格也较高时才出现(尽管并不清楚事实是否如此)。因而,我使用方行的高得多的数字,^②他给出的 18 世纪后期华北净棉价格为每斤 140—400 文。由于华北在这一阶段一直向长江下游输送原棉,我假定长江下游的价格不可能低于华北的价格,因此选择方行的 400 文的最高价(再一次,为了使收入估计向下倾斜)。这个“高价格”设定在下一节和下面的 320—321 页展开。

高价格设定的结果

按照这些价格,一匹布中包含的 1.33 斤净棉需要花费 533 文钱,即占这匹布价格的多一半。(尽管这些价格波动对那些用自己种植的棉花纺织的家庭来说无关紧要。)由于方行还估计,一名纺纱(一种比织布需要的技巧少,报酬也低的工作)妇女通常能挣到她所纺棉花价格的 30%—50%^③——黄同样依据这个估计——我们的估计表明,一名既纺又织的妇女使原料价值增加了将近 90%,按照这些价格看来是相当保守的,远远低于方行引用的当时的估计,即棉布价格通常为棉花价格的 4 倍。^④

如果一名妇女能够像这样用 7 天的纺和织挣到 457 文钱,则每年工作 210 天可以挣到 14 010 文。(这样一个年工作日数字比 20 世纪初江南见到的农村纺工和织工的工作日少很多,后者平均一年工作 300 多天;^⑤并且如附录 F 显示,如果江南每个妇女都织布的话,这个数字大致与我们对该地区棉布总产量的保守估计一致。由于无疑会有一些人并不织布,那些织布的人的工作年度可能多少要高于 210 天,我们的收入估计也再度向下倾斜。)按照 18 世纪中期的汇率,这相当于 15.5 两白银。如果我们使用王业键以 1750 年为中心的稻米价格 31 年移动平均值(1.67 两),它可以买到 9.3 石稻米。

① 黄宗智 1990:84。

② 方行 1987:84。

③ 同上,88。

④ 同上,92。

⑤ 徐新吾 1992:469。

用低价格计算的纺和织

319

上面引用的《木棉谱》中的价格看起来并不典型,可能反映的是特殊质量的棉布或一个特殊的年份。张忠民^①引用的0.3或0.4两是16尺长的棉布价格(《木棉谱》中布匹长度的80%),但没有给出重量数字,除了“清中期”以外,也没有提供一个具体年代。方行^②告诉我们乾隆朝(1736—1795)的棉布价格平均为0.4两,但在某些年份高达0.7或0.8两。他也给了我们一个棉布重量的数字,说一匹布使用3斤原棉,即《木棉谱》和卢与黄的计算中提到的标准布匹所需数量的3/4。让我们使用他的0.4两的数字,并从这里开始。

按照18世纪中叶长江下游的汇率,0.4两白银大约折合360文钱。如果岸本美绪的棉价数字是指籽棉价格(否则的话,它们就低得太荒谬,并且甚至在使用低棉布价格计算时也会得到非常高的收入估计值),这些布匹中包含的棉花价值约为90文。这些数字完全符合方行引用的一条资料,^③说棉布的价格是所使用的原棉价格的4倍。这样一来,劳动增加到这匹布中的价值就是270文;如果我们把这个数字换算为卢、黄和《木棉谱》提到的比较长的布匹,由劳动增加的价值就是360文。如果这是一个妇女7天纺织劳动的收入,她在210天的工作年度中的收入就是10800文或12两;大约比我们用高价格作出的估计低22%,但以1750年的价格仍然足够购买7.2石稻米,如我们即将看到的,完全可以与男性农业工人能够得到的收入相匹敌。

与男性收入和食物价格的比较

对每人每年平均稻米消费的估计从1.74到2.62石不等;马克斯断定2.17石为一个适宜的平均数。^④我所见到的最高的估计是一个在户外做体力劳动的成年男性每年5.5石;潘使用的数字是一个成年女性2.5石,儿童则要低很多。^⑤这些数据有助于把我们推论出的妇女收入放在具体的关系中。

① 张忠民 1988:207。

② 方行 1987:92。

③ 同上.92。

④ Marks 1991:77—78。

⑤ 潘敏德 1994:327。

这一时期江南无地的男性农业工人的典型收入为每年 2 到 5 两白银现金；^①较高的那个数字并不是来自年工资，而是来自月工资乘以 12，因而假定这样一个劳动者一年 12 个月都能找到工作（多少有点靠不住，但并非不可能）。农业工人在工作时至少还会得到一部分饭食。如果我们出于论证的需要，假定他们的全部饮食都是免费的，他们全年都能找到工作，他们的食品主要由每年 5 石稻米（略低于可见到的最高数字）构成，这样一来，他们每年挣到的现金和稻米相当于 10.4—13.4 两白银（或者换一种说法，是 6.1—7.8 石稻米）。

因而，我们用高价格设定推算的织工兼纺工挣到了一个男性农业工人收入的 116%—149%，即使他全年工作，而她“只”工作 210 天。如果我们注意到养活本人之后收入中多余的部分，再回想一下女性的饭量通常比男性（特别是在农田中工作的男性）少多少，这个差距就变得更大：妇女在养活自己之后还有 6.8 石稻米的剩余；男性只有 1.2 到 3.0 石。

我们用比较合理的低价格设定推论的织工兼纺工没有挣到同样多的收入，但仍然可以和一个男性农业工人相比。她的 12.0 两收入刚好高于我们用非常宽松的假定计算出的男性农业工人收入 10.4—13.4 两的中点；由于成年妇女吃的比男性少，她在满足自己的消费后享有的剩余也比男性农业工人明显更多。

换一种方式表述，高价格设定中的妇女用她的工作能够养活 1.9 个等成年男性，或者说是（如果她是一个寡妇）能够养活她自己、父母或公婆中的一位老人、三个或甚至更多个孩子（取决于年龄，当然还要假定那位老年人对孩子的照料和其他家务劳动足以使母亲的纺织工作顺利进行）。低价格设定中的妇女能够养活 1.4 个等成年男性，或者她本人、一个老人、或许还有两个孩子。尽管这样一种生存会很艰难，但与一个由一名丧妻的男性农业工人支撑的家庭相比，生活并不会更坏，可能多少要好一点，即使后者在其他方面相当走运。显然，这一时期女性的收入并不像“内卷化”观点所认为的那样在维生水平之下。

○ 赵冈 1983, 57。

18 世纪中期的纺而不织

用高价格计算

至于只纺纱的妇女,境况非常凄凉,但仍然不像黄所认为的那样糟糕。如果这样一个妇女使用带有足踏板的纺车(这种纺车要求一个成年人使用),她一天能够生产 8 两(0.5 斤)线;如果她没有这样做(许多纺工是年龄很小的女孩子,她们无力使用这样的纺车),比较可能的产量是每天 5 两(0.31 斤)。由于她的收入可能大致相当于她加工的棉花价格的 30%—50%,^①她挣到的收入相当于 0.09 到 0.25 斤净棉,取决于她每天的产量和价格的波动;为了论证方便,让我们使用 0.16 斤,它略低于这个序列的中点。如果棉价在每斤 140 到 400 文之间变化,并且我们再次采用这一序列的中点(这里与纺织结合的情况不同,为原材料选择高端的价格不会使我们的估计更保守),她每天可以挣到 43 文钱,或者一个 200 天的工作年度 8600 文(9.5 两),足够买 5.7 石稻米。现在让我们继续使用棉价序列和纺纱工作在棉线价格中所占比例序列的中点,但把产量估计降到序列的低端——每天 5 两——假定纺工不能使用足踏纺车。在这种情况下,纺工每年可以挣到 6400 文钱,或大约 7 两白银,或 4.2 石稻谷。如果我们对男性农业工人的挣钱能力继续作出与前面同样宽松的假定,则用这些设定序列中点推算的妇女收入比男性农业工人少很多:最高 87%(当我们用纺工估计数的高端与农业工人估计数的低端比较时),或许勉强有 50%(当我们作相反的比较时)。但即使如此,我们应该记住,这些工资足以养活一个成年妇女和至少一个儿童,而江南只纺纱的人绝大多数看来都是女孩,同时这种设定以一个 200 天的工作年度为依据。

如果我们坚持使用价格序列的低端、生产率序列的低端和 200 天的工作年度,我们得到的收入估计(3.7 两、2.2 石)可能低于一名成年女性的生存需求,但也许不会:用它购买的稻米一天能够提供 1870 千卡热量。

还可以用另一种方法对“纺工”的收入进行估计,尽管它把这些收入压得过于低。大致说来,生产一匹布需要工作 7 天(在一些晚期资料中是 6 天):4 天纺纱,1 天织布,两天用于其他杂项工作。如果我们加上这额外的两天杂工,就会得出一个数字:要为织布作好全部准备工作需要 6 天的劳动;这样估

① 方行 1987:88。

计的结果是，除织布以外全部工作的日常收入为一匹布所用棉花价值的40%，或者说是相当于0.53斤棉花的价值，等于6天共挣143文钱（用方行棉价序列的中点）。这使我们得出的结果是每天24文，一个200天的工作年度4800文，一年收入3.2石稻米，仍然足以养活一个成年妇女，或许还有一个幼儿。如我们在下面即将看到的，这种计算方法使织工只用一天的劳动就得到每匹布纱线和棉布之间的全部价值差额，导致那个人的收入成为天价，所以大概最好是放弃它。它惟一的实际用途是对“纺纱”报酬作出尽可能最保守的估计。但如果我们假定大多数家庭是纺织结合，像这个例子看上去的那样，最后结果当然不受我们在不同工序间如何分配劳动的影响。

用低价格计算

然而，如果我们使用棉价的低价格数字并继续按所使用原棉价格的40%计算一个纺工的收入，我们得出的收入估计确实非常低。如果每斤净棉90文左右，一名纺工一天只能纺纱0.31斤，她的收入是每天可怜的11.2文钱，或每年约1.5石稻米。如果我们改用另外一种方法估计“纺纱”（实际上包括了除织布以外的全部工作）收入，日生产率甚至更低，每天约0.22斤，年收入只有每年1.2石。这大大低于维持一个成年女性的生存所需，但在江南可能仍然足以养活一名十来岁的做了很多纺纱工作的女童。有必要注意的是，我们对纺工收入的估计（像黄一样）是根据棉价的百分比，这一估计的出处——
322 方行的文章——也是我们的原棉高价格资料的出处。^①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假定这个百分比会在比较低的棉价水平上保持。相反，看来更可能的是，在原棉非常低廉的时期和地点，纺工会在棉纱价值中得到多多少少更高的份额，而在一个棉布市场完全竞争的经济中，当价格太高，使得甚至在一个纯粹地方性市场上出售的人都难以经受原材料价格的巨大增长时，有足够多的消费者可能放弃购买棉布，方行的劳动在棉纱价值中的低比例数字，部分反映了这种情况下使用昂贵棉花的妇女受到的压力。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大部分案例反复显示纺和织是结合在一起的，因而区分这些工作的报酬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仅是极少数再也无力织布的老年寡妇之类不幸者收入的衡量基准。

^① 方行 1987。

18 世纪中期的织而不纺

棉布价值中小部分由纺纱工作提供的反面是一个相当大的部分由织布工作提供。大概只有非常少的农村织工购买他们需要的全部棉纱；大部分人或是自己纺一部分纱，或是有一个女儿做这种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家庭完全可能从来不去仔细计算他们卖布得到的收入中有多少要归功于每个成员的努力）。但为了论证方便，让我们设想一个妇女只织布，并计算她单独一人的收入。

生产一匹布要花 7 天时间，纺纱需要 4 天，织布一天。但我们怎样分配其余的两天？如果我们把它们派给织工以外的某个人（这几乎肯定是不切实际的，但把产生我们对纺工收入最低估计的“6 天”方法结合考虑，这种做法在逻辑上却是行得通的），那么纱线价格和棉布价格之间的全部差额就应该归之于织工的一天劳动。这会导致特别高的收入估计。如果按照上文的方式使用低价格设定（这种设定看起来是比较典型的情形），我们的估计是一天的劳动就把约值 168 文（比净棉价值 120 文高 40%）的棉纱织成了约值 480 文的棉布。这样一来，按照这一设定，一名只织布的妇女在 1 天中可以挣到 312 文，即在一个 210 天的工作年度中挣 65 520 文——令人难以置信的 73 两白银。高价格设定中的收入甚至更为难以置信：每天 640 文，或一个 210 天的工作年度 134 400 文，显然是一个荒唐的数字。（这反过来加强了用出自 6 天设定的纺工收入证明纺纱工作不合算的虚假性。）如果我们把除纺纱以外的所有 3 天都派给织工，我们得到的数字多多少少更为合理，但仍然显示出除纺纱以外的工作收入非常高：低价格设定每年 24.3 两（大约双倍于一个农业工人的工资），高价格设定将近 50 两。尽管更低的价格设定并非没有最微弱的可能性，但归根结底这主要是一种理论演示：只有非常少的纱线供出售，所以绝大多数家庭都是纺织结合，使得纺织结合工作的收入数字到目前为止是最为重要的。

323

较晚期的纺与织

我们的零散的价格资料使我们很难确定在 1750 年以后的一个世纪中纺工和织工的挣钱能力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由于除最特殊品种的棉布之外，

棉布价格看来相当稳定，^①同时稻米的价格（有非常完善的记载）明显上升，我们可以肯定我们假想的纺工兼织工的实际购买力下降了，但为了估计下降了多少，我们需要作一些假定。在接下去的内容中，我拟定了4种可能情况，计算出的下降幅度为25%—50%。

A

这是一种最简单的方法，产生了最乐观的结果。它从我们的高价格设定开始，使用广州地区的原棉价格趋势；我们有这一区域相当完善的资料，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外国人的存在（他们中有很多人从印度运来棉花）。由于这些原棉价格显示出1750到1850年间没有发生长期变化，^②棉布的价格也显示出没有长期趋势，这一模式告诉我们一个纺织品生产者的名义收入也应该表现出没有变化；由于稻米价格在1750到1800年间上升了约22%，到1840年上升了32%，^③她实际上应该变得更贫穷。

B

然而，长江流域的原棉价格不可能像广州地区那样没有变化。事实上，广州地区价格稳定本身就意味着长江流域出现上升趋势。岭南长期以来从长江下游得到它需要的大部分棉花，但在18世纪中期它也开始购买廉价的印度棉；当长江下游来的棉花再度在广州排挤印度棉花时，这主要应该归功于长江下游和岭南之间的运输费用急剧下降。^④如果广州的价格不变而运输费用下降，这就意味着江南棉花的买进价格在上涨。但到底上涨了多少？

324 让我们首先拿我们的高价格设定代表1750年的情况。当我们这样做时，我们需要使用方行的高端价格作为我们18世纪中期的起点，但由于他没有提供随时间变化的趋势数据，我们需要某种指标来替代在此后的一百年中原棉价格可能的提高程度。可以对此说出点什么的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是假定从长期趋势看棉花价格随着稻米价格变动。这两种价格在17世纪看起来的确是共同运动的（尽管棉价要滞后几年），这一事实使上述假定增加了一些合理性。^⑤在用货币解释价格增长时，或——对我们的分析更为重要——作出一种强调江南的贸易伙伴的土地/劳动比率变化及原始工业化发展使江南

① 张忠民 1988:207—208。

② Dermigny 1964:IV:表 19。

③ 王业键 1992:41—44。

④ 实例见 Greenberg 1951:91—92。

⑤ 岸本美绪 1997:141。

获得廉价的稻米或原棉输入更为困难的设想时,它看来也是合理的。事实上,有理由认为原棉会经历比粮食更高的价格暴涨。华北、长江下游主要的外来棉花产地,在 1750 年以后的一百年中人口增长特别快,并且(如第 3 章和附录 F 中所显示的)可能减少了棉田面积,同时增加了自己的纺和织;因而它的原棉输出可能下降得特别急剧。随着大运河的衰落,华北和长江下游之间的运输费用可能上升,进一步妨碍了江南的原棉输入。同时,长江下游和岭南之间——一条江南输出原棉的路线——运输费用的下降可能提高了为岭南市场收购原棉的买主愿意支付的价格。尽管长江下游的稻米输入(主要是从长江中游)出于与来自华北的棉花输入同样的理由——相对不发达区域的人口增长和原始工业化——而下降,但这种下降并不是同样急剧,与满洲贸易的增长可能通过次要粮食的输入而造成了至少某种程度的缓解;主要的输入品是压碎成肥料的大豆,但也运来了一些小麦(和一些食用的大豆)。因而,尽管假定在 1750 年以后原棉价格与稻米价格以同样的比例上涨是一种猜测,它却可能是一个保守的猜测。

如果我们也用稻米的价格趋势代替棉花,到 1800 年,一匹 1000 文的棉布中包含的原棉就应该从 533 文(根据前面讨论过的方行的著作)上涨到约 654 文。因而纺织劳动在棉布价格中占的份额就从 467 文下降到 346 文,大约下降了 25%。由于在同一个 50 年中稻米的价格上涨了 20% 多一点,^①实际收益的下降幅度共计约 40%。当我们对 1840 年进行同样的运算时,我们发现一匹 1000 文的棉布中包含的棉花价值上涨到 702 文,纺织劳动的报酬随之下降到 298 文;由于稻米价格进一步上涨到每石 2.20 两,实际收益在这 90 年的时间中下降了约 52%。 325

但是如我们所见,我们的低价格设定或许是更为典型的情况,这里我们也可以产生两种可能性。第一种采用岸本美绪的零散的 18 世纪棉价的票面价值数字;第二种改为采用她对 17 世纪的棉价大致追随稻米价格变动的发现,并把这一发现应用于 18 世纪和 19 世纪初期。由于能够得到的资料有限,两种都只是大致的估计。

C

岸本美绪收集了一批 18 世纪江南的原棉价格,显示出这些价格在 1750 年到 1800 年间翻了一番还多(尽管我们在区分真实趋势与短期波动时再一

^① 王业键 1992:41—44。

次遇到麻烦)。^① 并且如我们已经见到的,如果把张忠民和方行引用的 18 世纪中期的棉布价格结合起来,这些价格产生了合理的收入估计(尽管当与《木棉谱》中的价格结合时收入非常高)。如果现在转向我们利用岸本美绪的棉价和张忠民及方行的布价对 1750 年作的低价格设定,然后把原棉价格翻一番,一匹价值 480 文的棉布中原材料占的份额从 120 文上升到了 240 文,纺工兼织工的份额随之从每匹 360 文下降到 240 文;名义收入下降了 33%。如果我们根据到 1800 年稻米价格的上涨程度(岸本美绪的棉花价格资料截至 1794 年)进一步缩小这些收入,实际收入的下降幅度为 45%。如果我们假定(由于缺乏资料)到 1840 年棉价没有继续上升,稻米价格的进一步上涨仍然使实际收入下降几乎整整 50%,如果棉花价格在 1800 年以后继续上升,挣钱能力的下降甚至会更大。

D

最后,让我们使用我们的 18 世纪中期的低价格设定,但设想原棉价格追随稻米价格变动。假如这样的话,一匹价值 480 文的棉布中的原棉价值在 1750 到 1840 年间就从 120 文上升到了 158 文,纺织者的份额从 360 文下降到 302 文,名义收入的下降率刚刚低于 17%。吴承明和许涤新引用的一条 19 世纪中期的史料说,1821 年原棉每担(100 斤)价“3200”(应该是指铜钱),^②这个价格非常接近于岸本美绪的 70 年前的籽棉价格;然而同一条资料说,一二十年以后,4500—5000(文)是比较常见的价格(同时像其他资料一样,有更为剧烈的短期波动的记录)。因而用这条资料计算出的一百多年的价格增长幅度,大致与原棉价格追随稻米价格变动的猜测产生的增长率相同,尽管在把所有的增长组合进这一时间段的最后 20 年中时产生了差异。

如果我们使用稻米价格指数,并把我们的棉布价格中原料的份额从 120 文增加到 158 文,纺工兼织工的份额就从 360 文降到了 302 文,名义收入的下降率是相当低的 16%。但与稻米价格的上涨结合起来,到 1840 年,甚至这一设定也产生了 36% 的实际收入下降率。(1800 年的数字应该是棉花 147 文,劳动 333 文——因而收入下降名义上是 7%,实际上是 25%。)

^① 岸本美绪 1997:139。

^② 吴承明和许涤新 1985:323。

F 棉花和丝产量估计,1750年及较晚期,长江下游和全中国——与联合王国、法国和德国的比较

广东的丝产量

我只估计了两个最大的产区的丝产量:广东(主要是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对于广东,估计方法基本上与(第3章中描述过的)估计糖产量时所用的方法相同。我们从马克斯的耕地和粮食作物需要的耕地数量数据开始,估计出1753年至少有1680万亩地用于非粮食作物生产。(马克斯本人提出的数字比这一数字大约高20%)。然后我们指定这些土地中有1/10——168万亩——用于种植蚕桑,与我们指定种甘蔗的同样多。这几乎肯定是一个过低的估计,因为桑树和甘蔗到那时为止一直是该省最常见的非粮食作物,还因为这使我们估计的全省的桑树面积少于1920年代该省三个最大的产丝县的桑树面积,也远远低于三角洲各县的合计数字。如果我们使用阿尔文·索(Alvin So)的估计,即饲养生产一担(133磅)高档丝的蚕需要用20亩桑田,^①这168万亩地每年可以生产大约1100万磅丝。

大约在同一时期,中国出口丝中有1/4左右在广东生产。^②由于广东有中国惟一开放对外贸易的港口,又比另一个重要产区(长江三角洲)距高档丝主要的国内市场(长江下游和首都地区)远数百英里,广东的丝生产看来不可能比长江三角洲的丝生产更缺乏出口导向。因而长江三角洲的丝产量看来也不大可能低于广东产量的三倍(3300万磅),它很可能要高得多,这是一个当我们转回来估计那一区域的产量时值得记住的准则。

^① So 1995:80。

^② 同上,81注②。

328 江南的丝产量

我们对长江三角洲的农作物模式了解得相当多。王业键对三角洲 14 个府州的粮食消费和粮食输入作过认真的估算，^①这些估算可以用来估计为了提供粮食供给中由当地生产的部分，需要有多少土地种植粮食作物。我使用珀金斯的每亩 1.9 石稻米的数字作为一个平均产量，^②使用王业键本人的每个府州的人口数字^③（实际上是 1778 年的，但 1750 年以后这一区域人口增长并不多），耕地亩数采用珀金斯和梁方仲记录的官方征税册上的数字（这肯定不会过高）。^④（这些数据来自 1735 和 1820 年，大部分府州都非常接近。）

我只在两个方面与王不同，这两种不同都压低了产量估计。第一，我省略了位于长江北岸的三个府。尽管这些府既产棉又产丝，但它们也是主要的盐产地，这便分派用于其他作物的非粮田的工作复杂化了。由于完全省略它们，自然而然降低了我的总产量估计。第二，我使用人均粮食消费 2.2 石稻米或其当量的估计，而不是王的 2.0 石；这使我的计算与马克斯对广东的计算一致，并意味着必须用于粮食的土地比王所认为的更多。

这个过程产生了列在表 F. 1 中的长江三角洲各府州用于非粮食作物的土地的合计——这些数字普遍等于或低于王所引用的当时人关于（例如）某一个府土地有一半种棉花的随意的估计。

在作出这些非粮田的估计后，我们需要把这些土地在可能种植的非粮食作物之间进行分配。在这一区域，这类土地压倒一切的用途是植棉和种桑，而不是像广东那样用于多种多样的现金作物；所以，我们能够避免像在广东那样作出诸如 1/10 的非粮田用于甘蔗和蚕桑之类的必需的底线估计。相反，我们可以接受王所说的这些府州的特征是以产棉为主、产丝为主或两者混合——尽管我们将再一次仅仅为了确保使我们的估计保守而任意减少棉桑面积（有些府州减少了 50%）。

① 王业键 1989。

② Perkins 1969:21。

③ 王业键 1989:427。

④ Perkins 1969:230; 梁方仲 1981:401—413。

表 F.1 长江三角洲各府州非粮食作物面积估计
1750 年前后

府州	耕地面积	粮田面积	非粮田面积
苏州	6 254 000	3 471 209	2 782 791
松江	4 048 871	1 877 230	2 171 641
太仓	3 962 671	1 263 409	2 699 262
常州	5 579 264	3 222 943	2 356 321
镇江	5 200 023	1 815 028	3 384 995
江宁	5 233 949	1 798 866	3 435 083
杭州	4 284 327	1 733 300	2 551 027
嘉兴	4 356 442	1 538 385	2 818 057
湖州	6 136 678	1 406 438	4 279 640
宁波	4 066 059	1 290 984	2 775 075
绍兴 ^a	3 492 271	2 955 317	536 954

^a 绍兴是 1735 和 1820 年的总耕地面积数字差距极大的惟一个案；1820 年的数字 6 765 514 几乎双倍于这里所用的数字。采用它会使绍兴的非粮食作物土地百分比提高到略低于 60%，这个数字远比这里所用的约 15% 与三角洲其他府州更为一致。然而，为了避免任何高估丝棉产量的风险，我决定使用这个较低（并且几乎肯定不准确）的数字。

杭州、湖州和嘉兴都是重要的养蚕府州，棉田非常之少；它们共有 10 098 724 亩现金作物土地，能够生产 66 651 578 磅高质量的蚕丝。如果为了论证的需要，我们只把这些土地的 3/4 认作桑田，这样仍然能够生产大约 5000 万磅丝。苏州、宁波和绍兴是棉丝混合产区。按照我们上面的计算，它们共有 6 094 820 亩现金作物。尽管苏州的数字看起来有点低，因为人们几乎一致认为它是帝国商业化程度最高的府，绍兴的数字则肯定低（见上表注释），只为了额外的谨慎小心，我还是进一步把这个面积削减了 50%。这使我们有 3 047 410 亩地可以在棉桑之间平均分配；这样计算会再增加 10 056 453 磅高档丝。因而即使我们作出所有这些折扣，并假定三角洲其余区域丝产量为零（显然不是事实），我们仍然得出这一区域丝产量每年大约 6000 万磅的估计：每个居民两磅左右。要证明一个两倍于此的数字也并不困难。

330 算出一个全国性数字极不容易，因为我们省略了如此之多的产区，甚至对我们考察过的两个产区也尽力形成较低的数字。尽管如此，值得一提的是，即使前面的数字代表全中国的丝产量，我们也有每年 7100 万磅左右，或 1.75 亿—2.25 亿人口每人每年 5.1 到 6.5 盎司——对于一种奢侈品来说不算太多，但远非微不足道。

江南的棉花

即使在武断地把非粮田面积削减 50% 以后，在我们的棉丝混合府州，上述程序仍把 1 523 705 亩地指派给了棉花。这一时期的平均产量大约是每亩 39 磅净棉，按照这一平均产量计算，这些棉田会得到 59 424 495 磅的产量。如果我们拿三角洲以植棉为主的府州的非粮田面积乘以同样的产量估计，结果是 547 764 778 磅棉花，把它加到我们以前的数字上，得到的结果略高于 60 000 万磅。再一次为了保守起见，我武断地把它削减到 50 000 万磅。然而，这样得出的江南棉花总产量仍然略高于每人 16 磅。

要估计出江南有多少棉花织成了布还需要两个步骤。首先，我们需要计算用于织布以外的用途（主要是絮棉衣被）的棉花数量。我们没有 18 世纪如此使用的棉花数量的估计，但在 20 世纪初，中国全国这些用途合计每人约 1.3 磅。^① 如果 18 世纪同样如此，在江南，每人就会有约 14.7 磅棉花可以用于纺纱织布；我把这个数字缩为 14.5 磅。

第二，我们需要江南从华北输入的棉花参数，以及江南输出到东南沿海和岭南的棉花（主要用来交换糖）参数。遗憾的是，对这些流通量的大小我们实际上没有过硬的资料。一些野史方面的证据显示，18 世纪江南的棉花输入大概比它的输出要多，所以如果我们直截了当不管这些流通量，应该不会夸大估计当地的棉布产量；我把这种做法作为一个暂时策略，并使用上一节的棉布产量数字。但尽管有这些野史方面的证据，仍有一些理由认为甚至在 1750 年代江南就是一个原棉净输出地区；在接下来的一百年中，由于岭南的需求上升而来自华北的输入下降，到 1850 年江南肯定成为原棉净输出地区。遗憾的是，没有办法直接通过可用数据衡量这些流通量（而幸运的是它们与计算全国的产量无关），我们只能猜测它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我们的地区性估计。

^① 赵冈 1977:233。

认为江南输出原棉的一个理由是,以它的劳动力要把它生产的那样多原棉都织成布是很困难的——尽管并非不可能。如果我们坚持附录 E 中我们对布匹数量和每个妇女劳动生产率的估计,45 000 万磅棉花(减去用于絮衣被用的棉花之后)足够生产大约 30 000 万匹布,这些布匹需要大约 1000 万个等成年女性一年工作 210 天。1750 年,江南有大约 1600 万女性常住居民;如果人口的年龄结构与 20 世纪初大体相同,10 岁到 50 岁之间的女性实际上就会有将近 1000 万人。^① 由于我们知道有相当数量的妇女从事养蚕,还有一些妇女从事棉纺织以外各种各样的其他工作,很难认为能够有足够多的成年女性从事棉纺织业。 331

这一问题有多种可能的解决方法。一个是,有一些劳动是由 9 岁甚或 8 岁的孩子提供的(纺纱而不是织布);这大概是事实,但这些女孩不可能超过 30 万人。50 岁以上妇女的人数会更多(大约 250 万),其中一些人无疑既纺又织,但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人。男性做一些织布工作,但我们也没有办法知道有多少。我对从事棉纺织业的女性一个工作年度为 210 天的相当武断的估计有可能过低——如我们所知,20 世纪初为 300 多天——但进一步提高它会造成女性(及家庭)难以置信的高收入。这些不同因素能够使我们对劳动生产率的估计与江南输入输出了同样多的棉花的假定相符并不是不可能的,但看来更可能的是,有一些余量仍然需要用输出来解释。其中一些可能输出到非常邻近的区域,诸如三个紧邻江南(在北面)的相当富裕的府州;这些府州——王业键包括在他对“长江三角洲”的界定中——可能有另外 150 万 10—49 岁的女性。

这个差额中的其余部分可能输出到了东南沿海和岭南。这两个区域棉纺织品生产膨胀的证据显示出江南有大量的输出(它们自己生产的棉花非常之少,从印度进口一些,但远不够用)。江南从这两个区域输入的糖的数量也暗示出这一点:完全可能达到 30 000 万磅,每磅价格(白糖)大致与籽棉价格相等。^② 当时人通常把岭南—江南贸易描述为主要是这两种商品的交换,所以简单断言江南输出了 30 000 万磅籽棉(等于 10 000 磅净棉)是很有诱惑力的;但我们没有办法知道这种商品交易是否平衡,或者是否包含有其他商品在内(包括各种各样昂贵的奢侈品)。由于从华北输入的数量甚至更难以估计(见下文 335—337 页[指本书英文本页码——译注]),尝试估计我们的江南棉布产量数字需要削减到什么程度看来是徒劳无益的;在有更多的资料出现 332

① 卜凯 1964:377。

② 见 Mazumdar(1984:64)的糖价;附录 E 的棉价。

之前,看来最好是简单地说(记住我为了尽量使这一估计偏低所做的其他事情),人均 14.5 磅可能有点高,但并不过分高。

然而,在一部重要的刚刚出版的著作中,李伯重作了一个比我的估计低很多的江南棉布产量估计(他没有研究全帝国的产量)。令人感兴趣的是,他对每个劳动力产量的估计与我的大致相同,^①但他假定江南人口中从事纺织业的百分比要低得多。

李用徐新吾对江南一个府——松江——的人均棉布消费估计代表江南;然后他加上吴承明和许涤新的“输出”估计,得出江南的总产量。^②但除非松江的棉布特别重,徐的估计(以匹为单位)折算出的松江——或许是帝国最富裕的府——人均棉布消费量甚至比吴和许对全国平均值的谨慎估计还低很多(见下文 337 页[指本书英文本页码——译注])。然后李从这个产量向回推算,提出了从事棉纺织业的妇女数量的估计。^③这个数字相当接近他对从事非农业活动的农村家庭数目的估计,他以此来证实这一估计的正确性;但在有大量家庭耕织结合的情况下,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论证方法。相反,在接下来的论述中,我提出,以纺织劳动力为根据的估计更符合我的比较高的猜测。

李估计在江南一个具体地区有大约 140 万个家庭,每家有一对母女从事棉纺织生产,能够生产他所提出的江南棉布产量的 60%。如果其余部分都由类似的家庭以同样的生产率生产,结果是纺织业劳动力由 230 万对这样的母女组合构成——少于全部农村家庭的一半——生产纺织品的等成年妇女总数约为 350 万,约占江南劳动力总数的 19%。这些数字在我看来是太低太低了。

李提到,清初期和中期许多观察家估计江南的非农业劳动力占 50%—70%,但他认为这些数字肯定太高。^④他采用了 1930 年代和 1940 年代的调查中的估计——这些调查显示,不种田的农村家庭略高于 10%——同时认为这是一个保守的估计。他进一步提出,江南人口中约有 15% 在城市。^⑤

李认为 10% 的农村家庭不务农对 18 和 19 世纪来说是太低的数字,他几乎肯定是正确的,大概实际情况正是如此(无论如何他用这一数字是为了使他的估计保守)。首先,到 1930 年代,农村纺纱业被城市商业化的竞争所破

① 李伯重 1998:150—151、219 注 28。

② 同上,109。

③ 同上,185 注 10。

④ 同上,22—23。

⑤ 同上,20—22。

坏。其次,如第5章和第6章讨论过的,有可靠的理由认为,到1930年代江南棉布生产在数量上(从而织工的数量)下降,存留的部分中有一些转移到了城市中。此外,1930年代从中国其他地区运到江南的粮食数量看来也比两百年前要低,尽管城市有了实质性的发展;这种情况确认了其他证据,证明了当地粮食产量肯定有所增长,主要是由于增加了劳动投入。增加的劳动中有一些无疑来自每个劳动力更多的工作,但也有很好的理由认为农业劳动者总数有某种程度的增长。由于所有这些理由,几乎可以肯定江南两百年以前不务农的农村家庭比例高于10%。由于在一些不务农的家庭中,男女成员都会从事纺织业生产,它们会使生产棉布的实际人数增加。如果把城市的产量和所有务农家庭一半以上的家庭中的妇女的产量都计入(回想一下李本人在其他著作中的看法,即清代在江南最终看到了“男耕女织”的理想分工近于完美的胜利^①),不难得出高得多的江南棉布产量数字。这里通过江南原棉输出入相抵的简单化的假定所产生的数字可能有点过高,但推算中已经加入了其他谨慎的假定,所以我仍然认为我对1750年江南人均棉花产量14磅多的估计是处在一个合理的可能范围内。

与联合王国的比较

如果我们同意这个粗略的估计,在纺织技术的突破已经开始推广之后的1800年,联合王国的棉、毛、丝和亚麻产量合计为每人12.9磅^②就是很有启发性的了。(因为一磅亚麻或羊毛生产出的织物按平方英尺计量通常比一磅棉花生产的要少,把这些不同种类的纺织品用一种重量单位混合既是简单化的比较,又会使它向不利于中国的方向倾斜。)遗憾的是,我们不知道长江三角洲的棉布中有多少供输出——这个比例甚至完全可能比联合王国的输出比例(约占产量的1/3)更高,^③因而使这一区域的棉布消费量削减到低于联合王国的水平。但对中国和欧洲生产力最高的地区这种关键商品的产量和大致的消费量的粗略比较得出的这种相似性是有启发意义的,特别是当我们想到长江三角洲的这些府州在1753年有3100万人口,几乎双倍于联合王国的人

334

① 李伯重 1996:99—107。

② Deane and Cole 1962:51、185、196、202。人口数字引自 Mitchell 1988:9—10。理论上,把长江三角洲与不列颠比较更为合适,因为爱尔兰会压低人均数字,而长江三角洲内部并没有一个同等巨大的贫困区域,但我无法拆分联合王国的数字。

③ Deane and Cole 1962:185、196、202。

口时。

全国棉产量及与欧洲其他地区的比较

当我们尝试把全中国与全欧洲进行比较时,资料问题变得更为严重。中国和欧洲的数据都非常零散,生产在地理分布上都太分散,使我们无法集中分析几个重要区域。这方面的一个例外,如我们所见,是丝,长江下游可能占了中国产量的多一半,或许多达 3/4。但丝在纺织品总产量中只占一小部分,棉花生产则相当分散。

遗憾的是,用来产生我们对糖、丝和江南棉花的估计的方法,在用于范围明确的高度商业化区域时很顺利,当应用于广阔的但没有商业化的区域时失灵了。举例来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对人均粮食消费的假定中发生很小的变化,就能轻而易举地把我们对可以用于棉花的耕地估计提高一倍或两倍(比方说,一个非常大的总面积的 3% 到 9%)。所以,我们必须尝试别的方法——从后来的数字向回倒推。

1870 年,捻军和太平天国起义被镇压下去之后不久,中国生产了大约 185 000 万磅棉花。^① 到 1900 年这一数字降到了 150 000 万磅,但那以后开始了新的增长并持续至今。1750 年的产量看来很可能不会低太多,从而人均产量会高出许多。这一主张可能令人吃惊,但通过对中国的主要棉产区一个接一个的检验得到了证实。

首先,重要的是要注意几乎没有大区是从清代开始种棉花。^② 长江中游省份确实在 1750 年以后扩大了棉花种植,但它们从来没有成为非常大的产区。同时,西部省份四川和陕西一些重要产区在 19 世纪转向一种不同的现金作物——鸦片——时,通常以牺牲棉花为代价;这种情况一些发生在 1870 年以前,一些发生在那以后。^③ 尽管在中国各地还分散着其他小型棉花种植区,1750 年和 1870—1900 年最重要的产区都是长江下游和华北。对长江下游来说,没有理由相信棉花产量在 19 世纪有很大增长。1750 到 1850 年间,无论人口还是耕地面积在这一区域最为商业化的部分都完全没有增长,在它的其余部分也没有很大增长;在 19 世纪中叶的大灾难造成巨大损失之后,人

① 根据赵(1977:223)和 Kraus (1968,162)计算。

② 赵冈 1977:23。

③ 同上。

口和耕地面积可能到1900年有所恢复,但直到1949年它们都没有更进一步的增长。^① 由于我们的所有指标都暗示,1750年这一区域用于现金作物的耕地比重已经达到它在两个世纪之后同样的高度——实际上,1930年代这一区域的稻米输入水平可能低于1750年代,暗示着一些土地甚至可能退回到粮食种植——人们会预期现金作物面积也大致不变。如果有变化的话,那就是至少到1900年棉花种植面积可能缩减,因为1870年以后有更多的土地改为种桑。尽管我们的产量数字参差不齐,它们并没有显示出长江流域1750到1900年间棉花有任何增长;也不应该预期有所增长,因为技术没有重要变革,(由于人口没有增加)劳动投入大概也没有很大变化。

我们最后转向华北,华北的资料特别稀少,棉田数量很可能比其他地方波动更大。一方面,克劳斯的估计显示,1900年山东和河北加在一起只有300万亩棉田,到1920年代增长到500—600万亩(尽管军阀战争对这一区域造成巨大破坏),1930年代甚至更高。^② (山东和河北是华北三个产棉大省中的两个;我没有找到第三个省份河南的可用资料。)这种增长可能是对早期水平的恢复,因为我们已经看到全国棉花产量在1870到1900年间的下降,华北,19世纪后期经历了对棉花之类需水作物肯定特别危险的可怕的干旱打击,应该是发生重大下降的一个合乎逻辑的地点。克劳斯的1920年代的数字达到这两省耕地面积的将近3%。

另一方面,赵冈引用的一条18世纪中叶的资料认为,直隶(清代河北省的名称)耕地面积中有20—30%是棉田;仅该省即有1400万—2100万亩。^③ 18世纪另一部史料《棉花图》,说直隶省保定以南有20%—30%的耕地是棉田。^④ 由我们对这一描述理解的精确度决定,我们得出了1820年有3500万—5000万亩登记的土地(再一次可能是对真实面积的过低估计);乘以20%—30%,得出只在这一个省就有700万—1500万亩棉田。即使山东和河北只有10%的土地植棉,也意味着1700万—2400万亩,即1900年数字的6—8倍。^⑤ 如果我们使用前文对其他地区用过的估计方法,接受不合乎实际的过低的耕地面积官方估计,假定人均粮食消费为每年2.2石,^⑥这也是这两省

① 李伯重 1994a:34, Skinner 1977a:213,调整为 Skinner 1987。

② Kraus(1968),转引自黄宗智 1985:126、128。

③ 赵冈 1977:23。

④ 转引自张岗 1985:99。面积数字包括正定、顺德、广平、大名、冀州、赵州、深州和定州,根据梁(1980:401)还可以加上河间和保定本身。

⑤ 关于耕地面积的官方数字、它们的过低及对它们的合理调整,见黄宗智 1985:325。

⑥ Marks(1991:77),记录的估计范围是每人从1.74到2.62石,岭南用2.17石,那里比华北更富裕。

可以用于非粮食作物的近似面积。如果我们接受 1750 年代的耕地面积已经接近于 1930 年代的水平，可以用于非粮食作物的面积就膨胀到值得怀疑的 7000 万—9000 万亩的高度，取决于我们假定粮食消费是每人 2.2 石还是 2.5 石；无论哪种情况，棉花都是最常见的非粮食作物。因而，有很好的理由认为华北在 1750 年可能种植了比 1870 或 1900 年多得多的棉花。

其他资料间接显示了同样的情形。山东和河北的人口在 1750 到 1870 年间增长了 40% 以上，到 1913 年达到 80% 左右，而耕地面积增长得非常少。珀金斯认为，耕地面积实际上完全没有增长。^① 对我们来说这太极端了——如第 5 章所提到的，我认为这些省份甚至在 1800 年还有着比 1930 年代大得多的森林面积。但是甚至 1750 年代可怜的官方耕地数字也显示出到 1873 年有将近 4% 的增长，到 1930 年代则有约 45%；“增长”中包括了把很多以前一直耕种的土地加入到登记册中。^② 在中国其他地方，人地比例的恶化主要通过单位面积产量的巨大增长而平衡，这种增长由更为密集地使用肥料（粪肥和豆饼）、更多的复种作物和每亩地使用更多的劳动（例如极为仔细的中耕）产生。但华北并没有种植任何会像水稻那样对增加劳动作出引人注目的反应的作物；肥料投入的增加主要限于粪肥，因为效力更好的豆饼也更贵；比较短的生长季节排除了复种作物大量发展的可能性。此外，1853 年黄河改道以后不断恶化的涝灾和土壤盐碱化问题完全可能引起山东省成百上千万亩土地的产量下降。所以，看来最可能的是，1750 到 1870、1900 甚至 1930 年间，华北必须用于生产粮食的土地数量比它的耕地数量增长要快得多；这种情况反过来暗示出这一时期这一地区的棉花绝对产量可能有明显的收缩。

因而，华北棉花产量看来可能发生了大幅度下降，像四川和陕西的产量可能发生的情况一样，同时长江下游的产量保持不变；只有长江中游和（推测）河南——两个相当不重要的产棉区——的产量增长。由于这些地区性的结果，看来可能的是，1750 年前后中国棉花的总产量至少与它在 1870 年同样高，或者肯定与 1900 年同样高。

为了再谨慎一点，如果我们用 1900 年的数字，减去用于絮衣被和其他非纺纱用途的棉花，然后除以 1750 年的小得多的人口数（17 500 万—22 500 万），我们得到的平均人均消费量是每人 6.2 磅；使用 1870 年的数字则是每人将近 8.0 磅。这些数字比吴和许对 1840 年的估计高很多，后者根据从 20 世纪的数字的逆推（一种非常微妙的做法，因为我们对 1840 年以后骚乱的一百

① Perkins 1969, 219.

② 黄宗智 1985, 322.

年中产量和生活水平上升还是下降并没有一致意见)。① 他们提出的估计是人均约 3.5 磅(包括棉絮),而我的甚至比较低的估计是 7.5 磅(包括棉絮)。但这实际上并不太令人不安。如果我所说 1750 到 1840 年间棉花总产量没有大的变化是对的,而人口翻了一番(许和吴使用的 1840 年的数字是 40 000 万),他们对 1840 年的人均估计就应该是我的 1750 年估计的一半左右。所以我对 1750 年的估计范围看来是合理的,而低端可能比高端更合理。

这些数字与欧洲比较会怎样? 1800 年联合王国的消费(包括爱尔兰)约为人均棉、毛、丝、麻合计 8.7 磅。② 法国 1780 年代的亚麻产量看来在人均 6.9 磅左右,棉花则是微不足道的 0.3 磅。③ 现有的羊毛数据只有平方码而没有磅,准确的换算取决于生产的织物种类;但利用一个看起来相当可靠的比例计算,1800 年前后的产量达到每人每年 1.18 磅。④ 因而看来法国大革命前夜的人均纺织品产量大致与我对中国的较高的估计相似,比我的底线估计高 1/3。至于德国,我能找到的最早的数字显示出纺织品产量比中国低得多:1816 年的羊毛产量人均不过 1.1 磅,1838 年的棉花产量甚至只有人均 0.6 磅,1850 年的亚麻产量约为人均 3.3 磅,合计为人均纺织品总产量 5 磅。⑤ 从英格兰输入的棉布无疑使德国人的消费高于这些产量数字,但看来 19 世纪初期德国人每年使用的衣料仍然可能比 75 年以前中国人的平均水平低。当然,德国远非欧洲最穷的地区——我不知道 19 世纪后期以前东欧或南欧的任何可用的数字——而我们对中国的估计包括了帝国最遥远和最贫穷的地区。因而,看来 18 世纪中期和后期中国人的纺织品消费完全可以与欧洲人的消费相匹敌。

338

① 黄宗智 1985:322。

② 据 Deane and Cole 1962:51,185,196,202 计算。

③ 数据引自 Mitchell 1980:30,448,478。

④ 数据引自 Markovitch 1976:459;度量衡的资料见 497 页。为了换算成磅,我使用赵(1977:234)对粗布重量的估计,及 Jenkins 和 Ponting(1982:11—12)对羊毛纱线重量 1.5 倍于同样长度和粗细的棉纱的观测。

⑤ 数据引自 Markovitch 1980:30,448,464,478。